

版權信息

Copyright © 1985 by Yale University Pres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Yale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7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權合同登記號 圖字：10-2003-133號

書  名　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作  者　（美國）詹姆斯·C.斯科特

譯  者　鄭廣懷　張敏　何江穗

責任編輯　陳　葉

出版發行　譯林出版社

ISBN 　　9787544717250

關注我們的微博： @譯林出版社

關注我們的微信：yilinpress

意見反饋：@你好小巴魚

目录

[前言 3](#_Toc68788082)

[第一章 階級戰爭中的短兵相接 6](#_Toc68788083)

[拉扎克 7](#_Toc68788084)

[哈吉·“布魯姆” 11](#_Toc68788085)

[權力的象征性平衡 14](#_Toc68788086)

[第二章 常規的剝削，常規的反抗 16](#_Toc68788087)

[未被書寫的反抗史 17](#_Toc68788088)

[作為思想和象征的反抗 20](#_Toc68788089)

[人類行動者的經驗與意識 22](#_Toc68788090)

[第三章 反抗的景觀 24](#_Toc68788091)

[背景：馬來西亞和水稻主產區 25](#_Toc68788092)

[中層背景：吉打州和穆達地區的灌溉系統 28](#_Toc68788093)

[第四章 塞達卡：從1967年到1979年 37](#_Toc68788094)

[村莊 37](#_Toc68788095)

[富與窮 39](#_Toc68788096)

[村莊構成 44](#_Toc68788097)

[土地占有與使用 45](#_Toc68788098)

[租佃的變化 47](#_Toc68788099)

[水稻生產的變化和工資的變化 50](#_Toc68788100)

[地方機構和經濟權力 55](#_Toc68788101)

[第五章 勝利者和失敗者眼中的歷史 60](#_Toc68788102)

[分類[226] 61](#_Toc68788103)

[夜行船[232] 63](#_Toc68788104)

[綠色革命的階級史[238] 66](#_Toc68788105)

[雙耕與雙重看法 67](#_Toc68788106)

[從活租到死租 69](#_Toc68788107)

[聯合收割機 71](#_Toc68788108)

[失去的地盤：土地的獲得 75](#_Toc68788109)

[慈善的儀式與社會控制 77](#_Toc68788110)

[記憶中的村莊 80](#_Toc68788111)

[第六章 延展事實：意識形態的運作 82](#_Toc68788112)

[特定情境中的意識形態運作 83](#_Toc68788113)

[剝削的詞匯表 84](#_Toc68788114)

[歪曲事實：分層與收入 89](#_Toc68788115)

[合理化的剝削 91](#_Toc68788116)

[意識形態沖突：村莊大門 94](#_Toc68788117)

[意識形態沖突：村莊改進計劃 97](#_Toc68788118)

[作為反抗的爭論 102](#_Toc68788119)

[第七章 超越口舌之戰：謹慎反抗與適度遵從 105](#_Toc68788120)

[公開的集體反抗的障礙 106](#_Toc68788121)

[抵制聯合收割機的努力 108](#_Toc68788122)

[“常規的”反抗 111](#_Toc68788123)

[“常規的”鎮壓 118](#_Toc68788124)

[常規的順從與不留痕跡的反抗 120](#_Toc68788125)

[服從以及部分的文本 122](#_Toc68788126)

[何謂反抗？ 124](#_Toc68788127)

[第八章 霸權與意識：意識形態斗爭的日常形式 129](#_Toc68788128)

[塞達卡的物質基礎和規范性上層建筑 130](#_Toc68788129)

[重新思考霸權概念 134](#_Toc68788130)

[附錄 146](#_Toc68788131)

[附錄A 村莊人口記錄，1967—1979 146](#_Toc68788132)

[附錄B 不同土地使用類型/農場規模的農場收入比較（穆達地區，1966、1974和1979年） 147](#_Toc68788133)

[附錄C 關于土地使用情況變更、凈利潤及政治事務的數據 148](#_Toc68788134)

[附錄D 飛翔信的譯文 152](#_Toc68788135)

[參考文獻 154](#_Toc68788136)

[索引 164](#_Toc68788137)

[地圖 182](#_Toc68788138)

[譯后記 185](#_Toc68788139)

[“弱者的武器”：研究農民政治的底層視角 185](#_Toc68788140)

[注釋 188](#_Toc68788141)

# 前言

任何研究領域的局限性在與其相關研究的共有定義中最能突顯出來。大量的關于農民的近期研究——包括我本人的和其他人的——都關注反抗與革命的問題。平心而論，除了關于親屬關系、儀式、耕作和語言方面一貫的標準民族志描述之外，更多的關注集中于有組織的、大規模的抗議運動，因為它們盡管只是曇花一現，卻顯然對國家造成了威脅。我可以想到對此類運動重要性的共同理解得以盛行的原因在于一系列相互強化的因素。對左派而言，對農民起義的過度關注顯然受到越戰和現在已經開始消退的左翼學術界對民族解放戰爭的迷戀的刺激。絕對以國家利益為中心的歷史記錄和檔案鼓勵了這種迷戀，它們從不提及農民，除非農民的行動對國家構成威脅。另一方面，農民只是作為征召、糧食生產、稅收等方面的匿名“貢獻者”出現在統計數字中。這種視角下的每項研究強調了不同的側面。一些研究只能是強調外來者——預言家、激進知識分子、政黨——在動員通常懶散、無組織的農民的過程中的角色。另一些研究關注的只是西方社會科學家最為熟悉那些運動——那些擁有名稱、旗幟、組織機構和正式領導階層的運動。還有一些研究，只是在精確考察那些可能在國家層面推動大規模的、結構性變遷的運動方面有所貢獻。

我認為，這種視角所忽視的是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貫穿于大部分歷史過程的大多數從屬階級極少能從事公開的、有組織的政治行動，那對他們來說過于奢侈。換言之，這類運動即使不是自取滅亡，也是過于危險的。即使當選擇存在時，同一目標能否用不同的策略來實現也是不清楚的。畢竟，大多數從屬階級對改變宏大的國家結構和法律缺乏興趣，他們更關注的是霍布斯鮑姆所稱的“使制度的不利……降至最低”[[1]](#_1_96)。正式的、組織化的政治活動，即使是秘密的和革命性的，也是典型地為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所擁有；在這一領域尋找農民政治大半會徒勞無功。并非偶然，這也是走向結論的第一步：農民階級在政治上是無效的，除非他們被外來者組織和領導。

就其真正發生時的重要性而言，農民叛亂是相當稀少的——更不用說農民革命了。它們大多被輕而易舉地粉碎，即使非常罕見地成功了，令人悲哀的是其達到的結果也很少是農民真正想要的。無論是哪種革命的成功——我并不想否認這些成果——通常都會導致一個更大的更具強制力的國家機器，它比其前任更有效地壓榨農民以養肥自己。

鑒于上述原因，對我而言更為重要的是去理解可以稱為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的斗爭——農民與試圖從他們身上榨取勞動、食物、稅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間平淡無奇卻持續不斷的斗爭。此類斗爭的大多數形式避免了公開的集體反抗的風險。在此我能想到的這些相對的弱勢群體的日常武器有：偷懶、裝糊涂、開小差、假裝順從、偷盜、裝傻賣呆、誹謗、縱火、暗中破壞等等。這些布萊希特式——或帥克式——的階級斗爭形式有其共同特點。它們幾乎不需要協調或計劃，它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網絡，通常表現為一種個體的自助形式，它們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與權威對抗。了解這些平凡的反抗形式就是理解農民長期以來為保護自己的利益對抗或保守或進步的秩序所作的大多數努力。我猜想長期以來正是這類反抗最有意義和最有成效。因而，研究封建主義的歷史學家布洛赫指出，相對于“農村社區頑強進行的堅韌的、沉默的斗爭”而言，偉大的千年運動也只是“曇花一現”；這類斗爭旨在避免對他們的生產剩余的索要和維護他們對生產資料——如耕地、林場、牧場等的所有權[[2]](#_2_93)。這一觀點肯定也適用于對新大陸奴隸制的研究。對奴隸與其主人關系的分析不能僅僅去尋找納特·特納或約翰·布朗式罕見的、英雄主義的、注定失敗的舉動，而必須著眼于圍繞工作、食物、自主權、儀式的持續不斷的瑣碎的沖突——即反抗的日常形式。在第三世界，農民很少會在稅收、耕作模式、發展政策或繁瑣的新法律等問題上去冒險與當局直接對抗；他們更可能通過不合作、偷懶和欺騙去蠶食這些政策。他們寧愿一點一點地擠占土地而不是直接侵占土地；他們選擇開小差而不是公開發動叛亂，他們寧可小偷小摸也不去搶公共的或私人的糧倉。而一旦農民不再使用這些策略而是采取堂吉訶德式的行動，這通常是大規模鋌而走險的信號。

這種低姿態的反抗技術與農民的社會結構非常適合——農民階級分散在農村中，缺乏正式的組織，最適合于大范圍的游擊式的自衛性的消耗戰。他們的行動拖沓和逃跑等個體行動被古老的民眾反抗文化所強化，成千上萬地累積起來，最終會使得在首都的那些自以為是的官員所構想的政策完全無法推行。反抗的日常形式不需要名目。但是，就像成百上千萬的珊瑚蟲形成的珊瑚礁一樣，大量的農民反抗與不合作行為造就了他們特有的政治和經濟的暗礁。在很大程度上，農民以這種方式表明了其政治參與感。打個比方說，當國家的航船擱淺于這些暗礁時，人們通常只注意船只失事本身，而沒有看到正是這些微不足道的行為的大量聚集才使失事成為可能。僅此而言，理解這些無聲的匿名的農民行動的顛覆性就是十分重要的。

為了這樣一個目標，我在馬來西亞的一個村莊里度過了兩年（1978—1980）時間。這個村莊被我稱為塞達卡，這并不是它的真名。它是吉打州水稻主產區一個以種植水稻為主的小村落（有70戶人家），該村在1972年開始引入雙耕。[[3]](#_3_88)與其他許多“綠色革命”一樣，它使得富人更為富有，而窮人仍然貧窮甚至變得更窮。1976年大型聯合收割機的引進或許更是致命的一擊，它使得小土地所有者和無地勞動者失去了三分之二掙工資的機會。在這兩年當中，我設法收集了大量的相關資料。我在關注反抗實踐本身的同時也關注村莊內的意識形態斗爭——它為反抗寫就了腳本。在本書中，我試圖討論反抗和階級斗爭的重大主題，以及賦予這些主題以實踐和理論意義的意識形態支配問題。

在塞達卡，貧富之間的斗爭不僅是關于工作、財產權、糧食和金錢的斗爭，它也是關于占有象征符號的斗爭，是有關過去和現在如何被理解和被分類的斗爭，是確認理由、評價過失的斗爭，也是賦予地方歷史黨派意義的斗爭性努力。這一斗爭的細節并不光彩，通常包括背后誹謗、流言蜚語、人身攻擊、給人起綽號、肢體語言和無聲的蔑視等，這些大部分都局限在村莊生活的“后臺”。而在公共生活中——亦即在負載權力的情境中——經過精心算計的遵從是普遍和經常的狀態。階級沖突的這一方面的顯著特征是它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一個共同的世界觀。例如，如果沒有關于什么是越軌、什么是可恥和無禮的共同標準，那么任何流言蜚語和人身攻擊就是毫無意義的。在一定意義上，爭論的強烈程度基于這樣的事實：人們所主張的共同價值觀遭到背離。人們爭論的不是價值觀本身，而是這些價值觀適用的事實：誰富、誰窮、何以致富、何以貧窮、誰吝嗇、誰逃避工作等。這些斗爭除了可以視做動員社會輿論的約束性力量以外，還可視為這一小共同體中窮人為抗拒他們所遭受的經濟和儀式上的邊緣化并堅持最低限度的公民的文化尊嚴而進行的努力。這種視角含蓄地肯定了“以意義為中心”的階級關系分析的價值。在本書最后一章，我將就更廣泛的意識形態支配和霸權問題進行說明和探討。

在塞達卡度過的14個月中，我有時興高采烈，有時萬分沮喪，有時手足無措，有時辛苦乏味，這些是每個人類學家都能夠體會到的。由于我并非正式的人類學家，因而所有這些經驗對我來說都是全新的。如果沒有貝利給予我的實用的田野研究講座，我將不知如何去做。即使是在這些明智的建議的指引下，我仍然對人類學家從早上起床到晚上入睡一直處于工作狀態的基本事實缺乏準備。在最初的幾個月里，我去室外活動大半沒有目的而是為了自己獨處。我發現需要保持一種審慎的中立——亦即保持緘默，這是明智的，但同時也是巨大的心理負擔。隨著我自己的“隱藏的文本”（參見第七章）的增多，我首次認識到瓊·杜韋格納德的評論的正確性：“在多數情況下，村莊會向外來研究者做出讓步，而研究者通常求助于隱藏。”[[4]](#_4_88)我同樣發現鄰居們總是原諒我難免犯的錯誤，在每一點上容忍我的好奇心，他們對我的不適當行為并不在意，并允許我在他們身邊工作。他們有著既嘲笑我同時又與我友好相處的非凡能力，他們具備劃分界限的尊嚴和勇氣，他們善于社交，經常在非收獲季就感興趣的話題與我徹夜長談。他們的友善表明，相對于我適應他們來說，他們更好地適應了我。和他們在一起的時光對我的生活和工作的意義是言辭的感謝不足以表達的。

盡管我努力刪減原稿，但它依然很長。主要原因在于許多特定故事的講述對于揭示階級關系的結構和實踐是絕對重要的。既然每個故事都至少有兩面，因而有必要考慮社會沖突所產生的“羅生門效應”的存在。努力講述這些故事的另外一個原因在于，要將一種貼近底層的階級關系的研究提升到一個相當的高度。我認為這些更為宏觀的思考需要有血有肉的詳細實例來呈現本質。因而，一個實例不僅是將一般概括具體化的最成功途徑，而且它具有比歸納出的原則更為豐富和復雜的優勢。

在馬來語很難直譯的地方，或馬來語表達本身很有意思的地方，我都將其加在正文或腳注里。除了對那些外來者所做的正式演講，我從不使用磁帶錄音機進行記錄。我的工作是依靠談話時片斷的筆記或事后馬上進行追記來完成的。由于許多句子中只有一些比較容易記住的片斷可以憶起，結果使得我所記錄的馬來語有某種類似電報的性質。剛到時，我聽不懂吉打州農村的方言，相當多的村民用他們在市場上所用的更簡單的馬來語對我說話。

我覺得，本書的寫作還有一個特殊緣由。與其他鄉村研究相比，它更多是研究對象的產物。在我開始研究時，我的想法是展開我的分析，將研究寫出來，并準備一個關于我的發現的簡短的口頭版本，然后回到村民中去收集他們對此的反應、意見和批評。這些反應將收集在最后一章——作為“村民的回應”的部分，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將其視為那些應該知曉本書內容的人所做的“書評”。事實上，在塞達卡的最后兩個月中，我的確花了更多的時間用于從大多數村民中收集這些意見。在各種各樣的評論中——這些評論通常反映了評論者的階級立場——充滿著一系列針對我所忽視問題的富于洞見的批評、修正和建議。所有這些在改變原有分析的同時也提出了一個問題。我是否應該將我較早的愚鈍的分析交給讀者而只在最后才呈現村民提出的見解呢？這是我最初的想法，而當我動筆時，我發現把我現在已經知道的當做不知道來寫是不可能的，于是我逐步把這些洞見融入到我自己的分析中。其結果就是去理解在何種程度上塞達卡的村民既是形成分析的原因，也是研究的原始素材，并因此使得那些復雜的談話更像是一種獨白。

最后，我要強調這是一個非常自覺的地方階級關系的研究。這意味著農民——國家關系可能為很多反抗提供解釋，但在本書中，除非它們影響了地方階級關系，否則不會被涉及。這也意味著那些在任何政治危機中都相當重要的族群沖突、宗教運動或抗議也基本上沒有被涉及。本書也不去分析這里所考察的細微階級關系的經濟起源，這些源頭不難一直追溯到紐約和東京的董事會議上。這還意味著處于省或國家層面的正式的政黨政治也將被忽略。從一個角度看，所有這些省略都很可惜。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里的努力是要表明地方階級關系是多么重要、多么豐富和復雜，還表明不以國家、正式組織、公開抗議、民族問題為中心的分析視角將給我們帶來的潛在發現。

下面這些過于冗長的謝辭意在表明為了進行研究我必須學習的許多東西，同時也表明那些教導我的人的耐心和大度。對于塞達卡的那些家庭——出于顯而易見的原因他們的名字被隱去——我所欠甚多，這筆債之所以沉重，原因在于我所寫的內容讓不止一個人感到他們的友好被濫用了。當然，對一個專業的外來者而言，那是一種人性的困境，而我只能期待他們將會發現我是以誠實的努力和自己有限的學識來公正地對待我的所見所聞的。

我的接待單位是位于檳榔嶼州的馬來西亞理科大學（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比較社會科學院。作為客人或學者，我是非常幸運的。我要特別感謝學院的Mansor Marican, Chandra Muzaffar, Mohd Shadli Abdullah, Cheah Boon Kheng, Khoo Kay Jin, Colin Abraham及副校長兼院長Kamal Salih和院長助理Amir Hussin Baharuddin，感謝他們的建議和友善。Nafisah bte.Mohamed作為吉打州方言的特別輔導老師，幫助我為田野工作進行準備。馬來西亞理科大學政策研究中心對吉打州的穆達工程和與之相關的農業政策進行了許多出色的研究。該中心的Lim Teck Ghee 和David Gibbons不僅幫助我制訂研究計劃，而且還成為我彌足珍貴的朋友和批評者，他們的功勞在書中隨處可見——即使在我決定自行其是的時候。我還要感謝Sukur Kasim, Harun Din, Ikmal Said, George Elliston，當然還有中心主任K.J.Ratnam。位于亞羅士打附近Teluk Chengai的穆達地區農業發展局總部的官員們總是非常慷慨地貢獻他們的時間、他們的統計數據，尤其是他們的豐富經驗。任何發展項目中要找到這樣一些有知識、嚴格而坦率的官員都不是件容易的事。Affifuddin Haji Omar和S.Jegatheesan，以及時任穆達地區農業發展局總經理的Datuk Tamin Yeop，都給予了很多幫助。

與我的研究路徑互有交叉、對馬來西亞鄉村社會進行研究并著述的“無形學院”的成員們，對于我的理解和分析貢獻良多。由于他們人數眾多，我無疑會有所遺漏。他們中的一些人或許寧愿不被提及，而我還是必須提到這樣一些名字，他們是Syed Husin Ali, Wan Zawawi Ibrahim, Shaharil Talib, Jomo Sundaram, Wan Hashim, Rosemary Barnard, Aihwa Ong, Shamsul Amri Baharuddin, Diana Wong, Donald Nonini, William Roff, Judith 以及Shuichi Nagata, Lim Mah Hui, Marie-André Couillard, Rodelfe de Koninck, Lorraine Corner和Akira Takahashi。兩位來耶魯做畢業論文的馬來西亞理科大學的教師Mansor Haji Othman和S.Ahmad Hussein給我提出了重要的建議和批評。最后，我要特別感謝東京發展經濟學研究所的掘井健三的慷慨，他在1968年對塞達卡的土地所有制進行了研究并得出可以利用的結果，如此我才能確定十年間的變化究竟意味著什么。

最后的手稿在同事們細致的批評指正下有了很大改觀。我忍痛割愛，不再爭論那些他們認為荒謬或無關緊要——或兩者兼是——的論題，同時增加了他們認為必要的歷史性和分析性的內容。即使我拒絕他們的看法，我也總是盡量通過加強或改變我的立場來減少直接的打擊。然而，到此為止吧。如果完全遵從他們的想法，我可能還在改稿子并努力調整他們無意造成的混亂。我迫不及待地要回報他們的厚愛。感謝Ben Anderson, Michael Adas, Clive Kessler, Sam Popkin（對，就是他），Mansor Haji Othman, Lim Teck G hee, David Gibbons, Georg Elwert, Edward Friedman, Frances Fox Piven, Jan Gross, Jonathan Rieder, Diana Wong, Ben Kerkvliet, Bill Kelly, Vivienne Shue, Gerald Jaynes和Bob Harms。還有一些未提及姓名的人，他們同意甚至請求閱讀原稿，或許他們看到書稿之巨后又改變了想法。他們知道他們是誰。真是遺憾！

自1978年以來，許多機構的資助使得我和這項研究事業得以持續。我要特別感謝約翰·西蒙·古根海姆紀念基金會（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國家科學基金（批準號SOC 7802756）和耶魯大學對我在馬來西亞研究的支持。最近，由麻省理工學院“科學、技術與社會項目”授予的埃克森基金（Exxon Fellowship）使本書的終稿和大多數修訂工作得以完成。Carl Kaysen容忍了我對書稿傾注過多的精力，并且與Martin Kreiger, Kenneth Kenniston, Charles Weiner, Peter Buck, Loren Graham, Carla Kirmani, Leo Marx和Emma Rothschild一起，幫助我保持智識上的收獲。由日本大阪的國家民族學博物館主辦、Shigeharu Tanabe和Andrew Turton安排的“東南亞的歷史與農民意識”研討會，有助于使我的觀點更加明晰。由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幫助組織的在海牙社會研究所舉行的另一個有著更多爭論的工作討論會，對本書第七章有關反抗的分析起了重要的作用。盡管我不清楚這兩次會議的參與者是否完全認同我所提出的論點，但他們至少應該知道他們的著述和批評對本書具有何等重要的價值。

應當感謝的還有下列對本書早期的部分內容給予發表的出版物：《國際政治科學評論》（1973年10月）；《東南亞的歷史與農民意識》（Andrew Turton和Shigeharo Tanabe編，《山崎民族學研究》第13期；大阪：國家民族學博物館，1984）；《政治人類學》（1982）；《馬來西亞研究》1:1（1983年6月，馬來文）。

本書的出版傾注了許多打字員、排版員和編輯的心血，他們高興地看到這一出自他們之手的書稿。其中我特別要感謝的是Beverly Apothaker, Kay Mansfield和Ruth Muessig出色的工作。

本書與我的家庭生活的相互交融已經足以免除任何通常在此要說的常規套話。在此我可以說，盡管我努力了，但從未能夠哪怕稍微讓路易絲和孩子們相信，他們也在為我寫作本書出力。

# 第一章 階級戰爭中的短兵相接

嚴格地說，這并不是主張“道德”是人類選擇和意志的某種“自治領域”，獨立地出現在歷史過程之中。這樣一種關于道德的觀點從來就不夠唯物主義，它通常將強大的慣性——有時是強大的革命性力量——簡化為一個充滿希望的理想主義的虛構。這就是說，與之相反，每一種矛盾都既是價值的沖突，也是利益的沖突；每一種“需求”在它成為“應然”的過程中，都含有情感和“要求”（反之亦然）；每一種階級斗爭同時也是關于價值觀的斗爭。

E.P.湯普森：《理論的貧困》

## 拉扎克

這是一個種植水稻的小村莊，作為村莊通道的那條狹窄的小路在那個早晨顯得比平時繁忙。成群的婦女正趕著去插秧，男人們則騎自行車載著他們的孩子去鄰近的凱帕拉·巴斯塔鎮上的學校上早課。我的孩子們像往常一樣圍在窗邊觀望，而每一個路過的人也同樣注視著我們，從我住的房子進入他們的視野直到從其視野中消失。這一情景在幾個星期內成為每日的儀式。塞達卡的村民正在滿足對生活在他們當中的陌生家庭的好奇心。另一方面，我的孩子們也在滿足一種更為不懷好意的好奇心。他們開始溫和地抱怨自己如同缸里的金魚一樣的處境，而且確信遲早有人會因探頭觀望而不留神走進或騎進路旁的溝渠。這種喜劇般的可能性引起了他們的想象，當它不可避免地發生時，他們希望親眼目睹。

但事情似乎有點不對頭。一小群人靜靜地站在隔壁的房子前面，一些過路的人停下來和他們交談。哈姆扎、他的哥哥拉扎克和嫂子阿齊扎，還有村里的產婆托[[5]](#_5_80)·沙赫·比丹[[6]](#_6_76)都來了。他們說話的語調壓抑而低沉，時斷時續。往常這個時候，阿齊扎已經和其他貧窮人家的婦女與她的插秧組一起出發去工作了。在我準備離開前，和我同住這棟房屋的富有地主哈吉[[7]](#_7_74)·卡迪爾走進來告訴我所發生的一切，“拉扎克兩個季前出生的小孩死了”，“這是她的命，她運氣不好”。

情況簡單明了：兩天前，小孩發燒病倒了。在吉打州，發燒在旱季的末期是常見的，但是這一次看起來要比通常的發燒嚴重，有人認為也許是麻疹。昨天她被送到勒拜·薩卜拉尼那里，他是一個受人尊敬的布道者和傳統的治病術士，住在鄰近的雙溪通港村。他為孩子誦讀《古蘭經》中的詩篇，并在她的額頭上敷了膏藥。拉扎克后來告訴我，我才知道自己也牽涉其中。如果我不去訪問另一個村莊，他就會請我開車把孩子送到州府亞羅士打的診所或醫院。因為我不在，他才去求沙姆蘇爾，沙姆蘇爾是村里除我之外唯一有車的人，沙姆蘇爾告訴他需要15馬元的油錢。拉扎克身無分文，我猜想，他對醫院也沒有足夠的信任。而他的女兒在第二天的黎明前就夭折了。

我本能地走向拉扎克的住處，它位于哈姆扎家房屋的后面，尸體通常要在那停放。拉扎克叫住了我：“她不在這兒，我們把她放在哈姆扎家，那里比這好。”他的尷尬可以從他避開我的目光中顯現出來。

拉扎克是村里的“貧困戶”，他的房子不僅僅對他而言是一種尷尬，對大多數塞達卡人來說也是一種集體的恥辱。我到達村莊的時候，拉扎克和他的家人可以說是住在房子下面，而不是房子里面。兩面竹木墻已經傾斜，大部分的屋頂也已經坍塌。村里人嘲笑說：“他們像小雞住在雞窩里一樣，房子是單坡屋頂，和馬來人的不一樣。”不久以后，執政黨的當地領導人巴塞爾了解到拉扎克加入了他所在的黨派，而且對他來說，村里任何馬來人像畜牲一樣露宿是非常尷尬的，于是他讓村長從他可支配的資金中拿出適當的錢購買木材來修復這房子。一小群全部來自執政黨的志愿工作者修好了房子的三面墻，留下最后一面墻和屋頂讓拉扎克來完成。畢竟，拉扎克和阿齊扎得在那屋頂下生活。然而，屋頂依然如故，而且用來修最后一面墻的木板也不見了，拉扎克把它們賣了兩次——一次是賣給羅吉婭，另一次賣給了卡米勒，但只有卡米勒得到了木材；羅吉婭把拉扎克稱做“老騙子”，還說他連自己的孩子也會賣掉。她發誓說她再也不會從他那買任何東西，除非她先拿到貨。

當我爬上梯子進入哈姆扎家時，我意識到這是我第一次真正進入他家人生活起居的房間。此前我從未進過拉扎克的家或村里其他最貧窮的6戶人家。他們總是在屋外接待我，我們要么蹲著，要么坐在簡陋的長凳上。我們之所以留在外面是因為他們對自己房屋的狀況感到尷尬，而且實際上進屋意味著有一定的款待（如咖啡和小點心），那將使他們原本匱乏的生活更為緊張。在可能的情況下，我盡量在公共場合去見他們，比如，在稻田里、路上、村里兩個小店中的某一個或者每周兩次在市場旁邊相見。在這些地方，我可以合理地扮演主人的角色。對村里的富人來說，這從來不是問題；他們從來不進窮人的家。拜訪總是沿著地位階梯向上進行的，只有地位相等的除外，尤其是在穆斯林齋月結束后的儀式性訪問中。事實上，訪問模式服務于確定村莊的地位等級。這種模式只有在窮人家發生嚴重疾病和死亡的情況時才會破例，這時，待客的通常規則暫時停止，以表達對更普遍的人生禮儀的尊重。

這就是瑪茲娜（拉扎克的女兒）的夭折使得哈姆扎的家門得以向我和其他人開放的原因。女孩躺在小床墊上，被從房椽上垂下的蚊帳包圍著。她的身體裹在一塊新白布里，她的小臉由于被那種婦女祈禱時所戴的花邊頭巾覆蓋，幾乎看不見了。在蚊帳旁邊燃著一炷香，放著一個錫盤。每一個新來的訪問者在掀開蚊帳看一眼女孩后，都會在盤子里放點錢，少則5角，多則2馬元[[8]](#_8_74)。這筆捐款將用做葬禮的開支，稱為“救急款”或“緊急捐助”，由于拉扎克和其他許多非常貧窮的村民都未參加能夠支付喪葬費用的死亡撫恤金會，這些捐助就尤為必要。一天下來，盤子里的錢至少可以支付最小的禮儀費用。

大約25個村民，大部分是女人，坐在這間破屋的地板上輕聲地相互交談著。幾個男人自己聚在一起交談，但大多數迅速離開加入到屋外的其他男人中。坐在地板上的拉扎克被忽視了，但是他被孤立并非表達對他個人悲痛的一種集體尊重。在筵席上，在其他葬禮上，在村莊的店鋪中，甚至在市場的貨攤上，其他男人總是與拉扎克保持一定距離。他無法使自己加入其中，即使他女兒的死亡也不例外；那些起身離開的男人們從他身邊不慌不忙地走過，好像他只是一件家具。當他被提起的時候，人們的語調是明白無誤的。有時，一群男人坐在村子的一家店鋪中邊喝冷飲邊抽煙，看見他來了，人們會以“敦[[9]](#_9_70)·拉扎克來了”作為招呼，隨之而來的是周圍心照不宣的笑聲。敦·拉扎克是馬來西亞第二總理的貴族頭銜，這一稱謂用在這個貧賤的、虛弱的、諂媚的最下等村民身上是要說明他的地位。那天如果誰做東誰就會付他的飲料錢，而拉扎克則吸著自己用煙草和切碎的聶柏櫚葉做成的農民式香煙。他被給予了最低程度的禮遇，但在其他方面被忽略了，就像今天村民在埋葬他的女兒，而他本人最好還是被視而不見。

直接穿過村中的小路，在集中了村莊會所、伊斯蘭學校[[10]](#_10_68)和祈禱場所的建筑外面，幾個年輕人開始丈量他們收集來的不多的木板，準備做一具棺材。雅各布覺得木板太長了，于是村長的兒子達烏德被派回哈姆扎家拿繩子去丈量。這時，巴塞爾帶來了熱茶和用來墊在棺材下面的特制帆布。如同經常發生在咖啡店里的一樣，話題變成了有關拉扎克的許多可笑的故事的交流，這當中大部分構成了村里流言蜚語的來源。阿明講了最近的與政府資助的房屋改造和建設永久性室外廁所[[11]](#_11_64)有關的分期付款的事情。拉扎克連同其他執政黨的成員（只有他們）是一種瓷制抽水馬桶的受益者。盡管已經被明確告知這一物資不許買賣，拉扎克還是拿它和阿明的塑料馬桶進行了交換，并換回一些現金，而后又將塑料馬桶以15馬元的價錢賣給了諾爾。雅各布開玩笑地問道，拉扎克甚至連房子都沒有，為什么要建一個廁所呢？

雅各布接著問有沒有其他人看見拉扎克兩天前在羅吉婭女兒的婚宴上大口猛吃咖哩飯，而這場筵席并沒有邀請他。沙赫儂補充道，就在昨天，當拉扎克來到集市的咖啡店時，他請拉扎克喝咖啡，這意味著由沙赫儂買單。接下來他注意到拉扎克不但喝了咖啡，還帶走了三塊蛋糕和兩支香煙。部分由于我的提醒，其他一些人回憶起拉扎克是如何從卡米勒那里拿到買屋頂木材的錢而不交貨，以及卡米勒是如何把買特種稻種的現金付給他，因為拉扎克說他可以從鄰村的一個朋友那兒拿到這些種子。可一個星期以后，他說他朋友和種子都不在家里。又過了一個星期，他說他朋友已經把種子賣了。而這筆錢卻從未退還。在不同的場合，人們還說到拉扎克經常以播種的名義討要稻種，以養家糊口為由要飯，而每一次村民的施舍都被他換成了現金，既沒有耕種也沒有吃掉。加扎利指責他未經允許私自使用他房屋后面的聶柏樹做房頂，而且甚至在收割季之前，他就開始討要伊斯蘭教每年一次的稻谷施舍（扎卡特[[12]](#_12_62)）。在許多人不停地搖頭時，他補充道，“我發脾氣了”。

當富人們不斷地抱怨他們所雇用的田間勞力變得越來越懶惰和獨立的時候，拉扎克總是現成的例子。盡管他們也有其他的例證，但拉扎克到目前為止是最適用的。他們說有許多次，拉扎克提前拿了工資（現金或稻米的形式）卻不出來工作。對于他的貧窮他們心存懷疑，畢竟他有半里郎[[13]](#_13_60)（0.35英畝）地，但他卻像地主一樣租了出去，而不是自己耕種[[14]](#_14_60)。對拉扎克的普遍看法是他簡直不成器。當村長阿布杜爾·馬吉德向我談及窮人不再愿意工作并要求不切實際的工錢時，他援引了拉扎克的例子，“他使自己陷入困境，那是他自作自受”。

現在簡易棺材差不多做成了，村里最好的木匠阿明開始做一些小裝飾添加上去。阿里芬提出，“沒有必要添加裝飾”，于是阿明停了下來。當他們把棺材運到停放瑪茲娜的哈姆扎家中時，有人察看了棺木的做工后說，“太破了”。

在回住所的路上，我碰到一群帕克·哈吉·卡迪爾妻子的朋友在議論孩子的亡故。她們似乎都覺得這很大程度上是拉扎克和阿齊扎的過錯。畢竟，前天他們把生病的女兒帶到了羅吉婭的筵席上，喂她不該吃的東西，而且讓她一直待到深夜。“他們吃得很差，”托·卡西姆的妻子說，“他們只能吃些其他人筵席的剩飯。”在我的追問下，她們向我透露了這個家庭飲食匱乏的細節。比如早餐，如果家里有點錢，就是咖啡和木薯或者是前一天剩下的一點冷飯。如果沒有錢，就只有水。有人補充說拉扎克家里的飲用水和洗浴用水來自同一個溝渠。早餐很少有粥，從沒有牛奶，而且幾乎沒有糖，除非從阿齊扎在杜蘭村的親戚那兒拿來一點。同他們相比，村長哈吉·加法爾則經常在鎮上的咖啡店吃早餐，在那里他喝粥或者吃加糖或咖哩的油炸面包片，還有各種蛋糕、用糯米做的甜點和加甜濃縮牛奶的咖啡。中餐在村里是正餐，拉扎克一家人經常吃的是米飯和從村里免費采集到的蔬菜[[15]](#_15_60)，如果經濟狀況允許，會有一些從市場上買回來的干魚或最便宜的小魚。沒有人見過拉扎克買過蔬菜。當他們吃新鮮魚的時候，通常是直接放在明火上燒烤，因為他們幾乎買不起最少賣3角錢的最便宜的烹調油。而在一另方·面，哈吉加法爾的中餐則表現出他的富有和更是奢侈的偏好：用市場里買來的蔬菜和最貴的魚做成的美味的咖哩飯，每周至少吃兩次肉，這是拉扎克從未有過的奢侈。

拉扎克的家庭用品和他家的食物一樣，所擁有的比所缺乏的少得多。這對夫婦沒有蚊帳，他們的孩子手臂和腿上經常帶著蚊蟲叮咬的痕跡。他們大概一年才買一條最便宜的肥皂。他們吃飯的時候只能共用三個錫盤和兩個杯子。他們甚至缺少睡覺用的傳統的席子，只能用一塊拉扎克從市場上撿來的被丟棄的舊塑料布替代。至于他們的衣服，阿齊扎結婚后就沒有買過一件紗籠，穿的是巴塞爾的妻子給她的破舊衣服。拉扎克的一套襯衣和褲子是三年前買的，當時是典當行把沒有被贖回的二手衣服拿出來銷售。就像吉·普泰赫所指出的，拉扎克一家的悲慘狀況完全應由他自己負責，“他有田卻不去耕種”，“他總是想不勞而獲”，“他拿了工錢卻不出來打谷”，“現在這些窮人變得聰明了，現在欺騙也越來越多了”。

隔壁的摩托車發動聲提醒我們尸體安葬已準備就緒，送葬的隊伍要出發了。通常在成人的葬禮中，棺木會送到兩英里外的清真寺，后面跟隨著步行、騎自行車或摩托車的送葬行列。由于瑪茲娜又小又輕，她叔叔哈姆扎便把她裹在一塊新的蠟染布里，像背子彈帶一樣背在他的肩膀上，坐在巴塞爾的本田70摩托車的后座。加尼·勒拜·瑪把簡易的棺材橫放在阿明的摩托車上。加上拉扎克和我，只有11個男人。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完全由摩托車組成的送葬隊伍。村民和凱帕拉·巴斯塔鎮的華裔店主們停下來看著我們經過。

在清真寺附近的墓地里，托·西亞卡（清真寺的看守人）和他的助手仍在挖墓坑。瑪茲娜在棉制裹尸布的覆蓋下被輕輕地從蠟染布中取出，并側放在棺木里，這樣可以使她朝向麥加。墓坑中的一大塊黏土墊在她的背后以防止發生移動。托·西亞卡正用一個舊陶罐從墓坑往外排水。埋葬地點是在開墾的稻田里，而雨季已經開始了。在勒拜·薩卜拉尼的帶領下，祈禱者做了不到十分鐘的禱告就結束了。此時，大部分男人進到清真寺里為瑪茲娜的靈魂祈禱。當他們進來時，巴塞爾按照當地風俗遞給他們（每人）一個裝著一元錢的信封。[[16]](#_16_60)有六個參加祈禱的男人返還了信封。村民相信這些祈禱有助于減輕（死者）罪孽的負擔，使靈魂盡快升入天堂。他們祈禱得越多，死者的靈魂就上升得越快。在回村的路上，我問阿明為什么參加葬禮的人這么少。他回答說，既然瑪茲娜這么小，她的罪孽就少，因而是否有很多人為她祈禱并不那么重要。但這是個敏感的問題，我們兩人都記得一個月前在托克·沙赫小孫女的葬禮上，有兩到三倍的人去了墓地。

當天晚上，也是在哈姆扎的家里，舉行了一個小型的葬禮筵席[[17]](#_17_54)，來了不到15個人，還有哈吉·卡迪爾帶領的“臨時的”祈禱者和唱圣歌的人。購買咖啡、加糖的不發酵面包和制作農民式卷煙的費用總計不超過12馬元，其中部分是用那天的小額捐款來支付的。拉扎克像往常一樣，被忽略了，不見了。后來，我和雅各布沿著村莊的小路回家，他問我是不是注意到煙草短少了，因為拉扎克藏起來一部分打算以后抽。“真差勁。”他總結說。

三四天后的一個早晨，拉扎克出現在我的臺階前等著我叫他上來。他每次來看我時都很早，因而沒有其他人過來。如果碰巧有人經過，他就會陷入沉默，然后找個機會馬上離開。盡管村里關于他的傳言一直都引起我的好奇心，我還是發現自己在避免與他在公開場合過多地交談，因為我感到這只會使村里的議論更加喋喋不休。我當時在想，他是想利用我嗎？他會告訴我什么樣的流言和誹謗呢？我實際上認可這個“一無是處”的人么？

拉扎克是來感謝我為葬禮開支捐助的一大筆錢。他女兒死的那天我謹慎地把捐款直接交給拉扎克。我知道如果我把20馬元直接放到尸體旁的錫盤中，我會遭到許多指責。[[18]](#_18_52)

不久以后，我和村民近期的交談轉移到如下話題：8年前引進的雙耕給塞達卡帶來的巨大的變遷。對拉扎克而言，顯然現在的狀況比灌溉之前變得更糟。“以前很容易找到工作，現在村里無工可做，種植園（主要種植橡膠和油椰子）也不再要人了”，“貧者愈貧，富者愈富”[[19]](#_19_53)。他補充說。困難主要是聯合收割機造成的，它一次操做就可以完成收割和脫粒。以前，他妻子收割水稻一個季可以掙到超過200馬元，而他打谷也可以掙到150馬元，但是這個季節，他們兩人一起只拿到了150馬元。[[20]](#_20_51)“聯合收割機到來時，人們很不高興”，“你甚至連稻穗也拾不到了”[[21]](#_21_52)。機器使他感到痛苦的原因在于它使村里的錢落入了外來者手中。那些原本付給稻谷收割者和脫粒者的錢，進而部分地用于塞達卡內部的當地辦筵席的錢，現在卻直接付給了這些昂貴機器的所有者。正如拉扎克所說“：他們拿走了錢辦他們自己的筵席去了。”

現在，不僅薪資工作越來越難以獲得，而且幾乎找不到土地來租種了。拉扎克說，過去地主想讓你租種，而且很少在租金上糾纏。現在，所有地都由他們自己耕種了，或者通過長期租約把大片土地租給富有的、擁有機器的華裔承包者經營。“他們不愿意把地租給自己人”，“他們甚至不會拿出5分錢給窮人”。

拉扎克開始熱衷于表達他最經常的抱怨，這也是他和村里的許多窮人共同持有的想法：富人變得越來越傲慢和吝嗇。這可以從他所看到的富人們對慈善的態度中反映出來。拉扎克理所當然應該是慈善救濟的對象——他只有很小一塊地，四個（現在是三個）年幼的孩子和一個虛弱的身體（很多人說他是不愿意工作）。按照官方的貧困標準，像拉扎克這種規模的家庭的收入是2400馬元[[22]](#_22_52)，但他們的實際收入（慈善救濟不計算在內）上一年度只有800馬元，是目前為止村里最低的。他們已經不能勉強度日，瑪茲娜的夭折就證明了這一點。如果他們沒有得到小額的慈善救濟，如果在食物匱乏時不帶著孩子逃往杜蘭村阿齊扎父母的村莊，或許如果沒有拉扎克招致村民反感的“小偷小摸”，很難想象他家庭中的其他人能夠生存下來。

如果其他人指責拉扎克的處境是由于他自身的道德過失造成的，他會憤慨地予以反駁。“許多馬來人都不夠誠實”，“現在，甚至那些拿著三四百塊工資的馬來人都變得傲慢起來”，“他們不幫助別人解決困難。在村里，他們甚至連一杯咖啡也不給你”。這種指責嚴格說來并不正確。根據我對一年的大致計算，拉扎克一家獲得了大約夠他們吃三個月的稻谷和大米的饋贈。在齋月結束時，每個穆斯林都有義務準備一份稻米作為宗教禮物，稱為施舍。除了按照慣例把稻米捐贈給清真寺、阿訇和村莊的祈禱場所外，通常還要施舍給貧窮的親戚和鄰居，特別是那些在收割季為他們工作的人們，每次大約一加侖。拉扎克大約獲得了十加侖的稻米施舍，盡管其中不乏不太好的殘米。拉扎克不是有禮貌地等待別人招呼他去按照慣例收集他的禮物，而是挨家挨戶地去討要施舍。只有少數人拒絕他[[23]](#_23_52)；畢竟，每個家庭在主要的伊斯蘭教節日中應該能夠吃上米飯，而且，這種施舍也一被視為凈化自我心靈的種方式。一個月以后，在第二個主要的伊斯蘭節日里，拉扎克以同樣的方式獲得了少量的施舍。[[24]](#_24_50)獲得宗教施舍的第三次機會是在收獲季，屆時所有的穆斯林都被征收他們收獲的十分之一的什一稅（扎卡特）。盡管事實上征收扎卡特的官方責任最近已經由省政府來承擔，但非正式的扎卡特支付仍然沿用傳統的方式。它以稻谷而非大米的形式交付，而且成為對貧困的無地家庭收益的重要補充。拉扎克從他住在燕鎮的最年長的哥哥那里得到一麻袋稻谷，他曾經給他打過谷。拉扎克還以他通常使用的主動出擊的方式在本村獲得了四五加侖的稻谷。他還時不時地從那些有可能施舍的人那里討要少量的大米施舍。通常，他把這說成是預付的工資，使用掩飾其交易性質的語言，但這個謊言只是一層一捅就破的窗戶紙。那些被他糾纏的人說他“正在乞求施舍”[[25]](#_25_48)。

這種積極討要是有回報的，拉扎克獲得了比村里其他窮人多得多的食物——比曼蘇爾、杜拉、“瘦骨嶙峋的”瑪、帕克·亞赫和塔伊布都多。而他聲譽上的額外成本卻是最小的，他的地位實際上已經確定在最低點了。[[26]](#_26_48)另一方面，他的表現不如他弟弟哈姆扎那么好，哈姆扎經常被當做是值得贊揚的窮人的典范。他是公認的辛勤勞動者，他的妻子也是。他擔任了伊斯蘭學校的管理員，還經常出現在筵席上協助烹飪，幫助別人搬家，或者幫忙修建村路。在上一季的收獲之后，部分是由于對哈姆扎生病一個月不能像往常一樣工作的同情，他獲得了村民和親戚捐給他的八麻袋稻谷，巴塞爾稱他為“扎卡特冠軍”，這與拉扎克采用進攻性方式卻只得到較少的回報形成了鮮明對比。“我們不想接濟拉扎克，他是個騙子——我們只給像哈姆扎那樣誠實的窮人救濟。”另一個有影響的村民法齊勒也表達了類似觀點。“很多窮人說謊、騙人、懶惰”，“他們想找棵樹乘涼”，“他們想向富人貪婪地索取”。然而在沉思片刻后，他注意到了潛在的“惡性循環”的存在。“如果我們因為他們偷竊而不給他們救濟，他們也許會一直偷竊下去。”這是我聽到的最清楚地認識到為了對窮人進行社會控制而對其進行慈善施舍的重要性的言論。

在政治態度上，拉扎克做了一個謹慎的窮人為保護自己及家庭的利益可能做的一切。四五年前，他交納了一馬元的費用加入了執政黨的村莊支部，它支配著村莊政治和所有進入村莊的重要物質利益。“如果你和多數人在一起，你可以得到很多。而與少數人為伍是很困難的。我經過考慮，要站在多數人一邊。”拉扎克的邏輯也為一些窮人所共有并為他們帶來預期的收益，但這并不意味村里所有的窮人都贊同這一邏輯。一年前的一場干旱使得季節性的水稻灌溉不得不取消，政府為此開展了一項以工代賑計劃。由于在挑選工人的過程中，政治的分量很重，拉扎克成為一個勝出者。當地的農民協會辦公室雇他照看家禽，每天4.5馬元，工作40天。同時，他還獲得了一份幫助清理一段灌渠中雜草的工作，工資為50馬元。而那些在政治上站錯隊的貧窮村民是無法獲得這些機會的。使拉扎克的房屋得到部分修復的木材也是通過巴塞爾的政治影響獲得的，被拉扎克賣掉的多余的免費木材和馬桶也是救助計劃的一部分，至少在塞達卡村，這些安排只有執政黨的追隨者才能利用。如果這種語言表述不那么適合馬來人的口味，那么也可以說，拉扎克知道哪一邊可以使他的面包涂上黃油。

作為地方性保護和有些勉強的慈善施舍的受益者，人們可能期待拉扎克對村里的“社會性長者”抱有好感，但他并非如此。他也意識到人們在背后的議論，“我不去富人的家里，他們不叫我進去。他們認為窮人是低賤（粗俗）的。他們認為我們去就是為了要錢。他們說我們懶惰，說我們不想工作，這是他們的誹謗”[[27]](#_27_48)。讓拉扎克感到最為憤怒的莫過于同樣是這些富人在其需要幫助時就去召喚窮人，但是在需要互惠時什么都不付出，“他們叫我們抓住逃跑的水牛或幫他們搬家，卻不叫我們參加他們的筵席”。

同樣沒逃過他的注意的是，他和許多與他類似的人是被視而不見的人。“富人很傲慢，我們和他們打招呼，他們卻不搭理。他們不和我們說話，甚至不看我們一眼！如果富人聽到我們談論這些，他們就會發火。”[[28]](#_28_48)拉扎克在一些方面是獨特的，但他并不是唯一的。他所說的話與安達盧西亞農業工人的詩歌可做比較：

我由富變窮

看盡世態炎涼；

可嘆現在已經無人

再看看窮人的臉龐。[[29]](#_29_48)

葬禮后的一周，我從市場回到住所，看見哈姆扎房前的路上停著一輛越野汽車，車門上的標志是“衛生部”。不久，從哈姆扎屋后拉扎克住的地方走出兩個護士，她們說受到指派來對小孩的死亡進行調查，并給這個家庭提供營養方面的建議。她們留下了一些奶粉，但是所見所聞似乎讓她們非常泄氣。當她們登上越野車準備返回首都時，自問道：“對這樣的人你能做什么呢？”

## 哈吉·“布魯姆”

在討論拉扎克對于塞達卡村階級關系的重要性之前，有必要引入他象征性的“鏡像”，那就是和他一樣為社會最上層所拋棄的哈吉·布魯姆。盡管我所講述的關于他的故事都是二手的，因為在我到塞達卡村五六年前，他就已經去世了，但關于他的故事很多。

我到塞達卡村不久，勒拜·侯賽因就邀請我參加他兒子塔哈的婚宴，新娘來自距燕柯奇鎮南6英里的一個村莊。為了招待眾多的客人，新娘一家在屋外搭建了一個大帳篷，供男賓們就座。席間的話題主要有兩個：一是當前農忙季的收成；二是由于干旱人們取消了種植前一灌溉季作物，這推遲了許多婚禮的舉行，直到農忙季作物成熟后婚禮才得以操辦。

我發現地平線上矗立著一座巨大的新倉庫，于是便漫不經心地問我旁邊的人那是什么。他告訴我那是哈吉·拉茲和哈吉·安尼兄弟開辦的大米加工廠。當提到這兩個名字的時候，帳篷里突然變得鴉雀無聲。非常明顯，我不經意地開啟了一個引人注目的話題。在接下來的大約一個小時的時間里，人們興致勃勃地互相談論著關于這兩兄弟尤其是他們的父親哈吉·阿尤布的故事。事實上，正如我立即意識到的那樣，有關哈吉·阿尤布的傳聞是所有聚會中固定的交流話題，這足以引發一次小的故事風暴。

哈吉·阿尤布生前是吉打州（也許是馬來西亞）最大的稻田所有者，這一點幾乎毋庸置疑。他去世時，以擁有600多里郎（426英畝）的稻田（他的橡膠園和果園不計算在內）而聞名遐邇。在那時，中等人家擁有的土地數不超過3里郎，擁有20里郎土地的農場主算是相當富裕了。相比之下哈吉·阿尤布擁有的廣闊土地就顯得非常突出。吉打州的稻田以驚人的速度向哈吉·阿尤布手中聚集，這引起了州議會的警覺，實際上他們曾一度禁止他獲得更多的土地。

然而，在涉及這位吉打州的土地大亨的生涯和業績的眾多故事中，關于他擁有驚人的土地和財產這一事實本身的故事相對較少，而更多的是關于其生活方式和他建立自己王國的方式。哈吉·阿尤布之所以成為眾人談論的主要話題是因為他的吝嗇具有傳奇色彩。從那天下午眾多村民的觀點來看，這位吉打州最富有的土地所有者，他自己選擇的維持生活的方式幾乎和拉扎克毫無二致。像拉扎克一樣，他住在一間破舊的從未修繕或重建過的房子里。[[30]](#_30_48)他不買加工而成的紙煙，他一生抽的都是自己卷成的“農民式香煙”，吸的是最便宜的煙葉，卷煙用的樹葉也是他從自己栽種的聶柏櫚上摘下來的。[[31]](#_31_44)和最窮的人一樣，哈吉·阿尤布每年只買一塊僅夠做一件圍裙的布料。如果你從他旁邊經過，你很可能把他當成是村莊里的乞丐。據說他除了齋日外，只吃干魚，在這方面他甚至“超過了”拉扎克。雖然他買得起豪華轎車，家旁也有平整的馬路通過，但他都只是步行或騎自行車。哈吉·阿尤布曾騎在他那輛“古董”般的藍玲（Raleigh）車上，用手勢指揮著哈吉·卡迪爾把別人的房子推倒。他不斷地徘徊著，銹跡斑斑的自行車發出響亮刺耳的噪音。這就是那位吉打州的土地大亨從不按期交租的佃農那里收租的辦法。他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充斥著克己精神，只有一方面除外：他允許自己娶了三個老婆。[[32]](#_32_44)

當然，與其擁有的巨大財富相比，哈吉·阿尤布行為方式的吝嗇更顯滑稽。他代表了富有守財奴的典型，他為其他富有的吝嗇鬼樹立了無法企及的標桿，因此，他無疑成為了傳奇人物。從這個意義上講，他的確剛好是拉扎克的“對立面”。但是拉扎克的名聲純粹是地方性的，而哈吉·阿尤布不說是全州聞名也是全區聞名。

當談到哈吉·阿尤布是如何獲取所有這些土地時，村民的描述雖然依舊栩栩如生卻遠非輕松愉快。他廣為人知的綽號哈吉·“布魯姆”（Haji "Broom"）可能最準確地體現了他獲取土地的整個過程。村民在這里寧愿使用英文單詞"Broom"[[33]](#_33_44)，我猜測這意味著一種單一的、強勁的掃蕩力量。完全從字面意義上講，哈吉·“布魯姆”以自己的方式橫掃了一切土地。這個詞的力量也暗含著某種類似“橫掃牌桌”（即贏得牌桌上所有籌碼）或“使對手輸得精光”的意思。正因為前面冠有“哈吉”，“布魯姆”一詞才顯得力量更強，因為“哈吉”是對那些到麥加的朝圣者的敬稱。所以，“哈吉·布魯姆”這個綽號或多或少與“敦·拉扎克”這個綽號有些相似。

就在我向一些聚集在帕克·亞赫家的村民詢問關于雙耕前借貸的事情后不久，哈吉·布魯姆這個名字就出現了。諾爾在向我解釋Padi kunca這種聲名狼藉的借貸體系時，頭一句便說：“這就是哈吉·布魯姆的行事方式。”Padi kunca是指農民在收獲前約6個月借用的現金在收獲時以定額稻谷償還。一般而言，實際的年利率會接近150%。至少在半個世紀以來（直到1960年），這是店主、大米加工者、高利貸者和相當多的富有地主把持（沿用）的按季借貸的標準利率。事實上，所有水稻種植的研究者都引用過這一例子，認為它既是水稻主產區持續貧困的一個主要原因，也是農民拖欠貸款的原因，而農民拖欠貸款又將導致土地所有權的進一步集中。[[34]](#_34_42)而且，顯而易見的是，在這個地區，哈吉·布魯姆和吝嗇鬼幾乎是同義詞。

如果padi kunca的實際運作愈演愈烈，違反了針對利息的伊斯蘭律令，那么似乎哈吉·布魯姆也變成了一個十足的高利貸者。“瘦骨嶙峋的”瑪說，哈吉·布魯姆定期放貸，通常是100馬元貸6個月，要求償還130馬元或140馬元。“他的兒子，哈吉·拉茲和哈吉·安尼也這么干。這是一種罪惡。他們祖宗七代都放高利貸，他們只關心這個。”村民說，這些借貸中的一部分是二手的，即哈吉·布魯姆從大的華裔放貸者那里以40%的利息貸款，再以80%的利息放貸給農民，從中賺取差價。在這些村民看來，他與鎮上的華裔債主密切合作這一事實，要比自己單獨放貸更加違反伊斯蘭的律令。另一方面，華人為賺取利息而放貸的行為實際上不會招致任何指責，它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畢竟，這是他們正常的商業活動，而且其宗教也未禁止這種活動。但是，對一個馬來人而言（作為所處村莊和宗教中的一員）——尤其是在此例中還是哈吉——不顧《古蘭經》的明確禁令放高利貸必定會招致最強烈的譴責。[[35]](#_35_40)

但是，哈吉·布魯姆的財富主要來源于他人無法償還債務（jual janji，其字面意義是潛在的出售[[36]](#_36_40)），正是通過這一途徑大部分土地落入其手。諾爾、克·亞赫和“瘦骨嶙峋的”瑪都能夠輕而易舉地列舉出本地因債務而使自家的土地落入哈吉·布魯姆之手的家庭的名字。過程是這樣的：哈吉·布魯姆可以借一大筆錢給某個農民，但那個農民要將其全部或部分的土地所有權轉讓給哈吉·布魯姆作為抵押。書面的買賣合同上寫道：如果在規定日期前，借款者能夠償還最初的借款（幾乎總是低于被抵押土地的市場價值），他就可以重新獲得土地。[[37]](#_37_40)對借款者來說，抵押的土地是可以贖回的，至少從原則上講是這樣。當然，在實踐中，吉打州大多數的大土地所有者通常是以這種方式獲取土地的。諾爾補充說，哈吉·布魯姆和少數的另外一些人想出了一個新的變通的辦法。在最后期限來臨前的幾天，他會把自己藏起來，這樣一來那些足夠幸運的能湊足現金贖回土地的農民就找不到他了。最后期限一過，他就立即要求法庭將未歸還借款的農民所抵押的土地判給他。[[38]](#_38_37)通過這種策略，哈吉·布魯姆幾乎將他所有的抵押借貸變成了土地買賣。似乎是為了更加形象地描繪從哈吉·布魯姆那里借貸的后果，帕克·亞赫說道，前往這個土地大亨家的拜訪者，會看到他就坐在一個從上到下堆滿地契的大柜子前。

諾爾、帕克·亞赫和“瘦骨嶙峋的”瑪三個人興高采烈地搶著向我講述哈吉·布魯姆最令人無法容忍的事情。在談話的最后，諾爾描述了哈吉·布魯姆是如何對待自己的兒子的。諾爾說，哈吉·布魯姆到他兒子哈吉·安尼家做客，帶了一袋（一百個）人心果（一種便宜的褐色水果，它是能產樹膠的熱帶常青樹人心果樹的果實），從表面上看是送給哈吉·安尼的禮物。但離開前，他要求哈吉·安尼給他一百個鴨蛋作為回贈。“哪一個更貴？”諾爾一字一頓地問我。這不單純是關于哈吉·布魯姆“精明交易”的又一個故事，還表明他違反了禮品饋贈的精神，他用禮物饋贈來謀利。他實際上要求回報。最重要的是，他為了個人獲益而“剝削”他自己的家庭。“瘦骨嶙峋的”瑪把他的行為總結描述為“預先謀利策略”。

當我評論說我從未聽說過有人如此“吝嗇”時，帕克·亞赫糾正我道，“不是吝嗇，而是貪婪”。借此，他要強調的是，與其說是哈吉·布魯姆節省不如說他是在掠奪別人。“他毫不知恥”。在某種意義上，“毫不知恥”是對他最強烈的譴責，人們也是這樣評價拉扎克的。因為，說某人有羞恥心，這是鄰居和朋友對他好的評價，意味著他的行為還沒有超越由共同價值觀建立的道德邊界。說某人毫不知恥，則意味著他無所不為。[[39]](#_39_35)

諾爾最后表明，不是哈吉·布魯姆的財富本身令人憎恨，而是他獲取及隨后處置財富的方式令人憎恨。“不管一個人是不是富人，只要他是好人，村民會幫他。如果他辦筵席，即使他的谷倉里已經有一百麻袋稻谷，村民仍會送他稻谷作為禮物。但是如果他心腸不好，我們就根本不會理他。”[[40]](#_40_35)哈吉·布魯姆和拉扎克之所以會如此聲名狼藉并不是因為哈吉·布魯姆的富有和拉扎克的貧窮，而是因為他們行為的“無恥”，這種“無恥”違背了所有的規則，使他們實際上成為被排斥的人：一個成為貪婪富人的象征，另一個成為貪心窮人的象征。

但是，只有對哈吉·布魯姆的譴責才帶有幾分神話的、宗教的色彩。我不止一次地被告知，當哈吉·布魯姆生病時，他的身體非常燙，以致必須把他移到房子底下，那里涼快一些。當他的遺體被抬往墓地時，他們說，剛掘好的墓穴中已經開始冒煙（有人說是火）。我曾經故作天真地問加扎利是不是真有這回事，他回答說：“也許有吧，但也可能是編造的。”當然，重點不在于這些說法的真實性，而在于這樣一個社會事實：甚至是在哈吉·布魯姆被安葬之前，村民就希望用咒語召喚地獄之火來吞噬他。

大多數富有的土地所有者都是哈吉，而哈吉·布魯姆是他們當中最明目張膽的，因而也是最可資談論的。換言之，他們也是通過到麥加朝圣完成了伊斯蘭修行的第五“支柱”的人。事實上，有些已經超越了純粹朝圣的范疇。根據現有證據，宗教地位與土地財富的關系模式源于19世紀末。那時，在受人尊敬的宗教教師的帶領下，移民開墾了吉打州大片的水稻平原。政府贈與、自愿施舍和伊斯蘭的什一稅使得這一階層中的許多人在某種意義上成為擁有大量地產的鄉紳，他們通過與官員和低等貴族的策略性聯姻鞏固了自身地位。[[41]](#_41_35)到1916年，代理英國顧問已經開始抱怨一些大土地所有者的欺詐行為，他們用假名申請若干小規模的土地轉讓以避免公開向州議會申請大規模的土地轉讓的風險。[[42]](#_42_35)但是正如哈吉·阿尤布的案例所表明的，階級的界線仍然是比較容易打破的，該地區很多富有的哈吉都是比較新近的成員。

大部分較大的馬來土地所有者、稻米商人、大米加工者和農業機械所有者也是哈吉。[[43]](#_43_35)這一事實使他們得以積聚充足的資金去麥加朝圣，從而為這一頭銜賦予一種模糊不清的身份。一方面，朝圣行為本身會受到虔誠的崇敬，同時朝圣者因朝圣而獲得的神圣超凡能力也會受到虔誠的崇敬。另一方面，相當多的朝圣者僅僅是通過一系列的“苦心經營”（例如放高利貸、占有抵押的土地、以盡可能高的租金出租土地、對親戚和鄰居吝嗇、最小化儀式費用等——大部分村莊對這些行為是非常憎惡的）積累了朝圣的必要資金。因此，村民對那些以他們的土地、勞力和租金為經濟支撐、從麥加朝圣歸來的哈吉決不會完全崇敬也就不足為奇了。

這也許就是為什么哈吉這個詞在大眾的談話中經常和絕非恭維性的形容詞連用的原因了。Haji Sangkut字面上指那些戴著無邊帽穿著長袍然而還未到麥加朝圣的人，但是這個詞的隱含意也指某些真正到過麥加的朝圣者，這些人朝圣后的行為繼續與村莊對信徒的期待背道而馳。Haji Merduk和Haji Karut[[44]](#_44_33)指“虛假的”或“冒牌的”哈吉，他們到麥加朝圣，其行為卻絕不圣潔。因為在村民的概念中，到麥加朝圣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洗清自己的罪孽，等待真主的審判，所以，繼續堅持罪孽深重的行為方式就是極其嚴重地違反戒律（這是一種不忠的表現）。正如巴塞爾所說，“真主不會接納像哈吉那樣的人，他們朝圣也是白費錢，既無益也無用。”法齊勒補充說，他們的罪孽比普通穆斯林更深重，因為“他們明知故犯，虛偽的朝圣最可惡，他們到麥加想洗清自己的罪孽……但真主不喜歡那樣的朝圣”。

一次，我們幾個人圍坐在薩馬特的村莊小店外，我問托·卡西姆，哈吉·安尼像不像他父親。由于我們剛剛談論過一位著名的部長（他已經被解職了，表面上看他被解職的原因是腐敗），于是托·卡西姆把部長和哈吉·安尼進行了類比：“一個有欺騙和掠奪行為的哈吉就與有同樣行為的部長一樣。穆斯林的懲罰（比世俗的懲罰）更嚴厲。原因在于真主訓誡富人要幫助窮人，不照做的人對真主沒有敬畏，他們只想索取（不想給予）。如果是一個穆斯林這么做，懲罰可能最嚴重。”

據說，哈吉這個詞還經常和其他形容詞連用，其中大多數都與吝嗇有關。就像愛斯基摩人擁有眾多描述雪的種類（這在其他文化中被忽略）的詞匯一樣，馬來人的語言中也有大量描繪各種不同程度和類別的吝嗇的詞匯。幾乎所有我曾經聽到過的關于吝嗇的形容詞都是用來修飾名詞哈吉的。最常見的詞是Haji Kedekut和Haji Bakhil，它們意指吝嗇的或貪婪的哈吉。一位馬來作者還回憶起她和她孩提時代的伙伴以前常用來嘲弄吝嗇的哈吉的一首童謠：

吝嗇的哈吉晚上爬起床

偷偷地數著他的錢糧

但他只以鹽下飯

還睡在沒有床墊的地板上。

經過一段時間，我才知道我所居住的房屋的主人——富有的地主哈吉·卡迪爾——也是類似的玩笑的笑柄，那些玩笑在民間廣為流傳。我曾隨塞達卡的農民足球隊到鄰村踢過一場球。[[45]](#_45_33)比賽結束后，有些鄰村村民問我住在哪，當我告訴他們我住在“帕克”·哈吉·卡迪爾房子的前半間時，他們滿臉困惑茫然地看著我，不知道他是誰。我盡力地給他們描述房屋的位置，我想他在這一帶肯定非常有名，但是，村民仍不明白。直到有人說，“哦，那一定是高利貸者卡迪爾（Kadir Ceti）”，村民這才露出會意而又帶著尷尬的笑容。Ceti是指南印度聲名狼藉的切蒂亞爾放債者階層，從1900年到二戰期間，在馬來西亞和東南亞的一些地區，他們給農業生產提供了大量的金融資本。由于這一種姓專門從事《古蘭經》禁止的職業，他們成了高利貸剝削和債務奴役的持久象征。

雖然哈吉·卡迪爾是塞達卡唯一擁有“高利貸先生”（Pak[[46]](#_46_33)Ceti）綽號的人，但鄰近的其他村莊也有人被冠以這種綽號——Haji Lah Ceti和Pak Ali Ceti就是其中兩個。[[47]](#_47_33)當村民獲知我已經知道自己的房東的綽號后，他們打破了沉默，關于他的故事接踵而至。哈吉·卡迪爾在本地擁有的將近20里郎的稻田大部分都是從未能按期支付借款的農民那里獲取的，即通過抵押的方式。他以這種方式得到了哈桑父親的3里郎稻田，這可以解釋為什么哈桑的父親有時侯會要求贖回稻田，盡管這樣做徒勞無功。村民說，跟哈吉·布魯姆一樣，哈吉·卡迪爾用從一個凱帕拉·巴斯塔鎮富有的華裔店主那兒借來的錢再放貸給農民。他貧困的鄰居哈姆扎抱怨說，到他的院子摘一個椰子要收2角錢，而這在別人那里可能僅是作為禮物贈送。他還抱怨說，因為期望在收獲后得到稻米的施舍，上一季他作為田間勞力替哈吉·卡迪爾干的活比替村中其他任何人都多，然而他從哈吉·卡迪爾那兒絕對是一無所得，倒是他為之干活的、遠沒有哈吉·卡迪爾富裕的農場主表現得十分慷慨。

高利貸者卡迪爾的飲食也是公眾嘲笑的對象，就像童謠中吝嗇的哈吉一樣。他不從市場里買魚吃，而是和最窮的村民不得已的做法一樣，吃稻田里那些又瘦又小的魚。甚至于他的連襟帕克·卡西姆也認為他朝圣后絲毫未變，“連鎮里的華人都叫他高利貸先生，他總坐在同一把椅子上，怎么可能改變呢？”

在塞達卡村民的議論中，哈吉·布魯姆和高利貸者卡迪爾的故事占了關于哈吉吝嗇的故事的大多數，但是這里也不乏關于其他活著的與死去的哈吉的故事。村民對他們的謾罵如同激流一樣迸發，以致最終我都有些厭倦了，而他們卻不厭其煩、樂此不疲。他們說有的哈吉曾經偷過水牛；有的曾經不付錢從商店里明目張膽地拿東西；有的曾經搶割其佃農老老實實種的莊稼；有的曾經把土地全部租給華人而不租給自己鄉親；有的曾經要求佃農繳扎卡特（把通常的布施顛倒過來了）；而且，至少曾有一個哈吉在一位婦女禱告時用腳踢了她。當然，還有很多善良的、虔誠的、正派的哈吉（也許是大多數），他們的行為和朝圣都是伊斯蘭教的榮譽。但是，依然存在的一個事實是，在村莊社區遭人憎恨的富有地主中大多數也是哈吉。我們不可能判斷此類故事如此眾多僅僅是由于原始材料本來就豐富，還是在于其社會價值——作為對尚未誤入歧途的富人和可能致富的人的勸誡。我想，兩者兼而有之。

盡管如此，有兩點是清楚的。首先，雖然幾乎所有人都認為，富人（從總體上看）和富有的哈吉（具體地看）的無恥、貪婪程度，與過去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連富有的哈吉們也同意這一點，但他們不認為自己就是被指責的對象。蘇庫爾說：“過去的哈吉是真正的哈吉。現在他們不是了。他們只不過穿著長袍。他們只不過到麥加走了一趟（而不是真正朝圣）。當他們回來時，他們本應變成真正的哈吉，他們卻發放高利貸。他們只想要錢，他們的心比天還高。”他這是說出了大多數人的心聲。其次，還有一點明確的是，當這些哈吉死后，他們對伊斯蘭教義的違背會招致真主為他們準備的最嚴厲的懲罰。盡管懲罰的具體內容是什么只是一種猜想，但阿布杜爾·拉赫曼抓住了這種猜想的要點，他說，“當他們下地獄時，他們將在血泊中游泳”。

## 權力的象征性平衡

關于拉扎克和哈吉·布魯姆的故事——它們被恰到好處地添油加醋、修飾加工和重新講述——已經遠遠超出了純粹的消遣意義。在塞達卡富人與窮人之間的象征冷戰中，這些故事構成了一次小交火、一場小沖突。和大多數爭戰一樣，這場爭戰中的沖突雙方通常是在復雜的情境中相遇，其中有眾多的中立者、旁觀者和忠于不同派別的猶豫不決的參與者。至少，暫時看來，冷戰狀態會繼續維持。因為，一方面，極端對抗會威脅到很多潛在參與者的重要共享利益；另一方面，窮人很難想象直接對抗所導致的后果。這樣一來，“戰爭的消息”就幾乎全部由口頭爭論、制造假象、揭穿謊言、恐嚇威脅、一兩次小沖突和宣傳攻勢組成，其中宣傳攻勢是最重要的。

在這種意義上，廣為流傳的關于拉扎克和哈吉·布魯姆的故事或許可以理解成一種宣傳攻勢。如同有效的宣傳一樣，它們表明了——顯現了——這個小地方正在發生的全部爭論。富人只要一提到拉扎克的名字，就會聯想到一個貪心、不誠實、違背了應共同遵守的村莊規則的窮人形象。在富人看來，拉扎克是負面典型，唉，總體上窮人都在向其方向發展。而窮人們只要一提到哈吉·布魯姆的名字，就會聯想到一個貪婪的、吝嗇的、同樣違背了共同遵守的村莊規則的富人形象。在窮人看來，哈吉·布魯姆也是負面典型，總體上富人都在向其方向發展。

哈吉·布魯姆和拉扎克代表了富人和窮人行為的樣本，他們由此都獲得了相應的象征力量。每個村民都可以觀察到拉扎克的行為，因為每天他都給關于自己的故事添磚加瓦。關于哈吉·布魯姆行為的經驗僅僅是稍微不那么直接。因為幾乎每個人都見過或接觸過哈吉·布魯姆，而且每個成年人都聽過關于他攫取土地和放高利貸的第一手故事。由于這些故事的可感知性，村民可以把地方性的故事與自己的經驗相對照，因此這種宣傳攻勢不必太過于依賴事物的實際情況。至于人們選擇如何利用這些現存的活生生的故事——更確切地說是他們如何表述這些現存的活生生的故事——則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它們源于社會事實。

然而，哈吉·布魯姆和拉扎克作為社會標志的價值，既源于他們的可感知性，也源于他們越軌的行為。這種越軌行為不僅使他們的故事引人入勝，[[48]](#_48_33)而且使他們成為有效的宣傳工具。即使是塞達卡的窮人也認為拉扎克的過分頑劣使其行為越軌。即使是高利貸者卡迪爾也認為哈吉·布魯姆獲得財富的手段違背了真主的訓誡和村莊社會規則。窮人和富人恰恰都利用一些極端的例子以便更好地為自己的立場服務，這些例子是雙方都不得不承認的。

關于這兩人的故事還應當被看做是正在建構的意識形態大廈的基石。作為意識形態，它們包含了對現實的批判和對理想的展望。它們試圖構建和維持一種觀點，即得體的、受歡迎的人類行為應該是怎樣的。對越軌行為的社會制裁有助于界定什么是正常的、恰當的和受歡迎的行為。這些故事作為完全不受歡迎的行為的負面案例，也達到了同樣的目的。因此，這些故事可以被看成是一種關于人類行為的社會文本。正因為既定的象征秩序的維持和這一秩序的變遷一樣，經常成為問題，這些故事就顯得尤為必要了。意識形態的修復和革新永無止境。

這些競爭性的意識形態的深層目的不僅在于說服，還在于控制；更確切地說，其目的在于通過說服進行控制。就其成功地形塑了人們的行為來說，它們也實現了一種階級目的。如果富人會從哈吉·布魯姆的故事中吸取教訓，他們就不會再放高利貸，不會再算計別人的土地，他們會在宗教救濟和筵席上表現得慷慨大方，他們會雇用更多的佃農和勞力。這樣一種安排會給窮人帶來明顯的利益。另一方面，如果窮人會從聲名狼藉的拉扎克事例中吸取教訓，他們就不會再強求富人的施舍，不會再參加未被邀請的筵席，他們將成為忠誠的勞力，做到言行一致。這樣一種安排同樣會給富人帶來明顯的利益。這就是一種象征的平衡。富人得到的教訓是，如果他像哈吉·布魯姆一樣行事，就會遭到同樣的貶斥；窮人得到的教訓是，如果他像拉扎克一樣行事，就會遭到同樣的鄙視。如果愿望成為現實，如果意識形態成為實踐，塞達卡就將變成由慷慨的、充滿同情的地主和誠實的、辛勤工作的佃農和勞力構成的小烏托邦。

但是，這種均衡也僅僅是象征性的。畢竟，這些告誡性的故事要求窮人和富人為了維護自己的名聲放棄眼前的物質利益。然而，好名聲有多重要呢？換言之，壞名聲的代價有多大呢？不幸的是，問題的答案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你是誰，因為壞名聲代價的大小直接取決于對壞名聲的人施加的社會和經濟制裁的輕重。從階級的觀點來看，人們必須思考窮人在多大程度上依賴于富人對其的好評，反之亦然。由此觀之，關于名聲的政治有點“一邊倒”的意味。[[49]](#_49_33)可歸結如下：富人通常擁有將其認可的適宜行為強加給窮人的社會權力，但窮人卻很難以同樣的方式來要求富人。對于窮人而言，好名聲的作用有點像社會保險政策，使他們得以應對不計其數的農業生活中的不測風云。好名聲由窮人恭順行為的記錄所構成，包括在筵席和房屋搬遷中幫忙、積極肯干又不斤斤計較工資以及對村莊領袖的默默支持。好名聲會在找工作和慈善救濟時帶給他們切實的回報，在生老病死時帶給他們幫助，并借此獲取所有由村莊中執政黨進行分配的補貼。好名聲也在非正式的玩笑和鄉村生活的儀式方面帶來了切實的回報。已經聲名狼藉的拉扎克也因而獲得了打破村莊生活規則的一定自由。[[50]](#_50_33)但是，他為這一自由付出了沉重代價——他得不到工作并受到公眾的嘲弄。他唯一的讓步就是經過精心算計后加入了執政黨。相反，哈姆扎確立并維持了一個好名聲。其代價是他花費在村莊項目、筵席烹飪、照看村莊的祈禱室及村莊集會場所方面的時間和勞力。另外一個代價，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就是盡管他有時并不覺得那些社會地位比他高的人值得尊敬，但為了佯裝恭敬，他不得不忍氣吞聲。但是他的好名聲使他在雇傭、扎卡特禮物、病時救助方面獲利并贏得了村民的尊重和體諒。這些回報是非常重要的，它們足以使塞達卡村除三四個窮人以外的幾乎全部窮人在大多數方面選擇遵從由村莊精英界定并強加給他們的適宜行為的標準。

在塞達卡這個小地方，“哈吉·布魯姆”們和“高利貸者卡迪爾”們由于名聲不好而深受排斥。而他們幾乎或完全不用從窮人那里獲得什么。這是一種諷刺：一方面，只有違背對人慷慨和體諒他人的原則，他們才能獲得土地、收入和權力；另一方面，只有遵守對人慷慨和體諒他人的原則，他們才能獲得好名聲。現在，他們實際上不受制裁約束。

但有一點是例外的。盡管富人相對來講或許可以不受物質制裁的影響，但他們無法逃脫象征制裁，比如誹謗謠言、背后議論、人身攻擊等。并且，即使在這個小范圍內，競爭也是不平等的。這在下述事實中體現得最為明顯：人們對拉扎克是當面的斥責，而對哈吉·布魯姆和高利貸者卡迪爾則總是背地里貶損。因此，高利貸者卡迪爾總是被當面稱呼為"Pak Haji"（“哈吉伯伯”）。如果他知道了自己廣為流傳的綽號，我都會感到驚奇。人們對他的嘲笑永遠無需傳到他的耳朵里或使他寢食難安。

當然，大部分對哈吉·卡迪爾的公開遵從都是“虛假遵從”。[[51]](#_51_33)貧窮的村民，也包括其他人，選擇佯作遵從，因為他們完全知道任何其他舉動可能招致的懲罰。因此，當一位年老的村民伊沙克斗膽以貶抑的口吻談論哈吉·布魯姆后，由于害怕報復，他在最后要求我不要向住在燕鎮或明關村的任何人透露半句。我們在此處觀察到的是“臺前”與“幕后”行為的差異：在“臺前”權力負載的情境中所表現出來的遵從，在相對安全的“幕后”的私秘空間中發生了逆轉，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可以明確地說虛假遵從存在。

然而，即便是虛假遵從，也是對富人的社會權力的明確無誤的展示。毫無疑問，村莊精英繼續控制著公開的“舞臺”。公開的象征秩序通過表面的遵從得以維系，它不會遭到公然挑戰。與物質交換領域一樣，在這一很大程度是象征的層面上，社會權力的失衡允許對拉扎克的公開辱罵，卻禁止對哈吉·卡迪爾或哈吉·布魯姆的公開攻擊。

村莊中掌握權力的人并非完全控制了整個“舞臺”。雖然他們為“表演”寫好了腳本，但在此限制內，好斗者或造反者仍有足夠的運作空間來巧妙地表達他們對事件的蔑視和不滿。臺詞和表演姿勢是事先確定的，但清楚無疑的是許多“演員”只是裝裝樣子，并非在真心“表演”。有一個司機和行人都熟悉的老套例子可以說明“表演”中的此種行為。行人經過十字路口時恰好走到一半，這時交通燈由綠變紅，只要行人未面臨即將開近的車輛的迫切威脅，接下來發生的事就如同小戲劇一樣。行人會稍稍抬高腳走一兩步，裝做匆忙的樣子，從而暗示司機他要先通過。實際上，在幾乎所有的此類場合，如果我沒記錯的話，行人過十字路口的實際速度并不比他原來的步伐快。這給人以遵從的印象，卻沒有實質內容。但是象征秩序，即司機的通行權，并未遭到直接挑戰；實際上，行人表面上表現出的匆忙便是對象征秩序的認可和鞏固。[[52]](#_52_33)幾乎可以認為，將象征遵從最大化恰是為了使實際遵從最小化。

貧窮村民就是采取了類似最低限度的遵從的形式，使他們虛假的“表演”得以巧妙地進行。他們會去參加富裕村民的筵席，但迅速吃完飯馬上就走。他們會遵循習俗，接受邀請，但其遵從行為常打“擦邊球”。他們也會以實物或現金作為禮物贈送，雖然數量比預期的要少，但也不至于少到被視為公然不敬的地步。按照“要求”，他們會問候走在村中路上的大土地所有者，但這種問候是縮水的，而且也不夠熱烈。所有這些和其他形式的勉強遵從，避免了公然違抗的不利，并且至少符合了富人通常所要求的禮貌和遵從的最低標準。同時，這還代表窮人也為“表演”本身加入了“幕后”的態度，雖然微不足道，但它足以將其意義傳達給“導演”，但又不會極端到冒公開對抗的風險。[[53]](#_53_33)

我們在此分析的此種類型的沖突非常普遍，它在以下三個層面進行。首先是圍繞公平的定義展開的斗爭，旨在掌握評價當下經驗的概念和符號。其次，是當既定的公平定義用于特定的案例、特定的一套事實和特定的行為時，圍繞其適用性展開的斗爭。例如，假定富人應該慷慨，如果某個地主拒絕給窮人施舍，那么他是否違背了慷慨的原則。又如，如果一個人僅是裝窮或者其行為已使他喪失了接受慈善救濟的權利，此時拒絕救濟他是否合理。最后，當然是在農業革命帶來的巨大變遷中圍繞土地、工作、收入和權力展開的斗爭。

各方在這場斗爭中所使用的資源很難放在一起比較。在村莊的經濟生活中，地方精英幾乎總是有其特有的行事方式。倘若他們掌握了物質資源，他們在很大程度上也能控制公共儀式生活——即控制村莊中大多數窮人的“臺前”行為。只有“后臺”才能不受精英掌控。在那里，充滿了背后議論、流言蜚語、言語攻擊和匿名的暗中嘲諷，以及對公共儀式秩序的否認。打個軍事上的比方，只有在這里，地形才相對有利于武器裝備較差的處于不利地位的一方。

有人也許會問：為什么我要選擇這樣一個不特別重要的村莊來考察少數歷史上的失敗者的抗爭呢？這毫無疑問是有緣由的。用巴靈頓·摩爾的話來說，塞達卡的窮人差不多都必然是“即將被前進的滾滾大潮輾過的階級”的成員。[[54]](#_54_33)而且，國家強大的軍隊、農業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人口本身的增長都使他們舉步維艱。我們幾乎沒有理由相信，他們在村莊中能從本質上改善其前景，相反，我們有足夠的理由斷定他們會像他們數以萬計的先輩一樣面臨失敗的命運，至少在短期內是這樣。

確定這樣一項研究計劃的理由恰恰在于它的平凡——事實上，這才是歷史上所發生的階級沖突的常規情境。通過近距離、嚴密地考察這些情境，我們便可能發表一些關于常態的階級意識、日常的反抗和平常的階級關系的有意義的言論，因為在通常的情況下，公開的集體反抗或叛亂都不太可能發生。

# 第二章 常規的剝削，常規的反抗

由于難逃失敗和最終被屠戮的命運，大規模起義一般被迅速瓦解而不會取得任何持久的成效。然而，農村社區中經年累月的堅韌的、沉默的頑強抗爭將比大規模起義的曇花一現更為有效。

馬克·布洛赫，《法國農民史》

正如《田園》的編者曾經說過的，大人物總是不受普通人歡迎，大眾不能理解他們，大眾認為所有這些事情都是不必要的，甚至是英雄主義的。小人物不會給大時代留下任何影響，他所需要的只是偶爾走進酒吧，吃上一頓紅燒牛肉的晚餐。政治家自然對這些不思進取的人嗤之以鼻，在教科書中將其描繪成卑賤的可憐蟲。對大人物而言，普通人是一種累贅。就像巴洛恩在這里所表達的他的嗜好：最美妙的事情就是吃一小截匈牙利香腸作為晚餐。我對那些開始射向我們的齊鳴的槍炮聲充耳不聞。

帥克，載貝爾托·布萊希特，《二戰中的帥克》第一幕

## 未被書寫的反抗史

本研究的主旨（其關注點和方法）源于對近來眾多的關于農民反抗和農民革命研究——包括我自己和其他人的研究——不斷增加的不滿。[[55]](#_55_33)非常明顯的是，至少在北美，在越南戰爭和左翼學術界對民族解放戰爭的迷戀的刺激下，學者們對大規模的農民起義給予了不尋常的關注。學術利益與原始資料是相互強化的。歷史和檔案記錄對于那些農民發動起義對國家和既有的國際秩序構成威脅的時刻的記載最為豐富。而在其他時候，或者說大多數時候，農民在歷史記錄中不是作為歷史行動者而出現，而是或多或少地作為征召、稅收、勞動力流動、土地所有和糧食生產的統計數字而默默無聞地存在。

事實上，就其發生時的重要性而言，農民反叛也是稀少罕見的，更不用說農民革命了。不僅促使大規模農民起義發生的環境相當稀少，而且當他們真的起義時，也幾乎總是被輕易地鎮壓。固然，即使是失敗的反抗也會取得成果：國家或地主少許的讓步，在新的令人痛苦的生產關系中獲得的暫時喘息的機會，[[56]](#_56_33)以及關于反抗的記憶和潛伏下來以待未來的勇氣。但這些成果都是不確定的，而屠殺、鎮壓和失敗后的消沉卻是確定而實在的。值得回憶一下那些特殊的歷史時刻——農民背景的革命成功地獲取了政權，而即使是最好的結果，也不全是對農民的福音。無論哪種革命的成功，幾乎總是造就出更為強迫性的霸權的國家政體——靠農民而養肥自己，與此前并無不同。很多時候，農民發現自身處于一個非常具有諷刺意味的位置上，他們幫助統治集團獲得了權力，但統治者推行的工業化、稅收制度和集體化卻與他們所想象的為之抗爭的目標大相徑庭。[[57]](#_57_33)

鑒于上述原因，我認為農民反抗的研究重點被誤置了。而理解那些我們可以稱之為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平常的卻持續不斷的農民與從他們那里索取超量的勞動、食物、稅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間的爭斗——要重要得多。這種斗爭的多數形式避免了集體性直接挑釁的弊端。這里我所能想到的無權群體的日常武器包括：行動拖沓，假裝糊涂，虛假順從，小偷小摸，裝傻賣呆，誹謗，縱火，破壞等等。這些布萊希特式的階級斗爭具有共同特點，它們幾乎不需要協調或計劃，它們通常表現為一種個體的自助形式，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與官方或精英制定的規范相對抗。了解這些平凡的反抗形式就是理解大多數農民盡其所能為維護自身利益而進行的“經常性反抗”。

如同以前對農民反抗的研究一樣，如果將“弱者的武器”過度浪漫化會導致很大的失誤。它們僅僅能對各種剝削農民的方式產生邊緣性的影響。而且，這些武器也并非為農民所專有，人們在觀察中不難發現，官員和地主也經常抵制和破壞那些于己不利的國家政策。

另一方面，這些布萊希特式的反抗也并非微不足道。在東南亞，征兵和強迫勞役中的開小差和逃避就無疑限制了許多統治者的勃勃野心。[[58]](#_58_33)而在關于歐洲的類似研究中，對此種反抗過程與潛在影響的分析無人比科布對法蘭西帝國早期與后革命時代征兵中的開小差和反抗的分析更為出色：

從第五年到第七年，各部門紛紛遞來報告說……在某區每一個被征召入伍的人都回家了，而且自由自在地生活著。更有甚者，很多人根本無須回家，因為他們從未離開過……在第七年，右手斷指——最常見的自殘方式——開始在統計數據中顯現出來，其范圍之廣足可以視為一場集體共謀的大運動，參與者包括家庭、教區、地方當局和整個行政區。

即使是擁有大量的可靠的鄉村警察的帝國政府也未能暫時減緩這類流血事件的發生速度……從1812年開始，斷指者的數量再次達到災難性的比例。對一個普遍不受歡迎的專制政體而言，任何全民公決都不如斷指事件更具有說服力。對歷史學家而言，任何事件都不如下述景象更為激動人心：一個民族決定不再為統治政權戰斗而不慌不忙地回到家鄉……從這個意義上講，普通人至少在推翻法國最恐怖的政體中發揮了相當的作用。[[59]](#_59_33)

美國南北戰爭期間南部邦聯在軍事和經濟上的失敗進一步證明了沉默和不公開反叛的決定性作用。據估計，約有總共25萬名合乎條件的白人開小差或逃避兵役。[[60]](#_60_33)其原因顯然來自道德和物質兩個層面。貧窮的白人，特別是來自非蓄奴制的山區的人們，對政府的免服兵役法案將其排除在主要受益人之外非常不滿，不愿為之戰斗。[[61]](#_61_33)軍事上的失敗和“1862年的生存危機”促使許多人從部隊開小差，返回處境艱難的家中。就種植園本身而言，白人監工的短缺和北部聯邦對奴隸的自然吸引使得大規模的逃離不斷增加。與法國的情形一樣，我們可以說南部邦聯被社會中微小的反抗行動構成的雪崩式力量所擊敗，這些反抗是由奴隸與自耕農的不可靠的合作而實施的，即一種沒有名稱、沒有組織、沒有領導、而且其背后肯定沒有列寧主義式合謀的聯合。

類似地，偷稅漏稅一直限制著第三世界國家的雄心和權力范圍——不論是前殖民的、殖民的還是獨立的國家。在塞達卡，我們可以看到，在官方征收稻谷形式的伊斯蘭什一稅的過程中，農民實際上所交納的只占規定交納的一小部分，這是由于共同行動的網絡和虛報數字削弱了政府的征稅力量。因而毫不奇怪的是，第三世界國家的稅收主要來自于進出口稅；以上模式作為從屬群體抵制稅收的能力不可小覷。只要隨便翻閱有關農村發展的文獻就不難發現，一個不受歡迎的政府規劃或項目帶來的高收益可以被農民的消極反抗銷蝕殆盡。有學者以罕見的筆墨詳細描述了東非農民如何歷經數十年成功地消除了和規避了國家政策的威脅：

在這種情境中，發展過程經常簡化為一場零和博弈，這是不難理解的。正如本研究所表明的，統治者絕非總是那些游戲的勝利者。雖然非洲農民并不是當下發展思想啟蒙的先驅，但是他們用欺騙的技巧多次挫敗了當局。[[62]](#_62_33)

有時，這種反抗會變得主動積極，甚至走向暴力，但更多的時候，它以消極不服從、暗中破壞、逃避和欺騙的形式出現。馬來西亞殖民當局阻止農民種植和出售橡膠的持續性努力與種植一方擴大種植面積和市場的努力之間形成的對抗關系就是明證。[[63]](#_63_33)從1922年到1928年，以及整個20世紀30年代，政府出臺了多種限制性規劃與土地使用的法律，但由于廣大農民的抵制，這些限制收效甚微。在那些自稱為社會主義的國家中，農民抵制進而減少或消除不受歡迎的農業集體化形式的努力就是處于困境中的農民有效使用防御性技術的有力證明。此類斗爭更多的不是大規模地公開挑戰，而是平靜地逃避，其效果與前者相當，而且通常更為有效。[[64]](#_64_33)首先悄然的零散行動過程經常為那些農民用以蠶食耕地和國家林地；而另一種方式則是公開挑戰財產關系的公開占領耕地。

我們所討論的反抗類型或許最好以反抗形式的對比方式加以描述，它們或多或少都指向同一目標。第一種是我們所說的“日常”的反抗；第二種則表現為公開挑戰性質的反抗，其在關于農民與工人階級政治的研究中占據著主導地位。舉例說明，前一種情況是農民以不知不覺的方式蠶食種植園和國家林場的靜悄悄的不起眼的過程；而另一種情況則是農民通過公開挑戰財產關系的方式公開侵占土地。就土地的實際占有和使用而言，悄悄蠶食比公開挑釁的土地侵占更能達到目的，雖然前者從未向法定的產權配置提出過公開挑戰。又比如，如果是日常反抗，士兵會通過集體開小差的方式削弱軍隊的力量；如果是公開反抗，士兵們則會發動公開兵變以消滅或取代指揮官。正如我們所指出的，開小差會達到某些兵變所無法達到的結果，其原因恰恰在于開小差旨在自助和退出，而非制度性的對抗。而且，就某種意義而言，大規模地拒絕服從對軍隊制度的潛在影響比替換指揮官更為根本。最后一個例證是，日常反抗表現為在公有或私人糧倉中的小偷小摸，而旨在改變糧食供給的再分配關系的對市場或糧倉的公開襲擊則是公開反抗。

反抗的日常形式與那些更為激進的公開對抗方式的共同之處當然在于它們旨在減少或拒絕來自上層階級的索要或者對上層階級提出自己的要求。這些要求通常與階級斗爭的物質層面聯系在一起——對土地、勞力、稅款、租金等的。此處日常反抗與其他占有形式的反抗最明顯的不同在于它不承認有公開的和象征性的目標。如果制度化的政治是正式的、公開的、關注于系統的權利變化，那么日常反抗則是非正式的、通常是隱蔽的，并且以關注直接的實際的物質獲取為主。[[65]](#_65_33)

非常清楚的一點是，實際的反抗取得成功的可能性經常與表面上的象征性遵從的程度成正比。幾乎在任何情況下，公開的反抗都比日常的反抗更易招致迅速而殘酷的鎮壓，因為后者雖然很普遍，卻從不冒險挑戰等級制度與權力的正式定義。對大多數從屬階級而言，幾乎在整個歷史過程中，他們都很難獲得改善自身狀態的機會，此種形式的反抗成為其唯一選擇。在這種象征的束縛下，從屬階級的反抗所能達到的只是證明了人類堅韌性和創造力的存在，下面關于印度下等種姓反抗的分析就證明了這一點：

與主人簽有終身契約的仆人最典型地表達其對主仆關系不滿的方式是工作馬虎和辦事低效，他們有意無意地假裝生病、無知或無能，分散其主人的注意力。雖然主人可以通過拒絕給予仆人額外的好處而進行報復，但只要主人不想投資完全付諸東流，他就必須保證仆人最低限度的生存。這種沒有表現為公開挑戰的消極反抗的方式幾乎是不可戰勝的。它證實了哈維克（Havik）等人關于下等種姓的固有看法，但同時也限制了他們的行動能力。[[66]](#_66_33)

此種形式的頑強反抗在大量的美國農奴制研究的文獻中得到了充分證明，而公開的反抗在當時通常只是一種愚勇之舉。南北戰爭前美國南方反抗農奴制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行動拖沓、虛假遵從、逃跑、假裝無知、暗中破壞、小偷小摸的歷史，甚至夠不上文化反抗的歷史。這些做法，雖然幾乎從不對奴隸制進行公開質疑，但以其秘而不宣的、有限的、粗野的方式比那些被歷史詳細記錄的極少的英雄主義的和短暫的武裝起義取得了更多的成果。農奴們自身顯然已經意識到，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的反抗只有在公開順從的掩護下才能取得成功。不難想象，那時農奴父母對其子女的忠告與當代印度尼西亞種植園里的雇傭勞動者從他們父母那里聽到的忠告并無二致：

我讓他們（年輕人）記住：你們是在出賣勞動力，而買它的人要看到他能從中有所收益，所以當他在旁邊時就干，他一走開就歇，但是記住當監視者在場時你們一定要看上去是一直在工作。[[67]](#_67_33)

由此觀之，我們可以得出兩點明確的結論。首先，反抗的性質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現存的勞動控制形式和人們所相信的報復的可能性與嚴重程度。由于可能面臨永久解雇或監禁，公開罷工的結果可能是災難性的，因而工人可以采取降低工作速度和質量的方式進行反抗。通常這些行動因其不公開和匿名的特點使資方追究責任或進行制裁變得異常困難。在工業中，這種減緩工作進度的方式被稱為“意大利式”罷工；當鎮壓非常嚴酷時（如1983年波蘭實行戒嚴法時[[68]](#_68_33)），這種方式經常被采用。當然，資本家通常會以計件工資取代計時工資，從而限制工人此種形式的反抗。當計件工資在19世紀德國的絲織和棉紡織業開始盛行后，反抗不再以降低工作速度的形式表現出來，因為那成為一種自我損害，取而代之的是成品布匹的缺斤短兩、工藝缺陷和盜取原材料。[[69]](#_69_33)任何一種勞動控制或工資支付方式，與其他事物一樣，都可能會導致其特有的安靜的反抗方式和“反占有”的方式。

其次，反抗并不必然地直接要求占有資源。由于通常反抗者的目標是這些緊迫的需求——人身安全、食物、土地和收入，且他們行動時必須比較安全，他們只是遵循風險最小的原則。19世紀30年代普魯士的農民和無產者，因為受制于沒有財產和生存線以下的工資水平，只能采取移民或大范圍內盜伐木材、偷竊飼料以及賭博的方式做出反應。“森林犯罪”的速度與工資下降的速度、生活品價格上漲的幅度和移民的困難程度同步增加。在1836年，普魯士大約有207000件起訴案件，其中150000起是由于“林場偷竊”。[[70]](#_70_33)這類偷竊為群體共謀所支持，這種共謀源于自由進入和使用林場的早期傳統；然而，偷竊者并不關心他們盜取的野兔或木柴具體歸哪個雇主或地主所有。在此情境下，對一種占有方式的反抗可能致使其受害者采取較少公開的方式，而這或許是更為可行和更少危險的方式。[[71]](#_71_33)

此種反抗技術極為適合農民階級的特點。作為一個“階級性弱”的分散的階級，他們散布在廣大鄉村，通常缺乏形成有組織反抗的紀律約束和領導層。對農民而言，最合適的形式就是廣泛的游擊式的消耗戰，那很少或不需要事先協調。同時，他們個人的怠工和逃跑行為經常因為古老的民眾反抗文化而得以強化。從支持性的亞文化角度和人們對法不責眾（其廣度表現為整個社區的參與）的認識角度來看，上述反抗似乎可以視為一種社會運動。但奇特的是，這是一種沒有正式組織、沒有正式領導者、沒有宣言、沒有預期、沒有名目和旗號的社會運動。由于這種社會運動在制度上的不可見性，其小規模活動即使被注意到，也很難引發社會性關注。

農民發起的形式多樣、數量眾多的小規模反抗，最終會使自詡高明的大人物們在首都構想的政策陷入全然混亂之中。國家會采取多種措施予以應對，它可能調整政策以符合更現實的期待，也可能通過積極鼓勵自愿順從來維持或強化既有政策，當然，國家還可能直接采取更為強制性的方式。無論國家如何應對，我們不能忽視這樣一個事實，即農民的行動改變或減少了國家可用的政策選項。正是以這樣一種非叛亂的方式（更非合法的政治壓力），農民經典性地表現出其政治參與。因而，對任何歷史或農民政治學的理論而言，若想證明農民作為歷史行動者的正當性，就必須掌握我所提出的反抗的日常形式。僅僅為了這個原因，對這種看似雜亂的人類活動予以記錄并賦予其概念體系就是非常重要的。

反抗的日常形式不會成為頭條新聞。[[72]](#_72_33)正如成千上萬的珊瑚蟲雜亂無章地形成的珊瑚礁一樣，成千上萬的以個體形式出現的不服從與逃避行動構建了其自身的政治或經濟屏障。這些反抗沒有激進的公開對抗，也不具顯著的新聞價值。如果使用比喻的說法，當國家的航船擱淺在這些礁石上時，人們的注意力被典型地吸引到船只失事本身，而不會看到正是這些微不足道的行動的大量聚集才是造成失事的原因。正是從事這些細微活動的人們自身不想引起注意，他們的安全系于他們的匿名性。而且，政府官員也極少愿意公開這些反抗，這樣做無異于承認他們的政策不受歡迎，而更為重要的是，這暴露了他們在農村權力的軟弱無力，所有這些都不符合至高無上的國家的利益。[[73]](#_73_33)這些反抗行動本身的特點及其對手為保自身利益的默不作聲造成了一種共謀的沉默，從而幾乎將這些日常反抗形式從歷史記載中全然抹去。

歷史與社會科學由于是知識分子用文字書寫的，它們在很大度上也是被有文化的官員所創造的，因而不可能很好地用以揭程那些沉默的、匿名的、代表農民的階級斗爭形式。[[74]](#_74_33)這些記錄者和究者也暗中加入了參與者的共謀，與他們一樣“發誓保守秘密”。在多方參與下，這種不太可靠的共謀造成了銘記于文學和歷史中關于農民的刻板印象：作為一個搖擺不定的階級，他們要么處于長期的可憐卑微、消極被動的狀況，要么是短暫的、暴力的，卻是徒勞無益的憤怒的爆發。

在經歷了長久的畏懼和屈從后，他的肩膀變得可堪重負，他的精神也被制服，以致不能認識到自身不斷惡化的狀況。你可以打他，讓他挨餓，搶奪他的一切。如此日復一日，在他放棄膽怯和愚蠢之前，他的頭腦中一直被各種他不能真正理解的思想所充斥，直到不公正和痛苦的累積使他如同遭到過多鞭打的家畜發怒一樣，猛地掐住主人的咽喉。[[75]](#_75_33)

在左拉的觀點中有一點啟示（但也是唯一的啟示），當農民忍氣吞聲時，他們的“臺上”行為表現為服從、畏懼和謹慎。與之相反，農民的暴動卻像是一種盲目憤怒的本能反應。那種認為農民通常是消極被動的觀點忽視了農民與地主之間有關租金、收成、勞力和稅收的緩慢的、瑣碎的、平靜的斗爭，在這里遵從和愚鈍只是一種姿態——一種必要的策略。那種只看到農民反抗周期性爆發的觀點則忽視了他們所獲知的公正的潛在形式和他們實際上非常理性的特定的目標和對象。[[76]](#_76_33)爆發本身通常是一種信號，它表明常規的和大量的隱秘的階級斗爭形式正走向失敗或已經到達危機時刻，而可能帶來致命風險的公開反抗的宣言通常只有在不同地區長時間的斗爭后才會出現。

## 作為思想和象征的反抗

至此，我還是將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作為只不過是個體行動或行為的集合體。然而，僅僅局限于行為的分析就會遺失許多要點，那會使對人類行動的解釋簡化到對水牛或狗的行為解釋的水平上——水牛如何反抗驅使它的人以達到一個可以接受的工作速度；狗跳到桌上為的是偷吃剩飯。而我試圖理解的是有思想的社會存在物的反抗，我不能忽略他們的意識，即他們賦予其行動的意義。他們創造的象征、規范和意識形態形式構成了他們行為的必不可少的背景。然而由于他們對于情境的理解的局部性和缺陷，他們被限定的意圖、價值觀和目的性又制約了他們的行動。這一點非常明顯，若不是因為行為科學中直接從收入、熱量攝取、報紙發行量和收音機擁有量的統計數據中解讀大眾行為這一令人不快的趨勢，我們完全沒必要重申一遍。我想要做的不僅是揭示并描述作為具有深遠意義的獨特行為的日常反抗的模式，而且要通過對這些模式藉以產生并發生作用的意義和價值沖突的分析奠定這一描述的基礎。

說得委婉些，思想與行動之間的關系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在此我只強調最直接的兩點：第一，無論意圖還是行動都不是“不變的原動力”。產生于意圖的行動反過來影響意識和隨后的意圖與行動。因而，反抗的行動和關于反抗的思想（或意義）處于持續不斷的交流——持續不斷的對話中。第二，目的和意識與物質世界的聯系方式不同于行動與物質世界的聯系方式。對于人類行動者來說，可能和普遍的情形是，他能夠想象在此刻既不現實又不可能的行動方式。因此一個人可以夢想一次復仇或一個永遠不會實現的公正的千年王國。而另一方面，由于時過境遷，那些夢想可能實現。意識的王國賦予我們一種預想行動的特權，而行動可能——僅僅是可能——在某一未來時刻實現。舉例來說，如果對共享的價值、“幕后的”談話、反抗之前農民的意識沒有了解，我們如何能對任何農民的反叛給予充分的解釋？[[77]](#_77_33)最后，如果不考慮目的、觀念和那些行動的當事人的語言，我們又如何理解反抗的日常形式？

就另一個理由來說，對從屬階級的社會意識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這可以使我們澄清在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文獻中的38一個主要爭論——它集中于這樣一個問題，即在何種程度上，精英能夠把他們自己對公正社會秩序的想象不僅強加于非精英的行為，而且強加于他們的意識。

這個問題可以簡單地陳述如下：讓我們假設這樣一種情境，有一個特定的被剝削群體，且這種剝削發生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即由精英和（或）國家設置的強制力量使任何不滿的公開表達都成為不可能。為討論起見，假設唯一看得到的行為是表面的順從，對這樣一種狀態至少有兩種相互分歧的解釋：一種解釋認為，由于霸權性的宗教或社會意識形態的存在，被剝削群體實際上把這種狀態作為常規、甚至是社會秩序的合理部分接受下來。這一被動性的解釋假設了一種對社會秩序宿命論的接受甚至可能是一種積極的共謀（complicity）——對此馬克思主義者會稱之為“神秘化”或“虛假意識”。[[78]](#_78_33)這一解釋典型地建立在這樣的假設之上，即精英不僅支配了物質的生產方式，也支配了象征的生產方式[[79]](#_79_33)——而這一象征性霸權使他們可以控制其統治被評價的標準。[[80]](#_80_31)如葛蘭西所論證的，精英控制了社會的“意識形態部門”——文化、宗教、教育和傳媒。因而他們可以操縱對他們統治的同意。通過創造和散布與之相配的普適性的話語和概念，以及確立何為正確、美好、道德、公平與合理的標準，他們建立了一種象征環境，防止從屬階級自由地思考。事實上，對葛蘭西而言，無產階級在觀念層面的被奴役甚于其在行為層面的被奴役。因此，政黨的歷史使命就不僅是領導革命，而且更重要的是打破束縛革命思想的象征籠罩。這種闡釋被用來說明下層階級的沉寂，特別是在如印度這樣的鄉村社會，那里嚴格的種姓39分層的神圣體系被宗教約束所強化。低等種姓被告誡要接受他們在印度教等級中的命運以冀來世獲得回報。[[81]](#_81_31)

對沉默的另一種解釋是用農村中的力量關系而非農民的價值觀和信仰來解釋。[[82]](#_82_31)按照這一觀點，農村的平靜就可能是鎮壓（記憶的和/或預期的）的平靜而不是同意或共謀的沉默。

由這兩種不同解釋所引發的問題集中在對農民政治的分析以及更廣泛的階級關系研究上。圍繞這些問題發生了很多辯論，似乎解釋的選擇更多地取決于分析者的意識形態取向，而不是實際的研究。我并不想低估這些問題的重要性，但我認為有許多方法可以對這些問題進行經驗研究。換言之，一方面強調意識的相對重要性，另一方面考慮到鎮壓（現實的、記憶的或潛在的）在抑制反抗行動上的作用，是完全可能的。

關于虛假意識的爭論最終取決于精英和從屬階級價值觀的象征聯盟——即取決于這樣的假定：農民（無產階級）確實接受了精英的大部分社會秩序觀。如果“神秘化”并不意味著一個群體贊同剝削有理的社會意識形態，那么它意指什么？被剝削群體的觀點在實質上與精英價值觀的象征聯盟達到一定程度時，“神秘化”就得到加強；而當它在一定程度上持有相異的或矛盾的價值觀時，“神秘化”則被削弱。對從屬群體的亞文化及它與統治精英價值觀的聯系進行深入研究提供了部分我們所要尋找的答案，而證據并不確定，因為任何群體的社會觀點都會含有許多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內容。引起注意的反常的亞文化主題并不是簡單地存在，它們采取的形式、體現的價值觀和激發的情感聯系幾乎是普遍性的。因而，即使缺少反抗，我們也不會沒有探討虛假意識問題的資源。

為了減少爭論的抽象性，提供可能直接與此問題有關的證據或許是有益的。例如，關于租種或租賃的“臺上的”說法是強調其公平和公正。但再考慮一下，佃農背著地主用以形容這一關系的詞語就完全不同了——那是冷嘲熱諷的。[[83]](#_83_31)這難道不是意味著佃農對上述關系的看法被極大地“去神秘化”——即他們不再接受精英對租佃關系表面價值的定義——了嗎？當哈吉·阿尤布和哈吉·卡迪爾被稱為“哈吉·布魯姆”、“吝嗇的哈吉”或背地里被叫做“高利貸先生”時，難道不是意味著他們對土地、利益、租金和尊嚴的要求至少是在意識層面上的抗爭（如果不是“臺上的”的行動）嗎？對下層階級的宗教派別（如17世紀英國的教友會和20世紀爪哇的薩明教）放棄使用敬語，而使用低級別的稱謂來稱呼其社會上層（socialbetters），或使用像“朋友”或“兄弟”這樣的詞來描述每個人，我們又當作何解釋？這不是說明精英們為高貴和尊嚴的等級所寫的贊歌并沒有被其臣民逐字地唱頌嗎？

考慮農民由他們的經驗所形成的文化——他們“幕后的”評論和交談、他們的諺語、民歌、歷史、傳說、笑話、語言、儀式和宗教——才有可能決定農民實際上在何等程度上和以何種方式接受了精英所宣傳的社會秩序觀。下層階級文化的某些因素會比其他因素與此有更多的關聯。對任何農業系統來說，一個人可以認同一套關鍵的價值體系，它使精英所要求的尊重、土地、稅款和租金被證明合理。在很大程度上，這樣的價值體系是否能在從屬階級的亞文化中得到支持或遭到反對是一種經驗性的事實。如果強盜和竊賊轉變為民間英雄，那我們可以推斷對精英規則的違背博得了間接的贊許。如果公開的順從私下里受到嘲笑，那可以說明農民很難被一種實際上由人為規定的社會秩序所奴役。如果那些試圖拍精英個人馬屁的人被他們階級中的其他人避開和排斥，那我們就有證據表明存在著與權力抗衡的下層階級的亞文化。然而，對精英價值觀的拒絕并不是一個包含一切的命題，只有對農民價值觀的深入研究才能確定磨擦與調和的要點。就此而言，只有當沖突集中在社會秩序的主要價值觀上，并且不斷增長和突顯的時候，沖突的特點才是可以判斷的。

## 人類行動者的經驗與意識

帶著上面這些問題，我花了超過一年半的時間在塞達卡與村民生活在一起，傾聽、提問、努力去理解他們關注的問題。我希望，研究的結果是對一個正在經歷重大變遷（綠色革命：在這里是雙季稻的種植）的小村莊（70戶，360人）的階級關系的基礎堅實、思路縝密的說明。這些說明的許多內容（雖然并非全部）涉及到一場失敗的反對資本主義農業的發展及其代理人的階級斗爭。顯而易見，仔細傾聽那些我正在研究的行動者——傾聽他們的經驗、他們的范疇、他們的價值觀和對環境的理解是至關重要的。建立這種現象學的研究路徑有以下幾個理由：

第一個理由與社會科學能夠和應該如何進行有關。在新馬克思主義的結構主義學派中較為流行的做法是，假定能夠直接從一些表征——支配性生產方式、進入世界經濟的模式與時機、或剩余占有的方式——推斷出非社會主義的第三世界國家中階級關系的性質。這一過程具有高度簡約化的跳躍性，直接從一個或極少的經濟指標跳躍到從這些指標中推斷出的階級狀況。這里沒有了行動者，有的只是機制和木偶。當然，經濟條件是至關重要的，它們限定了許多但不是全部的人類行動者所面臨的情境；它們也限定了可能的、可想象的反應方式。然而這些限定是寬泛的，人類行動者可以在其中建構他們自己的反應，形成他們自身的階級經驗和他們自己的歷史。正如湯普森在與阿爾都塞的爭論中提到的：

這（對經驗的認識論的拒絕）在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那里是不可原諒的，因為經驗是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之間的必要中介：正是經驗（常常是階級經驗）為文化、價值觀和思想增色；正是經由經驗，生產模式才對其他活動施加決定性的影響……階級產生是因為在決定性的生產關系中，人們認識到對抗性利益的存在從而以階級的方式去斗爭、思考和評價：由此階級形成的過程也是自我形成的過程，盡管這一過程是在給定的條件下進行的。[[84]](#_84_31)

一種生產方式除非經由人類經驗和闡釋的中介，否則它如何能影響到階級關系的本質？只有把握了此類豐富的經驗，我們才能對一個特定的經濟體系如何影響了構成它、維持它或取代它的事物進行有意義的分析。當然，如果這對于農民階級或無產階級來說是正確的，那么對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甚至是流氓無產階級來說就更是正確的了。[[85]](#_85_31)在對階級關系的分析中忽略人類行動者的經驗無異于使理論吞食自己的尾巴。

將行動者的經驗置于分析的中心還有第二個理由，這涉及階級概念本身。階級在本質上通常被認為是在與生產方式的關系中占據一個同等位置的個體所構成的集合體。但如果這樣一個客觀的、結構的定義在那些被認知者的意識和有意義的行動中得不到反響呢？[[86]](#_86_31)取代簡單的“客觀”階級結構和意識之間一一對應的假設，去理解那些結構如何為有血有肉的行動者所理解不是更好的方式嗎？階級，畢竟并不能窮盡社會行動的整個解釋空間。在這個農民的村莊中更是如此，這里階級可能與親屬關系、鄰里、派系、儀式關系等作為人類認同與團結的核心事物發生競爭。超越村莊層面，階級也會同族群、語族、宗教、地域等爭奪認同的中心位置。階級可能適用于一些情況但不適用于另外一些情況；它可能被其他的關系加強或切割；它可能對一些人的經驗非常重要，對另一些人則不那么重要。那些試圖摒棄所有與階級認同相矛盾的人類行動原則，并把它們視為“虛假意識”而去等待阿爾都塞所說的“最后時刻的決定因素”的人，他們可能空等一場。與此同時，多重認同的雜亂現實一直都是產生社會關系的經驗。無論農民還是無產階級都不會直接地或孤立地從生產方式中獲得他們的認同，而我們越早關注到活生生的具體的階級經驗，也就能越快地了解到階級形成的阻礙和可能性。

為階級關系的深入研究提供進一步證明的是，在農村，而且不只在農村，階級是在陌生和欺騙性的旗號下傳播的。它們并未被理解為幽靈般的、抽象的概念，而是以完全的人的方式、以特殊的個體和群體方式、以特定的沖突和斗爭的形式出現的。皮文和科洛沃德把握住了這種工人階級經驗的特殊性：

首先，人們是在一個具體的環境中經歷剝奪和壓迫的，那不是大而抽象過程的最后結果，他們的不滿形成了針對特定目標的特定的抱怨，這是具體的經驗。工人所經歷的是工廠、流水線的快節奏、工頭、工賊、保安、所有者和付薪支票，他們不會經驗到壟斷資本主義。[[87]](#_87_30)

馬來農民以同樣方式經歷了地租上漲、吝嗇的地主、毀滅性利43率的高利貸、取代他的聯合收割機、以惡劣態度對待他的小官僚。而他沒有經歷的是由那些地主、聯合收割機擁有者、放債者和官僚（它在一個復雜過程中只是次級環節）所構成的現金體系或資本主義金融體系。因而不足為奇，在村莊里，階級的語言總是帶有其與眾不同的出身胎記。村民不會把帕克·哈吉·卡迪爾叫做金融資本代理人，而是稱他為“高利貸者卡迪爾”，這是因為正是通過大約1910年到二戰時期控制鄉村信貸的切蒂亞爾借貸制度，馬來農民才更多被動地經驗到金融資本。切蒂亞爾這個詞對于眾多越南和緬甸的農民來說有著相似內涵，這一事實證明了由資本主義滲透東南亞所喚起的這種經驗是普遍的。識別一種偽裝并揭示其背后的真實關系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就偽裝而言，隱喻是真實關系的一部分。馬來人通常把放債者視為一個放債者和一個切蒂亞爾，即作為一個外國人和一個非穆斯林。同樣，馬來人典型地把店主和稻米收購者經驗為不僅是一個債權人和批發商，而且還是另一種族和地區的人。因而，現實中的階級概念幾乎總是包含了基本金屬成分的合金概念。它的具體性質、它的使用都是合金的而非其所含純金屬的特性。我們要么如我們所發現的那樣認識它，要么放棄對階級的經驗研究。

階級的經驗性概念是植根于社會關系的特定歷史中的，這一點很難否認。經驗的這種根深蒂固性給了它力量和意義。當廣泛的共同經驗存在時，體現階級關系的象征就能夠具有超凡的喚起力量。不難想象，在此背景下，個體的不滿如何轉變成集體的不滿，而集體的不滿又如何具有了階級神話的性質，而它總是與地方性經驗聯系在一起。由此，某個地主的佃農，如果他認為地主很苛刻，他可能會抱怨；他甚至可能幻想向地主訴說他的所思所想甚或是殺人放火的邪惡想法。如果這只是孤立的、個人的不滿，那事情只能停留于幻想階段。但如果許多佃農發現他們在同一條船上，由于他們共有一個地主，或是由于他們的地主以同樣方式對待他們，那就會產生集體不滿、集體幻想甚至集體行動的基礎。農民們隨后可能會發現自己在交流壞地主的故事，而由于一些地主比其他地主更為聲名狼藉，他們就成為這些精心制作的故事的焦點和反對這類地主的許多社區集體抱怨的對象。于是我們就有了“哈吉·布魯姆”的傳奇，這已成為對當地大規模地主所有制的一種隱喻式表達。我們還有關于吝嗇的哈吉的詩歌，這更多地是關于曾經去過麥加的地主階級的象征，而不是關于個體的故事。

如果在吉打州曾經有過（實際上沒有）大規模的反抗地主的運動，那么可以肯定那些傳說的某些精神將在行動中反映出來。其方式早就象征性地準備好了。但核心問題是，階級概念（如果它已經被建立起來）被發現已編入具體的共同的經驗，它表現為文化材料及其承載者的特定的歷史內容。在西方，食物這一概念經常被表達為面包，而在亞洲大部分地區它意味著米飯。[[88]](#_88_32)在美國資本家可以簡稱為“洛克菲勒”，這是一個有著全部歷史內涵的名稱；而在塞達卡，壞地主被簡稱為“哈吉·布魯姆”，這同樣是一個有著全部歷史內涵的名稱。

基于上述所有原因，研究塞達卡的階級關系，如同其他地方一樣，都需要與研究行為一樣多地研究意義和經驗。其他方式是不可能的，因為行為從來不能自我解釋。引述一個快速眨動眼皮的著名例子即可說明問題，這是由吉爾伯特·賴爾所用并由克利福德·格爾茨詳細說明的案例。[[89]](#_89_31)那究竟是抽動還是使眼色？僅僅看到物理運動得不出什么線索。如果是使眼色，它又是哪一種眼色？是密謀、嘲弄還是引誘？只有一種文化知識，即行動者、觀察者及其同伙共同的理解才能告訴我們答案；即便如此，我們還須考慮到可能的誤解。知道地主提高了稻田的租金是一回事，而知道這行為對受其影響的人意味著什么是另一回事。可能，僅僅是可能，佃農把租金的提高當做是合理的和早該發生的，也可能他們把這種提高視為壓迫和把他們從土地上趕走的企圖。觀點會有分歧，只有明了佃農的經驗和他們賦予事件的意義，我們才有可能獲得答案。我說“可能”是因為出于佃農的利益，回答可能不是他們觀點的正確表達，或者那種解釋只是一種計策。但如果沒有那些信息，我們會完全陷入困惑。一個糧食竊賊、一個明顯的怠慢、一件顯而易見的禮物——除非我們能夠從只有行動者才能提供的意義中建構它，否則它們的意義是我們無法理解的。在此意義上，我們既關注行動者的經驗，又關注行動本身；既關注人們頭腦中的歷史，又關注作為“事件流”[[90]](#_90_31)的歷史；既關注階級如何被認知被理解，又關注“客觀的階級關系”。

這里采取的方法當然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被稱為現象學或常人方法學的方法，[[91]](#_91_31)但并不局限于此，因為人們解釋自己總比以行為解釋行為要真實一些。純粹的現象學有其自身的弱點。許多行為，包括言說，都是無意識的和非反思性的，建立在意識水平以下的理解上。細心的觀察者必須提供對這類行為的解釋，而不是僅僅重復對行動者的常識性認識。一種解釋必須從它的邏輯標準、系統性及其與其他已知社會事實的一致性來評判。人類行動者也可能提供對他們自己行為的矛盾的解釋，或者他們可能打算對觀察者或彼此隱瞞他們的理解。因而，盡管這一解釋的基礎是靠不住的，還是要使用同一的解釋標準。此外，在任何情境中都存在著使人類行動者的行動意義得以呈現的要素，但是很難期待它們被意識到。例如，一次國際信用危機、世界范圍內對糧食需求的變化、內閣中一次平靜的影響到農業政策的派系斗爭、種子基因結構的微小改變，都可能對當地的社會關系產生決定性的影響，而無論它們是否為與之相關的行動者所知。這種知識其實是局外的觀察者添加的對有關情境的描述，是對行動者自己所提供的描述的補充而不是替代。因為即使行動者所經驗到的現實是片面的甚或是錯誤的，這種現實還是為他們的理解和行動提供了基礎。最后，并不存在對經驗現實的全面解釋，也沒有對有意識的經驗的完整文本。[[92]](#_92_31)記錄文本的完整性既受到記錄者的經驗和分析偏好的限制，也受到時間和空間的實際限制。

因而，在此所要做的是合理地解釋塞達卡的階級關系，盡可能地依據由當事人自己提供的證據、經驗和對行動的描述。在許多地方，我的描述添加了自己的解釋，因為我清楚地意識到，意識形態、個人利益的理性化、日常的社會技術甚至禮節如何影響了行動者的解釋。但我從不指望用我自己的解釋來代替他們的解釋。我所努力的是使我的解釋更為有效，這是通過顯示我的解釋如何“在參與者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描述中消除異常或增加新的信息”而實現的。正如鄧恩所言：

我們不應當做的就是聲稱我們比他自己還能更好地理解他或他的行動，特別是在獲得他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描述之前……檢驗對一個行動的描述或解釋是否正確的標準是在對行動者所描述的全部內容的處理中所體現出的簡潔和準確。

# 第三章 反抗的景觀

今天，塞達卡村民生活的這個場景，僅僅在很小的程度上是由他們自己造成的。或許在一個世紀之前，也就是說在英國統治之前，這片土地仍是荒蕪之地，商品經濟和商品活動僅僅是勉強糊口的生存經濟的一小部分，國家僅僅是偶爾介入村莊事務。只有那時，我們似乎才能夠把塞達卡的開荒者在很大程度上視為他們小世界的創造者。即使從這個意義上講，塞達卡村也不能稱之為自治。[[93]](#_93_31)國家已經開始動員勞力開鑿灌溉系統，以便開墾大片新的稻田，擴大政府的稅收基數。檳城的水稻交易已經使經濟充分貨幣化，從而使它受到了更大的市場力量的影響。除去這些影響他們生活環境的社會力量外，最重要的是，千變萬化的自然條件年復一年地決定了他們的生活水平如何，以及能否生活下去。

變化是逐漸發生的，但是，它大到一定程度時就會引發質的變化。這些變化并不在于農業生產風險降低，而是更多地表現在不同季水稻的收成情況有巨大差別，這種差別主要受遠離村莊的外部社會力量的影響。從灌溉水供應的時間及受其影響的插秧和收割的進度到化肥和拖拉機服務的費用、水稻的價格、碾磨的費用、貸款的條件和勞動力的成本，所有這一切受國家政策和宏觀經濟狀況的影響如此之大，以至于地方自治的范圍略有縮小。

在此，詳細描述塞達卡村的社會歷史及影響其發展的外部壓力既沒有必要，也不可能。然而，我們有必要描述和分析塑造及影響了村莊內部階級關系的主要因素。這種景觀的背景——后殖民主義國家和經濟的基本情況——盡管顯然是人為的，但實際上，它是一個很少被小行動者注意到的既定事物（這里，這個小行動者就是我們關注的中心）。畢竟，我們不能期望魚去談論水，因為水是魚生存和呼吸的環境。當然，根據村民習以為常的場景的總體特征，我們最終可以預測出絕大部分他們擁有的極其詳細的常識性認識。然而，在其他的場合，他們的那些常識不起任何作用。這種基本場景的典型特征顯然限制了可能的事物，至少是短期可能的事物；它們也創造了機遇，并對階級關系的性質產生了明顯的影響。例如，恰恰是由于法律上實施的土地私有制，地主——佃農之間的關系才有可能成為并且通常是階級沖突的焦點。再如，恰恰是由于競爭性選舉的活動（盡管受到了嚴格的限制），政治沖突才能夠以特定的方式加以疏導和制度化。土地私有制、政治競選作為社會的產物不可能一成不變，但是，只要這些因素一直存在下去，它們就會被視為“自然”事實，猶如塞達卡村的黏土和雨季。[[94]](#_94_31)

或許我們可以說，這種景觀的中間背景（middle ground）就是過去十年的經濟和社會事實。在此，最明顯的標志就是雙耕引入之后，土地所有制、收入、就業、人口流動、社會分層以及整個地區社會結構等方面都發生了變化。在這些巨大的變化中，塞達卡村只不過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其次是政府活動的范圍和性質的變化。這個中間背景十分突出，因為它可以在農民的日常生活中清晰地表現出來；它是農民們必須適應的環境；最后，它也是農民們在擁有不同判斷和主張時做出選擇的依據。描述中間背景的情況就是去分析基本的社會和經濟事實，而這個事實又取決于村民對其內涵的理解。比如說，如果村民哀嘆，雇傭勞動收入的下降主要是由于聯合收割機，那么，我們就有必要知道，這種模式的普遍程度以及典型的損失又是什么。描述這種中間背景的目的并不在于讓事實自己說話（它們從來不會這樣做），而主要是依據這些事實建立某種經驗基礎，以此作為我們分析階級關系的起點。

景觀的前景——過去十年中塞達卡村發生的顯著變化——將在第四章加以描述。這兩章構成了地方經歷與活動的場景。

這里呈現的事實是根據我頭腦中的兩條篩選原則而選擇出來的。首先，在我看來，雙耕之后生產技術和生產關系的巨大變化，是塞達卡村階級關系的核心事實。其次，在對諸多事實進行篩選時，我也受到了村民所關注的事物的影響。如果說地租的水平或者是收割工作收入的損失引起了他們的極大憂慮，那么，我會允許這些憂慮影響我對事實的選擇。無疑，我可能忽略了其他很重要的因素，甚至是十分關鍵的要素。但是，根據他們的經驗而不是我的經驗去選擇事實似乎更可取，畢竟，村民的反應來源于他們的親身經驗。

## 背景：馬來西亞和水稻主產區

如果一個人注定要成為東南亞某地區的農民的話，那么，無疑馬來西亞從任何角度講都是最佳選擇。馬來西亞的優勢在于：它擁有一個開放的、很有活力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它擁有相對合理的人地比率，擁有一個雖不是完全民主、但至少能容忍政治反對派的政治體系。另外，同其鄰國相比，馬來西亞是一個缺少攻擊性的國家。在醫療服務、教育、水電供給、交通、洪災控制和農田灌溉等方面，馬來西亞政府確實為其人民做了很多好事，而且，在這些方面，它比任何其他的東南亞國家做得都要出色。[[95]](#_95_30)過去20年來，馬來西亞的經濟增長率令它的鄰國羨慕，同時也受到了國際借貸機構（如世界銀行和亞洲發展銀行等）的青睞。從1960年到1976年，馬來西亞的人均GNP增長率達到3.9%，這個增長速度遠遠高于低收入國家的平均增長水平，也高于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甚至高于一些發達的工業國家的平均水平。[[96]](#_96_30)因此，雖然人口增長較快（每年達3%），但到1978年，馬來西亞的人均GNP超過了1100美元，這個數據是任何其他東南亞主要國家的2倍，因而使它們都相形見絀。[[97]](#_97_30)

如果說哪個國家曾經是推行“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的典型國家，那么非馬來西亞莫屬。1980年，馬來西亞是世界上熱帶木材、錫、橡膠和棕櫚油最大的出口國，而且1975年以后，馬來西亞已經成為一個純粹的石油出口國。持續的貿易順差大大增加了政府的稅收收入（1966—1976年增長了4倍），從而極大地增加了國家的政策選擇和開發經費。至少依據東南亞地區的平均水平，馬亞西亞的國庫的確是很豐盈。與此同時，馬來西亞的經濟日益依賴國際市場，因為它出口的主要是初級商品。同過去相比（那時，馬來西亞的出口主要是依賴錫和橡膠等原材料），這種依賴現在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但它依舊是明顯的依賴。雖然這樣的例子很多，但是，進口替代型工業的快速發展并沒有減輕馬來西亞經濟對出口貿易的依賴；這種工業化嚴重依賴資本貨物和半成品的進口（1974年幾乎占到全部進口額的3/4）。外資對經濟的控制方式雖然比較溫和，但一直持續存在。外企首先在種植業站穩了腳跟，隨后在自由貿易區內，它在進口替代商品（如布匹、鋼鐵、機動車輛等）和出口的工業品（如電器、晶體管等）方面都占據了主導地位。到1974年，馬來西亞60%以上的股份公司都由外資控股。

在這種情況下，小農農業的需要，尤其是水稻生產的需要，無論是在殖民時代還是后殖民時代，從來都沒有被優先考慮過。作為外匯和政府稅收的主要來源，種植園總是優先獲得基礎設施、勞動力、土地和資本。目前，隨著城市勞動力的日益增加，人們試圖通過降低國內稻米（主要的食物來源）的價格來盡量降低勞動成本，這已經變得愈加迫切。

如同其他地方，資本主義發展、出口導向型增長、鼓勵外國投資進入的模式也導致了日益嚴重的收入分配不公。盡管總體增長率十分明顯，盡管政府出臺了治理貧困的方案，這種現象還是發生了。首先，它表現在，從1960年到1970年，傳統農業部門平均收入與其他經濟部門的平均收入差距日益拉大。1960年，這種差距為1:2.5，1970年超過了1:3。[[98]](#_98_30)其次，它也表現在，低于和高于官方貧困線的人口之間的收入差距在日益增大。比如，從1960年到1970年，農村貧困人口的實際收入以每年0.4個百分點的速度逐年下降，而其他人口的收入每年以2.4個百分點逐年上升。[[99]](#_99_30)在其后1970—1978年的8年時間里，農村貧困人口的實際收入以每年2.4個百分點增長，但是這個增長率還不到其他人口收入增長率的一半（5.2個百分點）。在過去將近20年的時間里，不僅不同群體的人們收入差距明顯擴大，而且到1978年，農村窮人中的兩個主要群體——耕種稻田的小農和橡膠農——的實際收入還不及他們1960年的實際收入水平。事實上，整個資本主義經濟增長模式已經導致了巨大的不平等，而且農村窮人從這種發展模式中獲益最少。[[100]](#_100_30)馬來西亞的貧困程度和增長模式之間的關系處于一種畸形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相當比例的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44%）生活在官方公布的貧困線以下，而在其他國家中，只有人均收入極低時，這種情況才會出現。

水稻種植會受到政府政策的關注，究其原因有三個方面。首先，國家要確保大米供給的穩定。[[101]](#_101_30)如果進口的大米價格便宜而且貨源充足，而橡膠和錫的價格大幅上漲，這時，國家就可以利用出口橡膠和錫所賺的外匯，從國外進口大米滿足市場的需求。然而，政策所基于的假設時常出現問題。比如，在1931年，出口商品價格的大幅度下跌使得政府根本就沒錢從國外市場進口國民生活必需的糧食。也是從這一年開始，政府第一次開始重視大米生產的自給自足問題；為了限制土地流入非馬來人之手，也為了限制土地用于非種植的其他用途，政府通過了《馬來西亞土地保護法》，并且，政府還在1939年建立了水稻最低價的保護機制。雖然政府出臺了這些激勵措施，但是，馬來西亞仍需不斷從國外進口大米，而且進口稻米的數量要占消耗總量的一半。即使在經濟大蕭條時期，割膠也比種水稻更有利可圖。二戰之后出現了一次大米供給危機，1954年，水稻價格下跌，大大地減少了農民的收入，激起了亞羅士達地區農民大規模的游行示威。這一事件之后，人們又開始重新重視水稻自給的重要性。政府不僅通過了一個小額的借貸項目，資助負債的農民贖回他們已經做了抵押的土地，而且，政府還通過了《水稻種植者法》，試圖控制土地租金價格，并確保農民的土地使用權。后者直到今天依舊是形同虛設。這些補救措施收效甚微是必然的，因為政府并不愿意大幅提高農產品的價格，他們擔心提高農產品的價格會增加種植園和城市勞動力的工資。大米的自足不得不等待著20年之后的新投入和雙耕技術。

第二，馬來西亞獨立之后，政治競爭迫使政府重視水稻生產的需要，這是到目前為止最為重要的因素。寬泛地說，獨立后的執政黨（馬來民族統一機構，簡稱“巫統”）是一個完全由馬來西亞人組成的政黨，而且其地位的維持主要依靠馬來西亞人的選票支持。其中，許多選票來自水稻種植者，而他們又多是馬來人。當然，選舉體制本身受一系列條件的限制。實際上，整個國家并不存在地方自治，從而確保了大部分唐人街不會落入華裔反對黨手中。國內安全法案允許政府以防范性拘留的方式來限制宗教和左翼反對派的活動。最后，根據不同的人口規模確定議會選區的方式，也使馬來人的選票要遠比其他居民的選票有影響力。1957年以后，馬來西亞的選舉體制一直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它賦予了馬來西亞政治精英和國民陣線統治地位的合法性。

由于調整后的選舉體制同開放的、出口導向型的經濟（需要指出的是，這種類型的經濟加劇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并存，馬來西亞的水稻種植者已經成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請考慮如下事實：首先，1970年，馬來人的平均收入僅是華裔平均收入的1/2，華裔是馬來西亞社會的另一支重要的族群。[[102]](#_102_30)僅以貧困的家庭為例，幾乎3/4是馬來人，而且4/5以上生活在農村。[[103]](#_103_30)同時，水稻種植者內部貧困的發生率遠高于從事其他職業的群體，而他們中的大多數是馬來人（84%）。貧困人口分布的地區差別也值得注意，主要集中在北部諸州，如吉打州、玻璃市州、吉蘭丹州和丁加努州等，這些地區是主要的水稻產區，而且農民多是馬來人。難怪，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與眾多的、貧窮的、馬來鄉村人口因素相結合，已經為馬來西亞主要反對黨伊斯蘭教黨的攻擊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在1969年大選之后，巫統完全有理由擔憂它在馬來人中的政治霸權；伊斯蘭教黨實際上贏得了和巫統一樣多的馬來人的選票，而且，據估計，在兩黨激烈爭奪的43個席位中，伊斯蘭教黨獲得了比巫統還要多的馬來人選票。[[104]](#_104_30)伊斯蘭教黨也曾經控制過吉蘭丹州和丁加努州的政府，并且1969年以極大的優勢在吉打州執政。

第三，執政黨之所以被迫去關注貧困問題、關注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問題，主要是因為這些問題不僅已經威脅到執政黨的選舉霸權，而且也威脅到公民社會本身脆弱的和平狀態。1969年大選之后，發生在吉隆坡市以及在其他城市社區的騷亂，是自國家獨立之后最嚴重的沖突，而且這些事件也讓政府開始意識到，上面提到的增長模式不一定能換來社會和平。[[105]](#_105_30)1974年，吉打州和其他地區爆發了大規模的小橡膠農的游行示威，這進一步增加了政策調整的必要性。這種擔憂——雖說不上是恐慌——的一個主要結果是促使政府出臺了現在所稱的“新經濟政策”。這項政策致力于在本世紀末徹底消滅貧困，重新調整經濟結構，以消除種族所具有的經濟功能。

對執政黨政治霸權的威脅主要來自于貧窮的、由馬來人構成的、以種植水稻為主的北部各州，在這些地區，種族具有強大的經濟功能。巫統為確保它在這些地區的統治地位作了一系列的努力，這主要體現在那些旨在使馬來大米生產者受益的政策上。事實上，所有這些政策都可稱為“軟方案”（soft options）。之所以說它是“軟方案”，是因為巫統既沒有試圖重新調整基本的財產關系模式，也沒有試圖去調整與其相連的權利。實際上，對稻田和橡膠園所有權的重新分配從來就沒有納入他們的考慮，雖然這兩個部門的不平等都源于無法平等地獲得肥沃的土地。土地所有制的改革是最基本的步驟，它雖然被提了出來，但是，現存的法律在實施過程中不僅有效地受到了地主反抗的阻撓，也受到了那些不愿意實施租賃協議登記和最高租金政策的官員的阻撓。這種強硬方案之所以擱淺，是因為它們既不容易實現，而且在某種意義上也沒有必要。說它們不容易實現（或者說它們不可能實現），這是因為，巫統在馬來鄉村的主要支持者是大農場主和大地主，而這個階級在重新分配土地和改革土地所有制中必然要遭受重大的利益損失。說它們不必要，是因為整個國家經濟增長的收益和商品出口的收入已經為消除非均衡發展的癥狀提供了必要的資金，以至于潛在的問題至少此時此刻被安全地忽視了。

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政府在推行軟方案時投入了大量的財政和行政資源。從1957年國家獨立到1975年，政府用于支持農村發展的財政支出實際上增長了六倍多。這部分開支大多投資在同每一個村莊都密切相關的基礎設施和集體財產上——如公路、學校、診所、灌溉水渠、電力、清真寺、祈禱室和社區禮堂等。當然，投資公共基礎設施建設與選舉政治相聯系，而且巫統的候選人會經常讓他的選民想起政黨在過去給予他們以及將來準備給予他們的好處。盡管這些措施并不是為了重新分配資源，但它們實際上無疑提高了包括窮人在內的馬來農民的生活水平。

政府大力追求的一個更深層次的軟方案，就是由政府資助的、以橡膠和油棕種植園的形式而出現的重新安置計劃。[[106]](#_106_30)從60年代中期開始，這個安置項目的花費已經接近農村發展支出總數的一半，而且到1975年已經安置了7萬戶家庭。[[107]](#_107_30)在這些計劃中，尤其是在油棕計劃中，移居者的收入遠遠高于水稻種植者的平均收入，而且在塞達卡村，每一個年輕的村民都夢想入選移民計劃。事實上，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夠被納入計劃，而且被納入計劃的那些人無論如何都不是最貧窮的人，因為對移民的選擇是高度政治化的。[[108]](#_108_30)然而，毫無疑問，該計劃已經對減緩貧困產生了影響，它不僅減緩了那些被安置者的貧困，也減緩了那些未被安置者的貧困，因為它的實施至少減少了土地和就業的競爭壓力。這種影響同城市地區的工業和建筑業繁榮的作用相類似，它減少了（暫時地或是永久地）農村地區沉重的就業壓力。然而，土地計劃終究是軟方案；因為只有在能為每個移民家庭提供4萬馬元且擁有大量未開拓耕地的國家中，這種計劃才有可能實現。[[109]](#_109_30)

除了提供公共基礎設施和一些可供選擇的就業機會之外，國家的水稻政策也試圖直接提高水稻種植者的生產率和收入。這種策略的核心就是穆達和凱姆布兩個地區的農田水利灌溉項目（分別在吉打州和吉蘭丹州實施），從而使大約8萬個家庭的27萬英畝的土地能種植雙季稻。雙季稻開始于20世紀70年代早期，在兩個項目中實施，迄今為止，其總體結果很顯著。二次收成、施化肥、引入新種子等，這些因素加在一起，水稻的產量比過去提高了2.5倍。平均收入實際上也增加了一半以上。[[110]](#_110_30)盡管馬來西亞最窮的兩個地區實現了產量提高和收入增加，但軟方案這一說法仍然適宜。正如我們觀察到的，這場“綠色革命”帶來的好處主要流向了擁有稀缺資源——土地和資本——的大農戶。最貧窮的農民家庭只是略有收益，而且目前收入的分配狀況比以前更加不平等。政府通過農民協會向農民提供化肥、生產貸款等方面的資助，資助的分配主要根據耕地的英畝數，因此，擁有大面積耕地的土地經營者獲得了最大的優惠。[[111]](#_111_30)人們根本不可能期望巫統違背它在農村地區最主要的支持者——富裕農場主——的利益，畢竟，他們才是市面上大部分水稻的來源。

國家干預水稻生產給階級關系帶來的影響不只限于收入分配上。按照政策自身的邏輯，政府不僅取代了私人部門的活動，在某種意義上政府也取代了氣候（自然條件）的作用，而兩者曾經是影響農民收入的關鍵因素。1939年以后，政府一直制定水稻收購的最低保護價，但是獨立之后，水稻價格卻變成了一個很敏感的政治問題，并促發了1954年及其后1980年爆發的大規模的游行示威運動。生產貸款和化肥曾經是幾乎由華裔店主專營，然而，從1970年開始，它們變成了農民協會向其成員提供的一種服務。大米加工曾經由私人專營，其后也日益受到大的政府加工廠和烘干廠的支配。對于那些外出找工作的農民來說，這些就業機會以前幾乎只能由私人企業提供，而現在政府也是一個可選擇的雇主，政府可以通過移民計劃或像1978年干旱時那樣為農民們提供短期的就業安排實現這一點。最后，水稻種植過去依賴于季風雨的出現，而現在則受制于當局預先規定的灌溉時間表。在與自然條件和私人部門之間的關系上，政府先前主要是一個旁觀者或調停者。而現在，幾乎在水稻種植的各個環節上，政府都已經成為直接的參與者、決策者、分配者和敵對者。政府與農民之間的大多數緩沖機制消失了，從而不僅極大地增強了政治的作用，也大大增加了執政黨與農民直接沖突的可能性。

所有這些至今仍被普通老百姓認可的國家政策——公共基礎設施、安置計劃、農田水利灌溉項目和雙耕的引入——在緩解貧困的過程中一直都扮演著某種角色，雖然這種作用并不大，也可能只是邊緣性的。同時，所有這些政策在收入和財產不平等方面充其量也只是扮演了中性的角色，或者說，在實施安置計劃和引入雙耕種植技術的案例中，甚至還擴大了貧富差距。[[112]](#_112_30)因此，這些政策被認為是軟方案。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不平等或許并不是無意的，因為目前政府仍在繼續推行這些方案，而且也沒有做出任何努力去消除可能出現的消極影響。事實上，最近執政黨開始著手推出一系列政策，目標在于培養一個富有的、馬來人的、“溫室”內的中產階級。這些政策的推行是在促進馬來人參與現代經濟部門的名義下進行的。在馬來西亞第三個五年規劃（1976—1980）期間，用于商業和工業發展的1.5億財政支出基本上都用于資助和扶持馬來企業家或者是政府直接投資于由馬來人控制的公司。這項政策的其他方面還包括：以優惠的價格出售私人股份給馬來人；為馬來人預留一些政府建筑工程項目和必需品供給項目合同；把某種商品交易的特許權以優惠的條件給予馬來人，因此，無論從理論上對這些政策如何解釋，事實已經證明，這些政策明顯偏袒處境優越的馬來人，而且在短期內產生了更多的股份丑聞。[[113]](#_113_30)這些政策也促使一個新的馬來商人階層迅速出現，他們利用有保障的國庫券，在受保護的市場中，操縱著某些政府特許商品的生產活動，而且通常以固定的價格把他們的商品和服務賣給政府，從而保證了他們的利益。在廣大的農村地區，相當多富有的農場主利用了各種機會去獲得貸款，用于購買出租車、開辦小型水稻加工廠、購買卡車、修建魚塘等。他們由此變成了一個新的、“受保護的”中產階級群體。因為這種最近出現的受國家保護的資本家通常與政黨結盟，而且他們中的大多數本來就是已經很富裕的群體，所以，在傳統農村社會中，以土地所有權為基礎的階級分化的性質具有了新的維度——這種維度充滿了新的政治和經濟沖突的可能性。

巫統是一個組織嚴密而且擁有雄厚財力的政治機構，它為個人或集體提供的誘惑滲透到了每個馬來村莊。1978年巫統以巨大的優勢贏得大選之后，它獨自或者同國民陣線中非馬來裔人聯盟共同控制了整個半島的每一個州政府，并占據了聯邦議會席位的4/5。在大多數農村地區，巫統代表的是占統治地位的富裕的農場主及其親屬朋友，而且，許多富裕的農場主都涉足了其他生意，同時，他們也得到了當地大多數政府官員的支持。

在馬來西亞，巫統最主要的反對黨伊斯蘭教黨也盡力爭取馬來人的大力支持，[[114]](#_114_30)即便它沒有巫統作為執政黨的優勢，也無法給它的支持者提供大量的物質鼓勵。盡管我的研究目標不是探討政黨政治，但值得注意的是，伊斯蘭教黨作為政治反對派的長期存在表明，大眾關于階級、種族、宗教抗議等問題的看法是混合在一起的。當然，在農村，伊斯蘭教黨和巫統更像是同一政黨的不同派別。許多伊斯蘭教黨的領導人是富裕的地主和農場主，這一點與巫統相似，但伊斯蘭教黨的領導人很少有機會獲得政府的資助和庇護，他們也不可能去經營那些要求與政府有政治聯系的副業。恰如克里夫·凱斯勒的精彩分析，就普通的伊斯蘭教黨成員而言，這個政黨喜歡把階級問題（涉及到從事種植業、漁業和割膠的馬來農民的收入和經濟安全）、種族和宗教問題（涉及到土著居民的權利和宗教信仰）與對執政黨以及對政府的批評相聯系，而且，在伊斯蘭教黨看來，政府和執政黨在兩方面辜負了絕大多數馬來人民的愿望。[[115]](#_115_30)與巫統不同，伊斯蘭教黨的組織形式是非正式的，它主要依賴遍及馬來西亞農村、受大眾歡迎的教長及其核心人物，并且，它有別于通常與巫統結盟的官方的宗教機構。一位伊斯蘭教黨發言人在1980年吉打州的遞補選舉大會——在這次選舉中，巫統以微弱的多數優勢獲勝——期間的呼吁表明，階級問題和宗教問題通常是以某種方式結合在一起的。他說，農民只能從每袋稻谷或每張橡膠中獲得微不足道的利潤，繼而他反問巫統為什么會耗費巨資修建佛教寺院。“如果橡膠的價格是每片2馬元”，他繼續說：“政府從中拿30分，而中間商能獲利70分”“，政府的政策不是基于信仰而是基于財產”。最后，他在演講中不僅提到了政府官員的奔馳車和豪宅，還提到了他們為了自身的利益而濫用《古蘭經》“，他們將是最先下地獄的人”，他補充說。在這種情況下，大眾對伊斯蘭教的理解自然就延伸到收入分配、就業問題以及其他階級問題，而且還延伸到了虔誠和宗教法則問題，所有這些都為政治抗議提供了理想的環境。近30年頑強的反抗表明，政治反抗是馬來西亞經濟發展模式的副產品，它阻止了更沉重的壓迫，將繼續找到某種形式的制度表達。

## 中層背景：吉打州和穆達地區的灌溉系統

以穆達河為名的穆達地區，至少從14世紀開始，就一直是整個半島主要的大米出產地。水稻種植主要集中在吉打州和大約500平方英里的吉打/玻璃市（Kedah/Perlis）沖積平原，這塊平原擁有大片肥沃而厚實的濕地黏土。在難得的晴朗的日子里，從坐落在南端4000英尺高的日來山山頂（吉打州的最高峰）眺望，我們可以看到西起馬六甲海峽、東至中央山脈連綿起伏的山麓的連續40里長的稻田。在這一望無際的稻田中間，只是夾雜著反映了該地區村莊典型的線狀分布的林蔭路，以及更為少見的像州府亞羅士達這樣的大城市。在水稻種植季的不同階段，我們可以看到不同的景象：在雨季時節，我們會看到一望無際的稻田，猶如同馬六甲海峽連成一片的巨大的淺水湖面；在水稻成長的季節，我們會看到變化多端的綠色海洋；在水稻成熟的季節，我們會看到無邊無際的金色的稻穗；在水稻收割之后的時節，我們會看到漫天遍野的褐土和林立的稻茬。

穆達平原的政治和社會歷史至少在兩方面顯示了現存的階級關系。我們首先必須記住，我們考察的這個社會直到本世紀都是由大量的拓荒者（入侵者）和移民組成的社會——邊疆社會。雖然水稻種植開始于14世紀，但是，穆達平原的大部分土地都是最近才開墾出來的。暹羅人1821年的入侵徹底破壞了那里延續下來的定居，使穆達平原的人口銳減到大約5萬人，或者說是入侵前一半的水平。[[116]](#_116_30)吉打州的人口直到本世紀初才恢復到原來的水平。當時正處于一個相對和平的時期，新的排水灌溉系統建設項目的引入和推廣吸引了大量移民的涌入。恰恰是在這段時間（大約1880—1910年），穆達平原上的許多村莊，包括塞達卡村，開始有居民定居下來，而且，在當時，稻田事實上是一種可以買賣的商品。最初，蘇丹把殖民地的土地所有權和運河的開掘權授予了貴族階級，但是這些人很快就被一個非貴族的、資本主義的、商業的土地擁有群體取而代之。[[117]](#_117_30)這種邊疆歷史的重要性在于：吉打州農村地區的階級關系只是一個簡單的富人和窮人、大農戶和小農戶的關系，而沒有加入傳統封建社會內部的地主和農奴、貴族和平民關系的因素，而這些因素曾廣泛而長久地存在于東南亞的其他地區，而且與王室宮廷政治有牽連。[[118]](#_118_30)

穆達地區歷史的第二個顯著特征是，國家通常不是剝削農民的一個有效的機器。實際上，這也是馬來西亞歷史的一個特征。正如古利克在他對前殖民主義時代國家歷史研究所總結的那樣，“逃離”（遷徙）是農民對抗壓迫最經常的一種選擇。[[119]](#_119_30)由于馬來西亞是一個邊緣的（處于邊疆的）、流動的社會，同時，由于王室的強制性權力有限，這是一種雖充滿艱辛但卻成功的策略。例如，1864年，王室試圖強行調動徭役來修筑一條貫穿整個半島的公路，這項工程引發了大量的農民向南部地區遷移。再如，蘇丹的首相（Menteri Besar）想修建一條從首府亞羅士達開始的萬邁薩曼運河（Wan Mat Saman Canal），然而，當這條運河在1885年動工后，大部分工程都是靠雇用中國勞工完工的。直到本世紀末，對外貿易額的增長和華裔人口的增加，為政府提供了另一種稅收來源，從而使得政府沒有太大的必要來壓榨馬來農民。事實上，此時吉打州的稅收主要通過企業家來征收：政府通過拍賣的方式把收稅的權力轉讓給他們，這些人由于具有專營權和特許種植權，因而他們竭力通過征收比租金更高的稅收來獲取利潤。這樣一來，種植鴉片和從事投機活動的農場很容易成為國家稅收的主要來源，這種稅收是水稻生產和農產品出口稅的3倍以上。[[120]](#_120_28)因此，恰恰是貧窮的華人而不是馬來農民，受到了殖民主義的財政政策的沖擊。甚至在國家獨立之后，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國家的收入，至少在財政收入方面，很少來自馬來農民。在馬來西亞，尤其是在大多數農業生產區，國家的經濟發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國家和農民之間很普遍、很殘酷的斗爭：國家向農民征收重稅，而農民為維持基本生存抵制繳稅。甚至到今天，馬來西亞整個國家的稅收仍然倚重于進出口稅收、政府特許產品生產稅、借貸收入和商業稅收，而非直接來源于稻米生產者的農業稅。毫不夸張地說，現代馬來西亞政府僅僅在食物供給和政治穩定方面依靠稻米種植者，但政府并不指望著他們提供必要的財政資金，因而，農民上繳的農業稅幾乎不會影響他們的收入。農民們對政府充滿敵意、猜疑、抱怨的情況很少出現，因為馬來西亞農民很少有過東南亞其他地區農民那樣承受沉重稅賦的歷史。

到1970年，穆達地區的農村人口已經超過50萬人，他們基本上是專門種植水稻的馬來人。比重很小的城市人口（112000）分散在19個城鎮中，在這些地方，華人和馬來人的數量大體相當。即使在推行雙耕之前，吉打州的政治家們也喜歡稱他們的州是馬來西亞的“糧倉”，因為吉打州擁有全國最大的水稻種植面積，而且也一直是國內市場最主要的稻米供應地。[[121]](#_121_28)吉打州水稻種植業之所有擁有重要的商業地位，是因為在歷史上吉打州地區的水稻產量一直很高，而且吉打州的水稻耕地面積相對較大，這兩方面優勢結合起來，吉打州的農民在維持生活必需之余仍有大量的剩余糧食可以出售。雖然農業收入相對而言要低于其他產業，但是在歷史上這里農民的收入水平要遠遠高于全國農民收入的平均水平。沿用先前的評論說，如果你必須在馬來西亞的某個地方做個農民的話，吉打平原應該是首選之地。

穆達地區相對較為優越的生態和社會條件表明，這個地區并非是我們考察嚴重的階級沖突的理想場所。在這里你能看到貧困，但不存在巨大的痛苦；你能看到不平等，但沒有明顯的兩極分化；你能看到租金和稅收負擔，但沒有殘酷的壓榨。在最近幾百年中，吉打州一直都存在著農民的遷移和逃離、土地掠奪、對邊疆地區的襲擾，而且最近還發生了抗議和政治反抗，但是，這里并沒有東南亞其他地方都曾出現過的農民起義。選擇這樣一個地方作為研究階級沖突的對象，其優勢恰恰在于它是一個難得的案例。假設有這樣一個地區，絕大多數農村人口都比十年前生活得好，如果我們在這里看到了大量的階級對抗行為，那么，我們就可以合情合理地推測，在東南亞其他以水稻種植為主的農業地區，也會存在大量的階級對抗。

雖然擁有肥沃的土地、宜人的氣候、相對的繁榮，但吉打平原經濟和社會結構的其他層面仍令人憂慮。如果這片土地只適合種植水稻，那么，它就不適合種植其他農作物，而且，這個地區隨后將逐漸形成十分脆弱的單作模式。如果農場的平均面積保持穩定（4英畝或5.6里郎），那么，這個地區多數農民就只能在小塊土地上分散耕作，這使得他們遠遠生活在貧困線之下，并且迫使他們在農閑季節涌向大城市和大農場尋找就業機會。如果水稻的產量高于平均水平的話，土地租金也會相應地占到收入的35%，這也意味著很多農民辛苦勞作一年的收入只夠維持基本生計。[[122]](#_122_28)如果說近一半以上的農戶都曾經擁有稻田，那么，他們的數量在過去60年的時間里在逐步減少，因為連續不斷的債務和農業歉收使許多人失去了手中的土地。[[123]](#_123_28)

穆達地區稻田灌溉項目始于1966年，完全推廣是在1973年。此項目的目標在于解決上述問題中的一部分。總體而言，這個項目不僅包括兩條大壩、主體工程、主運河和分支運河，還包括配套的基礎設施，以便有可能種植26萬英畝左右的雙耕稻田。猶如其他地方，穆達地區的“綠色革命”和其他措施一并推行，這些措施包括新的生長快、產量高的水稻品種的引入、復合化肥的使用、新技術和機械化、簡單便利的貸款，以及新的加工和銷售渠道。幾乎所有相關的官方負責人——世界銀行、馬來西亞政府和負責該項目的官員——都相信，截至1974年，該項目取得了成功。在灌溉項目的推廣地區，92%的區域都種植了雙季稻，新的水稻品種被普遍接受，而且，新的生產動力已經使水稻產量達到了自給的水平。世界銀行作為項目的主要資助者，其激情洋溢的成績報告被廣泛引用：

這個項目的推廣使得農場的平均收入幾乎翻了一番。對農場主和農民都是如此……水稻產量從1965年的26.8萬噸增加到1974年的67.8萬噸，而且有望在1980年達到71.8萬噸……項目的推廣也增加了大量的就業崗位，這樣，無地的農民和其他失業群體將從中受益……目前經濟增長率達到了18%，遠遠超出了當時預期的10%。[[124]](#_124_28)

從1974年的情況來看，這個項目近乎絕對成功。大量的重要研究都從生產、技術、就業和收入的角度記錄下了這種成功。[[125]](#_125_28)從1980年的情況來看，項目的評估，尤其是根據就業和收入而進行的項目評估，并不十分準確。當然，毫無疑問，如果沒有這個項目的話，馬來農民在絕對收入和相對收入上都要比現在差很多。

穆達地區的“綠色革命”直接或間接地引發了土地租賃、就業、收入和制度等方面的主要變化。既然這些變化能夠而且已經被記錄下來，我們有必要確定這種變化的性質和程度。一旦變化的基本輪廓被描繪出來，我們就可以把它當做行動者在這個小舞臺上必須處理的原材料。

從1970年開始推廣雙耕之后，穆達地區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從視覺的角度看，這些變化對任何一個熟悉先前吉打州農村情況的人來說都是十分明顯的。相當一部分變化并不是由于雙耕的推廣，而是由于政府為馬來西亞農民提供基礎設施的協同性的政治努力，包括修建清真寺、祈禱室、診所、公路、學校和提供電力。其他方面的變化更直接地來自雙耕帶來的平均收入的增加。曾經蕭條的小城鎮現在出現了許多新的商店和密集的市場。[[126]](#_126_28)曾經幾乎被廢棄的公路現在又開始充滿了卡車、公共汽車、小汽車和出租車，本田70摩托車更是像自行車那樣普遍。[[127]](#_127_28)許多家庭的房子，曾經是棕櫚樹的屋頂和墻壁，現在都換成了波狀錫制的屋頂和木板墻壁。[[128]](#_128_28)屋內也增添了大量的縫紉機、錄音機、電視、冰箱和煤油爐等日常生活用品。[[129]](#_129_28)

穆達地區發生的這些看得見的變化也許很驚人，但是，一系列并不是很引人注目的變化意義更大。事實上，這些變化可以稱之為“有益的缺失”，猶如先前經常發生、但現在很少見的悲慘的事件。比如，在推廣雙耕之前，這個地區1/3的農民不能滿足自家的糧食需要。如果他們沒有其他機會賺錢，并從市場上購買糧食的話，他們只能被迫靠木薯粉、玉米、木薯根等維持生命，這種窘況至少要延續到來年收獲糧食的時候。在一個災年之后——這個地區有過許多災年，如1919年、1921年、1925年、1929年、1930年、1946年、1947年、1949年、1959年和1964年——大部分農民同樣都面臨著饑荒，雙耕在這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即使是只擁有小塊土地（0.71英畝）的佃農，他們現在也能收獲足夠吃的糧食，盡管他們可能嚴重缺乏現金收入。如今，很少有農民一天不吃兩頓米飯了。[[130]](#_130_28)水利灌溉和化肥的使用，不僅僅提高了水稻的產量，而且使每季的收成有了保障。當然，這種新的農業生產機制也很脆弱，比如，在1978年，由于缺水取消了灌溉季，這使得穆達地區的農民痛苦地想到了昔日的情況。盡管如此，缺糧食鬧饑荒的情況，即使對那些最貧窮的農民，也已經很少發生了。

從已有的數據來看，由營養不良及其必然帶來的人類（尤其是兒童）死亡，盡管還沒有完全根除，但已經大為減少。與營養不良相關的各種疾病以及因為營養不良導致的嬰兒和幼童的死亡率也下降了，這種下降與雙耕的引入緊密相聯。[[131]](#_131_28)在1970—1976年間，穆達地區的嬰兒死亡率幾乎下降了一半，而此前，嬰兒的死亡率要遠高于整個國家和吉打州嬰兒死亡率的平均水平。對穆達平原的“進步”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在1970年，貧血和營養不良是第七位導致人類死亡的疾病，而到1976年，它已經降到了前十位之外，然而，交通事故已經從第六位上升到了第二位。

另一個“有益的缺失”是農閑季農民外出的減少，而這種減少很大程度上應歸功于雙耕的推廣。在1970年以前，短期和長期的外出是這個地區經濟發展的顯著特征。這在下面的事實中也有所反映：穆達地區人口增長率是自然增長率的一半，而農民外出率似乎是水稻主產地區中最高的。[[132]](#_132_28)此外，在農閑季，小農和佃農家庭必須有一個成年人外出打工賺錢補貼家用，至少也是短暫的外出。雙耕在穆達地區的推廣暫時減緩了這一趨勢，出現了所謂“再農民化”的過程。許多農民第一次很悠閑地一整年都呆在家里。在單耕時不能維持生存的小農戶現在看到了希望。這不僅僅是因為同一塊土地可以收獲兩次，而且因為農民有兩季獲取（田間）勞動工資的機會。由于1969年泰國勞工進入受到限制，以及煙草種植在貧困的、以勞務輸出為主的吉蘭丹州的盛行，就業競爭的壓力大大減小，勞動工資的收入也大大提高。然而，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這些只是暫時地緩解了競爭壓力。到1978年，聯合收割機取消了很多由于水利灌溉創造出來的工作崗位，穆達地區少地的農民再次被拋到了大街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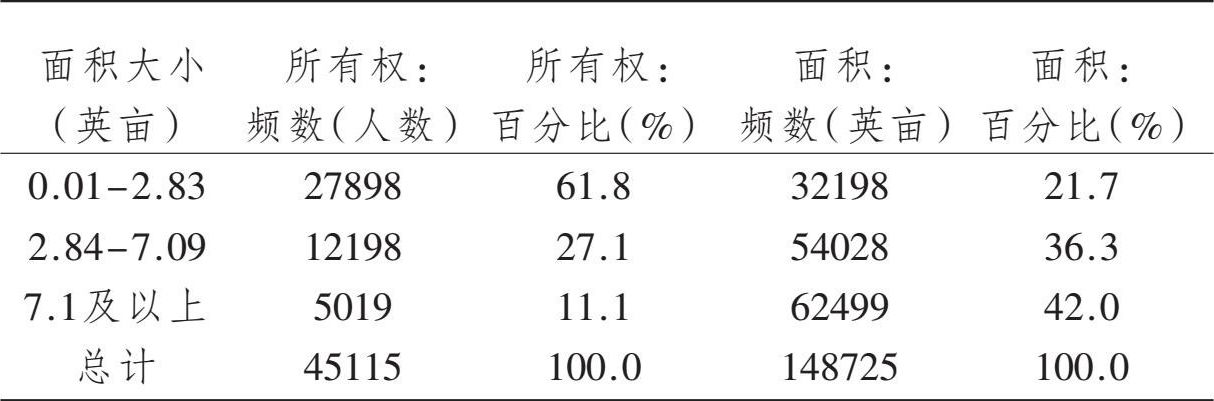
如果農民在家中專門從事水稻種植的好處只是短暫的，那么，雙耕對土地占有的影響顯然是持久的。兩次收成、穩定的產量、相對穩定的水稻價格在多數情況下有助于打破農民負債的惡性循環。此前，收成不好意味著農民可能要喪失土地。從店主和當鋪老板那里得到的按季貸款仍然是穆達地區的農民維持生計的主要方式，但是這些貸款因為連年好收成已經被徹底還清了，而且只有極少數人會采用日后危及土地所有權的借記方式。在這種情況下，農民階層相對穩定，而且也減緩了農村地區無產階級形成的進程。[[133]](#_133_28)

已經出現的這些變化——基礎設施、消費品、大米供給、營養、就業和農戶的還債能力等——都是過去十年中穆達地區取得的進展。然而，也有其他方面的信息——這些信息只能被視為模棱兩可的信息，因為對它們的評價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評價者所處的階級立場。這里僅僅是盡力去描述記錄下來的基本事實，而把社會的解釋留到第五章。為考察整個穆達地區的情況，求助于統計資料還是有益的。不過，一旦我們進入村莊層面（“前景”），這些數據就會變得有血有肉。

土地所有權

就任何一個農業場所而言，人們希望了解的首要事實是，主要生產資料——土地——的所有權是如何分配的。[[134]](#_134_28)在穆達地區，土地的分配非常不均（基尼系數為0.538），盡管大部分土地并不是被極少數人所控制。而且，并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在引入雙耕之后，稻田所有權的分配變得更加不均或更為集中。基本的情況見表3.1。[[135]](#_135_28)一定要記住，表3.1的數據只包括擁有稻田的農民，因此，它排除了近14600名雇農和8000戶無地的農戶（占農業人口的37%）。即使如此，土地分配不均的程度仍然令人吃驚。擁有7—10英畝水稻田的農民只占人口的11%，他們卻擁有總土地面積的42%。恰恰是這些富裕的農民階層，連同一些大土地承租者，是穆達地區商業農場主階層的核心，他們出售的水稻占整個地區市場上水稻的3/4。[[136]](#_136_28)另一方面，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61.8%）生活在貧困線之下。事實上，40%的農戶只擁有1.42英畝以下的土地，他們獲得的收入只是維持生存必需的一半。

表3.1 1975—1976年穆達灌溉工程范圍內稻田面積的分布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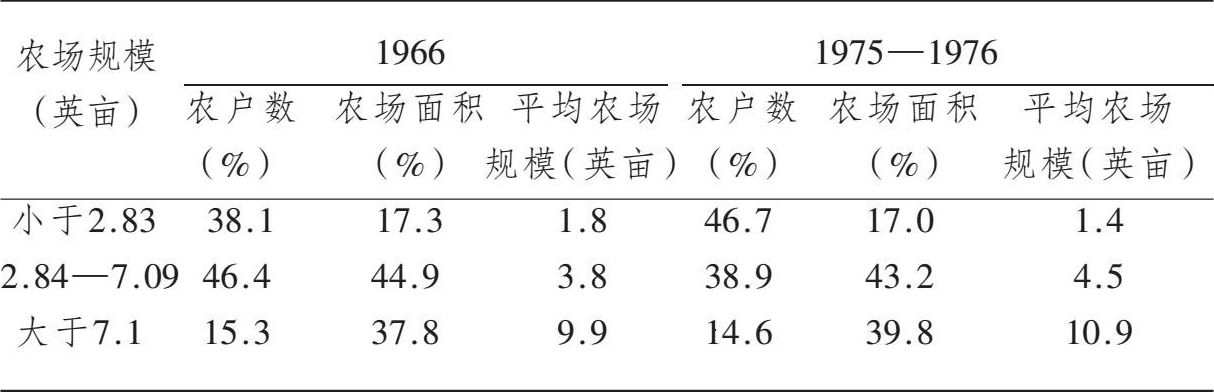


伴隨著雙耕的推廣，稻田價格上漲了大約5倍，遠遠超過了消費品價格的增長和水稻收入的增長，這也意味著將來可能發生社會流動（農民外出）。1970年以前，這種情況出現得較少，一位勤勞節儉的佃農能買得起一小塊土地，從而改善他的處境。隨著土地價格的猛漲，佃農已經買不起土地了，只有那些有錢的地主才能通過買賣土地賺取更多的利益，并擴大他們擁有的土地。傳統的向上流動的渠道就這樣被完全堵死了。

農場規模

考察耕地的分布情況（無論是自己擁有土地還是租種地主土地的農民）是分析基本生產要素一個很好的研究思路。表3.2給出了雙耕推廣前后農場規模的比較數據[[137]](#_137_28)。實際上，農場規模的不均，盡管不如土地所有權分配不均表現得那么顯著，但它依然十分明顯。幾乎占穆達地區一半以上的小農戶僅僅耕種了17%的稻田，但是，占總農戶14%的大農場主卻耕種了40%的稻田。處在這兩部分人中間的是一個為數眾多的、耕種中等農場的農戶。在過去十年，最引人注目的變化趨勢是小農場的數量不斷上升，但與此同時，農民擁有的土地面積卻沒有相應的增加，因此，平均每個小農場的面積降到了歷史的最低水平，只有1.4英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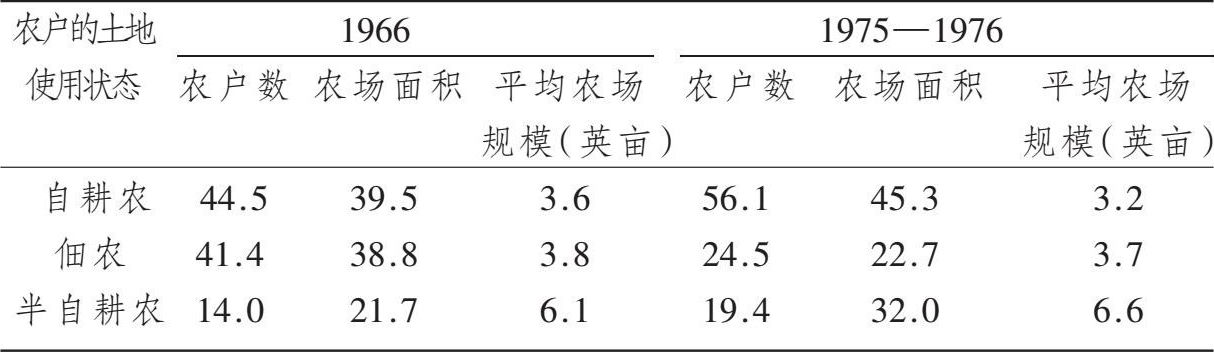
表3.2 1966年與1975—1976年農場規模的分布情況比較



土地使用

最根本的變革首先發生在耕種過程的社會安排中。穆達地區的土地占有和使用不僅復雜，而且也十分靈活。例如，我們經常會見到這樣的農民，他們耕作自家的部分土地，同時也會出租小塊土地，然后再租種另一小塊土地，有時為了賺點兒錢甚至也會為別人收割水稻。盡管如此，我們仍能發現存在著三種主要的土地使用類型：（1）自耕農（owner-operators），他們耕種自己擁有的土地；（2）佃農（pure tenants），他們全部租種別人的土地；（3）半自耕農（owner-tenants），他們既耕種自己的土地，又租種別人的土地。[[138]](#_138_28)從1966年開始，土地使用模式最明顯的變化就是，佃農人數比重急劇下降（見表3.3）。有證據表明，這一趨勢甚至在雙耕之前就已經出現了，但是1970年以后，這種發展趨勢被大大地加速了。[[139]](#_139_28)佃農在1955年是穆達地區土地使用類別的主要部分，到1976年，這部分農民已經在農民總數中降到了1/4以下，而且他們耕種的土地面積不到總面積的1/4。這些證據表明，我們正親眼目睹穆達地區的佃農階級快速消滅的過程。從農場規模到土地使用的數據，所有這些境況都是一個逐步兩極分化的過程——僅僅能夠維持自身生存的小農（大多是自耕農）的比重正在上升，佃農的數量全面下降，而大規模的商業化的農場在快速增長。這樣的結果同東南亞其他地區“綠色革命”導致的結果相似。[[140]](#_140_28)

表3.3 1966年與1975—1976年穆達地區的土地使用



對這些結構性變遷的解釋是復雜的，因為結構性變遷不僅在底層產生了一個為數眾多的、邊緣化的、普遍貧困的小農階層，還在上層產生了一個實力強大的、資本主義的農場主階層，同時還在二者之間產生了一個依然重要的中農階層。雙耕的引入、產量的提高和機械的使用使得繼續耕作對地主而言不僅是有利可圖的，而且還是可行的。這不僅有助于解釋為什么佃農會被取代，也有助于解釋為什么自耕農——不管是小的還是大的——會不斷增加。人口統計數據也能部分解釋其中的原因。雖然持續不斷地有農民外出打工，但是在1957年到1976年間，穆達地區的人口幾乎增加了30%。截至1980年的十年間，穆達地區的人口增長超過18%，達到了539000人。考慮到這一時期稻田面積是固定不變的，人口增長使得農場主逐漸開始收回出租的土地，并把這些以前由他們自己經營的土地分給眾多的子孫后代。這也有助于解釋小農為什么會激增，而佃農為什么會被解雇。

所有這些都使我們相信，在1976年以前已經被證明的這些趨勢，不僅仍會繼續存在，而且很可能加速。更重要的是，1976年以后，技術、生產成本和大米價格的變化為解雇小佃農提供了更深層的動力。聯合收割機不僅大大降低了監督成本，還加快了農閑季的收割速度。顯然，這有利于大農場的經營。考慮到穆達地區租金的“剛性”原則，[[141]](#_141_28)1979年農閑季節以來免費化肥的使用和20世紀80年代后期水稻的農戶價格30%的增長，使得自耕比以前更有利可圖。最近的跡象也證實了這種觀點。[[142]](#_142_28)

1966年之后，租佃形式出現了另外兩種引人注目的變化，而且，這兩種變化都傾向于在犧牲小佃農利益的情況下增進擁有資本的大租佃者——尤其是半自耕農——的利益。首先是每季收租的時間和方式。1955年，穆達的佃農3/4以上都是在收獲之后交租，形式是交納固定數量的稻谷，或者是相應的現金。[[143]](#_143_28)與稻谷數量無關的現金地租很少，只占所有租金繳納的12%。到1966年，現金地租已經變得和谷物地租一樣普遍了；在1975年，3/4以上的地租都是現金，這似乎徹底改變了20年前的交租方式。然而，谷物地租可以在每季收獲之后交納，因此，通常是可以依據每季水稻的實際產量做適當的調整；現金地租卻要在每季耕種之前交納，而且數目是固定不變的。在地主轉向現金地租時，佃農被迫一次性付清兩倍的租金，一份是為上季交租，另一份是為下一季的耕種交租。現在還沒有人研究這種變化的后果，但是，毋庸置疑的是，相當多貧窮的佃農因交不起租金而被有能力交租的農民取代了。[[144]](#_144_28)除了子孫從父輩那里租種土地之外，穆達地區大多數的租佃現在已經變成完全食利性的租賃，在此，所有耕種土地的風險都由耕種者承擔，因為他們在這一季的耕種之前已經預付了固定的租金。

在土地租佃關系中，另一個更關鍵的變化是，土地租期越來越長。這種稱為pajak的長期租賃方式至少是2季，現實中一般要延長到10或12季。全部租金要一次性付清，而且這些交易都有書面的、經過公證的契約。長期地租這種方式存在已經很長時間了，而且通常是那些中等收入的農民為了某個目的——比如，重要的婚禮、蓋房子、去麥加朝圣或者償還一大筆債務等——而籌集資金的方式。因為這類家庭急需出租土地，他們土地的租金價格一般低于當時市場租金價格。而如今，長期地租的租金已經相當于或者高于市場價，[[145]](#_145_28)而且，有錢的地主為了投資的目的通常采用這種方式來籌集資金。

對地主而言，長期租賃要優于抵押，因為在這種方式下，土地使用權可能出讓許多年，但是地主仍保留土地的所有權。但是，對于小的佃農來說，后果則不堪設想，他們會因付不起地租而被排擠出土地租賃市場。這里僅僅列舉一個典型的長期租地契約的例子。在1979年，若要租6個季（3年）3里郎的土地，需一次性預付租金2700—4000馬元。然而，這個數目是穆達地區農民年平均收入的2—3倍，遠遠超出了當地大多數農民的支付能力。那些有錢的馬來地主和華裔商人越來越多地采用這種長期地租的形式，因為他們擁有資本和現代化機器（拖拉機、聯合收割機），而且他們借此來謀求更有利的投資機會。他們愿意付高額租金，而且傾向于租用大面積的稻田。由此，正在出現的是一個富有的、完全商業性的佃農階層，而他們進入土地租佃市場而取代資本缺乏的小佃農。

我們無法估計，在1976年之前，有多少小佃農在競爭中因缺乏資本而被排擠出了土地租賃市場。然而，很清楚的是，在1976年之后，大農場和長期租地模式都得到了快速發展。在那之后進行的村莊研究幾乎都注意到了這種發展趨勢，而且還就它給穆達地區貧窮農民可能造成的后果發出了警告。[[146]](#_146_28)

機械化

在傳統條件下，種植水稻需要投入大量的勞動。大多數的勞動集中在水稻種植的四個階段：耕地、插秧、收割和脫粒。如果使用雇傭勞動力，他們大多出現在這四種勞作中，因為諸如除草和修堤這樣的其他勞動可以一點兒一點兒地做，而且一般是由家庭成員自己完成的。在穆達地區，少地的農民家庭通常要依賴這些勞動機會去獲得微薄的收入來維持生計。拖拉機和聯合收割機的引進大大減少了這樣的勞動機會，因為前者實現了耕地的機械化，而后者則實現了收割和脫粒的機械化。插秧是剩下的唯一沒有機械化的田間勞作，它可以為那些貧困的家庭提供一些就業機會——然而，這種勞作現在甚至也受到了威脅。

嚴格地講，使用拖拉機耕地，既不是由“綠色革命”引起的，也不是取代人力的新事物。1970年以前，穆達地區大多數的稻田都使用拖拉機耕地，但是在雙耕之后，犁地的速度變得至關重要。可以說，至少最初的時候，拖拉機推動了雙耕，從而使得每年插秧、收割和脫粒的工作量增加了一倍。由于拖拉機創造的雇傭機會遠遠多于它減少的機會，因此，拖拉機的使用在當時沒有引起太多的關注。[[147]](#_147_28)

聯合收割機的使用卻不一樣。1975年，穆達地區所有的稻田都是由人工收割和脫粒的。到1980年的時候，巨大的西式收割機——其價值約20萬馬元，而且通常為商人辛迪加所擁有——收割了幾乎80%的稻田。如果說我們很難想象這種令人吃驚的科技飛躍（從鐮刀和打谷桶到叮當作響的擁有32個底座截盤的機器巨人）給農民帶來的影響，[[148]](#_148_28)那么，計算出其對農村收入分配的影響并不太難。

就耕種2.8英畝以下土地的農戶（占到穆達地區家庭的46%）和雇傭勞動者（約占7%）而言，聯合收割機的引進對其收入的影響尤其明顯。前者的凈收入至少有1/4是來自收割水稻，而后者的收入通常是全部來源于此。如果我們計算收割（一般由女人來做）和脫粒（一般由男人來做）在全部的雇傭勞動中所占的比例以及聯合收割機的使用頻度，我們就會發現，聯合收割機的引入減少了薪資勞動收入的44%。[[149]](#_149_28)對于那些最貧困的小農階層來說，他們租種土地的純收入減少了15%；而對自耕農來說，他們的收入減少了11%。當然，就完全的雇傭勞動者而言，這樣的結果無疑是災難性的，而且很難想象，在新的環境下，他們作為一個階層如何繼續生存下去。因而，聯合收割機在穆達地區的應用意味著，貧窮的農民階層以前靠出賣勞動力賺取的工資收入減少了幾乎一半。盡管現存工作的工資水平提高了，但這無法彌補工作量的減少帶來的損失。

機械收割對工資收入的直接影響是巨大的，但是從長遠的角度看，其間接的后果將更具有危害性。機械化運作促進了大農場和長期地租的發展，但與此同時，它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了小塊土地租賃的機會。此外，它還取消了拾穗這樣的勞動，改變了當地的雇傭模式，減少了插秧勞動者的收入，改變了當地的社會關系。這些變化很少出現在地區的統計數據中，我們將在下一章中詳細討論塞達卡村所發生的這些變化。

從剝削到邊緣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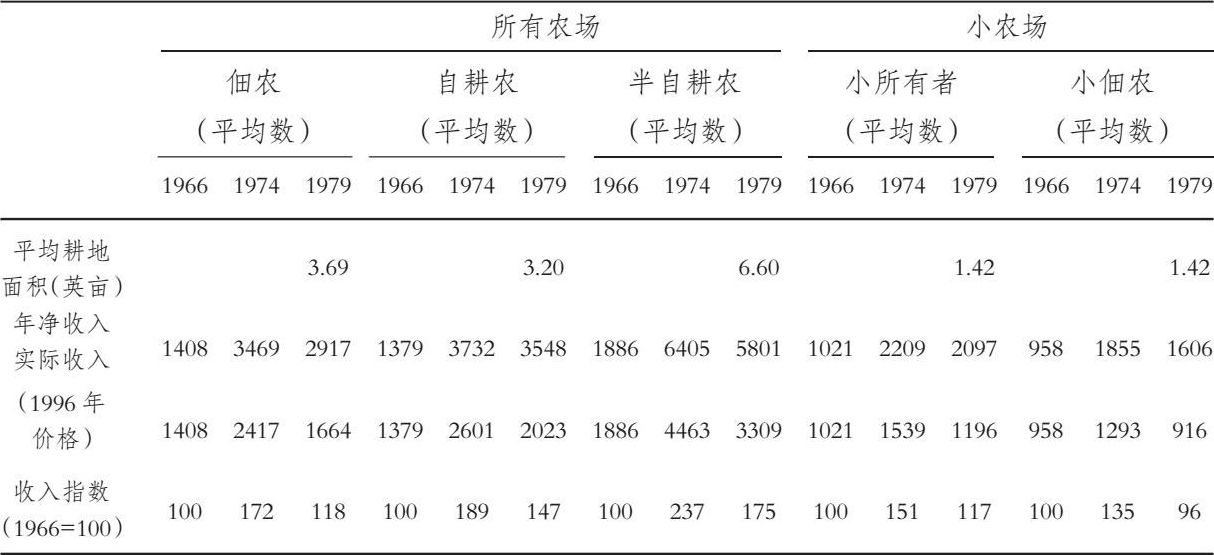
到目前為止，雙耕的影響似乎在很大程度上被視為有關獲取土地、工作和工資的問題。在此，我們有必要停下來簡單地分析它對階級關系的影響。穆達地區的綠色革命所帶來的變化切斷了農村各階層間的經濟聯系。在雙耕之前的穆達地區，在某種程度上甚至直到1975年，富有土地的階級和缺少土地的階級是通過工作——工資以及耕種——租金交換而結合在一起的，盡管這種交換具有剝削的性質，但它在水稻耕作中把他們聯系在一起。富裕的地主和農場主擁有大面積的土地，他們不可能單靠自己耕作，因此他們在犁地、插秧、收割和脫粒諸方面需要勞動力。而無地或少地的農民盡管沒有財富和土地，但他們擁有充足的勞動力，他們可以為地主和農場主提供所需的服務。由于勞動高峰通常出現在水稻耕種過程中，所以，雇主會通過提供一定的物品和貸款的方式來獲取及時可靠的勞動力。從更一般的角度來看，地主“經營”的不僅僅是土地，也包括較為貧困的村民，因為地主要想使土地有利可圖，他們就是必不可少的。

隨著機械化的推進，租種土地變得非常昂貴。除去地主的近親之外，其余的那部分佃農都要預付固定的市場化的租金，而此租金并不考慮農業歉收的情況，或者說，他們本身就成了大資本家式的土地所有者的承租人。更重要的是，現在水稻種植很大程度上不必依賴雇傭勞動力。除了插秧和一些情形，諸如一小塊土地早熟或者倒伏（被風雨刮倒）不得不實行人工收割之外，大農場主很少需要雇用貧苦村民。因此，他們相應地也不再有動機表現出善意。當然，這兩個階級之間的聯系不會完全消失，但是無疑比起以前減弱了，而且所有的跡象表明，這種階級之間的聯系紐帶正逐步趨于消亡。如果說以前貧苦的村民是通過相互依賴和剝削的紐帶同富裕的雇傭者聯系在一起，那么，現在他們發現自己被推開了，被邊緣化了。如果他們不再被剝削，如果說他們現在擁有了所謂的“自由”，那么，這也只是失業者或多余者的自由。

收入

穆達灌溉工程對整個地區收入和收入分配方面的影響最好分兩個階段加以考察：1966年到1974年的初始階段和隨后而來的1974年到1979年的第二階段。基本的匯總數據見表3.4。這個表包括穆達地區最常見的五種土地使用類型。如同所有的平均數，它們也只是個概括。這種概括隱藏了大量不同的環境和條件，以便建立集中趨勢的某種尺度。為了避免低估小農場主的收入，人們總會在必要的時候做出判斷。[[150]](#_150_28)

表3.4 1966年、1974年、1979年的穆達地區土地使用類型和農場規模對家庭收入的影響



說明：此表根據附錄B中的原始資料和說明簡化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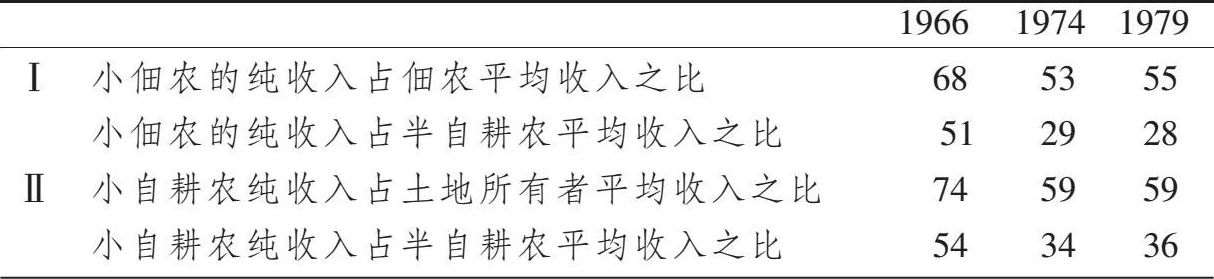
雙耕在穆達地區最初的影響是，它在廣闊的區域內增加了農民的收入——無論是名義上的收入，還是實際收入。然而，這種收益是以收入分配更加不公平為代價的。[[151]](#_151_28)租佃類型中最富有的半自耕農，因為擁有最大的農場規模，所以是最大的受益者，其實際收入增長了137%；佃農和自耕農的平均收入分別增長了72%和89%。比較而言，小佃農和小所有者（幾乎占穆達地區農戶的一半）的收益是最少的，分別為35%和51%。在此，考慮到不同的收入基數，甚至這些百分比也會引起人們的誤解，原因在于，典型的半自耕農的實際收入是2577馬元，但小佃農的平均實際收入僅為335馬元，二者的比率為8:1。需要補充的是，無論是收入上的差距還是收入分配不公，都不單單是由雙耕引起的。除此之外，還有其他方面的原因。1973—1974年全球范圍的經濟危機和通貨膨脹引起的水稻農戶價格的成倍增長就是一個重要的因。[[152]](#_152_28)

從1974年末到1979年的這5年，各類農民的收入（包括名義收入和實際收入）相對而言都下降了。[[153]](#_153_28)佃農和小所有者的平均損失意味著，到1979年末，他們的實際收入比1966年少了20%。小佃農損失最嚴重，他們的實際收入還不及13年前的水平。只有半自耕農和自耕農依舊充分保持著1966年的實際收入水平。

這種大范圍的收入下降主要是由三個因素造成的。首先，早些時候由雙耕帶來的水稻產量快速增長的勢頭已經停了下來，而且，水稻產量在這一時期一直都停滯不前。其次，1974年之后的五年時間里，水稻的價格一直很穩定。再次，隨著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了22%，生產投入的成本持續提高，從而抵消了各類土地占有模式的農民收入的增長。[[154]](#_154_28)農民收入的下降促成了1980年1月大規模的農民游行示威運動——這也是15年來的第一次——在這次游行示威中，成千上萬的農民聚集在亞羅士打，要求提高水稻的價格。

表3.5反映了1966年到1979年間收入分配不斷惡化的趨勢，該表比較了小農場主的純收入在這時期占其他類型農民純收入的比重。顯然，所有這些差別實際上源于雙耕引入的第一階段（1966—1974）。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第二階段雖然抑止了（并未逆轉）這些新的不平等，卻以普遍的更低的實際收入作為代價。小佃農在1966年的收入是半自耕農的一半，而現在只占到他們收入的1/4了。更確切地說，有幸殘存下來的佃農的收入已經下滑到了半自耕農收入的1/4。更大數目的小自耕農的收入13年前占自耕農收入的一半以上，而現在僅占其收入的大約1/3。穆達地區小農經濟地位的下降，一是由于他們的農場規模小，二是由于灌溉工程帶來的直接或間接的后果（這一工程并不是有比例地向土地所有者提供稀有的生產要素）。他們一開始就很窮；他們現在依舊很窮，而且相對而言變得更窮了。依據這些數據，我們根本無需去質疑基斯·格里芬對“綠色革命”做出的總體評價：“現在正發生的這些變化傾向于增加相對的不平等。”[[155]](#_155_28)

表3.5 1966年、1974年、1979年不同土地使用類型的收入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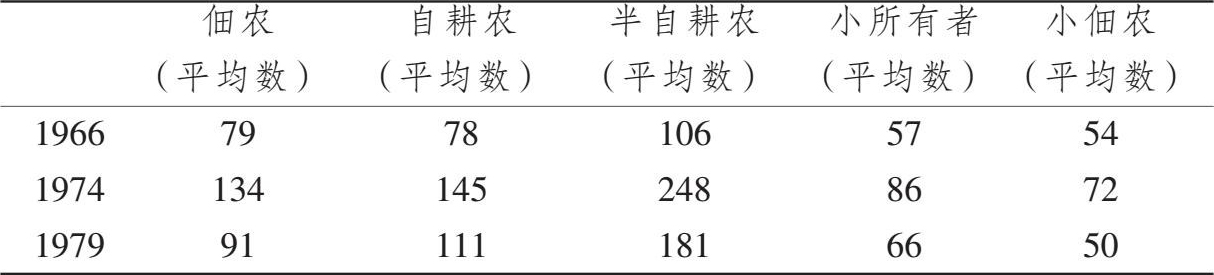
資本主義式的大農場主提供了當地市場上絕大多數的水稻，他們和眾多小農之間的鴻溝現在看來是難以逾越的，而且更為嚴重的是，前者已經幾乎不再需要雇用后者來種植水稻了。如果我們以1966年作為比較的起點，穆達地區絕大多數的農民家庭確實比以前富裕了很多，但與此同時，收入分配差距也越來越大，而且，相當多的農民——可能要占總人口的35%—40%—已經被遠遠地拋在了后面，他們的收入和10年前差不多。考慮到國家經濟吸納勞動力的能力是有限的，考慮到機械化帶來的工資損失，考慮到貧窮的農民只能耕作小塊的土地，如果不進行土地改革，他們的命運就沒有改變的可能性。[[156]](#_156_28)

貧窮

大型官僚機構的特征就是創建一系列測量的尺度，然后據此界定目標并測量目標得以實現的程度，而國家是這類機構的杰出代表。這樣，眾所周知的貧困這個人類苦難就能夠用一些數據來表示——每個家庭擁有的現金數額、每天攝入的卡路里量等等。盡管我們隨后有充足的機會去考察貧困的定義——它是怎樣被感受的、怎樣被理解的，但是，用數字對貧困進行寬泛地描述仍然為我們的討論提供了一個基礎。

表3.6中的數據是以官方的貧困線收入為依據的，它表明的是，與這種標準相比，不同的土地使用群體的收入在1966年以后是如何變化的。

表3.6 不同的土地使用類型和農場規模的農戶純收入占農村貧困線收入的百分比



說明：按照農村貧困線的標準，每戶每月的收入如下：1966年為148馬元，1974年為215馬元，1979年為267馬元。如果我們根據實際收成、因含水量而導致的稻谷價格降低，以及新肥料和扶持性價格等因素（1981年）對上述數據作一調整，那么，總體而言，小所有者和小佃農的收入依舊遠遠在貧困線之下（其收入分別是貧困線的72%和52%），而且佃農和自耕農的平均收入也只是略高于貧困線（其收入分別是貧困線的109%和126%）。只有半自耕農的收入高達貧困線的213%。

明顯而嚴峻的現實是，到1979年，1966年到1974年間農民獲得的大部分收益基本上已經被消耗掉了。甚至最初的價格提高和產量增加都沒有使小農場主——不管是小所有者還是小佃農——生活在貧困線之上，而且，到1979年時，他們再次遠遠生活在貧困線之下。盡管佃農和自耕農的收入都有明顯的增長，但許多人（即便不是大多數人）的收入仍舊在貧困線之下。在1979年的穆達地區，“官方”的貧困農戶最少有33000戶。[[157]](#_157_26)這些家庭意味著當地的貧困問題難以解決。他們依舊是貧窮的，盡管整個地區實施了雙耕，盡管穆達地區擁有肥沃的土壤，盡管為服務稻農而建立了一系列的機構，盡管政府推出了消除貧困的項目，盡管政府最近提高了水稻價格并增加了化肥補貼——簡言之，盡管這里經歷了13年精耕細作型的農業發展。

當然，問題的根源在于在灌溉項目開始時就存在的土地所有權的不平等和農場規模的不平等。新品種、灌溉和雙耕帶來的收益是根據生產資料的多少分配的。小農缺少的恰恰是土地和資本，因而，他們很難大幅增加收入。土地租期的延長，水稻價格的上漲以及地主對出租土地的回收，所有這些因素都進一步限制了小農獲取土地的機會。他們最富有的是勞動力。在聯合收割機使用之前，這種資產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他們的收入。但是，收割的機械化、生產資料成本的提高以及消費品價格的上漲等因素逐步侵蝕了他們微薄的收益。

制度性進入

連同生產的變化，同“綠色革命”相關的農場規模、土地使用模式和機械化也引發了制度革命。如前所述，其他方面的變革都不如政府對水利灌溉的控制那么顯著，也比不上政府對水稻加工、市場、貸款提供和化肥分配越來越多的參與那么明顯。這些變革最主要的制度性動力就是穆達農業發展局（MADA）和它的27個地方辦事處，每個辦事處都有自己的農民協會。這些地方分支機構的主要功能是將貸款分配給其成員，用于租用拖拉機，購買化肥、農藥和插秧。多達15000個農場主（約占總農戶的25%）從政府提供的這些服務中受益。除去少數人被動地接受服務之外，各地的農民協會都會憑借個人的和集體的力量成為積極的維護水稻農場主利益的代言人。它們實際上發揮了相當于水稻生產者游說團的作用，持續不斷地通過年度決議、請愿和授權向政府施加壓力，以便制定出對其成員有利的政策。競爭性的政治氛圍，尤其是在吉打州，提高了它們的影響力，而且，除了一兩個地方機構之外，所有其他的地方團體都由執政黨成員有效地控制。

穆達地區的農民約有40%的人曾經參加過農民協會，但這些成員決不能完全代表穆達地區農民的全部情況。表3.7就反映了農民協會成員分布的不均衡性。耕種2.8英畝（4里郎）以下的農場主占農業人口的一半，但是他們在農民協會中的比例只占12.4%。另一方面，耕作5.7英畝以上土地的大農場主只占農業人口的23%，但是，他們卻占農民協會成員總數的47%。富有的農場主把持農民協會是第三世界國家類似機構的普遍特征。[[158]](#_158_26)之所以如此，并不是由于有計劃的官方政策，確切地說，是那些由選舉產生的官員的政策導致了這樣的結果。[[159]](#_159_26)

表3.7 農場規模的分布、農民協會的會員

資格和生產貸款接受者的關系



貸款的分配更不平衡，獲利的更多是有錢人，而非農民協會的會員。耕作5.7英畝以上土地的大農場主只占農業人口的23%，但是他們占貸款人數的60%，而且在追加的實際貸款中，他們所占的份額還要高些。小農場主幾乎占穆達地區人口的一半，卻只占貸款人數的6%。那些最需要貸款資助的人沒有得到貸款，而那些有能力通過銀行或金融機構借貸或者自己擁有儲蓄的人卻得到了貸款。此外，逾期還款人數的日益增加表明，許多大農場主都設法把政府貸款變成直接的補貼。[[160]](#_160_26)沒有人去追查日益積累起來的壞賬，因為債務人大多數是執政黨在地方的忠實追隨者，因此，他們幾乎是難以追查的。從這個意義上講，穆達農業發展局、執政黨和吉打州政府是相對富裕的農場主階層利益的抵押品，這是“綠色革命”幫助他們建立并鞏固的。

隨著富人和窮人之間的經濟差距不斷擴大，特權階級獲取影響力和貸款的能力也在增加。如果說水稻農場主的利益受到了關注，那么，它們越來越是大農場主的利益。在一些問題上，比如保護性的水稻價格和化肥的補貼等方面，他們的利益沒有太大的差別，因為窮人和富人的利益在這方面是一致的。但在其他問題上——機械化、農業領域的工資政策、貸款資格、土地租金和土地改革等方面——他們之間的利益有嚴重沖突。現在，由于大農場主控制著農民協會，穆達窮人的根本利益甚至有計劃地被排除在政策安排之外，而那些從“綠色革命”中受益最多的人將繼續獲益。[[161]](#_161_26)

這些農業“進步”的事實經常出現在對亞洲其他地區“綠色革命”的分析中。正如基斯·格里芬所概括的那樣：

這種狀況（大農場主處于支配地位）的主要原因在于公共政策的傾斜，從而有計劃地使稀有資源流向了更大的、更富裕的農場主。雖然政策加重了農村地區的不平等，但從政府的角度說，它也有其優點，不僅促進了農業的商品化，而且還擴大了市場剩余。考慮到城市地區對大量廉價商品的需要……可能發生的最好的事情的確已經發生了：“綠色革命”壯大了農村中與城市統治集團有著天然聯盟的那些人，而且，它能夠使這些統治集團保證他們的現狀在本質上永遠不會改變。[[162]](#_162_26)

在穆達地區也是這樣，由于經濟、政治和制度因素的相互結合，目前已經普遍存在的巨大的不平等根本不可能得到重視，更不要說緩和了。

# 第四章 塞達卡：從1967年到1979年

## 村莊

我們所看到的圖景中最顯著的部分是由村莊層面的“事實”構成的。在過去十年里，這些“事實”逐漸明朗化。這是一些被直接體驗的“事實”，比如在租佃形式、機械化、薪資、土地控制、信貸、慈善賑濟等方面發生的變化。我們的焦點因這些“事實”而更加明晰。這些事實并不簡單地是對村莊所處的中層背景的復制。從某種程度上說，跟其他特定村莊一樣，塞達卡這個村莊是獨一無二的。換言之，塞達卡經歷了它自己的綠色革命，這一獨特的革命是與這個村莊的特定歷史、特定人物相關聯的。塞達卡村民推動并回應的正是這種特殊的、地方性的綠色革命。

塞達卡村所處的燕鎮行政管轄區跨越了穆達灌溉工程的南部邊界[[163]](#_163_26)（見地圖2）。小鎮燕鎮位于塞達卡村莊以南大約8英里遠的地方。這座小鎮里坐落著地區行政機構建筑群，其中包括地方土地管理局、警察局，在它們附近還有一家診所。就像只有在小鎮里那些有執照的當鋪中才能典當他們的黃金珠寶一樣，塞達卡的村民只有到小鎮才能使土地長期租佃的交易生效并得到公證。如果說燕鎮是塞達卡行政生活的中心，那么鄰近的凱帕拉·巴斯塔鎮就應該被稱為塞達卡商業生活的中心。村民從這里的商店和一周兩次（周三和周日）的集市購買他們大部分的食物和其他必需品。這里同時也是信貸和商品交易的中心。這些活動或者是通過提供借貸并收購水稻的那些華人小商店老板進行的，或者是通過農會和水稻專賣局在當地的機構進行的。水稻專賣局在凱帕拉·巴斯塔鎮郊區鄰近塞達卡村的地方有一座大型的水稻烘干設施。塞達卡村所屬分區雙溪達汶分區（Mukim Sungai Daun）的主管辦公室就坐落在凱帕拉·巴斯塔鎮，這里可以處理一些次要的行政事務：比如水牛的登記和買賣。凱帕拉·巴斯塔鎮上還有一個由政府護士負責的每周工作一次的產科小診所。

塞達卡的74戶人家直線分布在一條大約一里的土路上（見地圖3）。這條土路從連接燕鎮和凱帕拉·巴斯塔鎮的全天候公路開始，在一片稻田前突然收尾，正是這片稻田把村莊與其東面的鄰近居住區雙溪布浙村分割開來。像這個世紀在穆達平原上建立的大多數村莊一樣，塞達卡的居住模式與當地灌溉渠的線性分布是一致的，正是這些灌溉渠使得在周圍的土地上進行農業生產成為可能。這種帶狀的居住區往往與核心型的或群集的村莊模式形成鮮明的對照，社會的和儀式的凝聚力被認為在后面的模式中作用更強。[[164]](#_164_26)確實塞達卡村民們自己并不非常明確塞達卡村在哪兒結束、主要公路旁邊的另一個村莊雙溪通港村又從哪里開始。盡管存在這些地理上的反復無常，我們仍然可以看到，塞達卡村不僅僅是一個鄰近家庭的集合體。即使塞達卡村的邊界劃定得很糟糕，除了個別情況之外，所有這些鄰近家庭都毫無疑問地歸屬塞達卡村。所有村民通常都被邀請參與村莊的宗教生活和大型筵席。這些活動的中心是祈禱室。即使村莊可以再細分為幾個區域，祈禱室也使村莊在儀式上成為一個整體。從行政角度來說，塞達卡村也通常被當成一個獨立的行政單位。當塞達卡村不被視為一個獨立的單位時，村民就會試圖通過游說使得塞達卡村被確認為一個獨立的分支，就像不久以前結束的農民聯合會事件那樣。最重要的是，塞達卡村作為道義實體（moral existence）是被話語所確認的。當征收伊斯蘭什一稅的收稅人“阿彌爾”（amil）解釋他為什么沒有告發那些沒有交納全部稅款的村民時，他是這樣說的：“我們都生活在一個村子。”當一位佃農向我解釋為什么他不以高價和當地的另一位佃農競爭土地來擴大他的農場時，他說：“我每天都和他打照面。”當這些規則偶爾被打破時，違規的人也恰恰是因為這樣的言語而蒙羞。

從公路沿著通向塞達卡的那條土路筆直朝前看時，是看不見房屋的，只有由椰樹、香蕉樹、聶帕櫚樹形成的密密的拱道，還有生長在溝渠兩旁的風信子和其他草本植物。一個叫伊德里斯的人開的商店是進入塞達卡以后的第一座建筑物，它面對著北起凱帕拉·巴斯塔鎮南到燕鎮的公路。伊德里斯利用商店沿路的位置以及公路沿線提供的電力，向晚上聚集在這兒的青年人出售飲料和香煙，同時，他的商店也是當地唯一可以買到冰棒的地方。再稍微往前走，就遇到一塊上了鉸鏈的大木頭橫跨在路上，這塊大木頭用鏈條和鎖固定住，以此阻止卡車進入村莊。我們將會看到，這個村莊大門引發了一些爭議。大門的鑰匙掌握在勒拜·彭德克手中，他是居住在鄰近屋里的一位富有而年長的種植者，勒拜·彭德克和他的兩個兒子——穆薩和阿里芬，在控制村莊政治的那一小群人中是非常有影響力的。過了大門，房屋和點綴其中的稻田沿著土路延伸了兩百碼地。小康之家的住宅有鋅制的屋頂和楔形木板壁的外墻，而那些貧困的家庭卻以聶帕櫚葉遮頂，以扁平的竹片做外墻。我們將要探討，住房在當地也是一個很尖銳的政治問題，因為當地的執政黨及其追隨者被指控壟斷了政府的房屋修理津貼。曼蘇爾和塔伊布都住在這一片，曼蘇爾是一名無地的雇工，塔伊布則是一位貧困的小土地所有者。曼蘇爾和塔伊布他們的房子跟沙姆蘇爾那個重新整修過的房子形成了強烈的反差。沙姆蘇爾是執政黨的忠實追隨者，他擁有6里郎（4.2英畝）的土地，同時在附近的政府水稻烘干站有一份難得的、令人艷羨的工作。村莊里最堅固的兩幢房子坐落在村子中央的附近，它們都有高高的屋頂，有百葉窗和陽臺。其中的一幢屬于村中最富有的哈吉·卡迪爾，這幢房子同旁邊哈姆扎和拉扎克兩家快要坍塌的房子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另一幢房子屬于村長哈吉·加法爾。作為塞達卡的領導人，哈吉·加法爾雖有影響力，但相當不擅交際；同哈吉·加法爾住在一起的他的已婚的兒子達烏德，還有哈吉·加法爾的外甥——小商店老板巴塞爾，都顯然比哈吉·加法爾活躍得多。哈吉·加法爾更愿意強調他把大家攏到一起來的作用，他舉辦一年一度的村中所有人都參加的盛大筵席，偶爾也在土路對面的祈禱室主持禱告。雖然塞達卡有很多的公共聚集地，但是祈禱室是社區里唯一法定的公共空間。祈禱室底下的一層是村莊的會議廳、神學教師的課堂以及用于布道和政治發言的演講廳。

另外，村中非正式的集會點是圍繞兩家小商店的幾張桌子而形成的，這里交流著各種閑言碎語。每家商店都有少量的日常用品存貨，比如干辣椒、肥皂、火柴、煤油、煙草、糖果、調味品，還有快要過期的魚肉罐頭。在勞作以后或在農閑季節，人們總是聚集在這里打發時間：抽抽煙，喝喝自制的軟飲料；隨著人來人往，聚集圈也隨時發生變化。第一家小商店的店主巴塞爾是執政黨（巫統）地方支部的公認領導人，巴塞爾的店是他的同盟者的聚集點。附近薩馬特開的那個小店鋪也是一樣的，只是店主薩馬特和他的父親托·穆罕默德是反對黨的堅定支持者，他們的顧客也主要來自反對黨。少數忠實的黨派追隨者原則上從來不去“另一家”店，但大部分村民聲稱，這兩家店他們都去，他們并不考慮這些偏狹的黨派觀念。

村中最有名的、也是最直言不諱的三位婦人住得離兩家商店都不遠。沿著土路往前走就是她們的房子，在小店鋪里喊一喊，她們在各自的家里都能聽到。這三位婦人可以說是名譽男性（honorary men），因為她們已經不得不承擔了一些男性角色和責任。羅吉婭和洛斯妮都是插秧隊的領頭，她們需要和農夫們進行協調。洛斯妮是寡婦，而羅吉婭的丈夫雖然在世卻相當懦弱，所以是羅吉婭當家。第··三位是托沙赫比丹，她是村中的接生婆，也是寡婦，她所受的訓練和四十多年的接生經驗使她在村莊生活中獲得了一個獨特的位置。

村莊土路的盡頭，坐落著大量窮人的房子，他們大多數都是反對黨。在一位無地雇工帕克·亞赫跟他那位同樣貧困的姻兄“瘦骨嶙峋的”瑪以及他的朋友杜拉的談話中，我聽到了此地多數的尖銳批評和有見解的觀點，這些批評和觀點都來自帕克·亞赫。他們和其他的親朋好友時常聚在帕克·亞赫屋檐下的簡陋長椅上。從他們那兒，總可以得到與巴塞爾店中巫統的追隨者以及跟帕克·亞赫他們一樣是反對黨但卻富裕的村民（比如說，哈吉·卡迪爾）截然不同的視角。

從村莊的居住方式、經濟、規模以及歷史來說，塞達卡都是吉打平原上相當典型的稻米種植村落。然而，從上百座村莊中選取塞達卡來開展研究，需要做一個簡要的解釋。選擇村莊時，我的第一個要求是：這個村莊必須在某種程度上專門從事水稻生產。塞達卡恰恰非常符合這樣的要求。村中只有兩家的戶主依靠薪水收入，他們一個是農會的卡車司機，另一個在地方政府采購部門檢測稻米的濕度，而他們兩人在業余時間也都干農活。事實上，村中沒有一戶人家現在沒種植水稻，或者對老年夫婦說是過去沒種過水稻。這種單一的水稻種植不僅對于穆達地區的大多數村莊來說具有代表性，而且也比較利于確定收入和經濟分層。相對來說，位于灌溉工程邊緣的村莊，它們的經濟相當混雜，可能會包括捕魚、橡膠小農場或地產交易。而一個水稻種植的社區就像一個一年只捕兩次魚的漁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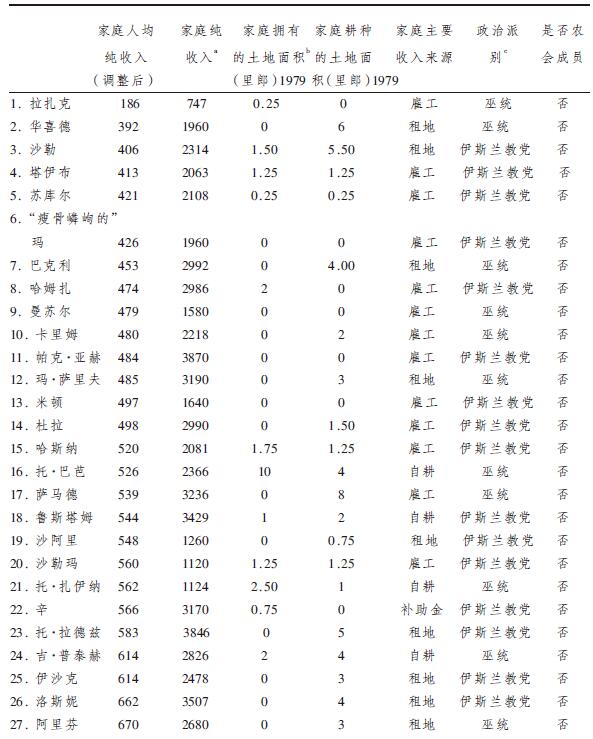
我對村莊選擇的另一個要求到目前為止是最苛刻的：這個村莊必須在1971年雙耕引入之前曾經被研究過。這樣就可以至少發現當地經濟的基本變化。只有三、四個村莊滿足這樣的條件，塞達卡村是我訪問的第一個村莊。村長哈吉·加法爾不僅歡迎一個陌生的家庭定居在他們中間，而且，經過簡短的交談后，看起來哈吉·加法爾有可能出租他的大房子里的部分房間，因為他的孩子們已經成年離家了。村莊選擇的基本要求都得到滿足的輕松，加上當時壯觀的日落，再加上得知我隨時可以欣賞到南邊吉打州最高峰90（Gunung Jerai）美景所帶來的愉悅，已經足夠使我落腳于此。[[165]](#_165_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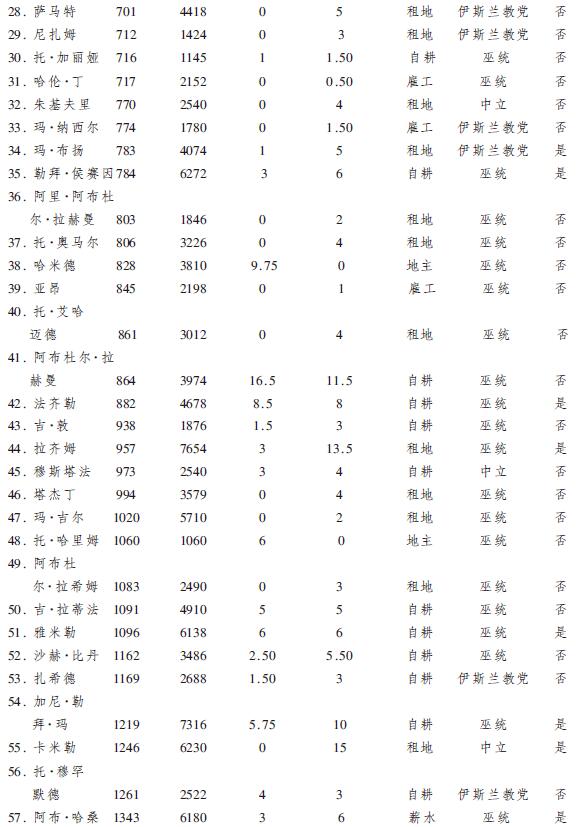
## 富與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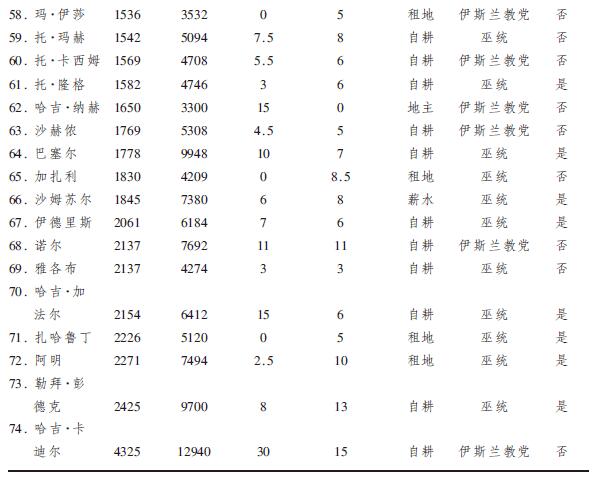
顯著的不平等是塞達卡雙耕之前經濟生活的整體特征。至今不平等仍然存在。在衣著、住房、食物、家具、廚房裝置或者農耕器具、收音機以及現在幾個家庭的電視機這些隨意可見的證據中，不平等是明顯的。經過更仔細的考察，這些顯見的不平等是由土地所有權、耕種面積以及相應的收入這些方面的分配上同樣顯著的不平等產生和維持的。

塞達卡的收入分配在1978年至1979年間呈現高度不平等。雖然缺少1967年的數據作參照，但是，從我們確知的土地面積和耕種面積的分配情況來看，1967年至少也出現了相似的不平等。表4.1反映了現在的情況。從表中我們可以看到村莊中每個家庭的純收入、擁有的和耕種的土地面積，還有一家之主的主要職業。表中各家庭按照他們的人均收入由低到高排列。對于這些將在文中反復出現的家庭，如果讀者想了解它們的收入、土地使用狀況、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政黨歸屬等方面的情況，這一列表將非常有幫助。

表4.1 村莊中各家庭的數據——各家庭按戶主姓名區分并按照年人均純收入由低到高排列







a 不可避免地，家庭純收入的數據所傳達的某種程度的精確性是不能保證的。土地的收成——作為大多數家庭收入的主要部分——有一定的精確性。但是，雖然由雇傭勞動和家庭副業所獲得的收入都經過了復查核對，這些數據仍然缺乏一定的準確性。因此，這里的家庭純收入只是一個近似值，這些數據在上下200馬元到300馬元的幅度之間是準確的。因此，完全而準確的數據可能會略微改變排列順序。

b 在少數案例中（5個家庭），家庭擁有小塊的果園和橡膠園。雖然這種狀況在表中并沒有列出來，但是這些內容在收入一欄中已經做了統計。

c 在其中的3個案例中，政治派別被計為“中立”的，是說這些家庭或者是中立派或者是騎墻派，或者如在其中的一個案例中，夫妻雙方屬于不同的派別。一般地說，所有的村民都清楚各家的政治歸屬，而且大家獨立作出的評價是相互一致的。

按照政府的標準程序來計算人均收入，即小孩和大人一樣計算人頭，有40戶人家，也就是說村中54%的家庭，人均收入在官方所定的貧困線以下（572馬元/年）。如果采取一種較為寬松的算法（表4.1中使用的就是這種算法），即一個六歲以下的孩子按1/3個成人，六歲到十二歲的孩子按2/3個成人算，那么有22戶人家，或者說村中30%的家庭，人均收入在貧困線以下。正是在這22戶人家和另外8到10戶收入水平貼近貧困線的家庭中，食物和日常必需品都非常緊缺。成年勞動力的一次疾病，一次產量不佳，一次收成減少，一次租金上漲，以及一次租佃取消，諸如此類的因素都很容易使這些家庭陷入絕境。這些家庭的收入與村中最富有的22個家庭形成鮮明對比：最貧困的22個家庭每年的純收入平均是2291馬元，而最富有的22個家庭，每年的純收入平均是6044馬元。如果考慮家庭人均年收入，這種懸殊更加明顯：最富有的22個家庭人均年收入（1867馬元）是貧困家庭人均年收入（475馬元）的四倍。

就像通常所預期的那樣，收入差別也反映在他們對生產資料核心要素——土地——的牢固掌握上。塞達卡最貧困的22戶人家一共只擁有22.5里郎的土地，平均下來每戶僅有1里郎（1里郎＝0.71英畝）。切記：以稻田耕種作為收入唯一來源的話，貧困線的標準是擁有4里郎土地。這些最貧困家庭所擁有的土地數只有滿足基本生活所需土地數的1/4。另一方面，對于最富有的22戶家庭來說，他們總共擁有超過142里郎的土地，平均每戶擁有將近6.5里郎的土地。把租入土地加上后的耕種面積在村莊等級制的兩級的差別實際上已經不那么大了。因為對于許多有地的富有家庭來說，他們沒有必要去租入額外的土地。但是，對于最貧困的22戶人家來說，他們租入的少量土地只能使他們的平均耕種面積達到不到2里郎（1.89里郎），而最富有的人家平均的耕種面積為7.25里郎。換言之，村中相對富裕的人家事實上租入的額外稻田幾乎與貧困家庭租入的一樣多，雖然富裕家庭遠不那么需要這些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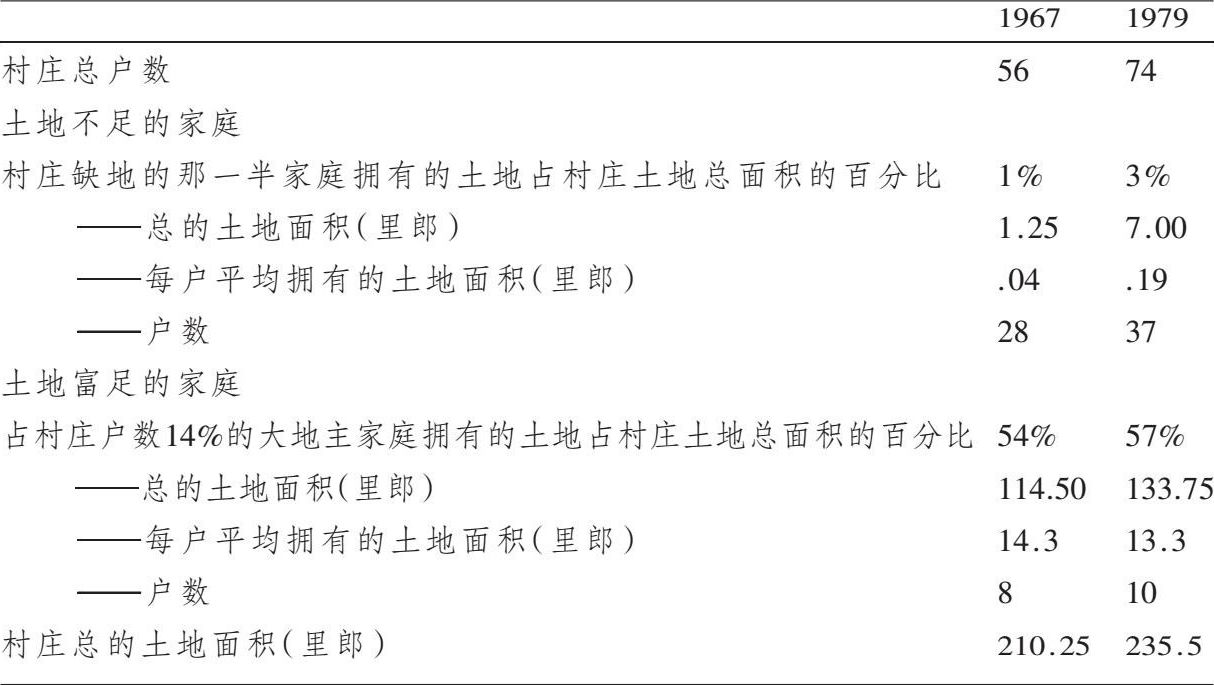
實際上，如果我們從稍微不同的角度來看問題，關于土地所有權的數字揭示了更為明顯的不平等。如果我們忽視表4.1中的收入數據而僅僅統計那些村中沒有土地的家庭，那么，有30戶（41%）將要被劃在這個類別中。[[166]](#_166_25)也就是說，近半數的村民對稻米生產中的主要生產資料缺乏法律認可的支配權。塞達卡村中一半的家庭（37戶）幾乎不擁有多少土地，如果統計他們的情況，我們會發現，他們一共只占有7里郎的土地。塞達卡的土地總面積是235.5里郎，所以，村中這一半的家庭只擁有全村土地面積的不到3%。而同他們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村中10個最大的地主雖然只占村莊戶數的14%，但他們占有133.75里郎的土地，也就是47%的村莊土地。

我們可以將1979年村莊土地所有權形式與1967年的情況進行比較，并以此評估雙耕和新技術的影響。在過去13年時間里，土地所有權的形式未發生本質上的變化，換言之，土地所有權的分配依舊像以前那樣是極端不平等的。一旦我們考慮村莊人口的增加（從56戶到74戶），即使是缺少土地的那些家庭所擁有土地的比例有少量增長的說法也是有誤導性的。到1979年，村莊中少地的那一半家庭的數量比1967年增加了9戶，他們擁有的村莊土地一共只有微不足道的3%。同1967年的情況（27戶）比起來，塞達卡村中沒有土地的家庭現在已經增加到了30戶，雖然他們占村莊總戶數的比例有一定下降。

在單一作物經濟中，土地所有權和收入之間的關系是顯而易見的。最富有的22戶人家中，只有4戶人家沒有土地。而這4戶人家的例外之處是他們是小家庭的多樣組合，他們有外出務工的薪水收入，最重要的是，這4戶人家平均每戶能夠租種8里郎多的土地。相反地，村莊中低收入的那一半家庭幾乎是沒有土地的。大約有60%的貧困村民一點土地都沒有，只有3個家庭擁有2里郎多的土地。

村莊土地所有權的分配在近期內不大可能發生顯著變化。土地收成的穩定和增加，還有馬來人不愿失去土地的傳統，都戲劇性地減緩了因債務而導致的土地集中進程。哈吉·卡迪爾（#74）是現在村中擁有土地最多的地主，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的30年間，他分8次從負債的小土地所有者那里一共購得了25里郎的土地。雖然哈吉·卡迪爾對土地的貪欲依然像以前一樣強烈，但是自從實行雙耕以來，他名下的土地并沒有實現增長。一方面，盡管哈吉·卡迪爾可能覬覦小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但是，這些小土地所有者卻不愿意陷入賣地的絕境；另一方面，現在市場上土地租佃的價格一直在上漲，一個生計艱難的小土地所有者能夠比較容易地通過把土地出租幾個季節來償還債務，而這種做法不會讓他失去土地所有權。

表4.2 塞達卡村稻田所有權的分布狀態，1967—1979年



同理，土地價格的明顯上漲也降低了除富戶以外的其他人向上流動的可能性。當然，即使是在雙耕以前，通過土地買賣實現向上流動的情況也并不普遍，只有5位現在擁有3到7里郎土地的村民，其土地至少有一部分是在當時購買的。而1970年以來，塞達卡村里的小土地所有者中沒有一個人增加了自己所擁有的土地。如果說這類家庭被有效地限制了進行土地購買，那么，那些擁有土地不足3里郎的家庭，也就是說塞達卡的絕大多數的家庭，甚至沒有考慮過這種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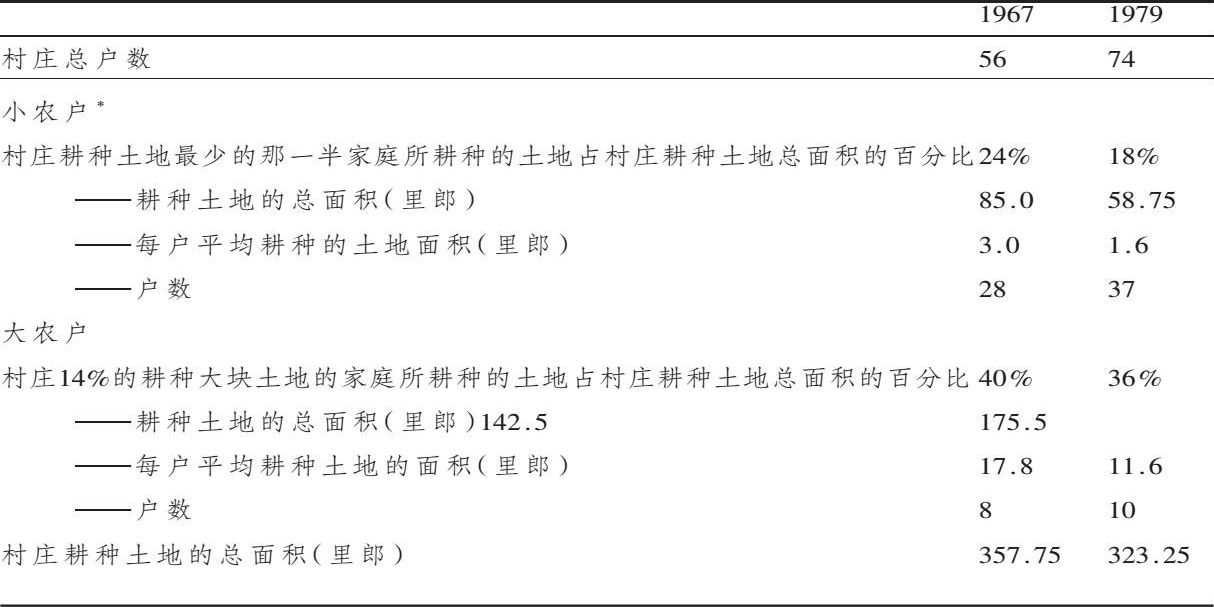
自實行雙耕以來，只有9位村民參與過土地買賣。這些土地交易的形式不僅說明土地集中的進程有所減緩，同時也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雖然土地集中的速度放慢了，但它仍朝著原來的方向進行。土地的購買者無一不是富裕戶，而賣者主要都是貧困戶。1970年以來，塞達卡村有4位村民購置了總共19.25里郎的土地，其中不少土地都在村莊之外。達烏德是村長哈吉·加法爾（#70）的兒子，在他父親的幫助下，達烏德已經購得了8里郎的土地，其中包括從一個本村人手中購得的3里郎土地。諾爾（#68）也在父親（一個擁有50多里郎土地的非塞達卡村民）的資助下購得了8.25里郎的土地，這些土地離村莊都有一定距離。阿明（#73）用自己的積蓄從鄰村一位富有的、擁有很多土地的哈吉那里購得了塞達卡村中2.5里郎的土地。總的來說，這三個家庭向我們展現了村中哪個階級的人有能力增加自己的土地所有，他們是塞達卡村最富有的6戶中的3戶。唯一的例外法齊勒（#42）的情況也證實了這一法則。法齊勒從另一個村民手中購得了2.5里郎的土地。盡管他不是村中最富有的10位村民之一，但他確實擁有8里郎的土地，而且，他當前收入不多是因為他不得不出租他的許多土地，以便籌集資金來購買這2.5里郎的土地。

有5位村民賣出了自己的土地，其中最大的兩宗交易分別賣出了10里郎和5里郎的土地。這些村民被納入政府的移民規劃中，所以需要處理自己在地方上的財產。[[167]](#_167_25)除了其中的2.5里郎，這些土地都以高價賣給了富有的非塞達卡村民。第三宗3里郎的土地交易表明，在某些情形下貧困的家庭依然需要賣出他們的土地。“瘦骨嶙峋的”瑪的妻子（#6）和她至少8位兄弟姐妹共同繼承了3里郎的土地。他們在土地分割上難以達成共識，一年以后，他們決定把土地賣掉，然后平分賣地所得。這塊土地賣給了哈吉·加法爾的兒子達烏德，也就是說從村中最貧困的一個家庭流通到了最富有的一個家庭。剩下兩宗土地交易中，賣地的是兩位守寡的窮姐妹，哈斯納（#15）和沙勒瑪（#20）分別把自己0.5里郎的土地賣給了她們住在鄰村的、景況較好的兄弟。這兩宗土地交易都是在相當特殊的情形下進行的；通常來說，這兩姐妹中沒有一個會考慮把土地賣掉。[[168]](#_168_25)在這5宗交易中，土地無一不是落入了小康人家或富人手里。其中兩位賣地者景況良好，賣地可以合理地視為他們的投資決策；而對于其他的賣地者來說，土地出賣使他們朝著“無地”更進了一步。

租佃偶爾也會緩解土地所有權中的不平等。如果那些擁有大宗土地的地主能夠把他們的土地出租給較為貧困的農民耕種，那么，土地在耕種中的實際分配可能比所有權統計數字更為平等一些。在塞達卡，雖然土地在耕種中的實際分配比所有權的分配更為平等，但是它依然是高度不平衡的。比如，10個最大的農戶，雖然他們只占村莊家庭總戶數的14%，但是，他們耕種著115.5里郎的土地，也就是村莊36%的耕種面積。這10個農戶平均耕種11.6里郎（8.2英畝）的土地。而與之對照的是，村莊只耕種小塊土地的那一半家庭（37戶），耕種著58.75里郎的土地，也就是村莊18%的耕種面積。[[169]](#_169_25)每個家庭平均的耕種面積只有1.6里郎，剛好1英畝多。這里的情況是穆達地區總體情況的復制：村中許多從事農業耕作的人口無法獲得必要的生產資料，因而他們不能獲得可靠的生活保障。雖然這些人耕種的小塊土地可以為他們中的許多人提供每日的糧食，但是，如果沒有在稻田或其他地方出賣勞力獲得的現金工資，這些人是難以為生的。

就像土地所有權的數據一樣，我們可以利用掘井健三早期收集的數據，對比1979年和1967年的土地耕種面積的分配狀況（表4.3）。相對穩定的百分比分配掩蓋了一些戲劇性的變化。塞達卡的一些小農戶幾乎已經完全失去了土地。他們所耕種土地的份額已經從多于1/4下降到了不足1/5；他們耕種的總畝數已經下降了大約1/3。伴隨著村莊人口的增長，對于這一部分處于困境的村民來說，他們耕種的平均面積已經從雙耕以前的3里郎下降到1979年的1.6里郎。這個變化已經足以抵消雙耕帶來的額外收入。[[170]](#_170_25)從數字上來看，耕種大片土地的村民同樣也失去了相當一部分的土地，特別是就平均耕種面積而言。然而，這些減少的耕種面積中，很大一部分都可以追溯到農夫卡米勒（#55）。卡米勒在1967年租到了38里郎的巨額面積土地，而這些土地的大部分已經被那位外村地主收回，并分配給了自己的后人。

表4.3 塞達卡村土地耕種面積的分配，1967—1979年



\*包括1979年沒有土地的10戶家庭，（我把沒有土地的10戶人家也包括在內。而對于一般的耕種面積分配的統計來說，只有那些擁有土地的家庭才包括在內。這種方法得出的結果會低估土地緊張的程度。這10戶人家中的7戶都想方設法要租種別人的土地，只有3戶年邁的種地人是選擇不種地的。）。

威脅到貧困村民生存的基礎性結構變遷有重要而復雜的原因，這值得在后面進一步展開分析。其中的一些原因，我們在前面的章節中已經有所提及。人口學意義上的變化無疑是要考慮的。其次，許多相當貧困的家庭遷入了塞達卡村，他們沒有土地可耕種，者更為普遍的是，只能耕種1里郎或2里郎的土地。另一種情況或財產繼承。經過財產繼承，原來父母耕種的整塊土地被分成若干塊，傳給已婚的子女。最后，為了追求更多的利潤，地主——特別是在外地主（outside landlord）——解雇了佃戶，自己耕種土地或者簽訂長期契約將大塊的土地整租。塞達卡村村民耕種的土地總面積從1967年到1979年的下降，已經明確地說明了這一點。

## 村莊構成

1979年的塞達卡已經遠遠不是1967年的那個村莊。一些家庭發生了解體或者遷出了村子。然而更多的家庭又建立起來了。塞達卡村的總戶數增加了25%（從46戶發展到70戶），而村中總人口也大致以相同的速度增長。[[171]](#_171_25)只要觀察這一變化的具體細節，我們就不僅能夠了解馬來西亞社會的社會流動性，同時也能夠了解到社會流動是如何與那些關鍵因素——比如土地、收入和親屬關系等——聯系在一起的。

對變化中的村莊構成的更具體的分析可以參考附錄A，不過為了我當前的目的，下面這幾點需要特別說明一下。在離開塞達卡村莊的人中，窮人通常是以個體形式離開的，村中的年輕男女普遍到城市工作（作為建筑工人、手工勞動者、工廠工人以及家政服務人員）。而另一方面，那些一家一家遷出塞達卡的家庭則多是富裕家庭，他們或者在村莊附近地區買了土地，或者被接受為政府房產的“居住者”。還有15戶新的家庭遷入村莊，他們屬于村莊中最窮的那部分。就像村民所說的，“人產子，地不產子”。村莊經濟已經沒有空間來容納大部分新增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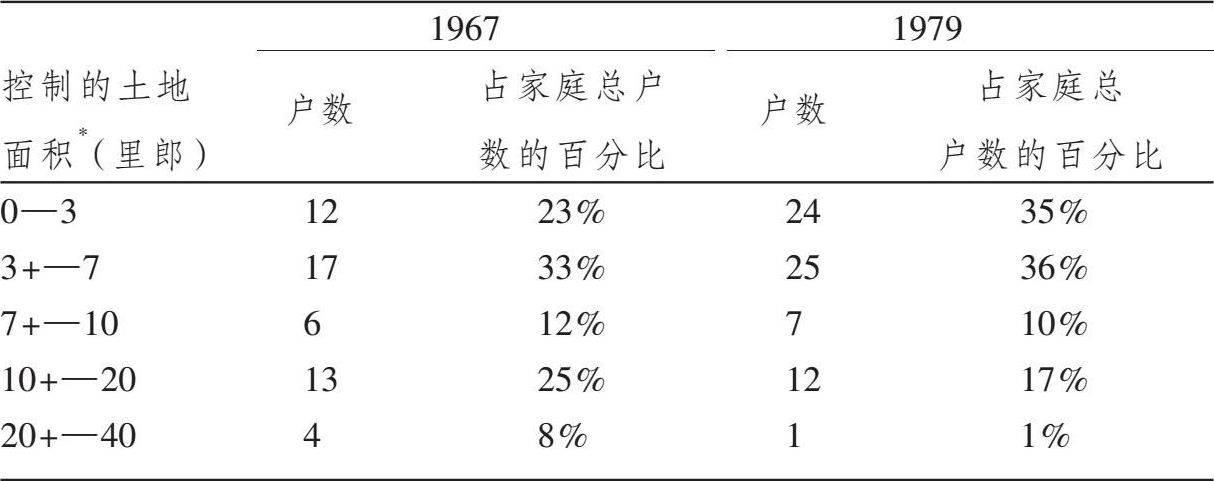
## 土地占有與使用

塞達卡經濟生活的許多主要變化都反映在表4.4所顯示的對土地控制情況的基本數據中。具體的比較可以參考附錄C中的表1和表2。我們這里只討論最重要的發現。

在過去12年間，最顯著的趨勢就是村中小農戶的數量以及他們占村莊總戶數的比重都有所增長，而那些大農戶所占的份額則在下降。那些耕種面積在3里郎或者3里郎以下的家庭已經從12戶增加到24戶，翻了一番。其中5戶人家的耕種面積還不足1里郎，而在1967年的時候，掘井健三有足夠的理由完全忽略“不足1里郎耕種面積”這一類別。就在同一過程中，這些小農戶平均的耕種面積已經下降到不足2里郎（或者說1.4英畝）。但是，小農戶耕種面積的縮小并不是因為穩定的小農戶階級被剝奪的土地越來越多；恰恰相反，這些小戶主耕種的土地面積的份額已經從7%上升到了13%，幾乎翻了一倍。作為一個階級，他們耕種面積的減少一方面是因為他們人口的增加，另一方面是因為全村耕種的土地總面積減少了大約10%（從375.75里郎減少到325里郎）。

在塞達卡，越來越多的貧困小農戶耕種的土地面積減少了，但那些耕種大量土地的農戶所耕種的土地面積并沒有相應地增加。事實上，出現的情況幾乎與此相反。在雙耕以前，有17戶人家擁有并且（或者）耕種著超過10里郎的土地；他們一共壟斷了全村耕種面積的57%以上（206.5里郎）。現在，盡管村莊的人口增加了，但是只有13戶人家達到了這樣的規模，而他們耕種的土地也只占全村耕種總面積的37%（123里郎）。這一階層平均的耕種面積在這一時期從原來的12里郎萎縮到9.5里郎。我們發現了這樣的情況：無論是小農戶還是大農戶，他們的耕種面積都減少了；不過，小農戶的戶數翻了一倍，而大農戶的戶數卻下降了。

表4.4 塞達卡村農戶耕種面積的頻率分布，1967—1979年



\* 這里的“控制”既包括耕種的土地也包括擁有但是租出的土地。所以，如果一個農戶自己耕種15里郎土地，同時租出15里郎土地，那么這一農戶應歸屬“20＋—40”這一類。這里存在一些重復計算，有些土地為村里的地主擁有，于是被計算一次；這塊地被出租給本村的佃戶，那么這塊地就又被算入一次。因為大部分租種的土地屬于不在地地主，所以重復計算的影響不大。

把塞達卡村每個農戶平均耕種的土地面積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的話，其變化趨勢是可以比較的。在1967年，塞達卡村每個農戶平均耕種的土地面積差不多是7里郎，而現在不足5里郎。也就是說塞達卡村耕種的土地面積減少了32%。如果按照關于雙耕利潤的標準假設進行計算，雙耕的潛在利潤有超過90%已經被耕種面積的顯著減少抵消了。[[172]](#_172_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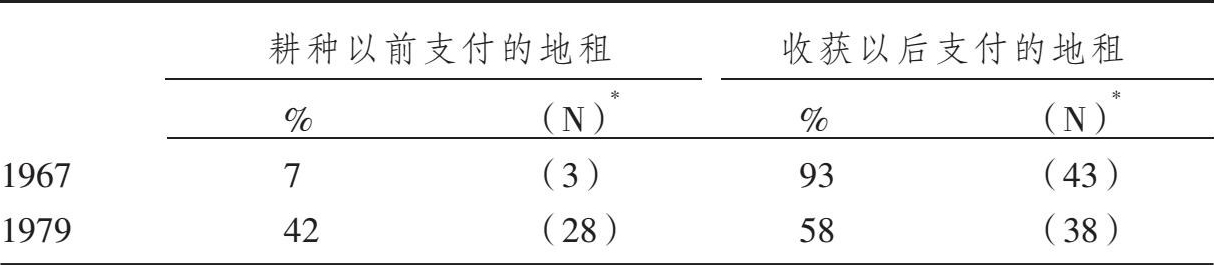
塞達卡已經陷入了人口和結構的鉗形攻勢（pincers movement）。村里農戶的人口已經增加了將近1/3，而這些農戶耕種的土地面積卻減少了將近10%。即使村莊的耕地沒有減少，單單人口的增加也足以使每個農戶平均耕種的土地面積從差不多7里郎減少到5.2里郎。農戶平均耕種的土地面積減少到現在的4.7里郎還可以從村莊耕種總面積的減少來解釋，1967年以來塞達卡的耕種面積減少了差不多33里郎，這種減少是如何發生的？我們可以確信，這并不是因為塞達卡的地主收回了佃戶耕種的土地。村里的地主租給村民——通常是他們近親——的土地總量在過去的12年里并沒有發生變化。村莊耕種土地面積的減少主要是由于外村地主收回了他們的土地。這些外村地主大多比較富有，他們收回土地或者自己耕種，或者傳給自己已經成人的子女，或者把這些土地租給其他的耕種大量土地的種植者。

1967年和1979年土地控制情況的各類別分布可以說相對比較穩定。唯一例外的是塞達卡第一次出現了5戶完全不種地的土地所有者。不過，其中兩戶人家把自己的小塊土地租出去是因為他們實在窮到無力購買稻種并提供一直到收割所需的人力物力。其他的幾戶大多是因為年老而不能下田耕作。還有一戶是因為債務而只能暫時把自己的土地租出去以滿足債主的要求。除此以外，唯一的一個比較顯著的變化是，塞達卡村里完全靠租地的農戶的比例有所下降（從44%下降到35%）。然而，更為重要的是，這些純粹的佃農耕種的土地面積也有所下降。在1967年，他們是土地控制情況中人數最多的一個類別，不過那時，他們平均耕種6.1里郎的土地；而到了1979年，他們平均耕種的土地已經下降到了4.1里郎。如果把現在耕種面積超過7里郎的3戶佃農排除出去，那么，其他佃農平均的耕種面積就要下降到3.3里郎。在整個穆達地區，失去土地的幾乎都是那些完全靠租地的農戶這一階層。總的來說，雖然這些完全靠租地的農戶的絕對數量從23人增長到26人，但是，他們耕種的土地比雙耕前少了1/5。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這一時期，人數較少的自耕農階層的耕種面積盡管很小但相對比較穩定。

## 租佃的變化

佃農地位的下降同雙耕以來土地租佃形式的變化有密切的聯系。如先前已經指出的，一個關鍵的變化是谷物地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現金地租。[[173]](#_173_25)在1967年，掘井健三發現，塞達卡只有不到一半（48%）的租佃協議是以現金為度量來決定地租，而不是跟谷物掛鉤來決定地租的。[[174]](#_174_25)但是，到了1979年，用谷物來度量地租的協議銳減，90%以上的租佃協議都是商定的現金地租。

表4.5 塞達卡村的租佃協議（按地租支付的時序分類），1967年，197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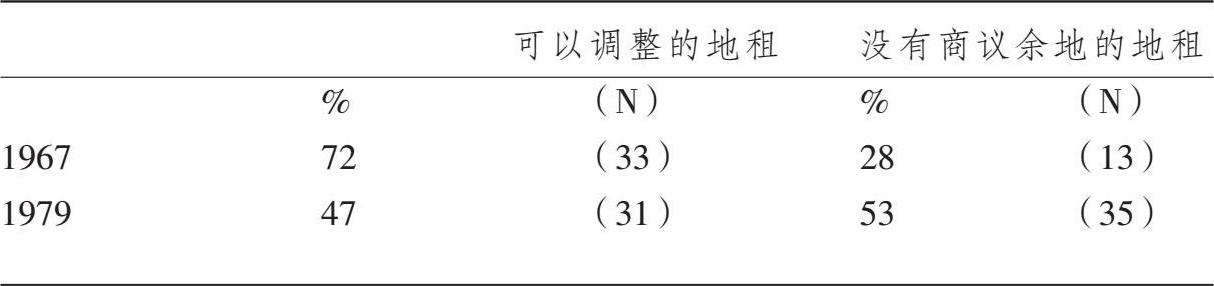


\*"N"表示在這一年中租入的土地有多少塊，這個數量要大于租地村民的數量，因為不少村民都租入了不只一塊土地。

1970年以前，在耕種土地以前就要用現金支付地租的情況比較少見，就像表4.5所顯示的一樣。然而，到1979年的時候，預付地租的方式已經相當的普遍，接近一半的租佃協議都是按這種方式執行的。這個變化主要發生在實行雙耕最初的兩年。由于新的灌溉工程所帶來的最初的利潤，大多數佃農有能力提前支付地租，地主也就可能提出這樣的要求了。對于貧困一些的佃農來說，這種負擔是相當大的。究竟有多少村民是在這種形式下因無力籌集現金而失去了他們耕種的土地？我們將會看到，這是一個頗富爭議的問題，而這種爭議中的各種態度基本上遵循著階級路線。[[175]](#_175_25)

土地租佃的第二個變化是，當收成不好時，重新商議地租的可能被排除了。當地把可以進行商議的地租稱為“活租”（living rent），以此表明它的靈活性，與之相對的就是被嚴格執行的“死租”（dead rent）。“死租制”包括了在耕種以前支付地租的土地租佃以及收獲后嚴格執行地租交付的土地租佃。當地主和佃農之間不存在親屬關系時，收獲以后才交付的地租多是死租。

表4.6 塞達卡村的租佃協議（按地租的可商議性分類），1967年、1979年



說明：1967年的數據是根據掘井健三的研究估計的。掘井健三提到，除了定租的土地租佃（leasehold tenancy）之外，如果租佃雙方沒有親屬關系，其他情況下地租也很少是可以調整的（"Land Tenure System"，60）。然而，掘井健三在另外的地方曾經提到，“減租”只有在谷物地租的方式下才有可能的。我確信，他后面的敘述是有部分錯誤的，因為即使在1979年，近親之間的“現金地租”也是有協商余地的。我在統計1969年的地租時，把雙方沒有親屬關系的租佃和“現金地租”都歸入了“死租”之列。相比而言，1979年的數字基于我的直接調查，每一個案例中我都對租金調整的可能性都進行了詢問。

就如表4.6所示，在雙耕以前，沒有商議余地的地租是比較少見的。而到了1979年，這已經非常普遍，已經成為租佃協議中的多數。一個佃農如果向地主支付的地租不低于平均水平，那么，根據他的生產投入，這位佃農就要收獲大概7到11麻袋的稻米，只有這樣，他才能夠維持收支平衡。[[176]](#_176_25)在塞達卡，土地的平均產量是13到14袋稻米，偶然會下降到7到8袋。在舊的租佃制中，實收的地租在不好的年景中一般會下降，以彌補——至少是部分彌補——農業歉收的損失。現在，水稻作物即使有了灌溉系統也仍然會受到自然的反復無常的影響。當水稻歉收時，佃農需要承擔所有的損失，而且在下一次播種之前要向地主提前交納所有的地租。但是，大多數的佃農依然繼續租種土地。年景不好的時候，種地的成本是非常高昂的，佃農只好勒緊褲帶，短期外出務工，或者重新舉債。同時，在這些例子中，租佃關系變成非個人的硬性合同——即使不是書面合同。以前，對地租的調節表明了在實際的租佃關系中社會紐帶起了一定的作用；而現在社會紐帶讓位于商業追求，人們錙珠必較。

盡管耕種面積的下降造成塞達卡的土地比較緊張，但是，地租的平均水平并沒有顯著提高：1967年的地租是每里郎71馬元，而到了1979年，上漲到每里郎112馬元。這一上漲速度總體上低于水稻生產投入的增長速度。[[177]](#_177_25)在許多佃農——尤其是那些同地主關系比較密切的佃農——看來，現在地租在耕種收入中的比重并不比1967年高。但較低的租金上漲幅度并不意味著地主遭受了相應的損失。情況正好相反，雙耕開始后，所有的地主都因灌溉工程而得到了一筆永久的橫財：他們每年的地租收入翻了一倍。

在塞達卡，就像在吉打州的其他地區一樣，絕大多數租佃協議都是口頭約定，是租佃雙方以一種非正式的方式達成的。這種方式在1955年受到了“水稻耕作者條例”（Padi Cultivators'Ordinance，1967年再次頒布）的限制，“水稻耕作者條例”為租地合同提供登記，并且按照土質的不同等級設置了最高地租（平均收成的一個比例）。顯然，同1967年一樣，現在塞達卡大部分的租金已經超過了最高限度。這一法令并未得到切實執行，因為那將是與地主階級的激烈對抗，而地主階級是執政黨在鄉村的核心。此外，對于那些從近親那里租種土地的佃農來說，這一法令是沒有必要的，因為這些佃農通常有相當可靠的土地使用期限，并且支付靈活的、可討價還價的租金。而對于那些按市場價租種土地的佃農來說，如果他們要求進行登記，地主就會立即解除租約；在任何例子中，要求登記都是無意義的，因為登記并不能防止地主收回土地自己耕種，也不能防止地主在實際中私下要求非法的高額地租。

然而，平均的地租水平是很有誤導性的，因為塞達卡和吉打州的土地租佃市場都是各自為政的。1979年，這些市場上的地租從每里郎200馬元到實際上的零地租，浮動很大。[[178]](#_178_25)表4.7清楚地表明，租佃市場上的主要“斷層線”是由于親屬關系的存在。租金的不同反映了兩分的租佃體系，其中為數不少的佃農（42%）都是他們的父母或者祖父母的特許條款（concessionary terms）的受益者。在這個受保護的市場中，地租遠遠低于市場上的地租。如果租佃雙方沒有親屬關系，那么，可以預料的是，這種租佃關系的地租是最高的；而租佃雙方有遠親關系的地租大致落在這兩端之間。盡管綠色革命帶來了商業化，但是，土地租佃仍然以親屬間的租佃為主，這種租佃方式占了所有土地租佃的2/3，這也是穆達平原的總體情況；這種租佃方式為完全的資本主義土地市場的各種后果提供了一處安全的庇護所。不過，這種近親之間特殊化的租佃關系只涵蓋了塞達卡由佃農耕種的土地的40%，這是因為租給近親的地塊的平均面積一般小于租給非親屬的地塊的平均面積。

表4.7 租佃中的租率（按租佃雙方親屬關系的遠近分類），1979年



親屬關系并不是唯一減輕租佃條款的社會紐帶。當地主和佃農生活在一個村莊的時候，地租一般都低于市價。一個佃農每個種植季支付給跟他沒有親屬關系的外村地主的平均地租是每里郎129馬元，而他如果向沒有親屬關系的本村地主租地時，他所支付的地租只有105馬元。[[179]](#_179_23)在塞達卡，土地租佃的經濟影響同樣也反映在地租支付的時序上。與所租種土地的地主之間有某種關系（但不是父母子女關系）的佃農中，有3/4可以在收獲以后再支付地租。而從外村親戚那里租種土地的佃農中，只有不到一半可以得到這樣的優惠。[[180]](#_180_23)所有這些都清楚地表明，村莊在適中但顯著的意義上是一個共同體。不幸的是，這種機制下可用的土地遠遠不能解決土地稀缺和人口壓力的問題。

在親屬和鄰里關系所庇護的租佃市場之外，市場競爭十分激烈。沒有親屬紐帶的租佃的平均地租水平是反映這種競爭的一個指標。另外一個指標，我們可以把它稱為“哈吉”地主租佃市場。如前文所指出的，許多富裕的哈吉地主階級都相當商業化，他們已經把觸角伸到了其他的領域：比如拖拉機出租、糧食加工以及運輸。事實上，塞達卡村有9位村民從與他們沒有緊密關系的哈吉地主那里租種了土地。這9位村民平均支付的地租是140馬元（每里郎每種植季），這個價格已經超過了那些從非親屬的外村地主那里租種土地的佃農所支付的平均地租。雖然這些“哈吉”地主的支配能力有限，但是，他們嚴格按照市場原則行事，是一個數量少但力量大的地主階級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過去十年中，長期契約租佃的急劇變化最突出地反映了土地競爭的狀況。在1967年的時候，可以把長期契約租佃看成是親屬之間傳統性租佃關系的一部分。掘井健三在塞達卡發現了3個親屬之間的契約租佃。這3個個案的平均租金都遠低于當時現金地租的標準。[[181]](#_181_23)所以，他合理地推斷，這種提前支付租金的多種植季租佃并不是“地主的強硬要求”“，而是一種親屬之間互助的表現……是一種在有親屬關系的地主和佃農之間存在的信用體系”[[182]](#_182_23)。

到了1979年，契約租佃已經成為了一種徹底商業化的交易，這種交易反映了地主和佃農在雙耕以后可能的新收益。這時候，長期契約租佃的個案數已經從原來的3個發展到7個；涉及的土地面積已經從10里郎發展到20里郎，翻了一倍。特別重要的是，雖有季節性的調整，這種長期契約租佃的平均租金都維持在每里郎142馬元的水平，遠高于非親屬租佃平均地租。高額租金是對目前的長期租佃中地租情況的不充分表述，因為很多現存的協議都是1979年之前簽定的，那時候，低租金比較普遍，簽訂長期租約的佃戶一次性付清地租時，是可以大約按照目前的利息率獲得折扣，所以，長期租金比每一季的短租價格要低，而不是高。長期租佃目前的地租水平可以從最近剛剛簽定的協議反映出來，一個佃農（托·奧馬爾，#37）要連續兩個種植季租種3里郎的土地，他支付的地租為1110馬元——相當于他每一種植季的地租為每里郎185馬元。

如同許多觀察者的看法，如果高度商業化的長期租佃在塞達卡乃至整個穆達地區逐漸普及的話，這將不利于農民獲得土地。[[183]](#_183_23)按照這樣的趨勢發展，就像我們之前提及的情況，承租土地的主流將不再是租入土地的窮人，只有那些家資豐裕的商業經營者才有財力參加租佃的投標。即使對于一個中等水平的農戶來說，他想要在市場上競爭土地，也會遇到障礙。羅吉婭（瑪·布揚的妻子，#34）的個案就說明了這一點。她花了1600馬元從她兄弟那里得到了連續四個種植季種植2.5里郎土地的權利。但是，為了支付這筆費用，她典當了家中所有的黃金首飾，并且從村里兩個雜貨店店主那里借了500馬元的高利貸。而現在，她的兄弟在原來的租期沒有到期的情況下要求她把租期延長一年（800馬元）。而如果她不能拼湊出額外的800馬元，那么這塊地就要被轉給另一個佃戶。即使對村中耕種土地最多的農戶之一拉齊姆而言，為了籌集3000馬元租金從法齊勒那里租種4里郎（7個種植季）的土地，他也犯了難。盡管這份契約從長遠來看非常誘人（平均每種植季每里郎的租金為107馬元），而且法齊勒還允許他延遲一季交其中的1000馬元。拉齊姆最初交納的地租的一部分仍然是從一個鄰近的中國商人那里借到的。所以，塞達卡村中簽訂長期租佃契約的農戶沒有一家是來自村中最窮的那1/3的家庭，盡管這些家庭極其需要可供耕種的土地。租佃關系的商業化的另一個明證是，即使租佃的雙方是近親，他們的合同現在不但是書面合同而且還經過了公證。[[184]](#_184_23)

有4位村民已經失去了他們以前租種的土地，因為他們的地主堅持要將租約轉為長期租約，而這幾位村民卻不能湊夠所需的現金。大約有18里郎的土地以這種方式落入了村外人的手里。更加令人不安的是，村民們幾乎每天都會從市場上或者從親戚那里得到這樣的消息：大片的土地落入了富有的、從事商業的佃戶手中，其中很多是華裔。這些華裔自己有拖拉機，有些人甚至擁有聯合收割機的一些股份。一個在雙溪布浙村附近的村民已經把8里郎的土地以15000馬元的租金租給了一個擁有拖拉機的華裔小商店老板耕種15個季。塞達卡的托·卡西姆（#60）把自己4里郎的土地出租了10個季，以便為他兒子駕駛的出租車籌集6000馬元首付。而租種托·卡西姆土地的佃戶是一位華裔拖拉機所有者。托·卡西姆就是這個華裔拖拉機所有者的經紀人，托·卡西姆負責排出犁耕作業的時間表并收取相關的費用[[185]](#_185_21)。托·卡西姆說自己更愿意把地租給馬來人，但是，他認識的馬來人中沒有人能夠支付他所需要的那筆費用。同這些消息相伴隨的是一些外來的商業經營者參與土地競爭的日常證據。在塞達卡的富裕地主勒拜·彭德克（#73）看來，那些跟他做生意的華裔小商店老板沒有一周不問他是不是有意出讓他的土地。

即使是最小型長期租佃，最初資本支出已經超出村中絕大多數家庭每年的純收入；此外，現在長期租佃租金已經達到每季每里郎180馬元到220馬元。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農業收成一般的話，利潤非常微小，甚至會無利可圖。對于當地絕大多數耕田人而言，即便他們有租地的資本，他們也不敢冒這種風險。只有那些自己已經擁有拖拉機或聯合收割機的人和那些從事大面積種植的農戶才可以在這個市場上參與競爭，前者可以降低他們的生產投入，而后者則可以分散風險，減少短期損失。事實上，資本（包括機器、磨坊和貨幣儲蓄）的主人正在直接進入生產進程，并自己耕種土地。那些想把自己的土地出租給長期租佃佃戶的土地所有者可能是富人，也可能是窮人；但是，那些租入這些土地的新佃戶越來越多地來自那些最富有的馬來人和華裔農業經營者。雖然所有權基本沒有什么變化，但是，耕作的集中趨勢——經營權的壟斷，正在快速地發展。[[186]](#_186_21)

## 水稻生產的變化和工資的變化

塞達卡村中那些貧窮家庭現在十分懷念雙耕剛開始的那五年（大概一直到1977年），那時，不僅由于兩季稻生產中的插秧、收割、打谷以及運輸，工作是充足的；而且，勞動需求在種植和收獲的時候達到了高峰，這提高了勞動者在談判中的地位，大大增加了他們的實際工資。一直到1976年，形勢都是喜人的，樂觀主義有充足的理由——幾乎所有的人都在雙耕中得到了好處。當然，大農戶和地主是產量提高、地價上漲的主要受益人，盡管生產投入的增加抵消了一定比例的利潤。對于過去勉強維持生活的小農戶來說，他們第一次發現，雙耕給他們帶來了一定的剩余，并減輕了他們日益增加的債務。對于村中少地或無地可耕的最貧窮的村民來說，他們過去主要依靠打工來養活自己的家庭，現在即便是他們也可以在水稻的兩個種植季中在當地找到工作，這些貧窮的村民無需每年離家去找工作來滿足家庭的需要了。

從外部來看，似乎雙耕已經使村民有了一個更加可靠的經濟基礎，并使得他們在人口、債務和移民的壓力下有一些喘息的機會。從內部來看，塞達卡的村民以一種典型的樂觀態度來回應這樣的變化。他們用更加牢固的材料重蓋了自己的房子；他們以更加鋪張的方式操辦婚禮和其他儀式；他們買了新的自行車，甚至小摩托車；他們在食物、服裝、家具、甚至首飾方面有了一些小的奢侈消費；他們開始旅行去拜訪以前很少探望的親戚。對于村中比較貧困的農戶來說，人生中第一次，他們發現自己也可以擁有水利灌溉以前殷實的中等農戶才會有的食物、不動產，可以舉行他們才能舉行的儀式。相應地，那些原本已達到小康水平的家庭則熱衷于大約10年前只有最富有的人家才會考慮的消費時尚、儀式和投資。在這種普遍的歡愉中，對日益擴大的收入差距的擔憂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這并不奇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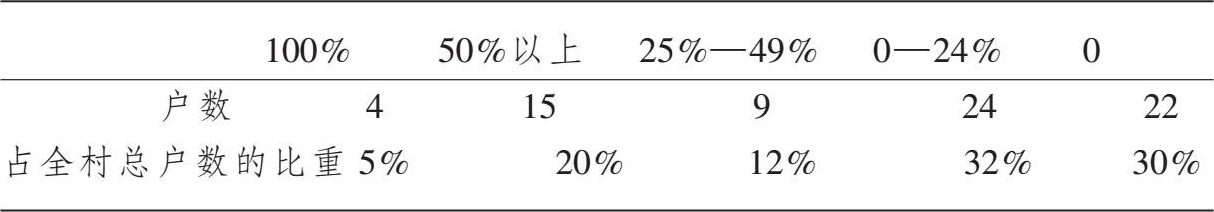
到1978年，到1979年則更加明確，愉悅的氣氛以及那些支撐這種歡愉的許多物質條件都消失了。不過，如果說原來的歡愉是一個普遍的現象的話，那么，幻想的破滅則是選擇性的，它主要影響著窮人。自從1974年以來，農產品的交貨價格沒有變化，生產投入的增加大大削減了農業的收入。對于大的農戶來說，這只是帶來一定的麻煩，但是對于小佃農和小農戶來說，這是一個沉重的打擊。1978年的一場旱災幾乎使需要灌溉的作物顆粒無收，這不但削減了將近一半的農業收入，而且也剝奪了窮人賴以為生的工資收入。同時，那股原本促進農村相對繁榮的經濟力量已經開始促成了租佃模式和生產技術的變化，正是這些變化潛在地破壞了之前的繁榮，特別是對于那些社區中原本就受益最少的農戶來說。就像我們所看到的，大地主為了追求更大的利潤，他們或者自己親自耕種土地，或者把大塊的土地出租給那些能夠提前交納大筆地租的富有的長期租佃佃戶。在任何情形下，可供小農戶和中等水平佃農租種的土地減少了。

大約在同一時間，聯合收割機開始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促成聯合收割機出現的經濟力量很大程度上正是原先提高村莊工人收入的經濟力量。只有當收割所需的勞動費用增加了，而且雙耕以后事實上有了全年收割的可能，對大型聯合收割機的投入才是有利可圖的。[[187]](#_187_21)聯合收割機的直接和間接的影響都是巨大的。受損失最大的幾乎無一例外的是村中比較貧困的家庭，他們的經濟保障和經濟收入幾乎又重新回到了1970年以前的水平。1978年農閑季作物因為干旱顆粒無收，這使得這些貧困家庭的收入銳減。這些貧困家庭也很快意識到，聯合收割機的出現使他們很難在1979年通過人力收割來彌補他們的損失。窮人們又一次勒緊了褲帶；筵席和婚禮或者已經過去，或者被取消，或者縮小了規模；窮人們原來的一點點奢侈享受現在也消失了。到1979年，許多窮人又開始離開村莊，到城市打臨工，以維持他們的生計。

這里雖然我們只考察了這些變化在塞達卡所產生的經濟影響，但是，這將有助于發現在最后一章中要簡要描述的更大范圍的變化。促進生產技術領域變化的地方性努力也將揭示出其他多樣的次要后果，對這些后果的討論在對穆達地區的各種綜合分析中是缺失的。這里，我們關心的是那些地方性的“事實”，至于它們的“社會意義”和對這些社會“事實”的反應，我們將在此后的幾章中討論這些重大的問題。

農業生產的機械化，自然對那些以打短工的工資為主要收入來源的村民產生了最直接的威脅。純粹的雇工這個小群體受到的負面影響最大。不過，在塞達卡這樣的人家只有4戶，而在整個穆達地區，估計純粹依靠的打短工的工資收入的家庭大概占7%到10%。或許是因為這個原因，人們甚少關注機械化所帶來的工資損失。考慮到稻米經濟以外的勞動力市場的快速發展，如果說機械化的影響只局限于純粹的雇工階級，這樣的疏忽是情有可原的。但是，機械化影響的范圍要廣泛得多，機械化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所有過去依賴打短工換取部分收入的家庭。如表4.8所示，在1977—1978年塞達卡村對打短工的依賴程度是很顯著的。

表4.8 塞達卡家庭的打短工\*收入占家庭純收入的比重：1977—1978年，主種植季



\*這種勞動首先包括插秧、收割、脫粒以及田間運輸。它也包括一些不太普遍的薪酬工作：比如趕水牛犁地、拔草、捆綁、運輸秧苗、修復堤岸，以及在插秧、除草和施肥以后補種被破壞的區域。但打短工不包括運送袋裝的糧食，一旦這些糧食離開了田地。

在塞達卡，至少1/4的家庭應該主要被視為雇工，因為他們大半的家庭收入來源于此。除了其中的兩戶人家，這1/4的家庭都屬于村莊中最窮的那一半，他們或者土地稀少、或者家庭人口眾多，或者既土地稀少又家庭人口眾多，以至于他們只有依靠打短工才能繼續生存下去。另外9戶人家（12%）中，家庭收入的1/4來自于打短工的收入，同時，還有24戶人家都有一定的收入是來自打短工。因此，塞達卡有多于2/3的家庭有一些收入來自打短工，而對于1/3以上的家庭來說，打短工的收入是最重要的。即使這樣，這些數據還是低估了打短工的收入的重要性。[[188]](#_188_21)實際上，在22戶沒有打短工收入的家庭中，有一半的家庭是由不能參加打短工的退休人員或殘疾人組成的。

在土地備耕（field preparation）時使用拖拉機是水稻種植機械化的第一步。在雙耕開始以前，拖拉機已經廣泛地用于松土、平整土地以及犁地，不過，拖拉機通常是和水牛一起使用的。掘井健三發現，即使到1967年，水牛在水稻種植中還是占據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塞達卡村的水牛數量幾乎與村里的家庭數目一樣，而大多數沒有水牛的家庭都租借了一頭。雙耕以后，犁地的速度被提到了重要位置，因而拖拉機開始在備耕的各個階段普及開來。雖然對于水牛的所有者和使用者來說，增加的花費和損失的收入都比較大，但是那時候塞達卡村民沒有任何理由在收入增加的背景下為這一點小小的花費而躊躇。

村中兩個較為貧困的家庭遭遇到的收入損失能夠反映村中當時的普遍情況。在雙耕以前，通過為別人間苗，還有偶爾用一頭租借來的水牛幫人犁地，拉扎克的弟弟哈姆扎（#8）每年有200馬元的收入。但是，到1973年，這些工作就已經消失了。薩馬德（#17）現在仍然有一頭水牛，他自己算出來他過去每年的收入大概有500馬元，薩馬德為別的農戶犁、耙20里郎土地，每里郎25馬元。幸運的是，薩馬德現在每年還可以以這種工作掙到100馬元，但他認為他會在近期內賣掉他的水牛。塞達卡的貧困戶們遭遇的損失是逐步加深的，而且損失的分布也是不均勻的，所以，我們幾乎不可能估算他們的平均損失。不過，一項農業經濟調查顯示：穆達地區在雙耕以后，每季稻每里郎土地的勞動投入平均下降了17%，農民收入的損失跟這個數據應該不會相差太多。[[189]](#_189_21)現在，在塞達卡村，負責備耕的拖拉機是大型的四輪機器，這些拖拉機的所有者幾乎都是住在村外的、富有的經營者，他們或是馬來人，或是華裔。只有4位塞達卡村民擁有拖拉機，而其中的3位都是村中最富有的人（哈吉·卡迪爾、勒拜·彭德克和阿明），不過，他們的拖拉機都是腳踏的兩輪機器，主要在自家耕種的土地上使用。與此相比，村里水牛擁有的分布要均勻得多。[[190]](#_190_21)

如果說在塞達卡土地備耕的機械化由于通過雙耕帶來的就業機會，而受到村民的普遍歡迎，那么，稻谷收割的機械化，即使不說是極有爭議的，也是存在不同看法的。毫不夸張地說，商用的聯合收割機席卷了塞達卡所在的水稻種植的平原。1976年中期，在灌溉季作物收割的時候，聯合收割機第一次出現，不過只有一兩個外村地主使用這些機器；而到了1979年的灌溉季，也就是5個種植季以后，塞達卡村60%的稻田是用機器收割的；一年以后，機器收割的比例已經達到了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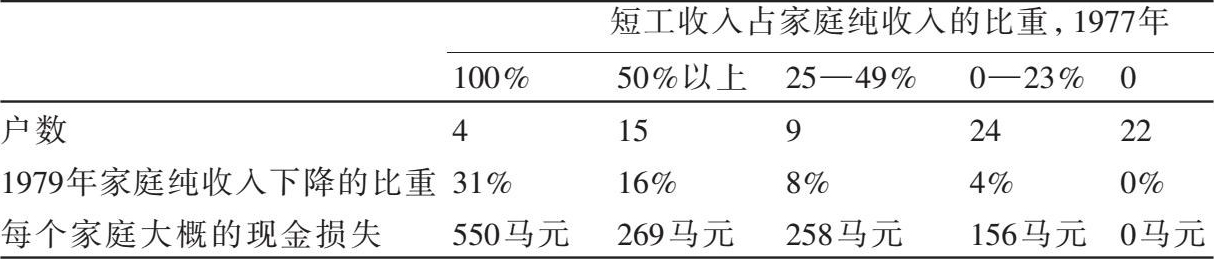
最初雇用聯合收割機的村民基本都耕種了6里郎以上的土地。由于耕種面積很大，他們很少有足夠的家庭勞力來自己收割莊稼，也無法同鄰居進行換工。因為泰國勞工受到限制，吉蘭丹州的移民又紛紛離開，所以，雇用勞力來收割水稻的費用有了較大的上漲。[[191]](#_191_21)新的雙耕體制也強調速度。高產新品種的稻粒在成熟時很容易散落；尤其是灌溉季，在潮濕的環境下收割會導致更多的稻粒脫落；此外，當種植季已經開始晚了，要想及時為下一個種植季準備好隨后要耕種的田地，收割速度非常重要。

可以理解的是，小農戶和佃農極不愿意使用聯合收割機。對他們來說，自己承擔全部或部分的收割工作更可行，也更重要：說它可行，是因為相對土地而言，他們在勞力方面是比較“富足的”；說它重要，是因為在農耕過程中，節省現金投入對于他們來說意義更大。[[192]](#_192_21)當然，他們也清楚地意識到，聯合收割機可能并且確實威脅著村中的低收入家庭，這些家庭打短工收入的主要來源將被剝奪。但是，即使就小農戶而言，情形也并不簡單。到目前為止，對于貧困家庭的男人們和婦女們來說，水稻收割階段是最有利可圖的；婦女三五成群地收割水稻，每人一天的收入是7馬元；而一個壯勞力每天可收割8到9麻袋的稻子，假如他們能夠找到這樣的工作的話，每人每天可得到16—18馬元的報酬。這正是問題所在。小農戶每天忙于收割自己的稻子，或者與鄰居換工，所以他們錯過了在農忙時賺取高額薪水的機會。從個人的角度來說，使用聯合收割機收割自己小塊地上的水稻在短期看來是合理的做法，這樣這些小農戶就可以有更多的時間為別人收割并以此來賺取薪水。當然，總的來說，當聯合收割機逐漸替代手工收割的時候，從長期來看，這合起來就是“以鄰為壑”（beggar-thy-neighbor）的損人利己的做法。對于村中的一些——但不是所有——小農戶來說，短期利益占了上風，這帶來了一些難以避免的后果。

總體后果可以通過比較不同時期家庭純收入的凈損失得出：在1977年的灌溉季，只有15%的土地使用了聯合收割機；而在1979年的灌溉季，60%的土地使用了聯合收割機。因為表4.9中的數據主要來自對先前工資收入的回憶，所以它們應該被當做大致的近似值。[[193]](#_193_21)

表4.9塞達卡村由于水稻收割的機械化導致的家庭純收入的凈損失（數據由村民提供）：

表4.9 1977年的灌溉季與1979年的灌溉季相比



如同人們所預料的，塞達卡村中最窮的家庭收入下降得最嚴重。對于那些完全靠雇工收入的家庭來說，聯合收割機意味著一場經濟災難。而對于另外22戶家庭來說，打短工的收入占這些家庭收入的1/4以上，考慮到他們的收入普遍很低，聯合收割機帶來的后果顯然也是嚴重的。但是，對于塞達卡村一半以上的家庭（46戶）來說，聯合收割機的應用則是一種恩賜，至少是喜憂參半的恩賜。這一事實不僅有助于解釋對聯合收割機的普遍接受，還有助于解釋村民支持和反對聯合收割機的階級基礎。我們將在下一章節討論這些問題。

村莊內部損失的模式和類型可以在一些具體的例子中很好地反映出來。卡里姆（#10）只租種了2里郎的土地，他的現金收入的大部分是靠收割時打短工獲得的。在廣泛使用收割機之前，通過收割時在塞達卡及臨近區域不間斷地打短工，卡里姆每一季大概可以得到300—400馬元的收入。而現在，如果他在收割時打短工能夠得到100馬元的收入，他就認為自己已經是很幸運了。在向我細數自己的損失時，卡里姆特地加了一句：“如果不是因為機器，我就跟你一樣在工作在流汗了。”[[194]](#_194_19)對卡里姆的家庭來說，收入的下降更為嚴重，因為卡里姆的妻子也失去了收割時打短工的機會。而對于那些是一家之主的婦女來說，聯合收割機導致了更為艱辛的生活。洛斯妮（#26）是一位45歲的寡婦，家中有5個孩子。她是村里出了名的勤快人，她還是村里窮戶婦女組成的插秧收割隊的頭頭。雖然她租種了4里郎的土地，但是租金很高，洛斯妮主要還是依靠打短工來支撐人口眾多的家庭。在1978年的主種植季，洛斯妮和她的大女兒靠打短工賺了350馬元，但是在1979年的灌溉季時，這部分收入下降到70馬元。而且，她們插秧時打短工的收入也下降了，因為她們過去的兩位雇主現在選擇了直接撒種的方式。洛斯妮現在非常擔心的是，要勒緊褲腰帶生活就意味著她正在上中學的13歲兒子將不得不退學。而對于那些無地可種的家庭來說，聯合收割機對于他們的影響簡直是災難性的。“瘦骨嶙峋的”瑪（#6）是一位貧窮的無地雇工，他原來在谷物脫粒時打短工可以賺到300馬元，他的妻子收割的時候打短工大概也有這樣的收入。但是，現在他們兩個人每季的收入一共大概只有200馬元。他們倆不得不到塞達卡往北10里的地方去找插秧的工作來彌補一部分收入的下降，[[195]](#_195_19)但是，他們依然擔心，瑪或者整個家庭都將不得不搬出吉打州去另找工作。帕克·亞赫（#11）是另一位家庭人口眾多（家中有9個孩子）的無地雇工，他也面臨著同樣的景況。他和他的妻子以及4個已經到了勞動年齡的孩子，過去收獲時打短工一共可以獲得1400馬元的收入，而現在，帕克·亞赫一家從收割打谷獲得的收入已經降到了大約800馬元，帕克·亞赫的一個兒子已經決定去城里找工作來養活自己了。

在1980年的主種植季，當村中又有20%的土地也開始使用聯合收割機的時候，村民打短工的收入就下降得更嚴重了。雖然仍有一些使用人力來進行收割和脫粒的工作，但是村民往往需要走到更遠的地方才能找到這樣的工作機會；并且在所有的情況下，這只是過去的工作機會的一小部分。雖然機器在跟人搶奪工作機會，但是跟大家的猜測相反，打短工的工資似乎并沒有下降而是增加了，收獲時人工的價格現在大約是收割1里郎土地是40馬元，而打一麻袋谷則是2.50馬元，這一報酬和插秧勞動的薪水都以大約同樣的幅度增長。但是，以土地面積來計算的人工的單價是有一定欺騙性的：它掩蓋了單位勞動報酬下降的事實。大多數現在仍然由人工收割的稻子不是種植在機器無法進入的深水田，就是已經被不合時宜的風雨刮倒了。因此，這些收割工人往往是在過膝的水田里工作，稻桿很難割斷，也很難打出稻米。婦女收割1里郎這樣的土地要花費比平時多一倍的時間；而一個好的男勞力在比較好的條件下一個早上能打出四麻袋的稻米，但是，他們現在如果能打出兩袋已經算運氣不錯了。因為薪水仍然是按勞動量而不是按時間來計算的，所以，標準工資率實際上已經減少了。如穆斯塔法（#45）抱怨的那樣，“現在，他們只讓窮人在水溝里收割”。

但是，聯合收割機的影響決不僅僅限于它們取代了手工勞動，農業收割的機械化同時也產生了一系列間接后果，這些新的可能性一旦變成了現實，它們對于村中的窮人的影響就幾乎是毀滅性的了。首要的一個后果就是，窮人逐漸不再把“拾穗”作為自己的一種生存策略。在聯合收割機被廣泛使用的1978年以前，至少有來自14個家庭的婦女和孩子，帶著小麻袋和打谷工具去田里收集那些殘留在打過的稻桿上的稻米。拾穗在土地干旱的主種植季比較普遍，而在農閑季（off-season），陰雨天氣和泥濘的道路使拾穗變得比較困難。一個貧困的家庭可以通過這種方式收集3到4麻袋的稻谷。[[196]](#_196_19)對于那些無地或幾乎無地的家庭來說，拾穗為他們增加了很大一部分糧食。拾穗不涉及錢財的支出。而且，婦女在那時候也正好沒有其他的收入來補貼家用。對于至少一戶的人家來說，拾穗所得是家庭口糧的主要來源。經過一個月辛勤的拾穗，“瘦骨嶙峋的”瑪、他的妻子和女兒就可以拾到15袋的稻米，而這些稻米足夠這個家庭吃上大半年。如人們預料的那樣，塞達卡村的這些拾穗者基本來自村中最窮的家庭，在14戶拾穗的人家中有11戶都屬于村中收入較低的那一半家庭。

現在聯合收割機已經減少了拾穗，除了在少數由人工收割的田地，收割后已經很少見到拾穗人了。只有“瘦骨嶙峋的”瑪和他的妻子試圖彌補他們的一部分損失，因為他們有一大家子要養活。瑪和妻子發現，聯合收割機在急轉彎、改變速度或者被卡住的情況下會把稻米掉出來，于是他們就尾隨著機器，挑揀機器遺留下的殘留物。[[197]](#_197_19)如果比較幸運的話，這種取代傳統拾穗的巧妙方法可以使“瘦骨嶙峋的”瑪他們一天拾得兩麻袋的稻米；但是，這種收獲是不確定的、無規律的。除了這種相當獨特的調整，拾穗基本上已經消失了。

一旦收割的大部分工作都實現了機械化，那么，現有的雇傭勞動模式隨后就要發生更微妙的變化。一般來說，打短工可以分為兩種形式。第一種是工作隊計件工作制，這種形式在插秧和收割（當地人把這些看做婦女的工作）時比較流行。在這種形式下，工作隊的頭頭與雇主就每里郎的勞動報酬討價還價，隨后把活分派給工作隊中的每個人。打谷的報酬一般說來也是計件制的，不過，報酬是直接付給個人，或者直接付給在一個打谷盆工作的那一組兩個人。另一些短工勞動是在不忙于種田、收割的季節出現的工作，比如修理堤岸、除草、補植、在旱季挖井供水，這類工作支付報酬的方式是所謂的“古榜”（kupang）固定工資制：工作一個早上或者一整天并獲得固定的現金工資。這類工作都是在種植的農閑季節出現的，這些工作的報酬在過去和現在都低于收割和插秧的有效報酬。

然而，在過去的兩年中，這種“古榜”固定現金工資制開始流行于那些必須由人力來完成的收割工作。這種轉變之所以可能是因為聯合收割機取代了足夠多的人力，這實際上也是提高了雇主在討價還價中的地位。如果有人認為自己的土地確實需要人力收割，那么他就會雇婦女在早上來給他干活。這種做法的效果是雙重的。第一，這更便宜。在1979年，收割1里郎稻田標準的工作隊價格是35馬元，而在固定現金工資制下，只要30馬元，甚至更少。第二，這允許雇主一個一個地挑選工人，而無需同由婦女領導的、有組織的、具有一種萌芽狀態的商業社團精神的工作隊進行談判。在1980年主種植季收獲時，塞達卡大概有一半依靠人力收割的稻田都是以“古榜”固定現金工資制來雇用勞力的。在一些臨近的村莊里，“古榜”固定現金工資制已經成為收割時雇工的一種標準方式。但是在插秧時，這種方式不是太普遍。“古榜”固定現金工資制看起來也造成了一些小麻煩，地主節省下來的費用（對勞動者而言，是損失的）似乎是相當可觀的。[[198]](#_198_19)而對于脫粒來說，固定現金工資制較為稀少，但并不是前所未聞。在插秧和脫粒的環節中，固定的現金工資制將會變得如何廣泛，現在似乎還很難預見；不過，在收割的環節中，固定現金工資制已經降低了雇工的薪水，并且削弱了塞達卡村中少數非正式勞工組織之一——工作隊。

另一方面，雇主現在占據了更有利的談判地位，這一點也可以從村里那些非正式“勞動合同”反映出來。直到1978年，如果雇一個工作隊插秧，按照慣例，雇主要提供一頓豐盛的午餐。但是到了1979年的灌溉季，這頓午餐顯然已經不存在了。在一些例子中，雇主單方面將充足的咖喱魚飯或者對蝦糯米飯降低為干面包和茶點。這樣，婦女們開始自帶干糧。另一些雇主給婦女們提供了兩種計件報酬率：一種是沒有午餐，每里郎35馬元；另一種是提供午餐，每里郎32馬元。因為上一季標準報酬是每里郎35馬元，再加上一頓午餐，所以，免除午飯的新方式有效地降低了種植成本。大多數的工作小組都選擇放棄食物，因為這頓飯通常被削減得極其簡單。現在，我們可以確切地推斷，為插秧工人提供午餐已經成為了歷史。

在實行單耕的時候，還有雙耕剛開始的興盛時期，農戶，特別是大土地所有者，往往在雇工們還沒開始插秧和收割的時候就預付薪水。這種預付的薪水可能是糧食也可能是現金。這種做法對于雇主和雇工雙方都是有好處的：對于雇主來說，這保證了他在農忙季節可以找到勞力；而對于雇工來說，特別是在單耕制時，因為農業周期的原因，他們收到這種表示歡迎的糧食或現金的補給時，他們的家庭正處于經濟吃緊、米缸見底的狀態。當然，對于雇工來說，他們也為提早得到工資付出了代價，因為跟收獲以后得到的工資相比，這時候得到的工資打了30%的折扣。到1979年，當聯合收割機的使用造成了對收割勞動力的需求顯著減少的時候，幾乎所有的雇主都放棄了預付工資的方式，因為即使需要人工收割，雇主們也很容易當場找到所需要的勞力。

聯合收割機出現以后，同預付薪水密切相關的另一種風俗也不再存在，或者說急劇減少了。雇主通常在薪酬之外還要送給收割工人一些稻米作為饋贈。這種饋贈被認為是“私人的伊斯蘭什一稅”，這種做法雖然不是被所有人采納，但是已經被廣泛接受，許多收割工人已經把這種饋贈當做他們預期收入的一部分了。對雇主來說，這種饋贈跟提前支付工資的目的是相同的，這能保證他可以雇到足夠的勞力以確保下一個種植季的種植。現在，饋贈這種方式雖然沒有完全消失，但是也已經成了例外。當然，在使用聯合收割機的的情況下，饋贈或預付工資是無需考慮的，因為除了外來的高收入的司機之外，根本沒有其他的勞動力。但是現在，即使是使用人力進行收割、稻米裝袋以及運輸時，由地主送給工人額外饋贈的情況也變得非常罕見了。

聯合收割機也以一種間接的、甚至有悖常理的方式，促進了一種新的播種方式的發展，而這種新技術實際上嚴重地削減了稻米種植中打短工的最后機會——插秧。同人工插秧不同，以這種新方式播種的田地里，莊稼根本不成行，而且也長得高低不一。因為這些原因，使用人工對這些莊稼進行收割和打谷的難度就增加了，這一點從人力收割的花費上就可以看出來。[[199]](#_199_19)然而，這樣不整齊、高低不一的莊稼并不能阻擋聯合收割機。聯合收割機只按照每里郎的標準價格來收費，根本不管這些田地是怎樣播種的。農戶現在可以直接往田里播撒種子，因為他知道，他這樣做絲毫不會增加收割的成本。

干種（dry sowing）的優點很明顯：首先，種田人節省了在育種、護理、出苗、插秧上時間和人力的投入，也就節省了現金花費。水稻周期中插秧這一階段的現金節約是相當重要的，因為插秧的花費都來自以前的積蓄，而收割時的花費可以從收成中提留出來。在塞達卡地區，干種還有其特定的優勢。塞達卡是最后接受灌溉的地區。采取在灌溉季播種的方式，農戶就有更好的機會及時收割，把土地清理出來，為靠雨水的主種植季（rain-fed main season）做好準備。此外，如果雨量不穩定或者排水不佳破壞了部分甚至全部播種的作物，那么，農戶仍然有機會重新犁地重新播種，也可以從鄰居那里購買剩余的秧苗進行補種。[[200]](#_200_19)

自1979年的灌溉季以來，塞達卡播種方式的發展已經十分明顯，這引起了很多人的不安。在1979年灌溉季的前一個種植季，鄰近的雙溪布浙村里，至少有三個大地主——湊巧的是他們三個都是“哈吉”——開始嘗試直接播種的方式以便能早點收割莊稼。[[201]](#_201_19)三個“哈吉”中有兩個的產量高于平均水平。這兩個“哈吉”的經歷鼓勵了塞達卡村一位擁有16.5里郎土地的大地主阿布杜爾·拉赫曼（#41），阿布杜爾·拉赫曼也開始在他的一部分土地中自己嘗試這種技術。雖然阿布杜爾·拉赫曼的產量并不令人滿意（每里郎8袋糧食），但是，這是因為他未能精心照料莊稼，而不是因為技術本身。在1979—1980年的主種植季，塞達卡村中有17戶家庭在大約50里郎的土地上嘗試了播種的方法，這大約占了村民耕種面積的15%。

四個種植季以后（1981—1982年的主種植季），塞達卡大約有40%的土地都采取了播種的方式。非常明顯的是，大部分嘗試直接播種的都是村中比較殷實的人家，[[202]](#_202_19)他們一般來說都是帶頭創新的，同時也最有能力承擔產量下降的風險。即使這樣，他們也沒有把握在他們一半以上的土地上都進行播種。[[203]](#_203_19)

更令人吃驚的是，村中一些比較貧困的村民也嘗試了干種。就具體的情況來看，他們的選擇似乎更多是為環境所迫，而不是有意的冒險。因為沒有現金支付插秧的費用，或者家中沒有足夠的勞力和鄰居換工，或者沒有足夠家庭勞力來完成自家的插秧工作，一些貧困戶也選擇了直接播種的方式。巴克利（#7）從他父親那里租種了4里郎的土地，因為當時他的妻子剛剛生了孩子，直接播種3里郎土地是節約財力的辦法。就華喜德（#2）來說，他的妻子生病了，他認為，在育苗準備的時間，離開村子到城里做建筑工人會掙得多些。于是，他租種的6里郎地的一半都采用了播種的方式。這既為他節省了花銷，也使他有時間去打工。不過，塞達卡大多數的貧困家庭都不愿意冒播種這個險，除非他們被強迫這么做。直接播種暫時還主要局限于大種植者，而貧困家庭婦女的大部分插秧報酬正是通過為這些大種植者插秧才得到的。在播種方式普及的同時，貧困家庭在進一步衰落。直接播種的普及情況很難預測，但是，直接播種似乎得到了穆達地區農業管理機構的支持。[[204]](#_204_19)

這樣看來，聯合收割機帶來的間接效果至少和跟它的直接沖擊一樣是大規模的。聯合收割機除了減少了收割和脫粒的工作機會之外，同時也使拾穗變得不可能。聯合收割機也促進了新的勞動報酬支付方式（固定的現金工資制）的發展，這種支付方式實際上降低了所剩無多的工作酬勞。聯合收割機也促進了直接播種的發展，插秧的勞動報酬因此減少了一半。聯合收割機還鼓勵大地主把佃農打發走了以便親自耕種，聯合收割機也有利于產生一個商業性佃農階層，這些擁有財力和機器的佃戶以優惠的租金長期租種大片土地。這些變化中的大部分（雖然不是全部）提高了塞達卡富裕家庭的收入。所有這些變化無一例外地導致了貧困家庭收入的下降。[[205]](#_205_19)

不過，總體而言，我們并不是僅僅涉及到了相對不平等在量上的增長，也涉及了一系列意味著質變的量變。在此，“程度”發展成了“種類”。我們可以看到，當莊稼成熟時，對一個直接播撒種子并使用聯合收割機的大農戶來說，他根本不需要雇用任何一個需要薪水的貧窮村民。從大地主這一方來說，他既不需要把土地出租給他貧困的鄰居，也不需要雇這些鄰居在自己的地里工作。富人和窮人之間傳統的經濟聯系——雇傭勞動和租佃關系——已經近乎消失了。我們一方面有日益增加的由大土地經營者組成的商業階層，另一方面也有數量眾多的、只能被松散地稱為“半無產者”的群體。“松散”是必然的，原因在于，盡管這一群體仍然擁有自己的小塊稻田，但是他們注定要越來越不像農業無產者，因為如今的生產主要不是由他們進行的。如果他們要成為徹底的無產者，那么，他們應該出現在馬來西亞的城市或種植園中，而不是出現在不再需要他們的稻田中。

與此同時，一個準無產化的進程已經開始了，這個進程不是把村民和農業生產聯系起來，而是把他們和塞達卡之外（實際上也是吉打州之外）的城市經濟聯系起來。如果說雙耕的第一個階段還允許小土地所有者待在家里，那么，雙耕的第二個階段已經證明了是一個根本的逆轉。成批居民的離去曾經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以農耕為主的吉打州的持久特征，現在這種成批居民的離去又使村莊蒙受了巨大的損失。1978年以來，8位家庭的家長已經離開村莊，其中有7位來自村中相對較窮的那一半家庭。這8位家長到吉隆坡、檳城以及其他的中心城市去尋找臨時的建筑工作了。如果不是因為認為自己太老，或者是認為自己找不到工作，還會有更多人離開村莊的。12位已婚的男性已經申請了吉打州外的移民計劃，盡管他們成功的機會很渺茫。[[206]](#_206_19)差不多30多位未婚的男女已經離開了村莊到其他地方謀生，很多人是暫時離開，而有些人的離開卻是永久性的。無疑，他們當中的很多人最終是要離開村莊的，但是，1977年以來當地的土地控制狀況和就業狀況的變化迫使很多人提前離開了塞達卡。

村民大量外流的最直接原因是由于干旱造成的1978年灌溉季的完全歉收。由于顆粒無收，又失去了相應的打短工的機會，很多小農戶和雇工不得不暫時到城市謀生。那些待在塞達卡的村民，債務不斷累積，他們發現不但接下來那一季的收成只是一般，更糟糕的是，由于來自聯合收割機的競爭，這些村民的收入已經大大減少了。在種下了下一季的秧苗以后，這些村民中很多人馬上帶著已經成年的兒子離開了村莊，希望能夠彌補自己的損失，并償還自家虧欠典當行和小商店老板們的債務。

這樣的結果或許是人們記憶中最大規模的一次村民外出尋找工作。[[207]](#_207_19)工作一兩個月，這些外出做工的村民中的大多數已婚男子可以從他們的收入中攢下至少200馬元的積蓄，來供養他們在塞達卡的家庭。雖然有些夸大，但是，正如一個加入外出務工人群的小佃農所說的，“所有留下來的都是那些不能外出工作的人”。在臨近的村莊中，出外務工的人更多。對于仍然在塞達卡居住的窮戶和小農戶來說，臨時的外出務工無疑正在變成他們的生活方式。只要城市經濟提供了這種安全閥，這就將成為塞達卡的邊緣家庭在村莊中生存下去的唯一方法。

## 地方機構和經濟權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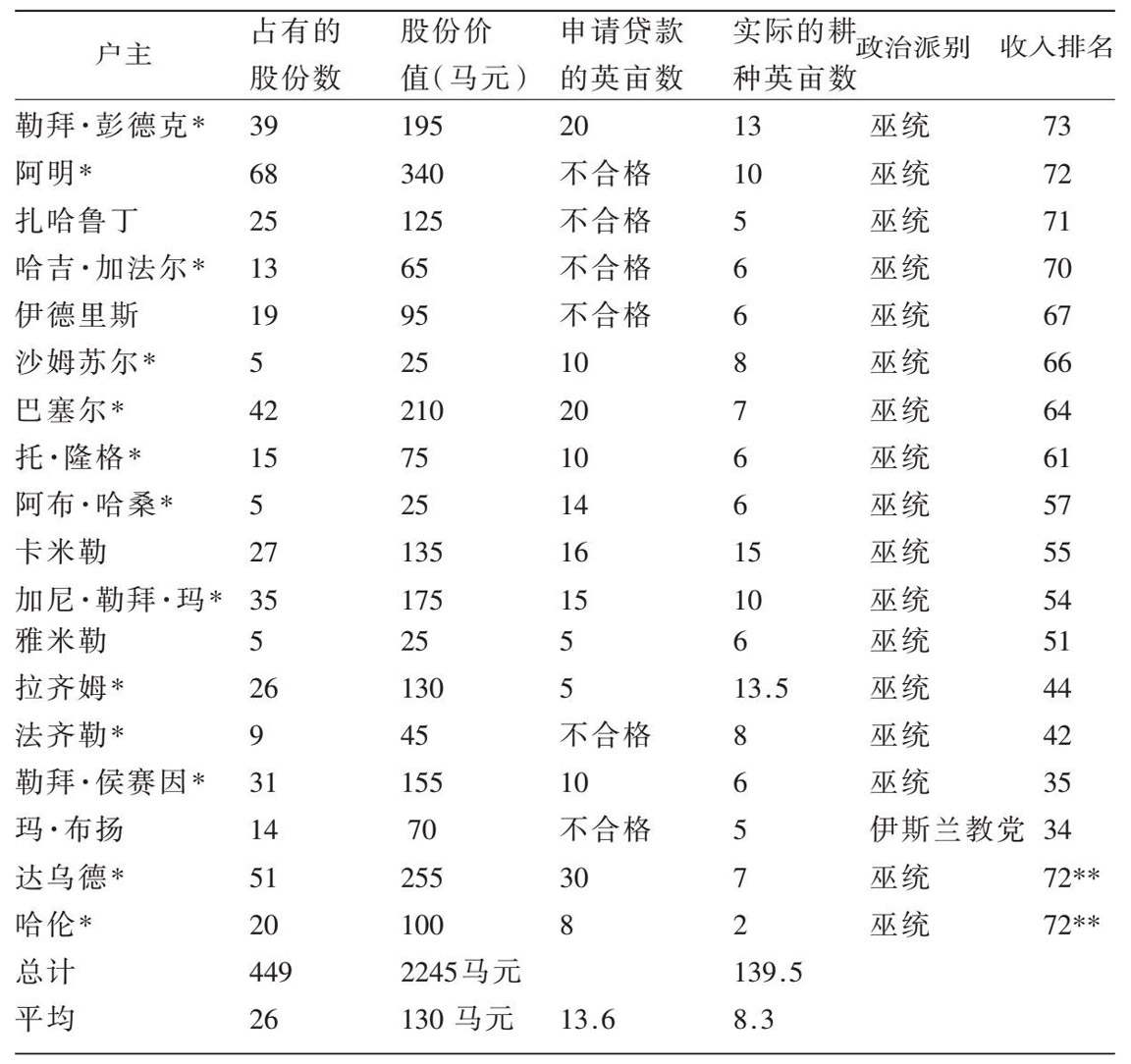
農會

在穆達地區，雙耕對土地控制、收入、社會關系的巨大影響，不可避免地會在地方機構的特征中表現出來。在塞達卡，雙耕影響地方機構的這種進程可以清楚地在農會的簡史中得以反映。農會在1967年根據法律成立，其最初目的是為了給當地農民的水稻生產提供推廣和信貸便利。雖然農會也許從未實現它的最初的承諾，但它很好地發揮了其他的功能。農會在鄰近的凱帕拉·巴斯塔鎮有一個分支機構，這個機構理論上應該覆蓋20多個村莊和1800多戶家庭。然而，只有600個家庭曾經成為農會的會員。由于認為入會的成本太高、收益太小，大部分小土地所有者和佃農都沒有參加農會。而當地的反對黨（伊斯蘭教黨）成員，包括許多富戶，也沒有參加農會，因為他們認為，農會是被由代表執政黨利益的國家所控制的，這一判斷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正確的。凱帕拉·巴斯塔鎮的農會分支機構，就像農會在其他地方的分支機構一樣，實際上已經成為隸屬于執政黨巫統的富農組織。

當農民提到農會的時候，他們稱其為“穆達農業發展局”，這既不是指農會本身，也不是說農會中被選舉出來的領導階層，而是指一個指導農會活動的政府機構。不管是在農民的眼里還是在實踐中，穆達農業發展局的主要功能就是提供生產所需的貸款和化肥。根據耕種面積的大小，農會確定給農會成員資助的數額，這包括拖拉機的花費（在1979年，1里郎土地兩個來回的費用是30馬元）和以實物的形式提供的肥料。[[208]](#_208_19)1978年灌溉季顆粒無收時，農民生計更為艱難，因此，穆達農業發展局也承擔了對一個大型的干旱救濟項目的監管，這一項目給那些清理排水溝和灌溉水渠的勞工們提供了相當慷慨的報酬。穆達農業發展局也為養魚養牛這些風險行為提供貸款，偶爾也公費組織到蘇門答臘、新加坡這些遙遠的地方去進行“學習旅游”（study tours）。由此可見，與其說穆達農業發展局是自治的農民協會，不如說它是向其成員分發貸款和支援物資的“聚寶盆”。

在塞達卡，這些資助的主要受益人就是表4.10所列的18位農會成員（16戶家庭）。在村里這些家庭在若干方面都是比較出眾的。除了兩個家庭外，其他都屬于塞達卡村里相對較富的那一半家庭。有12戶屬于村中最富有的20戶。這18位農會成員平均耕種了8.3里郎的土地，遠在塞達卡村的人均耕種面積之上；這18個人耕種的土地總面積為139.5里郎，整整占了全村稻米耕種面積的43%。從政治上來說，塞達卡的18名農會成員中，除了兩個人以外，其他人都是執政黨地方支部的成員。[[209]](#_209_19)實際上，在全村最富的20戶家庭中的支持執政黨巫統的那些家庭，除了3戶，其他都曾經加入過農會。[[210]](#_210_19)而全村最富的那20戶家庭中的7個伊斯蘭教黨家庭都沒有參加農會。[[211]](#_211_19)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農會的成員幾乎都是那些隸屬于執政黨的富有的農戶。這種聯系是如此緊密，以致四位選舉出的農會地方小組的領導人——達烏德（#70的兒子）、巴塞爾（#64）、阿明（#72）和法齊勒（#42）——恰恰是實際上控制著村莊政治的那個小集團的成員。而對塞達卡的窮人來說，無論他們歸屬于哪個政黨，他們幾乎都不會參加農會，只有兩個人敢冒這個風險。[[212]](#_212_19)

表4.10 塞達卡村農會會員的基本情況（在農會的股份、申請貸款的土地數、實際耕種面積、政治歸屬和收入排名，1979年6月）



\*表示這些人或者他們的直系親屬，是巫統塞達卡支部執行委員會的成員。

\*\*是哈吉·加法爾的兩個兒子，因此這是一個家庭的三個成員。

通過對農會的控制，少數精英獲得了大量的好處。在農耕和生產的借貸問題上，這種暴利是明目張膽的。除了4個人，農會成員申請貸款時申報的土地數量都遠遠大于他們實際耕種的畝數（見表4.10）。這樣，農會會員能以優惠的利率獲得一筆額外的款項，還能購買到額外的化肥并將這些化肥轉賣給非會員，以從中獲利。[[213]](#_213_19)當這些微小但是系統性地騙取貸款行為在凱帕拉·巴斯塔鎮發生時，穆達農業發展局的雇員很清楚發生了什么情況。這些雇員在登記這些浮夸的土地畝數時的共謀表明，他們試圖維持目前的成員人數，避免同執政黨的鄉村領導發生對抗。因此，村長的兒子（#70）達烏德登記了30里郎的土地，得到了900馬元的現金，而他實際上只有資格注冊7里郎的土地，只能貸款210馬元；小商店老板巴塞爾（#64）是塞達卡政治生活的核心人物，盡管他只耕種了7里郎的土地，但是，他卻貸到20里郎土地的款項，這樣，巴塞爾就以優惠的利率得到了自己的運營資金。

實際上，只有依據最寬容的定義，這種生產信貸才可以被稱為“貸款”。到1979年6月，塞達卡的18位農會會員中有6位會員就簡單地靠不還貸款把“貸款”完全變成了“撥款”（表4.10中“不合格”的人）。還有至少4個人沒有出現在這個名單里，因為他們很久以前就開始拖欠貸款，不再償還定期的應付款。在1979年中期剩下的12位還貸記錄尚可的會員中，至少有2人——巴塞爾（#64）和加尼·勒拜·瑪（#54）——在下一種植季未能還貸，也就不再具備繼續貸款的資格。巴塞爾欠了農會將近2000馬元的貸款。

負責當地農會分支機構的農業官員估計，不到一半的會員仍然有資格獲得貸款。盡管在1978年那場甚至打擊了一些富戶的旱災之后，農會放松了還貸的時間安排，但是，拖欠貸款的不良行為還是增加了。拖欠還貸的原因跟會員的還貸能力是沒有關系的。總體而言，農會成員大多來自富裕的階層，他們很容易從華裔商店老板那里借到周轉資金，或者更有可能的是，這些成員自己充足的積蓄就足夠支付他們的生產費用。因此，跟完全占有2000馬元的吸引力相比，無法繼續從穆達農業發展局貸款的制裁對他們而言僅僅是一個微不足道的麻煩。基于來自經驗的政治智慧，這些富裕的農會成員知道，他們不會被起訴，因此他們無憂無慮地忽略了定期收到的催促還貸的通知。如同這位地方農業官員所作的哀嘆：“因為政治是復雜的；如果我們采取行動，法院就會敦促還款，而政黨需要人民的選票。”[[214]](#_214_19)這種邏輯雖無瑕疵，不過并不是完整的。強行收債并不會疏遠巫統的普通成員，卻會疏遠構成了鄉村領導班子的大農戶。[[215]](#_215_19)草率地追債可能會給農會本身帶來致命的一擊。

農會的黨派特征和階級特征從來都沒有受到嚴厲的質疑。從一開始，農會就是由隸屬于執政黨的大農戶和地主控制并為他們服務的。這一公認的事實本身只是對村莊政治和階級關系的一個微不足道的刺激。明顯的證據就是，一小群寡頭可以享受特權從農會那里獲得信貸。不過，在1978年中期農會介入抗旱項目管理的過程中，穆達農業發展局和農會的黨派特征越來越鮮明起來。對許多種田人來說，這次旱災是一次好運；旱災發生時正值1978年的大選，所以，執政黨通過救濟可以達到一石二鳥的目的。穆達農業發展局的辦公室遍布稻產區，有專業的管理人員，同時，它又跟巫統有緊密的聯系，因此看起來，穆達農業發展局是在比較大的范圍內分配救濟品的合理發放渠道。發放的結果便帶上了穆達農業發展局的政治和階級特征的印記。

抗旱救濟被設計成一項勞動密集型的公共建設事務。實際上，跟勞動的密集程度相比，薪資的強度更可觀。清理兩天水渠，許多村民可以得到80馬元的收入，而在當地，一天的工作收入通常不超過10馬元。在塞達卡，農會工作人員在招工之前開展了一項入戶調查，主要了解各個家庭的規模、收入和耕種的土地數，由此可見，招工時是否合格是由家庭需求決定的。實際上，負責招工以及指導救濟工作的是由農會小組（ketua yunit）選舉出來的領導人。在塞達卡，這個人就是來自鄰村雙溪通港的瑪·塔明，他是一位巫統的堅定擁護者。當救濟工程開始以后，附近的穆達農業發展局辦公室被一大堆抱怨給包圍了，因為需要工作的人的政治派系顯然在獲得工作機會時發揮了重要作用。比如說，支持伊斯蘭教黨的貧困村民如果能去工作一次，那已經是很幸運了；但同巫統有關系的貧困村民平均獲得了兩次工作機會。[[216]](#_216_19)抱怨并不僅僅來自伊斯蘭教黨的成員；一些支持巫統的小農戶發現，跟他們同屬一個政黨的那些富有的成員充分利用了這次機遇來賺這不費力的錢。哈吉·沙利姆是一個有40里郎土地的富有的地主，他住在塞達卡村外，擁有卡車、拖拉機；他的兩個兒子都獲得了兩次工作機會。同樣，村中最富有的巫統成員勒拜·彭德克（#73）的兒子，也獲得了兩次工作機會；而勒拜·彭德克的一個兄弟則獲得了為農會搭建養雞場的合同，勒拜·彭德克的兄弟從這個抗災項目中得到的純收入在500馬元以上。而許多申請工作的伊斯蘭教黨成員往往被告知，已經沒有申請表了。為了搶奪工作機會，指責不僅多而且傳得快：許多工作隊的頭目都被指責編造工人的名字從中漁利，或者被指責敲詐勒索那些已經被雇用的人，或者被指責照顧親屬和同黨。村民聲稱，在抗旱災的項目中，農會小組的頭頭們每人從干旱救濟工程中漁利了2千到3千元。這種由于抗旱項目被操控所產生的怨恨使得瑪·塔明在幾個月后競選連任時遭遇了慘敗，他被跟自己同黨派的農會成員給選了下去。巴塞爾的弟弟住在村子附近，并在政府中擔任情報官員，他聲稱，干旱救濟項目管理中出現的丑聞，直接導致了貧困的巫統成員在隨后的大選中在許多選區的反戈一擊。

塞達卡的執政黨

在塞達卡，提及農會的成員，其實就是同時提及巫統的地方領導和所謂的村莊政府的“官員”。因此，農會現在的18位成員中有13位現在是或者曾經是由當地巫統支部選舉產生的村莊發展委員會的成員。[[217]](#_217_19)

除了3戶人家在政治上是“中立”的以外，每個家庭的政治派系大家都很清楚。塞達卡村中43戶家庭（58%）都在巫統的陣營，28戶（38%）家庭屬于伊斯蘭教黨。當然，這樣的統計掩蓋了成員們在開放性和積極性方面的差異。每個派別中都有少數的中堅力量。占村民絕大多數的巫統，除了少數核心成員，普通成員的加入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動的。事實上，相當多的村民公開承認，他們只是追隨者，他們加入巫統只是“站在主流的一面”，并希望有資格得到些小恩小惠。

巫統成員獲得的利益是非常實在的。對于村里富有的成員來說，成員身份意味著他有資格獲得一個出租車的執照、一筆小額的商業貸款、經營小型磨坊或者卡車營運的許可證，還有地方政府中的一官半職。1979年初，在巫統的地區年會上，一位來自古阿·貞布達鎮的有名望的巫統領導人曾經公開譴責一些成員：這些人入黨的目的就是為了獲得出租車的執照，而他們一旦達到了目的，就不再交納黨費，也不參加聚會了。對于一名普通的巫統成員來說，他能夠獲得的收益相對來說要少一些，但這并不是說，這種收益不重要。一些年輕人夢想到政府的土地規劃區定居，只有加入巫統他們才可能實現自己的夢想，因為在選拔過程中，政治派系是一個公開的選拔標準。貧困家庭可以從附近的小學校長那里獲得一些包括校服和練習本的費用在內的小額補貼。這筆補貼是根據塞達卡巫統領導人巴塞爾提供的人員名單發放的，而來自伊斯蘭教黨的貧困家庭的孩子很少出現在名單上。當然，除了這些贊助，各種好處還包括農會提供的貸款和工作機會，它們是通過同一群相互交織的村莊主管運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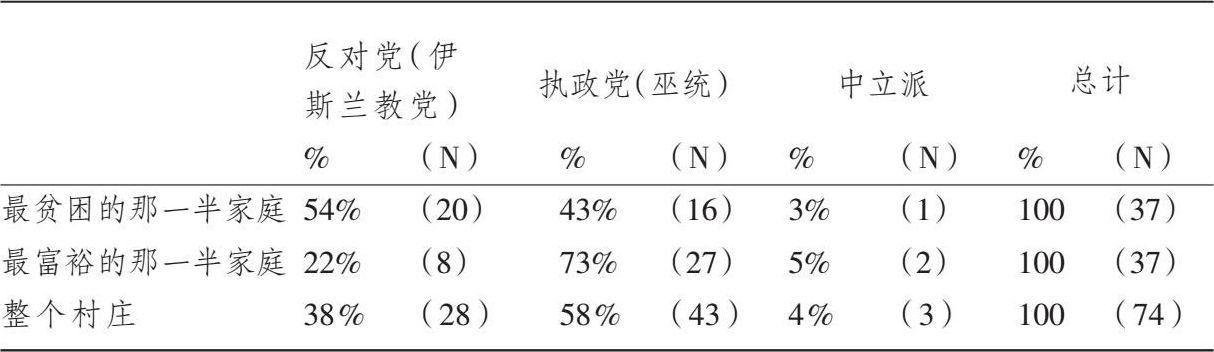
到目前為止，規模最大、也是最有爭議性的資助分配事件發生在1979年下半年。當時塞達卡村入選了“村莊改進計劃”，得到了超過2萬馬元的基金。就像之前的干旱救濟項目一樣，首先要對村莊每家進行普查來判斷各戶的收入和需求狀況。此后，基金就以實物的形式——比如木材、鋅質的屋頂材料、水泥、化糞池、盥洗裝置——分發給各個家庭。我們稍后將詳細地考察這一事件，但是，這里需要指出的是，這筆基金的分配完全是由一個小型的“四人幫”按照黨派原則來分配的。這個“四人幫”非正式地控制了塞達卡的巫統和村莊發展委員會。這四個人是巴塞爾、達烏德（村長的兒子）、卡里姆和法齊勒。在1980年初，無需進行詳細的調查，只要隨意地沿著村莊的小路漫步，就可以看出村中每個家庭的政治歸屬。那些有新屋頂、墻上有新木板以及（或者）有新廁所的家庭都依附于巫統，而剩下的家庭都是伊斯蘭教黨的支持者。

因此，對塞達卡的巫統成員的社會學分析相當簡單明了。在塞達卡，巫統被一些富裕的家庭所操控，這些家庭充分利用了他們的地位所帶來的各種利益，這些利益幾乎全是來自政府的某種資助。而巫統的普通成員大都來自與這個小寡頭群體的成員有密切關系的家庭，或者來自經常為這些寡頭所雇用的家庭。塞達卡最窮的16戶巫統家庭中，有10戶跟同黨派的一些富戶在血緣、婚姻或者是雇用關系上有密切的關系，這種關系即使不能被解釋為一種黨派忠誠的表現，它至少強化了對黨派的忠誠。[[218]](#_218_17)在塞達卡村，巫統只是親屬關系和庇護關系龐大鏈條中的最終環節，這一鏈條可以延伸到街道、地區、乃至國家。在村莊之外，親屬關系的重要性消減了，庇護行為變得極為重要。巫統的地區領導人是不均衡地從政府官員、學校教師和依靠國家貸款和項目盈利的富戶中選拔出來的。雖然黨組織上層的利害關系自然而然地比基層的要大，不過，在各個層級中，確保組織結構不受影響的因素顯然都是相似的。

盡管成為巫統成員的好處是非常明顯的，但是村中仍有許多伊斯蘭教黨的成員。雖然作為一個機構，反對黨很難稱得上興盛。在10年以前，塞達卡村的大多數村民都是伊斯蘭教黨的成員。然而，就是從那時起，村長哈吉·加法爾和一些出于戰略考慮的村民都改變了政治立場。此外，那些新遷入塞達卡的家庭也選擇了加入巫統。在1978年大選之后，向執政黨轉移的潮流突然得到了強化。此時，吉打州政府開始整頓各個村莊的發展委員會，以保證發展委員會的成員都來自巫統。在一些仍然由伊斯蘭教黨控制的村莊，吉打州政府或者取消了村莊發展委員會，或者更普遍的是，指定一兩個巫統家庭參加發展委員會。在塞達卡，巫統由此得以排除了村莊發展委員會中的兩名伊斯蘭教黨成員，盡管這兩人已經被選舉進了發展委員會。這兩名伊斯蘭教黨成員在此之前幫助保持了村莊領導層的超黨派性。從此，伊斯蘭教黨在地方社會的處境變得十分慘淡。除了喪事互助會——他們為成員支付葬禮的費用，以回報成員每年的會費——塞達卡的伊斯蘭教黨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有關消極抱怨、社會回避（social avoidance）和人身攻擊的事物。雖然很多伊斯蘭教黨成員都在回避巴塞爾，抵制他的商店，但是，公開的對抗是很少見的。伊斯蘭教黨的成員有他們自己關于村莊發展委員會的惡作劇。他們把這個惡作劇稱為jangan kacau kerja kami，翻譯過來就是說，“不要插手我們的事務”[[219]](#_219_17)。

盡管擁護巫統可以獲得一些物質利益，但讓人非常驚訝的是，在塞達卡，數量巨大的少數派抵制住了各種利益的誘惑。（參見表4.11）

表4.11 塞達卡家庭的政治派別與收入水平（以百分比計算）交互分析



反抗主要發生在村中最窮的那些人當中，窮人參加反對黨的比率是富人參加反對黨比率的兩倍。考慮到加入巫統帶來的好處，大多數村民本應加入巫統，如果村民這樣選擇的話就沒有什么需要說明的了。但是，為什么大部分的窮人（還有少數富人）不顧他們的物質利益，選擇留在了伊斯蘭教黨的陣營？對他們的這種選擇，我們需要做一些說明。似乎有那么幾個原因。一個原因是村莊的黨派模式扎根于更古老的、以家庭為基礎的宗派，這種宗派早在政黨形成之前就已經存在了。例如，村中最富有的人哈吉·卡迪爾同他的父親以及兩個兄弟在村莊政治中擔當少數派的角色至少有30年的歷史。但是，因為這4戶家庭都屬于富戶，所以，這只能解釋他們堅持“領導”伊斯蘭教黨與巫統對峙的原因，而不足以說明為什么伊斯蘭教黨能夠吸引那么多窮人。要想解釋這一現象，我們應該考慮家庭紐帶、特殊的物質利益、巫統的治理策略以及反對派的道德吸引力這些因素的綜合。因為家庭紐帶的關系，在至少4個或5個案例中，兒子入黨都是因為父親（往往都不是本地居民）是公開的、堅決的伊斯蘭教黨支持者。但是，在巫統的成員中，沒有發現一例這樣的情況。20戶最窮的伊斯蘭教黨家庭中只有7戶人家其親屬或雇用關系能夠解釋人們參加反對派的行為。更明顯的是，至少有5戶比較貧困的家庭，他們的黨派歸屬和他們表面上的經濟利益是不相容的。換言之，他們是伊斯蘭教黨的成員，卻依靠巫統成員提供的工作機會維持生活。

其次，除了最貧困的家庭，很多伊斯蘭教黨的支持者都是長期向伊斯蘭教黨名義下的喪事互助會交納會費的會員。如果他們離開伊斯蘭教黨，他們將自動失去享受喪葬補助的權利，而他們已經為了這種喪葬補助付出了大量的投入。伊斯蘭教黨成功地將傳統的社會保險方式同成員資格結合起來。事實上，伊斯蘭教黨的這一成功促進了巫統近來對這種模式的效仿。

第三，巫統在村里的發展策略并不強力地鼓勵伊斯蘭教黨成員退黨。塞達卡執政黨的領導們似乎采納了博弈理論家關于“最小優勝組合”的策略。他們已經成功地控制了村莊，所以他們并不急于在數量上發展自己已經占據優勢的隊伍。如果人數壯大，巫統成員既有的物質利益就會受到損害。

第四，雖然從物質上來講，加入伊斯蘭教黨不會獲得什么好處，但是，這個政黨有可觀的道德吸引力。這種吸引力的一小部分是源于伊斯蘭教黨要求成員忠誠于伊斯蘭教義的聲明。在這方面，塞達卡的伊斯蘭教黨跟執政黨相比并非更遵守規范或更正統。確切地說，這里包括的是階級問題、民族和宗教情感、民眾對政府政策及其引起的不平等的普遍的反對等等所有這些的結合。這種結合并不驚奇，因為伊斯蘭教黨是馬來西亞社會可以容忍的——只是勉強容忍的——唯一公開的成組織體系的反對黨。[[220]](#_220_17)地方上貧窮的伊斯蘭教黨成員談起巫統的時候，他們并不是指巫統的普通成員，巫統的普通成員中的許多人和這些貧窮的伊斯蘭教黨成員一樣生計艱難。伊斯蘭教黨成員談起巫統的時候，他們所談論的是控制著塞達卡村的富戶以及一個由政府雇員、富有地主和跟這些人有聯系的商人構成的控制這一地區巫統的聯盟。對于這些伊斯蘭教黨成員來說，巫統就是“富人”和“政府”的同義詞。雖然伊斯蘭教黨并未獲得對吉打州的控制權，但是它吸引了很多貧窮的農民，因為在這些農民看來，伊斯蘭教黨是“充滿宗教色彩的捍衛農民利益的民眾運動”[[221]](#_221_17)。塞達卡的伊斯蘭教黨的成員強調，他們僅僅代表了一個種族和一種宗教，而巫統及其同盟恰恰不能捍衛馬來西亞人和他們的宗教。大多數貧困的伊斯蘭教黨成員所理解的種族問題和宗教問題是跟他們對于階級關系和小農危機的討論聯系在一起的。因此，我們將看到，關于剝削、工作機會、土地、慈善活動這些重要的物質利益的觀念，都是用馬來西亞社會的本土觀念以及伊斯蘭教的宗教行為規范表達出來的。說巫統只保護富人的利益，很少或者根本不幫助最窮的農戶，實際上也就是說他們背離了馬來西亞和伊斯蘭的價值觀。[[222]](#_222_17)

最后，我們不應該忽視伊斯蘭教黨成員的驕傲和剛強，這使他們在犧牲物質利益的情況下也不會轉換陣營。由于已經堅持了這么長的時間，按照巫統領導人的說法，伊斯蘭教黨成員現在是“把必須做的事裝成出于好心做的”（make a virtue of necessity），伊斯蘭教黨成員不愿意放棄因為追隨一條為了原則并犧牲物質利益的政治路線而帶來的公開的和私人的滿足。這種氣氛是如此強烈以至于貧窮的塔伊布沒有改換陣營，因為他擔心他的機會主義會遭到伊斯蘭教黨朋友的蔑視，盡管塔伊布告訴他的朋友在他妻子力勸他時他曾經有過這種想法。最近塞達卡村中明顯的黨派偏見事件，比如干旱救濟項目以及“村莊改進計劃”，如果說有什么成效的話，那就是增加了伊斯蘭教黨成員的怨恨，強化了他們的決心。

和伊斯蘭教黨對抗的是一些富戶的強大聯合，這些富戶壟斷了社區中巫統的事務（參考附錄C，表4）。那11位現在是或曾經是村莊發展委員會成員或官員的村民，平均耕種13里郎的土地（將近村莊人均耕種面積的3倍）。而且，除了1個人之外，這些人都來自村莊相對富有的那一半家庭。[[223]](#_223_17)另一個促進了這些人政治傾向的紐帶是，這11個人中，除了兩個人以外，都從政府那里得到了就業機會、執照或者貸款。[[224]](#_224_17)在一兩個案例中，這種紐帶是先于他們的政治活動的。而對于其他人來說，這些紐帶是他們做了一項有利的政治選擇之后所獲得的回饋，最初或許僅僅是政治偏好，受到了物質利益的強化，以至于這種選擇幾乎無法逆轉。

先前提到的“四人幫”不僅控制了巫統，也掌握了當地的農會和宗教委員會，這四個人之間有密切的親戚關系。比如，巴塞爾是村長哈吉·加法爾的外甥（村長的兒子也是這個團體里的一員），同時也是另一個成員的舅舅和巫統地區黨支部領導人的侄子。巴塞爾的祖父還是塞達卡所屬的雙溪達汶分區的行政長官，巴塞爾的兄弟則是情報部門在地方的全職工作人員。巴塞爾成功地利用他的財富、他的家庭關系和他相當大的個人能量，達到了對地方巫統和村級農會組織的幾乎不可挑戰的統治。此外，巴塞爾還是坐落在凱帕拉·巴斯塔鎮的政府小學、私人宗教學校、清真寺、合作磨坊、附近市場的執行委員會的成員。巴塞爾出眾的才能不僅受到“四人幫”內部其他人的承認，同時也使塞達卡名義上的村長哈吉·加法爾顯得黯然失色，最終哈吉·加法爾選擇做一個受尊重的旁觀者。

與他們在地方的競爭者相比，巫統的領導層并不僅僅是或者說甚至不主要是因為他們的經濟實力而顯得突出。伊斯蘭教黨領導階層也很富有，盡管這些人只代表了“眾多”家庭中的少數。[[225]](#_225_17)現在，巫統領導階層的明顯特征是，他們的家庭日益依賴各種形式的國家資助；同時巫統的領導層也能夠接近分配那些資助的機構或個人：比如農會、分區的長官、小學、地區辦公室等等。當然，巫統領導層的影響力并不僅僅依靠這些資助。親屬關系仍然將許多領導人相互聯系起來并將某些領導人與一部分普通成員聯系在一起。“喪事互助會”、提供筵席器皿的“碗碟社團”以及鄰里之間輪流的“信貸協會”，所有這些基本上沿著政黨路線發揮作用的傳統村莊機構使得家庭的紐帶更加復雜并得以進一步擴展。

然而，現在村莊生活中最大一塊的缺失是十年前由租佃、雇用和救濟等物質聯系而形成的社會凝聚力。在雙耕以前，庇護關系主要是村莊事務，巫統的上層家庭是庇護者，而被庇護者自然是這些家庭的雇員、佃戶以及債務人（這些身份可能指向同一群人）。就像我們所看到的，雙耕帶來的經濟機會已經大大削弱了（如果不是取消了的話）這種領導權的傳統基礎。由于村中的窮人在稻米生產中已經幾乎是多余的，他們隨之在社會上也變得多余了。換言之，如果說塞達卡的富人現在花費較少的時間和精力來“培育”他們比較貧困的鄰居，這恰恰是因為，這些貧窮的鄰居不再耕種富人們的田地了。

窮人的選票仍然很重要，不過，這些選票已經無法通過預先存在的社會經濟紐帶而自動得以確保了。至少，從政治上來說，總是在塞達卡占據領導地位的富人，現在愈發是由不獨立的中間人組成的，而不是由憑借自身能力的庇護者組成的。現在這些占據領導地位的富人所支配的資源，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直接從國家那里“借來”的。這些富人對村莊生活的社會控制正在減弱，這些資源可以為他們提供必要的資金以加強這種社會控制；但是，因為同樣的原因，富人們已經變得更加脆弱。現在這些富人的命運很大程度上并不掌握在他們自己的手里。只要馬來西亞繼續發展、政府的財政收入繼續增加、渴望鄉村支持的國家領導繼續當政，這些富人就不會碰到真正的危險。然而，如果這些保證他們地位的前提一部分或全部不再存在了的話，那么，這些富人就會發現他們自己將處在嚴重的困境之中。

# 第五章 勝利者和失敗者眼中的歷史

任何顫抖——哪怕它發生在無助者和受傷者的身上——都有可怕的一面：停留的針刺正在收集毒液。

喬治·艾略特：《丹尼爾·狄隆達》

## 分類[[226]](#_226_17)

上一章對土地控制（land tenure）、收入、機械化、政治權力的詳細敘述對非常有限的目的而言可能是充分的。至少，它清楚地表明了，當代農村的“一系列”變化——商業化、資本、灌溉——如何影響了一個小地方的生產關系。然而，如果僅僅局限于此，我們就只是給大廈加了一塊磚。關于綠色革命對地方的影響，到目前為止這幢大廈只講述了一個人們熟悉的而且多少有些令人沮喪的故事。

作為社會史（或者說人類歷史），前面的敘述是不充分的。對工廠中生產線的技術特點和一個組織的架構圖進行描述的社會史，僅僅只是勞動力的社會史。換句話說，上一章僅僅勾勒了塞達卡農民不得不與之搏斗的一些確定的狀況。

如果事件不是自明的，如果它們無法自我說明，那么，人類主體也無法完全自我說明。如果人們可以完全地自我說明，那么，只要打開錄音機，然后向讀者提供一份完整的錄音記錄就足夠了。不過，有人確實嘗試過這種“社會科學家作為錄音機”的技術，并產生了一些富有啟發性的結果，其中，最為有名的就是所謂的“人類學的奧斯卡·劉易斯學派”。但是，即使是奧斯卡·劉易斯也發現，對錄音記錄進行整理編輯并加上前言或后記是非常必要的。我認為，這種必要性至少有三個理由。第一，人們自己在說話時通常會使用一種語言學意義上的簡略表達，比如微笑或者使用暗喻。對于這些，說話的人是不需要向他們的鄰居進行解釋的，但如果不說明，局外人就會對這些微笑和比喻感到迷惑不解。因此，如果我們不認識塞達卡村的拉扎克，我們就無法了解，當塞達卡的某人說另一個村民“行事像拉扎克”是什么意思了；同樣，如果我們不了解美國的棒球運動，當美國人說某人在找工作時“三擊不中球手出局”（struck out），我們也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第二，意義及其連貫性是處于更大的規范之中的，但在日常話語的想當然世界中，人們只要“知道”這些規范就可以了，而無須用言詞將這些規范表達出來。葬禮中的禮儀標準，還有在特定場合下對適當禮物的期待，都屬于這種情況。這些行為標準通常扎根于行為模式之中，只有當這些行為標準的表現成為爭論的焦點時，也就是說這些表現不再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時候，人們才會給出具體的說明。第三，觀察者會發現一些特定的主題和價值，這些特定的主題和價值似乎會把在其他情況下可能屬于相互分離領域的實踐、信仰、話語統一在一起。在一些地中海社會中，關于“男子氣概”的理想型（ideals of "manhood"）也許就是一個恰當的例子。[[227]](#_227_17)在這里，觀察者正在創造這樣一種綜合或解釋，這些綜合或解釋或許同記錄的事實一致，但不大可能曾經被創造這些記錄的人有意識地思考過或談論過。這種解釋，正如格爾茨所說的，是“我們對于其他人（我們討論的那些人）關于他們自己和他們同胞狀況的建構的建構。”[[228]](#_228_17)

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評價這些建構”這樣的問題必然會出現。在什么基礎上，一種建構優于另一種？概念基礎在這里是不可靠的，此外，從自然科學的嚴格意義上講，論據也是無法找到的。然而，一些關于證明和推論的標準是可能的。這些建構應該是實用的，至少要與它們試圖揭示的實踐和信仰保持一致。此外，這些建構也要弄清楚在人類行動的記錄中跟自己無關的或反常的數據是什么樣子，正是從這種意義出發，一些建構要比跟它競爭的其他建構更優越。一種評判各種解釋的最終標準一直是許多爭論的焦點，即原則上，我們的解釋或描述應該是被那些其行動被我們解釋的行動者認為看起來是可靠的。當然，這里的問題在于不僅所有的行動者都有隱藏或歪曲自己意圖的利益考慮，而且，這種標準也必須應對弗洛伊德學派的學說——許多動機行動者自己是無法了解的——和“虛假意識”的觀念。因而，認為行動者應該證實我們對他們行動的建構的想法是不現實的，但是，我們能夠堅持，我們的解釋應該考慮行動者提供的所有自我描述。

過去十年對于塞達卡的村民以及他們在穆達平原上的同胞來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人們已經很難再找到另外的十年能像這十年那樣——物質生活和生產關系發生如此引人注目的變化，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的舊模式被徹底地拋進無序的狀態之中。[[229]](#_229_17)所有的村民都不得不掌握、理解或解釋這些事實。村子里發生了什么？有什么意義？誰應該受到譴責？所有這一切預示著什么？一點也不奇怪，塞達卡的村民們在這些問題的看法上有很大差別。這些解釋因村民的個性、年齡、地位、以及至少是他們的產權關系——也就是說他們的階級狀況——而有所不同。“被刺死的是誰的公牛”（whose ox is being gored）是造成不同解釋的關鍵。沒有人會期望一個無地的雇工會像大農場主那樣泰然自若地或滿意地看待聯合收割機。然而，無地雇工和大農場主的不同經歷和利益各自形成了同一社區話語的一部分。他們對于事件截然不同的、甚至矛盾的理解都試圖與對方對話、試圖引起對方注意；另外，這些不同的理解是被所有人都可以利用的同一文化素材所形塑的。

因此，本章之后的內容以及下一章節將試圖描繪和分析剛開始時在塞達卡村這種關于階級的新經歷是什么樣子的。

如果說在上一章我是以經濟史或者社會史學者的眼光對綠色革命的影響進行了考察，那么，在這一章里，我打算分別從勝利者和失敗者——這兩類村民的有派別性的眼光考察同樣的事件。根據談話對象的不同，這里至少有兩場綠色革命在發揮作用。然而，在深入探討之前，我們應該明確的是，階級并不是村民唯一的社會經歷。且舉幾樣東西來說吧，宗派、鄰里和親屬紐帶，也造成了各自的分裂線，而這些并不總是完全和階級一致。作為同一族群、同一宗教、同一村莊、同一經濟門類（稻田經濟）的成員，村民也經常因為某些目的和他們的對手聯手。取決于不同的問題及相應的背景，這些別樣的被體驗到的自我可能是決定性的。盡管，不可否認的是，產權關系在雙耕之后變得更加明顯，但是，產權關系卻總是相當混亂，不能像其他銳利的“社會學解剖刀”一樣把村莊齊整地分為兩三個部分。1972年以來的各個方面的變化對“勝利者”和“失敗者”的定義是不同的；例如，那些希望通過租入土地來擴張自己農場的小土地所有者可能和窮人一樣痛恨長期契約租佃，但是，這些小土地所有者并不像窮人那樣仇視聯合收割機。此外，就像我們將要看到的那樣，綠色革命帶來的變化在村莊社會分層中的上層和底層都積累了足夠的影響，這為某種類似階級觀念的東西的產生提供了經驗基礎。

在這里的分析中，“窮人”一般指村中人均收入最低的那37戶人家。反過來，“富人”指的是人均收入最高的那25戶人家。[[230]](#_230_17)不過，雖然同總收入和擁有的土地總數相比，人均收入水平這一概念本身是對當地的階級位置的一個較好的量度，但是，它仍然造成了一些同當地看法不一致的異常個案。在這些個案中，我遵循了當地看法，因為在更廣泛的意義上，當地的看法似乎比我的數字更加精確[[231]](#_231_17)。因而，下面接著要分析的那些有分歧的觀點，反映了窮人和富人之間最顯著的差異。除去“共識區域”（zone of agreement），我將只探討那些將窮人和富人分別開的對雙耕及其后果的看法，這些看法在每個群體中都得到了相當多人的支持。

在一個深深植根于更大經濟體系的村莊中，村里稻田的一部分是外村人所有的，村民們也會到社區外去尋找工作和土地。在這樣的村莊中，階級問題不可能僅僅局限在當地的范圍。然而，在當地，下面的這些問題中有許多都會清楚地表現出來。生產關系中的許多種變化，如機械化、預付地租、福利的下降、工資率的變化，都為窮人所怨恨。就像每種怨恨總有其外在目標一樣，這種怨恨也幾乎總有相應的地方目標。就少數最明顯的階級問題而言（比如，引人注目的長期契約租佃），在當地，幾乎是沒有對抗者的。在這些事件中，“勝利者”基本上在村莊之外，而絕大多數村民基本上相互保持一致，但是，如我們將要看到的，他們這樣做時懷著程度相當不同的熱情。

## 夜行船[[232]](#_232_17)

對塞達卡目前事態的兩種簡短解說將有助于闡明前一章提到的事實如何可以具有非常不同的意義。我選擇用對目前事態的這兩種不同的解說來突出這些論證的不同風格，并展現對目前事態的這兩種不同的解說反映出來的對比。但是，這兩種解說既不是差異最大的例子，也不是差異最小的例子。事實上，這兩種解說相當有代表性。我把這兩種解說呈現在此，只加上最少的解釋，那么，在“勝利者”和“失敗者”之間的更大話語背景下，這兩種解說所傳達的意義稍后就會變得明朗。

帕克·亞赫是一位沒有土地的雇工，他有8個孩子。帕克·亞赫總是艱難地維持收支相抵的生活。帕克·亞赫的處境不僅反映在他的居住條件上，他的房子只比拉扎克的好一點；帕克·亞赫的這種處境同時也反映在他的綽號上。他被人們稱為“瓶子亞赫”（Yah Bottle）[[233]](#_233_17)。帕克·亞赫每天下午騎自行車回村尾的家時，差不多都有一個烹飪油的油瓶在他車筐里，那個油瓶總會發出一些聲音。帕克·亞赫的綽號就跟油瓶的這種聲音有關。這個綽號同時也暗示了帕克·亞赫的貧窮，因為他幾乎從來不能購買超過30馬分的物品，所以他不得不每天都去買油。跟拉扎克不一樣，帕克·亞赫是一個公認的老實可靠的雇工。我曾聽到過他忿忿地抱怨，他很難找到工作，也無法租到一小塊土地。然而，這一次，他比以前更加憤怒了，因為最近由巫統領導人分配的、作為“村莊改進計劃”一部分的房屋修繕津貼他一點兒也沒有得到。在同樣沒有得到津貼的兩個鄰居（諾爾和“瘦骨嶙峋的”瑪）的鼓動下，帕克·亞赫對村里的形勢進行了總體評價。

“那些富人正在把生計艱難的人拋到一邊”；“我們越想提高自己，我們就越會被推倒，（他們對我們）也就越殘忍”；“他們想要埋掉我們”。當帕克·亞赫說最后這句話的時候，他的手掌根部猛地推向了腳下的地面，好像要把什么東西推進土里。他補充說，“我們想提高一點兒”。為了說明他的意思，帕克·亞赫指出：在過去，從富裕的村民那里借一些大米是可能的；而現在富人賣掉了稻米換成了錢，繼而聲稱，他們沒有錢。

最后的這一控訴，我從村中其他的窮人那里也聽到過很多次。這里需要做一些解說。傳統借貸與預付地租所使用的流通物通常是作為主食的大米，包括稻谷或碾好的大米，今天流行的現金在當時是十分罕見的。窮人似乎相信，試圖避免陷入窮人強求借債的困境是富人把稻米賣掉換成現金的部分原因。在賣掉絕大部分收成以后，富人們現在可以聲稱，他們剩下的稻米只夠自己一家吃的，而他們的錢已經花掉了。這種做法的額外好處是有助于隱瞞財富，因為一般來說，我們有可能知道人家的谷倉是否是滿的，但是很難知道他是否有錢。[[234]](#_234_17)

帕克·亞赫補充說，拒絕借貸表明，“那些富人的看法是，那些手頭缺錢的人都很卑鄙”。“他們不想讓我們大聲說話。”“他們不希望我們聰明一些。”“（但是）現在窮人開始有所行動，富人發覺這些（的時候），他們甚至更加憤怒了。”可以確定的是，有關“有所行動”的評論基本上是指那些公開的抱怨，這些抱怨針對的是對政府給的房屋修繕津貼的派性分配。

帕克·亞赫繼續說道，“他們說我們懶惰，但我們是沒有得到機會繼續接受教育或者得到政府的工作（比如說，政府移民計劃）”。“他們說我們不想工作，但是找到工作真是太難了。”這里，正如在別的地方一樣，帕克·亞赫和其他貧窮的村民說這些話時就像辯論或對話的雙方都在說話。在此，他先是說出了富人對窮人的譴責，接下來又逐條駁回這些譴責。此外，這種爭論是按富人窮人來分派角色的，盡管眼下激起帕克·亞赫怒火的問題是巫統和伊斯蘭教黨成員間的問題。巫統成員并不都是富人，而伊斯蘭教黨成員也并不都是窮人。

大概一個月后的一個下午，跟上面提到的那次談話幾乎相同的一群人聚集在帕克·亞赫的屋檐下，我正在聽他們的談話。這一群人對按政治派系分配政府房屋修繕津貼依然怒氣沖沖。他們的怒火尤其集中在分配津貼前進行的住戶調查，他們認為這次調查是欺詐性的。辦事人員問的一個問題是，“你在哪里上廁所？”帕克·亞赫蹲在地上，摸著腳后跟，然后說，他甚至“不得不拉在其他人的地里”。按照村里的說法，這種表達意味真正的貧困。

然而，在發錢的時候，很明顯，那次調查已經成了個笑話。正如帕克·亞赫所言，那次調查“被扔到垃圾堆里了”。他還做了一個辦事員用食指查閱名單時的手勢。“他們說，帕克·亞赫很富有，杜拉很富有，甚至蘇庫爾也很富裕。”這些聚集在一起的人認為這種說法很好笑，因為他們知道，這三戶都是伊斯蘭教黨支持者，而且是村里最窮的人家，但他們一點資助也沒收到。帕克·亞赫繼續他的描繪，“他們說，勒拜·彭德克很窮，沙姆蘇爾窮得他們不得不給他一些粉刷房屋的涂料，阿布·哈桑也窮。”當然，這三個人都來自村里最富有的巫統支持者，但他們都收到了津貼。這種嘲弄之所以是如此尖刻，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村里的巫統領袖肆無忌憚地忽視他們的黨派表面上公正的、客觀的程序，這一切不過是為了犒勞他們自己及其追隨者。然而，這個問題再一次以窮人和富人之爭、以富有的巫統領導歪曲事實的面貌呈現出來。

但是，如果我們簡要地聽聽其他村民的說法，我們就會聽到一個截然不同的故事。這個故事的場合非常獨特。跟我和村民的大多數談話不一樣，這只是一個無意中的偶遇。有天晚上，哈吉·卡迪爾、他的妹夫托·卡西姆和他的女婿加扎利，坐下來和我聊天，顯然，他們有一些他們一起商量好了的話要告訴我。他們到來的情境無疑非常重要。此前的兩個星期，我花了很多時間跟村里的許多窮人一起給水稻脫粒。[[235]](#_235_17)在工作期間，我逐漸了解了許多先前只是略有耳聞的貧窮家庭。這些貧困家庭對聯合收割機導致工作機會喪失和先前給予打谷者的“慈善”收入的減少都很關注，這些關注都涉及到了我已經開始向其他村民詢問的問題。哈吉·卡迪爾他們三個人似乎擔心我得到了錯誤的消息；他們是來糾正我的錯誤的。[[236]](#_236_17)就像有人猜測的那樣，這三個人根據村里的標準都是富人。哈吉·卡迪爾（高利貸先生）當然是村里最富的人；他的女婿加扎利耕種著8.5里郎土地，而且將來能繼承這些土地中的大部分；而哈吉·卡迪爾的妹夫托·卡西姆則耕種著6里郎土地，其中絕大多數都是自己的。

哈吉·卡迪爾用一個反問開始了他的談話。他問：“為什么有些人其實很富有，而我們卻說他們是窮人？而另外一些人其實很窮，我們卻說他們是富人？”他進而用一些精心挑選的例子回答了他自己的問題。“像卡米勒，他根本沒有任何財產，但他會設法掙一些錢，因為他足智多謀。”“再比如說瑪·吉爾，他雖然沒有地，但也很足智多謀。”這兩個例子都具有很強的傾向性，并且都是經過精心挑選的。塞達卡有5戶人家沒有土地，也沒有繼承什么財產的希望，但是他們都有一些收入，因此這5戶人家比村里的中等人家還要富。卡米勒和瑪·吉爾就是這5家中的2家的戶主。卡米勒幾十年來都是塞達卡最大的承租人，他現在耕種了15里郎肥沃的土地。而瑪·吉爾盡管只耕種了2里郎土地，但他有一份穩定的令人羨慕的工作：他受雇于附近鎮上的一個成功的華裔小商店老板兼稻谷商人。卡米勒和瑪·吉爾兩人都有能力為他們的大家庭提供舒適的生活。這兩人都是明顯的例外，因為在鄉村中普遍的規則是：土地的擁有是財富的基礎。哈吉·卡迪爾也暗示了：卡米勒和瑪·吉爾兩人遠遠沒有那些有土地的人收入穩定，并且，卡米勒和瑪·吉爾他們必須辛勤工作才能掙得這些收入。

在列舉了沒有財產但憑借他們的足智多謀也能生活不錯的這兩個案例后，哈吉·卡迪爾開始討論硬幣的另一面。他此時舉的例子是哈姆扎和哈姆扎曾經很勤快的哥哥拉扎克。哈吉·卡迪爾說，“他們有財產，他們有土地，”“多達二三里郎，多到他們可以像大地主一樣把土地租出去。”哈吉·卡迪爾指出，假使哈姆扎和拉扎克足夠聰明且能提前考慮清楚，那么，他們就能親自耕種這些土地，每年收獲20到30麻袋稻谷，而這些稻谷足以養活他們的家庭。他們無法養活自己家庭并不是因為他們的貧窮，而是因為他們不夠“足智多謀”。哈吉·卡迪爾得到了他的同伴的極力贊成。又一次，這些例證是被精心挑選的。塞達卡村里最貧窮的14戶人家當中只有5戶擁有土地，拉扎克家和哈姆扎家就是其中的2戶。嚴格來說，拉扎克和哈姆扎兩人其實并不擁有土地，因為他們如要要從他們那故去已久的父親那里繼承土地，必須支付一些費用以及伊斯蘭的遺產稅[[237]](#_237_17)，而他們根本沒有足夠的資金來支付這些費用。哈姆扎的母親讓哈姆扎租出去2里郎土地，哈姆扎是否能夠獲得那2里郎土地的所有權這一點同樣也并不清楚，因為他母親住在外村的兩個兒子也有權擁有這塊土地。在這種情況下，哈姆扎租出了他那2里郎的地，這就像拉扎克把他的0.25里郎土地租出去一樣。拉扎克和哈姆扎兩人都聲稱，由于1978年干旱歉收時的工作喪失、龐大的家庭，還有打短工的工資收入減少，所有這些都使得他們根本不可能擔負得起種植水稻的全部花費。事實上，哈姆扎在1977年灌溉季種了莊稼，但他說，為了養家糊口，他不得不在收獲前賣掉未收割的稻谷。然而，哈吉·卡迪爾及其朋友顯然認為，是因為目光短淺，而不是貧窮，使哈姆扎和拉扎克變成了低微的土地所有者。究竟誰的說法是對的？這是一個會引起強烈爭論的問題，單憑經濟上的證據并不足以解決這個問題。

托·卡西姆和哈吉·卡迪爾想當然地認為拉扎克狼藉的名聲解釋了拉扎克的情況，所以他們隨后特別提到了哈姆扎的例子。盡管他們沒有說哈姆扎很懶惰，但他們的確聲稱他“不是很勤快”。托·卡西姆說，“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始終不愿意給他資助或者工作的原因”。“他有財產；他和我們一樣。”隨后，我問道，誰是村里的真正窮人？經過一些討論后，他們提出來三個可能的候選人——帕克·亞赫、曼蘇爾以及“瘦骨嶙峋的”瑪。他們說，如果生病沒法工作的話，那么這三個人都將“玩兒完”。他們說，剩下的人或者要么不是那么窮，要么是不夠足智多謀。

在被我的問題轉移了片刻視線之后，哈吉·卡迪爾再次回到了主題。他重新談起了那些惡意地要求工作或救濟的人身上。哈吉·卡迪爾以他在燕鎮的侄子哈希姆為例來說明。哈吉·卡迪爾說，哈希姆總是在收割前到塞達卡村來，然后說他將幫忙脫粒，并且要求提前領取一部分工資。然而，當脫粒工作就要開始了，哈希姆通常卻會去臨近的玻璃市州的梅加德瓦（Megat Dewa）地區，那里工資和額外的扎卡特（zakat）饋贈都要更高一些。哈吉·卡迪爾還說，有一次，在拿到了一部分預付工資后，哈希姆在一天晚上告訴哈吉·卡迪爾準備好第二天早上的咖啡，因為他要來幫助脫粒。可是，第二天清晨，哈吉·卡迪爾發現哈希姆沿著運河去了塞達卡南部，去給別人干活。哈吉·卡迪爾還懷疑，自己和其他兩個親戚在齋月前給哈希姆的大米很可能是被賣掉了，而不是被吃掉了。哈吉·卡迪爾曾有一次告訴哈希姆，他應該只向那些他幫助過脫粒的人家要求施舍大米。哈希姆卻依然如故，在過去幾十年中，哈希姆每年都會像時鐘一樣按時來要求施舍大米。當哈吉·卡迪爾表示可以把自己在梅加德瓦的一塊將近2里郎土地租給哈希姆種幾年時，哈希姆拒絕了。“他并不那么感興趣。”哈吉·卡迪爾總結說。

因此，哈希姆被認為是同拉扎克和哈姆扎類似。根據這種說法，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對工作感興趣；除非是乞求救濟或要求提前領取工資，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是足智多謀的。他們當中的某些人——如果不是所有人——是相當富有的。毫無疑問地，從他們的行為和擁有的資源來判斷，哈希姆他們這幾個人中沒有一個應該得到那些已經給予他們的同情和幫助。

帕克·亞赫的說法和哈吉·卡迪爾的說法相去甚遠，這兩種說法中所忽視的內容跟它們所包含的內容一樣重要。在這兩種說法中，在當前情形中的物質事實——工資率、田間工作的喪失、實際給予和接受的貸款及施舍——顯然是相對缺失的。或許這僅僅是因為這些物質事實都被想當然地當做常識了。然而，這里強調的是社會事實，即人們相互關系的性質。因此，當帕克·亞赫談到拒絕給予借貸時，他關注的并不是物質的損失，而是那些認為窮人都“很卑劣”的富人的態度。同樣，當哈吉·卡迪爾提及被迫借貸時，在公開場合他并不怎么強調他所付出的代價，而是更多地強調他所看到的那些尋求幫助的人的道德墮落。正如在拉扎克和哈吉·布魯姆的故事當中看到的那樣，這里有一個文本，這個文本表明了體面而適宜的社會關系應該是怎樣的。

同樣顯著的是，這些不同的看法都試圖同時根據人們真實的經濟狀況和社會聲譽來判定人們的位置。帕克·亞赫嘲笑村里的領導為了他們自己的目的而肆意扭曲關于貧窮與富裕的“事實”。哈吉·卡迪爾則非常努力地表明，大多數窮人都應當自己為自己的貧困負責，此外，哈吉·卡迪爾還努力地將真正的貧窮從偽裝的貧窮中區分出來。這場有關“事實”的斗爭為什么會在塞達卡的富人與窮人的對話中處于中心位置？這一點將隨著我們研究的推進而愈加清晰。

## 綠色革命的階級史[[238]](#_238_17)

關于階級的社會經驗的核心是要發展出對歷史的一種既獨特又共享的理解，這種理解使一個階級有別于其他的階級。總體而言，這些理解是一種共享的世界觀，而這種世界觀既體現了關于公正的各種標準，又體現了這些標準在過去及當前事件中的應用。例如，通過考察法國各階級對法國歷史的主要分水嶺——1789年和1848年革命、巴黎公社、人民陣線、維希政府、1968年五月風暴——的看法，我們可以得到法國各階級的世界觀。在塞達卡這個小小世界中，與雙耕有關的生產關系的轉變，就是這樣一個歷史分水嶺。這些轉變之所以對于階級關系具有決定性作用僅僅是基于這樣一個事實：這些轉變所產生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沿著階級界線劃分了勝利者和失敗者。作為一整套的歷史經驗，這些轉變為窮人和富人之間無聲的斗爭提供了基礎與場景。

盡管窮人最近幾年遭受了痛苦的挫折，但是不管是現在還是在可預見的未來，穆達平原都不會出現階級戰爭（class war）。可展望的前景僅僅是持續的階級爭斗（class struggle）、零星的反抗，還有我們已經目睹的言辭之戰。斗爭不可能升級，其原因有如下幾點：首先，近半數村民現在的生活要好于雙耕之前的生活。無論他們殘存的不滿與恐懼有多少，他們基本上都可以算是勝利者。其二，即使是那些時運不濟的人，他們的生存或生計也很少受到威脅。他們面臨的選擇，如緊縮開支、暫時或永久地移民、在村莊的邊緣生存（marginal subsistence），這些當然是痛苦的，但是這些選擇完全不像印度尼西亞或印度的農民所面臨的選擇那樣嚴峻。其三，在塞達卡以及吉打地區其他村莊中，社會結構不存在戲劇性的尖銳的反差：一邊是少數的壟斷地主階級而另一邊是為數眾多的未曾分化的農民階級。塞達卡并不是1910年的莫雷洛斯[[239]](#_239_17)。塞達卡的社會分層并非是一張從上到下的天衣無縫的網，塞達卡社會分層是多樣的，這足以防止團結一致的受害者軍團（a solid phalanx of victims）的產生。旁觀者和中立者在塞達卡總是存在的，這調和了在別的情況下可能會出現的更為尖銳的社會沖突。最后，地方沖突固然存在，但下面這一事實緩和了這種沖突：盡管存在階級對抗（class antagonisms），所有稻谷種植者事實上有著某種共同的利益（例如，馬來的政治支配以及對稻谷價格的高度支持）。所有這些因素造就了“普通”形式的階級爭斗，而非突發的劇烈沖突。

帶著這些限定性條件，我將從階級的角度簡要考察塞達卡綠色革命的經過。我試圖探尋，生產關系的每一個主要變化是如何被富人和窮人——勝利者和失敗者——體驗和解釋的？根據這些解釋，也就是根據這兩種解釋，我們有可能建構出村莊階級關系的圖景。

## 雙耕與雙重看法

迄今為止，有許多關于穆達地區雙耕制后果的研究，其中的一些相當出色。在反映國際捐贈機構和馬來西亞政府利益的同時，這些研究都涉及了生產、收入和經濟增長。整體而言，這些研究似乎為吉打州綠色革命的后果或多或少地提供了詳盡的解釋。

然而，我們不應該驚奇的是，無論是就論調還是就內容而言，雙耕這出戲的真正參與者對于雙耕的整體評價同官方的說明有很大的出入。畢竟，參與者有其自身狹窄的、樸實的關注。同樣我們不應該驚奇的是，富人對雙耕的看法同窮人的看法有相當大的差別。如果有人就雙耕的影響詢問村民，那么，作為普遍共識的核心區域（a core zone of general agreement）會讓位于爭執區域（a zone of dispute）與異議區域（a zone of differences）。正是在后兩個領域當中，階級是決定性的。

事實上，每個人都同意，雙耕帶來了某些好的變化。他們會提到房屋的重建及修葺，他們會談到1972年以前只有兩個最富有的村民才擁有摩托車，而現在許多比較富有的村民都有了摩托車，而且，現有的道路和公交服務允許他們去拜訪亞羅士打城以及附近的親戚。然而，使這些受人歡迎的便利黯然失色的特大新聞是，在塞達卡村民們的記憶中，第一次村里的每一個人都有足夠全年食用的大米。即使富有的村民也不會忘記提到這一點，因為他們依然能夠記起莊稼歉收之時，他們的糧食供應也用盡了。當然，對于窮人而言，在塞達卡，總是折磨農民的基本擔憂幾乎都不復存在。“即使是窮人現在也可以維持生活了，他們現在有吃的了”（杜拉）；“有足夠的米可吃了”（蘇庫爾）；“大米再也吃不完了”（華喜德）。所有這些話都第一次進入了窮人們的頭腦中。他們隨后對最近困境的抱怨正是發生在這一主要成就的背景之下。然而，即便閱讀成堆的政府報告，人們也不可能發現農民對這一壓倒性單一結果達成了任何共識。

在這一狹小但重要的共識區域之外，各種評價有所差異。無論是塞達卡的富人還是窮人，他們對雙耕帶來的變化并不是完全充滿熱情。考慮到窮人新近經歷的挫折，他們的抱怨是在預料之中的。然而，大農場主的抱怨卻有些奇怪，因為他們是這一頗受贊揚的計劃的主要受益者。最初，人們傾向于將怨言歸于只愿意接受好運這種普遍的人類（至少是農民）特性，但是這些抱怨的本質揭示了一種明顯的階級視角。富人們最重要的怨恨是——他們再也不可能購買土地了。因此，哈吉·卡迪爾說，情況在灌溉改革“以前要好得多”，那時“我們可以攢錢，買1里郎地只花1000馬元”。租種了15里郎土地的卡米勒抱怨說，他現在還比不上十年前富裕，他再也無法得到土地了。這里所反映出來的懷舊并不僅僅是懷念每里郎土地只有1000馬元的時光，而且也是懷念貧窮的小土地所有者會因為欠債而將土地交給債主的時光。事實上，這就是哈吉·卡迪爾等人致富的手段。而卡米勒則認識到，這種社會流動的渠道已經對他關閉了。

富人們的怨言不止這些。他們抱怨高額的生活成本，他們抱怨在農忙時很難找到幫手，他們抱怨使用幫手的成本太高，他們抱怨即使是他們也不得不經常貸款。富足的村民偶爾也會以更加懷舊的心情惋惜，他們失去了昔日曾經享有的在收獲和下次種植期間的閑暇與娛樂，那正是他們較為貧窮的鄰居通常到外地去找工作的時候。現在，他們整年都異常繁忙。他們尤其懷念在1972年以前為農閑時節增加光彩的小型筵席、游戲以及伊斯蘭吟誦。[[240]](#_240_17)這樣的哀怨通常不怎么強烈，因為沒人愿意為了復興這些文化禮儀而放棄下一季的耕種。

當談到雙耕對他們經濟情況的影響時，村里大部分農場主的評價都奇怪地與前面提到的狹小的共識不相符。從他們的收入和財產來判斷，所有這些家庭都獲益匪淺。然而，他們當中的許多人都認為沒有改善；他們說生活和以前沒什么區別。如果你刨根問底，他們可能就會稍微松一松口：“我稍微好過了一點”；“我們不必再那么精打細算了”；“我們可以有足夠的食物了。”盡管如此，在談到灌溉給村里的窮人帶來了什么時，這些人就會十分健談。根據他們說的，窮人現在已經過得不錯了。他們中的一個說，“自從種植季有變化以來，即使無地的雇工都在用摩托車”。另一個抱怨勞動力花費提高的人則堅持認為，靠打短工為生的人生活已經變得如此舒適，以致這些人可以非常挑剔了。農場主總是說窮人現在和雙耕前的富人一樣舒適。事實上，這些農場主一方面極大地掩飾了他們自身獲得的好處，另一方面夸大了窮人的好日子——我們將會一再看到這一模式。

對那些處于更加不穩定情況中的村民而言，事情變得更為直截了當。在承認他們基本糧食供應可以確保之后，這些人通常都會進而強調他們的前景日益惡化。如同哈姆扎提到的，“我無休無止地工作，（卻）看不到生活變舒適的希望。”哈姆扎和其他跟他處境相似的人把富人的大量收益同他們向家庭提供必需品的艱難進行了對比，這些必需品包括魚、衣物以及學校教育等花費。在富人抱怨沒有閑暇的同時，窮人卻有一個相對應的抱怨：他們沒有工作。這些人能夠而且確實詳細地說出了誰曾經雇用他們、給了他們多少錢，并以此與當前缺少工作情況下的收入進行比較。對這些村民來說，轉折點并非雙耕的開始，而是聯合收割機的進入，這一點是和富人不一樣的。因為大家的經歷是不一樣的，所以大家對于時間的感知，對自己生命歷程中重要時日的感知也必然不同。確實，這些村民中絕大多數人的生活肯定不會比灌溉規劃實施前更差。然而，他們目前的參照點是雙耕引入的頭四五年（1972—1976）。那時候，工作充足，工資也很高。正是從這一時點出發，這些村民認為他們目前處于困境；或許，只有在目前的困境這一背景之下，灌溉剛引入的那些年才變成了“過去的好日子”（the good old days）。

在這些村民看來，這種時運逆轉的核心，并不僅僅是技術變革帶來的毫無人情味的工作，而是人們之間相互依賴的泯滅。曾經被哈吉·卡迪爾認為是少有的辛勤工作的窮人卡里姆說出了許多貧窮的村民的看法。他解釋說，從前，“窮人依賴于富人”。跟帕克·亞赫一樣，卡里姆以預付工資為例，他告訴我說，現在已經不再有預付工資了，作為替代，開當鋪的華裔成了窮人借貸的最后倚仗。卡里姆接著說道，“他們（地主）再也用不著我們了；如果我們不來脫粒，他們可以雇機器”。村里另一個無地村民曼蘇爾表達了大致相同的立場，他哀嘆通過幫助脫粒獲得的額外扎卡特饋贈現在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曼蘇爾曾經從那些他幫助脫粒的種田人那里收到過這樣的饋贈，而現在那些種田人都不再需要他幫忙了。村里的窮人不僅準確地認識到了他們在工資、工作和禮物上的損失，而且也非常清楚地意識到，他們根本不再是稻米生產中的一個有機部分了。[[241]](#_241_17)

## 從活租到死租

在實行雙耕前，在耕種前支付固定現金地租并非不為人知，但是，只有伴隨著1971年后現金經濟的擴展，固定現金地租才成了一個通則，而不再是例外。隨著預付地租的轉變，到底有多少佃農失去了部分或全部土地？關于這樣一個事實，我們再次遭遇到了幾乎無法處理的爭執區域（zone of disagreement）。最高的估計數目是十戶，而最低的數目只有三四戶。較高的數字接近村里的一致意見，而較低的估計數字則代表了一小部分富裕村民的看法。我們似乎沒有辦法確定具體的數目。比如說，拉扎克一直依照傳統方式從他哥哥（外村人）那里租種5里郎土地，1972年，拉扎克的哥哥宣布要收回那些地讓自己的兒子耕種。拉扎克說，他哥哥是把這當做個借口以便將他踢出那塊地。拉扎克的證據是，兩個種植季之后，他哥哥把那塊地租給了一個預付地租的新佃戶。這個故事看起來是部分可信的，因為打發走原來的佃農，然后將地出租給自己的孩子耕種，是少數可以接受的更換佃農的方式之一。恰恰是由于這個原因，這種做法常常被視為是那些行事小心的地主使用的一個花招。但在這個事例以及其他許多事例中，我們不可能確知事實如何。對于這一類的事例，地主通常會宣稱，是佃農決定要退掉租種的土地。無論如何，如果聽取了絕大多數村民的說法，那么，由于轉換為預付現金地租而導致的“損失估計”（damage estimate）就會很大；如果聽取了少數富人的意見，那么這種轉換的影響就相對地微不足道。

對那些租出很多土地的人來說，預付現金地租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由于租金不再是以稻谷作為等價物來計量，地主的利潤就不再受農產品交貨價格（farm-gate price）的影響。倘若稻谷價格上漲，那么很簡單，現金地租可以在隨后的種植季提高；倘使稻谷價格跌落，那么損失則由佃農承擔。在新協議中，預付的租金當然要提前五至六個月交付，這樣地主就可以更長久地使用這些資本。最重要的是，預付現金地租避免了在打谷場上由于莊稼損傷或歉收所導致的爭端或沖突。判斷歉收的原因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歉收是由于耕種者的疏忽，還是由于天氣或蟲災？如果是前一種情況，地租是不能減免的；如果是后一種情況，地租的減免通常是可以協商的。此外，減免的額度同樣是導致激烈交鋒的一個原因，通常交易雙方都覺得自己吃了虧。現在，地主甚至不需要看他的土地一眼，也不需要在收成不佳時聽取佃戶可疑的辯解。不滿意的佃農只有一個選擇：放棄租佃。

那些采納了地主看法的人自然高興。卡米勒是大佃農，但他付的地租非常合適（每個種植季每里郎土地120馬元）。卡米勒表示，在舊有的谷物地租制度下，“欺騙”非常普遍。[[242]](#_242_17)欺騙通常有以下幾種方式：在正式收割之前，在晚上偷偷摸摸地收割莊稼；如果看管很松，在實際收割時偷走一些稻谷；在脫粒時留一部分稻谷在稻稈上，日后通過拾穗據為己有；最重要的是，謊報稻谷損失以掩蓋部分或全部的詭計，進而減少交付的地租。當然，佃戶會選擇用恰當的手段來實施這些策略，如果做得太過分太頻繁，佃戶就會失去租佃資格。然而，在現金地租的制度下，所有這些小伎倆都無關緊要了。哈吉·沙利姆是一位住在村外的大土地所有者和經營者。哈吉·沙利姆明確地指出，預付現金地租是勞動紀律的基本要素。他說，“這些人（佃戶）都是無賴”[[243]](#_243_17)。哈吉·沙利姆補充道，在現金地租實施之前，佃戶們可能漫不經心地耕種，然后再要求減租，聲稱蠕蟲或者毛蟲毀壞了莊稼。但是現在，“如果他們先給了錢，他們就不得不仔細看護莊稼，再也沒辦法耍花招了。他們不得不更認真地對待他們的莊稼”。

現金地租給佃農帶來的壞處，顯然就是地主的好處。當然，那些深刻了解這些壞處的人，正是那些因為地租形式的這種轉化而失去租佃資格的人。即使對絕大多數——那些試圖及時籌集現金的人來說，成本也相當大。他們通常用妻子的首飾（這通常是女性結婚時她們父母的贈禮）作為抵押來借貸，在贖回這些珠寶之前他們每月要付給在燕鎮的當鋪2%的利息，而要贖回這些首飾，他們只能寄望于收獲后。如果稻谷收成好，這只會帶來小小的不便；如果收成欠佳，那么這就將演變為一場財政危機。[[244]](#_244_17)首飾很可能會被當鋪沒收，丈夫就得離開村莊去別的地方找份工作，否則債務就會越積越多。現金地租的日益流行也對其他形式的租佃產生了微妙但明顯的影響。盡管有些足夠幸運的佃戶的租約仍然允許他們在收獲之后支付地租，這種收獲后支付的地租原則上是可協商的，但是，這些佃戶越來越不愿意利用協商地租的特權，以避免地主會要求轉換成預付地租來進行報復。[[245]](#_245_17)

佃農最主要的不滿在于，地租是固定的，因而跟特定季節的稻谷產量無關，也就是說跟佃農的支付能力無關。就像佃農們說的，“你沒法考慮收獲，你沒法討價還價，你沒法商量，你什么也做不了”。這并不僅僅是以不帶人情味的方式對事實作出的陳述。這種說法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同“預付現金地租”聯系在一起的。這種說法是如此常見，以至于幾乎成了一句口號，“如果稻谷被徹底毀壞了，那也是你（佃農）自己的事兒”。佃農在說這話的時候通常伴隨著手勢和面部表情，以便能夠模仿一個冷酷無情的地主是如何向佃戶宣布這一殘酷現實的。當然，這種說法暗示著，佃農們認為，稻谷的狀態——以及佃戶的狀態——絕對應當為任何一個自重的地主所關注。

正像絕大多數村民看到的那樣，這里涉及的是，地租形式的轉變折射了階級關系性質的不祥變化。當地租可以調整的時候，地主的態度被說成是寬宏大量的（senang kira）。這個術語相反的意思是berkira，或者說是“小氣的”和“斤斤計較的”，如同我們已經看到的，這種說法是對富人最猛烈的控訴。寬宏大量存在于友好互惠占主導地位并且沒有人會不恰當地利用別人的社會中。現在寬宏大量這一價值既被破壞又被遵守，但它并不因此缺少影響力。在阿明的描述中，過去與現在的情形存在著鮮明的對照。“以前他們說，‘如果收成不好，（我們）就少收點（地租）’。”“那么你可以討價還價，這里有同情的成分。”“現在他們只關心錢。”“他們說，‘如果你不滿意這個價錢，我就找別人’。”“他們這樣做時毫無遮掩。”[[246]](#_246_17)

少數大地主對預付現金地租的社會建構終止了一種制度，這種制度允許佃農通過欺騙好心的地主而避免為自己的疏忽承擔后果。對絕大多數其他人來說，預付現金地租的社會建構則終止了一種安排，在這種安排中，地主對他的佃戶所處的環境以及佃戶的需要都表現出應有的關照。[[247]](#_247_17)

## 聯合收割機

機器把工作吃了。

——一些村民

我們已經詳細考察了使用聯合收割機的后果，這些后果是可以進行統計分析的。這一問題上的許多“事實”——直接收割工作的喪失、拾穗機會的喪失、收入損失的程度、受影響最深的社會階層——都已明確。這里，我將探討塞達卡居民對于這些事實的社會建構。寬泛地說，關于聯合收割機的進入，至少有兩個社會史：一個是由勝利者所宣揚的歷史，另一個則是由失敗者所宣揚的歷史。在此，勝利者和失敗者并非地主和佃農，而是指以大規模的種植者（不論是所有者還是佃農）為一方，以小規模的種植者以及無地雇工為另一方。這兩個階層中間的是那些中等的農場主，這些中等農場主的得失互為抵消，因此他們的看法亦模棱兩可。[[248]](#_248_17)當然，在塞達卡，農場規模是相當可靠的收入指標，這樣勝利者和失敗者也就大體上對應著富人和窮人。富人和窮人各自關于聯合收割機的社會史，是村民之間的階級沖突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有關聯合收割機的某些社會事實是如此明顯和確定，有關各方都承認了這些社會事實。這些事實構成了共識領域的一部分。這一共識的核心是基于這樣一個事實，收入依賴收割勞動的窮人受到了損害，而富人則從中獲益。窮人受損的程度有多大，富人的獲益有多少，這些量的問題完全不能達成共識。對聯合收割機的整體影響是沒有爭議的。阿布·哈桑在農會擁有一份穩定的工作，還耕種著6里郎土地，他說，“因為機器來了，那些打短工的農民就干坐著了”[[249]](#_249_17)。托·卡西姆也非常富有，他補充說，“確實，窮人有損失。”在談到聯合收割機時，富人往往更愿意承認窮人的損失，而不愿意承認自己的獲益。而對于窮一些的村民來說，聯合收割機通常使他們說出這樣的話：“富人變得越來越富，窮人則變得越來越窮。”在說這些的過程中，這些村民試圖表明，機器不僅給富人帶來了利潤，也給富人帶來了快樂。無地的雇工哈姆扎說，“為工資辛苦的朋友們沒辦法找到足夠的（工作），但那些不掙工資的人卻生活得很幸福”。他的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快樂與痛苦的分界線在何處，也表明了他自己站在哪一邊。即使基于共同認可的社會事實，窮人的議論中有一種特殊的意義歪曲，他們傾向于把自己的損失與他人的獲益、他們自身的痛苦與他人的快樂聯系在一起。

在討論聯合收割機是如何有效率又是如何有利可圖時，我們進入到一個富人和窮人針鋒相對的區域。富人所宣揚的主要是機器收割相對人工收割的一系列好處。最為重要的是，大農場主提到了機器收割和裝袋時的速度。他們確信，相對人工收割而言，用機器收割每里郎可以多收一麻袋到兩麻袋稻谷。此外，這些大農場主也提到，機器收割可以節省將大米從地里運到臨近碼頭所需的人力和資金。這最后一項工作通常每麻袋需要花費一至兩元，這樣生產成本就明顯增加了。[[250]](#_250_17)像村長哈吉·加法爾這樣的大種植者，總是不斷地計算機器收割相對于雇用勞力收割在經濟方面的好處。在不計入速度提高及損失減少等要素的情況下，大種植者估計，使用聯合收割機每里郎可以節省18—30馬元——具體數額取決于季節、土地的位置和產量等因素。

使用機器至少還有另外兩個好處，一個人們經常提到，而另一個好處卻顯然不被富人們公開提及。大農場主很高興能從招募收割工人所涉及的管理和監督中解脫出來。這不僅包括在合適的時機安排收割工和脫粒工，還包括監視脫粒以確保稻稈能完全脫粒，還有向脫粒的雇工提供飯菜。雇用收割機不僅省下了勞力和花費，還減去了這項復雜并且隨時可能失控的任務。[[251]](#_251_17)塞達卡的那些打短工的雇工則指出了促使大農場主進行機械化作業的另一個因素。卡里姆辛辣地指出，機器并不要求預先支付工資，也不在工資之外期待接受伊斯蘭要求的慈善（額外的扎卡特饋贈）。正是在這一點上，富人保持了沉默，或許是因為富人對歷史悠久的習俗正在遭受破壞并不關心。無論如何，絕大多數大種田戶欣然從舊有的收割體系轉向了新的體系。原有的體系使富人陷入一系列的對貧窮鄰居的傳統社會紐帶與義務當中，而在新體系中，只要同機器掮客簽署一個一次性的不帶人情味的合同就夠了。其他人，特別是那些損失最嚴重的人，駁斥了使用聯合收割機的一些——如果不是全部的話——好處，并且指出使用機器的一些缺陷。無地雇工“瘦骨嶙峋的”瑪和租種9里郎土地的佃農加扎利之間曾發生過一場低調的爭論，這場爭論在諸如此類的許多討論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瘦骨嶙峋的”瑪認為，聯合收割機經常漏掉臨近田埂的水稻，并且會壓倒稻田入口處的水稻。他還說，收割機在轉彎或者儲存倉裝滿了的時候會發生堵塞或者會將稻谷溢出來。“瘦骨嶙峋的”瑪作為跟在收割機后面拾穗的發明人，可以算得上這方面的專家。加扎利客氣地表示了異議。加扎利說，使用收割機之后他至少多收了一麻袋。在上個種植季他鄰居的兒子曾經為他手工脫粒，結果，大量的稻谷散落在了稻桶之外，而且在稻稈上也留下了非常多的稻谷。

在其他方面，窮人試圖證明，即使把道德規范放在一邊，聯合收割機的使用對于種田人來說也沒有什么好處。他們聲稱，公正地說，收割機這樣的龐然大物造成了深深的車轍，在灌溉季稻田里還很濕潤的時候尤其如此，這樣土地在下次耕種前很難平整好。窮人們還提到了收割機穿越一塊地到另一塊地時造成田埂的破壞，此外，為了確保聯合收割機有一條道路可以穿越已經收割過的稻田到達任何一塊不在路邊的稻田，還不得不協調種植時間，這也很麻煩。大農場主幾乎毫無例外地對這種反復出現的壞處無動于衷；他們作出了使用聯合收割機的決定，對結果也非常滿意。

然而，塞達卡的富裕村民不愿意承認，僅僅是因為收割機更方便并為他們省了一些錢，他們便剝奪了貧窮村民謀生的主要方式。如果他們承認的話，那么，這就意味著他們公開宣布他們自己微不足道的私利是至關重要的，而且也意味著他們公然否認自己對于社區其他人的福利的義務。正如事實上所有人都已經承認的那樣，大農場主也承認聯合收割機意味著窮人經濟上的困境。大農場主認為，他們的鄰居即使無法接受但也會理解他們的做法，大農場主竭力以此使自己的行為正當化。大農場主們聲稱，由于存在著勞動力的短缺，如果他們想在合適的時機收割莊稼的話，他們除了使用聯合收割機外別無他法。這一聲明也是大農場主使自己行為正當化的努力。這是他們退而求其次并且更實質性的社會辯護方式；大農場主在強調必要性而非實用性。我們將會看到，恰恰是這種辯護方式遭到了窮人的猛烈攻擊，但這種辯護方式并沒有被拋棄的危險。

這種勞動力缺乏的說法非常狡猾。一方面，它只不過意味著，某些人向勞動力支付的工資要比他們愿意支付的工資多。倘使勞動力是充足的，那他們付出的工資就會減少。另一方面，從更為客觀的角度看，如果稻谷因缺少收割工人而腐爛在田里，那么當然可以說存在著勞動力短缺。然而，即使富人也不會這樣說，因為即使在雙耕引入之后而聯合收割機進入穆達地區之前，水稻都被及時收割了。大農場主更為溫和但毫不妥協的說法是，勞動力是短缺的，因而是昂貴的；如果依賴人工的話，他們的莊稼就面臨著危險。因此，村長哈吉·加法爾和他那個耕種著13.5里郎土地的兄弟拉齊姆解釋說，在使用機器收割前，村里的窮人經常離開塞達卡到工資比塞達卡高的地方去幫助脫粒。村長兄弟倆說，成熟了的稻谷收割晚了，而晚收割的稻谷也比正常收割的稻谷要輕，結果這些稻谷的收益就降低了。拉齊姆補充說，“受損失的是種田人”。托·卡西姆也附和了這種說法。他說，到最后一刻，他既缺收割工，又缺脫粒工，因為他們在需要的時候沒有出現；在這種情況下，他不得不提高工資招募額外的人手。托·卡西姆說，即使這么做，莊稼也已經被耽擱了。瑪·伊莎租種了5里郎土地，他也雇用了收割機。他說自己更愿意從村里雇用工人，但他無法做到這一點。瑪·伊莎特別擔心，如果不能在灌溉季及時收割，稻谷就會發芽。他還記得，兩個種植季以前，他的稻谷就是這么被毀掉的。政府的磨面廠只按半價收購了他的稻谷。瑪·伊莎承認，村民的工作被機器取代了，但他補充說，如果不是因為聯合收割機，那些雇工就會松懈，并且不會全天工作，因為他們的收入會很高。

那些大農場主為了自身利益的說辭比事實更值得關注。如同關于階級行為的任何一種公開解釋，這些說辭聽起來似乎有一定道理。即使在雙耕之前，穆達地區的勞動力在收割最繁忙的時節也很緊張。來自泰國和馬來西亞吉蘭丹州的外來人口定期地補充了當地的勞動力。實行灌溉以后，工資最初上漲了將近兩倍，但在1972年至1974年間，收割工人的實際工資事實上下降了。[[252]](#_252_17)況且，沒有證據證明，從1972年直到收割機的使用，勞動力的短缺導致的莊稼損壞是一個嚴重的問題。[[253]](#_253_17)許多大范圍使用聯合收割機的農場主希望說明，他們的手腳受到了束縛，如果不雇用機器，他們就會損失部分或全部莊稼。一旦這種論調被接受，他們的行為就有了合理性。因為如果使用機器是拯救莊稼的唯一辦法，那么，塞達卡就沒有人會責備使用聯合收割機的農場主。

那些完全依賴打短工來獲取收入的人，會認為上述說法是無稽之談。羅吉婭每年都為別人插秧和收割，她說，“如果他們不想使用機器，他們可以雇村里人；找工作的人有的是”。寡婦洛斯妮由于辛勤工作而受到眾人的贊揚，她認定，使用機器的人“只是對速度感興趣”。洛斯妮的說法跟其他人的一樣暗示著，為了提前兩三天收割他們的莊稼，大農場主會犧牲村里窮人的福利。村里的雇工很清楚，富人使用聯合收割機是為了滿足他們對方便和速度的要求，而不是出于必需。

如果我們再深挖一點兒，我們就會發現，如同富人看到的那樣，塞達卡的勞動力缺乏并非是對工作太多而人手太少的客觀統計數據。事實上，問題是窮人是否真的想工作。哈吉·沙利姆（有三個妻子、拖拉機、卡車以及許多里郎的稻田）的觀點在這個方面相當有代表性。在承認“窮人只是勉強能夠維持生活”、“他們什么奢侈品都沒有”之后，哈吉·沙利姆趕緊補充說，他們不愿意工作。“他們都游手好閑；他們不想工作；他們很富有，（所以）不愿意（工作）。”“他們中有些人過去甚至連一輛破自行車都沒有；現在他們有摩托車。”[[254]](#_254_17)巫統的領導人法齊勒擁有8.5里郎土地，他也同意這種觀點。“村民不來工作，他們說他們發燒了，他們說在下雨，（但）他們是懶惰，他們會去咖啡店里吃糕餅，或者是很早就去市場買魚。”“我們的莊稼就這樣被毀壞了。”“他們多少有些懶惰；他們自己有2里郎3里郎的土地，但不怎么愿意工作。”“而機器是可靠的，而且速度很快。”當這種看法和勞動力短缺的斷言合在一起時，機器使用者似乎就完全不會受到譴責了。他們不簡單是為了增加自己的收益，而是在拯救他們自己的莊稼，這些莊稼因為當地雇工的懶惰而受到威脅。維多利亞時代的經營者也想不出比這更讓人滿意的借口來為自己的行為開釋。

值得指出的是，這種觀點得到了各級官方充足的支持與鼓勵。塞達卡所屬的雙溪達汶分區的最高領導人阿布杜爾·馬吉德宣稱，村民不愿意工作。“人們說，他們很傲慢，他們在墮落，他們只有工資很高時才會露面。”“只有工資很高時，他們才愿意（工作）。”“村民很難相處。”他同法齊勒或哈吉·沙利姆唯一的不同在于，一般而言，他是高高在上地、更為寬泛地談論村民，他沒有對村民做任何區分。他把這些難以對付的村民同聯合收割機進行了對比，然后總結說，機器收割“快速而便宜，并且不用提供食物”。塞達卡和臨近的雙溪通港村的農民協會基本上是由富裕的農場主組成的，在年度會議上，有人表達了幾乎同樣的看法。這些觀點是由伊斯梅爾·艾爾沙德——他不僅是該選區議會的巫統成員，也是高貴的吉打家族的一員——肆無忌憚地公開作出的。“人們不再愿意像先前那樣為工資而工作。”“他們只在上午工作，隨后就打道回府。”對此，巫統在塞達卡的領頭人巴塞爾非常贊同。“這些人很難管理；他們爬上椰子樹（來逃避工作）；你無法信任他們。”官員及其富裕的支持者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完全一致：一方面，雇工現在是或者正在變得懶惰、好斗、不值得信任；另一方面，也存在著完美的工人，這就是經濟可靠且快速的聯合收割機。

塞達卡的富人盡管承認短期雇傭工作喪失了，但他們不可能去渲染這種損失。就像哈米德說的，村里并沒有太多人完全依賴打短工的工資作為收入。毫不奇怪，那些受到機械化沖擊的人并不會如此鎮定地這么說。當這些人說起他們的收入在過去3年間的劇幅下降時，一種緊張萬分的氣氛主導了這些人的評價。羅吉婭的話代表了這些人當中絕大多數的想法，她說，“如果機器來了，拿走了所有的工作，人們就賺不到什么錢”。“富人得到了越來越多的好處，窮人只有損失。”“你幾乎兩手空空。”“找工作沒用；現在根本沒什么工作。”哈姆扎的表達更為簡潔：“我們正在瀕臨崩潰。”“瘦骨嶙峋的”瑪說出了這種十分悲觀的觀點，“（因為）機器進來了，馬來人能吃什么？”“現在，機器可以奪走一切。”當然，跟“瘦骨嶙峋的”瑪的反問中所暗示的不一樣，這不是饑餓的問題。事實上，這是一個選擇問題：是在村里永遠受窮，還是像年輕人那樣永久地或者半永久地移民？大農場主日益傾向于用機器播種他們部分或全部的稻田，這樣插秧工作也取消了，這將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上述預言。[[255]](#_255_17)

正如許多農場主將“勞動力缺乏”視做人的問題而不單單是統計數據一樣，窮人將聯合收割機的引入也視做人的問題而不是機器的問題。如果說富人認為窮人很大程度上應該為勞動力問題受到責備，那么，窮人則認為富人很大程度上應該為機械化受到責備。從表面上看，其他一些因素似乎也導致了聯合收割機的使用：例如，鼓勵使用機器的政府，購買并使用了聯合收割機的以華裔商人為主的辛迪加聯合企業（syndicates）。然而，村里窮人中壓倒性的共識是：使用這些機器的種植者應該受到譴責。當我詢問穆達農業發展局是否該受到責備的時候，“瘦骨嶙峋的”瑪迅速做出了回答，“應該被譴責的不是政府，而是村里人；正是他們把機器叫來并使用那些機器。”“如果他們拒絕使用，那機器就不會來。”“他們怎么能夠連汽油費都付呢？”“似乎是機器在請求救濟，然后我們就給了（它們救濟）。”當羅吉婭談到機器對她的收割時打短工的收入造成了侵害時，她說，當塞達卡的某些人選擇使用機器時，他們“沒有同情心”。我們經常可以聽到類似的評論。卡里姆猜想，富人之所以更喜歡機器，是因為他們不用預先向工人支付工資，也不用給工人額外的扎卡特饋贈，他還總結說，“富人并不打算為我們煩心”。跟在其他許多問題上一樣，在這個問題上，村民首先責備身邊的人。我猜想，這并不是說，貧窮村民認為政府和聯合財團不該為他們的苦難負責。畢竟，大種植者在道德約束之內；大種植者是村莊共同體的一部分，所以不應該漠視他們的行為對鄰居造成的后果。

即使在機器付諸使用后，依然有一些大種植者繼續雇用本地的勞動力。這些大種植者因此受到了表揚。這種表揚和上面的批判都運用了相同的計算方法。總共有七八個大農場主被挑選出來，他們是“有同情心”、“好人”的典型。[[256]](#_256_17)這種表揚的結果是把這些人變成具有象征性的正面典范，就像哈吉·布魯姆和拉扎克被當做負面典型一樣。這里要說的是，如果其他種植者對本村村民有相應的照顧的話，那么，本村村民也會這樣做。

這種微弱的宣傳攻勢似乎不可能對富人的感受有太大的影響，當然，除非有些富人發現他們使用聯合收割機的精心論證受到了質疑。托·卡西姆是個例外，托·卡西姆是聯合收割機中介人，他的工作就是為他的華裔雇主安排好當地的收割工作的時間表，托·卡西姆以此可以換取每里郎5馬元的酬勞。托·卡西姆顯然為尋求自己工作的正當性而頭痛不已。[[257]](#_257_17)事實上，他是收割機所有者的代理人，而且他清楚地意識到了某些貧窮的鄰居對他的蔑視。“他們說我錯了，”托·卡西姆說，“但是，是那些土地的所有者吩咐我去叫收割機的。”“如果我不做，別人也會去做。”“我也得活命啊。”[[258]](#_258_17)托·卡西姆在這里顯然非常局促不安；托·卡西姆同時還強調，他“只是服從吩咐而已”，并且這工作總得有人做（為什么他不能做呢？）。尷尬的跡象看起來是明顯的。[[259]](#_259_17)

在整個村莊內，尤其是在窮人中間，人們強烈感覺到，村里的經濟關系的自然秩序被聯合收割機搞得亂七八糟。工資的發放方向被逆轉了；如同人們期望的那樣，工資通常是從富人流向窮人。現在，你瞧，工資向相反方向流動了，因為種田人得給聯合收割機的主人支付工資，而后者要比前者富得多。阿明的話揭示了這種反常：

過去，你得去找窮人，然后再付給他們工資。現在，你得去找富人，再付給他們工資。以前是（擁有或租種土地的）華裔雇用我們；現在是我們雇用華裔。甚至帕克·亞赫也得給富人付工資，窮人卻在家待著無所事事。

人們總是滿懷驚訝地重復這樣的句子：“現在富人在掙工資”，或者“現在窮人雇用富人”。這些說法反映出了看起來極其混亂的情況所具有的諷刺意味。對于村里的富人來說，這是一件值得注意的古怪的事；但對村里的窮人來說，這真是一件痛苦的具有諷刺意味的事：過去屬于他們的工作和收入現在都讓富有的商人拿走了。塞達卡的雇工指出了兩個——而不是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的說法，這兩個說法一起可以概括各種各樣的議論。第一個說法是，現在“機器擄走了全部錢財”。第二個說法是，“錢財正在遠離村莊”，事實上是遠離國家（他們提到了香港、日本、澳大利亞），并且永遠地離開了村里的流通領域。這里背后暗含的意思是，雇用同村的鄉親應該優先于雇用外村人，更別說機器了。因為這樣的話，金錢就被留在了當地宗教儀式的禮儀圈子之內，而受益的則是村里的所有人。

當地農業發展史上的一個小插曲或許最清楚地揭示了窮人和聯合收割機二者之間的關系。在1979年灌溉季的收割期，那時已經是收割期的后期了，而且田里也很濕。有消息傳到村里，說是在南邊四里遠的雙溪凱林村里有一臺收割機陷入了稻田的黏土里。由于下午的工作已經結束，立刻就有十來個村民騎著自行車和摩托車到雙溪凱林村去看。大概一小時以后，他們回來了，說收割機真的卡住了，司機試圖把機器開出來，卻使它陷得更深了。從第二天一早開始，持續了此后的一個半星期，塞達卡以及四鄰村莊看熱鬧的人群越來越多。幾天之內，雙溪凱林村的收割機成了“朝圣”之地。想把機器拉出來的努力都以失敗告終，每天都會嘗試一種新的方式——絞盤、拖車、將纜索綁縛在裝滿貨物的自動裝卸貨車上來拉、推土機——但都不管用。從辛迪加聯合企業來的兩個收割機的所有者每天都來，他們顯然非常焦急和生氣。當每個新計劃實施和失敗之時，這兩個所有者都會對工人大吼大叫，指手畫腳。日漸增大的人群并沒有給這兩個所有者的情緒任何鼓舞，人群堅定不移地反對收割機及其主人。人們為這臺收割機日益陷入吉打州的爛泥中高興不已。事實上，一星期之后，稻田一百碼的地方只能看到收割機的駕駛室；時間是站在吉打州的爛泥一邊的。與此同時，當地的勞動者在無法動彈的收割機周圍收割、脫粒，收割機現在已經沾滿了泥漿，整個世界看起來都成了出土文物的考古場所。

在我的田野調查中，我從未看到人們這么高興，這么滿足。[[260]](#_260_17)人們的情緒毫無疑問越來越高昂，仿佛收割機真的被吞噬了。人們的談話集中在兩方面：第一，隨著收割的推進，機器主人可能每天都要損失大筆收入；第二，因為1972年以來稻田整年被水浸著，再加上持續使用機器，類似事件可能會經常發生。最后，收割機的主人對其他辦法徹底失望了，他們雇了一幫苦力，這些苦力差不多挖空了機器周圍，并在機器前面修了一道小斜坡，機器這才被拖了出去。[[261]](#_261_17)即時的朝圣與節日猝然中斷，但它提供了一個“因果報應”的小插曲。

這里同樣不應該忽視的是，聯合收割機導致了大種植者和雇工之間更為直接的敵對關系。任何機械化進程的退步都是大農場主的倒退，與此同時，機械化進程的退步卻是對那些尋找工作的人的恩賜。這在灌溉季的收獲期尤其明顯。過去，大農場主的好收成也是雇工的利潤；農場主的好收成意味著雇工可以獲得更多的工作和薪水。然而，現在，大農場主的壞收成才是雇工直接收獲的時期。風雨造成的莊稼倒伏越多，地里的水越深，使用聯合收割機收割的范圍就越小，這樣留給窮人的工作就越多。完全是由于聯合收割機，窮人第一次發覺自己實際上在期望洪水、在期望莊稼被毀壞，因為他們可以從這些不幸中獲益。甚至天氣也變成了某種階級問題。

## 失去的地盤：土地的獲得

找到一塊可以租種的稻田變得越來越難，這種說法在塞達卡正在被普遍接受，而且人們都對此哀嘆不已。村里的老年人都還能回憶起加尼·勒拜的父親以及其他村民用少量的錢從東姑·吉瓦（Tengku Jiwa）那里買到20里郎至30里郎土地的時光。中年村民也能回憶起另一段并不久遠的時光：那時，村里不管是佃農還是地主，沒有人無地可種。阿布杜爾·拉赫曼還說，“那時，人們收地租的時候充滿同情心，土地很便宜，也很多；一個富人至多也只能耕種20里郎的土地”。當然，這種“過去的好日子”現象是被社會地創造出來的，顯然是為了同當前的局面進行比較。阿布杜爾·拉赫曼在進行了比較之后說道，“現在，一個人就可以獨自耕種50里郎甚至100里郎的土地；他自己不僅保留了全部錢財，還保留了全部大米”。托·穆罕默德的比較有所不同，但可以作為補充：“現在人也多了，地租也高了，地主出租土地時開始使用長期租佃制。”有兩個原因經常被援引用來解釋今天的事態（忽略掉人口與現金地租不計），一個是大地主開始重新耕種，另一個是長期契約租佃的現金租金的增加。后一個原因比前一個原因更為重要。

在這些問題上，塞達卡并不存在太大的分歧。[[262]](#_262_17)畢竟，塞達卡并不存在名副其實的地主階級。出租土地的村民絕大多數都是以小塊地的形式按照特許條款（concessionary terms）將土地出租給了子女或者孫輩。其余被出租的那些土地，或者是繼承來的但因距離太遠而不方便耕種，或者是由于土地所有者暫時有財政困難而被迫租出去了。因此，在塞達卡，對無法以合理的價格租種稻田的普遍憎恨，幾乎無一例外地指向住在塞達卡村外的大地主階級。然而，村民在這個問題上的激情和熱情有明顯的不同，這種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取決于階級地位的。對于十來個擁有并且/或者耕種超過8里郎土地的富裕農場主而言，問題不是很大。假如能夠租到更多土地，他們中的某些人將會歡迎這種機遇，但這并不是非常急迫的事情。但對于剩下的村民來說，尤其是對那些無地可種或者是幾乎無地可種的人來說，這個問題則是備受關注的，因為這涉及到他們在塞達卡是否有未來。

地主為了自己的利益決定重新開始自己耕種土地，因此解雇了他的佃戶，這是貧窮的耕種者失去土地的通常方式。在雙耕的利潤以及很容易就能雇到機器的驅使下，許多吉打州的大地主一度收回了曾經由小佃農耕種的土地。[[263]](#_263_17)哈吉·布魯姆的兒子哈吉·安尼正是以這種方式收回了明關村附近超過100里郎的土地。另一個明關村的大地主來自檳城的貴族家族，他通過雇用一個華裔經理人收回了超過50里郎的土地。塞達卡的沙姆蘇爾和托·艾哈邁德也面臨著土地被地主收回的威脅，因為他們的地主哈吉·丁宣稱，他想自己耕種這些土地或者讓他的兒子耕種。幸運的是，通過向地區政府投訴，他們達成了一個妥協方案，哈吉·丁暫時收回一半的土地。[[264]](#_264_17)用這種方式收回大塊土地的地主，通常會因為他們的貪婪而被憎恨。托·艾哈邁德會譴責哈吉·丁：“他根本不關心我們能不能吃上飯；他想吃了我們。”[[265]](#_265_17)收回土地的小地主并不會受到這樣的辱罵，因為人們都明白，這些小地主也非常貧窮，而且他們也得為子女的生計考慮。因此，這里的邏輯是：如果一個地主擁有的土地，在滿足自己生活所需要之外還有剩余，那么他們就應該將多余的土地租給更窮的人。如果這些地主拒絕這樣做，那么他們就會被認為是冷酷或者是貪婪。

大地主要求高額的地租或者要求收回耕種權，這些都引起了許多擔憂。但是，向長期契約租佃制轉化的趨勢看起來更具有威脅性。傳統的長期租佃協議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簽訂的：由于小土地所有者急需現金，于是他們將自己的小塊土地租出幾個種植季以換取租金，這種租佃規模較小。新近的長期租佃則涉及了較大塊的土地以及高額的保證金。村民對此密切關注，關于長期租佃地租的每一個消息通常都成了胡亂推測的基礎。最近有消息說，雙溪通港村瑪·布揚的兒子以總額2000馬元的代價連續三個種植季租種了3.5里郎土地的租佃合同。這是個悲傷的消息，因為在這一宗交易中每個種植季每里郎土地的地租超過190馬元。大多數村民都認為，瑪·布揚的兒子“竟敢”以這樣的價錢租地，這將是一個失敗的交易。

引起了如此恐慌的不僅是計算出來的地租，還有長期租佃要求一次性付清地租所需要的資本。哈吉·查希爾是尼扎姆租種的那塊土地的所有者，哈吉·查希爾通常是在每個種植季開始時收取一些保證金，不過，在1979年初，哈吉·查希爾宣布他要改為一次收取兩個種植季的預付地租。盡管這些地租錢并不多，但尼扎姆依然需要立刻籌集1000馬元。因此，尼扎姆只能匆忙從他父親和當鋪那里籌集貸款。如果尼扎姆沒有籌集到這筆資金，那塊地就會落入別人手中。尼扎姆認為，“他（哈吉·查希爾）想剝削我們；他想拿走一切”。其他人可就沒尼扎姆這么幸運了。由于地主堅持延長租期，而薩馬德和法齊勒都拿不出所需的資金，于是他們兩個都喪失了原本承租的土地。兩個案例中都是富裕村民加尼·勒拜·瑪拿到了租佃權。薩馬德和法齊勒對于加尼·勒拜·瑪的怒火比不上他們對于那兩個外村地主的憤怒強烈，那兩個外村地主拒絕在租佃期限和地租上做出讓步。對于尋求土地的年輕農民來說，長期租佃制是一個可怕的障礙。例如，羅吉婭新近結婚的兒子瑪·納西爾在過去的3年一直在積極尋找可以租種的土地。最近，瑪·納西爾聽說有一個4里郎土地連續4個種植季的租佃合同，所有的花費共計2400馬元。盡管每個種植季每里郎土地的平均地租比較合適，只有150馬元，但這筆錢依然超出了瑪·納西爾的籌集能力。盡管那塊地的所有者是他妻子的親戚，這種情況有助于瑪·納西爾成為那塊地的佃農，但是，沒錢就無法獲得租佃權。瑪·納西爾非常痛苦地發現，“現在他們只是考慮自己的肚子。親戚關系被放在了一邊”。

在轉向長期租佃制的過程中，如果說貧窮村民受到的損失最為嚴重，富人受到的影響也不小。我在塞達卡期間，村里對一份長期租佃合同進行了廣泛討論，富人們的擔憂就反映在了他們對這份合同的反應之中。該合同的雙方分別是來自明關村的富有馬來地主哈吉·哈桑（他是哈吉·布魯姆的孫子）以及他的新佃戶——凱帕拉·巴斯塔鎮最有錢的綽號叫“支那煙鬼”的華裔小商店老板[[266]](#_266_17)。50里郎的一塊極其寬闊的土地被出租了8個種植季，一次性付清的租金總計為88000馬元。每里郎土地的地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每季度220馬元，但更令人驚詫的是巨大的租金總額，這筆錢甚至遠遠超出了該地區最富有的馬來地主的支付能力。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存在于非常富有的馬來地主和華裔佃戶之間的大宗租佃交易，這些華裔大都擁有收割機辛迪加聯合企業的部分產權，哈吉·哈桑的這份租佃合同引發了塞達卡富裕村民的沮喪感。盡管有望積攢資金進行較小規模的土地租佃，但他們猜測，如此巨大數額的租佃——不管是從每里郎的成本看還是就所需的資金總量而論——從此以后將被擁有機器的富裕華裔壟斷。[[267]](#_267_17)哈吉·納揚把這些租佃稱為“競買”租佃：“只有非常富有的人才可以擁有（土地）；他們（地主）不關心種族問題，許多（佃戶）是華裔。”因此，富人和窮人同樣都有充足的理由為長期租佃制而憂慮，盡管他們的擔心并不相同。對富人而言，長期租佃制意味著進一步進行土地積累的渠道正在消失；對窮人——尤其是佃農——來說，長期租佃制代表著對他們不穩定生活的一種威脅。[[268]](#_268_17)

長期租佃制的實施以另一種方式再現了由聯合收割機導致的混亂的社會關系。以前，富裕的地主把土地出租給比自己貧窮的人，這種關系也反映在傳統社會意識形態下的租佃制中。然而，現在，地主把土地出租給了同他們一樣富有的新型佃農，并且，在很多情形之下，這些佃農比地主還要富有。幾乎每一個貧窮村民都滿腔怨恨地諷刺道，今天，收割工作和越來越多的土地租佃正在變成富人——而非窮人——的保留地。無地雇工蘇庫爾的說法代表了絕大多數人的意見，“以前，他們把土地出租給窮人。現在，你根本租不到地了。富人把地租給富人，窮人靠窮人生活”。

誰應該為長期租佃制而受到責備？答案并不那么顯而易見。或許，有人會歸咎于華裔，他們常常被看做是成功的競標者。或許，有人會認為馬來地主難逃其咎。或許，有人還會認為國家應該為許可長期租佃制而受到責難。[[269]](#_269_17)事實上，人們對馬來地主恨之入骨，正是這些馬來地主希望得到最大的利潤而無視親戚、鄉親及其種族的需要。我偶爾直接詢問誰應該為某一個特定的長期契約租佃受到“責備”——是地主還是（華裔）佃農，我幾乎總是聽到相同的回答。例如：

地主應該受譴責；他們不愿（把地）租給馬來人。（羅吉婭）

地主，他只想著錢，他拍賣土地，并問，“誰出價最高？”（拉齊姆）

他們（地主）不愿意把地租給他們自己的種族。（拉扎克）

塔伊布是村里最貧窮的人之一，他有個妹妹住在附近。塔伊布發現，他的那個妹妹以500馬元的價錢把她自己擁有的1里郎土地出租給了一個華裔小商店老板耕種10個種植季。正要尋租土地的穆斯塔法也有類似遭遇。他媽媽將她自己的2里郎土地租給了一個擁有拖拉機的華裔，一共租出8個種植季。沒人對華裔有什么偏見，盡管這些人奪走了他們本來想自己租種的土地，但是，他們都為自己的家人不考慮親人的利益而感到沮喪。穆斯塔法絕望地說，“我居然都不能在我母親的土地上耕作。”

在之前考察聯合收割機時，我們已經遭遇到這種“譴責的邏輯”。最經常地被挑出來受到譴責的并非陌生人，或者說外地人。畢竟，這些陌生人處在共同體的道德約束之外；這些陌生人利用他們可以利用的有利時機是在意料之中的。而在另一方面，親戚、同村的鄉親、馬來人都被視為共同體的成員，這些人在直接的物質利益之外彼此負有義務。因此，村民有可能去呼吁這些人重視自己的責任。例如，瑪·納西爾說，他已經呼吁他的親戚把地租給他幾個種植季，而不是把地租給陌生人。當那個親戚無視他的請求時，瑪·納西爾理所當然地感到了背叛。在想象的共同體的邊界之外，請求與背叛這樣的概念顯然是不適用的。村民沒有理由去呼吁一個聯合收割機的華裔主人為了給馬來人工作而放棄自身的利益；即使他的呼吁不為這些華裔所重視，村民也不會感到被背叛了。然而，對一個雇用聯合收割機或者將土地租給華裔小商店老板的馬來大地主來說，情況就完全不同了。人們期望這位馬來地主做更多的事情；因為他對那些他可能會背叛的朋友、鄰居和親戚負有義務。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由于這個原因，綠色革命在吉打地區導致的許多變化對馬來人內部的階級關系的影響要比對種族關系的影響更深遠。

## 慈善的儀式與社會控制

如同在任何小農社會（peasant society）一樣，塞達卡同樣存在大量超越了直接生產關系的儀式紐帶（ritual ties），這些紐帶有助于創造及凸顯共同體的存在——這個共同體并不僅僅是生產者的集合。涉及富人與窮人間禮物與交換的儀式紐帶是階級關系變遷興衰的一個敏感的晴雨表。盡管在任何意義上這些儀式紐帶都不是以某種原始的機械方式同生產關系結合在一起的，但這些儀式紐帶依然對生產領域的變化高度敏感。如果把這些禮物與交換作為觀察階級關系變遷的有價值的窗口，我們就會明顯地看到，窮人已經在稻谷種植中變得日漸邊緣，他們在村莊的儀式生活中也已經愈發邊緣。塞達卡傳統上有三種饋贈儀式性禮物的主要形式，通過這些禮物饋贈，富人與窮人聯結在了一起。這三種形式包括村民所稱的私人扎卡特饋贈（zakat peribadi，“私人的”伊斯蘭什一稅）、賽得卡救濟（sedekah/derma）以及所有村民都參加的筵席（kenduri）。在村民看來，所有這些形式或者是穆斯林律法要求的，或者至少是穆斯林律法予以支持的。在簡要介紹了這些形式之后，我將考察每種形式發生了何種變化，這些變化在村莊內部又是如何被各個階級體會到的。

私人扎卡特饋贈有別于大多數村民所稱的給蘇丹或政府的扎卡特捐贈。后者是“法定”的扎卡特：除去非常小的種植者，所有的種植者都應該向吉打州宗教事務局繳納一定量的稻米，這通常是由特別指定的地方收稅人“阿彌爾”（amil）征收，塞達卡村的“阿彌爾”是巴塞爾。盡管這種款項專門用于伊斯蘭慈善事業，但因為可感知到的不平等，許多種田人都非常憎恨這種法定的扎卡特捐贈，并因此普遍逃避交納這種捐贈。[[270]](#_270_17)事實上，私人扎卡特饋贈是宗教慈善的一種形式，而不是像扎卡特這個詞本義所暗示的那樣是一個稅種。私人扎卡特饋贈之所以會受到普遍歡迎，是因為它不是被強制的，而且受益者通常是塞達卡的當地村民。這種私人扎卡特饋贈的一部分實際上是在政府征收法定扎卡特捐贈的時候由當地收取法定扎卡特捐贈的地方收稅人“阿彌爾”征收、并根據饋贈者的意愿捐獻給凱帕拉·巴斯塔鎮附近的清真寺、發揮著祈禱室、會議室、宗教學校的教室等功能的村莊會所、清真寺的阿訇。私人扎卡特饋贈也可以由個人直接捐給清真寺看管者托克·斯雅以及在當地倍受歡迎的宗教導師勒拜·薩卜拉尼（他的宗教班級包括很多當地兒童）。總體而言，這部分私人扎卡特饋贈或許應該命名為用于宗教活動的饋贈，這一部分私人扎卡特饋贈大概占到全部私人扎卡特饋贈的2/3。剩下的私人扎卡特饋贈則給了其他的一些個人，尤其是窮親戚、鄰居、朋友以及幫助種植和收割的雇工。[[271]](#_271_17)

只有最后這個類別的扎卡特饋贈才具有再分配的性質。然而，其涉及的稻谷數量并不很大；村民們用于私人扎卡特饋贈的稻谷總量大約相當于110麻袋，不足村莊平均收獲量的2.5%。[[272]](#_272_17)就數量來說，用于潛在再分配的份額應該不超過40麻袋，或者說不足收獲量的1%。即使我們加上齋月前夕自愿向貧窮村民提供的少量碾磨過的稻谷，作為潛在再分配的私人捐贈的總量也不會顯著增多。

扎卡特是伊斯蘭教的五大支柱之一，它是一種神圣的義務。扎卡特背后的宗教論據和社會論據在吉打州政府宗教委員會所發的傳單中得到了最好的說明。[[273]](#_273_17)在指出伊斯蘭教并不反對信徒致富之后，這份傳單聲稱，富人有義務將自己的部分財產與窮人和沒有財產的人分享。這份傳單引用了一條《古蘭經》的訓諭，“對于那些貯藏金銀且不跟隨安拉的人，請讓其知曉最痛苦的折磨”[[274]](#_274_16)。那份傳單接著寫道，扎卡特的目的不僅是為了抑止吝嗇，也是為了促進富人和窮人之間的社會和諧：“為了免除那些接受施舍的人對富人的嫉妒和仇恨，為了協調富人和窮人的社會關系”。村民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承認了扎卡特。村民們通常會說，他們給出私人扎卡特饋贈是為了“免除財產（的罪責）”。

財產經由自愿的扎卡特饋贈得到凈化的程度，在村莊內部是多樣的。少數富人在私人扎卡特饋贈上相當慷慨，而其他人就幾乎一毛不拔了。阿布杜爾·拉赫曼給了親戚、雇工和宗教官員8麻袋多的稻谷，而哈吉·卡迪爾則僅僅給了不到1麻袋。考慮到其收入，少數相當普通的農民也十分慷慨。巴克利是一個耕種了4里郎土地的普通佃農，他給出了6麻袋，換言之，他給了那些幫助他插秧和收割的家庭每家1麻袋稻谷。而身為雇工和佃農的洛斯妮一共給了宗教官員、窮親戚以及為她干活的村民（帕克·亞赫）6麻袋。[[275]](#_275_16)村里其他人則一無所出。

窮人收到的扎卡特的多少（谷物量）取決于他們的聲譽、莊稼的長勢以及他們在特定種植季的工作量。因為洪水，1979年灌溉季可找到的工作比以往多，結果帕克·亞赫和曼蘇爾兩人在那一季收獲后分別收到了3麻袋和4麻袋稻谷。在這兩個例子當中，帕克·亞赫和曼蘇爾他們只從那些他們幫助過脫粒的人——而不是所有的人——那里收到了扎卡特饋贈。哈姆扎是“扎卡特冠軍”，他收到的扎卡特甚至更多，但他收到的谷物中有一部分是他看管村莊祈禱室的酬勞。那些沒有什么好名聲的赤貧村民即使定期去幫人家脫粒，也不會收到太多的扎卡特饋贈；塔伊布和杜拉得到了1麻袋多的稻谷就覺得很幸運了。這里值得注意的是，貧窮村民收到的扎卡特饋贈，幾乎完全來自他們的雇主，村民們得到的扎卡特的多少也是根據他們的受尊敬程度而經過了相當認真的計算的。扎卡特的功能不僅僅是為了“清除財產的罪責”，同樣也是為了促進勞動控制及社會服從。

賽得卡（Sedekah）和德爾馬（derma）作為救濟的形式幾乎是可以互換的。與扎卡特不同，賽得卡與收獲無關，也并不總是以稻谷形式給予。賽得卡既給予提出請求者，也給予未提請求者，但幾乎只給窮人。德爾馬與賽得卡唯一的不同在于，德爾馬通常是出于慈善的目的而挨家挨戶地收集，一般是為了幫助貧窮家庭支付喪葬費用，就像拉扎克女兒的喪事那樣。[[276]](#_276_16)賽得卡和德爾馬在伊斯蘭語境下都被視做“善功”（good works），因為捐助人如果完全出于真心，將獲得好報。至少在村莊里，這樣的救濟量都很小，比如，只夠做幾頓飯的大米。

所謂的“慈善活動”的第三種主要形式是筵席，筵席構成了村莊儀式生活的基礎。同扎卡特和賽得卡不同，這些筵席是集體儀式，不僅有一個主持者，而且作為東道主的家庭還要為受邀的客人提供一頓飯菜。[[277]](#_277_16)舉行筵席的原因有許多，如果大體上以次數和重要性為序，那么，最平常的筵席是：婚禮筵席；為死者祈禱的筵席，這種祈禱筵席通常兼具慶祝某種好運（如孩子通過了考試）的功能；割禮筵席；懷孕筵席；嬰兒筵席；嬰兒理發筵席；搬家筵席；新房筵席；以及還愿筵席，這種筵席通常是因為生的孩子符合自己的性別期待。富人與窮人都會發起筵席，但人們自然會期望富人更經常、更大方地舉行筵席，并且邀請更多的客人參加筵席。如果東道主家境平常，筵席的花費就要由客人承擔一部分，客人會帶去一些東西或現金。比較貧窮的客人可能不會這么做，但他們會幫助主人準備食物。[[278]](#_278_16)對于村里的窮人來說，筵席實際上是唯一能吃到肉的場合，正像曼蘇爾所說，窮人是被煮肉的味道“引”到筵席上去的。這種儀式筵席是富人通過炫耀性消費證實他們地位的傳統方式，被邀請參與筵席的有他們的朋友、鄰居、親戚，而且通常全村人都被邀請參加。

不管村民討論哪一種慈善活動，他們都同意：作為社會關系的一種形式，慈善活動已經明顯減少了。甚至富裕農場主也有類似的看法，盡管許多富人都立刻將自己個人從這種指責中排除出去，并把矛頭指向了更富裕的人。村長哈吉·加法爾說，慈善活動的衰落始于雙耕。以大方出名的富裕地主阿布杜爾·拉赫曼注意到，甚至私人扎卡特饋贈在今天都很少有了，而賽得卡救濟就幾乎沒有了。阿布杜爾·拉赫曼說，富人寧愿把稻谷賣掉，然后用獲得的現金來購買或者租入更多土地。相當富有的佃農瑪·伊莎說出了大家的心聲，他聲稱，“富人很傲慢；他們不會認真對待窮人（的窘境）；（他們）在賽得卡救濟方面很吝嗇，而且（他們）不愿意給”。村里的窮人常常坦率地指出事實。按羅吉婭的話說，“富人根本不給窮人什么東西”。

至于筵席，村民也有一種共識，盡管這種共識中有輕微的分歧。起初，雙耕帶來的新利潤在1972年引發了塞達卡前所未有的令人難忘的筵席風潮。哈吉·卡迪爾當時有一個用電池的大喇叭，他記得他的喇叭在一年多的時間內出租了七十多次供筵席使用。幾乎每個人，包括小佃農和雇工，都利用自己新發現的繁榮來舉辦他們先前無力承擔的慶祝儀式。比較貧窮的村民的筵席自然要簡單一些，但是，即使是他們也能至少舉辦一次體面的筵席，這有助于他們在村莊這個小共同體內確定自己的村民資格。

據大家所說，短暫的歡欣鼓舞之后，無論是筵席的次數還是筵席的規模都急劇縮小。很少有村民會不同意卡米勒有關自那時起發生了什么的講述。他說，“以前，筵席規模很大，甚至達到了需要把10里郎土地出租幾年才夠筵席的花銷。”“現在，人們聰明多了”；他們精確計算出有多少人會來，這些客人會帶來什么禮物，這些禮物會抵償多少花銷。“過去，人們不指望賺錢；他們也不想舉辦一個很差的筵席，筵席上應該有牛肉，而不是雞肉。”在過去，人們會諷刺在筵席上比較吝嗇的“哈吉”，他們會說，“‘嘿，某某“哈吉”辦了個雞肉筵席，’他會感到羞愧。”“現在，這種事情屢見不鮮。”當托·卡西姆描述了一場持續了兩個晚上并且獻祭了兩頭牛[[279]](#_279_16)的筵席時，他對上述說法也表示同意。他說，現在的筵席僅有一個下午，并且只有雞肉。貧窮村民削減儀式筵席的原因是明顯的；至少自1976年以來，窮人的收入變得更加不穩定。對富一點的農民來說，筵席質量下降和數量縮水則主要是一個態度問題而不是資源問題。絕大多數村民都同意杜拉的解釋，“富人開始抄近路；他們不想耗費錢財”。

在解釋為什么給予窮人的扎卡特饋贈或賽得卡救濟是如此之少時，塞達卡的富裕村民絕不會張口結舌。事實上，他們會給出三種理由，其中任何一個理由都足以證明他們的立場的正當性。第一個接近法律的論調，因為根據伊斯蘭的律法，只有8類人有資格接受扎卡特饋贈，身體無殘疾的或者說有工作能力的窮人并不在其中。卡米勒堅持認為，由于政府在大約十年前建立了國家扎卡特體系，政府并不贊成官方渠道之外的私人扎卡特饋贈。這里暗含的意思是，這種私下饋贈現在不僅是錯誤的，而且可能也是非法的。

第二種理由通常是作為第一種理由的補充：村里實際上沒有人真正需要施舍。例如，村莊附近最富有的哈吉·沙利姆反問道，“為什么要給那些經濟困難的人扎卡特？他們有地，而且像我們一樣種水稻”。這句話的意思是，所有種田人在名義上是平等的。哈吉·沙利姆在暗示，我們的地位大體相當，因此沒有提供扎卡特饋贈或賽得卡救濟的必要。的確，塞達卡的絕大多數窮人都擁有或者租種土地，盡管他們的耕種面積很小；這一事實使得哈吉·沙利姆抹殺了租種1里郎土地和擁有20里郎土地的差別。另一個富有村民勒拜·彭德克表達了同樣的觀點，他補充說，既然那些幫助他脫粒的人已經得到了報酬，而且他們自己通常擁有土地，所以，任何更進一步的饋贈都是“太多”。如果接受勒拜·彭德克的邏輯，那么一個中肯的疑問是，為什么在1975年之前給雇工扎卡特饋贈的做法是如此普遍？我確信，如果我們把饋贈視為勞動控制的手段，那么，這種異常就可以得到解釋：在收割勞力缺乏時，扎卡特饋贈是必要的，然而，當人們很容易地就能找到聯合收割機時，扎卡特饋贈就不再是必不可少的了。無地雇工“瘦骨嶙峋的”瑪用非常精準的語言記述了正在發生的一切：“富人給扎卡特饋贈，是為了能找到人手。窮人哪兒都去。他們叫我們我們就去。現在，即使沒有扎卡特饋贈，我們也會去，因為我們需要工作。”當然，富裕村民有可能一直就把給予收割工人的扎卡特饋贈視為不合理的負擔，甚至當做某種形式的勞動勒索。現在的不同或許在于，由于聯合收割機的出現，他們可以反對扎卡特饋贈。

第三個也是最后一個反對給予收割工人扎卡特饋贈的理由現在已經耳熟能詳了——許多貧窮的村民，如果不是絕大多數的話，并不適合成為慈善救濟的對象。哈吉·沙利姆質問道，“我們為什么毫無理由就要給那些不愿工作的人扎卡特？”哈吉·沙利姆進而舉例說明了窮人的奢侈，他說，去年有個得到了扎卡特饋贈的人把饋贈得到的稻谷賣掉了，買了一雙非常昂貴的鞋子（35馬元）。“他穿著比有錢人還要華麗的鞋子。”富裕的村民總是提到過去為他們工作的拉扎克和其他窮人，在這些富人看來，這些窮人（例如，杜拉、米頓、塔伊布、“瘦骨嶙峋的”瑪等）基本上是聲名狼藉的。富裕的村民以此來解釋扎卡特饋贈和賽得卡救濟減少的原因。對這些窮人的指控包括撒謊、欺騙以及懶惰。在某種程度上，這些被指責的人包括了村里絕大多數窮人，慈善救濟的問題就這樣一舉解決。富人們暗示說，幫助這些窮人，就是鼓勵上述行為。這里我們再次看到，施舍實際上有助于社會控制和勞動控制。富人要讓窮人注意到，只有那些完全遵守富人的正確行為標準的人，才有資格接受富人的禮物。這種模式唯一顯著的例外是當死亡發生的時候，此時即使是最窮的村民也要被給予最基本的尊嚴。[[280]](#_280_16)

至于筵席，依然有幾個富裕村民十分慷慨，尤其是阿布杜爾·拉赫曼和村長哈吉·加法爾，他們幾乎每個種植季都要辦一個相當規模的全體村民都會被邀請的筵席。其他殷實的村民通常會承認，有時還略帶尷尬地承認，為了不浪費錢財，他們在筵席上變得精明了。很少有地主會像哈吉·納揚那樣完全拒絕這種習俗，并且聲稱“只有傻瓜才辦筵席”。

人們可以想象，扎卡特饋贈、賽得卡救濟以及筵席這些慈善的潛在受益者對慈善救濟的減少有跟富人完全不同的觀點。自然，他們會為自己及家人遭受的收入損失感到惋惜；每個人都能精確地說出他們失去了什么，又是從誰那兒失去的。但這絕非問題的全部。在他們遭受損失的同時，富裕村民獲取了雙耕帶來的利潤。他們因此更被憤怒和痛苦所折磨。像往常一樣，這些指責都是個人化的，而且都是針對富人，因為對更多利潤的貪欲使得富人放棄了對于貧窮鄰居的義務。如同窮人經常做的那樣，窮人們指出，富人正在變得越來越吝嗇，首先就是富人們拒絕像從前那樣給窮人慈善救濟。塞達卡其他的窮人很熟悉蘇庫爾的說法。蘇庫爾回憶了在脫粒之后所有干活的人都會立即得到扎卡特饋贈的時光。蘇庫爾說，現在稻谷都賣掉了，并且直接裝到卡車上送到磨坊去了。雇主只留了一點兒稻谷（過去用于慈善救濟的流通物），并且聲稱他的現金都用來還債了。這種做法允許他裝窮。事實上，正像蘇庫爾所說的，在正常情況下，10里郎土地的扎卡特饋贈（15麻袋）足以幫助許多村里的窮人。

向別人乞求賽得卡救濟或者偶爾乞求扎卡特饋贈時，如果被拒絕，這將是一種恥辱，不過在今天，這已經成了一種習以為常的體驗。“名聲很好的”窮人哈姆扎感觸更多的是這種羞辱，而不是被拒絕給予的糧食。上個種植季的收割之前，因為工作很少，他家幾乎把大米吃完了，而且錢也用完了，在這種情況下，他請求他經常幫助干活的雇主借給他一些大米作為預先支付的工資，結果是悲慘的。“請求朋友的幫助讓我感到很尷尬。真是可憐；我不得不每天出去乞求幫助。我真是感到羞恥。”在他母親去世之后，哈姆扎不得不為喪葬費用而乞求幫助。幾乎沒有什么錢的羅吉婭立即給了他150馬元，而塞達卡最富的哈吉·卡迪爾，居然一分錢都沒給，盡管哈姆扎經常為他工作。“我去請求哈吉·卡迪爾；他沒給（任何東西）；我知道他是不愿意。”就像大多數情況一樣，這種拒絕并非生硬的拒絕，而是故意的怠慢——沉默。就在這一年的晚些時候，我聽到哈姆扎向一個朋友抱怨哈吉·卡迪爾少付了工錢。哈姆扎幫忙將聯合收割機吐出的稻谷裝袋并且縫合麻袋。他本來期望可以得到一麻袋50分的工資，他裝了50麻袋一共可以得到25馬元，但只得到了5馬元。我問哈姆扎是否向哈吉·卡迪爾申訴了，他解釋說：“窮人不能（抱怨）。如果我生病了或者需要工作，我可能還得求他。我只能在心里生氣。”這是一個忍氣吞聲的人，哈姆扎痛苦地決定服從富人強加的規則——隨叫隨到、言行謹慎、恭順有禮。顯然，哈姆扎跟他的兄弟雷扎卡不一樣，也有別于其他很少請求富人幫助的窮人。

托·穆罕默德是個半退休的鰥夫，他跟獨身的女兒兩個人住在一起，他也經歷了相同的羞辱，但他不像哈姆扎那樣沉默寡言。[[281]](#_281_16)托·穆罕默德說，現在從富人那里得到大米的唯一辦法就是拿錢去買。“我們現在去問都很尷尬。他們會說，‘你也種大米’，‘如果你不夠吃，那就是因為你懶惰’。他們永遠不會幫忙的。”像帕克·亞赫等人一樣，托·穆罕默德知道富人會怎樣說窮人。村里的窮人面臨的困境是，過去的假設已經不再有效了。以前，他們可以合情合理地期望雇主給他們扎卡特饋贈、向雇主要求賽得卡救濟或者要求預付工資。現在，他們可以提出這些要求，但必須準備遭受令人感到恥辱的拒絕。在這種情況下被拒絕的饋贈并不單純是谷物了，更為重要的是，這種拒絕是一個鮮明的社會信號：窮人提出請求時認為還有效的富人與窮人之間的關系，已經被單方面地宣布為無效。富人已經表明，他們不再對村里窮人的急迫需求負有責任。

從塞達卡筵席承辦圈的衰弱，窮人看到了富人自私、不愿承擔社會責任的征兆。“瘦骨嶙峋的”瑪說，不會再有持續整個晚上并吃掉三四頭母牛的筵席了。相反，富人“只想著錢；他們只是想投資”[[282]](#_282_16)。“以前，富人想有個好名聲。現在他們基本上不做什么了；他們很精明。以前他們想炫耀，現在他們不想浪費錢財了。”“瘦骨嶙峋的”瑪補充說，富人們在過去可能花費2000馬元的地方，現在只肯花200馬元。蘇庫爾站在富人的角度，對富人的算計進行了想象。“如果筵席要花費500馬元，他們會問，‘用這些錢我們可以買多少東西？’”這樣他們就不會辦筵席，而會決定轉而購買一臺電視機。蘇庫爾總結說，富人“只想著今世”。對其他人來說，比如塔伊布，最氣憤的就是雇主雇用他們干活，卻不邀請他們參加筵席。正如塔伊布所說，“如果是工作的問題，那么富人就不得不去找窮人；如果是一個筵席，富人們要找一個會領唱圣歌或者可以背誦《古蘭經》的‘拉比’或者‘哈吉’，而不是窮人”。

在蘇庫爾最后的那個評論中，我們可以領會到他的指控中的宗教論調。考慮到今世之外，就是要考慮到安拉的審判，就要慷慨幫助和同情那些不幸的人。這種看法在極少數依然敬重筵席傳統的富人——主要是阿布杜爾·拉赫曼、哈吉·加法爾、勒拜·彭德克——的聲望中也得到反映。此外，根據窮人的民間信仰，對于不夠慷慨的懲罰并不僅僅局限于安拉的最后審判。哈姆扎等人相信，在筵席、扎卡特捐贈以及賽得卡救濟方面表現出的慷慨有利于使富人免遭像意外及疾病這樣的不測。哈姆扎說，這就是那些去麥加朝圣的人在出發前總要舉辦筵席的原因。哈吉·卡迪爾是出名的吝嗇，但他看起來身體很好，這怎么在他身上應驗呢？當我說這些話時，哈姆扎立即提醒我，哈吉·卡迪爾的妻子已經在醫院里待了很久了，她的腿已經不能走路了，而且哈吉·卡迪爾總是不斷陷入麻煩當中。哈姆扎暗示說，所有這些不幸都是安拉不滿意的跡象。從這些解釋中我們可以發現，窮人試圖對富人進行適度的社會控制，盡管其效用微乎其微。窮人們不僅相信貪婪的富人將在今世和來世遭受懲罰，而且，他們也的確希望，不幸和審判將根據富人們的行為降臨在那些咎由自取的富人身上。

## 記憶中的村莊

塞達卡的富人和窮人都在試圖理解他們在過去十年間所經歷的巨大變遷。在傾聽他們的傾訴時，我們會發覺自己處于一場意識形態的斗爭當中，盡管這種斗爭的規模很小。這是一場關于事實及其意義的斗爭，是一場關于“究竟發生了什么”以及“誰該受到譴責”的斗爭，是一場關于現有的境遇該如何定義、又該如何解釋的斗爭。在經歷了這段歷史之后，從某種意義上說，每一位村民都有資格成為一名歷史學家，事實上村民是被要求成為一名歷史學家的——有私心的歷史學家。這種歷史的核心并不是為了對過去經歷的那十年作出四平八穩或者不偏不倚的評價，而是要提出一種觀點，進行贊揚與批評，并維護或詛咒現存的事態。

如同在任何歷史當中一樣，評估現有的歷史必然涉及對逝去時光的重新評估。因此，為界定當下而導致的意識形態斗爭也是一場界定過去的斗爭。沒有什么比貧窮村民給出的解釋更鮮明地反映了這種斗爭，這些村民從過去的十年中幾乎沒得到什么，并且他們當下的前景看起來也是一片黯淡。他們集體創造了記憶中的村莊和記憶中的經濟，并以此作為譴責當下的有效的意識形態背景。[[283]](#_283_16)他們回憶起地租在莊稼收割之后才交付并且能反映實際收獲的時光。他們回憶起機械化之前的歲月，那時，大地主尋找他們作為佃農，而且地租也很適中。他們還回憶起收割工作很充足的歲月，那時，大農場主不僅預先支付工資、準許他們借貸、送給他們扎卡特饋贈，還經常舉辦大型筵席款待他們，大農場主通過這些方式來拍他們的馬屁。

并非他們的記憶出現了偏差。他們所指出的古老習俗與做法確實存在，并且的確對他們有利。然而，他們的記憶具有相當的選擇性。他們的記憶恰恰集中在土地使用和勞動關系這些對他們有利的方面，正是這些東西在過去十年間逐步受到侵蝕并且一去不復返。并不奇怪，他們并沒有詳細描述過去秩序中對自己不利的因素，因為這些因素對他們今天要表達的觀點沒什么用處。他們的懷舊——如果人們可以這么說的話——因此就如同他們的記憶一樣，具有相當的選擇性。為何村里窮人的敘述充滿了懷舊色彩？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過去十年的許多革新都從根本上妨礙了他們的物質利益。窮人們有充足的理由去留戀舊有的制度安排。我們已經看到，塞達卡的富人自己并不是不懷舊。但富人們的懷舊并不那么明顯，這恰恰是因為富人從現有的制度安排當中得到了更多的好處，從根本上說，現在的制度安排對富人是有利的。

這種根據當前利益對過去的重構讓我們回想起了黑格爾的名言，“密涅瓦的貓頭鷹只在黃昏時飛翔”。比如說，毫無疑問，塞達卡窮人在過去幾年間所遭受的損失，激發了他們以一種新的和同情的目光看待舊的制度安排。十年前，這些制度安排很可能不會得到如此褒揚；它們那時只是某段時間內指導稻米生產的理所當然的做法的一部分。只有在雙耕引起的新威脅的背景下，上述常規做法才被提升到值得敬畏的習俗、權利和權益的地位。只有在現在，被重估的過去才會成為評估可怕的當前的必要條件。

窮人的意識形態運作可以被視做一種整頓世界的努力，這個世界早已被雙耕搞得差不多天翻地覆了。窮人們隨處可以看到對傳統生產關系的激進的顛覆，所有這些變化都破壞了他們在村里的生存資源和地位。以前，大地主把土地租給貧窮的佃農；現在，地主們越來越多地把土地租給富裕的土地經營者，或者是地主自己用機器耕種他們的土地。以前，大農場主雇用他們貧窮的鄰居用水牛犁地和耙地；現在，大農場主雇用富裕的拖拉機主人進行備耕。以前，大農場主雇用窮鄰居給他們插秧；現在許多大農場自己撒種。以前，這些農場主雇用窮人給他們收割莊稼和脫粒；現在這些農場主雇用擁有聯合收割機的富人做同樣的工作。以前，富裕村民有充足的理由向他們所雇用的勞動力預付工資，并提供扎卡特饋贈；現在，即便這些富裕村民有活要做，他們也沒有必要像先前那樣大方了。以前，村里的富人有充足的理由用慷慨的筵席來給自己樹立一個好名聲；現在，許多富人認為這么盛大的筵席是在浪費錢財。總而言之，這些轉變的確質疑了雙耕之前控制著社會生產關系的所有假定。

新的安排不僅改變了塞達卡先前存在的階級結構，也改變了穆達平原絕大多數其他同樣種植水稻的村莊的階級結構。在早先的階級結構當中，恰恰是在相互依賴和相互利用的共生關系中，富裕農民和大地主跟貧窮村民聯結在了一起。盡管土地由于借貸及逾期不還等原因還在急速地集中，但是，只要土地還算充足，勞動力在農忙時也還算緊張，剝削就會受到限制。這種共生關系不僅表現在村莊的儀式生活當中（例如，富人要向窮人提供扎卡特、筵席和預付工資），還表現在了村中的政治生活中（那些富裕的政黨領導人能夠將絕大多數依附于他們的佃農和勞動力接納進他們的政黨）。與此對照，中農在某種程度上更為自主，他們在土地方面較少依賴富人，并且他們也較少雇用工人，他們更喜歡使用家庭勞力（或者換工）。

新的生產關系打破了絕大多數的直接依賴，而這種依賴正是早先的階級體系的特征。隨著機械化以及租佃制度的變遷，貧窮的村民不僅經濟上被邊緣化了，他們發覺自己在儀式方面也被日漸邊緣化。親緣關系以及間接的資助（由政府通過地方精英進行發放）依然將許多人同執政黨粘合在一起，但這種從屬關系不再嵌入在村莊的生產關系當中了。在雙耕之前，人們或許可以認為窮人是塞達卡的貧民或者說是次等村民。現在，他們依然很窮——盡管已經從極度的營養不良和饑餓中掙脫出來——并且肯定是次等階級。但是，我們越來越沒有理由把他們稱為村民了。

在這種或任何其他經濟轉型中，如果從屬階級的命運遭受了逆轉，就自然會出現一個問題：如何理解和解釋這些逆轉？在隨后的分析當中，我將考察這個問題的答案會在諸如階級意識、虛假意識、反抗和意識形態霸權等重要問題上引起的重大后果。但是，這里僅僅關注村里窮人的話語中所反映出的答案的主旨就足夠了。

我們很難從原始的經濟事實中推衍出吉打地區綠色革命參與者對這一革命后果的解釋。那些事實可以同多種解釋相符：它們可以被視為必然要來臨的洪水或干旱；它們可以被視為預言的實現或者安拉對偏離信仰的懲罰；它們可以被視為政府政策的惡性效應或者華人辛迪加聯合企業貪婪和財力的結果。

如我們已經看到的，事實上，上述解釋沒有一個在記錄中得到明顯記載，如果確實被記載了。相反，塞達卡的貧民階層把他們當前不幸的原因首先視為個人化的（就是說，人類能動性的結果）、地方性的，并且很大程度上局限在馬來人共同體的范圍之內。例如，他們認為，長期租佃制被廣泛采用以及小佃農遭到解雇，源于大地主（絕大多數是馬來人）攫取更多利潤的欲望。替代勞動力的機器的使用日漸增多同樣被視為大農場主希望節省金錢以及不愿雇用勞力的結果。地方慈善救濟的減少同樣反映了富人以名譽為代價保護其財產的意愿。在每種情況下，責難與譴責的邏輯都與施用于擁有土地并對被抵押土地的喪失負有責任的“哈吉”階級的邏輯相同。這里，更間接和非個人化的原因肯定發揮了作用。而它們被強調道德墮落、自私以及違犯社會禮節的視角所替代。如同窮人看到的，富人無情地選擇了無視他們自己對于窮鄰居的義務。我們又該如何理解窮人既關注他們現在面臨的輕視和無禮，又同時關注他們所遭受的物質損失？

窮人自然不是村里唯一使用這種邏輯的群體。盡管富裕農場主承認聯合收割機的速度及其帶來的收益，但他們同樣堅持，窮人已經變成了不值得信任的、挑剔的、懶惰的工人，已經不再值得他們的關照。通過這種方式，富人也為村莊社會關系的巨變找尋到了一個個人化的道德解釋。

然而，不論是富人還是窮人，都注意到了影響他們生存環境的更為廣闊、更為非個人化的力量。窮人和許多富人都理解新的安排背后存在的積累和投資的欲望。雙方都理解雙耕和機械化帶來了新的可能性。每個村民在頭腦中都同時有著令人難忘的個人的和集體的經濟史，其中充滿了肥料、種子、地租、稻谷、大米、魚肉、耐用品的價格、工資率。對于年老的農民而言，他們還可以記起半個世紀以來的稻谷產量。就像在任何此類口述歷史當中一樣，日期是同事件聯系在一起的，“日本人占領時期”、“我第一個孩子出生時”、“雙耕之前”，關注的焦點是收入、土地和工資的多少等諸如此類數字的后果。窮人完全知曉聯合收割機使他們失去了多少；富人也完全知曉他們獲得了多少。在地方經驗的范圍之內，他們明白資本主義的運作方式。富人和窮人都看到華裔經營者之所以能夠支付高額地租是因為他們自己擁有機械設備，而且華裔經營者不能讓自己的資本處于閑置狀態。正如他們所說：“華裔得讓他們的錢流通起來。”他們知道新的生產資料——拖拉機、聯合收割機、卡車——的主人現在奪取了原本由水牛的主人、收割勞動力以及搬運工所得到的回報，而且部分利潤現在流向了海外的制造商。窮人完全明白，因為許多人喪失了租佃權，他們已經被無產階級化。羅吉婭無論如何都不是唯一注意到“他們想讓我們變成苦力”的人，盡管她還大膽地加了一句，“他們不能這么做”。窮人還明白，他們正在被逐步邊緣化；他們談到了沒有工作，談到被晾在一邊，談到了所面臨的完全離開村莊的前景。

如果說窮人總是想著造成他們不幸的地方原因和個人原因，這并不是因為，窮人對于他們位居其間的農業資本主義這個更大的社會情境尤其“迷惑不解”或者無知。自然，他們并不使用抽象的或者說枯燥的社會科學術語——無產階級化、分化、積累、邊緣化——來描繪他們的生存境遇。然而，他們對于正在發生的一切有一套自己的民間說法：被迫成了苦力，富人越來越富而窮人越來越窮，正在被“晾在一邊”。這些說法很準確，與此同時，這些說法有可能比任何學術的政治經濟學提供更為豐富的情感意涵。

為了更快捷地尋找到他們苦難的直接原因，他們的選擇——因為這是選擇——同時包含了便利和策略兩個要素。就窮人而言，譴責直接損害了他們利益的那些人是很便利的。窮人觀察到馬來地主奪走了土地，或者親自耕種，或者租給華裔的承包商；但他們并未直接觀察到土地控制的集中。窮人觀察到大農場主不再雇用他們的鄰居，并且叫來了聯合收割機；但他們并未直接觀察到，辛迪加聯合企業或政府的政策使這一切變得可能。

窮人的選擇也是策略性的，這是因為，他們所關注的人類行動者（human agents）似乎正好在窮人的社會行動領域之內。[[284]](#_284_16)窮人希望影響那些他們為之工作的地主及大農場主；他們并不祈求影響華裔商業農場主或是由機器的主人構成的辛迪加聯合企業。畢竟，過去租給他們土地或者雇用他們工作的那些人將自己的行為描述為“幫助他們解決困難”，這暗示著富人應該有遵循村莊規范的美德。唯一合乎邏輯的就是，那些富裕村民和地主現在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而且，那些富人也應該受到譴責，因為富人們無情地漠視了——如果不是輕視的話——那些富人們自己曾經宣稱要幫助的人。村里的窮人因此選擇了將其怒火發泄到那些應該關照他們的人身上。在穆達農業資本主義轉型的情境中，窮人們的要求越來越受到忽視。窮人們的勝利——少數地主繼續把地租給小佃農、少數地主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依舊雇用人力收割、少數地主依然遵守施舍和舉辦大型筵席的傳統——微乎其微，并且很可能只是暫時的。窮人們的這些要求所依賴的社區感及義務感是正在快速消耗的優勢。然而，這的確是窮人們在這場保衛戰中的唯一優勢，[[285]](#_285_16)也是窮人們在考慮更加堂吉訶德式的目標前所能期望的唯一優勢。

# 第六章 延展事實：意識形態的運作

智者（homo faber）無法同工匠（homo sapiens）區分開來。每一個人，最終……都從事著一定形式的智力活動……他分享某種特定的世界概念，擁有道德行為的自覺邊界，并且因而有助于堅持關于世界的一個概念或者改變之，也就是說，導致思考模式的產生。

安東尼奧·葛蘭西，《獄中札記》

## 特定情境中的意識形態運作

塞達卡的雙耕以及機械化給富農和地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量致富機會。人們幾乎毫無例外地急切地抓住了這些機遇。

然而，為了利用這些新時機來進行資本積累，大農場主和地主剝除了許多以往曾將他們與貧窮村民綁縛在一起的經濟和社會紐帶。他們不得不雇用機器取代村里的勞動者，提高地租，解雇佃農，并且削減自己在村落內的禮儀及施舍義務。在此過程中，他們發覺自己多多少少是在一種意識形態真空中行動。我們在塞達卡以及穆達平原其他地區所觀察到的正是新興的資本主義農業階級，這一階級一直在穩步地擺脫它與勞動者和佃農的紐帶，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前資本主義的規范氛圍中行動，這種氣氛使得人們極難證明此類行動的正當性。在此意義上，他們是必須為自己辯解的資本主義者——公開證明其行為的正當性，但他們不能從馬來西亞的亞當·斯密的詳盡學說中獲益，更遑論邊泌或馬爾薩斯了。我們將會看到，富裕農場主為了使事情的真相有利于自身所做的痛苦而有創造性的努力，這使得意識形態的不利因素只是被部分地規避。

歷史地形成的、經協商而實現的村莊生活的道德情境，如果僅就意識形態而言，完全不利于較為新型的資本主義行為方式。這種道德情境由一套有關富人和窮人關系的預期和偏好組成。一般說來，這些預期體現為資助、援助、關照以及能否獲得幫助等習慣用語。它們適用于雇用、租佃、施舍、筵席舉辦以及日常的社會行為。它們意味著人們將對那些滿足這些預期的人充滿敬意、忠誠及社會認可。直白地說，這涉及某種“名譽政治”，在此，遵守某種行為規范將會使一個人獲得好的名聲。[[286]](#_286_16)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富裕農場主正在破壞的階級關系的道德情境是一個社會產物，而這一產物是由他們自身為了實現自己的目標一手創造的。它曾一度有利于農場主通過增加工資、禮物（如收獲后的扎卡特）或邀請赴宴的方式來雇用收割工人，并確保他們的忠誠。它曾一度有利于雇用佃農耕種其多余的田地并且在歉收之后調整地租以挽留優秀的耕種者。它不僅有利于他們以這種方式行事，而且有利于將此種行為表述為意識形態術語，諸如援助、幫助、仁慈以及同情等。由此，他們為自己的行為——一種當土地相對充裕而勞動力相對匱乏時很明智的行為——披上了資助和慷慨的語言外衣。這里并不意味任何冷嘲熱諷，只是意指展現人們竭力合理化自己行為的普遍趨勢。同樣，并不必然暗示較貧窮的村民是否完全接受其行為的社會建構，盡管他們不可能公開地對它進行挑戰。

人們按照社會圈子的遠近而獲得不同程度的這種聲稱的資助和慷慨。它最適用于雙系親屬群體以及同村的居民。在近親居住在同一村莊的情況下，對關照的要求尤其強烈。距離這一小圈子越遠，對于特殊關照的要求就越薄弱。

目前，在這些圈子里，不管是“意識形態”還是慷慨的慣例都并不僅僅是正在衰退的歷史記憶。盡管已不完整，它們仍存在于親屬租佃、對村內佃農的較低租金、施舍的殘留形式、村莊筵席以及優先雇傭當中。即使機械化也未徹底消除對零工的不時需求、對插秧工或者忠誠的政治追隨的需求。因此，塞達卡的富有農場主尚未徹底消除村莊生活的前資本主義規范情境。

然而，他們確實希望從根本上限制這些他們曾經從中獲利甚多的價值觀的適用性。今天，這些價值觀的充分使用將阻礙他們剝除那些處于他們和綠色革命的收益之間的社會義務。他們如何進行“意識形態運作”——他們的策略，它的邏輯、用途以及他們所遭遇到的反抗——正是本章的主題。我將從剝削的概念談起，它嵌于語言和實踐，并且隨后展現出富人和窮人各自如何試圖歪曲事實以使這些價值觀服務于派系和階級的目標。由于這些價值觀只能通過社會沖突而形成，我將考察它們在三種社會沖突中的實際應用：提高地租或解雇佃農的企圖、有關村莊“大門”的爭論以及圍繞村莊改進計劃的政府基金分配而進行的指控與反駁。最后，我將探究塞達卡的符號和意識形態斗爭的意義。

## 剝削的詞匯表

在檢驗不同階級的村民如何試圖加強或改變地方行為的規范情境之前，關鍵是確定這種情境是什么。圍繞階級關系而形成的信念和習俗絕不是固定的，因為如同任何形式的規范一樣，它們是持續不斷的斗爭與協商的歷史產物。然而，確定斗爭進程中產生了什么以及是什么形成了當前話語的規范環境的大致輪廓卻是可能的。這一規范環境或許最好地體現在剝削的詞匯表中，如同它在塞達卡所使用的那樣。

在通常情況下，知識分子和/或官僚使用的術語和范疇不會影響下層的市民用以描述相同情境的詞匯。因此，官方報紙和文件中用來描述穆達平原的灌溉型水稻種植的術語——綠色革命——極少在村里聽到；取而代之的僅僅是所謂的“雙耕”。精英與“百姓”話語中的概念分歧在剝削的例子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有一個標準的馬來語動詞（tindas, menindas），它可以被精確地譯做“剝削、壓迫、壓榨、不公正地統治”。它在村子里通常用來表示諸如用手指甲擠虱子這種乏味行為。然而，除了一兩個年輕村民顯然是在表現其受過學校教育之外，這一詞匯并不用于表達剝削的概念。[[287]](#_287_16)其他表示幾乎同一個意思的詞語——其中有tekan, kejam, peras, desak, sesak——偶爾可在村里的談話中聽到。每一個詞語都在傳達一種物理上的壓力的意義——擠壓、壓榨、沖壓、憋悶——這使其成為讓人想起敲詐與壓迫的專用工具。因而，當尼扎姆的東家哈吉·查希爾堅持提高租金和改變兩年租佃合同時，尼扎姆告訴我，“他想壓榨（tekan），他想吞食（makan）一切”。當地方上的反對派成員抱怨只有執政黨的成員才有機會被接納為政府土地計劃的移民者時，杜拉補充道，“政府其實在壓迫（tekan sunggoh）我們；我們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舉動（bergerak）。”一些暗示剝削的短語在傳達這一實際隱喻時走得更遠，并且暗示剝削者堅持他們合法的無禮要求。一位貧窮村民提到那些官員“坐在軟椅上”并且“鞭打（tutuh）村民的脊背”。另一個人則提到地主“在村民背上（”menenggala atas belakang）耕田。

因此，當談到表達剝削的概念時，幾乎不存在任何語言上的匱乏。然而，最為持久地受歡迎的動詞——日常對話中最經常聽到和含義最豐富的動詞——是“吃”（makan）。領工錢是“吃工錢”，收取利息是“吃利息”，受賄是“吃賄賂”，背叛朋友是“吃朋友”，壓榨某人是“吃他們的骨頭”，剝削別人是“吃他們的血汗”[[288]](#_288_16)。最平常的表達很簡單，“他想吃了我們”。這里，農民對食物的歷史性關注以及對類似于人吃人現象的控訴結合成一個強有力的、富于啟發性的隱喻。[[289]](#_289_16)此外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這一隱喻不僅被窮人用于描繪有權勢的人對他們的所作所為，而且也被富人用來形容窮人強加于他們的貸款和施舍的要求。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有關剝削的地方詞匯更多地存在于吝嗇和傲慢的概念中，而非以上這些動詞之中。當一個佃農抱怨其地主增加地租時，他只是有可能私下聲稱地主在敲詐（tekan）他或“吃”（maken）他。但他幾乎肯定會譴責地主吝嗇或貪婪（ke dikut, kikir, bakhil, berkira, lokek, tamak, keras hati, tankai jering, haloba），并且他通常還會譴責地主自大或傲慢（sombong）。一個要求雇主貸款或施舍的貧窮村民如果受到輕蔑地拒絕，他可能不會私下抱怨他的雇主在壓迫他，但他總是抱怨雇主的小氣和不知羞恥。這些私下譴責的詞語構成了塞達卡“民間”剝削概念的核心。總而言之，它們具體表現為同階級關系的意識形態密切相關的一些東西——此外，這種意識形態并非僅僅是村里窮人的觀點，它們還在相當程度上被富人所分享。

認為吝嗇是馬來村落社會的特點的成見清楚地體現在人們編造的哈吉·阿尤布（哈吉·布魯姆）的傳奇故事中。他對他的馬來伙計的剝削幾乎不容置疑，但他的突出的吝嗇才是被關注的核心。我們在上一章已經見識了對吝嗇的譴責是如何頻繁地出現在村民的議論中。當尼扎姆抱怨地主的壓迫（tekan）時，他也是通過引證他的吝嗇（berkira）和無情（keras hati）來對壓迫加以解釋。洛斯妮形容她的地主非常精于算計或者說吝嗇（sangat berkira），而剝削的事實可以從其行為中推斷出來。經歷一個歉收的季節之后，羅吉婭不可能奢望從身為她的親哥哥的地主那里得到任何仁慈，她痛苦地談到了他的冷酷無情（keras hati）。當塔伊布悲嘆這些日子租地的不易時，他和其他人一樣，將原因指向地主的“貪婪”（lokek）。雅各布以出賣勞動為生，自從聯合收割機到來之后，這種機會越來越少。他也把聯合收割機的使用歸因于近來大農場主的“益發吝嗇”（lagi kedekut）。當托·卡西姆特別指出現在施舍和大型筵席更少時，他解釋說，富人現在更吝嗇（susah berkira la'ni）了。甚至很富有的外村土地所有者哈吉·納揚在發現許多被解雇的佃農不得不遷走后，也將他們的窘境歸因于地主現在“更精于算計”（lagi susah kira）而重新使用機器耕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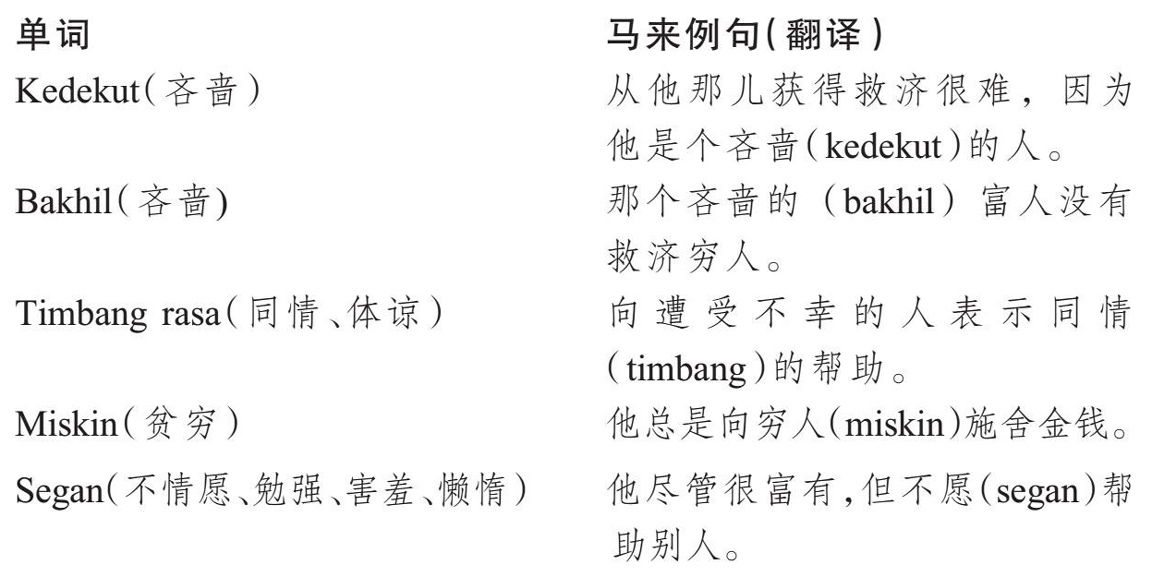
人們感受到的富裕村民的態度和他們遭受詛咒的方式的變化在穆達平原并不完全是新現象。穆赫扎尼在灌溉型雙耕開始前的玻璃市州附近進行的有關信用的研究中提道：

每當村莊里的談話導向互助主題以及把提供現金貸款視為援助同村村民的一部分時，對村民之間合作的日益減少以及對籌集友好貸款的難度越來越大的感嘆就難以避免地出現。諸如此類的陳述總是與村里人在有關金錢的事物上越來越精于算計（berkira）的現實結合在一起。村民還不知疲倦地重新提起“過去的日子”，那時人們總是隨時準備幫助別人。[[290]](#_290_16)

就塞達卡本身而言，掘井健三1967年的研究更普遍地影射“互助原則的弱化”以及“土地租賃體系正接近于土地所有者——佃農關系的階級面貌日漸鮮明的階段”這一事實。[[291]](#_291_16)我們有理由推測，我們今天聽到的對吝嗇的譴責并不僅僅是綠色革命的產物，而是代表了回應商品化壓力的更為悠久的倫理傳統。已經發生的一切正是機械化的影響極大地加劇了抱怨，并且將秘密控訴的呼聲提升到一個新的水平。

如同我們在哈吉·布魯姆事例中看到的一樣，所有對吝嗇的控訴都蘊含了一個對應當在窮人與富人間確認的關系的清晰觀點——某種意識形態。在對待窮人，尤其是窮的親屬或同村人時，富人應該體諒（timbangrasa），樂于助人（tolong），并且不自私（senang kira）。如同窮人所認為，此類行為應當包括提供雇傭、租佃、貸款、施舍以及適當的筵席。達到這些行為標準的有錢人可以作為不剝削的、行為適當的標準。

這些標準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嵌于譴責性的言辭當中，標準馬來語詞典中用來說明一些關鍵術語的句子也證實了這一點。[[292]](#_292_16)



在每個例子中，“吝嗇”都與富人的拒絕，尤其是拒絕幫助窮人聯系在一起；同情則與施舍相連，并且窮人被界定為適宜的施舍對象。

許多證據表明此處確認的規范性觀點并不限于穆達平原的農場主，而多半是馬來農業社會的普遍特征。[[293]](#_293_16)來自過去40年間馬來半島不同地區的田野工作報告提供了這方面的證據。雷蒙·弗斯的經典性研究《馬來漁夫：他們的農民經濟》，就是基于日本人占領前的東岸的吉蘭丹州的田野工作報告。他關于財富和慈善的討論會讓塞達卡的村民感到非常熟悉：

就整體而言，這一地區的富人通過勤奮和節儉積累了他們的財富。這兩個因素與富人應有的慈善做法相結合，或許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解釋了社區內的窮人對富人沒有明顯的怨恨的原因……怨恨和批評只有在下面的場合才會出現：富人沒有表現出慷慨，“他很吝嗇”，他不對窮人篤行慈善，不修建路旁的避雨棚或祈禱場所，或者不熱情款待。[[294]](#_294_16)

同樣的民風也見于斯威夫特的報告——這是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對森美蘭州日叻務地區的研究。

富人與沒有窮到依賴他人為生的村民之間的關系也并不那么融洽。苦難和嫉妒的力量是驚人的……富人是物質幫助的明顯來源，但是由于每個村子都只有很少的富人，他們總是要滿足別人的各種要求，自己卻幾乎沒有機會得到幫助。受助者并非滿懷感激地接受他們提供的幫助，而是把它當做一項權利，因為富人是他們的親戚或鄰居，并且他們富有；一份微薄的禮物對他們而言算不了什么。這種單邊關系造成了怨恨，富人總是憤憤不平，因為他們在被迫不斷地施舍，而他們的善良本性卻未得到充分的承認。受助者不滿則是因為，他們不得不要求施舍，然而并沒有得到更多。[[295]](#_295_16)

20世紀60年代中期，阿里·胡辛做了一項三個村莊領導權的比較研究，其中一個村子距離塞達卡不超過12英里。他對全部三個社區財富和地位的評論證實了弗斯和斯威夫特的發現。

財富就其本身而言并未受到極大的尊重，而是經常被視為受到村民厭惡的諸多罪惡的根源。一個冷酷無情或揮霍浪費的有錢人會受到憎惡，但另一方面，那些慷慨大方的有錢人則受到人們的愛戴與尊敬。[[296]](#_296_16)

最后，前田成文在最近的一項有關馬六甲州一個村莊的社會學研究中考察了慈善的做法以及相關的約束。他總結道：

單方面的禮物給予受到伊斯蘭精神的支持，而相互幫助則受到了共同體情感的支持，它更加強烈地被視為抵御未來可能的意外事故的保證。在前一情形（法定扎卡特）中，貧困和缺乏的人，無論誰都可以得到幫助。在后一情形中，助人者和被助者具有特殊關系，例如，他們是鄰居或親戚。在有需求的情況下，那些能夠幫助特定個人的人被期待那么做。[[297]](#_297_16)

從這些各不相同的研究中可以看出，非常類似的預期限定了馬來村莊中窮人和富人的關系。這里關鍵之處不在于這些期待能否在實踐中總被遵行，而是它們確實存在，違背它們會招致我們所觀察到的怨恨和譴責。這些期待的合法性得到三重保證。首先，它們符合馬來村莊生活的傳統價值觀念。此外，它們受到通行的伊斯蘭律法的有力支持，這些律法規定了來自富人的慈善與憐憫。最后，我們不應忽視執政的馬來政黨（巫統）在過去20年中的選舉政治方式對于維系這一規范遺產的貢獻。巫統在馬來社區內部的資助政治的基礎上塑造了選舉機器，并且依靠為其獲得尊敬和忠誠的慷慨來贏得選舉。國家——農民關系的固有模式明顯類似于我們正在考察的鄉規民約。

雖然上述精神正逐漸在塞達卡失去它的約束力，但即使在較為富裕的村民中間也完全沒有達到瀕臨消亡的地步。事實上，每當一個大農場主在描述他給予貧窮村民的作為“幫助”（tolong）的工作或者私人施舍時，就會訴諸于上述精神。它還用于伊斯蘭教共享的意識形態，這一意識形態把施舍視為“凈化”財富和促進社會和諧的手段。當一個親戚或鄰居獲得土地租佃權時，當齋月筵席前的貸款被發放時，當租金低于其市場價時，當人工勞動優先于聯合收割機的使用時，當舉辦一場大型婚宴時——每當上述情況發生時，上述精神就會含蓄地表現出來。所有這些做法盡管倍受攻擊，但依然是當前村莊生活現實的一部分。甚至當富裕村民批評外來的富人將他們的大片土地租給大企業主而不考慮自己人民的需求時，也同樣會訴諸于上述鄉規民約。

近來一些非常顯著和獨特的經驗研究進一步表明了這種鄉規民約及其運作。藤本明實考察了馬來西亞四個種植稻谷的村子（兩個在韋爾斯里省，兩個在吉蘭丹州），其目的是為了確定地租水平、田地價格、土地出租量，以及這些共同體內農業勞動力的數量及工資能否被凈收益最大化的新古典假設充分地解釋。[[298]](#_298_16)他在每一個案例中得出結論，現行的做法與這些假設并不一致，并且非經濟的收入共享假設在解釋次優結果時必不可少。因此，許多土地所有者事實上雇用了更多的佃農，收取了較低的租金，以更高的工資雇用更多的勞動力，而沒有遵循凈收入最大化的假設。顯然，他們這樣做并非出于慷慨的精神，而是對來自其鄰居和親戚的明顯壓力的一種反應。由此造成的微小的再分配幾乎不足以對現存的不平等產生本質的影響；然而，它的確表明這一精神對現行的實踐具有一定的影響。

不管是要求富人要有一定程度的慷慨的意識形態，還是其現行的做法，都是持續不斷的，盡管是低水平的意識形態沖突的領域。這一點應該被注意到，因為它們不僅對土地分配、工作和收入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也對聲望、地位及從屬關系的分配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在對動詞tolong（幫助、資助和援助）的使用和解釋中得到了最明顯的體現，它主要用于描述此類慷慨大方。

“幫助”是由一個村民給予另一個村民的，當它被描述為tolong時，傳達了發生在概念上對等主體之間的互助的含義。它涵蓋了諸如水牛或者廚房用具的短期借用、從鄰居那兒獲得烹飪材料的臨時之需以及（現在正在消失的）在插秧和收割期間田間勞力的交換等瑣事。[[299]](#_299_16)就我的目的來說，tolong的重要之處在于它意味著隨后一段時間由受惠者返還的同等（而非同樣）的獲益。這樣的幫助并不意味著接受者對給予者的任何從屬關系。甚至當幫助顯然是由富裕者給于一個較窮的鄰居或朋友時，tolong所表明的概念上的平等仍然保留下來。一個需要向大土地所有者租種土地的無地農民可能會問，地主是否愿意“幫助”他。請求臨時貸款或增加工資實際上也采用同樣的語言形式。所有這些例子中，暗示互惠的術語是恰當的，部分原因在于回報成為那個情境中的重要部分；佃農要交租和耕作，借貸者希望償還，勞動者將為他或她的預付工資而工作。當一個境況較好的村民要求一個窮人的服務時，tolong同樣產生作用。請求鄰居幫忙插秧、修補堤岸，以及割稻和打谷的農場主，即使這份工作是有報酬的，也總是要詢問鄰居能否“幫助”他。

在此類交換中使用tolong的功效在于強調有關當事人概念上的平等地位，盡管“事實”可能并非如此。使用這一客套語有利于富裕村民，因為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將現存的財產和收入的實際差別最小化與他們休戚相關。對于窮人而言，使用tolong的確是一種保全面子的說法，這能使他們免受被公開地視為低人一等或靠他人生活的屈辱。“幫助”的交換因而完全有別于事實上意味著從屬和低下的施舍關系。尋求不同于互惠性幫助的救濟將使自己置于永久欠債的位置，并且因此從屬于他的施主。[[300]](#_300_16)拉扎克是村里唯一一個經常愿意自取其辱地尋求幫助的人。

誰幫助了誰以及幫助多少——誰是社會債權人、誰是債務人——在被描述為tolong的關系中，總是一個爭論不休的社會事實。土地租佃以及人口統計的變化改變了游戲規則，這一事實使得事情變得更加復雜。聯合收割機投入使用以前，當收獲期勞力缺乏時，收割者和打谷者及時地收獲某個農場主的莊稼的確是在幫他的忙，至少看上去是這么回事。這一解釋體現在普遍實行的做法中：農場主通常給予在收獲季節為他工作的人稻谷形式的扎卡特禮物作為獎勵。獎勵的目的之一，就是引發一種感激之情，并且社會性地使雇傭勞動者感到有義務在下一季節中保持同樣的及時性和勤勉。然而，對勞動者來說，他們并不認為扎卡特獎勵是一件禮物，而是認為那是一項權利——作為收割工作常規的、預料之中的報酬的一部分。在雙耕之前，佃農和地主的關系也同樣可以這樣表述。村民堅持認為佃農供應不足，而需耕種的土地是充足的。考慮到他的其他機會，一個種田好手接受租佃就是在幫助他的地主，這是可以論證的。作物歉收后免除租金，從地主的角度看，可能是一種恩惠或讓步，而在佃農眼中，卻是隱含在合同中的慣例性權利。

我確信，只要各階級的聯系是直接的和個人化的，這類斗爭就一定會非常普遍。上層階級的成員希望把他們所支配的利益的可支配特征最大化，因為恰恰是這方面的權力產生了最強大的社會控制以及由此而來的服從。就下層階級成員來說，他們力圖將地主酌情給予的恩惠轉變為權利，據此他們自然就有權提出要求。倘若他們成功了，就不用再恭順地承認那些恩惠，就不再處于社會從屬地位，也不再受到屈辱。當然，最可能的結果是，通過語言和姿態的表達就此類事物的意義進行持續不斷的斗爭，因為在這類事物中，沒有一種見解處于完全的優勢。[[301]](#_301_16)

當然，現在雇傭勞動和租佃迅速減少。誰最有恩于誰也不再曖昧不明；佃農和雇傭勞動者認為自己有地可耕、有工可做，非常幸運，并通過公開的順從表示感激。雇用勞力的地主和農場主將會而且確實聲稱，他們只要雇用一個佃農或勞動者，就是在幫助他，即使租金可能更高更固定，或者工作更為分散和繁重。“幫助”的意義及其社會分量因此在某種程度上依賴于受惠者的需求，并且這種需求反過來又是大農場主目前在工作機會方面所享有的近于壟斷的地位的產物。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塞達卡的窮人私下里怨恨新形勢造成的地位喪失，但是對生計的考慮迫使他們采取一種公開的審慎的路線。

盡管使用tolong一詞在表面上保持了村民之間概念上的平等，但非常清楚的是，人們期待“幫助”主要流向一個方向——從相對富有的人流向有需求的人。這一預期可以清楚地從公然破壞規范的行為所引發的震怒中體現出來。托·艾哈邁德和沙姆蘇爾在5年當中以很高的季租從哈吉·丁，一個非常富有的外村人那里合租了大約10里郎稻田。當哈吉·丁宣布他希望佃農在地租之外再付給他幾麻袋稻谷作為扎卡特時，這兩人憤怒了。正如托·艾哈邁德告訴我的，“他自己來要，他想從我們這兒吃扎卡特！這怎么可能？好像我們（應該）幫助他！”[[302]](#_302_16)托·艾哈邁德憤怒的力量有賴于聽眾知道扎卡特和幫助在邏輯上應該是由富人給予窮人的，而不是像哈吉·丁所希望的——方向相反。他能夠直接提出這樣的要求，是他不知羞恥的進一步表現。這里和別處一樣，社會價值觀被宗教所強化。從這樣或另外的視角來看，伊斯蘭教不是順服和溫良的理由，而是一套譴責富人成了一種范式的價值觀。我們很難找到任何不同于托·卡西姆的理解：“富人理應提供幫助（di-suruh tolong）”，違反這一規則的人“不敬畏上帝”。人們一定是從較窮的村民那里聽到這一不斷被提起的規范。但同時它也牢牢地嵌入他們富有鄰居的話語當中。

猶如在日益增多的事例中所體現的那樣，當塞達卡富有的農場主不再給他們陷于困境的親戚和鄰居提供工作、貸款、扎卡特和小恩小惠時，他們將受到兩方面的指控。首先是常見的吝嗇和小氣的指責。正如托·卡西姆指出的，“富人以前很慷慨（senang kira）。我們曾經能夠求得幫助（minta tolong）。但是現在很難再求得他們的援助。他們現在是‘守財奴’（pakai nipis）”。阿布·哈桑談到哈吉·卡迪爾不愿意租給他田地時，同樣將拒絕幫助與對吝嗇的譴責聯系起來：“以前，那些有很多田地的人愿意幫助（tolong）那些沒有土地的人。他們曾經很慷慨但現在變得更聰明（cerdik）了，他們真的精于算計（kira sungguh）。”

第二種指責更為寬泛而且具有揭露性。它是對傲慢自大、自負和自以為是——將自我置于村莊社區之上，并因此置身其外——的譴責。如果說對吝嗇的譴責是指責拒絕慷慨和幫助，那么對傲慢自大的譴責則是指責否定村民概念上的平等。譴責某人自以為是（sombong, bongak, bongkak），或許是塞達卡最普遍和最具破壞性的詆毀人格的通行方式。它們大多是指向富人的，但也有例外。與此相對的特征——行為適當（meren dahkan diri, malu）——則受到很高的評價。最受尊敬的地方人物勒拜·薩卜拉尼正是因為符合這些要求而倍受贊揚。他的宗教學識和醫術為他贏得了很高的聲望，但他從不裝腔作勢。

簡單地說，一個村民對另一個村民共同社交禮儀的期待遭到拒絕會引起對傲慢的指責。拒絕或未能回復相遇時的問候將很容易招致指責。任何人若沒有邀請某個鄰居赴宴將面臨同樣的危險。如果一個人不和他人交往，并且回避村民相互間的善意玩笑，那么，他也會招致非難。并且，任何人若憑借其衣著、言語或者走路的方式顯露出優越高傲的跡象，都將理所當然地被指責為傲慢。[[303]](#_303_16)那些為了通過高中證書考試并在政府找份工作而數年徒然地留在村里學習的年輕人，以及那些拒絕在田里干活的年輕男子，通常被認為是傲慢。在所有這些例子中，村民并非沒有意識到在收入、財產、教育、宗教知識或技能等方面存在的差別是村莊生活的重要部分。問題在于，村民們要求按照承認共同的村民資格和相互關系的方式，即全體村民在概念上平等的方式來行事。[[304]](#_304_16)

富裕村民由于兩個原因尤其易于被指責為傲慢。首先，正是他們最有可能自視高人一等，并且擁有這樣做而相對免于懲罰的手段。其次，既然更有能力幫助他們的鄉親，他們作為公民的義務就被認為應該更多，像過去那樣。如果把塞達卡比做“一個家庭”——這種類比通常是由村民在指出某些人的缺點的情境下做出的——無視親戚和鄰居需求的富人往往趾高氣昂，并因此被視為傲慢。正如穆赫扎尼在其關于鄉村信貸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樣，拒絕借貸給處于緊急情況的鄰居的富人將被指責為傲慢。[[305]](#_305_16)吝嗇和傲慢這兩個詞語在用于富人時自然而然地連在一起。當“瘦骨嶙峋的”瑪談及富人的態度如何在過去十年中發生變化時，他說，“他們更吝嗇，更傲慢自大了”，似乎二者在他心中是同一回事。瑪·伊莎在相同情境下談及外村的地主時，認為“富人就像以前一樣傲慢自大；他們根本不考慮窮人”，仿佛他們的冷酷無情就是他們狂妄自大的一種表現。

富人如果對其義務熟視無睹就是傲慢自大，這種觀點很自然由當地窮人不斷地提出，對他們而言，人格詆毀是少數延續至今的社會武器（social weapons）之一。但這一觀點也并不僅限于他們，人們經常聽到富裕村民以幾乎同樣的詞語批評那些繼續耕種或者將大量土地租給商業佃農的外村的大土地所有者。但是，如果僅僅將其視做通過訴諸共同價值觀來要求富人遵守秩序的努力，我們就會錯失對傲慢的譴責背后的社會意義。為了免于譴責，一個富裕村民必須不僅留意其親戚和鄰居最緊迫的需求，還以tolong的精神去做，也就是說，以不讓受益人感到羞愧和屈辱的方式去做。助人者必須以至少是形式上保持互助的方式去做，即使實質上并非如此。否則，連一個仁慈的富人都不能免于傲慢自大的指控。頗具諷刺意味的是，窮人所需要的是無須讓人感恩戴德的救助。在這里，村里的窮人似乎總是處于自相矛盾的狀態。具有象征性的是他們試圖不僅要求施舍和援助，而且同時拒絕富人希望獲取的作為對他們善行補償的“社會獎賞”。[[306]](#_306_16)換句話說，他們在努力保護其重要的物質利益的同時，也試圖盡量減少有系統的單方面施舍關系所帶來的公開的社會恥辱。

然而，對傲慢自大的指控是一把雙刃劍。如果塞達卡貧困村民利用它來影響富人，富人同樣也可以更為成功地利用它來社會性地控制窮人的行為。富裕農場主的談話，經常將傲慢自大轉嫁給那些違反了他們認為得體行為規范的、更具攻擊性而不太謙恭的窮人。這一譴責尤其涵蓋了這樣一些村民：他們要求把獲得幫助（tolong）或施舍視為一項權利，而并沒有通過順從、小小的效勞、忠誠或社會支持等方式向施主表示適當的感激之情。它也涵蓋了那些堅持在開始工作前就確定工資水平的男女雇傭勞動者。從農場主的觀點來看，這些事情理應由他決定，并且發放收割工作報酬的恰當時間應該是在他賣出稻谷之后。違反這些預期（經常是由于過去的痛苦經歷）的勞動者被認為是“傲慢的”（sombong）。拒絕工作或者，更糟糕的是，接受工作卻拒絕出工的窮人也會落入同一范疇。因而勒拜·侯賽因私下嚴厲批評某些逃避工作但仍然希望得到農場主禮物的貧窮村民。他聲稱他們是難以相處的、不合作的，并且妄自尊大。哈吉·卡迪爾用幾乎相同的言辭批評無地的勞動者瑪·納西爾，因為只有當工資高到令他滿意時他才愿意工作。“他難以相處（payah）、不愿合作（rukun tidak mau bikin）并且妄自尊大（sombong）；我們（村民）不應該如此精于算計”，他總結道。

從上述以及我們聽到的其他譴責中，我們可以非常簡單地構建出富裕村民所認為的“好窮人”肖像。事實上，沙赫儂在表揚一個從他母親的村子季節性地來為他干活的人的過程中，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理想型”的素描。此人是他的遠親，總是在沙赫儂需要他打谷的時候到來；他認真地為每一捆稻谷徹底脫粒；他在收割結束前每天都來，他從不詢問工資是多少、什么時間發放，他全聽沙赫儂安排；他從不要求扎卡特獎勵，而是完全由沙赫儂自行決定。對來自塞達卡本地的工人來說，評判標準雖然類似但更為寬泛。一個好工人不僅應該在雇主要求時不計報酬地從事任何工作，而且應該不同于許多窮人，他不應該在富人背后誹謗他，他應該謙恭，也就是不傲慢也不難相處。

這一“好窮人”的合成素描只是一個“理想型”，如果有人要根據村里的窮人在富人當中的聲譽來對他們進行分類，那么每個真實的窮人都是一個黯淡的影像，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好窮人”類型的人幾乎是不存在的！阿布杜爾·拉希姆、哈姆扎、曼蘇爾以及帕克·亞赫擁有心甘情愿服從雇主的最好名聲；但即使對此也是有意見分歧的。許多更窮的村民顯然具有傲慢自大和挑肥揀瘦的惡名，其中包括瑪·納西爾、杜拉、塔伊布、“瘦骨嶙峋的”瑪、羅吉婭、洛斯妮、奧馬爾、蘇庫爾，當然，還有拉扎克。有人可能會想到，最恭順的窮人在他們的窮鄰居那里并不會得到他們從富人那里得到的那么高的評價。我還聽說村里其他的雇用勞動者把阿布杜爾·拉希姆和曼蘇爾貶低為“好好先生”或奴隸，即只按照其雇主的吩咐行事。

在自負和傲慢自大這一微妙的領域里，我們再次遭遇有關對村里貧窮工人的社會控制的小型意識形態斗爭。在富人眼里，恭順的品性和忠誠的服務是“好窮人”必備的素質，然而這在其他雇傭勞動者看來卻是有損身份的特征。窮人彼此之間很少能提供工作或者施舍，因此，上述斗爭并不是平等的，其中公共行為至少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富人的期望。

## 歪曲事實：分層與收入

規范性情境僅是一個情境，而不具強制性。它為塞達卡的勝利者和失敗者之間的沖突提供了一個場景。沖突各方都是這樣的操作者（bricoleurs）：他們或者擁有一套既定的工具，或者有一套在很大程度上暫時給定的各種主題。這些主題包括諸多規范預期，如相對富裕的人對其不那么富有的鄰居和親戚應該慷慨一些，這種慷慨應該以無損尊嚴的形式（tolong）給予，并且無論富人還是窮人都不應有傲慢自大和不體面的行為。誰是富人、他們應當如何慷慨、他們的慷慨應該采取何種形式、何種形式的幫助才與尊嚴相適合，以及何種行為是傲慢的和不體面的，正是這些問題構成了戲劇的主要內容。

在這些寬泛的限定內，富人和窮人都發展出了旨在盡可能使規范原則服務于自身利益的操作策略。[[307]](#_307_16)那些利益直接受到這些價值觀威脅的富人試圖歪曲它們，以盡量減少其義務，并將自身置于最有利的位置。當然，在某種程度上，他們越來越可以只發展壯大自身，他們使用機器、放棄使用佃農和工人、削減自己的儀式和慈善負擔；然而，他們還關注自身行為的正當性，不僅對他人也對他們自己而言，因為他們也處于同樣的道德界限內。對村里的窮人來說，對現有的同情少一些歪曲和壓榨是必要的，即使僅僅因為這些同情至少是象征性地對他們有利。更為直接的是，他們力圖在現存的規則下使富人的義務最大化。

隨后發生的或持續或短暫的意識形態斗爭總是非決定性地在幾個領域內展開。其中的一個核心領域就是分層和收入領域。除非首先確認誰是富人誰是窮人以及他們富有或貧窮的程度，否則，評價他們的行為就是不可能的。因此，首要的問題——沖突的首要領域——就是關于這樣一些事實的：它們一旦被確認，就構成社會預期發生作用的框架。

塞達卡的富裕家庭在這一領域響亮的和堅持不懈的戰斗口號是“我們不富。”它以不同形式一再重復。這些形式多得令人眼花繚花，但相互間又是統一的，它們遠遠超出了僅僅是謙遜的程度。例如，無論是個人還是集體場合，富人從不說他們自己“富裕”（kaya）。事實上，他們只是極少地使用senang，或者說“舒適”這個詞，這個詞經常用來表示村里手頭較為寬裕的人。完全根據他們自己聲稱的經濟地位進行表面評價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他們僅僅是收支相抵。由此，他們總是稱自己有足夠的吃的，或僅僅可以填飽肚子。吉·亞赫，一位離了婚的婦女，由于她的家戶很小還算富裕，但她形容自己“剛能糊口”。勒拜·彭德克是村里第二富有的家庭的家長，他耕種13里郎土地并且擁有一輛拖拉機，但他只承認自己僅有“很少一點”稻田。如果是一個大農場主就會強調他的地有多少是租來的而不是自己的；如果他擁有大塊的土地，他就會強調他的土地如何貧瘠以及他有許多孩子。[[308]](#_308_16)

在其他方面，富裕村民也煞費苦心地強調他們根本不比他們的鄰居富有。因而，他們不失時機地指出，他們和其他人一樣是農夫，并且和其他人一樣種植水稻。誠然，倘若人們愿意將種植20里郎土地等同于種植半里郎土地，并且無視一些村民根本無地可種的事實，那么，這種說法很大程度上就是正確的。在此，他們充分利用了那些依然支持所有村民名義上的平等的無力事實，以此來避免被視做特權階級。

然而，當地的分層術語并不對稱。盡管富人形容自己只是很節儉，窮人卻幾乎毫無例外地形容他們很“富有”。他們在聽力所及的范圍內小心翼翼地不那么做，除非是在私下里或者在適當范圍內與其他村民在一起時。公開的舞臺再一次被富裕村民控制，然而在舞臺背后，窮人卻不失時機地直言不諱。就像“瘦骨嶙峋的”巴卡爾一樣，有幾個人都談到有錢人是富人“群體”——或者富有階級。盡管塞達卡的最富有者正如窮人所認為的那樣的確非常富有，但窮人稱富裕村民“富有”并不僅僅是按照他們的比較標準得出的結論。我們將會看到，窮人在強調并且夸大他們的富有鄰居的收入和財產時有著既定的階級利益。

如果說富人一貫刻意地保持低調并且對其經濟上的舒適程度輕描淡寫，那么塞達卡的窮人也沿用了強調其貧窮的類似策略。他們堅持“我們太窮了”。因此，他們向旁人，尤其是富人，形容自己“手頭很緊”（susah）或者“極度地窮困潦倒”（sangat susah）。由于表達“貧困”（miskin）的標準的馬來詞語包含有損身份的乞討的含義，他們避免使用這個阿拉伯外來詞，而是用susah取而代之。同senang相比，susah著重于描述生活質量——實現收支相抵的難處——而不是固定的經濟地位。他們利用每一個有利時機一再重申他們只有很少或沒有土地可以耕種、無法找到足夠的工作、不得不購買供他們食用的大米，以及以可以贏利的租金租入更多土地的前景幾乎消失殆盡。

富裕村民斷然否認窮人這種帶有欺騙性的自我描述。在這種情境下，哈吉·沙利姆提供了可以稱做根據富人看法的事實：

以前我們曾有窮困的人——實實在在的窮人，他們窮得揭不開鍋。以前有10%的人不得不買米吃，但現在所有人都不必買米了。以前，窮人很多而過得舒適的人很少。現在依然有一些窮人，但窮人不再像以前那么多、那么窮了。當我們需要他們（來工作）的時候，我們卻找不到足夠的人。他們有足夠的東西，并擁有新的援助，即使他們不工作，他們也可以有吃有穿。（這就是為什么）他們不勤奮工作。

所謂的勞動力短缺和用以解釋這種現象的繁榮之間的關聯尤其重要，哈吉·沙利姆正是由于上一個季度獲得許可從泰國運來勞動力栽種水稻，而遭到窮人的激烈批評。然而，他的觀點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得到了塞達卡幾乎所有富裕農場主的附和。他們抓住了少數小佃農現在也雇用聯合收割機這一事實，將其作為后者富足和懶惰的證據。達烏德是村長哈吉·加法爾的兒子，他發現洛斯妮和塔伊布曾經雇用機器并因而說他們懶惰，因為“這些只耕種兩三里郎土地的人理應自己動手”。“如果他們的確需要錢，他們理應自己去做這項工作。”只要一個窮人被看見在咖啡店吃飯，只要貧窮的男人或女人穿了新衣服或新鞋子，只要他們買了最便宜的魚之外的任何東西，只要他們乘公共汽車去走親訪友，都將被視為他們假裝貧窮的進一步證據。

對我來說，有關經濟分層的事實的持續不斷的爭論從研究一開始就很清楚。在塞達卡最初的幾個月中，我非常重視走訪每戶家庭以獲得有關各家農事和收入的基本“事實”。鑒于當地的社交模式，大多數談話都有碰巧在場的充滿好奇心的鄰居參與。于是有趣的模式出現了，例如，如果我問一個窮人他和妻子在插秧、收割、打谷及其他工作中能收入多少現金，他通常會在妻子的幫助下心算一會兒之后得出一組數字。[[309]](#_309_16)但這些數字經常受到一個或者更多的旁觀者的質疑。比如說，如果這個人說他打谷賺了150馬元，其他人可能會說，“不是，應該更多；你為某某打谷五天，給你叔叔又干了一個星期，還在雙溪布浙村為哈吉某某干了點事情。”“上個季度你打谷至少掙了200馬元。”過了些日子，我才意識到相對富裕的村民總是懷疑窮人的估算，并且他總是聲稱后者賺了更多。[[310]](#_310_16)類似的爭論經常圍繞一個窮人從較富有的家庭得到多少扎卡特禮物而展開，而富人總是斷言窮人所得到的稻谷要比其聲稱的多出一兩麻袋。諸如此類的爭論很少過于激烈，并且總是以爭論雙方各執一詞而無果而終。

當我和有錢人談到他們的收入、產量和地租時，上述模式的一個鏡像（mirror-image）展現出顯著的不同。他們也會得出一個數字。然而，在富人中間從不象窮人那樣公開爭論數字本身。相反，在隨后幾天中，事情可能出現在另一小群體的談話中，或者有些當時在場的人會在私下里接近我。如果某個大農場主聲稱他的8里郎土地上每里郎產量是13麻袋，人們可能不同意并且提出每里郎的產量是15麻袋，甚至可能會指出該人沒有提到他在另一個村子還另外擁有一或兩里郎土地。我很快意識到，提供修正后數字的人往往來自塞達卡的較貧窮的階層，并且他們總是提供遠遠高于富有村民所報告的收入和財產的數字。當大農場主談到給予勞動者的扎卡特禮物時，窮人——通常是正在被提到的勞動者——總是會堅持說禮物比富人所聲稱的要少。[[311]](#_311_16)

富人和窮人同樣——對我和對彼此——說明自己比實際情況要窮一些，這一事實并不重要。這只不過是一個曾經負擔沉重的階級試圖減輕負擔而采取的通常的掩飾姿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在當地每個階級關于村莊分層的觀點中還是在關于收入多少的爭論中，人們都可以發現一種清晰的模式。富人和窮人之間的經濟差距因為各自采取的不同觀點而存在非常大的差別。在富人看來，這一差距很小；他們自己不過是勉強將就，而那些宣稱自己貧窮的人實際上卻過得不錯。與這一觀點相一致的是，他們堅持認為自己的收獲有限而窮人的收獲卻很充實，他們對于雙耕的影響的看法，我將在最后一章詳細論證。在他們看來，塞達卡的社會分層是一個相當平等的場景，在那里人人都種植水稻，那里真正的富裕和真正的貧窮都不存在，并且那些確實比別人富裕一點的人都非常慷慨。然而在窮人看來，經濟差距要大得多；富人要比他們假裝出來的富有得多，而窮人確實很貧窮。相反，他們所認為的塞達卡的社會分層是一個極為不平等的場景，那里少數有特權的人壟斷了土地和收入，窮人僅能糊口而且沒什么希望，那里慷慨行為極為稀少并且微不足道。[[312]](#_312_16)

至此，與對經濟現實的這些不同解釋關系密切的階級因素已經很明顯了。這些解釋因“游戲規則”被游戲參與者廣為接受這一事實而引起，這些規則為富人們制定了某些慷慨的標準。然而，非特定的、不固定的以及因此可以在一定界限內被操縱的是某一特定家庭或戶在既有的義務模式之內的位置。塞達卡的“有錢人”將不平等最小化，因為如此他們還可以將他們為窮鄰居提供工作、大米和土地的義務最小化。如果他們的鄰居不窮，并且他們自己也不富有，那么有關他們義務的問題就不會產生。實際上，當事后分析時，他們還可以補充說，可能存在的微小差別是由于某些原因（懶惰、愚蠢和目光短淺）才出現的，這些原因使村里的少數窮人沒有資格受到特殊的關照。相反，塞達卡的“窮人”之所以夸大不平等，是由于這么做同樣可以最大化富人在既有的價值體系下理應對窮人負有的義務。一旦這些巨大的不平等被接受為社會事實，隨之而來的將是，村里富人的吝嗇和自私自利行為就會公然破壞共享的傳統規范。簡而言之，我們所觀察到的并非關于某些事實的觀點上的瑣碎分歧，而是對事實的兩種社會建構之間的沖突，兩者都是為了促進不同階級的利益而謀劃并運用的。[[313]](#_313_16)

## 合理化的剝削

顯而易見，在過去十年中，土地租佃期、地租以及雇傭方面的大部分變化破壞了或者嚴格地限制了先前同情的適用范圍。在此我要考慮的問題是，這些變化如何在意識形態層面被接受，它們如何被表述？塞達卡內部和外部的不同階級如何堅持他們的訴求以及如何面對反抗？近距離考察這一主題就是要觀察意識形態的運作，它在剝削的合理化和反抗這一合理化的過程中的確發揮著重要作用。

在此，我們關注表象，關注經濟和政治權力行使過程中總是戴著的面具。這一領域的事情很少像其看上去那樣；我們應該想到偽裝，不論這偽裝是否是有意為之。這一過程中沒有什么令人驚訝和神秘的東西。解雇部分勞動力的執行者可能會說他“不得不放走”。對其行為的這一解釋不僅意味著他在這件事上別無選擇，而且意味著那些被他“放走”的人得到了幫助，這就像被拴著的狗最終獲得了自由一樣。這一慷慨行為的受益人可能會持不同意見；他們的隱喻通常更加豐富多彩：“我被炒魷魚了”，“我被開了”。如果受害人無法接受執行者的看法，他會得到一個道歉。然而無論越南農民用何種語言描述美國軍隊對他們的所作所為，人們都可以確認這并不是“和解”。[[314]](#_314_16)

然而，偽裝是可以診斷的。這一點在雙方處于部分敵對部分合作的關系時尤其如此。這里，相互的訴求和反訴求可能以這樣的語言加以表達：每一方都有理由確信，對方將會做相關的與合理的考慮。因而，當有人要求雇主漲工資時，他很可能援引他的勤奮、他的忠誠以及他對雇主事業的貢獻來支持他的要求，而不會說他想要一輛新汽車或者一次花費昂貴的假期。而希望回絕漲工資要求的雇主則可能提到停滯的利潤、雇員間的平等以及現在的工資已經相當高了的事實，而不會說雇主自己想增加利潤或者投資新的生意。這里的有趣之處并不在于此類要求的真正價值，而是其提出的方式，它們能幫助我們確定什么才是看起來會被各方共同接受的話語領域。

在此情境中，我想了解的是，當一個地主決定增加地租、改變租佃形式或者實際上解雇佃農時會發生什么。這種決定如何向佃農提出，如何向佃農證明其正當性與合理性？佃農又用什么樣的措辭反對這一要求？此類情形都具有診斷價值，因為它們典型地涉及到原則上什么行為會被看做是對共同價值觀的嚴重違背。除了少數例外，某些相對富裕的人會在這種情況下，試圖從一個更窮的人那里抽取更多的地租，或者拒絕給予他/她生產資料。如果它公開背離了富裕農民在其財力所及的范圍內應該幫助其不那么幸運的鄰居和親戚的規范，這樣的要求怎樣才能被合理化？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搜集了盡可能多的在這種對抗中人們實際上會說什么的材料。

盡管增加地租總是很棘手的事情，但自1960年代以來，這種現象還是有規律地發生。在那之前，當地價和稻谷價格很少變化時，租期和地租水平也都相對比較穩定，而且，這種穩定源于社會壓力。正如1953年的稻米生產委員會報告所指出的，隨意增加地租的很少，“因為輿論將反對任何地主堅持高地租，或者解雇通常勤勞和用心耕作的佃農。”[[315]](#_315_16)甚至到今天，塞達卡依然有一個共識，如果地主要提高租金，他在把地租給其他人之前一定要依照習慣，問問當前的佃農是否想繼續租賃。據我所知，村里只有一個例子可能破壞了這個習慣。[[316]](#_316_16)

增加佃農地租的棘手程度當然要取決于一系列其他因素。我們從來沒有涉及到一個抽象的地主和他抽象的佃農在一個抽象的情境中相互對峙的情形。稻谷的價格[[317]](#_317_16)、地主和佃農之間親屬關系紐帶的親密程度、佃農耕種土地的年數以及雇主相對于耕種者的富裕程度，所有這些都是影響關于交易的社會見解的關鍵因素。一般說來，當稻谷價格劇烈上漲時（在固定的現金地租下增加了佃農的回報），當地主和佃農不是親戚關系時，當佃農是短期租種者時，以及偶爾發生的，地主顯然比佃農還窮時，地租的上漲最容易被接受。相反，當所有這些條件反過來時，高地租很難被認為是正當的。

洛斯妮和她的地主阿布·薩曼（一個外村地位）的事例就落入了這樣一個很“棘手”的境地。當阿布·薩曼一年前提出要增加租金時，谷價自上一次在1974年租金增至600馬元（或者每季每4里郎土地150美元）以來再未發生過變動。由于生產成本增加，洛斯妮自己的利潤一直在下降。她已故的丈夫和地主是非常遠的親戚，她和丈夫從地主的祖父手中租到了土地并且耕種了二十多年。洛斯妮并不富有；她除了這4里郎土地之外沒有其他土地，自從她9年前守寡以來只能努力憑借插秧和收割等艱辛的雇傭勞動養活七個孩子。相反，阿布·薩曼擁有超過25里郎的稻田和一個很賺錢的店鋪，是一個富人。

在此情況下，阿布·薩曼避免直接提出這個問題就不足為奇了。通過共同的朋友，他選擇了“讓人知道”他想把租金提高到一季4里郎土地700馬元，并且他要預先拿到兩個季的地租。阿布杜爾·拉赫曼在聽見洛斯妮談到地主的迂回策略之后，幫我解釋了他為什么要這么做：“他不想自己來；他覺得尷尬和勉強，因為他和洛斯妮有親戚關系。”[[318]](#_318_16)他的解釋聽起來很有道理，這是因為在有可能出現對峙或者令人感到羞辱的拒絕的棘手情況下，這種間接的提議是比較普遍的做法。它還是傳達批評[[319]](#_319_16)和提出微妙的婚姻協商問題的手段。如果批評不奏效或者結婚建議被拒絕，這個方式能夠讓發起人體面地放棄甚至否定這個提議。阿布·薩曼對中間人的使用是一個強有力的但并不是最終決定的信號：他知道他的要求不合情理。當洛斯妮并未經過同一渠道做出答復時，阿布·薩曼除了直接來提出他的要求之外，很少有別的選擇。

在必需的客套、咖啡和糕餅之后，阿布·薩曼談到了他的來意。他聲稱，因為“我的境況也不好”，所以需要增加地租。妻子生了病，他得支付大額的看醫生和住院費用；他已經靠抵押自己的其他土地借錢并且不得不還債，否則就會失去這些土地。從洛斯妮的立場來看，他的悲慘故事是徹頭徹尾的不誠實的表現，一個字都不值得相信。但是當然她沒有公開對這個故事提出質疑，而是根據她自己的境況做出答復：上個季度收成很差，她大女兒懷了孕，所以沒辦法插秧掙錢，孩子們需要校服，并且在下次收獲前她已經沒有什么錢來維持生計了。就我的目的而言，有意義的是，阿布·薩曼增加地租的理由完全是基于需要。不管這個案例是否有價值——很有可能沒有——阿布·薩曼實際上裝做他自己和洛斯妮一樣貧窮，甚至比她還窮。他這么做有效地肯定了他必須在規范的框架內行動。獲取更高地租的唯一正當性是把自己劃入有急需的一方——這一方最需要幫助和同情。同樣的邏輯也通行于有關分層和收入的討論。隨之而來的行動策略是象征性地對富人應該幫助窮人這一共同價值表示尊重，然而事實卻是完全有利于富人那一邊。盡管如此，阿布·薩曼打出的交易的最后一張王牌是，提到還有其他人要租地。他無需再說什么，會談無果而終，但一星期之后，洛斯妮讓兒子送來了高額地租，但只是這一季度而不是兩個季度的。從阿布·薩曼接受這筆錢并且隨后保持的沉默來看，顯然他接受了這一雙方默認的談判達成的妥協。

托·艾哈邁德和沙姆蘇爾兩人從外村地主哈吉·丁那里合租了6里郎土地，他們同樣落入了這樣一個棘手的境地。他們二人租種這塊土地也有將近三十年之久了，而且托·艾哈邁德和地主有較遠的親戚關系。他種了6里郎土地中的4里郎，按照塞達卡的標準應該算是中等水平，但是他除了從哈吉·丁那里租的地之外再沒有其他土地了；與此同時，沙姆蘇爾由于在附近的政府稻米加工廠當濕度檢察員的工資而相對富裕。然而，兩人都比哈吉·丁貧窮得多，哈吉·丁是退休的稻谷經銷商，擁有20里郎土地和兩臺拖拉機。與阿布·薩曼不同，哈吉·丁沒有采取迂回戰術而是直奔提高租金的主題。[[320]](#_320_16)他堅持一季度每里郎180馬元而不是150馬元，他的論據同阿布·薩曼的主張相比只有細節上的而非實質上的不同。他同樣借口自己的日子不好過，并且詳細說明他計劃增蓋的房子所需的材料如何越來越昂貴，強調他家里有14個子孫，他們都要吃穿，他還說到他在一小塊果樹地上欠了債。總而言之，他聲稱自己很窮。他的困境一點都沒觸動托·艾哈邁德和沙姆蘇爾，他們私下里說他在撒謊——也就是說，這個人竟然要從他們身上收取扎卡特，而他們知道他富裕到什么程度。盡管如此，在他面前，他們稱自己也很貧窮：稻谷價格并未上漲；肥料和拖拉機的花費在一路上漲；收割之后他們手里只剩下僅供糊口的大米。這樣的對話我們已經很熟悉了。當事人差不多都得被迫接受一套通行的價值標準，它表明向較窮的一方做出讓步是合理的。如果說托·艾哈邁德和沙姆蘇爾的要求至少看上去是有道理的，那么，哈吉·丁擺出的姿態幾乎就純粹是在演戲，因為在現存的價值標準中并沒有任何其他途徑能證明他的要求是正當的。

唯恐他的故事無法贏得佃農們的同情，哈吉·丁提出了最后的威脅。他提到他的孫子鬧著要種地。這一威脅并非沒有效用，因為哈吉·丁要收回托·艾哈邁德和沙姆蘇爾先前耕種的10里郎土地中的4里郎。面對這種警告，佃農們不久就只能不情愿地接受地主的條件。

諸如此類的補充記錄可能會不斷地增加。蘇庫爾指出，當地主要求更多的租金時，他們不得不說自己沒什么錢，日子不好過。他確信，這類表演是必要的常規，并補充說，這也是哈吉·卡迪爾用來拒絕借貸或增加工資的“腔調”。由于佃農總是擔心失去土地，結果當然很少存在疑問。“你不得不接受，否則他就會更換（佃農）。”“如果你失去了土地，那就完了，你得回到拿著鋤頭掙工資的地步。”華喜德說，他的地主要提高租金時總是聲稱他“沒有足夠的錢”，雖然地主和他的妻子都是領工資的學校教師，而且還用他們的積蓄買了很多橡膠樹和稻田。加尼·勒拜·瑪從他的表親那里租了土地，他的表親想加租時總是說，他日子過得緊巴巴的，盡管實際上他過得很舒服。拉齊姆從他兄弟那里租地種，后者收入不菲但是用同樣的伎倆聲稱自己的生存壓力很大，以此證明提高租金是正當的。在他和其他人的案例中，這種說法通常有一些細節的支持，而設計這些細節的目的就是證明更高征收額的正當性。

除了個人的厄運——債務、疾病、兒子不務正業、歉收——以外，地主還可能提出各種其收益減少的因素，諸如土地稅和通貨膨脹，他們也會提及由于稻谷漲價或新的肥料補貼而帶來的佃農收益的增長。這里的邏輯訴諸于土地所有者和佃農相對利潤的變化。如果當前租金明顯低于該地區的平均租金，地主就會指出這一點。在此情境中，地主可以聲稱他過去過于慷慨了。在其后相當長的時間里，雙方通常會致力于爭執平均租金到底是多少、被談論的土地的好壞程度、收成怎樣以及佃農在交租和消費開支后還能得到多少利潤。關于收入的問題，地主會夸大土地的肥力和佃農的利潤，與此同時，耕作者也不失時機地貶低土地品質和少說其收成和利潤。總而言之，這些細節都在為努力確定雙方的相對需求的話語做注腳，而這樣的談話反過來也是確定相互義務的共同觀念的支撐點。

這些沖突的標準情境或許突出地表現為其對前資本主義的友善的敬意，即使這種敬意扭曲而可疑。地主極少放棄特定的儀式而不加修飾地對佃農提出要么接受要么就滾開的提議。哈吉·納揚指出，這種粗魯的做法只有在主人說“今年我要提高地租到175馬元；如果你不要這塊地，我就把它租給別人”的時候才會出現。當然，考慮到土地和工作的短缺，這一強制性的選擇恰恰是佃農通常要面對的；如果不屈服于壓力，就會失去土地。然而，由于規范性氛圍的需要，象征性的禮節幾乎總是可以觀察到的。正如瑪·薩里夫所說，“地主不得不說他日子不好過。否則他怎么加租？”他還說，即使“他真的要買更多土地”，事情也是如此。當然，關于地主表演的真誠性，我并沒有太多值得說的話。事實上其真誠性受到了大多數有意識的觀眾的質疑，這是一個重要的社會事實。此外，非常清楚的一點是，地主只有很少的素材和道具——價值觀、習俗或意識形態——可以利用，使他能夠采取令人信服的姿態。

當地主希望造成不利于佃農的租佃條件的其他改變時，邏輯也是同樣的。因而，當哈吉·查希爾（一個村外的地主）宣布他要尼扎姆及其父親預先支付兩個季度8里郎土地的地租時，他講述了一個自己好運結束后陷入經濟困境的故事。但尼扎姆和父親有充足的理由確信，哈吉·查希爾只是想將一次性付清的租金借給別人，以獲得債務人土地的使用權。當薩馬特的雇主決定在季節開始前而不是收獲后收取地租時，他以自己的貧困作為借口。薩馬特評論說，地主“像往常一樣念誦這些（套話）”，這意味著這是在此情境下可以預料的常規表演。

每當地主想解雇佃農時，人們可以在此過程中看到同樣的社會邏輯。當然，這種可能比增加租金或改變租佃期更具威脅性，因為它經常意味著一個小耕種者的破產。根據共同的價值觀，一個富裕的地主幾乎沒有任何方式能夠將奪走一個貧窮佃農的生存手段的行為合理化。限定詞“幾乎沒有”用在這里，是因為地主的立場在倫理上并非全無實現的可能性。其中的一個可能就是，地主宣稱他需要把土地給兒子或女婿。所有人都意識到并且接受一個人對子女的義務理應優先于對更窮的遠親的義務，更不必說沒有親屬關系的人了。許多口頭租佃合同事實上就包括如下條款：地主同意出租土地時包含這樣的諒解，即在其子女結婚或開始種地時，他有權收回部分或全部土地。因此，當哈吉·丁1975年從托·艾哈邁德和沙姆蘇爾那收回4里郎土地時，他給出了唯一可以被接受的借口。他說他的一個兒子失去了租佃權，因而需要種這些地。托·艾哈邁德和沙姆蘇爾熟知他的名聲，兩人表面上都沒有接受他的借口。因為他們有難得的書面租佃合同，他們去地區辦公室提出控訴。地區辦公室負責土地事務的官員做了一個折衷，哈吉·丁只能收回他要求的10里郎土地中的4里郎。而在下一季，哈吉·丁的兒子根本沒有出現，土地由一個雇來的勞動者耕種，前佃農的懷疑被證實了。隨后一個季，土地被賣給一個富有的馬來稻谷商。

在被剝奪成為一個無地勞動者之后，塔伊布的遭遇與上述事例如出一轍。地主宣布他兒子將在收獲季結束時結婚，因此需要塔伊布租種的土地來養活他的新家庭。因為地主本人至少擁有15里郎稻田，其中大部分靠近他自己的村子，塔伊布認為他在撒謊。失去土地意味著一場災難，這一通常的說法在此案例中表現得很清楚，它使塔伊布驚惶失措。在隨后的一季中，地主的兒子真的在耕種這塊土地，偶爾雇用塔伊布撒一下肥料以及耙一耙地。但千真萬確的是，在被解雇后的第二個季，塔伊布發現土地被以10個季的租期出租給一個華裔店主，一個擁有拖拉機的人。他猜想這才是地主自始至終的謀劃，但他當時過于不知所措，以致沒有立即揭露地主的騙局。其他地主更少費心偽裝；無論如何，如果沒有涉及地主對他的孩子的義務，租佃權在塞達卡幾乎不會喪失。[[321]](#_321_16)

當然，在一些情況下，地主的辯解并不僅僅是花言巧語。有些地主沒有其他供給子女的方式；有些地主的確陷入了困境而且除了重新種地別無他法。然而，通常地主的目標都是進一步積累土地或其他生產資料，或者是蓋新房子、或舉辦一次奢侈的婚宴。由于土地歸他所有并且他隨心所欲地處理土地的權利幾乎完全受到了法律保護，他根本無需為自己的行動提供任何合理化解釋。盡管如此，他通常會通過渲染他的艱難處境或者子女的需要來訴諸共同的價值觀，這些價值觀可以在受害者眼中展示其行為的合理性。不管是否基于事實，他的訴求有助于證實或強化現存的象征秩序。地主的表演，如同狄更斯筆下的威格（Wegg）先生一樣，將自己安全地置于“那些冒名頂替者的諸多行列中，他們決意對自己和鄰居裝點門面”[[322]](#_322_16)。在佃農這一邊，盡管表象的欺騙性相對少得多，他們同樣通過其破產或不幸的故事來構建同樣的符號大廈。

地主較大的經濟權力通常確保了戲劇的結果預先可知。但事情并非總是如此；它并不是單純的戲劇。偶爾，地主至少要做出一些讓步。也許他只能收回部分最初堅持要求的土地；或許如同洛斯妮的事例一樣，他可能在接受更高地租的同時在預先支付的問題上做出讓步；亦或許他決定收取比最初要求的略微低一點的地租。當然，我無法斷定是否最初的要求就是虛張聲勢以產生最后的解決結果，這些結果現在可以表現為他出于慷慨所做的讓步。比如，卡米勒說他的地主哈吉·阿扎丁想出賣他租種的5里郎土地，但是當他（卡米勒）無法籌集18000馬元購買土地時，地主就改變了主意。他轉而選擇出賣另一小塊出租的土地，那塊地上的佃農有現金購買土地。由于這個原因，卡米勒稱他為好地主。佃農們一般都憤世嫉俗，因此不會被輕易打動，但是有少數地主對其佃農一貫很溫和——收取低于平均水平的地租、在收獲之后收租、并且在收成欠佳時適當減租。這些地主因他們的慷慨行為而使我所描述的符號大廈保持完整；他們有助于鼓舞業余的戲劇演出，甚至那些吝嗇的地主在壓榨其佃農時也感到有義務在此表演。

## 意識形態沖突：村莊大門

如果塞達卡的富裕農場主在某種不利形勢下行動，那么，那些不利更多地是指意識形態而非行動方面的問題。然而，這一模式有一個微小但重要的例外。它實際上涉及到唯一的集體的和公共的共識：村莊有義務保護其成員的生計。作為少有的、但正式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障礙，它受到攻擊是不足為奇的。這一攻擊如其所發生的那樣暫時被擊退了。舊有價值觀的勝利只是一個微小的勝利，但這一斗爭對于我們正在考慮的問題具有診斷價值。

位于村莊主要道路入口的木制的搖搖晃晃的大門上寫有這樣一些簡陋的文字："LORI PADI, LORI LAIN, DAN KUBOTA TIDAK BOLEH-JKKK"。這些文字或許是利害所在的最佳表述。它們翻譯過來無非是說“稻谷卡車、其他卡車以及拖拉機禁止入內”。并且，警告由村莊發展委員會“簽署”。大門只是一個高約六英尺的木柵欄，跨越了道路兩側，并且用鏈子鎖住。它并不妨礙行人、自行車、摩托車、小型的“后掛”拖拉機甚或汽車通過，但它有效地阻止了卡車和大型拖拉機進入。鑰匙保存在位于大門左側的勒拜·彭德克屋內，任何大型交通工具的司機必須停下來要求開門。雖然不是全部，但大多鄰近村莊都有類似的大門，而這個大門立在這里已經至少15年了。[[323]](#_323_16)

大門具有雙重用途。首先，它有限制土路上的交通的作用，這條土路在過去許多年中總是泥濘不堪，容易滑倒，并且很容易因此留下車轍。在最潮濕的季節中，裝載量大的卡車會被要求停在那里，并且卸下貨物——比如柴火、磚石、木材、鋅制屋面材料、家具——隨后以徒步或自行車運送。往常，開門要收取3馬元的費用，然后卡車才可以通過。收費的目的是為了建立一小筆基金，用于每年購買額外的填充土石以修復先前雨季時給道路造成的破壞。在我看來，大門的第二個和最重要的用途，是阻止稻谷經銷商的卡車進入村里，以免因此而影響主要付給村民的將裝入麻袋的稻谷拖運到主要道路的酬勞。如果稻米像往常一樣在附近的凱帕拉·巴斯塔鎮賣掉或加工，如果沒有很大數量的麻袋要搬運，付錢給村里人，由他們一次一袋地直接搬運到磨坊或買主那兒是合情合理的。由此村民的潛在收入是很可觀的。在正常年景，一個年輕男子賺150馬元并不罕見，而現在由于種植雙季稻，收入會成倍增加。

因此，大門就是一個集體強迫性tolong的例子，即對只留給村民的工作的保護性壟斷。[[324]](#_324_16)大門的最初建立是尤其有利于貧窮村民的，因為稻谷麻袋是用自行車運送的，而即使最貧窮的村民也擁有自行車。我們將會看到，現在摩托車更為普遍，而主要的受益者也發生了變化。大門本身就是其所代表意義的恰當的象征。它表明，僅從這樣一個角度來看，塞達卡是一個封閉的經濟體，其中運送稻谷的工作只對村民開放，當地對此類工作的壟斷并不考慮商業性的稻谷買主或者磨坊主（通常是華裔），盡管他們可以提供更廉價的服務。當然，從經濟角度來看，大門代表一種補助，那是由村里較大的農場主付給為他們運送稻谷的鄰居的。補助金的數量依據農場主的稻田到大門的距離以及收獲量而不同。不管有沒有大門，他都得支付將麻袋從田里搬到村莊主路的搬運費（按麻袋計）。但是，一旦打好包的稻谷已經運到村路邊，他就不得不為每一袋付錢讓搬運工把它們運到村路盡頭，隨后稻谷將在那里被裝上卡車，如果他愿意，也可以付錢給本村的搬運工將稻谷一直運到鎮里。可以設想一下，如果沒有大門——如果稻谷經銷商的卡車可以直接開到距離他的稻田最近的村路上——農場主可以每麻袋節省2馬元。對一個大農場主而言，例如一個擁有8里郎土地的農場主，兩季度可以節約大約500馬元。而擁有2里郎及以下土地的農場主幾乎不受影響，因為他們可能將大部分稻谷保存在家中，當他們確實要出賣或碾磨部分稻谷時，他們可以一次一袋自己運過去。

1980年3月底，臨近上一個收獲季末期，大門暫時被打開允許兩個稻谷經銷商的卡車通過，由此引起一場激烈的爭論，其影響時至今日還在塞達卡回響。大門最初是由法齊勒打開的，這個中年農場主擁有8.5里郎土地，并且曾經是管理村莊事物的巫統委員會（村莊發展委員會）成員。法齊勒即使在他那一派中也不討人喜歡；他被認為是村里最不經心耕種而且水稻產量一直很低的兩三個人之一，并且他作為已故的托·哈里姆最寵愛的養子，從小就被寵壞了。盡管他高傲自大，他作為公共發言人的讀寫能力和技巧還是得到巴希爾和其他村莊發展委員會成員的重視。他在村委會的立場在這里值得注意，這是因為，塞達卡的每個人都知道，在幾年前問題出現的時候，他曾為之辯解并投票支持限制稻谷卡車的禁令。

法齊勒的故事是這樣的：在他收獲的稻谷打好包放在地里之后，他去和作為運送稻谷小組的成員之一的勒拜·彭德克的兒子穆薩接洽。穆薩告訴他（運送）一麻袋稻谷的價格是1.80馬元。法齊勒非常氣憤，不僅因為他認為費用太高，而且還因為費用通常由農民們自行決定。但他沒有進一步協商，只是說1.80馬元的價格太高了。他推斷，大門的存在讓這些年輕人“敲詐”農場主。他說，前些年搬運費只有1.20馬元，沒道理暴漲到1.80馬元。消費品的價格并沒有上漲太多，稻谷價格也一樣。[[325]](#_325_16)這還不是全部。他補充說，道路新近填了土，其狀況有了很大改善，這使得摩托車搬運起來更加方便，尤其現在是旱季，道路又不是很滑。既然已經到了收獲季的末期并且沒有太多稻谷要搬運，搬運價格理應降下來。

假如那天下午運走了稻谷，事情也就僅僅止于法齊勒的抱怨。然而，搬運工們沒有露面。法齊勒再次去找穆薩，后者許諾第二天一早就搬。但直到第二天中午，法齊勒的50袋稻谷依然堆在地中間，穆薩傳話說當天下午就搬。到下午三點，依然什么都沒有發生；法齊勒說，他擔心稻子在夜里被偷走，而且他也注意到天邊的積雨云，擔心稻子被浸濕。他短暫地考慮了一下，打算去找另一群搬運工，但隨之改變了看法。穆薩和他的朋友都來自巫統家庭，在政治上和法齊勒以及村莊發展委員會是同盟，而其他群體都屬于村里的伊斯蘭教黨。讓伊斯蘭教黨的人為像法齊勒這樣的巫統堅定分子搬稻子，將極大地破壞對本黨派的忠誠。

在這一點上，法齊勒顯然決定正面沖擊大門的規定。他聲稱要去找巴希爾談話，解釋相關情況并且要求把大門打開，巴希爾不是村長但是公認的巫統的領袖。事情在這里出現了分歧。巴希爾否認他曾涉及了開門的事，而法齊勒聲稱巴希爾讓他把門打開。不管怎樣，法齊勒去了凱帕拉·巴斯塔鎮聯系他的華裔商人，他派了一輛卡車由法齊勒用摩托車帶路到了村里。到達大門時，法齊勒下車從勒拜·彭德克妻子手中拿到鑰匙，說巴希爾允許打開大門。下午五點鐘，華裔司機和他的兩名馬來搬運工將法齊勒的莊稼搬上了卡車，并運到鎮上的經銷商那里。

與此同時，消息迅速傳開，許多憤怒的人很快聚集在巴希爾在村里的店鋪前，那里是巫統在塞達卡集會的地方。他們的語調明白無誤。有幾個人已經將大門拆下來，看上去要夸大法齊勒的罪過。他們說，他的所作所為是“錯誤的”和“不誠實的”。而且，他做這一切好像“他是個領導”，好像“他想接管”。另外一些人談到了暴力，“應該斃了他”，“應該馬上把他斃了”。不足為奇的是，巫統搬運小組的成員最為激動，但憤怒是普遍的。

伊斯蘭教黨最為積極的成員立刻做出了反應。當他們聚集在與巴希爾的店鋪僅隔兩戶人家的“自己的店鋪”（薩馬特的店鋪）時，他們極其高興地觀看著巫統領導成員間這場公開內訌造成的不體面的景象。一些人意識到，一旦有人敢于蔑視大門，其他人也可以如此，而且，如果規矩被破壞了，伊斯蘭教黨成員也有權利帶進運稻谷卡車，這點很重要。因此，尼扎姆——他對巴希爾的反感人人皆知（他不和巴希爾說話，也不到其店鋪里買東西），而且他地里還有打好包的稻子——出去招來一輛卡車運送他的稻子。法齊勒的卡車離開不到半小時，尼扎姆的卡車就進來停在了薩馬特的店鋪門前。華裔司機臉上出現的害怕表情說明，他寧愿去任何別的地方；他不愿從車上下來。裝載開始前，巴希爾親自出來和司機談話。他并未直接要求司機離開，但他說得很清楚，在把稻谷裝上更多的卡車之前，如果司機允許村里解決眼下的問題，可能更好一些。抓住這一黃金時機，那個司機開著空車跑了，甚至沒有停下來向尼扎姆解釋他倉促離去的原因。

巴希爾有充足的理由努力平息潛在的暴力沖突。他很清楚在附近的村莊當大農場主試圖省下將稻谷運到主路上的費用時所發生的事。在杜蘭村，一個農場主試圖用他自己的拖拉機將收獲的谷物運到路邊，以節省當地價格的運費。那些靠搬運掙工資的年輕人攔住了他的拖拉機，拆走了電池，并且威脅說如果他不放棄企圖就要砍破他的輪胎。迫于形勢，他退縮了。在明關村，幾年前一個華裔土地所有者為了將稻子直接運到磨坊而在旱季將卡車直接開進大田里。第一輛裝好的卡車開走后，對威脅十分警惕的一大群村民設法將兩棵大椰子樹放倒在路上，以防止剩下的卡車離開。一大群叫嚷著威脅使用暴力的人迫使地主相信，謹慎即是大勇；其他卡車最終卸了貨，稻谷麻袋被一袋一袋地運到主路上。考慮到這些情況，巴希爾無疑意識到，事態很容易轉向暴力，而這一沖突很可能使巫統成員內部以及巫統和伊斯蘭教黨成員之間陷入對抗。

巴希爾的確進退兩難。包括他自己在內的其他大農場主很高興看到大門被破壞，其他村莊已經這么做了。但是，他同時要面對的是來自他自己最直接的政治追隨者的堅決反對，而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是他的親戚。他的表親阿明，村長哈吉·加法爾的兩個兒子達烏德和卡立德，勒拜·彭德克的兒子穆薩和沙希爾，還有勒拜·侯賽因的兒子塔哈，他們都是巴希爾“智囊團”的核心成員，同時還是巫統的稻谷搬運小組的核心成員。所有這些人都代表了有影響的家庭，而他需要這些家庭的支持。

當天晚上，巴希爾召集了五個人（勒拜·彭德克、塔哈、阿明、達烏德和法齊勒）討論這一事端。這群人可能尤其打算孤立法齊勒。巴希爾的立場是，穆薩為搬運稻谷所要過多，但是法齊勒本應與他商議一個較低的價格而不是自行做主把大門打開：“這么重要的事不是一個人能決定的。”意識到這群人可能不利于他，法齊勒努力證明他的行動是正當的，但是由于顯然無法將巴希爾牽扯進開門事件而作罷。他意味深長地補充說，他知道其他人認為他既不體諒人又沒有同情心，但是他確信“我們有自由（打開大門）”。“別的村子已經拆掉了大門，我們也不得不這么做。”這等于明目張膽地宣稱，他的經濟行動的自由優先于村莊保護其正在消失的工資收入來源的權利。勒拜·彭德克和三個巫統搬運小組的成員一同爭辯說，工作應該給予本村人而不是外人，而且卡車會損壞道路。巴希爾最終支持關閉大門，但他擔心，如果就此議題召集全體大會，那些通常參與這類會議的較富裕的巫統農民會真的投票贊成稻谷卡車進村。

第二天下午，一個小型會議在位于既是村莊會議室又是教室的祈禱室下面的屋子里召開。與會的約有15個村民，全都來自巫統家庭，此外還有兩個外村人：作為政府稻米加工廠（LPN）的職員及農會和地區巫統行政官員的阿基勒，杜蘭村退休的村長加法爾。會議由阿基勒而非巴希爾主持，因那些高官在場，會上似乎要草擬一個決定來宣布。唯恐人們意識不到此種場合的正式性，阿基勒向所有人顯示了一下一份打印好的報告[[326]](#_326_16)以引起注意。他開始談到那天的事件，并沒有提及有關的姓名，隨后給了法齊勒一個說話的機會。法齊勒知道人們要求什么，他拐彎抹角地為他的草率舉動道了歉，但也指出許多村民很生氣，因為那些搬運稻谷并且從大門受益的人“反過來（為了利益），敲我們的竹杠”——他補充說，其程度之甚迫使他不得不雇用其他的搬運小組。阿基勒隨后接著讀他的報告，報告完全由保持村莊大門的理由組成。首先，如果允許運送稻谷的卡車進村，道路將被嚴重破壞，尤其是在雨季。其次，村里“依靠搬運工資為生的人將失去這些收入”。第三，農場主們將“轉而求助于那些擁有卡車的不同種族”。他補充說，許多村民因為村莊發展委員會內部爭論不休而非常生氣，而且，如果塞達卡拆掉大門并且在下一年去要求用政府的錢修路，目前的分區領導阿布杜爾·馬吉德會非常不滿。會議最后以當地受人尊敬的元老加法爾的簡短講話結束，他談到伊斯蘭教、和平解決事端、幫助他人以及不要自私自利等內容。會議并沒有舉行投票；事情就這么結束了。兩天后，一個新大門在適當位置建成。法齊勒顯然沒有出現在修建大門的工作班子中。[[327]](#_327_16)

隨著有關會議決定的消息四處傳播，日益明顯的是，反對派（伊斯蘭教黨）成員沒有被邀參加會議。他們怒氣沖沖，與其說是抗議事件的結果，不如說是抗議執政派處理這件事的方式。他們說，所有人都應該被邀參加會議，應該平等對待每個人。在此，他們充分利用了所有村民概念上的平等來證明自己的觀點。與此相反，會議是秘密進行的，并且事情是由一個小群體“選擇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決定的，而且無論如何這個小群體大多是親戚構成的。所有這些發生在巫統成員聽力范圍之外的說法都用“我們——他們”的措辭來表達。[[328]](#_328_16)巴希爾尤其因為缺少教育、傲慢自大和無力阻止自己派系內部的爭吵而受到奚落。蘇庫爾是一個強硬的伊斯蘭教黨成員，他指出，巴希爾和他的朋友處理事情時采取的高壓方式，就是為什么當政府運來新的填路材料時，只有少數巫統成員到場修復和平整道路的原因。他說，過去當伊斯蘭教黨和巫統成員都參與村莊發展委員會時，所有的人都會幫忙。他和其他人都認為，甚至卡車的過路費現在也不見了（“誰知道在哪兒”），而且不開具收條。

就封閉的經濟而言，依據村莊的首要義務是保護其工資和收入來源這一原則，保留村莊大門無疑是個不大不小的勝利。勝利者是負責將稻谷運到主路上的村民，而失敗的一方則包括那些本來可以通過直接裝上卡車節省一筆錢的農場主和那些卡車的擁有者（尤其是華裔稻谷經銷商和磨坊主）。[[329]](#_329_16)大門繼續代表著對完全“理性化”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一個微小卻有意義的障礙。然而，這一障礙之小值得強調。同這一奇特而孤立的古老價值觀的殘余試圖恢復的機會相比，租佃關系的變化和收獲的機械化早已將工作和收入的更多機會一掃而空。甚至這一微小的勝利也很有限。一次打開大門引起的具體可見的威脅，以及此后大門將永久敞開的可能性，都有其預期的、可怕的后果。下一季節村里搬運稻谷的價格沒有更高，并且在很多情況下低于早些時候。加法爾有關自私的罪惡的質樸講話，不僅指向法齊勒，也同樣指向那些搬運稻谷的人。如果不留意他的警告，他們就會冒殺雞取卵的風險。

如果把這個微小的地方權利的勝利解釋為任何意義上的塞達卡窮人的勝利，都將是一個嚴重的誤解。事實是，過去十年中即使在水稻種植這一微不足道的方面，也已全面機械化了。除了少數例外，所有稻谷現在都由摩托車，而不是自行車沿著村路運送。人們可能會想到，摩托車（絕大多數是本田70s）的擁有與收入有很高的相關性。有關的統計數字是，最富有的25戶家庭中有19戶擁有摩托車，而最窮的25戶人家當中只有2戶擁有摩托車。而且最貧困家庭的兩輛摩托車這一數字，也帶有夸大的成分。因為它們經常由于無法支付分期付款而被收回或者因為所有者付不起備用的配件而無法運行，這使得摩托車的存在只能是一個小插曲。將近一半的中層農民都擁有一輛摩托車。因此，人們將發現，大門的主要受益人僅僅是中層農民，尤其是那些富裕家庭。這有助于解釋大門為什么得以重建。其支持者在過去數年中從有自行車的窮人和中層農民轉變為有特權者，他們的利潤使他們能夠一次性付清購買摩托車的錢。我的一個猜測是，如果稻谷依然由自行車運送，大門現在就不可能存在。頗具諷刺意味的是，一度保護窮人收益的大門恰恰成功地防御了窮人，因為大門現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那些從綠色革命中獲利最多的人。事實上，窮人幾乎完全退出了這個議題：他們既不給別人運送稻谷，也無心去關注這種或那種方式。[[330]](#_330_16)

## 意識形態沖突：村莊改進計劃

我在塞達卡期間，對當地影響最大且分歧最大和爭論最激烈的事件，是政府的村莊改進計劃中有關建筑材料分配的高度派系化問題。這是數月以來日常談話的主題；它極大地加劇了村里的政治分歧，在幾個場合幾乎都引發了暴力，并且其社會反響持續至今。與大門事件不同，它發生于五個月前，是一場明顯的派系之間的政治爭端。但是與大門爭端一樣，它的爆發成為一場意識形態斗爭，其中包含許多至關重要的同樣的原則。隨著事態的發展，援助的實際配置違背了我們已展示過的推動塞達卡許多道德話語的兩項原則：所有村民概念上的平等和富人對其貧窮鄰居的義務。村里的統治精英達成了其直接目的，卻發現很難向自己的派別證明其行動的正當性，更不用說其他村民了。由于伊斯蘭教黨主要代表村里的窮人，派系的斗爭顯然帶有階級的意涵。

如果詳細考察這一時期，人們就會發現，還有一個與生產關系的改變類似的有趣現象。在此領域中，大農場主和地主或多或少可以自行其是。然而，為了證明他們索要的正當性，他們就不得不歪曲事實、借口必需，投入幾乎沒有可信性的不誠實的表演。在村莊改進計劃利益的分配過程中，領導村莊的家庭能夠隨心所欲。然而，他們再次被迫采取一系列的歪曲事實、假裝必需的做法，以及做出不可信的保全面子的姿態。當然，當地社會共同的價值觀既不能證明以損害鄰居為代價而專心追求利潤的正當性，也無法說明粗暴拒絕全體村民利益的合理性，這就是問題之所在。利益的獲取和政治偏袒在塞達卡都不是什么新鮮事。確切地說，每個人的新的機會都是前所未有的，而且這些機會遠遠多過為其訴求辯護和證明的可利用的手段。

根據可靠的傳言，村莊改進計劃是現任總理穆罕默德·馬哈蒂爾博士還是副總理時提出的構想。它被認為是一種政治資助的工具，由此，基于需要和政治忠誠，許多村莊被挑選出來接受一大筆將用于并未明確的“發展”目的的基金。[[331]](#_331_15)到1979年10月為止，該計劃已經在整個吉打州開始實施。在巫統官員與地區辦公室之間進行了長時間的談判之后，燕鎮周圍的12個村莊被幸運地選中。[[332]](#_332_15)它們都被宣布為“落后的村莊”。但“落后”還不夠；村子還必須是巫統的據點。

塞達卡符合上述兩個標準，得到了35000馬元。村莊發展委員會從未召開過全體會議討論如何分配這筆撥款。相反，作為地區巫統官員和住在村外的大土地所有者的哈吉·沙利姆，與巴希爾、法齊勒、阿明以及達烏德，會集村長阿布杜爾·馬吉德共同制訂計劃。與其他村莊一樣，這一大筆錢被配置為不同的用途：15000馬元用于改善道路狀況的填充材料以便于貨車運輸，還有戶外廁所的材料；20000馬元用于改善居住條件，包括木材、鋅制屋頂材料、粉刷和水泥樁等在內。按照有關的管理規程，被指定接受資助的家戶要在挨家挨戶調查的基礎上選出。主持這一調查的是塔哈，他是地區辦公室的職員，還是當地巫統的中堅分子勒拜·侯賽因的兒子。在期待（和預知）的氣氛中，實施了調查。如同上一章所指出的那樣，問題只和需求有關：收入、土地所有狀況、耕地面積、現有住宅的材料、衛生設施、子女數、畜力和小家畜數量。塔哈解釋說，資助不是給予現金，而是以授權的形式進行，受助村民可以從附近的三個建筑材料供應商那里獲得一定數量的物資。村會議室的一角被劃出來用做小辦公室，里面有桌椅和一個標牌，上面寫著：“塞達卡村莊改進計劃工作室”。

很快，村里伊斯蘭教黨成員最壞的猜疑就完全被證實。調查就是一個騙局。這不是一個“改善”窮苦村民命運的計劃，而是僅僅改善巫統村民命運的計劃。事實表明，甚至貧困也不是必不可少的條件，因為實際上所有的巫統成員，無論其多么富有，都參與了油水的瓜分。44戶參與了分配，每戶至少分得3200馬元的戶外廁所專用撥款，并且其中3戶每戶都分到了多達1000馬元的建筑材料和廁所款項。巫統家庭之間存在適度的平等。依據官方記算，貧困的巫統家庭平均得到672馬元；中等收入的巫統家庭平均得到486馬元；而最富有的巫統家庭平均得到388馬元。這些平均數掩蓋了在每個類別之內的大量差異。這一點似乎與那些相關家庭同巫統領導關系的密切程度和積極程度有關。由于許多最貧困的村民（25戶中的16戶）來自反對派家庭，這種對戰利品的派系分配幾乎不具有再分配的性質。因而，71%的富裕和中等家庭處于小圈子之內，與此同時，只有36%的最貧窮家庭分得了一點東西。在這些不平等當中，村莊發展委員會成員并未忘記他們自己。盡管3/4的村委會成員屬于最富有的25戶家庭，他們仍然設法使自己正式得到平均579馬元。我們將會看到，他們在非正式層面甚至所獲更多。

即使是援助模式的明顯例外也揭示了相當顯著的黨派偏見。只有兩戶反對派家庭得到了援助，并且他們也不是出于巧合。哈姆扎（1000馬元）和羅吉婭（200馬元）是僅有的通過交付巫統會費而兩面下注的伊斯蘭教黨家庭。此外，兩人還有其他優勢，羅吉婭是實施調查的塔哈的好朋友；哈姆扎則是村會議室和祈禱室的看管者，并且經常為巫統地主服務。村里三戶中立家庭中的兩戶，卡米勒和朱基夫里，也得到了幫助，[[333]](#_333_15)而后者更加貧困的兄弟巴克利則一無所獲，因為他還留在伊斯蘭教黨中。

幾天后，指責和反擊的氣氛驟然緊張，并且其范圍并不局限于被排斥的那一群人。幾乎所有的指責都針對村莊發展委員會，特別是巴希爾。他們被指控非法占有、受賄、腐敗、收取回扣、挪用基金、徇私舞弊和欺騙——馬來語為描述這些活動提供了豐富的詞匯。僅僅這些指責就可以寫滿一本書，但僅有少數實例可以傳達出真正的味道。人們普遍指責巴希爾和村莊發展委員會與一個華裔的木材場做生意來收取回扣，進而允許商人漫天要價卻提供劣質的材料。“瘦骨嶙峋的”瑪說，這就是大多數木材尺寸不夠、開裂而且像軟木塞一樣不結實的原因。人們相信，村莊發展委員會成員得到了比“正式的”分配更多的東西。因此，巴希爾聲稱自己只得到一個廁所，人們卻說他拿到了大批木料，而為了避嫌，他把這些木材藏在法齊勒的房子下面。沙姆蘇爾正式地獲得200馬元，但風傳他至少得到價值800馬元的原材料和油漆。許多貧窮的巫統成員滿懷嫉妒地比較了自己和富裕的巫統領導人所得到的東西。卡里姆說，他有權獲得價值600馬元的材料，但只拿到400馬元，而比他富得多的法齊勒卻得到了750馬元。羅吉婭忽視了她自己只是個見風使舵的巫統成員的事實，她抱怨自己獲得的那一小份并不比她更富有的鄰居加扎利的那一份多。曼蘇爾向巴希爾抗議說，他是一個沒有土地的窮人，卻比那些擁有8里郎土地的人分得更少。在每個例子中，抱怨都是建立在相對需求的基礎之上，而這種相對需求與當地的施舍邏輯是一致的。

甚至用于墊高和加寬村莊道路的300卡車的土方也沒能逃脫尖刻的指控。部分土方被廉價賣給個人，用以鋪墊他們房屋周圍的場地。巴希爾說，這樣做是為了酬勞那些幫忙鋪路和修整道路的人。而其他人說并非如此；所有修路的巫統成員都得到兩三百馬元作為工資。事實表明，新土方從未鋪墊到村頭，大概還缺80碼。托·拉德茲房前就堆著些剩下的土方。巴希爾解釋說，這只是因為沒有足夠的預算來完成這項工程，因而那些住在村頭的人將不得不自己鋪完留下的那一段。伊斯蘭教黨有一個更簡單的解釋：發生這樣的事就是因為，住在堆積土方另一邊的7戶人家中至少5戶是堅定2的伊斯蘭教黨成員——那里是村中反對派家庭在地理上最集中的地方。由于村里其他部分的土方大都是由推土機鋪墊，而剩下的土方不太夠用，因而這些家庭拒絕自己鋪路。他們說那樣做會很丟人。幾天后，那些土方消失了——鋪在勒拜·侯賽因的院子里，人們說那看上去“像蘇丹的花園”。

如果我們首先意識到伊斯蘭教黨和巫統之間的裂痕從未具有完全的合法性，我們就能更好地領會關于村莊改進計劃的斗爭的意識形態輪廓。并非與伊斯蘭教黨或巫統結盟的觀念違背了任何村莊禮儀。事實上，塞達卡每戶人家在很早以前就選定了政治立場，這是相當清楚的。然而，政治應該保持在其應有的位置，派系斗爭不應該破壞儀式共同體和鄰里關系，村民們確信，這些關系在社區中應該是主流——這種廣泛共享的情感確實是存在的。盡管這種虔誠的希望確實沒能阻止派系情感對地方社會關系的侵犯，但它們幾乎毫無疑問地對喧鬧的黨派斗爭起到了抑制作用。

在村莊改進計劃造成新的和更深的裂痕之前，幾乎所有人都認為，由早先的選舉煽動起來的派系偏見已經有所減輕。20世紀60年代晚期和20世紀70年代早期被認為是黨派斗爭最糟糕的時期，那個時候鄰居之間有時互不交談，近親發現自己站在敵對的立場。對我來說，具有啟發意義的是，人們總是帶著尷尬和羞恥談到那些日子。村民責備自己輕信了候選人和他們的追隨者，他們被指責為過于狂熱地助長了黨派情緒。整個時期及與之糾結在一起的事件都被認為是有失體面，并且出現這樣的事態：在村莊的家庭內部，父母和子女或者夫妻之間不斷地爭吵、叫嚷和打斗。村民都注意到，相對的改善無疑應該歸因于1974年伊斯蘭教黨在某種程度上進入政府聯合內閣。盡管地方上家戶的派系聯盟沒什么改變，因為它已根植于獨立前就存在的家族結盟，其公開的表現卻明顯減弱。在我1978年到達該村前不久，伊斯蘭教黨稍后退出政府聯盟的時候，當地的派系斗爭并未立即恢復以前的活力。[[334]](#_334_15)

村民們認為，早期無節制的派系斗爭最不體面的地方在于，它們冒犯了傳統的儀式禮節。因而，作為堅定的伊斯蘭教黨成員的托·卡西姆舉例說明那些日子里事態變得多么嚴重，他談到在塞達卡的一次婚禮筵席上，由于隔壁鄰居屬于另一個黨派，所以既沒有被邀請也沒打算參加。他強調說，筵席開始時，客人們都到了，食物就在鄰居的窗下烹飪。那種尷尬的感覺那么強烈，以至于鄰居只好離開村子一天直到筵席結束才回來。“同一個村的鄰居”竟然這么爭吵，這一事實令他非常不快。他總結道，“如果村莊社會被毀壞，那就不會有太平日子了”。

托·卡西姆的故事連同它具體表達的價值觀，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不斷重復。每個人都會講述“當爭吵最激烈的時候”塞達卡或者鄰村的故事，而且這些故事無一例外地涉及到儀式性筵席，在這些筵席上，鄰居或親戚不是被排除在外，就是拒絕出席。如同羅吉婭所哀嘆的，事態變得如此嚴重，甚至鄰居們都有可能不出席一次葬禮，就連親戚也會聯合抵制某個婚禮筵席。[[335]](#_335_15)這些或隱或顯的重復將共同體價值與黨派價值區別開來，而前者總是被賦予優先地位。勒拜·彭德克是巫統的一個領導，他因此認為“村民們變得聰明一些了”，“他們（現在）知道村落是不同的；以前他們把村落和政治混淆在一起”。當無地的巫統成員曼蘇爾解釋為什么他參加所有的筵席而不管主人屬于哪個黨派時，他說，“我只考慮村落”。事實上，在塞達卡，向任何人提出有關所屬黨派的問題都是困難的，除非事先作出免責的聲明：當涉及婚姻、疾病、葬禮、甚至幫忙搬家時，“黨派沒有任何影響”。甚至那些因政治激情偶爾破壞這一規則的人，也總是在口頭上表示贊成，從而強化了該規則作為理想的地位。

在這一語境中，人們更容易理解針對村莊改進計劃的援助分配所提出的主要異議的基礎。自然，叫囂最強烈的是伊斯蘭教黨成員，但也不乏巫統信徒的反對之聲，而且不僅僅是那些個別感到受騙的人。瓜分金錢的途徑基本上有三種。首先，可能優先給予村里的窮人，從而符合了如下規范：幫助應該給予最有需要的人，而不考慮其派系忠誠。這一原則源自古老的農業秩序，適用于個人和村落的義務，它似乎還可能擴展到適用于政府的援助。第二種可能性是在全體村民當中分錢，既不考慮他們的需求也不考慮其政治傾向。這一點將符合所有村民在某一層面上都享有概念上的平等的規范。第三種可能性，也就是被采納的那種，是嚴格按照派系分配援助。這對當地的巫統領導人來說當然是最稱心如意的選擇，但與此同時，它也是在道德規范中最不具合理性的做法。因為無論在塞達卡牢牢扎根的派系忠誠在實踐中如何變化，它們都不承載道德的影響，因而當然不足以證明村莊發展委員會行動的正當性。這不僅適用于雙耕，同樣也適用于政治領域。新的“盈利”活動的機會遠比用來證明充分利用此類機會正當性的規范性手段重要得多。

最初的強烈攻擊因而指向了派系資助中明顯的不公平。村里某些最富有的人——勒拜·彭德克、沙姆蘇爾和阿明——在大多數最貧困的村民一無所獲的同時為己牟利。帕克·亞赫作為一個突出的例子一再被提及，這個毋庸置疑的窮人本應得到幫助。他的房子難道不是因為缺錢而年久失修嗎？畢竟這是一項旨在幫助人們修補房屋的計劃！帕克·亞赫還是一個擁有誠實名聲的范例，他是一個辛勤工作的勞動者，而且經常為巫統領導人巴希爾干活。如果有人應該得到幫助，那就是他。僅以這個例子為基礎，許多村民認為分配方案“不公平”、“不合體統”、“不正確”。相當一部分巫統成員得到了好處，盡管他們聲稱窮人應該首先受到照顧。比如，卡米勒說“（只有）在境遇最差的階層得到幫助后，比他們處境稍好的人才可以受助”。曼蘇爾作為一個貧困的巫統成員分得了750馬元的物資，他主張，“我們應該幫助窮人，不管什么派系；首先應該是那些擁有不足2里郎土地的窮人”。

巫統成員在得意于自己的好運的同時，他們在伊斯蘭教黨鄰居面前感受到強烈的尷尬，他們不得不與后者保持友好關系。隨著新木料分配完畢和工程的開始，他們感受到了來自毗鄰而居的家庭的嫉妒與憎恨。這種憎恨由于村路上發生的冷漠的沉默而被強化。許多人同意村莊發展委員會的做法是不公正的，但他們表示對此愛莫能助，他們感到有必要通過這種方式為自己意外的運氣向他們的伊斯蘭教黨的朋友道歉。少數人通過將部分木料廉價賣給其伊斯蘭教黨鄰居來減輕其良心上的不安，并同后者重修舊好。還有人雇用更窮的伊斯蘭教黨朋友幫助他們修建房子。[[336]](#_336_15)換句話說，通過將利益再分配給貧困的伊斯蘭教黨家庭，這些零散的私人努力部分地逆轉了村莊發展委員會的做法。

對村莊改進計劃未能幫助最貧困村民的指責是恰如其分的，因為分配之前進行的調查只在表面上確定哪些家庭最需要救助。貌似公正的調查，與在實踐中對事實的公然違背，這二者之間的強烈對比使得伊斯蘭教黨成員——還不只他們——有理由宣稱，村莊發展委員會公然違背政府的意愿。村里許多人都相信，政府本想把錢分給窮人而不考慮其派系，并且，村里流傳著許多別的村莊的故事，在那里資助首先給予了最需要的人。比如說，雅各布聲稱，他在默布克村和浙倫村有親戚，這兩個村所有最貧窮的家庭都得到了最大份額的補助。曼蘇爾說在附近的雙溪凱林村，幾乎所有人都得到了幫助。[[337]](#_337_15)仿佛是為了強化人們對于村莊發展委員會背信棄義的看法，塞迪蒂·班杜村的類似故事也在流傳。該村的一個小官吏據信做了一次公正的調查，木料也隨之而至。當那里的巫統和村莊發展委員會看到所發生的事情時，他們集結眾人向吉打州議會成員抗議，并迫使這個官員調離。人們說在爭斗中，已經堆積在伊斯蘭教黨成員家門口的木材被搬走，并且重新分配給巫統家庭。由此所謂的調查只是一種無端的污辱，以至于最窮的伊斯蘭教黨成員“瘦骨嶙峋的”瑪去見村長阿布杜爾·馬吉德，告訴他，如果塔哈回來再做一次調查，他就會“揍死他”。

以一種更為現實的態度，許多伊斯蘭教黨村民意識到，在這樣的環境下，只根據需求分配基金很可能是一個烏托邦，雖然這樣做更符合當地的價值觀。所有的巫統成員當然堅決主張分得一份政治報酬。他們進而爭辯，為什么不給每個人同等數額的一份？憤怒的“瘦骨嶙峋的”瑪說，“假使平等地發放，那還好。如果每人分得300元，那也不錯。但是我們什么也沒得到”。所有人平均分配的原則引起許多其他人，尤其是那些被純粹的派系標準觸怒的普通巫統成員的共鳴。雅米勒是一個相當富有的巫統成員，他也認為平均分配最好：“就村莊社會而言，應該平等地對待每一個人。”阿布·哈桑盡管在名義上是村莊發展委員會的成員，卻相信“平均享有即公平”。伊斯蘭教黨成員很快指出，政府用一個標準收稅，然而在這件事情上，卻用另一個標準分配援助。伊沙克準確地抓住了這個矛盾，他說，“他們收取土地稅和灌溉稅時沒有依照派系，但當他們分發木料和廁所時，卻依照了派系的標準”。這里同樣流傳著關于其他村子、其他村莊發展委員會的故事，那些村莊里每個人都得到一些東西。

有傳言說，在哈吉·沙利姆家聚會的巫統組織在決定如何使用村莊改進計劃撥款問題上存在著分歧；這一傳言強化了平等對待所有人的主張。雙溪通港村頗受尊敬的宗教人物勒拜·薩卜拉尼和負責凈化儀式的托·穆丁，顯然認為每個人都應有所得，或者至少把像帕克·亞赫那樣的非常貧困的伊斯蘭教黨成員包括進去。隨后，當我獨自和勒拜·薩卜拉尼聊天時，他說的確如此。他建議把錢平等地分配給所有人，但是，他說，哈吉·沙利姆和巴希爾表示反對，他們認為，如果所有的伊斯蘭教黨成員都得到一些東西，他們會說，“看見了吧，我們是反對派，但我們還是得到了援助”。哈吉·沙利姆說，不能那么做，而且他的立場被接受了。勒拜·薩卜拉尼不情愿讓他的異議廣為人知，但是與之相關的消息卻對伊斯蘭教黨成員的憤慨起到了很大作用。他們現在可以引用最受人尊重的巫統宗教人物的觀點來證明他們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哈吉·沙利姆和巴希爾隨后變成了罪魁禍首。伊斯蘭教黨成員報告說，哈吉·沙利姆在市場上的咖啡店公開聲稱“伊斯蘭教黨成員一根椽子也別想得到”，此外，巴希爾給塔哈出示了一份伊斯蘭教黨家庭的秘密名單，這些家庭絕不會得到任何東西。

這樣的談話充滿憤怒甚至暴力。杜拉說，“他們向我們開戰，我們不得不回擊”。但除了“瘦骨嶙峋的”瑪威脅性地談到塔哈，大多數談話是安全地限于朋友和盟友的小群體內的。他們通過在咖啡店和村路邊冷落怠慢村委會成員而表達自己的憤怒。公開的沖突因而得以避免，村莊發展委員會通過“謠言”間接地知曉了大多數針對他們的指控。缺少正面的挑戰源自于自尊和畏懼。洛斯妮就是前一個原因的突出例證。我問她，她的插秧小組是否向經常為之工作的巴希爾或阿明抱怨過，她解釋說不好意思去要求[[338]](#_338_15)。她補充道，他們二人都告訴她應該加入巫統，那樣的話她就會被包括在內了，但她沒有。除此之外，她還在沒有他們的木料的情況下獨自修好了自家的房子。“如果他們給我援助，我會接受，但我不會去乞求或者制造麻煩。”其他人無論私下里如何抱怨，考慮到事后可能的損害，他們都小心翼翼地避免引起同巴希爾的公開對抗。加扎利是一個巫統成員，入贅到一個堅定的伊斯蘭教黨家庭，他可能非常煩亂，以至于寫了一封正式的抱怨信，但他對巴希爾當面什么也沒說。為什么？“我不想破壞我和巴希爾的關系；所以我保持沉默。”

然而，針對村莊發展委員會的抗議并不僅僅限于私下的人格詆毀以及對不公正做法的共同憤慨。在薩馬特的村莊小店的一次非正式集會上，一些伊斯蘭教黨成員鼓動說，他們所有人應該集體去地區辦公室抱怨。[[339]](#_339_14)他們事先已經得知，有一群雙溪凱林村的人已經去過位于燕鎮的地區辦公室，為的是抗議那里的調查方式。但是，人們并沒有很高的抗議熱情。就像加扎利說的那樣，“只不過說說而已，他們沒有足夠的膽量去”。顯然“瘦骨嶙峋的”瑪是唯一的生氣并且/或者足夠勇敢到親自抗議的人，但他去的是附近的村長辦公室，而不是地區辦公室。最終，一部分人同意寫一封正式抗議信，并且分別送交吉打州的州長、地區長官以及負責反腐敗工作的國家調查局（BSN）。信件于當晚起草，并由瑪·伊莎、巴克利、瑪·納西——他們都是伊斯蘭教黨成員——以及實際上在村莊發展委員會的巫統成員（至少名義上如此）加扎利簽名。該信有禮貌地抱怨不公正的調查和分配，指責村莊發展委員會應該為事態負責，聲稱村莊的和睦受到了破壞，并且要求派人來整頓。[[340]](#_340_15)顯然，許多來自其他被選定獲得村莊改進計劃基金的村莊的類似信件紛至沓來。

盡管人們說幾星期以后有國家調查局的人員到村里找巴希爾談話，但這些抗議未產生任何結果。巴希爾對此予以否認。他當然清楚信已經發出，但他帶著自信的微笑補充說，“這些信沒什么用”。哈吉·沙利姆也告訴我，他知道寫信聲討他并且威脅要把他和村莊發展委員會告上法庭的事。“如果他們不喜歡，那他們就應該贏得下一次選舉，選出自己人。”

一天晚上，在只有巫統成員才能獲得幫助這件事已經變得清楚之后不久，村辦公室里的村莊改進計劃的標志被徹底涂黑了。警察第二天被叫來，匆匆忙忙地在幾幢房子里搜尋黑色油漆刷和油漆筒，但一無所獲。嫌疑犯沒有被發現。

一般說來，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能夠通過故意回避村委會成員，以及某種“儀式上的聯合抵抗”來含沙射影，公開的抗議往往局限于此。這種“有意識的輕描淡寫”的力量在塞達卡這樣的小村莊里并非微不足道。巴希爾首當其沖地受到公眾的鄙視。恰好他女兒在接下來的那個月里出嫁，他很看重所有被邀請的家庭都能參加入席典禮。但至少有10戶人家沒來參加筵席，如果不是因為這次事件，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應該去赴宴。[[341]](#_341_15)少數像帕克·亞赫和“瘦骨嶙峋的”瑪那樣較貧窮的伊斯蘭教黨成員因為不時給巴希爾干活，出于禮貌不得不到場，但為了表示其不滿，只待了一會兒就走了。哈吉·卡迪爾只去吃了一碗糯米飯，然后就走了。少數像曼蘇爾那樣正常情況下應幫忙準備飯菜的人只是像客人一樣來了。有許多種差別細微的暗示不同輕蔑程度的方式，而幾乎所有方式都用到了。甚至那些照常赴宴的伊斯蘭教黨成員也找到了將自己的出席變為一種政治表達的方式。他們對巫統的朋友解釋說，并非他們的派別造成了這一切，并不是他們試圖“分裂”村莊。他們這么做是要采取有效方式捍衛村莊的價值標準，并且使自己處于在道德上比巫統領導更優越的位置。

并不是只有巴希爾才體驗到了鄰里關系中新出現的冷漠。吉·敦已經用她的新木料修補了房子，還擴充了她家老房子前面她兒子的一間小屋。現在她想將新房子移到老房子邊上并且連在一處。這一工作至少需要70個人，他們無非是把它抬起來移動一下。為此，她安排了一次搬家宴，邀請了她所有的鄰居，并且為工人準備了豐盛的食物。但是結果只有三四十人出席。大多數住在村尾的伊斯蘭教黨家庭特意外出；[[342]](#_342_15)他們當然不愿意幫忙搬一個用他們被拒絕給予的木料和鋅皮屋頂建造的房子。不止一個人告訴我，“如果巫統成員蓋房子，那么，她最好自己搬家”。盡管有人呼喊、嘟噥以及再三地努力，房子僅憑現有的人力還是不能搬動。為了避免已經很尖銳的尷尬進一步延續，巴希爾派了五六個巫統的人用摩托車又接來二三十個人。一小時之內，他們終于找到足夠的額外幫助，這樣房子才最終得以移到新的位置。但是，這大部分的新面孔并非來自塞達卡，并且那些缺席的伊斯蘭教黨成員在他們內部一再幸災樂禍地提起這件讓村莊發展委員會和吉·敦丟臉的事。[[343]](#_343_15)

在了解到村莊改進計劃之后的抱怨、受傷的情感、聯合抵抗以及群情激憤等社會遺留之后，巴希爾向我傾訴說，這是一場政治災難。半數的巫統成員對他很生氣，因為他們認為自己被欺騙了。一些人聯合抵制他的商店，其中包括非常有影響的接生婆托·沙赫·比丹和她的朋友們。“一個店主，”他提醒我，“應該討每個人喜歡。”總而言之，他總結說，盡管給村民分發了“數千”馬元，他在他們當中的“影響”還是下降了。整個事件非但沒有加強巫統，反而使其受到了削弱。

在負責分配政治報酬的過程中，巴希爾和其他村莊發展委員會成員或明或暗地被要求證明他們行為的正當性。但他們怎么可能解釋村里這種嚴格的派系處理方式？甚至最貧窮的伊斯蘭教黨成員都被忽略而富有的巫統成員卻得到了酬賞，這一明顯的事實又如何解釋？更不用說其合理性了。他們根據聽眾的不同而對處理方式的合理性做出不同的解釋，但都不太成功。對于包括伊斯蘭教黨成員在內的整個村莊來說，他們給予一種解釋；對于巫統成員，又是另一種解釋；對由自己人構成的內部小圈子，還有第三種解釋。

由巴希爾和大部分村莊發展委員會成員對伊斯蘭教黨的朋友公開做出的解釋，顯然根本沒有真正的合理性可言。它只是各地的小官吏由來已久的托詞，即，他們只是遵循上面的指示去做他們被要求做的事。在此類事例中總是如此，這些解釋只是努力在道義上使自己的行為免受譴責；正如它總是暗示他們的手腳被束縛住了；他們在處理事情時沒有選擇余地。因此，計劃宣布不久之后，巴希爾對來他店里的人解釋說所有的事情都是由“上面”決定的。在此情形中的“上面”是指Bahagian Jerai選區的地區長官和巫統執行委員會。政府“研究”了事態并且“命令”村莊發展委員會只能將救助給予巫統成員，是“他們想分裂村莊”。在鎮上的咖啡館里，當看到伊斯蘭教黨成員就坐在鄰桌時，法齊勒采取了同樣的姿態。他說，“是上級”，“這是他們的做法”，“我們并不知情，那是他們的決定”。這一為村莊改進計劃推脫責任的無用努力有兩點值得注意。首先，幾乎可以確定，這是一個簡便易行的謊言。勒拜·薩卜拉尼和其他有著充分巫統成員資格的人清楚地表明，決議是在哈吉·沙利姆家里作出的，同時還有大部分的巴希爾“參謀團”的成員在場。同樣非常清楚的是，村莊改進計劃至少在一些村莊里是平均分配給所有家庭的。第二個值得注意的方面是，這一免于指責的嘗試只不過相當于明確地承認了，至少對全村來說，村莊改進計劃的偏袒無法被證明是正當或合理的。情況既然如此，僅有的策略就是將責任推卸給別人。

當聽眾完全由受到救助的巫統成員、甚至是那些在公開的派系氛圍中感到不自在的人組成時，就會出現另一種正當性的理由。此時雖然只有一類聽眾，但至少存在一種合理化的努力。針對村里那些最貧困者的訴求或村里所有家庭的權利要求，一個來自家庭生活的樸素比喻被提了出來：實際上，村莊被區分為我們的孩子和他們的孩子、好孩子和壞孩子“、親生的”孩子和繼養的孩子。正如巴希爾常常告訴他的擁護者的那樣，“我們必須先給自己的孩子，如果還剩下一些，我們再給繼子”。這一主題在村委會核心成員中產生的反響差別很小。阿明說，“我們不得不先把財產給我們的孩子”。法齊勒說，“我們必須幫我們自己的孩子。我們怎么能夠給別人家的孩子呢？”當哈吉·沙利姆試圖向勒拜·薩卜拉尼和其他人證明只有巫統家庭才能受益時，或許也沿用了這一思路，他進一步推進了這一主題。

巫統組織首先要關照那些支持他們的人。沒有足夠的東西給每一個人，所以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得到一些。同父親作對的那些不服從的孩子必須等著；他們任性并且頑固。要是有許多孩子，我們必須給聽話的孩子更多一些，而不是給那些不服從我們的孩子。當我們自己的孩子被安排好之后，我們才可能考慮那些繼養的孩子。

我懷疑，這種認為家庭內部的偏袒行為無可厚非的主張，是為了打消村莊發展委員會成員的疑慮，同時為更大范圍的巫統成員提供貌似合理的證明，這兩點同樣重要。[[344]](#_344_15)例如，貧窮的巫統成員可能欣然接受繼子的類比，并且仍然有理由驚訝為什么自己黨派內部的分配中有那么多異常做法，即相當一些富裕的巫統積極分子比貧困的成員得到更多。然而，即使在此處，我們也可以發現某種程度的閃爍其辭，這是對其他的村莊價值標準的讓步。我們自己的孩子或者忠誠的孩子的說法是極為重要的，但并不是排他性的，并且，這種主張暗示了所有的孩子，甚至是繼子，都有權得到“父母”的賞賜。最后這一點常常被巴希爾所強調，他期望隨后有第二階段的村莊改進計劃，這樣即使是伊斯蘭教黨成員也將被允許分得一份。

在更為堅定和黨派性更強的村莊發展委員會成員中，流行著更為犬儒主義的氣氛，這種氛圍即使在普通的巫統成員中也不是公開的。在此，有關伊斯蘭教黨的報償和懲罰的談論可以公開表達。有天晚上巴希爾在自家的房子里私下同阿明和我聊天，他采用了一種坦誠的派系論調，我想這種論調往往局限在巫統內部的小圈子里。他說，那些伊斯蘭教黨永遠不會改變，“即使砍下他們的頭也不會改變”。那么為什么要給他們東西？他接著說，即使我們給他們援助，他們仍然會抱怨，就像他們在獲得免費的肥料補助時的所作所為一樣，說是沒有得到他們那一份或者說肥料里摻了沙子。“總是抱怨”，這就是他們的“規則”。當我插話說，有部分巫統成員似乎也認為，每個人或者至少是窮人應該得到幫助，他回答說，“這不是村里的社會關系。政治還是有些不同的。這個世界就是這樣”。這是巴希爾最直接地公開承認村莊的價值觀所要求的有別于政治需要，并且在此情形當中，前者不得不被有意忽略。

最后，如果離開村莊立場，即使對地方規范的表面敬意也往往煙消云散。我同村長阿布杜爾·馬吉德在他位于雙溪通港村的辦公室進行了一次工作時間以外的談話，我謹慎地提到對村莊改進計劃的怨恨的問題。他的回答與他有關聯合收割機取代人工的觀點一樣直言不諱。他用毫不掩飾的言辭表明，村莊改進計劃實際上就是要迫使那些“頑抗者”屈服。“他們遲早會被削弱；富人可能還能維持，但窮人撐不了多久。”阿布杜爾·馬吉德的局外人地位能夠使他不需要采用任何社會面具或美化事實，他可以毫不隱諱地說出一切。

聽眾群越小、越具黨派性，說話者（哈吉·沙利姆，尤其是阿布杜爾·馬吉德）也就越有權力并不可觸犯，解釋也就越少束縛。如果他們愿意，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和地位穩固的官員無需向那些地位低下且利益受到威脅的人為自己辯解或證明自身行為的合理性。然而，在塞達卡內部，一些美好的東西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下來，并且存在一種證明獲得新的利潤和資助機會的正當性的努力，盡管它相當薄弱。哎，他們可以支配的規范性原料并不足以承擔如此重任。勝利者或多或少地被迫歪曲事實，公然做出不誠實的表演，聲稱他們的手腳被束縛住了，并設法利用他們能夠匆忙拼湊的所有道德合理性的殘片。他們的行為可能服務于一個更高的或者至少是不同的合理性，但是從村莊層面即從馬來鄉村社會的道德準則來看，這種合理性并不具有說服力。

## 作為反抗的爭論

總體來看，村里窮人提出的論點對他們而言有著顯著的一致性。他們挑選出雙季稻和機械化所造成的最具破壞性的經濟和社會后果。他們指出有關收入、機械收割、土地租佃的改變以及雇傭等一系列“事實”，用以支持他們的立場。他們宣揚這樣的觀點：由于習俗、鄰里關系、親屬關系和種族等原因，富人應該盡可能地提供工作、土地、信貸以及施舍。根據這些主張，他們譴責那些冷酷無情地只關心利潤而破壞了窮人所認為的合理預期的人。這些主題及其所包含的權利主張，在有關村莊大門和村莊改進計劃的爭論中體現得尤為明顯。在一第個事例中，摩托車的擁有者——那些過得不錯的家庭——成功地利用了曾經保護村里窮人的邏輯。在第二個事例中，傳統的道德邏輯屈服于黨派邏輯，但是付出很大的象征性代價，而且只是由于巫統窮人的參與才保證了他們的共謀或沉默。試圖保護和宣揚一種特定的世界觀（或者是一套規范性的話語）的努力，部分地獲得了成功，而且構成了不僅僅是純粹象征的反抗形式。

窮人的世界觀至少代表了對另一種潛在的話語形式的象征性屏障，這種話語將公然地使大部分富有的農場主當前的做法合理化。話語的這種潛在形式是一種有關狹隘的經濟利益、利潤最大化、積累以及財產權的直截了當的語言——簡而言之，資本主義的語言。實際上，這種語言在村莊生活中沒有任何道德地位。富人象征性的劣勢實際上是有物質結果的。窮人竭力倡導的價值觀甚至在富人的話語中也得到默認，它將名譽、地位和聲望授予那些遵守這些價值觀的人。反過來，這些價值觀還使得那些故意違背它們的人成為人格詆毀的對象。實際上，許多富人不得不在自己的名譽和雙季稻的全額利潤之間作出選擇，以致只能采取一種不完全對抗那些規范的方式。畢竟，這種選擇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一個必須天天在許多日常事務中做出的抉擇。由此，村里有7個農場主，其中4個是富人，他們至少在灌溉季之后沒有在部分或全部田地里使用聯合收割機并因此而受到贊揚。還有少數人將小塊土地租給鄰居或親戚，而不是自己耕種，這些土地大多不足1里郎。阿布杜爾·拉赫曼偶爾將一兩里郎土地租給較窮的朋友并且收取適度的地租，他由此而聞名。正如本研究和其他研究所表明的，在村內出租土地的地租往往比租給外村人要低一些。一些生活舒適的村民，其中包括勒拜·彭德克、哈吉·加法爾以及巴希爾，由于經常舉行邀請所有村民參加的筵席而受到褒揚[[345]](#_345_15)。至少有10個村民——他們并不都是富人——對給予勞動者的扎卡特相當慷慨，并且預先支付工錢。這些事實都不能掩蓋富裕村民、特別是外村地主以他們的名聲為代價來追逐利潤的總體趨勢。然而，這些事實的確表明，地方觀念和習俗的約束仍舊對人們的行為具有微弱但可以感知的影響力。受人尊重，或者至少不被輕視的愿望，是村里的一種實質性的壓力，它僅憑借圍繞著特定的傳統價值觀通過對窮人進行象征性動員就可能實現。[[346]](#_346_15)換言之，延遲向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全面轉型，本身就是一個重要的而且人道的成就。在受到包圍的農民能力所及的范圍內，它通常是唯一的成就。[[347]](#_347_15)

窮人所捍衛的價值觀毫無例外地與他們作為一個階級的物質利益緊密聯系在一起。然而，如果我們只局限于斗爭的物質結果，我們就會誤解斗爭的完整本質。只要男人和女人們繼續依靠價值觀證明自己行為的正當性，那么群體和階級之間對象征高地的爭奪就仍將是所有權力沖突的有機部分。在此情境中，湯普森在其關于18世紀平民文化和抗議的討論中所作的結論，只要稍作調整就適用于塞達卡。

貴族擁有三種主要的控制資源——權勢和優先體系（它幾乎不包括不受歡迎的窮人）、君權和法律的威嚇及其霸權的象征系統。有時會存在一種微妙的社會均衡，此時，統治者被迫做出讓步。因而，對象征權威的爭奪，不應被視為“真正”爭奪的預演，而是其本身就是一種真正的爭奪。平民的抗議有時只是挑戰貴族霸權的確定性，剝除權力的神秘外衣，或者甚至僅僅是辱罵一番，而沒有更進一步的目標。[[348]](#_348_15)

倘若我們明白，“抗議”在塞達卡很少公開表現出來，并且富裕階級的“象征霸權”單薄無力，那么我們仍然要面臨“為象征權威而進行的爭奪”。通過獎賞（即使是象征性地）那些品行更符合其價值觀的人，并且通過詆毀那些品行公然違反其價值觀的人，村里的窮人憑借分配他們部分掌控的僅有的資源——名譽和社會聲望——削弱了敵方的道德權威。在此過程中，基于對事實的特定看法，基于一套特定的要求，基于特定的世界觀——或許，“村莊觀”是一個更恰當的說法——它們有助于聯合大多數因雙季稻而受到損害的人。這一象征性屏障決不是不可超越的，但它仍是對富人的企圖的真正障礙。[[349]](#_349_15)

貧窮村民的象征性反抗就其堅持的和否定的內容而言同樣重要。它所反抗的幾乎全部是富人對于自身及其行動特性的描述。哈吉·卡迪爾可能當面被稱做“哈吉伯伯”，而背后又被稱為“高利貸先生”。富裕農場主可能解釋說，他們使用聯合收割機是因為無法及時找到當地的勞動力，但這種解釋遭到那些受傷害最甚的人的反對，他們視之為對快速獲取利潤的貪婪欲望。地主提高地租時可能會以自己的貧窮為借口，但是窮人“知道”這只不過是一種詭計和虛假的表演。這個清單可能會無限地擴展下去，然而意思卻很清楚；事實上，富人的自我描述與合理性解釋經常遭到質疑和破壞。

最重要的是，窮人的象征性反抗拒絕了富人試圖強加于他們的范疇。他們知道，大農場主越來越認為他們懶惰、不可靠、不誠實和貪婪。他們知道，他們在背后被指責為親手造成了自身的厄運，而且在日常的社交活動中，他們越來越不被當回事，或者更糟糕的是——被人忽視。他們不得不在內部說的許多話題，都是堅決反對將他們歸入永遠劣等的經濟和儀式地位的企圖，而且堅決肯定他們在這個小共同體內的村民權利。

在此，為了理解什么是至關重要的，我們必須首先更為寬泛和深入地理解此種情境下貧窮的含義。我擔心在此問題上我可能已經促成了一種狹隘的觀點，因為我既強調了機械化和租佃變動帶來的經濟損失，又不斷地提到塞達卡的“窮人”。

貧窮遠遠不是卡路里或現金不足這樣一個簡單的問題。在塞達卡，情況尤其如此，這里并沒有人瀕臨即將餓死的危險。就村里大多數窮人而言，貧窮更多地代表著對他們在村莊內日常地位的威脅。任何農村社區都有可能在文化上確認一套最低限度的行為準則，用于界定在當地社會中完整的村民身份。這些最低限度的文化禮儀可能包括婚禮和葬禮的某些基本的儀式慣例；回報特定禮物和幫助的能力；對父母、子女、親屬和鄰居等最低限度的義務。巴靈頓·摩爾將上述文化要求作為他對普遍的公正概念所做分析的核心：

如果我們將注意力限定于下等階級，他們當然少有像樣的財產權……我們經常會發現如下觀念：每個個體都應該擁有“足夠的”財產權，以便在社會上充任一個“體面的”角色。“足夠的”和“體面的”都是由傳統術語界定的。一個農民應該擁有足夠的土地來供養家庭，并且能夠讓家長在村落社區中有一個受人尊敬的地位……只要商業關系中的增長威脅到這種類型的自主，它就會產生憤怒的不公正感……這種憤怒遠比直接的物質利益更有意義，意識到這一點至關重要。這些人產生了道義上的憤怒，因為他們感受到，他們全部的生活方式受到不公平的攻擊。[[350]](#_350_15)

如同巴靈頓·摩爾指出的那樣，所有這些禮儀都假定某種程度的物質資源，這些資源對于保證其實現是必需的。低于這一水準不僅意味著物質上的貧窮；它還意味著達不到當地標準所界定的完整的人類生存。社會身份的破壞性喪失與收入的喪失同樣嚴重。

在雙季稻之前，塞達卡許多貧苦農民的文化和儀式地位已經受到嚴重威脅。舉例來說，村里有超出常規數量的貧窮婦女，她們結婚很晚或者根本嫁不出去。男人們有時稱她們是“滯銷處女”，但他們也會補充說，她們的父母無法向新郎許諾任何耕地。在齋月期間，許多貧寒人家的男子只能待在家里，而不是去拜訪較富裕的鄰居。一些人承認，他們不去是因為感到“尷尬”，因為他們“互惠不起”這個重要的穆斯林節日上應有的糖果和蛋糕。[[351]](#_351_15)由村里的窮人安排慶祝的宴會通常都是簡化的，它們缺少標準的儀式、娛樂表演和應有的食物。他們的寒酸總是被富人所利用，作為主人沒有能力表現自己尊嚴的標志。在齋月期間，窮人發現很難或者根本不可能為祈禱后的晚餐貢獻食物。在祈禱康復或者在懷孕期間為孩子的特定性別（通常是為男孩）祈禱時，他們實際上避免許諾提供筵席，因為他們知道自己無力履行這個神圣的承諾。富人經常舉辦的筵席——比方說，為年幼的孩子舉辦剃發宴，感謝安拉帶來好運或者為祖先祈禱而舉辦筵席——這些在窮人那里很少舉辦。除了必須的喪葬儀式，至少有7戶人家在過去六年中間沒有舉辦過任何筵席。他們都屬于村里最貧窮的20戶人家。在一種舉辦筵席可能是最主要交換方式的文化中，他們地位的喪失極其嚴重。[[352]](#_352_15)由于貧困，窮人大多被喪葬互助會和相關群體排斥在外，因為他們不能購買和分享任何像樣的筵席所必需的陶器。考慮到所需的費用，貧窮的農民家庭極少讓子女在小學畢業后繼續讀書。就像我們已經看到的，他們的孩子很可能早早就外出并且永遠地離去，因為村里沒有使其立足的稻田。

正是在這個更大的背景下，如同它在塞達卡被感受的那樣，貧窮呈現出其全部意義。少地或無地的人們總是被歸入相當邊緣的儀式地位。但只要他們可以租到土地、找到工作，就能，即使是勉強地，獲得最低限度的儀式尊嚴。在雙耕開始的最初四年中，工作充足，在此期間，筵席的盛行是補救積累下來的儀式不足的標志。在這個短暫的興盛時期，窮人也能夠擁有原來只有中等和富裕農民才擁有的地位和儀式尊嚴。現在，由于機器收割、播種以及租佃權的喪失，維持這些權利的資源或者一去不復返，或者迅速萎縮。

當然，雙耕的文化和物質后果在此不可分離。窮人所要求的適度的儀式地位不僅基于他們的收入，而且基于如下事實：他們在水稻種植過程中依然重要，從而對于種植大多數水稻的大農場主也依然重要。如果他們受到尊重，如果他們被邀請參加筵席，如果在收獲之后他們得到了扎卡特禮物，如果他們借貸或預付工資的要求得到了關注，在很大程度上這是因為他們的勞動被需要。盡管窮人在生產（用馬克思的術語來說是“經濟基礎”）過程中的角色與他們在文化生活（上層建筑）中的角色之間不存在機械的聯系，但不可否認的是，隨著對他們勞動的需求的驟降，他們也同時經歷了隨之而來的對他們的尊重和認可的喪失。因此，當窮人在自己人中間談話時，與收入本身的喪失相比，他們更為強調地位和認可的喪失。從前窮人們在收割時會外出做工，而現在他們無事可做，我們又該如何理解由這種賦閑引發的許多評論？有關未被邀請參加筵席、或者在村路上不被人理睬或者甚至不被看見、被無禮地對待或者“被晾在一邊”，有關這一切的尖刻評論，我們又該如何理解？他們感到沒有得到該有的人道關照，這至少與他們家庭收入的跌落一樣令人憤怒。當地對于村莊改進計劃的憤怒，甚至對于打開大門的憤怒，大都可以依據這些觀點來看。在每一種情形中，通過訴諸習俗而抗拒的是這種企圖——它要廢除一群村民作為當地村民應有的正常權利。

在左翼學者通常專注于工人和農民的低工資、失業、惡劣的居住環境以及營養不良等經濟剝奪時，儀式尊嚴和人格尊重等更為日常的事物卻往往被忽視。可是，對受害者自身而言，這些主題看起來才是至關重要的。例如，在歷史上騷亂不斷的安達盧西亞鄉村工人中間，一個主要的怨恨就來自被稱為宗派主義的“上層階級社會性自我免職的實踐”。正如吉爾摩所觀察到的：

他們公開指責宗派主義，因為他們感覺到，那是傲慢和輕蔑的反映……工人階級激烈的反應部分地源于深切感受到的道德假設：社區內的窮人認為，忽視一個人就是主動地輕視他和侮辱他，就是有意識地不把他當人看。[[353]](#_353_15)

旺·扎維·伊布拉欣更接近于我們的領域，他出色地研究了近來從東岸村莊招募來的馬來平原工人，研究詳細地探討了作者稱之為“地位剝削”的反應。[[354]](#_354_15)一個上了年紀的馬來工人期待別人像帕克·吉那樣恭敬地對待他，當他被一個馬來監工粗魯地呼來喝去——“嗨，你過來”時，他深感屈辱，如同他被當做“馬路中間的垃圾”。以前是農民的工人的許多抱怨不僅集中于工資和工作環境等一般問題，也同樣多地集中于不被重視和被無禮地對待。

如果我們要全方位地理解塞達卡的意識形態斗爭，就必須同時理解他們所面臨威脅的全部維度。這種威脅至少有三個層面：看得見的永久貧窮的威脅；同樣明顯的在社區中有意義和受尊敬的生產角色的喪失；以及與之相關的在本村被確定為完全成員資格的社會認可和文化尊嚴的喪失。將以上事物稱為生計問題會在很大程度上錯過其重要意義。當窮人通過發明綽號、惡意的謠言、聯合抵制筵席、并把當前的事態歸咎于富人的貪婪與吝嗇，從而象征性地瓦解了富人自我授予的社會地位時，他們同時也在堅持自己對地位的要求。正如平日所發生的那樣，甚至當一個貧窮家庭勉為其難地舉行筵席時，這也是一個微小的但是意味深長的象征，由此表明他們不接受饋乏所暗示的文化邊緣化的決心。正是在此意義上，口舌之戰，即塞達卡的意識形態斗爭，構成了“日常反抗”的核心部分。拒絕接受從來自上層的情境定義，拒絕認同他們自身的社會和儀式的邊緣化，所有這些對于進一步的反抗而言盡管是不充分的，但肯定是必要的。

# 第七章 超越口舌之戰：謹慎反抗與適度遵從

不管發生了什么，帥克都不會變成一個狡猾的暗中破壞者，他只不過是一個利用可能的微小機遇的機會主義者罷了。

貝爾托·布萊希特（1943年5月27日）

那些該詛咒的無禮的政客、教士、文人，還有那些諸如此類的教導實行“唯物主義”的人！工人所要求的只是在其他人看來必不可少的東西，沒有這些人們就根本不可能生存下去……工人階級符合他們的“唯物主義”是多么正確！不是就價值觀而言，而是就時間而言，他們意識到肚子先于靈魂又是多么正確。

喬治·奧威爾，《西班牙內戰的回顧》（1942）

從迄今為止的論述來看，人們有理由假定窮人與富人之間的斗爭在很大程度上只限于口舌之戰。這個假設并不全錯，但一定會有所誤導。因為塞達卡貧窮和富裕的農民并不只是在爭辯；他們之間同樣有戰斗。在這種境況下，此類戰斗并非激戰，更多的是低級的、打了就跑的游擊隊行動。我認為，本章要描述并分析的“戰斗”類型將是典型的“田園式”反抗，它表現了大多數農民階級和其他從屬階級在其大部分不幸的歷史中的特點。然而，更為特殊的是，我們這里涉及的是平淡無奇但是普遍存在的反對國家扶植的鄉村資本主義發展結果的斗爭：獲得生產資料的途徑的喪失（無產階級化），工作（邊緣化）和收入的喪失，以及雙耕前窮人尚擁有的微乎其微的地位和權利的喪失。閱讀資本主義發展史的絕大多數讀物，或者僅僅看一眼此種背景下當前的不平等，都會從中得出這種斗爭注定要失敗的結論。有充分理由相信事實不過如此。如果是這樣的話，塞達卡貧窮的農民階級將會發現自己有著聲名卓著的和數不清的歷史同道。

在考察了公開的集體抗議為什么如此之少的主要原因之后，我考察了為改變生產關系而進行的真實的反抗模式：縱火、怠工、聯合抵抗、私下的抗議、偷竊，以及窮人之間的相互支持。隨后我將評價高壓統治——或許可以稱之為“日常的鎮壓形式”——在從公開的順從中產生上述抗爭的偽裝形式中的作用。最后，我將回過頭來，用更一般化的術語，探討反抗的定義以及為什么此處所研究的許多行動有理由被稱為反抗。

## 公開的集體反抗的障礙

觀察家不必經過長期觀察和艱苦努力就可在塞達卡找到更多反抗的實例。事實上此類事例極其充足。而這些事例正是反映它們得以產生和受到制約的條件的反抗形式。如果斗爭是公開的，那就極少是集體性的，而如果斗爭是集體性的，它們就極少可以公開。兩者相遇幾乎等同于“意外事件”，結果通常是不了了之，并且作亂者會在黑暗或匿名的掩護之下逃離，消失在“老百姓”的保護層中。

為了理解為何反抗要采用此類偽裝，短暫地停下來考察一下少許“已知事物”是有幫助的，這些特定事物決定了可供選擇的范圍。這將在一定程度上預見到隨后的材料，并且一些此處只是概略提出的主題將在本章和下一章更為詳盡地展開。

或許構成塞達卡窮人可能的選擇最為重要的“已知事物”無非是他們已經經歷過的變遷的本質。其中一些變遷比其他的更容易引起爭論——更有可能引發公開的集體違抗。在此范疇之內，我可能提出那些重大的和突發的變遷，這些變遷決定性地破壞了幾乎所有日常生活的常規，并且同時威脅到許多人的生計。然而，在塞達卡，構成綠色革命的變遷被體驗為一系列在土地使用期限和技術上的逐步完成的變遷。變遷是痛苦的，它們趨向于逐步呈現，并且一個時間內只影響一小部分村民。比如，從收獲后交付的谷物地租到種植前交付的現金地租的變化，只影響佃農并且是在幾個季內推進，因此只有極少數佃農發覺自己同時身陷險境。此外，即使這意味著額外的債務負擔，他們中的大多數也能夠保住租佃權。我們能夠想象如果個別的大地主堅決要求村莊中所有佃農在同一季內繳納現金地租，其后果可能完全兩樣。當地主決定自己重新開始耕種土地或者將他們的土地租給富裕的商業經營者時，由此而來的租佃權的喪失也遵循相同的模式。增加地租和播種機替代插秧可以說更是如此。壓榨以變動不居的速度逐步完成，這樣受害者每次總是少數。此情形和其他情形一樣，每個堅持變遷的地主或農場主都代表著一個特定的情境，影響一個，或者至多是幾個個體。

這一模式唯一的例外是聯合收割機的引入，以及我們將要看到的，它所引發的最趨近于公開的集體違抗的情形。然而，即使在這個事例當中，影響也不是即刻發生的，對于村里的許多人而言也不是沒有某種模糊性。在最初的兩到三個季節中，對于窮人的經濟影響引人注意但并不具有毀滅性。中農在迅速收割莊稼的好處和自己或其子女喪失工資收入之間真正地分裂了。正如我提到的，少數最小的農場主已經屈服于使用聯合收割機的誘惑，以便早點結束收割，而簽訂城里的勞動合同。但在任何時刻，聯合收割都不意味著對大多數村民的生計的整體威脅。

吉打州農業改革的另一個顯著特征——一個用于有效緩和階級沖突的特征——是它將窮人轉移出生產過程而不是直接剝削他們這個事實。一個接一個地，穆達工程中的大農場主和地主將有關收獲和利潤分配的潛在斗爭從水稻種植中排除出去。現在機器經紀人的單一報酬取代了有關收割和打谷的計件工資率的斗爭。播種替代了有關插秧費用的商議，并完全避免了沖突。使用機器自己耕種或者將地租給外村人而收取一次性地租的選擇取代了關于時間和租金標準的緊張而有異議的論爭。甚至向現金地租的轉變也消除了苦難和破產的故事，而此前它們曾主宰收割后調整地租的要求。當然，變遷本身——解雇佃農，轉而使用機器，耕種前轉為固定地租——都不是那么簡單就能完成的。而它們一旦被實施，先前的佃農或雇傭勞動力就不再與此相關：一季接一季的斗爭也就不存在了。一旦生產領域中的聯系和斗爭被切斷，同樣的聯系——以及斗爭——在儀式的、慈善的、甚至是社交領域的聯系被切斷也就很簡單了。綠色革命的這一方面，就其自身而言，在解釋群眾暴力在此處和其他各處都相對缺乏的方向上前進了一大步。假使綠色革命的收益更多地依賴于壓榨佃農，而不是解雇他們，或者從收入較少的勞動力身上榨取更多勞動，那么其導致的階級斗爭一定會更激烈。實際上，雙耕的利潤與其說依賴于剝削窮人，不如說是忽視或取代他們。[[355]](#_355_15)如同其他的任何沖突，階級沖突發生在打谷場、流水線以及確定計件工資率或地租的場合，在此，至關重要的利益就是爭奪的目標。穆達的雙耕取得的成就是，它逐步清除了那些歷史上曾經發生過階級沖突的場所。

公開抗議的第二個障礙早在雙耕逐步實現的沖擊中就有所暗示。我們討論過的所有變化的影響都有塞達卡復雜的和重疊的階級結構作為中介。在這樣一個結構中，有比較富裕的和非常貧窮的佃農；有自己（或其子女）同樣是租佃者和勞動者的地主；有需要有薪工作來維持生存同時也租用聯合收割機的小土地所有者。因而租佃權和產品的每一個重要轉變不僅造成了受害者和受益人，還造成利益同樣并不那么容易辨別清楚的實質的分層。塞達卡并非莫雷洛斯，后者那里的糖料種植園中窮人和大量未曾分化的農民面臨著共同的敵人。事實上只有在為數極少的環境中，鄉間的階級結構才會產生決定性的單一分裂或者對于外部壓力的接近一致的反應。塞達卡階級結構的復雜性妨礙了在多數問題上形成集體意見，以及因此而來的集體行動。

由當地階級結構所呈現的集體行動的障礙還混合了其他超越階級的斷裂和聯盟。這些因素是親屬、朋友、派系、資助關系以及儀式性紐帶，這些聯系實際上攪渾了所有小共同體中的“階級之水”。幾乎毫無例外的是，他們通過建立一種依附關系而有利于富裕農民，而這種依附關系限制了那些謹慎而貧窮的男男女女以階級的方式行動。因而，沒有土地的窮苦勞動者曼蘇爾，同村里最富有的沙姆蘇爾建立了關系，并且偶爾還有希望在他家中蹭一頓免費午餐或者不時可以打打零工。盡管這一切并未阻止曼蘇爾私下里抱怨失去了工作以及富人通常都很吝嗇，但這的確有助于解釋他的巫統成員的身份以及他在村莊政治中的恭順態度。“瘦骨嶙峋的”瑪極度貧窮，私下在階級問題上相當心直口快，并且他還是伊斯蘭教黨的成員。但他從其岳父阿布杜爾·拉赫曼（一個相當富有的巫統地主）那里租了1里郎地，并且小心翼翼地不在村里惹是生非以免讓他的岳父為難。還有其他很多例子可以引用，但意思很明確。村里的少數窮人受到親屬關系和/或他們不會輕易破壞的微妙的經濟依賴的制約。如果他們與這些親戚、地主或雇主意見相左，他們多半會謹慎從事。過分強調這類紐帶將是錯誤的，因為較之于從前，它們已經相當稀少并且益發脆弱，而且還有許多窮人根本未被限制于此種形式中。然而盡管如此，它們的確限制了窮人形成派系。[[356]](#_356_15)

公開反抗的第三個障礙與其說是障礙，不如說是一個可行的選擇。正如巴靈頓·摩爾在另一個完全不同的情境中提醒我們的那樣，“過去數個世紀中人們對壓迫的一個最經常和有效的反應就是逃走。”[[357]](#_357_15)這一選擇通常在東南亞特別是在馬來亞具有任何地方都不能及的歷史重要性。只要存在陸地疆界，并且只要對人力而非土地的控制是榨取剩余的基礎，被一位作者笨拙地稱之為“逃避抗議”的可能性就總是比冒公開對抗的風險更具吸引力。[[358]](#_358_15)讓本土領導人和殖民地統治者驚愕的是，馬來的鄉村人口總是處于異常流動的狀態——遷到另一個小的領地，離開一塊土地去開辟另一塊新的空曠土地和林中家園，并在此過程中改變種植的莊稼和職業（通常是后者）——屬于經典意義上的“用腳投票”。由于其獨特的人口特性和社會組織，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正是“退出”而非“表達”表現了馬來社會對于壓迫的傳統的和首選的反應。[[359]](#_359_15)幸運的是，就綠色革命中的失敗者而言，這一傳統選擇對許多人來說依然可資利用。

至少在過去半個世紀內，吉打州水稻種植區大量增加的人口一直在遷出。他們作為拓荒者對霹靂州、彭亨州、柔佛州以及吉打州內陸地區新水稻種植區的開發做出了貢獻。事實上，村里每戶貧困家庭都曾申請政府發起的移民計劃，那里橡膠尤其是油椰的收入甚至通常都超過一個富有的水稻農場的勞動所得。但入選的只有少數人，并且他們通常都不是最窮的村民。盡管如此，成為被資助的居民的微小機會卻是預防地方沖突更公開表達的因素。對謙恭而貧窮的村民子女來說，工廠工作和家庭服務（對女性來說）以及全職的城市合同工（對男性來說）的選擇都是可以實現的。對主要選擇留下來的貧窮家庭來說，城市里短期合同的勞動提供了一個能維持下去——即使不那么令人滿意——的生存方式。這一最后和最為普通的生計方式，不僅減輕了貧窮家庭的經濟壓力，許多年來還將家里的當家人從村莊事務的積極參與中轉移出去。這種半無產者依然主要居住在村莊里，并且甚至可能耕種一小塊稻田，但是他們在可能引發階級沖突的地方議題中扮演的角色卻越來越邊緣化。外出就業機會的下降當然可能極大地改變這副圖景，這一改變是通過增加地方性工作和獲得土地而實現的。[[360]](#_360_15)然而，從目前來看，利用現金經濟以補償地方生存不足的能力將繼續為地方沖突提供一種風險更小的替代物。

人們可能會從前述內容得出一個印象：塞達卡階級沖突的障礙完全是復雜的地方分層、生產關系變化的散亂特點，以及收入的替代性來源等因素造成的。我必須補充的是，鎮壓以及對鎮壓的恐懼也應該包含在內。正如貧困村民經歷過的那樣，鎮壓的快速冷卻作用在接下來的描述中將變得清晰異常。只需說明阻止聯合收割機增長的努力發生在某種恐怖氣氛中就足夠了，這一氛圍是由地方精英、警察、內部安全部隊的“特殊部門”、政治拘留和脅迫模式等共同造就的。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如果不是由高壓統治造成的合乎情理的恐懼，抗拒聯合收割機的地方運動將呈現出更為公開和公然反抗的趨勢。

只有在考慮到預期鎮壓的背景時，公開反抗的第五個也是最后一個障礙才有意義。這一障礙無非是日常的謀生需要——為了家庭的生存——馬克思恰當地稱之為“經濟關系的無聲的壓力”[[361]](#_361_15)。在暫時缺乏任何直接的和共同改變其處境的現實可能性的情況下，除了盡可能地適應每日所面對的景況之外，村里的窮人們幾乎沒有什么選擇。佃農也許痛苦地憎恨必須為一小塊土地繳納的地租，但他們必須交租，否則就會失去這塊土地；近乎無地的人們可能痛惜喪失了薪資工作，但他們必須為少數的可資利用的工作機會拼搶；人們或許滿懷對于主宰村莊政治的派系的憎恨，但要指望獲得派系贈與的小恩小惠，他們就必須謹慎行事。

謹慎、務實地適應現實至少有兩方面值得強調。首先是它并未取消某些形式的反抗，盡管它確實設定了界限，而這界限只有魯莽的傻瓜才會去逾越。其次，它首先是務實的；而這并不意味著對那些現實的規范性的贊同。理解這一點無非是要領會，在所有情況下，大多數從屬階級歷史上的處境究竟是什么。他們要在很大程度上自身無法控制的條件下抗爭，并且他們緊迫的物質需求使對于那些條件的日常適應成為必要。來自中層或上層階級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有時可能有興趣執著于長時段的結構性變遷的前景，但是，農民或工人階級不可能從謀生的世俗壓力中有稍許解脫。就像我們要做的那樣，如果觀察塞達卡日常的社會生活中的許多“順從”行為，我們沒有理由臆斷它們衍生于精英或國家所操縱的某些符號霸權或者規范性的共識。日常的脅迫已經足夠了。像馬克思一樣，涂爾干和韋伯都意識到，“無論其偏好和傾向如何，人類都被迫按某種方向行動”[[362]](#_362_15)。涂爾干有關產業工人階級所受到的日常約束的觀點甚至更適用于農民：

社會關系的張力應部分歸于工人階級并不真正滿足他們生存于其中的環境，但是由于他們沒有任何可以改變這些環境的手段，他們常常得被迫接受它們。[[363]](#_363_15)

最后，在特定條件下，農民和工人階級的確擁有從根本上改變其處境的手段。但是，在短期內——今天、明天和后天——他們面臨著嚴酷的限制其現實選擇的情境[[364]](#_364_15)。今天，像以往一樣，留給塞達卡窮人微乎其微的土地和工作機會依然要靠富人的默許。如果說窮人日復一日的許多公開的行為反映了這個事實，那么，只有對生存健康而合宜的考慮能夠解釋這一點。農民所處的情境是：“破釜沉舟”的第一個字必須按字面意義理解，那么“破釜沉舟”的做法就沒什么吸引力了。

## 抵制聯合收割機的努力

作為伴隨著雙耕出現的最為突然和最具破壞性的變遷——聯合收割機的引入同樣激發了最為積極的反抗。這種反抗超出了如我已經描述過的關于效率的爭論、對失去工資的抱怨以及直接針對使用它的人的流言蜚語。整個吉打水稻種植區都試圖阻止機器進入農田，發生過縱火和破壞等事件，組織過水稻插秧工針對率先使用機器的人舉行“罷工”。所有這些行動最終都沒能阻止水稻收割的機械化，盡管它們毫無疑問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這一進程。精密考察這些反抗形式和大農場主的反應，能夠教會我們許多有助于建構此類反抗的可能性與限制。

當然，聯合收割機并非威脅穆達貧窮村民生存的第一種機器。我們在前面的章節已經看到，使用拖拉機和卡車將稻谷從地頭直接運到鎮里在更早的時候就已經在一些村莊引發了英勇而成功的反抗。然而，聯合收割機造成的威脅遠為巨大。零星的反抗早在1970年就已開始，當時，從日本原裝機改裝后的第一批小型實驗機器在吉特拉鎮附近的農田實驗中投入使用。穆達農業發展局管理實驗的官員回憶了幾起暗中破壞的小事件，所有這些事件都是“惡意破壞公物”[[365]](#_365_15)。貧窮村民從機器里拆除了電池并扔到灌溉渠里；他們弄壞了汽化器和其他重要部件（如配電器和空氣過濾器）；他們把沙子和泥漿放進油箱；他們把各種物體（石頭，電線，釘子）扔到螺絲鉆里。這些暗中破壞有兩個方面尤其值得強調。首先，暗中破壞的目標絕非簡單的偷竊，這一點再清楚不過了，因為事實上什么東西都沒被偷走。其次，所有破壞行為都是由幾個人或小組在夜間秘密進行的。而且，他們受到鄉親們的保護，后者即使知道誰干的，在警察調查時也會宣稱完全不知情，結果，沒有任何人做出檢舉。夜間設置警衛看守聯合收割機的做法就可追溯至這些早期的實驗。

從1976年開始，聯合收割機開始報復了，農民的報復行動也同樣在整個水稻種植區蔓延。塞達卡較窮的村民還能回想起幾個事件，他們講述這些事件時依然帶有某種喜悅之情。比如，托·穆罕默德告訴我他清楚地知道如何阻塞螺絲鉆——在哪兒放入有倒刺的金屬絲或釘子——因為他的朋友們曾經干過。他拒絕太過仔細的描述，他說，因為如果公開談論那么他的朋友就可能遭到逮捕。蘇庫爾描繪了一個更具戲劇性的事件，在我到那里之前的兩個季，在距塞達卡南部幾公里的托凱村附近有一臺聯合收割機起火了。他說，有幾個窮人圍住馬來守夜人問他機器究竟是誰的。當后者回答說機器屬于一個中國企業所有時，他們命令他爬下來，然后給發動機和駕駛室澆上汽油并且點燃了大火。第二天有兩個馬來年輕人被逮捕，但是由于缺少證據而很快被釋放。村民還講了發生在斯朗庫村附近的其他幾起事件，如把大樹砍倒放在聯合收割機進入村莊或者到其他村的路上，以及螺絲鉆被電線卡住等。

盡管有極少數農民連一兩個事件也回憶不起來，我還是不費吹灰之力就收集到非常齊全的事件報告的清單。然而，沒有人能夠回憶起發生在塞達卡本地的任何此類事件。或許這只是反映了可以理解的避免他們自身引起注意的做法。在任何時候，這些暗中破壞活動都未達到19世紀30年代將脫粒機引入英格蘭時所導致的砸毀機器的水平[[366]](#_366_15)。

在男性的個人和小群體還在襲擊機器的同時，為了對那些使用機器的農場主施加壓力，還出現了婦女靜悄悄地然而更具集體性的努力。那些通常來自同一家庭的男人和女人由于聯合收割機而失去了工作，但是，唯有婦女還有著實際的討價還價的力量，因為她們暫時還控制著插秧的工作。[[367]](#_367_15)收割農場主土地的婦女群體通常也是先前耕種同一塊土地的那群人。她們失去了大約一半的季節性收入，因而可以理解其痛恨為那些在收獲季使用聯合收割機的地主插秧。因此，在塞達卡和整個穆達地區，這些婦女決定組織一次聯合抵抗行動，拒絕為使用聯合收割機的雇主提供插秧服務。

塞達卡五個這樣的“共享小組”中的三個顯然做了一些努力來推進聯合抵抗行動。那些由六到九名婦女組成的小組由洛斯妮（一個寡婦），羅吉婭（瑪·布揚的妻子）以及米麗婭姆（瑪·伊莎的妻子）領導。其余的兩個小組由塔杰丁和阿里芬的妻子領導，看起來并沒有卷進去，但是沒有一個小組同意為被其他三個小組當中的任何一個小組所抵抗的農場主種植水稻。洛斯妮、羅吉婭以及米麗婭姆的小組發起抵抗的原因還不是特別清楚。她們由來自平均水平比其余兩個小組貧窮，但也只是稍窮一些的家庭的婦女組成。同樣，前兩個小組大多數成員來自伊斯蘭教黨家庭，但這一點歸因于親屬和鄰里關系的程度和歸因于派系的程度本質上差不多，并且至少她們也經常聯合抵抗與自己同一政治派系的農場主。如果我們依賴當地關于反抗模式的解釋，那么多數人會認為洛斯妮和羅吉婭嚴重依靠雇傭勞動來養活家庭，而且與此同時她們是“勇敢無畏”的[[368]](#_368_15)。

聯合抵抗的形式與迄今為止我所描述過的諸種謹慎反抗的種類差不多。在聯合收割機的農場主和他的插秧工人之間，并沒有出現公開的對抗。相反，這里的對抗是匿名的和間接的。婦女們通過調停者“讓人們知道”她們的小組對于失去收割工作的不滿，并且將不愿意為那些在前一季使用聯合收割機的地主插秧。她們還讓人們知道，如果聯合收割機在收割過程中壞掉，這個時候希望人工收割莊稼的農場主別指望先前的工人會幫他擺脫困境。

1977年灌溉季初期，當實現這一威脅的時機到來之際，小心謹慎又一次占了上風。三個小組中沒有一個直接拒絕給那些上一季使用聯合收割機的人插秧。相反，她們拖延時間；共享小組的領頭人告訴那些令人討厭的農場主她們很忙，現在還沒辦法到他們的田里去。只有大約12個農場主曾在上一個收獲季使用過聯合收割機，因此共享小組有足夠的工作要做，她們忙著給那些尚未機械化的人插秧。[[369]](#_369_15)插秧者因而公開了她們的選擇；她們避免直接拒絕插秧，那樣的話可能招致公開的決裂。與聯合抵抗的傳言緊密配合的是，那些被搪塞的農場主越來越感到焦慮——他們的水稻秧田正在錯過最佳插種時節，進而他們擔心在水源供應被切斷的預定期限前他們的稻谷還未完全成熟。看到自己空著的地塊旁鄰居新插種的稻田，他們的心里感到不是滋味。

在這場心理戰兩個多星期后——表面上的聯合抵抗從未真正宣布過——6個農場主“讓人們知道”，他們正在安排外村勞動力來為他們插秧。依據大多數人的講述，這6人是哈吉·卡迪爾、哈吉·沙利姆、托·卡西姆拉齊姆、卡米勒和西卡瑪赫，他們總共擁有將近100里郎耕地。他們聲稱為了捍衛自己的權利，他們敦促當地的共享小組履行一項插秧日程的明確承諾，而且，只是被再次推托之后，他們才轉而考慮別的辦法。就此而言，聯合抵抗瓦解了。三個共享小組都面臨著背叛，因為婦女們擔心插秧工作會永遠屬于外村人。她們匆匆忙忙地放出話來，說將會在幾天內就開始插那些田里的秧。6個農場主有3個取消了讓外村人來插秧的安排，而其余的3個農場主繼續堅持先前的安排，這也許是因為他們覺得現在取消安排已經太晚了，亦或許是因為他們希望給這些婦女一個教訓。插秧者來自燕鎮（恰好不屬于灌溉計劃區域）以及更遠一些的新基亞鎮和默布克村。哈吉·沙利姆利用他相當的政治影響力同穆達農業發展局商定后，帶來一隊泰國的插秧人——這一做法他現在依然繼續著，并因此而被人恨之入骨。

通過集體行動阻止聯合收割機的短暫而且失敗的嘗試，是令人沮喪的或者自鳴得意的事后議論的主題，這當然取決于人們碰巧站在哪方的立場。除了其所表達出的喜悅或失望，這些事后分析唯有一次集中在這一結局的必然性上。由于機械化而所失甚多的人們意識到，婦女們不可能真正超出議論和威脅。由此，華喜德說，傳言中的聯合抵抗“只不過是個議論，而她們無論如何會去插秧的”。“她們能做什么？”他絕望地問道。托·穆罕默德也附和這一評價：“其他人會去做這項工作；一旦丟了這份工作，她們就什么也做不成了”。“人們都很聰明”，蘇庫爾補充說，“如果你不想去插秧，他們就會奪去這份工作和錢。”正是由于這個原因，薩馬德宣稱，婦女們小心翼翼地不破釜沉舟，并且只在大農場主聽不見的地方談論聯合抵抗。最后，哈姆扎以同樣的口氣總結了婦女們面對的諸多可能：

你抱不抱怨都沒用。你什么都干不了；你根本贏不了。要是你開口，他們就不會雇你。如果聯合收割機壞了，女人們還得去給農場主收割水稻。如果你手頭緊，就不得不接受這份工作。如果你拒絕，如果你不去做，其他人會去做。只有那些有錢人才能夠拒絕。

我們不可能希求有關“經濟關系的無聲壓力”的更清晰的說明了。富人們不僅清楚這一“無聲的壓力”，并且還依賴于它。如同瑪·伊莎所說的，“他們什么都做不了，只是閑扯”。托·卡西姆在機械化過程中所面臨的風險更高，因為他是一個機器經紀人，同時也是一個農場主，他意識到聯合抵抗永遠不可能實現，“窮人無論如何得工作；他們不可能長久堅持聯合抵抗”。勒拜·侯賽因說，雖然她們很生氣，對于聯合抵抗她們也只能是說說而已，因為她們需要錢。他用一句馬來諺語精確地總結了婦女們面臨的困境：“生大米的氣，就用大米喂雞”。最為切近的英語表達則是“損人不利己”。

如果從我們單一的村莊視角中后退幾步，就會看到更為廣泛和更不樂觀的模式。塞達卡的婦女共享小組在同一時期偶爾被雇用到30英里外的稻田插秧。洛斯妮告訴我，有一次一個來自塞迪蒂·班杜村——她們的共享小組正在那里插秧——的婦女告訴她，她們正在為之工作的農場主不再雇用當地的插秧工了，因為上個季度他用聯合收割機收割。得知這一消息以后，洛斯妮告訴那女人她“心里不舒服”，但是工作差不多就要完成了。[[370]](#_370_15)非常類似的情形還會有很多，因而，從這一更加寬廣的視角出發，塞達卡貧窮的婦女不經意地充當了穆達地區其他村莊的“罷工破壞者”。這些村莊的婦女，或者和她們一樣的其他婦女，毫無疑問也破壞了塞達卡的聯合抵抗行動。我們在此處看到的是農民的階級行動功效折損的近乎經典的例證，特別是當這些行動通常被限制在一個相當廣闊的勞動力市場中的一個或幾個村莊里的時候。[[371]](#_371_15)

勞工聯合抵抗行動的類似嘗試發生在穆達大部分地區。穆達農業發展局指揮部的一位官員向我透露，他懷疑大多數地主，比如哈吉·沙利姆，申請允許引進泰國插秧工人，事實上是為了對付當地勞工的聯合抵抗。因為這些人多是大規模的農場主，他們就是最有可能在第一時機使用聯合收割機的那批人。有關聯合抵抗的議論當然非常普遍。因而羅斯瑪麗·巴納德提到一個距亞羅士打州首府不遠的村子，那里（在1978年）有“關于聯合各種力量在下一季度阻止聯合收割機的議論”[[372]](#_372_15)。在塞達卡，我也常聽到一些村莊的名字，據說這些村子把聯合收割機拒于田地之外。勒拜·彭德克說基蘭杜村北部依然使用人工收割。布基拉雅地區是伊斯蘭教黨的據點，這里的古班·哲萊村和其他村莊曾經聯合抵抗和搗毀機器以阻止聯合收割機的到來，它們經常因此而被提及。曼蘇爾說在北部的康港村，窮人“組織得更好”，并且手工收割依然占據統治地位。[[373]](#_373_15)在附近的明關村，當一個大地主發現能夠馬上利用附近的聯合收割機，并因此試圖把他的已經集合起來的收割工人打發回家的時候，警察會被即刻召來以防止可能的騷亂。

然而，此種關系中最經常提及的村子是往北大約12英里的帕瑪當·布魯赫村。許多人說，由于窮人成功地聯合在一起，在甘榜這個村中聯合收割機尚未被使用。塞達卡的收割工人和插秧工人談到這個共同體時總是帶有某種近乎敬畏的表情，于是為了親眼看看，我決定到帕瑪當·布魯赫村走訪一趟。那天陪同我去的是阿明，他有個舅舅住在那兒。他舅舅自己耕種十多里郎土地，他告訴我們，他和大部分人現在都使用聯合收割機，而且聯合抵抗行動已經失敗了。只有當我獨自一人穿過稻田時，我才從一個小佃農那里聽到了略有不同的講述。他說，實際上帕瑪當·布魯赫村的“窮人”在三個季內阻止了聯合收割機收割稻谷，直到1978年。當我問到他們如何做到這一點時，他回答說大農場主們“害怕”。我問為什么他們害怕，他只是說golok putihputih，這個詞組或許可被譯為“彎刀在閃光”（或者非常鋒利）。或許他感到對一個陌生人已經無償地吐露太多，因而拒絕詳加描述，但他的談話已經很清楚地表明，暴力威脅是一個重要因素。帕瑪當·布魯赫村的另外兩個特征或許有助于解釋其在阻滯機械化過程中的相對成功。看起來村里有超過通常比例的無地者和小土地所有者，他們較多地依賴于工資。村里的領頭人同樣以不尋常的方式推進了窮人之間的團結。盡管他和大多數領頭人一樣出生于富有家庭，但他父親由于賭博欠債失去了幾乎全部土地，因而當前的領頭人自己也兼作收割工人。然而即使考慮到那些特殊的“有利條件”，帕瑪當·布魯赫村的成功也是相當短暫的。

塞達卡的那些試圖聯合抵抗和破壞機器的人們談到他們自身的經歷或者其他人相對的成功時，人們聽到的不止是灰心喪氣和悲觀絕望的老調重談，還有關于如果窮人更團結更有力地行動，本來應該（或可能）發生的就不會只是隱約閃現的念頭。因此薩馬德把帕瑪當·布魯赫村視為一種鼓舞：“如果我們在這里也做了同樣的事，機器就不會到來。如果我們曾經做了，事情本該好一些，但我們沒被組織起來。”羅吉婭自己把塞達卡的共享小組同帕瑪當·布魯赫村作比較時不無鄙視地說：“在這里她們根本不想堅持”，“如果她們都同意，如果她們罷工了，機器就不敢進村”。曼蘇爾是村子里少數幾個完全沒有土地的體力勞動者之一，他非常明確地附和了這種觀點。“這里的人沒有被團結起來；他們總是害怕并且只會跟隨有錢人；如果他們再強大一些，他們自身才能被發動起來。”當談話轉到總有一天插秧機會取代婦女勞力的可能性時，對當前不團結的類似評論連同可能團結起來的暗淡前景就再清楚不過了。巴克利說，如果此類機器進來，婦女們會為從秧田中每拔一小捆秧苗要價一美元，“這將演變成一場戰爭”，他補充說。伊沙克更加現實地指出，如果婦女們每捆要價1馬元，那么其他人將同意90分就去做，還有其他人會同意80分或70分，這就是“事情的結局”。

正如大農場主看到的，未遂的聯合抵抗行動是“說說而已”事實上只是“雷聲大雨點小”。這種觀點不無道理，因為聯合抵——抗行動從未公開宣布并且悄無聲息地瓦解了。拖延的做法和近乎似是而非的借口意味著，聯合抵抗自身的目標也可以被否定。然而，正如失敗者看到的那樣，它是朝向最終未能到達的正確方向的一種努力。他們對于自身的弱勢地位或者路途中的障礙并不存在任何幻想，但是，他們的確期望在別處一定程度的成功作為激勵和鼓舞。

## “常規的”反抗

阻止聯合收割機的努力，盡管很難成為激動人心的戲劇素材，但至少是非同尋常的——即使無甚效果，它仍不失為一種嶄新的主動精神。它發生在很少為人注意的背景下，即有關工資、租佃權、地租以及稻谷分配的常規性反抗是塞達卡和任何業已分層的農業社區中的永久生活特點。對這一斗爭領域的詳盡分析將揭示地方工團主義的隱蔽形式，這種地方工團主義因窮人間的團結以及針對財產的數量可觀的偷竊和暴力行為而得以強化。我們將會看到，無論就物質意義或象征意義而言，這種行動都極少會對土地不平等的基本結構構成任何根本性的威脅。然而，它所代表的卻是一種階級之間生產關系的檢驗和再協商的持續過程。就雙方——地主——佃農，農場主——雇傭勞動力——而言，他們都不斷地試圖抓住每一個小的優勢并使之堅持到底，試探現存關系的邊界，準確地把握如何能夠越界而逃避懲罰，以及將此邊界作為可接受的部分或至少是可以容忍的領地要求。在過去的10年中，這一邊界之戰的潮流當然是有利于大農場主和地主的。他們不僅侵吞了大量由薪資工人和佃農守衛的領地，還在此過程中（通過邊緣化）縮小了斗爭持續的范圍。然而，即使沿著這一縮減了的邊界來看，那些希望重新獲得一小塊土地——這些土地都是他們極不情愿失去的——的人們所施加的持續壓力依舊存在。反抗者幾乎不需要外部的協同就能夠實施這一斗爭，因為維持一種尚可忍受的生活的簡單需求足以使他們堅持自己的立場。

在這里，我的目標只是傳達出此種常規反抗的某些特點及做法，而不是其全部，因為那個題目可以自成一本大部頭的書。由于大量的反抗行動與水稻種植過程的安排有關，我們最好從進行打谷工作的田間地頭開始。

沒有工會的工團主義

與收割工人不同，打谷工人是作為個人被農場主雇用并付錢的。他們通過同一根脫粒的管子兩兩在一起工作，然后在一個工作日結束時分配計件工資收入。在1979年，平均每麻袋的計件工資數是2馬元。這項工作的計件工作組織方式在打谷工人和那些稻谷正在脫粒的農場主之間引發了利益沖突。農場主自然想獲得田里所有的稻谷，為此，他們傾向于讓打谷工敲打每一捆割下來的稻谷，直到實際上所有的稻谷都進入管子里。相反，打谷工人卻對他一日工作能賺得的現金更感興趣。[[374]](#_374_15)根據稻谷的成熟度，粗略說來頭兩三下可能打下80%—90%的谷粒。而為了打下大多數剩余的谷粒卻需要再敲打六至七次。如果打谷工人每捆稻谷只敲打兩三下然后就迅速換到下一捆，管子就會滿得更快，而他們每天可以賺得更多。[[375]](#_375_15)如果有人能按照這種方式工作，他就有可能每天打下10麻袋稻谷（20馬元）。相比之下，比如說，如果他把每捆稻谷打得更徹底，就只能賺10或12馬元。對窮人而言，打谷是每個季節當中收入最好的工作，收割期間如果能打下盡可能多的稻谷還有額外的獎賞，考慮到這些，上述區別就是至關重要的。打谷工的工資收入和農場主的稻谷收入之間的利益沖突到此還未結束，如果打谷工家里有人拾穗，他事實上還可以再獲得一部分留在稻稈上的稻谷。窮人留在脫粒桶之外的稻谷越多，他們家里的女人收割后能收集到的稻谷就越多。這就為他們多留下一些稻谷提供了進一步的動機。

每捆稻谷根據其品種及成熟度應該打多少次，相關的期望當然會逐步增大。但這些期望需要持續的壓力和持續的監督才能實現。經歷了最初幾次打谷后，我想了解農場主為什么不自己打谷，即使他自己比較窮。我考慮，畢竟他可以省下付給別人的20馬元的工資。當我在那天工作結束后詢問一個農場主（瑪·伊莎）時，他說如果他不監視那些打谷工，就可能損失一半的稻谷。這當然是夸大之詞，但解釋了為何大多數小農場主監視他們的打谷工而自己不干活的原因。當勞動者工作的時候，農場主慢慢地穿梭于田間并且讓人感覺到他就在眼前。當他在田里遙遠的一角時，當脫粒桶周圍防止稻谷被吹走的席子擋住他的視線時，或者當他忙于準備食物時，每捆稻谷被敲打的次數就會略微降低。由此而獲得的好處是微薄的且極為有限，因為農場主——馬來語中的稱呼，“稻谷的主人”——會覺察到桶裝滿的速度，可能臨時檢驗被敲打過的稻捆，并且無論如何總是可以決定在下一季不再請這些工人回來工作[[376]](#_376_15)。我被告知，偶爾也會發生由于打谷工的工作讓農場主感到很不滿意而被告知第二天不用來了的事，但此類事件是極少數。農場主同樣盡可能避免雇用家里有很多人拾穗的打谷工。因此，全家擁有大量的拾穗者的“瘦骨嶙峋的”瑪很少在塞達卡被請去打谷。其他的窮人偶爾也會讓他們的妻子或女兒在他們收割過的田里拾穗，但是他們小心翼翼地不養成習慣以免危害到他們的雇傭地位。

由于現有的打谷工作大量減少，上述常規性反抗的邊界也收縮了。然而，反抗并未完全消失。一捆稻谷的實際敲打次數仍然是農場主的意愿和他的強制能力之間的一個折衷——一個不僅由兩種力量的綜合平衡，而且還由稻田里日常的持續不斷的斗爭所決定的折衷。

常規反抗的另一個焦點是耕種、收割和打谷的工資額的確定。其變動的范圍相對較小，因為如同基于勞動力市場環境的現行工資率，它是在每個季中確定的。但是，在確定工資額之前的特定時期或是當臨時的勞動力短缺出現時，還存在著一定的變數和機動空間。婦女共享小組與男性打谷工令人難以置信地對于任何農場主支付哪怕只比上一季高出一點點工資的消息保持警覺。如洛斯妮所說，“一旦有人得到更高的工資，其他人就不得不跟著”。事實是既定工作的現行工資額是幾乎每個季的激烈爭論的主題，共享小組的頭領會引用她聽到的（或者是看似確有其事地杜撰的）最高工資額，而雇主會用同樣的方式引用最低工資額。工人們受制于工作被其他人奪去的可能性，而農場主則因考慮他的莊稼能否適時栽種或收割而受到限制。就勞動者來說，在這一地區經營農場的華裔在談判過程中扮演了有益的角色，因為他們最有可能打亂原有的排列并且支付更多的工資。[[377]](#_377_14)談到現行的工資額時，人們可以非常普遍地聽到大農場主抱怨工人如何撒謊和欺騙。他們時刻打聽來自田間地頭的消息，盡可能地懷疑有關更高工資的報告，或者通過對照自己田里并不適用的特殊條件（比如，收割和打谷時的水深、倒伏情況）來加以辯解。從勞動力市場的競爭性表現中獲取的好處看上去可能微不足道，但是，對處于邊緣的人而言，微薄收益的可能性從來不是微不足道的。穆達的季節性“勞動力市場”的統計材料表明——插秧、收割和打谷的平均價格——在村莊的水平上，是持續的變動的產物。

當前機械化造成的打擊意味著人工收獲的稻谷大量來自低洼地帶的澇地或者暴風驟雨造成大量稻穗倒伏的田地。此類特殊的條件原則上要求特殊的工資；這些特殊工資的確切數額應該是多少又將是一個斗爭的舞臺。處理這場爭斗的方式揭示出與我們在反抗聯合收割機事件中所看到的“罷工”行為和小心謹慎同樣的因素。比如，在收割的案例中，一個共享小組的頭領（如洛斯妮）通常會預先查看一遍稻田。如果水特別深或者稻子被風吹倒了（或者兩者兼有），她很少會直接要求農場主為每里郎付更高的工資。相反，她會“讓人們知道”收割需要比往常更多的時間，工資也應該相應地比35馬元的標準（1979年農忙季節）更高。對此農場主可能通過幾種方式“答復”他可能：也“讓人們知道”，他愿意按照工作如何進行支付更高的工資，他也可能會保持沉默，或者可能讓人們知道他認為標準工資對這種情況來說已經足夠了。然而，除非農場主給出的工資額明顯地差距過大而且還有可獲得的替代性工作，婦女們都會到場工作。如一一果稻田的條件和預期樣差或者更差些，她們有可能在割稻子時公然抱怨，提出諸如“你的稻子很難收割；我們吃虧了”等批評。這是農場主面臨失去勞動力的危險的清楚信號，他通常暗示他會漲一點工資作為回應，盡管很少說清具體數額。另一方面，如果他確信他們的要求很無理，他只會保持沉默，這可被視做拒絕的信號。在此情形之下，女人們面臨著困難的選擇；她們可能繼續工作而同時抱怨不休，或者辭掉這份工作。

辭工的決定并不是輕易做出的，因為農場主可以有充分的理由在下個季轉而雇用另一個共享小組，而且任何寶貴的收割收入的喪失都是一種損失。如果農場主大體上擁有以前支付合理工資的好名聲，婦女們就會繼續工作同時讓她們的不滿被人們知道。[[378]](#_378_14)但是如果農場主有一個吝嗇的名聲，婦女們就會罷工，她們一年中會這樣做一兩次。“罷工”并不宣布，但是每個人都知道正在發生什么。她們并不直接離開稻田，而是更有可能午飯后或第二天早晨不再回來。農場主隨后的典型做法是派某人去共享小組的頭領那里建議適當增加工資以結束罷工。農場主也可能拒絕改變立場，但這種情況較少發生，如果他這么做了，就必須重新雇用外面的勞動力，因為一旦工作已經開始，村里就沒有一個共享小組會同意接替另一個小組的工作。

有關收割工資的爭論隨著更多農場主轉而采用撒播法播種而變得愈加普遍。撒播種植的稻田收割起來要困難得多，因為缺乏整齊的稻行并且成熟稻稈的高度更加變化不定。收割這樣的稻田，婦女們要求并且能得到高達每里郎60馬元的工資，尤其是在灌溉時期，那時已經是收割季，但地還是濕的。她們還注意到高額的收割工資對那些不雇用插秧工的農場主來說也是一種適當的報應。洛斯妮在她的小組收割阿布杜爾·拉赫曼的撒播稻田時每里郎要價50馬元，她私下里說，“要是他剝奪了我們插秧的活兒，我們就在收割時奪回來”。在可能的情況下，農場主對高額收割成本的對策是轉向將一上午的工作包給一些個人并支付統一費用（3或3.50馬元）的現金工資制。這是只有當農場主的稻田同其他人的稻田不發生沖突時的一種選擇。然而，即使在那個時候，共享小組的許多婦女仍將拒絕為現金工資去插秧或收割，因為她們知道這是減少她們收入并且打破她們的初級組織的另一種方式。判斷大農場主能否成功地把現金工資制確立為插秧和收割的規范還為時過早，然而，貧窮婦女對現金工資制的反抗是迄今阻止其應用的主要因素，這一點卻非常清楚。

有關打谷工作的計件工資的沖突與收割時的矛盾如出一轍。在正常環境下，那些從事稻谷脫粒工作的人們可以預期一個大上午可以打大約4麻袋稻谷；依照1978—1979年收獲季通行的每麻袋2馬元的標準薪水，勞動者就可以至少收入8馬元。但是如果稻谷是濕的或不成熟并且水很深，那么整個上午時間只能打一兩麻袋稻谷。因此公開的抱怨將不可避免地出現，并且農場主明白需要進行調整。[[379]](#_379_14)這時他面臨著作出讓步的強大壓力，因為收獲和曬干莊稼過程中的任何拖延都必將造成損失。此外，如同收割時一樣，直接表達要求也是很少出現的，但農場主知道潛在的威脅。如果他做出或者許諾做出適當的調整——如同通常情形中那樣——工作就會在得到改善的氣氛中繼續。如果他不提高工資，就可能引發一場罷工。然而，和共享小組不同——她們作為一個集體罷工，打谷工人卻是作為個人停止工作的，盡管這會給那些堅持參加罷工的人帶來壓力。就此方面來說，1979年灌溉季的收割對于村中的打谷工人是一個非同一般的時機，因為大雨在緊要關頭造成大面積倒伏，并且收割的很大一部分不得不通過人工完成，否則就會顆粒無收。農場主們不顧一切地挽救他們的稻谷，而且打谷工人的兩起罷工幫助確立了最低限度每麻袋3馬元的工資。在每起罷工中，所有的打谷工都一致同意第二天早上不再回來工作，并且放出話來他們生病了或者被其他人叫去做更緊迫的工作了。他們的一致行動使他們免于農場主在隨后的季節不再雇用他們打谷的可能。兩個農場主都沒有試圖雇用其他的村民來干活，因為他們知道沒有人會來。[[380]](#_380_14)有人（扎哈魯丁）想到可以從他姻親的村子里重新雇用外人，但當他知道他們無法在三天內過來，而這三天他將在潮濕中損失掉大部分割倒的莊稼時，他馬上決定不這么做。打谷工人因而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時機堅持自己的權利要求。而他們和收割工人仍然繼續謹慎行事，只要可能就避免公開對峙和罷工，因為他們知道自己未來的收入依賴于他們自己和雇主之間保持一定的友善。在這些適當的限制之內，他們作為以工資為生的人仍然進行了保護自身利益的斗爭。[[381]](#_381_14)

強制的相互性

顯然，塞達卡所上演的即使是最節制的反抗形式，其效果也有賴于窮人之間一定程度的相互關系。階級團結首要的和最低限度的必備條件是一個消極的條件：窮人至少要避免彼此削弱而擴大其雇主和地主已經可觀的經濟權力。“否則”，如同馬克思所說，“他們就會像對手那樣彼此敵對”[[382]](#_382_14)，以彼此為代價換取生存。現存的相互性能夠在其他的共享小組或打谷工人拒絕充當村里的罷工破壞者時顯現出來。我們將看到，相互性還存在于最重要的租佃領域，在此領域中那些力圖得到土地的人們并不愿意損害他們的鄰居。基于這個約定俗成的自我約束，人們不會做出任何過分的權利要求，這些約束只在村莊自身的邊界內起作用，并且即使在此情境下其運作范圍也是很有限的[[383]](#_383_14)。然而，它的確預防了大多數發生在窮人之間的為有限機會而進行的有害的過度競爭。[[384]](#_384_14)

這種最低程度的團結，在這里和在別處一樣，不僅依賴于表面上對同伴的尊重，而且依賴于窮人所能達到的相互保持一致的道德約束。由于破壞秩序的誘惑對于那些長期以來很難保持收支平衡的階級成員總是具有吸引力的，這些約束必須是強有力的，足以避免窮人當中固有的霍布斯式的斗爭。已經達成一致的適度約束充分利用了社會約束力，諸如流言蜚語、人身攻擊以及公開回避等。對于貧窮的男人或女人來說，沒有比為低于普遍工資的工資額而工作、或者從事習慣上“屬于”他人的工作更遭人鄙視的做法了。那不僅僅是名聲的問題，因為冒犯者將發現他或她在勞動交換中會受到排斥，不會被納入共享小組，也不會被告知找到工作的可能性，不會得到窮人偶爾提供的零星的工作，也無法加入鄰里之間相互幫助的“信貸協會”。所有這些物質性約束力，分開來看相當微不足道，但總起來看卻代表著某些潛在的重大損失。正如我們即將看到的那樣，暴力威脅在這些社會約束力中并非完全不存在。因此，那些想破壞陣營的窮人必須認真權衡其短期收益和他的憤怒的鄰居能夠強加給他的損失。依據他們的意見和限制，窮人建立起一套習慣性禁令，標示出可接受的利己主義的限度。

通過考察那些想要成為佃農的人對土地的不斷追求所適用的價值觀，上述限度再好不過地呈現出來。因為有權使用土地對于窮人的福祉如此重要，他們處于持續的誘惑之下——同意出更高的租金而將土地從其他窮人家庭那里奪走。然而，對此種行為方式的約束使這種情況極少發生。我總是有機會就詢問較窮的村民，為什么沒有更多的人嘗試向有特權者出更高的價從當地佃農那兒租走土地。他們的回答表明了他們的一致性，他們說得很明白，那樣做是對其他佃農的冒犯。雅各布說，那樣的嘗試很少，因為那會違背當地的“社會輿論”。總是要找地租種的卡里姆說，他不會試圖出高價把地租走，因為那樣他會“在朋友面前感到尷尬”。“在我們的社會中，你不能那么做”，他補充說。蘇庫爾和雅米勒在解釋為什么這種行為很卑鄙時用了同樣的措辭：“你不能傷害你的朋友們。”當哈姆扎解釋為什么不能這么做時，他強調自己對于窮人中通行的禮節的感受：“我們的朋友們不會同意那么做；那樣爭來搶去是不合適的。”甚至比較富裕的村民也意識到這些規范的力量并且謹防破壞它們。因此，阿明談到引發價格戰的地主或者試圖通過這種做法取代另一佃農的窮人將“不會受到尊敬。我們都是朋友；我們都在一個村里；他會覺得問心有愧的”。

部分村民暗示，限制利己行為的約束力還不止于有關羞恥、名譽以及習慣性規則的內容。薩馬德說得很清楚，任何以這種方式失去土地的佃農都將“非常生氣并且可能做任何事情”。“瘦骨嶙峋的”瑪在談到被冒犯的佃農時更不隱晦：“你不能那么做，他會生氣，他會動刀子的。”

在這方面，羅吉婭和薩馬特的意見尤其值得一提，這倒不是因為他們在已經描述過的內容之上補充了許多，而是因為他們提供了一個清晰的例子，在這個例子中反對佃農間競爭的禁令被打破了。薩馬特解釋說窮人極少試圖出價高于當前的佃農，因為，如果他那么做，“就會受到譴責：（我們會說）咱們完了”。羅吉婭的觀點同樣有說服力：“那樣偷取別人土地的人會被人瞧不起”。事情發生時，羅吉婭有了按她的信條行動的機會。在1975年之前，羅吉婭和薩馬特從同一個外村地主那里租種了相鄰的兩塊稻田：4里郎租給羅吉婭，1里郎租給了薩馬特。憑借其岳母曾經擁有所有這些土地的事實，薩馬特在1975年閑季前去找地主，提出以高出租金20馬元的價格，說服地主把額外的1里郎地從羅吉婭那兒轉租給他。從那天起，羅吉婭家的人就不再和薩馬特家的任何人以及他的父親托·穆罕默德說話。盡管她以支持伊斯蘭教黨聞名，她和她家里的所有人都再不踏入薩馬特的小店一步，而這個小店被認為是伊斯蘭教黨的集會地。事實上，一些村民認為，她應該為薩馬特的小店受到其他人非正式的聯合抵制負有責任，這或許可以解釋我在那里逗留期間小店瀕于破產的原因，而羅吉婭并不承認這一點。[[385]](#_385_14)1980年羅吉婭的女兒出嫁，薩馬特和托·穆罕默德告訴我他們是村里唯一未被邀請的兩戶人家。羅吉婭宣稱，事實上她邀請了他們，但他們自己覺得過于尷尬而沒有出席。確定某一特定規范是否存在的一個可靠途徑就是觀察它被違背時會發生什么。在這個例子當中，涉及羅吉婭和薩馬特的事件從反面證明了規則的存在。[[386]](#_386_14)

為了回到這一規則來討論，必須說明它并未阻止佃農之間的某些競爭形式。因此，如果一個地主要將地租提高到他一向承租的佃農不愿續租的程度，那么在新的租約下是允許其他人承租的。對一個想要承租土地的人來說，為了土地而去接近地主，而他想取代的佃農既非鄉親又非親屬，這也是被允許的——但是不被贊許。同反抗聯合收割機一樣，相互性的約束力又一次在村落外部失敗了，其效用部分地被村莊外部的競爭破壞了。然而，在村莊里不被支持的是窮人主動并試圖通過提出更高的地租來“偷取”租佃權。[[387]](#_387_14)

窮人們強加于彼此的限制的實際效用是什么？就此而言，租佃市場依然是地方性事物，連同親屬關系的作用，它很可能略微阻礙了地主榨取最大可能地租的努力。事實上，許多有關穆達地區農業經濟的研究談及了地租水平通常略低于純經濟分析所預言的水平，即使對非親屬關系的租佃也是如此。盡管區別不大，但它至少可部分歸因于窮人努力開創的程度較低的地方性相互依存。當涉及插秧、收割、打谷，或者這類工作的雇傭量的工資率時，這種相互性的影響可能并不顯著，因為勞動力市場相對于租佃市場更加地方化。相互關系的地方主義因而是這一領域中更為嚴重的障礙。盡管如此，以微小然而意味深長的方式，窮人之間的相互性代表了一種日常反抗的形式，它阻止或至少延緩了農村生產關系完全“理性化”的最壞的結果。

自助以及/或者強制

迄今為止我一直試圖研究集體行動——以及窮人為防止“狗咬狗式的”競爭而加諸地主和雇主以及他們自身的“約束力”。然而，更為隱蔽和更加個人化的反抗領域是存在的；它包括種類繁多的偷竊和殺害牲畜的行為。研究這一領域必然是一件棘手的事情，因為絕大多數參與者的沉默與就研究者而言可理解的規避危險的要求混合在一起。在沒有積極尋求這方面事實的情況下，兩年來的閑談依然可以浮現這類事實的某種模式，它表明此類行動與階級關系和反抗是有關聯的。

鄉下的偷竊行為很平常；它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幾乎都是農業生活的持久特點，并且國家及其代理人也無力控制。然而，當此類行為表現出對財產權的質疑斗爭的特點時，它卻成為所有認真分析階級關系的關鍵因素。英國部分地區的案例就很典型，至少在過去兩個世紀當中，偷獵在這些地區是再普遍不過的——并且是非常流行的——犯罪行為。在法國，左拉毫不夸大地宣稱“每個農民的內心里都藏著一個偷獵者”。[[388]](#_388_14)在此偷獵的政治和階級意涵極其明顯，因為農民從未完全承認過那些宣稱對森林、河流、“荒地”以及先前屬于社區共同財產的公共牧場擁有所有權的人的財產權。偷獵并不僅僅是一種必需的生存選擇，而且還是被視做自然權利的實現。[[389]](#_389_14)

與今天相比，1950年以前吉打州的偷竊行為要普遍得多。塞達卡上年紀的村民仍能回憶起那個并不久遠的年代，那時偷盜水牛的事件那么普遍，以致每個男人睡覺時都在手腕上系一根繩子，這根繩子沿著地板拴到水牛鼻子下面來提醒他防止偷牛賊靠近。他們還能記起最著名的鄉間盜賊的姓名和行為，比如阿旺·坡、沙勒·圖伊和納揚，他們劫富濟貧，贏得了“社會強盜”的名聲。那個時候，村落比較小而且很分散，叢林和森林還沒有被清除。吉打地區的這種邊疆性質、鄉下警察部門的弱小，以及農民的貧困和流動狀態，都為搶劫和偷竊行為提供了便利環境。

今天，為任何懷抱野心的搶劫行為提供有利條件的地形和逃離追擊的便利都不存在了。塞達卡周圍的所有土地都很平坦并被開墾出來，而且凱帕拉·巴斯塔鎮和燕鎮的警察數量更多，機動能力強且武裝精良。針對一兩個特大地主的階級挑釁行為也不復存在，這些地主實際上壟斷了所有土地，面對的是同樣貧窮并團結起來的農民。人們發現，塞達卡現在的偷竊類型反映出這樣一些情況：它在黑暗的掩護下匿名進行；它看上去是個人的行動，或者至多是兩人配合進行；它僅被警察記錄為“小偷小摸”。

各種各樣的東西在塞達卡經常丟失。水果經常性地從富裕農場主的房屋周圍和樹上消失，幾乎沒人能夠指望收獲超過一半產量的芒果、木瓜、掉到地上的椰子或者香蕉。由于棕櫚樹的葉子能編織席子、籃子或用來做傳統的屋頂，那些擁有棕櫚樹的人經常抱怨葉子總是消失不見。飼養雞、鴨子或者鵝等小家畜的人不斷地抱怨蛋和家禽經常被偷。在干旱季節，當飲用水偶爾要由政府的水罐車運來時，村民必須把他們的塑料或金屬水罐放在主路邊以便獲得不定期送來的飲用水；這些通常大約值5馬元的容器經常被偷走。在略大一些的范圍內，不時也會有自行車、水牛甚至摩托車被偷竊（在過去兩年中發生過三起）。

這些或大或小的偷竊行為具有一種銘刻在村莊社會結構中的模式。可能除了自行車之外，偷竊的目標是塞達卡較為富有的居民。相對較富有的人才最有可能擁有周圍有果樹和棕櫚樹的大房子，他們有為數最多的裝水容器，他們飼養小家畜，并且最有可能擁有水牛或摩托車。看到這一事實，上述目標也就毫不令人驚訝了。人們通常承認，犯罪者應該到塞達卡較貧窮的居民當中找尋。這一模式本身并不能證明此類偷竊行為被窮人視做一種反抗手段或某種形式的“社會搶劫”。在這一范圍內證據無從獲得。然而，有意義的是，偷竊行為的階級特征已成為塞達卡現行的財產關系的組成部分。一般說來，富人擁有值得被拿走的東西，而窮人有最強的動機拿走它。這使人們想起一個美國銀行劫匪的答復——當問他為什么要搶劫銀行時，“狡猾的”威利·薩頓回答說：“因為里邊有錢。”

除了水牛和摩托車的失蹤之外，我們所遇到的其他類型的偷竊也讓家境較好的村民嘆息不止，但它們更多地是一種煩擾，而不是一種嚴重威脅。這類偷竊集中在這一單一作物經濟的主要產品——水稻——上面。對一個想要成為盜賊的人來說，偷竊水稻的好處不言而喻。一切都對他有利，很容易少量拿走，并且一旦拿走，幾乎無從尋找。

一個季偷走的水稻數量即使不占收獲總量的很大部分，也足以讓大農場主們警醒。此外，他們確信這一數量還在增長。當然，并無可供利用的確切的統計數字，但我努力將1979—1980年主產季里人們告訴我的所有丟失了的稻谷總量記錄了下來。到目前為止最大的偷竊行為是拿走收獲季留在稻田里過夜的整麻袋的脫粒后的稻谷。這些都在附表中列出。

1979—1980年主季節中報告的被偷竊的稻谷袋數



在這一總量之上還必須加上通過其他方式被偷走的稻谷。至少有4麻袋晾曬在席子上的稻谷不見了，其中有2麻袋是從阿布·哈桑那里拿走的。哈吉·加法爾和卡米勒每人丟了1袋，這些稻子都是儲藏在他們各自家里的。據報告，約有同樣數量的稻谷在收獲季被從谷倉里偷走。[[390]](#_390_14)還有少量稻子據報告從田里的稻稈上就被偷了，很難判斷具體數量，但數目不大；村民指出，打谷的聲音和稻草的處理是偷竊的一個難題，富人們說，實際上小偷太過懶惰，不會親自動手打谷。[[391]](#_391_14)最后，對水稻偷竊行為的全面清算將不得不包括那些打谷人在一天工作結束時塞滿衣兜和裝滿襯衫的稻谷的估算量。對此類偷竊行為絕大多數農場主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我也沒有試圖計算過有多少稻谷通過這種方式被偷走。

有必要關注關于偷竊模式的某些事實。首先，除了薩馬特和法齊勒這兩個只是稍稍富有的人，所有受害人都屬于塞達卡最富有的1/3家庭。這或許僅僅表明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此類家庭可能在收獲時節留在地里的稻谷最多，而那些小土地所有者由于無法負擔損失而想方設法將打下的稻子迅速運到家中。大農場主的農田都離家很遠，因而無法在一天當中脫粒（并且存儲）完畢，這使得他們尤其易于被偷，這當然是千真萬確的。但是早先的觀察在此又一次適用；偷竊模式是財富分配的典型后果——在此情形中是由農場規模表現的。毋庸置疑，窮人，而且是當地的窮人，應該為絕大多數的稻谷失竊負責。

稻谷失竊的總量可能是20到25麻袋，少于村里所有農場主一個季中收獲稻谷的1%。根據這個估算，損失量并不大，并且大部分由那些生產出大量剩余的人承擔。[[392]](#_392_14)然而，如果我們依據它可能增加村里最貧窮的幾戶人家的食品補給量來估算其重要性的話，它將變得相當重要。值得注意的是，這20到25袋稻谷多于收割之后農場主自愿捐出作為扎卡特禮物的稻谷量的一半。我兩次聽到窮人微笑著將稻谷失竊稱為“人們據為己有的扎卡特禮物”，因而進行這樣的比較頗為恰當。這一證據當然不是無可置疑的，但是很可能窮人無論如何不認為這樣的行為是偷竊，而是當做他們依據早先的習俗認為理應據為己有的東西——某種強制性的濟貧稅來代替他們不再收到的禮物和工資。在這一聯系中，另外兩項間接證據是有相關性的。在丟失了稻谷的農場主當中，只有一個（薩馬特）是屬于受到窮人稱贊的拒絕使用聯合收割機的農場主。其他人則是只要可能就使用機器。還有一些跡象表明，稻谷偷竊行為被一些忿忿不平的勞動者用做一種制裁。蘇庫爾曾經就此告訴我，農場主們小心翼翼地雇用他們通常邀請的打谷工，因為任何被忽略的人都可能出于憤怒而偷竊地里的稻子。事實上，如果稻谷失竊具有某種普遍的正義要素，此種反抗的范圍由于聯合收割機的使用而在相當程度上被縮小了，它使得在一天之內收割并且儲存（或者出售）一個農場主的全部莊稼成為可能。聯合收割機因此不僅排除了人工收割、人工打谷、田間運輸以及拾穗，它們還消滅了偷竊行為。

富裕農場主對此類偷竊行為的態度如同人們猜測的那樣，是憤怒與恐懼的結合。比如說，哈吉·卡迪爾由于失竊而憤怒至極，以致考慮要在第二天晚上帶著獵槍守候在田里保護稻谷[[393]](#_393_14)。因為推斷自己在地里埋伏等待的傳言已經足以嚇退任何盜賊，他并沒有實施這個計劃。在此，我們能夠感覺到富人的恐懼，部分原因在于，塞達卡并沒有就稻谷失竊報過警[[394]](#_394_14)。富有的農場主向我解釋說，如果他們報告并且指定了嫌疑人，消息很快會傳開，他們擔心因此會成為更多盜竊行為的目標。事實上，哈吉·卡迪爾曾經發現有人夜里從鄰居的地里偷了一麻袋，他不僅沒有插手阻止盜竊，甚至沒有通知他的鄰居，盡管他非常確定竊賊的身份。當我問他為什么這么做時，他回答說盜賊也看到了他，會知道他就是告密者，接著就會偷他的稻子。曾經有一季，瑪·薩里夫丟了2麻袋，但他告訴我不想知道是誰干的。他補充說，自己上了年紀身體又弱“，我擔心被人殺死”。對一小撮更膽大的窮人來說，看一起來個有關恐懼的小平衡形成了，因而允許這種有限度的偷竊行為繼續下去。[[395]](#_395_14)

然而，還有一種更微妙的指認嫌疑人的方式，這實際上是“讓人知道”的傳統方式。它由咨詢一位在當地以尋找丟失財產和確認盜賊聞名的巫醫構成。[[396]](#_396_14)在獲知細節后，巫醫將使用咒語并且施用魔法使竊賊的面容在特別為此種場合準備的水中現形。毫不令人吃驚的是，由此現出的面容總是委托人一直在懷疑的那一位。在失竊水稻的案例中，目的與其說是為了找回稻谷，不如說是為了確定竊賊。農場主返回村子以后將會告訴他的朋友，巫醫所看見的像是某某人。如此，無需直接指控，更不用報告給警察，消息就會傳開并且被懷疑的盜賊就會知道他被看見了。因此，哈吉·卡迪爾說，這次巫醫在水中看見了塔伊布和另一個身份不明的人。如果塔伊布事實上真是嫌疑犯，哈吉·卡迪爾希望這個迂回的指控能從那一刻開始阻止隨后的偷竊。然而，村民回憶說，至少有兩次，部分或者全部丟失的稻谷在請教了巫醫之后又奇跡般地失而復得了。這種為少數農場主采取的求助于巫醫的謹慎做法再度表明，公開對抗被認為是危險的。

村里較大的農場主認為他們知道誰應該為大多數的偷竊而受到譴責。三個名字最經常地被提及，而且總是采用秘密暗示的審慎方式：他們是塔伊布、米頓和杜拉。其中最后一位是村里唯一的“被證明的”盜賊，他因為偷竊離雙溪布浙村不遠的一戶人家的稻谷而在監獄里渡過了兩個月。五六年前，似乎是他從一個農場主屋子的下面偷了兩麻袋稻谷，并且正要返回去偷第三袋時，那個農場主去向鄰居求助并把他當場抓獲。在這一事件中，警察被叫來而且杜拉被證明有罪。其他的兩個人都未曾被當場抓獲但他們都知道自己被別人懷疑。拉扎克本人一度也曾處于同樣境地，但是由于他身體很差，村民認為他不再有能力從田里搬走整袋的稻谷。如同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在富人看來，所有這四人都是“不”“爭氣的、聲名狼藉的”窮人的“典型”代表。就社會和經濟限制而言，他們為自己的惡名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沒有人愿意租給他們土地；他們極少被邀請參加筵席，他們也很少被雇用，從來得不到貸款，并且總是被拒絕給予任何扎卡特禮物。當然，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如果富人的懷疑是正確的，這些竊賊看來正在秘密地享用他們被公開拒絕的扎卡特禮物[[397]](#_397_14)。

在塞達卡，還有可被稱做秘密和匿名反抗的最后一個形式。這表現為窮人宰殺小家畜，偶爾宰殺大牲畜。村里絕大多數的雞、鴨、鵝、山羊、水牛和三頭菜牛構成的畜類都為富裕家戶所擁有。它們在許多方面都給窮人帶來了麻煩。盡管有柵欄和圈雞的網線關住它們，它們還是經常進入秧田、稻地和窮人的小菜園里覓食，造成了相當的破壞。當然，窮人并不是唯一被騷擾的人（迄今為止家畜本身并無階級忠誠），但最為憤怒。他們的怒氣并不僅僅來自于他們最經受不起損失這一事實，還來自可以被稱為“飲食的道義經濟”的內容。這可以從哈姆扎的對于隔壁哈吉·卡迪爾家的雞的抱怨中看到。哈姆扎發現這些雞經常從廚房里存放稻谷的口袋上的小洞里啄食稻米。正像哈姆扎所說，“他的肉在吃我的米”。一旦我們回想起哈姆扎家和其他許多窮人家庭只有在被邀參加筵席時才能吃到肉，這里的不公正就顯而易見。警告一兩次之后，窮人會訴諸于宰殺這些動物，就像時常發生的那樣。動物被宰殺而不是被偷走這一事實可以表明，這是一種抗議而不是偷竊。[[398]](#_398_14)哈吉·卡迪爾的兩只山羊沖破了羅吉婭位于屋后河道堤岸上小菜園周圍的籬笆，并且吃掉了除西瓜之外的所有蔬菜。她的憤怒的表達與哈姆扎如出一“轍：帕克·哈吉的肉吃掉了我的蔬菜。”每年都有一兩只山羊和相當多的雞（很少是鴨子和鵝）被打傷或者打死。[[399]](#_399_14)6年前，有人發現托·隆格的水牛受到一把帕蘭刀的猛砍并在扯斷繩索后死在一個窮人的稻田里。“兇手”沒有被發現，但是，這頭水牛因為四處亂跑并且踩踏成熟的水稻而聲名狼藉。較長的干旱的農閑季中，家畜們可以在收割后的稻茬中閑逛而不用擔心造成破壞，但雙耕使得這一季不復存在，事情在此情境下變得更糟。比較經常的宰殺家畜的行為就像偷竊莊稼一樣，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幾乎不會觸動財產關系和權力的整體結構。但是，這些為數甚少的、相對安全的象征性的反抗行動是對窮人開放的，是他們保護現有生存方式的反抗形式。[[400]](#_400_14)

原型反抗

我對窮人可以利用的反抗形式的關注，并沒有考慮那些同當地階級關系相關甚少或者無直接關系的大量的沖突和策略。因此，舉例來說，我并未涉及許多有關用水權的糾紛，或通過移動界標來侵蝕土地，或者在損害鄰居的情況下逐漸移動一家的地界以增加另外一家的田壟等等做法。我也沒有分析作為整體的村民對伊斯蘭教十一稅或者對影響了所有水稻種植者的政府政策的反抗。富人的反抗本身就可成為充滿書卷文獻的探索研究。我已經描述了這類反抗與工資、雇傭和租佃權有關的那些方面，同時這些反抗還采取了許多其他有利于他們對地方制度和地方經濟的支配地位的形式[[401]](#_401_14)。盡管它將賦予這類反抗更重大的意義，即它對于全面解釋塞達卡的社會關系是不可缺少的，但它對于我的主要研究對象而言仍然是邊緣性的。

我所研究的窮人的多種反抗形式有著顯然不同的標志。無論是抵制機器收割、工資談判、防止窮人之間破壞性的競爭、偷竊等事件，還是宰殺家畜，階級之間公開對抗的相對缺乏這一特點都非常顯著。在發生集體反抗的地方，它們都是謹慎地進行的；在個人或小群體侵襲財物的反抗中，大多是匿名的或是在夜間進行的[[402]](#_402_14)。通過審慎的計劃和保守秘密，在很大程度上，它成為主導塞達卡公共生活的權力的舞臺劇。任何襲擊舞臺的企圖都被拒絕，并且選擇總是有意識地保持公開。盡管很少畏縮不前，順從和遵循仍然是窮人的公開姿態。然而，對于所有這些，人們能夠在后臺清楚地進行持續的有限度的試驗。至少，人們可以說這里有著比簡單的同意、順從和遵循更多的東西。

塞達卡的反抗事實上并沒有人們在鄉村沖突的典型歷史上所期望的發現。這里沒有暴動，沒有示威，沒有縱火，沒有有組織的社會搶劫，沒有公開的暴力。我所發現的反抗同任何更大的外部政治運動、意識形態或者革命骨干都沒有關系，盡管這一地區每個村子事實上同樣的斗爭一直都在發生。這里發現的行動種類幾乎不需要協同，更不必說政治組織，盡管它們可能從中獲益。簡而言之，它們都是村莊范圍內完全本土的斗爭形式。倘若我們非常謹慎地使用這一術語，這些行動或許可以被適當地稱做原始的反抗。使用原始一詞并非像霍布斯鮑姆認為的那樣，意味著這些行動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倒退，并且注定會讓位于復雜的意識形態和斗爭策略。[[403]](#_403_14)它只是意味著此類反抗形式幾乎是永恒的、持續不斷的、在極為困難的條件下鄉村從屬階級的日常策略。在危機或重大政治變遷的時代，它們或許可以為其他更為適宜的斗爭形式所補充。然而，只要鄉村的社會結構還是剝削性的和不公正的，它們就不可能完全消失。它們是堅固的基礎，其他形式的反抗可以生長其上，并且，它們可能在其他形式的反抗失敗后或者轉而產生新的不公正模式后，依然持續下去。

## “常規的”鎮壓

正如塞達卡的反抗形式是“常規的”，鎮壓形式也是如此。人們徒勞地尋找在東南亞其他地方大多存在的過度的高壓統治：大規模拘留、清洗、軍事管制，以及容許綁架和殺戮的準軍事組織。馬來的農民階級與印度尼西亞的農民階級不同，他們并未承受迫使他們全然沉默的近期大屠殺所帶來的恐怖記憶。[[404]](#_404_14)取代這些大范圍的野蠻行為和病態恐懼的，是日常的鎮壓所帶來的穩固壓力，這些日常的壓制由偶爾的逮捕、警告、勤奮的警務工作、合法約束和有關不確定的預防性拘留以及禁止多項政治活動的國內安全法案構成。

準確地判斷此類鎮壓在限制我們迄今所觀察到的反抗形式中的作用如何，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如果鎮壓程度減輕或者完全消失，追根溯源地判斷其影響如何就是可能的。同樣，如果反抗的替代形式——例如在城市打短工——突然消失不見了，那么，則可能測量出現有的鎮壓水平是否足以制約處境更為艱難的農民階級。在缺少此類天然實驗的情況下，任何判斷都只能是推測性的。然而，我們可以表明的是，在許多村民心中都存在著恐懼的因素，并且它構建了他們關于可能的選擇的見解。

恫嚇的氣氛尤其感染了那些緊密認同反對黨伊斯蘭教黨的村民，但是并不局限于此。1978年選舉后不久，所有的伊斯蘭教黨分子被系統地從州里各個村委會中清除了。這一步驟不僅為避免所有的伊斯蘭教黨分子得到政府的好處創造了條件，而且自此表明反對派在村莊政治中不再擁有合法地位。1979年年中，吉打州的宗教事務辦公室采取進一步措施，禁止包括來自燕鎮附近的烏斯塔茲·帕夫茲在內的至少8位著名的伊斯蘭教黨宗教導師在該州任何清真寺或者村莊里的伊斯蘭學校布道。在這樣一種普遍氣氛中，1978年至1980年間該地區許多伊斯蘭教黨的會議只能秘密舉行。由于巴希爾和其他巫統領導人的反復無常，塞達卡的反對派成員親身經歷了這種不時有可能被捕的普遍威脅氣氛。因而一位堅定的伊斯蘭教黨成員尼扎姆解釋說，他從不去巴希爾的店里買東西，因為擔心巴希爾說他偷東西并讓人把他抓起來。他和其他用摩托車運稻谷的伊斯蘭教黨成員總是擔心巴希爾會安排警察在路上攔住他們，并以未交公路稅和保險費的名義罰他們的款。沙赫儂說他在政治上保持“沉默”，因為只要村委會愿意就可以讓伊斯蘭教黨的任何成員被逮捕，并且警察會聽村委會的而不是伊斯蘭教黨農場主的話。如果有人在伊斯蘭學校的村莊改進計劃標志牌上涂鴉，警察就會在第二天早上被叫來并且質詢幾個伊斯蘭教黨成員。雖然沒有人被逮捕，但是警察的造訪正好起到了村委會所希望的冷卻效應。如前所述，托·穆罕默德因為懼怕警察而不敢告訴我他所知道的關于毀壞機器的情況。在塞達卡對于村委會和警察的特別恐懼必然增加了普遍存在的猜疑，甚至對政府發動的看起來最不得罪人的行動也是如此。1980年2月，當情報部門的一個小官員來到村里為即將到來的十年一度的人口普查做準備時，這一點就顯而易見了。他的講話大多用來責備村民過去的一些錯誤反應及徒勞地打消他們的疑慮，他試圖讓人們相信，人口普查和稅收毫無關系因而他們不應該擔心或者逃走。由此可知，典型的農民對于國家的不信任強化了疑懼的氣氛，更不必說某種特定的恐懼了。

政府對1980年1月23日在亞羅士打州首府舉行的大規模示威的反應提供了一個可容許反抗限度的實際的教訓。我們不需要在抗議的起源和細節上糾纏太久，因為這個簡要描述的目的在于強調事件的后果所引發的恐懼。激發起示威的表面事端是要求提高稻谷的農場交貸價格，并且反對最近出臺的降低稻谷價格的計劃，這一計劃將從每pikful稻谷的價格中截取2馬元，留給銷售商。盡管被迫存儲將產生利潤（不是“利息”，這是被禁止的），并且能夠在六個月之后兌換回來，這個計劃仍然普遍地不受歡迎。顯然對許多人來說，生產價格因此被降低2馬元，而且將稻谷賣給華裔中間商的大多數生產者能否重新得到“儲蓄”尚不清楚[[405]](#_405_14)。吉打州的首席行政長官曾在競選中提出提高稻谷價格的承諾，巫統領導的農場主聯合會自身也反對降低稻谷價格的事實又給上述不滿增加了一定的合理性。無論如何，1月23日約有一萬人聚集在州政府辦公大樓門口抗議降低稻谷價格，并要求稻谷價格上漲10馬元。[[406]](#_406_14)當首席行政長官最終出現時，他的聲音被人們的喊叫聲壓倒，而警察和防暴部隊沖進去驅散并逮捕了示威者，一些人徒勞地穿過大街逃進了清真寺。據說，這是至少自1954年以來吉打地區的稻谷種植者舉行的規模最大的一次示威，當時成千上萬的農場主在災難性的一季之后為爭取到政府救濟而進行示威。

當場有超過90人被逮捕并拘留。首席行政長官當即宣布，示威是“由某些好戰派團伙挑起的”[[407]](#_407_14)，并且以不祥的口氣談到布爾什維克、法國以及伊朗革命都“利用了”農民[[408]](#_408_14)。示威過后的幾星期之內，更多的人被逮捕并被起訴。吉打州包括一個州議員在內的7個伊斯蘭教黨官員被逮捕和拘留。300名特別警官進駐吉打州以協助調查。首席行政長官指責“伊斯蘭教黨制造恐怖和恐懼的策略，并且吉打州的伊斯蘭教黨全體領導必須為……組織這次示威負責”[[409]](#_409_14)。一個同伊斯蘭教黨有著相同的首字母縮寫（Pertubuhan Angkatan Sabilullah, PAS）并暗示一場“圣戰”的隱蔽的地下組織，被確定為陰謀的中心。

政治圍捕的影響馬上就在塞達卡被感覺到了。由于附近村莊的人受到懷疑，消息迅速傳開。鄰近凱帕拉·巴斯塔的3個人和1個來自雙溪布浙村的人被指認、受到質疑，之后被保釋出獄。來自明關村、古阿·貞布達鎮、爪哇村以及彭當村和布基拉雅地區的著名伊斯蘭教黨成員，也遭受了同樣的命運。[[410]](#_410_14)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并未參與示威。隨著持續逮捕的消息滾滾而來，一種不難理解的恐懼開始緊緊扼住當地的伊斯蘭教黨成員，他們當中有3人的確趕去參與了示威。塔伊布是伊斯蘭教黨成員，他將政府的反應解釋為一個“將我們粉碎”的嘗試，還說他想找個鐮刀保護自己[[411]](#_411_12)。另一個伊斯蘭教黨成員蘇庫爾則提到村里的“奸細”，他們可能叫來警察和做出虛假的指控。“即使你沒偷他們也會說你偷了；他們什么事都做得出來，這是暴政。”實際上，塞達卡并沒有人被拘留或者被逮捕。但來自特別部門的警察兩次同巴希爾和村長哈吉·加法爾談話。他們的造訪產生了預期的效果，我懷疑他們在稻米平原也造訪了另外無數個村子。許多伊斯蘭教黨成員知道，巴希爾或村委會的一句話就可能招致逮捕，他們擔心自己成為犧牲品。正如穆斯塔法所說，“我們當然擔心；他們想壓垮伊斯蘭教黨”。

如果不考慮這一更大范圍的真實的和預期的高壓統治情境，就無法理解我們在塞達卡所發現的反抗的類型與順從的類型。常規性鎮壓毫不顯眼地發揮自己的作用：這里是一次逮捕，那里是特別部門的造訪，村委會領導的間接警告等等都是制造邊界標志的正常需要，而這些標志任何機警的農民都不會蓄意破壞。然而，可容許異議的相當穩定的邊界的存在使之成為一個令人畏懼而并非恐怖的環境，這里不存在安全的邊緣地帶。至少有一點是清楚的，這些被創造、被改變、偶爾也被歷史經驗所強化的邊界，作用在于抑制某些公開的抗議和挑釁形式。那些從雙耕中獲益最少的人們有各種理由相信“預料中的反應法則”，并且避免使自己陷于危險境地。正如他們所說，“不管你是不是抱怨都不會有什么結果”，他們不僅談到大農場主的地方經濟勢力，還談到國家及其地方代理人的強制性權力。這里順從的含義“不是本土的文化產物，而是非精英在其中發現自身的權力情境的產物”[[412]](#_412_12)。

正是在這一對反抗的更大制約的背景下，“經濟關系的無聲壓力”的相對效用才能夠被理解。富裕農場主依然能夠隨意提供或者收回稻田里的薪資工作、扎卡特禮物，政府援助（如就業、貸款、補助）、移民計劃的建議、學齡兒童的救助、貸款、短期信貸（比如在巴希爾的商店），并在危機時充任信用擔保人。[[413]](#_413_12)難怪，一些貧窮家庭不希望公開冒犯那些控制這些戰略資源的人。但是，這種潛在地屬于選擇性的“善行”不可避免地同惡意相連。支付合理地租的佃農有可能被提高租金或者解除其租佃權；女兒在學校救助名單上的貧窮家庭可能被從名單上除名；被雇為臨時勞動力的人可能被別人取代；被容忍的“好惹是生非”的窮人可能被指控為盜賊。富有農場主偶爾的善心因此與防衛性的欺騙并無太大不同。并且，就其作用的程度來說，它起作用完全是因為鄉村階級關系的更大的壓迫情境幾乎將可能在實質上改變窮人處境的直接反抗的種類都排除在外。也就是說，強制性情境創造并維持了相對無權的情境，其中“經濟關系的無聲壓力”因而能夠榨取其日常的捐稅。[[414]](#_414_12)

## 常規的順從與不留痕跡的反抗

塞達卡富裕農場主的經濟和政治權力需要那些謹慎的貧窮男女們某種最低限度地公開順從。對于那些現在經常去別處找工作和幾乎不依靠村內幫助或工資的人來說，這樣的順從可以微不足道。但是對那些生計更為確定無疑地倚靠村莊經濟的人而言，順從的壓力則無所不在。這樣的男人和女人有足夠的理由使自己符合“高尚窮人”的老套印象，以謀取這個名聲可能帶來的好處。因而，發現這一農業體系所能榨取的象征“稅”的地方，就在那些最貼近上述形象的人中間。即使我們在此發現常規的遵從和順從或許不是一味的犬儒主義，但無疑是精于算計的。

我們有機會聽到帕克·亞赫和朋友們在一起時關于巫統領導（“他們想瞞著我們”）和有關村里富人的態度（“他們認為，沒錢的人讓人看不起”）的見解。但帕克·亞赫并不總是處在可靠的同伴中間。他設法找到的薪資勞動大都來自巴希爾，就是那些“想瞞著我們”的人的頭領。就他和巴希爾的關系而言，他是恭順的工人的典范：可靠、從不對工資提出疑議、從不拒絕任何工作。即使正在由于未能獲得村莊改進計劃的補助而怒火中燒時，他也不敢參與聯合抵制巴希爾女兒的婚禮，盡管他只是短暫地露了一面。他的生存狀況需要一種公開的態度，而這并不一定與他的私人觀點一致。

另外一個“好名聲的”窮人哈姆扎的公開行為就更加微妙。他經常性地為哈吉·卡迪爾和巴希爾工作，盡管他們二人是政治對頭。或許由于我是他隔壁的鄰居，我和他非常熟悉，他并無戒備地向我坦言他為何不像絕大多數伊斯蘭教黨成員一樣，而是通過巴希爾和村委會接受村莊改進計劃的援助。他說受到優待是因為自己窮，因為他給巴希爾工作并且從無怨言，因為他照看伊斯蘭學校，還因為他并不“在意”政治派別。他還補充說，他從村中兩個店里買東西，并且只要被邀請就會參加所有人的筵席。哈姆扎接著還描述了他的策略和謹慎給他帶來的好處。上一個齋月之前他生了病，沒辦法去工作，他仍得到了一些大米，而他的兄弟拉扎克得到的施舍要比其他人少得多；他得到巴希爾店鋪賒賬的最高限額60馬元；當其他人找不到工作時他仍能得到稀缺的工作；并且他近來生病在家期間，很多村民順路探望并且愿意提供幫助。聽他的講述人們可以得到一個印象，如同在聽一個會計主動地歷數合計一個財政年度投資于遵從和取悅他人所得到的收益。他了解巴希爾和其他人知道他傾向于伊斯蘭教黨，但他補充說，他并不是一個積極的伊斯蘭教黨成員，因為“如果我是一個堅定的伊斯蘭教黨分子，巫統的人就不會雇我了”。哈姆扎的做法是為了讓自己和家人安全度過不可避免的經濟危機而精心設計的走鋼絲般的微妙平衡。這并不意味著他沒有經歷過生氣和憤怒，而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小心翼翼地加以控制。在這里值得再次回顧的是，當我問他把從機器里出來的稻谷裝入麻袋時哈吉·卡迪爾給的報酬過低，他是否抱怨的時候，他不得不說：“窮人不能抱怨；如果我生病了或需要工作，我不得不再次去求他”，“我在心里很生氣”。這里并沒有虛假意識，只有窮人必須的日常姿態。哈姆扎毫無困難地意識到他什么時候受到剝削或者被不公平地對待；在一定意義上，他的努力和成就抑制了他的憤怒以免危及到他的生計。[[415]](#_415_12)人們可以要求哈姆扎式的順從，它早在18世紀英格蘭鄉下的窮人那里就被要求過了：

順從通常并沒有絲毫的幻想色彩；從下層來看它是自我保存的必須部分，是所有可榨取的東西中經過算計的榨取部分。由此來看，窮人向富人要求的某些義務和家長式職能與富人反過來向他們要求的順從是一樣的。[[416]](#_416_12)

窮人的需求可能還促使他們積極討好富有農場主。因此，當哈姆扎生病而無法再給哈吉·卡迪爾工作時，塔伊布夜里開始經常出現在哈吉·卡迪爾家，陪他聊天。當我隨意問及沙赫儂為何以前從未前來的塔伊布總是來順路拜訪時，他解釋說塔伊布是來“搭訕”并奉承哈吉·卡迪爾的，希望能得到那份工作。他的策略奏效了，對于塔伊布來說，那需要相當的意志力，我在其他情境中聽到過他對哈吉·卡迪爾完全不同的評價[[417]](#_417_12)。

自我保護性順從的要素在許多貧窮村民結黨的選擇上最為直觀。曼蘇爾也是一個“好”窮人，就像他經常為之工作的沙姆蘇爾一樣，他也是一個巫統成員。當曼蘇爾解釋為什么他作為村里相對的新來者加入巫統時，他毫不掩飾對可能得到的好處的簡單算計：

我謹記自己是個窮人。我這么打算：如果加入巫統，我就能從一個富人那兒得到工作。我可以給他干活拿工資。如果我加入窮人這一派，他們沒辦法讓我有活兒干。我得關心我自己的家。為此我對每個人都表示友好。

人們幾乎想不到黨派選擇背后還有什么比這更不帶情感的原因；如果獲利的邏輯反過來，轉換派系也是同樣的道理。

近來的兩次政治“轉變”將有助于說明巫統成員資格背后的算計。朱基夫里來自另一個村子的一個堅定的伊斯蘭教黨家庭，但在1979年，他決定轉而皈依巫統。當我問他為何轉變時，他回答說“在巫統稍好一些；這里有發展”，此處他指的是政府補助。他補充說，“伊斯蘭教黨”，“什么事都干不了”。就他而言，他從村莊改進計劃中得到一小筆款子（200馬元），而他住在隔壁的還留在伊斯蘭教黨的兄弟巴克利則一無所獲。卡里姆是近來的又一個“背叛者”。他對我解釋說如果留在伊斯蘭教黨，“就很難申請援助”，并且“很難去見小學校長”（為了一項給孩子們的學校基金的特殊補助）。他說，離開伊斯蘭教黨，是因為那里“沒有服務”而巫統則提供“很多服務”。然而，卡里姆可能在玩一個雙重游戲，因為蘇庫爾和哈吉·卡迪爾宣稱，卡里姆還是投票給伊斯蘭教黨，盡管他付了巫統的會費。哈吉·卡迪爾總結說，“他很聰明”，“他真正地跟隨我們”。不管這件事是否清楚，卡里姆也不準備澄清事實，但可以肯定的是，窮人尤其可能為了獲得執政黨一方名義上的成員資格所帶來的好處而希望偽裝其所屬黨派的身份，這一點對于塞達卡任何人來說都很有道理。羅吉婭和哈姆扎為了自己獲益已經那樣做了。

當普通的巫統成員說他們只是想站在“大多數一邊”或者他們想通過加入巫統“得到一點好處”時，起作用的是非常相似的權力與利益邏輯。相當多的人暗示最安全的做法是和執政黨站在一邊，這是一個結合了對好處的許諾和一定恐懼因素的推理。因此，阿布杜爾·拉赫曼說：“我每天都覺察到（誰擁有）權力，我處在邦主（Raja）的控制之下。”他以此來解釋他的巫統成員資格。至多有六七個村民，他們大多數是村委會成員，甚至不耐煩為站在巫統一邊提供任何熱心公益的理由。

在塞達卡，順從、遵循和政治服從的壓力對所有相關的人都是顯而易見和不證自明的。考慮到順從的回報，許多村民選擇做“好名聲窮人”的典型也就不足為奇了。或許更令人吃驚的倒是還有那么多人堅持自己的冷漠和疏遠，留在伊斯蘭教黨，極少去討好村委會或富裕農場主，并且在一些情境下成為“聲名狼藉的”窮人的典型。然而，即使對那些順從的人來說，順從也是在算計和無任何幻想的意義上成為常規的。

在這方面，在常規的順從和常規的反抗之間有一個引人注目的類比。如果常規的順從是在算計村莊的權力格局和回報的眼光下做出的，那么常規的反抗也是一樣。如果常規的順從規避了不必要的風險，那么常規的反抗也是如此。我們在塞達卡遇到的幾乎所有的反抗都是那種相當有效地“掩蓋其蹤跡”的反抗。在村莊道路上的冷漠會以匆忙或疏忽作為借口。一次對插秧的聯合抵抗似乎能夠被合理地解釋為勞動力集合時的延誤或困難。而且，偷竊、怠工、故意破壞等行為理所當然地根本沒有始作俑者。因而，盡管塞達卡存在相當數量的反抗，實際上卻沒有公開宣布的反抗者或麻煩制造者。

即使是我們已研究過的更為純粹的象征性反抗——惡意的流言蜚語、人格污蔑、起外號、謠傳——也遵循了同樣的模式。[[418]](#_418_12)畢竟，流言蜚語根據定義差不多就是關于不在場的第三方的故事；一旦被發起，它就變成了沒有作者但有許多傳播者的匿名故事。盡管絕非對人的尊重，惡意的流言卻是對它運作于其中的更大的規范秩序的尊重。在每一條不僅是消息的流言背后，是對被破壞的規則或規范的含蓄陳述。事實上唯有對預期行為的違背才值得讓一個事件成為流言蜚語。正在被討論的規則或規范經常只是因為被違背才得以闡明或引起人們的注意。在此意義上，越軌定義了什么是規范。因而，在通行的服飾規范被違背并因此引起何為得體著裝的議論之前，沒有人會注意到它。[[419]](#_419_12)人們心照不宣的語法規則，不被注意地起著作用，直至某個言說者或寫作者犯了一個明顯的錯誤為止。許多與塞達卡的階級關系相關的流言蜚語和人格詆毀都是窮人對租佃權、慷慨、慈善、雇傭和雙耕之前被視做當然的筵席的一種訴求。在名聲被流言中傷的同時，某種曾經被廣泛認可的規則正在被肯定和提倡。流言蜚語從來不是“公正無私的”；它是一種針對他人的為實現自己的訴求和利益的黨派的（如階級、派系、家庭）努力。然而，這種對規則的操縱只有在把訴求變成普遍接受的行為標準的時候才能夠成功。因此，流言作為一種公認的弱社會約束只有或多或少地保持在業已建立的規范框架內才能實現其惡意的功能。在此方面，不管其如何操縱，窮人使用流言蜚語就其自身而言同樣表明了某種謹慎和恭敬。

因而，作為一種反抗形式，流言蜚語是一種在權力和可能的鎮壓使公開的不敬舉動變得危險的情境下的民主之聲。富人當然能更為自由地公開表明他們對“不值得尊敬的窮人”的蔑視。然而對窮人來說，流言蜚語在把被指認和報復的風險減到最低的同時也實現了看法、輕蔑和不同意的表達。在塞達卡，正如夜間匿名的偷竊行為在物質上損毀富人的財產一樣，惡意的流言蜚語象征性地損毀富人的聲譽。這種一點點的蠶食，對權力結構的整體影響不大，但它是可供從屬階級利用的為反抗實踐穿上表面順從的安全外衣的少數方式之一。

毫無疑問，在塞達卡反抗的謹慎和匿名性把對“公共舞臺”的控制交給了村莊精英。通過避開所有直接和公開的進攻——象征的或物質的——公開互動的精英控制模式持續占據支配地位。如果那些企圖從事未聲張的聯合抵抗的人公開和公然地致力于此種行動過程，如果那些私下譴責村莊改進計劃弊端的人在村莊會議上公開地譴責村委會，隨之而來的騷亂就可想而知。僅憑這一點人們也會注重前臺行為的支配地位的重要性。窮人不去選擇燒毀橋梁的方式完全可以理解，他們的審慎保持了表面的禮儀，這種禮儀有助于富人的象征利益。表象是重要的[[420]](#_420_12)，并且正如布迪厄恰如其分地指出的那樣，“禮貌的[[421]](#_421_12)讓步總是包含了政治讓步”。

然而，窮人對于官方構建的村莊秩序的象征性“付出”，并非僅僅是恐懼和自衛本能的反應。例如，當窮人覬覦可租的土地、工作、貸款、或施舍而去接近較富的村民時，他們經常非常間接地進行，這樣只有在實際上確保一個有利的答復之后問題才會真正被提出來。如果回答有可能是否定性的，人們就會悄悄地不再詢問。以這種方式可以避免明確的和令人丟臉的回絕的可能。然而，同樣會被避免的是富裕的一方直接提出疑問駁斥那些需求本身的合理性的機會。因為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窮人發覺自己正在保衛古老的救助原則的正義性，就他們的利益而言，就是要避免造成一個使這些原則最終被公然否認的情境。[[422]](#_422_12)

當然，基于更為寬泛的觀點，所有這些反抗形式諸如流言蜚語和人格詆毀等訴諸共享的規范性標準的形式，都在不斷地失去它們的約束力。稻谷生產關系的轉變侵蝕了貧窮家庭作為佃農和勞動力提供者的價值，同時，也使他們的意見變得無足輕重。越來越多的富人現在能夠安全地不理睬窮人對他們的看法，他們正在逐步超出社會約束的范圍，而這些社會約束不再被經濟力量所強化。在這方面，“名譽政治”作為窮人的武器失去了多半效力。由過時武器構成的窮人的社會武器庫盡管在雙耕引進前似乎是有用的，現在卻難以適用于他們身處其中的不利的新的戰場。

## 服從以及部分的文本

塞達卡的窮人在和更有權勢的村民或外村人的關系上幾乎總是采取保護性的偽裝。這種偽裝在他們的服從和反抗方面同樣明顯。因而，哈姆扎在哈吉·卡迪爾不付足工資時隱藏他的憤怒，但在家里的私下場合，卻為受到不公正對待而發泄怒火。因而，帕克·亞赫盡管因為被排除出村莊改進計劃的補助而忿忿不平，卻仍然本本分分地去參加巴希爾的筵席。對機器使用者蓄意的聯合抵抗表現為插秧的延誤，而它可以隨時被放棄和否認。一場針對打谷工資的罷工是通過工人們稱病或者突然記起先前的許諾來實施的。塞達卡階級關系的“完全文本”，并不能簡單地從富人與窮人、強者與弱者之間的公開互動中獲知。為了超越作態和掩飾盛行的范圍，事實上必須與窮人單獨交談或者在他們都是朋友的小群體中交談。只有在這個時候，人們才會看到完全文本的局部，而如果在其他情境中公開宣布這種文本，就會危及窮人的生計。

窮人在權力面前應該偽裝，這一點都不令人驚訝。掩飾是大多數時間中任何地方的從屬階級典型的和必要的姿態，這是一個當這種姿態被放棄時非常的和危險的時刻就變得明顯的事實。所有對從屬階級生活的詳細說明都會區分所謂“后臺”和可以安全地公開宣布的不同。曾經收集到的一份出色的口述歷史，即生于1823年并一直活到20世紀初的法國佃農“年邁的梯也儂”（Old Tiennon）的講述，通篇充滿了被壓抑的憤怒的記錄。[[423]](#_423_12)在他與地主、監工、官員和權貴們日常遭遇的過程中，他不無小心翼翼地采用遵從和順服的公開偽裝，并且對自己的危險觀點守口如瓶：

當他（曾解雇他父親的地主）穿過勒克勞（Le Craux）去往梅勒斯（Meillers）的時候，他會停下來和我說話，而我強迫自己表現出親切，而不論我多么輕蔑他。[[424]](#_424_12)

年邁的梯也儂從他自己父親的魯莽中直接獲知直率所帶來的危險：

我父親通常從事喂馬之類的工作，當別處有如此之多的工作要做時，他從來都沒有忘記告訴主人待在家里是如何令人厭煩。他對生活中如此必要的偽裝藝術完全無知。[[425]](#_425_12)

或許正是這種必要的“偽裝藝術”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大量的農民保守的歷史。因為資源幾乎總是由高于小農的階級創造的，且不論意識形態目的，他們可能只是看到農民階級面對權力時采取的謹慎和恭順的方面。他們在此基礎上的描述并非錯誤，但是就采取必要方式獲知整個事實來說，至多只是局部的和有誤導的事實。此時，我們會得到一幅湯普森以扭曲方式描繪的18世紀英國鄉土社會的圖畫：

表面看來所有人都意見一致、恭順、相互遷就；依賴者卑賤地祈求恩惠；每個鄉下人都在抓緊時機；沒有一句針對杰出的漢諾威議院（House of Hanover）或光榮憲法（Glorious Constitution）的話打破同意的虛幻之水。進而，在匿名和模糊的層次上，突然間出現激進的二世黨人或者平均主義的濫用主張。我們不能將服從和祈求當做終極事實的指標；在境遇和算計利益允許的時候，二者都可能源自同一心靈。[[426]](#_426_11)

即使像左拉那樣仔細的觀察者，也在這一方式的引導下得出小農是一個在卑微的、不問是非的恭順和暴怒之間搖擺不定的階級的觀點。大量的中間狀態被忽視了，其中，遵從通常是一個自覺的策略，反抗則是謹慎地留有余地的事情，它避免極端的直接對抗。如果左拉更為細致地觀察恭順，他或許會發覺信仰和價值觀之間的鴻溝幾乎已經成為現代的奴隸制研究的主題，它既體現在奴隸們在其居住區的安全環境里的表現中，也體現在同一群男女面對權力時典型的審慎行為中。[[427]](#_427_11)正是此類至關重要的考慮讓一個有洞察力的社會學家拒絕所有那些恭順的概念，即將其作為人們的一種屬性或態度，并且堅持視之為發生在傳統權威運作環境中的社會互動形式。[[428]](#_428_11)

實際上，權力負載（power-laden）的環境幾乎總是不可靠的；權力的運作幾乎總是使得完整文本的一部分處于秘密狀態。在考慮到總是有失去控制的憤怒和鋌而走險的例外情況下，對依賴性的個體而言，正常的趨勢是在面對強權時，他或她的完整文本只能展現其安全的和適于展現的那一部分。何為安全和適當當然是由權勢者單方面定義的。雙方權力上的不平等越大，完整文本中可能被隱藏的部分也就越大。[[429]](#_429_11)

因而，我們或許可以思考一個連續性的情境，這些境遇涵蓋了從十分接近于哈貝馬斯所稱的“理想的言談情境”（ideal speechsituation）[[430]](#_430_11)的平等雙方之間的自由對話，到絕大多數受害者的文本被迫進入地下狀態、而只留下對于實際上因致命恐懼而生的假裝順從的老套模仿的集中營。事實上，在極端的卡里古拉恐怖（Caligulan terror）的情境下，沒有任何規則是被允許的，全部的文本可能都被隱藏了，剩下的只有麻痹。大量更為普遍的情形分布于上述極端情境的中間，從屬階級總是發現自己身處這些普遍情形之中：老板和工人、地主和佃農、領主和農奴、主人和奴隸。在每種情形之下，較弱的一方不可能談及他/她的內心，完整文本的一部分將為了符合于掌權者預期的“表演”而被抑制。[[431]](#_431_11)

如果我們期待不只看到臺上的表演，就必須移至后臺，在那里面具可以被揭開，至少部分被揭開。就奴隸而言，這意味著從“大房子”轉移到奴隸的住所；就工人階級而言，這意味著從有意設計的富人與窮人的相遇轉移到相對私密的室內或比較封閉的同伴群體中。正是在這些“不戴面具的”情境下，某些經習慣性審查的內容最終會躍然而現。我們已經看到，這些內容的大部分與發生在權力關系舞臺上的內容直接和完全地矛盾：哈吉·卡迪爾變成了Pak Ceti。這種不戴面具的、或后臺的文本與舞臺中央的文本之間的關系直接涉及到虛假意識這一主題。我懷疑，許多支持“神秘化”和“意識形態霸權”觀念的民族志材料只是將權力負載情境下的文本假定為完整文本的產物。然而，除了在集中營這樣的極端機構中，大多數從屬階級都能夠不時進入限制較少的社會環境。就此發現的文本而言，它顯著地區別于或否定權力關系背景下發現的文本，虛假意識在此被弱化了。[[432]](#_432_11)

權勢者的公開的文本與其全部文本的契合可能遠遠多于弱者的文本的情形。畢竟，由于其權力，他們更為自由，能夠相對泰然地談及他們的內心。拉扎克可以用哈吉·卡迪爾或巴希爾所不能的方式安全而公開地無禮。然而，權勢者也要多少受到限制，這既來自于對其名譽的關注——正在衰退但仍具有實際價值，也來自于支撐權力“表演”的需要。因而，他們會在自己家中指責許多村里的窮人，卻很少當面這么做。這一點同樣不令人吃驚；工廠經理和他的工人談話的文本不同于他在自己所屬俱樂部的安全環境中的文本；奴隸主對待奴隸的文本不同于他在席間和其他奴隸主不加防備的談論。只有當我們對“未經編輯的”精英文本和未經編輯的從屬階級文本進行比較時，我們才會發現在權力關系背景下盛行的相互掩飾的程度。在通常的階級關系的日常運作中，這些未經編輯的文本從不會直接相遇。只有在極少的歷史危機時刻這些文本和它們所暗示的行動才導致直接沖突。在此情況下，通常假定會出現改變階級關系的新的意識、新的憤怒、新的意識形態。然而，更有可能的是這種新“意識”已經存在于未經編輯的文本中，并且它還構成以允許或要求一方或雙方在此基礎上行動的方式發生改變的環境。

塞達卡的窮人和富人當然都清楚權力關系領域發生的并非故事的全部。他們懷疑并通常知曉大量發生在他們背后的村莊話語。然而，他們的知識并不對稱。在此，窮人至少在信息領域——如果可以這么說的話——擁有微弱優勢。正如我們已經從他們的評論中得到的，他們知道大量的富人對他們的看法。他們消息更靈通不僅緣于村莊精英能更加自由和輕蔑地談論他們這一事實，還由于打聽各種消息對窮人來說更為重要和關鍵這一事實。相反，富人較少知道窮人未經編輯的文本，因為窮人更為謹慎，并且富人更不屑去傾聽。知道得少，他們就能免于懷疑到最壞的情形。他們知道的是，盡管他們感覺到公開恭順和尊重的常態背后的輕蔑與憤怒，卻無法輕易洞察掩飾的姿態。他們恰好處于黑格爾的領主和奴隸辯證法（Hegel's dialectic of lord and bondsman）所描述的主人的境遇。[[433]](#_433_11)正是權力的運作妨礙了村莊精英了解較窮村民的真實想法，因而損害了對富人儀式性的遵從和恭順的價值。可能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大多數統治精英過去經常認為，他們的下層階級擁有各種源于復仇欲望的惡性力量和意圖。[[434]](#_434_11)塞達卡的情境并不那么極端，但其形式在性質上并無二致。村莊精英在匿名偷竊、誹謗、忘恩負義以及偽飾等方面對窮人抱以最壞的揣測。然而，他們的恐懼在地方權力關系的性質上有著真實的基礎。[[435]](#_435_11)

## 何謂反抗？

我們已經在塞達卡內部遇到一連串含混不清的反抗和順從。由于環境引導許多窮人用表面贊同的語言掩蓋他們的反抗，因而確定順從在哪里結束和反抗在哪里開始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如果按照字典對動詞反抗的定義——“努力使自己抵擋或抗拒某種力量或影響……”，如何區分微妙地混在一起的表面的順從和試探性的反抗，例如試圖對使用聯合收割機的農場主進行聯合抵抗就成為一個問題。就公共記錄而言，它從未發生過，而在另一層面，它是一次罷工，盡管是失敗的罷工。此外還存在其他問題。諸如偷竊或屠殺牲畜的個體行為，盡管并不包含集體行動，也未公開挑戰財產和統治的基本結構，能否被認為是反抗？盡管看起來在資源分配方面很少或根本沒有造成任何影響，大量的象征行動諸如聯合抵抗筵席或詆毀名譽的舉動能否被稱為反抗？每一個這樣的疑問背后都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何謂反抗”？由于定義是分析工具而非目的，說得更清楚一點，就我的目的而言，什么是真正的反抗行動？

作為初步的大致定義，我認為，階級的反抗包括從屬階級成員所有如下行動：有意識地減少或拒絕上層階級（如地主、大農場主、國家）的索要（如租金、稅款、聲望）或提高自己對于上層階級的要求（如工作、土地、慈善施舍、尊重）。如我們所見，這一定義并非沒有問題，但它有幾點長處：它集中于階級關系和階級斗爭的物質基礎；它既指個人的也指集體的反抗行動；它不排除那些向支配性情境定義挑戰和要求不同的公正與平等標準的意識形態反抗形式；最后，它強調目的而非結果，意識到許多反抗行動并不能達到其預期的結果。

在行動背后的意圖有著有力根據的地方，反抗的理由會相應加強。因此，共享小組的婦女打算拒絕給機器使用者提供插秧服務并因此迫使他們恢復人工收割的道理就清楚了。窮人之間的相互關系防止他們為租佃權而競爭，同樣清楚地意在阻止最終會傷害所有佃農的爭奪發生。在任何個案中意圖都不是從行動中直接推斷，而是從參與者對其行為的解釋中得出。對諸如針對富裕者的人格詆毀或惡意傳言等“言語行為”來說，行動與意圖融為一體；對吝嗇富人的指責在其身上明確地顯示了喚起他們不同的行為標準，或至少破壞其社會名望和影響的意圖。

然而，堅持認為反抗行動必定會顯示反抗的意圖，卻給在塞達卡和其他地方被視做反抗的農民行動的整個領域制造了巨大的難題。例如，考慮一下偷盜和竊取的問題：我們如何稱呼從富人田里“盜用”一麻袋稻谷的塞達卡窮人？只是小偷？還是也算反抗者？我們又如何看待那些打谷者的行為：他故意在秸稈上留下許多稻穗以便他的老婆孩子第二天來收集？這是小偷小摸行為還是反抗的行動？這里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很實際，就是為行動背后的意圖，即行動對行動者的意義，找到證據。其根本問題在于，行動者連行動本身都不可能承認，就更不用說解釋其內心的想法了。塞達卡的一些窮人將此類偷竊視為自助性地獲得扎卡特禮物的方式，這可以視為這類小偷認為自己有權獲得屬于自己的東西的間接證據，一但這點并不確定。因此，盡管有可能揭示出一個視偷盜和竊取為合法行為的階級所共有的一套信念，但要發現行動者的個人信念幾乎是不可能的。小偷尤其是那些尚未確認的小偷的“文本”，是異乎尋常地難以獲得。

第二個問題關系到更廣泛的定義和分析。我們傾向于將反抗視為個體或群體為得到較長遠利益而作短期犧牲的行動。罷工、聯合抵抗，甚至避免與本階級其他成員競爭土地或工作所帶來的直接損失即是上述犧牲的明證。但是當涉及偷盜之類的行為時，我們所看到的是直接的個人獲利和可能的反抗合二為一。我們如何判斷這兩個目的中哪一個是主要的和決定性的？關鍵并不在于如何精確地定義，而是解釋整個行動系列，對我來說，它歷史地呈現于日常階級關系的核心位置。18世紀的英格蘭偷獵者或許一直在反抗貴族們所宣稱的對野物的所有權，但他一定也對燉兔肉感興趣。南北戰爭前美國南方的奴隸秘密宰殺其主人的肥豬或許是一直在堅持他們體面生存的權利，但是他們無疑也在滿足他們對于烤豬肉的喜好。東南亞農民將大米和財產隱藏起來不讓收稅官發現可能是在抗議高額稅收，但他也是在確保他的家庭能在下一次收獲到來之前擁有足夠的大米。被征入伍并從軍隊開小差逃跑的農民可能是一個戰爭反抗者，但他也是通過逃離前線以確保自己的安全。這些無可避免地融為一體的動機當中哪一個應該置于首位？即使我們能夠向這些行動者發問，即使他們能夠坦率地作答，也還是無法確定他們能否做出清晰的答復。由于這些自助形式通常是奴隸們唯一可能的選擇，那些密切關注此事的奴隸制研究者們傾向于并不認為這些行動是“真正的”反抗，這緣于三個理由。這三點都見于杰拉爾德·馬林有關奴隸“造反”的分析：

在處理奴隸行為中這些可觀察到的不同時，學者們通常會問，是否一種特定的叛亂類型代表了對奴隸制弊端的反抗或真正的對奴隸制本身的反抗。當在其政治背景中研究奴隸行為時，那些最卑下的工作者、大田里的奴隸情況最糟。一般來說，他們的“懶惰”、消極怠工和小偷小摸代表了一種有限的，或許是自我放縱的造反類型。他們對預料之外的虐待或耕作常規的突然改變的反應至多是對奴隸制的象征性行動。但是種植園奴隸為了阻礙種植勞動的有組織和系統的計劃——他們持久地消耗莊稼和倉儲的行為，以及維持黑市交易的夜間合伙搶劫——則是更具“政治性”的后果并且表現了對奴隸制本身的反抗。[[436]](#_436_11)

盡管尤金·基諾維斯對此問題的態度在某些重要特點上有所不同，他也堅持對反抗的前政治形式與更為重要的對奴隸政體的反抗加以區別。對他而言，正如下述引語所表明的，上述區分既存在于結果領域也存在于意圖領域：

嚴格說來，只有起義才是政治行動的表現，它被定義為唯一真正的反抗，因為只有它直接挑戰了政權。從此觀點出發，那些被一些人稱為“對奴隸制的日常反抗”的行動——偷竊、撒謊、偽裝、開小差、謀殺、殺嬰、自殺、縱火——最多被定性為前政治的和至少被當做非政治的……但是“對奴隸制的日常反抗”通常意指遷就，并且除了假定某些已被奴隸認識或界定的規范和現狀已遭到破壞之外沒有任何意義。[[437]](#_437_11)

結合這些相互重合的視角，結果是真正的反抗和象征的、偶然的甚至附帶的行動構成一種二元關系。真正的反抗被認為是（a）有組織的、系統的與合作的，（b）有原則的或非自利的，（c）具有革命性的后果并且/或者（d）將觀念或動機具體化為對統治基礎的否定。與之相反，象征的、偶然的、或附帶性的行動則是（a）無組織的、非系統的和個體的，（b）機會主義的和自我放縱的，（c）沒有革命性的后果而且/或者（d）就其意圖或意義而言，含有一種與統治體系的融合。上述區別對于任何試圖描述各種反抗形式和它們如何相互關聯或與統治形式關聯的分析都是重要的。我不同意這樣一種觀點，即認為后一種反抗形式是無足輕重和毫無結果的，只有前一種才能稱得上構成真正的反抗。在我看來，這種觀點從根本上曲解了從屬階級——不僅是奴隸，還有農民和工人——在強制背景下從事日常的經濟和政治斗爭的真正的基礎。它是列寧主義者和資產階級對政治行動的構成的兩種臆斷的具有諷刺意味的組合。上述對比中的前三個問題將在此討論，而最后一個也是最重要的一個，關于意圖是妥協的還是革命的主題，將簡單提及并在下一章更為詳盡地加以探討。

讓我們從“自我放縱的”、個人化的和非組織化行動的問題開始。嵌于基諾維斯的邏輯特別是馬林邏輯的假定是，此類行動從根本上缺乏革命性成果。或許通常都是如此，但當此類行動大規模發生時，幾乎沒有一種現代革命能在不精確參照此類行動的情況下成功地得以解釋，這一點也同樣是事實。舉例來說，可以考慮一下從軍隊開小差這件事及其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

俄國革命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例證。1917年夏天，軍隊中的大量普通農民士兵開小差的行為日漸增長，至少從兩方面來看，這正是革命進程中主要的和不可或缺的部分。首先，他們造成了沙皇專制國家主要鎮壓制度的崩潰，這是由臨時政府繼承的并且早在1905年就曾鎮壓過一起革命暴動的制度。其次，通過參與遍及俄國在歐洲核心省份奪取土地的運動，逃兵們直接為農村的革命進程做出了貢獻。而且盡管成千上萬的個體扔掉武器跑回家去，沙皇軍隊的失血在很大程度上仍是“自我放縱的”、“無組織的”和“個人化的”，這一點也足夠清楚。[[438]](#_438_11)對奧地利的六月進攻以軍隊和軍官的大量流失而被粉碎；面包配給減少并且“齋戒日”儀式也在前線舉行；此外，士兵們都清楚，如果繼續待在前線，他們就可能失去在村莊爆發的奪取土地運動中獲利的機會。[[439]](#_439_11)開小差給農民雇傭兵提供了保全自身并且回到可以獲得面包而現在還可以獲得土地的家鄉的機會。由于軍隊的紀律已經渙散，風險就微乎其微。人們難以想象一套更加“自我放縱”的目標了。但恰恰這些非組織化的大量的“自我遣散”的農民士兵完成了自我放縱的目標，從而使革命成為可能。[[440]](#_440_11)

俄國軍隊的瓦解只是許多微不足道的、利己主義的不順從或開小差行為的諸多例證中的一個，這些行動都不具備革命的意圖，卻引發了革命的形勢。1948年蔣介石的國民黨軍隊和1975年西貢軍隊的瓦解無疑可以按照同樣的思路分析。在最終崩潰之前很久，每支部隊——包括越戰中的美國軍隊——的反抗和不服從行為已經嚴重限制了反革命的軍隊對其普通士兵的預期和要求。[[441]](#_441_11)此類反抗當然并不是為反革命的力量所專有，如同喬治·華盛頓和埃米利亞諾·薩帕塔[[442]](#_442_11)所發現的。可以想象，作為曾經的薩帕塔軍隊的一員，佩佐·馬丁內斯非同尋常的個人邏輯和逃離前線的沙皇軍隊的邏輯并沒有顯著的不同。

我就是在那兒（蒂薩潘戰役）進行最后一戰的。戰斗極其可怕：驚人的射擊！完全是一場流血戰斗，三天三夜。而我只參加了一天之后就走掉了。我離開了軍隊……我告訴自己，“現在是回到妻子和孩子身邊的時候了，我要逃出去”……我告訴自己，“不，我的家庭是第一位的，現在他們在挨餓。現在我要離開了”。[[443]](#_443_11)

佩佐·馬丁內斯與眾不同的坦率有助于提醒我們，一方面是自我保護行動和家庭義務的平凡陳述，另一方面是此類行動后果的平凡陳述，此二者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的聯系。

盡管農民自利的后果對于任何更大的階級關系或國家的分析都是基本的，但我并不想爭辯這種反抗只能參照其后果來做出界定。如果只是因為“非預期后果定律”而不考慮任何其他理由，這樣的觀點會陷入極大的困境。幾乎所有通情達理的觀察者都會稱之為反抗行動的諸多行為可能會導致事與愿違，并造成與預期截然相反的結果。明確的旨在顛覆國家的革命運動的恐怖主義卻可能導致更糟糕的和持久的獨裁。明確要求增加工資和增進就業的農業工人的有效罷工，或許反而會促發大規模的生產機械化，并因此縮減了工作機會。[[444]](#_444_11)

因而有關現存的反抗概念的問題并不是一定要涉及目的、意義與結果的問題。問題在于，若堅持區分“自我放縱”的個體行動與假定的有原則的、非自利的集體行動，并將前者排除在真正的反抗范疇之外，會造成誤導、沒有結果和社會學上的天真。堅持將這一區別作為比較反抗形式及其結果的方式是一回事，但是，將它們作為基本標準以決定什么構成了反抗就會忽視農民政治的真正來源。

經常處于農民造反的核心內容，即對“面包”、“土地”和“無稅”的訴求與農民家庭基本的物質生存需求相結合并不是什么巧合。農民的日常政治和日常反抗（當然還有日常的順從）都源自這些同樣基本的物質需要，這是再平凡不過的常識而已。就農民家庭而言，我們只需假定一個可以理解的生存需求——確保其身體的安全、確保其食物供給、確保其必需的現金收入，由此就可以明了針對統治集團、征稅者、地主和雇主的索要的反抗之來源。

忽略農民反抗中的自利性質就會忽略農民政治，同時也忽略了大多數低等階級政治的決定性背景。自利與反抗融合在一起，正是激發農民和無產階級反抗的關鍵動力。當一個農民把他的一部分谷物藏匿起來逃避付稅時，他既是要填飽肚子也是奪走國家的谷物。[[445]](#_445_11)當一個農民士兵因食物太差和家里莊稼成熟等待收割而從軍隊中開小差時，他既是關心自己也是拒絕當國家的炮灰。當這類行動稀少而孤立時，幾乎無關緊要；但是當它們成為一種固定的模式（盡管沒有協調、沒有組織）時，我們就將其視為反抗。在某種意義上，許多農民反抗的內在本質和“優點”就在于，它往往帶來直接的和具體的好處，與此同時它奪走有產階級的資源，而且，它極少或者根本不需要明顯的組織。此類反抗的頑強與力量直接源于其如此堅實地根植于一個階級所經歷的共同的物質斗爭這一事實。

要求下層階級的反抗具有某些“原則性”或是“非自利性”，不僅是烏托邦的和對于基本物質需求的道德意義的貶低，而且是一種對階級斗爭基礎的錯誤建構，階級斗爭首先是關于占有工作、產品、財產和稅收的斗爭。“面包與黃油”的問題是低等階級的政治與反抗的本質所在。從這一角度看，消費對反抗和反反抗來說既是目的也是結果。尤沙·帕特耐克指出，“消費不過是歷史性的‘必要勞動’，作為他們與剩余占有階級（the surplus-appropriating classes）斗爭的結果，小生產者得以獲得凈產出的份額”[[446]](#_446_11)。這就是常規階級斗爭的自利性內核：減輕或擊敗占有的經常的防御性努力。[[447]](#_447_11)從有利的一面來說，少量的偷竊稻谷和打谷場上的小偷小摸看上去像是微不足道地“對付”機械化，但從更廣闊的階級關系的觀點來看，實際上如何分配收獲才是問題的中心。

始于自利的物質需求的反抗概念的另一個長處在于，它與“階級”如何被歷史行動者自身所感受密切關聯。在此我完全贊同湯普森基于他卓越的工人階級歷史分析所得出的判斷：

在我看來，人們的理論關注（許多明顯是非歷史的）給予“階級”的過多，而給予“階級斗爭”的過少。實際上，階級斗爭是更為優先也更為普遍的概念。坦率地說，階級并不是作為相互分割的實體而存在，并不是環顧四周，發現敵對的階級，然后開始斗爭。而是相反，人們通過社會的結構化以特定方式（在生產關系中至關重要但并不是排他的）發現自身，他們經受剝削（或需要保持對他們所剝削的人的權力），他們意識到與自己相反的利益，開始圍繞著這些爭端進行斗爭并且在斗爭過程中，發現自己作為階級而存在，他們知道這一發現就是階級意識。在現實的歷史進程中，階級與階級意識總是最后的、而不是最初的階段。[[448]](#_448_11)

當然，斗爭的物質基礎不可能從價值觀的斗爭——意識形態斗爭中分離出來。反抗一種索要或占有同時也是對抗這一索要背后的理由和道理。在塞達卡，這一意識形態反抗通常會避開公共視線，但它形成了窮人的規范性亞文化的關鍵部分。

將“個人化的”反抗行動貶低為無意義和將“反抗”術語限定為集體的或有組織行動的傾向與強調“有原則的”行動一樣具有誤導性。我懷疑，符合組織化運動的特權地位出自于兩種政治取向之一：其一，本質上的列寧主義，認為可行的階級行動只能是由一個充當“總參謀部”的先鋒政黨所領導的行動；另一個則更為直接地源于熟悉的和偏好公開的制度化的政治，即運作于資本主義民主制中的政治。然而，這兩個主張中都有不足。

當然，許多農民反抗的個人化的和通常匿名的性質都非常適合于產生于其中的階級的社會學研究。作為分布在小社區中而且通常缺少集體行動的制度化方式的下層無階級（low classlessness）的階級，它更可能使用那些當地的幾乎不需要合作的反抗方式。在普遍的物質剝奪、公開政治行動的合法保護或鎮壓制度發生崩潰（在少數情況下，三者都具備）的特定歷史背景下，農民可能而且已經成就一種有組織的、政治性的群眾運動。然而這種背景極為少見而且通常是短命的——即使它們對革命有所貢獻。在大多數地方和大多數時間中，這種政治選擇都是被阻止的。個人化的和謹慎的反抗形式的偏好不僅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對小商品生產者和鄉村勞動者的預期，而且這種形式有幾個優勢。與等級化的正式組織不同，它沒有中心、沒有領導、缺少可辨識的結構，不會被同化或失效。缺少中心協調的情形或許可由其靈活性和持久性加以彌補。這些反抗形式所贏得的不是固定形式的戰斗，但它們極其適合于長期的消耗戰。

如果我們把對農民反抗的研究限定于正式的組織行動，我們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會成為徒勞，因為在馬來西亞如同在其他第三世界國家，或是缺少這樣的組織，或者它們是官員和農村精英創造的結果。如此我們會錯過許多正在發生的事情。例如，馬來農民反抗國家的歷史仍需要被書寫，然而，當它被書寫時，它將不會是公開反叛或者正式組織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歷史。前殖民主義時代有關反抗的記錄或許將由逃亡和逃避強迫勞動、逃避大量的稅費占據主導地位。有關對殖民統治的反抗，對公開對抗的記錄會遠少于對故意的和大量的不順從的記錄，例如，其最有威脅的方面是持續地少報土地擁有量和莊稼產量以盡可能減少稅費，無情地漠視所有旨在限制小土地所有者的橡膠種植和交易的規定，以及不懈地在新土地上開發定居點而無視許多禁止這樣做的法律。上述做法中許多持續至今。這類反抗在檔案中有大量證據[[449]](#_449_11)，但由于這類反抗的目的是逃避國家和法律秩序而不是進攻它們，它所受到的歷史學關注遠少于那些相當稀少的小規模的造反，而這種造反對殖民統治進程的影響卻很有限。即使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窮人的運動也大多發生在正式的政治活動領域以外。[[450]](#_450_11)由此可知，如果在高度工業化的、有很高識字率的城市經濟和相對公開的政治體系中窮人以這種形式進行的政治活動是令人信服的，那么，農業經濟中的農民這樣做就更合理了，因為在這樣一個背景中公開的政治活動是被嚴格限制的。正式的政治活動對精英、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來說可能是規范性的，他們在第三世界以及在西方國家幾乎壟斷了制度性的技能和途徑。但是如果期待農民的反抗能夠或將會規范性地采取同樣方式，那將是幼稚可笑的。

我們不應忘記農民反抗的形式不僅是農民社會生態的產物。反抗的參數也是部分地被鎮壓制度所設定的。在相當程度上，這類制度運作得十分有效，它們幾乎可以排除任何形式的反抗，只除了那些個體的、非正式的和秘密的反抗。[[451]](#_451_11)因而，甚為合理和至關重要的是區分不同水平和不同形式的反抗：正式的——非正式的，個體的——集體的，公開的——匿名的，挑戰統治體系的——旨在邊際收益的。但是在這一點上，我們應該完全明白，我們實際能夠度量的是構成可能選擇的鎮壓水平。根據他們所面臨的情境，農民可能在有組織的選舉行動到暴力對抗和沉默匿名的偷懶和偷盜行為之間搖擺不定。這樣的搖擺在部分情況下可能是由于農民社會組織的改變，也可能是由于鎮壓水平的變化。不只一類農民階級被粗暴地迫使從某一時刻的公開、激進的政治運動退縮為隨后的頑強而零散的微小反抗行動。如果我們只允許自己將前者稱為“反抗”，我們就只能讓統治結構來為我們界定什么是反抗，什么不是反抗了。

我考察過的許多反抗形式或許都是個人行動，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是沒有協同的。[[452]](#_452_11)在此，源自正式的和官僚體制的合作概念對于理解小共同體的行為再次無所助益，這些小共同體有著密集的非正式網絡和豐富的、歷史深厚的、反抗外部要求的亞文化。[[453]](#_453_11)例如，可以毫不夸張地說，許多屬于農民“小傳統”的民間文化都將我所研究過的逃避性的、狡猾的反抗形式合理化甚至對其進行頌揚。在馬來社會，這一傳統在所有農民都熟悉的鼠鹿傳說（mouse deertales）中被記載下來。鼠鹿是一個定型化的“騙子”形象：一個弱小但卻敏捷的動物，它利用自己的智慧、欺騙和狡詐存活下來并戰勝了比它遠為強大的野獸。在此無需任何文學技巧就可以認識到，鼠鹿傳說是小農必需的生存技術的通俗的隱喻。當然，這類形象有著歷史上的其他從屬群體在其民間傳統中的文化對等物——TilEulenspiegel和Brer Rabbit[[454]](#_454_11)就是兩個例子。至少它們鼓勵一種反抗，如同南卡羅來納州黑人奴隸的諺語所說：“白人有他們的陰謀，黑鬼也有自己的伎倆。白人想出一個陰謀，黑鬼可以用兩個來對付，道高一尺，魔高一丈。”[[455]](#_455_11)

通過這種和其他方式（例如強盜、農民英雄的傳說、宗教神話等），農民的亞文化對于偽飾、偷獵、盜竊、逃稅、逃避服兵役等等都有所助益。盡管民間文化在其形式上并不一致，但它通常能形成一種“思潮”，在其他更為制度化的社會中，這種思潮則需要一種公共關系活動。[[456]](#_456_11)農民社會令人驚訝的一點是一系列復雜活動——從勞動力交易到搬家，再到出席婚宴——都經由理解和實踐的網絡而得以高度協調。對于聯合抵抗、工資“協商”、佃農拒絕彼此競爭，或者有關偷竊的共謀的沉默等都是同樣的邏輯。沒有正式的組織被創立，因為沒有這種需要；然而，某種協調形式的達成提醒我們正在發生的一切并不僅僅是個體的行動。

根據這些思考，讓我們再短暫地回到意圖的問題。從農民反抗的多種形式來看，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行動者總是對他們的意圖保持沉默。他們的安全有賴于沉默和匿名；這類反抗本身的有效性建立在表面一致的基礎上；他們的目的可以埋藏在農民的亞文化或常規之中，為生存和家庭生計而進行的斗爭是被視做當然、不必言說的。就好比魚兒從不談論水。

當然，從一定意義上說，他們的意圖體現在他們的行動中。一個開小差逃跑的農民士兵用他的行動清楚地“說出”，現行制度的目的和他所承擔的風險與艱辛比不過他的家庭和個人需求。一個從雇主那里偷竊稻谷的收割工人“說出”的則是他對大米的需求比他老板的正式財產權重要得多。

當涉及到占有階級的物質利益直接與農民發生沖突（有關地租、工資、雇用、稅收、征兵、收獲分配）的社會場景時，我想，我們可以從行動本身的性質推斷幾分意圖。當對農民的盈余的克扣和剝奪行為表現出系統性時，情形尤其如此。當然，有關意圖的證據總是受歡迎的，但我們不應期望太多。因而，此前給出的反抗的定義特別強調了反對統治階級的物質和象征的索要的努力。畢竟，大量的農民反抗的目的都不是要直接推翻或轉變統治體系，而是要在其中生存下去——活過今天，這個星期，這個季節。正如霍布斯鮑姆準確地指出的，農民的目標通常在于“讓制度的不利達到最小”[[457]](#_457_11)。他們堅持不懈地努力“蠶食”可能會適得其反，他們可能非常有限地減輕了剝削，他們可能促成一次關于撥款限制的再談判，他們或許可以改變后來的發展過程，但他們極少能夠帶來制度的改變。這些都是可能的后果。而他們的目標幾乎總是生存和持續。根據具體環境，對這一目標的追逐也需要我們已經看到的微弱的反抗，或者更激進些的自我防衛行動。無論如何，他們的大多數努力將無產階級視做野蠻、欺騙、逃避、偷竊、傲慢——簡而言之，所有的標簽都是為了詆毀反抗的形象。

顯而易見，反抗并不僅僅是農民為維持自身和家庭生計所做的一切。他們的許多作為在我們看來，可以被理解為順從，盡管有些勉強。一部分小商品生產者或勞動者可能會為生計所迫而以同伴為代價來保全自己。從另一個窮人那里偷竊稻谷或者出高價來獲取租佃權的貧窮無地的勞動者存活下來，但他肯定不是在此所定義的意義上進行反抗。必須提出的有關統治制度的一個關鍵問題是，在何種程度上這種制度成功地迫使從屬階級為了生存而全然采用“損人利己的”策略。原子化、恐怖、鎮壓和壓抑物質需求相結合的確能夠達致統治的終極夢想：讓被統治者相互剝削。

假定唯有那些拒絕或減少來自剝削階級的索要的生存策略才能被稱為反抗，我們仍需認真思考許多行動。這些行動的多樣性掩蓋了其根本的連續性。這種連續性存在于相對自主的小商品生產者為保護其基本的物質和身體需求以及再生產自身所進行的不懈努力的歷史中。在不同時間和不同場合，他們使自己免受強迫勞役、稅收和傳統農業國家征兵的傷害，免受來自殖民政府、資本主義的侵襲（例如租金、利息、無產階級化、機械化），免受現代資本主義國家以及許多據稱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傷害。如果當革命真的到來時，它可能清除許多古代政體的最壞的罪惡，但是它極少成為農民進行反抗的目的。由于奪取國家的激進精英很可能在內心有著和他們以往的農民支持者不同的目標。他們會期待集體化的農業，而農民階級則執著于小土地所有；精英們可能想要一個中央集權的政治架構，而農民階級卻與地方自治相結合；精英們可能為發展工業化而在鄉村收稅，而且他們幾乎肯定會期待一個相對于市民社會的強有力的國家。因此，像戈蘭·海登那樣敏銳的觀察者很可能會發現，坦桑尼亞的農民階級早期對于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反抗，同其當下對坦桑尼亞社會主義國家的制度和政策的反抗之間有著明顯的類似。[[458]](#_458_11)他提供了有關“農民生產方式”——通過消極怠工、將政府奪去的土地和工作私有化、通過規避、逃亡和“破壞”政府為自己的利益而實施的項目等方式——如何阻礙了國家計劃的引人注目的論述。在越南也是如此，在南方和北方的革命完成之后，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同樣在繼續著。小塊私有土地的暗中擴張，為了家戶生產而從國有企業撤回勞動力，不向國家交付糧食和牲畜，國家信貸和資源被家庭和工作小組“挪用”，以及黑市的穩步增長，所有這些都證明了社會主義國家形式下小商品生產的頑強性。[[459]](#_459_11)我已經分析過的這種頑固、持久和難以削弱的反抗形式或許正代表了真正持久的弱者的武器，在革命之前和之后都是如此。

# 第八章 霸權與意識：意識形態斗爭的日常形式

至于社會變遷的原因，我用這種方式看待它——思想類似于一種議會，但其外部還有整個國民，而且大量的正在致力于變革的國民并不知曉議會在做什么。

喬治·艾略特：《丹尼爾·狄隆達》

如果只是稍稍觀察塞達卡階級關系相當平靜的官方表面之下的內容，人們不會輕易認為，窮人對他們的境遇是迷惑不解的。他們關于綠色革命及其社會后果的說明同富人的描述全然不同。誰是富人、誰是窮人——以及富裕和貧窮的程度——這個看似直截了當的社會事實在這個共同體內存有異議。窮人在相對安全的情況下這樣做時，便展現了他們令人印象深刻的能力，換言之，他們有能力對富裕農場主的虔誠和道理背后的東西進行洞察，有能力對資本積累、無產階級化、邊緣化的更宏大的現實加以理解。他們重視并操縱那些對他們作為一個階級的物質和象征利益有利的價值觀。他們拒絕富人強加給他們的污蔑性特征。在鎮壓的恐懼和“經濟關系的無聲壓力”造成的狹窄范圍內，他們通過聯合抵抗、不聲張的罷工、偷竊和惡意的流言等方式為保護自己的利益而行動。

在本書最后一章，我希望將這些來自塞達卡本土的見解與更大的關于階級的社會經驗以及典型的階級斗爭語境聯系起來。應該說，這對于階級意識、神秘化和意識形態霸權的理解，都是有意義的。研究的目標是深入地分析象征性反抗的日常形式和經濟反抗的日常行動的表達方式。正如左拉等人指出的，農民并不是簡單地在盲目的服從和兇惡的憤怒之間搖擺，他們也不是從意識形態共謀直接走向敏銳的階級意識。如果我們在精英所強加的行為一致的表象背后發現無數的匿名的反抗行動，我們也會發現，在象征的和儀式的順從背后也存在著無數的意識形態反抗的行動。當然，這兩種反抗形式不可避免地結合在一起。以更加細致的分析來考察這些問題——盡管這需要我們稍稍離開塞達卡幾步——將有助于我們澄清這樣一些爭論，即，在何種程度上統治階級能夠將其自己的公正社會秩序的設想，不僅強加給從屬階級的行為，而且強加給他們的意識。然而，在進入這些重大主題之前，我們首先要認清塞達卡意識形態斗爭的性質。

## 塞達卡的物質基礎和規范性上層建筑

由政府支持的雙耕和機械化使生產關系的重大改變成為可能，毫無疑問，塞達卡目前正在上演的意識形態沖突是對這一變遷的反應。正是這些物質基礎的外源型變遷允許大地主和農場主改變租佃制度，增加地租，解雇佃農，用機器取代薪資工人，并且或者長期出租大量土地，或者收回土地自己耕種。經濟權力平衡的這種改變還讓富裕農民取消或減少了許多社會習慣：諸如舉辦筵席、伊斯蘭慈善施舍、借貸和預付工資，甚至包括許多先前的給予貧窮村民的社會承認和尊重，而這些社會實踐曾是以前的生產關系安排中至關重要的部分。簡言之，不再為富有農場主的物質利益所認可的先前的生產關系正在被逐步或整個地放棄，這就是已經發生的一切。

物質基礎的變遷及其在階級關系方面的經濟和社會后果，是在既定的規范化環境的背景中產生出來的。有關這一規范化環境有兩個一般性事實值得注意。首先，并不像某種帕森斯理論的價值共識那樣，行動者遵從于在一定程度上外在于和高于他們自身的規范性秩序，而是遵從一個沖突的和有著不同解釋的規范性環境。例如，在雙耕之前，大農場主認為給予收割工人的扎卡特饋贈是一種恩惠或禮物，而工人自身卻認為這是自己理應被賦予的像收入一樣的一項權利。其次，這種規范性環境自身也部分地是雙耕和機械化之前物質生產條件的一個產物。因而，我們并非研究純粹外在于日常實際行動的精神構造，而是研究穩定地固化在大量平凡的物質性實踐之中的價值觀。[[460]](#_460_11)我的目標要點在于，塞達卡的農民并非簡單地對客觀條件本身做出反應，而是對由嵌于具體實踐的價值觀所傳達的對那些條件的解釋做出回應。

在這種關系中，重要的是簡要勾勒出和稻米生產聯系在一起的物質實踐，以及雙耕之前普遍對這些物質實踐的規范性理解。就實踐本身來說，人們可以圓滿地幾乎完全按照相關行動者具體的物質利益加以說明。反過來，這些物質利益很大程度上是雙耕之前的生產資料（稻田）的分配中明顯的不公平的產物。對于有實力的農場主來說，生產的關鍵問題是及時可靠地動員勞動力進行插秧、收割和打谷等主要作業。靠降雨量決定的生產計劃的限制造成了對于勞動力的峰值需求，即使有流動的工人，也需要有隨時性的地方援助以應對種植和收獲稻谷的不可避免的急需。因而，對大農場主而言，通過社會性體諒和友好的物質與象征行動開發忠誠的勞動力就有著突出的好處。在實行雙耕的最初幾年中，由于流動工人不再容易獲得，而聯合收割機還沒有出現，這種策略就變得尤為重要。在地主與其佃農的關系中這一過程也很顯著。那時，佃農很容易租到土地，而地主為了留住種田好手，也會因既定利益而不時做出讓步。除此之外，村莊精英的經濟動機還包括通過培養忠誠的政治追隨者而使自己獲得當地政府和黨派機構提供的好處，特別是自獨立以來精英們更是這樣做。

那些需要土地和工作——或兩者都需要——的人，也有著同樣的、甚至更迫不得已的算計。對那些僅能糊口、經常不得不在收獲后外出尋找工作的人來說，每個季能獲得穩定的租佃權或者可靠的田間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偶然但不可避免的危機，如歉收、家庭中死亡或疾病的發生，或者臨時性的儀式開銷都意味著能獲得借貸、施舍或緊急援助，對家庭來說并非只是一種便利，而更是一種至關重要的必需。[[461]](#_461_11)如果他們公開地使自己適應于這些社會生產關系，并不斷努力重新定義其利害，那么他們的行為也就有了充分的理由。

然而僅僅理解這些社會生產關系表面的自利基礎是不夠的。就我的目的而言，關鍵是對于意識形態沖突的分析，即掌握規范的過濾器的性質——這些自利的行動必須通過這一過濾器，以及它們如何、為何經歷這一過程而發生社會性的轉變。換言之，為什么經濟力量要以這種方式“委婉地表達”以及它的委婉化的結果是什么。[[462]](#_462_11)從一種角度看，富人所做的就是通過那些他們曾經自愿付出的慷慨或施舍行為，將其不成比例占有的經濟方式的一部分轉變成地位、聲望和社會控制的形式。當然，這種社會控制會再次轉變為勞動服務——并因而再度成為物質財富。正如布迪厄在類似背景下所發問的，我們是否會從這種只不過是聰明的伎倆中看到“勞動力購買的偽裝形式或者強制勞役的隱蔽性勒索”？他回答道：

只要分析與在實踐中相互結合的東西不分離，即認識到本質上模棱兩可，曖昧不明行為的雙重現實……這種占有服務的全部現實就必定取決于如下事實，它只能發生在一種無私的禮物贈與儀式的偽裝之下，自愿援助同樣是一種強制勞役，因而也是一種自愿的強制勞役和強迫性援助。[[463]](#_463_11)

經濟力量的委婉化在兩種情況下成為必要：在直接的物質性強迫尚無可能的地方；在單純的資本主義市場的間接統治本身還不足以確保其占有的地方。[[464]](#_464_11)在以上情境下，占有必須通過社會認可的統治方式實現。這種統治并不僅僅是用力量強加的，它也必須采取一種形式達到社會順從。如果它要行之有效，它需要弱勢的一方默認——即使只是在公共場合——這種委婉方式。

這種經濟控制的委婉形式的三種后果是我分析的中心。第一個就是，如果它能夠完全實現，它不可能沒有代價而實現。對人的培養如同種植稻谷，需要時間、精力和資源。想確保其勞動力供給和政治追隨者的大農場主，不得不一環扣一環地通過策略性的禮物、施舍、借貸、社交、宴請以及其他具體的和象征性的服務打造自己的社會權威。[[465]](#_465_11)

第二個且密切相關的后果是，經濟支配的委婉化只能通過耕種利潤的一定程度的社會化而實現。我非常謹慎地使用社會化這個詞，因為從來都不存在生產資料的所有權的任何社會化。相反，實際發生的是對一部分農作物本身及其帶來的收益的適度的和策略性的社會化，它表現為危急時刻的饋贈、收獲之后的扎卡特禮物、筵席、慷慨等形式。這一有限的財富的社會化——確切地說是在私人之間實現的——是財富能夠成功地轉化為社會信譽和勞動服務的唯一途徑。在此，我們擁有了類似于馬克思所說的私人占有與社會化生產之間的矛盾的鄉村對等物，只不過，在塞達卡的案例中呈現的是財產的私人占有和社會使用之間的矛盾。當我們著眼于窮人對富人的指責時，他們幾乎毫無例外地贊同財產的社會使用。因此，對拒絕宴請、取消收獲之后的扎卡特禮物、拒絕施舍的譴責，以及由此而來的對小氣和吝嗇的更為普遍的譴責，與財產的社會使用直接相關。即使是生產關系中的主要問題——聯合收割機的使用、租佃權的持有、加速遞增的地租征收以及村莊改進計劃的濫用——都可以訴諸過去無論是習俗中的還是特殊的伊斯蘭文化中的做法，其中，富人的財產和影響只有在它們同時有助于為社區的其他成員提供土地、工作和收入時，才能夠得到寬恕。這或許也是意識形態斗爭主要限制在馬來社區的原因——只有在這一范圍內，財產的社會使用才會得到人們積極的贊許。此類權利主張現在得到頑強的辯護，原因在于它們根植于共同（即使存在爭議）傳統的象征和物質做法當中。

財產關系委婉化的第三個方面是，它總是有關象征的操縱、斗爭與沖突的焦點。我們不能將這些模式視為僅僅是用以蒙蔽從屬階級的眼睛的一種策略，或一種神秘化。富人的象征行為當然是自利的，但構成自利內容的真正定義是階級斗爭的產物。因而，對于偶爾的禮物或扎卡特，如果我們像精英希望的那樣去看待它們，即視其為無私的慷慨，或者當我們將其視為僅僅是對占有的犬儒式偽裝時，我們就不能理解它們的全部意義。一種更為完備的觀點要求我們掌握委婉化本身的雙重象征操縱，正如湯普森在相關情境中所觀察到的：

甚至“慷慨”和“施舍”都可能被當做匱乏時期階級和解的算計行動，或者是（在暴亂的威脅下）群眾有計劃地勒索：（從上面看）“給予的行為”（從下面看）就是“獲得的行為”。[[466]](#_466_11)

讓我們將這一見解用于我們所熟悉的塞達卡的一個特定案例：哈姆扎和他經常的雇主哈吉·卡迪爾的關系。哈姆扎知道，哈吉·卡迪爾處在給他提供工作或預支未來工資的地位。他還知道，哈吉·卡迪爾和同他類似的人總是把此類行動描述為幫助或援助。哈姆扎進而利用這一點來追求他的具體目標；他使用所有的尊重和禮貌的恰當語言形式接近哈吉·卡迪爾，并且要求他的“幫助”和“援助”[[467]](#_467_11)。換句話說，他訴諸于自利的表述，那也是哈吉·卡迪爾對其自身行為的描述，從而將這些行動置于最有利的位置。我們對哈姆扎有足夠的了解，因而多少可以獲知他內心的真正想法究竟是什么。如果他贏了，他會實現自己要求的目標（工作或者一筆貸款），并且在此過程中，他有意無意中加強了對自己策略性地使用的原則的公共合理性。在此類細微的事物中究竟是誰在操縱誰，并不是能夠簡單確定的。或許，最好將其視為一種委婉象征的互惠性的操縱。

稍后我會回到這個主題，但現階段認識到在塞達卡激發階級關系的關鍵象征——慷慨、吝嗇、傲慢、謙恭、幫忙、協助以及富裕和貧窮——并未建立起一套行動者可簡單遵循的既定的規則或原則就已經足夠了。相反，這些只是規范性的原材料，它們為人們的日常行動所創造、保持、改變和操縱。我在此處進行的關于圍繞著富人與窮人關系的規范的討論非常類似于布迪厄在“親屬制度”和“親屬關系”之間所做的區分，前者被視為一個應該遵循的“封閉的、緊密的純粹邏輯關系”，而后者則是實際的社會行動者的實踐活動：

簡而言之，考慮到經濟決定因素以及相關的近乎完善的內在聯系，結構主義傳統或多或少地將完全的自主性歸諸于親屬的邏輯關系，而事實上只有通過并且為了正式與非正式的使用，它們才能在實踐中存在，這些參與其中在其正常運作中保持它們并使其有效運作的行動者——經由不斷地使用——更加容易在一定程度上實際地或潛在地實現其不可缺少的功能，或者用更明確的說法，它們的確或者能夠滿足至關重要的物質與象征的利益。[[468]](#_468_11)

就親屬關系來說，對階級關系的意識形態進行社會分析的目標并非要對商定的規范達成共識，而是理解那些規范的制定和實施會因階級利益的不同存在很大差異。因而，不足為奇的是，我們看到了塞達卡的窮人不斷地致力于維持、強化和確認關于誰是富人、誰是窮人以及他們應該如何針對彼此而行動的看法。他們關于何謂得體行為的看法、他們的流言蜚語、他們對于“事實”的描述、他們對于綽號的使用、他們對于伊斯蘭義務的看法、他們的罷工和聯合抵抗、他們對于習俗性做法的選擇性使用，都服從于滿足他們物質和象征利益的規范性見解。正如現實中所發生的，由于生產關系的轉變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對他們的不利，他們發現自己正在捍衛大量的早先的慣例。

就富裕村民而言，他們同樣利用所有規范話語的彈性來最有利地表達他們自身、他們的權利主張和他們的利益。然而，我們已經看到，他們的問題略有不同。他們無法簡單地否認舊有慣例及其背后的規范性預設，但他們同樣不愿意放棄遵循慣例所要損失的利益。因而，他們很大程度上被推入一種“事實”的建構中，即他們可以聲稱原有的慣例已不再適用。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他們堅稱收入上的差距是微不足道的，宣稱這里所有人都在大致相同的立足點上種植水稻，并且斷言那些明顯貧窮的人的行為在道德上不具備獲得任何同情照顧的資格。

富人的意識形態地位有兩個方面值得特別注意。首先，盡管它很少受到公開的挑戰，但我們從窮人不留心作出的嘲弄性解釋中可以得知，他們認為其沒有說服力——更不用說具有霸權了。其次，同樣重要的是，事實上富人從不公開否認富人應該考慮窮人的需要這一原則——而是爭論事實以及它們對特定情形的適用性——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意味著，他們自己不經意地“促進了——完全正式的——規范的保持”。[[469]](#_469_11)

從一個更大的視角來看，塞達卡富裕農民的意識形態困境源于這樣的事實，即他們的經濟行為日益建立在新的市場機會的邏輯上，而同時他們的社會權威依然建立在傳統的支配形式上。因而，他們面臨著轉向更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的經典性意識形態矛盾。[[470]](#_470_11)在新的生產關系占支配地位的情況下，財富的社會性使用隨之減少，進而無產階級的社會權威就相應地衰落。

此過程的直接結果就是與占統治地位的巫統結盟的大農場主和地主喪失了他們對于窮人的社會控制。過去，巫統對鄉村的政治控制直接建立在較富有的家庭能夠以經濟依賴關系，特別是租佃和雇傭關系來實施的對小土地所有者的社會控制之上。對巫統而言，依靠占比例較大的較富有的村民已經足夠了；這樣，在經濟上依附于他們的村民自然也就被拉攏過來。隨著對生產關系的“有機”依賴被拆解，隨著利益不斷地與對較貧窮村民的社會控制相脫離，地方權威的這些經濟網絡變得愈加脆弱。它們并未隨之消失，但數量日減，益發不可靠。而且，那些依然保留下來的經濟依賴關系現在日益緊密地被非個人化的市場力量——例如，現金工資制、契約租賃、全額且固定的經濟地租——所組織，以致就系統化的社會從屬而言產出愈少。

在此背景下值得指出的是，穆達地區稻田的不公平分配就其本身而言從來都不具合理性。畢竟，該地區大多數大片的土地都是通過抵押和其他精明的交易獲得的，這些交易則是利用了小土地所有者周期性的貧困。正如哈吉·布魯姆的故事充分表明的，富有的土地所有者的特權地位帶來的社會權威（與控制相對）的程度，只是建立在他們的財產滿足貧窮村民對于租佃權、工作和救助的實際需求的程度上。[[471]](#_471_11)我正在強調的社會控制同財產的社會使用的聯系，或許最好地體現在自稱的慈善的例證中——扎卡特禮物、施舍禮物、偶爾的貸款和施舍。此類行動同時起到符號化和確認現存社會等級的作用。由于其非同尋常的可區別性和任意性，它們還用于挑選出“應受獎賞的”窮人給予優惠待遇，從而加強他們——至少公開地——對于從屬規范的順從。[[472]](#_472_11)一旦此類慈善背后的策略理性喪失其經濟和政治力量，社會控制的主要元素也會失去。因此，許多村民為了自己的生計都開始極力“放縱”，并且，這正是富有農場主極力要加以合理化的。這種“自由”的結果給窮人帶來經濟痛苦，而為富人帶來財政回報。但是，它們也瓦解了有產階級的社會統治基礎。

這并不意味著村里的大農場主喪失了對地方事務的控制，更不必擔心他們會面對叛亂的農民。然而，已經發生的是他們的統治基礎已經改變了。曾經嵌于生產關系的原本依附性的控制，現在更多地基于法律、財產、政治強制、市場力量和政治資助。為了保證他們的信譽和投入，為了他們資助資源的提供，以及為了確保他們對于稀缺的土地和資本的持續控制的根本勢力，他們使得自己越來越依賴于國家。利益的紐帶現在不可避免地將這個階級與國家綁在一起，而這些紐帶當然意味著，其成員在面對任何可能危及其權力和影響的事件（例如持續的不景氣或重大的政治變革）時，變得越來越脆弱。頗具諷刺意味卻又完全符合邏輯的是，這個階級一直如此放心地與國家相結合，恰恰在此時，他們自身對于從屬階級的自發控制正在迅速地削弱。缺少了從早期的生產關系中生成的經濟控制，缺少了令人信服的嵌于現實的習俗中的意識形態位置，這些精英在依靠國家所能配置的資助、利益和控制資源的基礎上，也就只能孤身奮戰、自主沉浮了。

假使穆達地區鄉村人口中最貧窮的階層不再是稻谷生產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假使他們在剩余分配的過程中不再必要，人們有理由提問：為何富有農場主還要不厭其煩地證明他們新的行為模式的正當性？為何還要對那些與農業制度幾乎無關的人證明農業制度的合理？這里有兩個密切相關的說法。其一，為富裕農場主的新行為提供的理由實際上相當草率、粗淺并且容易識破。它們無論如何很難讓那些處于不利地位的人信服。其次，富有農場主自己也是早期農業制度以及支撐這一制度的規范化觀念的產物；如果他們選擇用自己最為熟悉的范疇理解和解釋新的安排，我們就不應該大驚小怪。

然而，人們可能想到，即使意識形態霸權作為稻作農業中日常生產關系的一部分變得越來越不必要，但它對于國家本身的剩余分配卻舉足輕重。我確信，甚至這個推斷對于1900年以來任何時期的稻谷產區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錯誤的。關于馬來半島的殖民地和獨立國家的最值得注意的事就是，它們對取自于稻谷耕作者的系統占有的依賴是如此之少。稻田的稅收總是最小限度的，而且當地的生產價格通常高于世界市場價格。即使在殖民時代早期，吉打州的財政歲入的大部分來源都不是鄉村收入。例如，1918年和1919年，鴉片和賭博專營的“包稅制”提供了地方歲入的主要來源。[[473]](#_473_11)國家從穆達平原的農民那里一直以來需求的并且以后也會需求的是價格合理的作為商品稻米的剩余部分，這些大米可以用來養活礦場、種植園和當時城市地區的工業勞動力。穆達地區絕大多數的小土地所有者現在而且一直與這一目標基本無關。我們只需回想一下，穆達地區大部分（大概3/4）在市場上銷售的稻谷是由少數（11%）耕種面積超過10里郎土地的耕作者出售的。剩余部分當然在很大程度上不需要窮人勞動力來生產。并且這一勞動力并不被其他地方所需要。最近的估算表明，目前在種植園和城市中的現存勞動力的自然增長，將大大超過這些領域可預期未來的人力需求。[[474]](#_474_11)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在穆達地區，占農村人口2/3的最為貧困的那部分人，現在已經基本上與生產或占有過程不相關了，無論對富裕農民還是對國家而言都是如此。

地方精英和國家為證明其統治不斷地進行意識形態的努力，如果我們想理解他們這樣做的理由，只看稻作農業地區的生產關系是徒勞的，因而我們必須關注政治領域。在這樣一個多元化、開放的、外向型經濟中，國家收入主要取自于進出口稅、公司收入稅、執照、特許、消費稅和貸款。如果保守的馬來精英要繼續從經濟與國家所提供的特權和機會中獲利，作為基本的前提條件，就必須保持其對所在州的政治統治。在現行的半競爭性選舉體制中，達到這一目標要求大多數馬來選民的政治支持。[[475]](#_475_11)馬來人口占最大多數的吉打州和吉蘭丹州恰恰也是水稻主產地區，它們的政治支持是必要的。在此背景下，就不難理解國家在發展計劃、撥款、診所、學校、貸款和基礎建設等領域中所做的許多努力，都是著眼于政治支持的最大化的。甚至可以說，正是國家和執政黨以向農村地區發放補貼的方式，在目前承擔了將統治委婉化的任務。這一委婉化的實現當然是以富裕的、擁有土地的當地巫統精英為中介的。在任何事件中，對稻作農民的政治控制本身都不是目的，也不是證明直接占有方式正當性的手段。政治控制是占有的基本前提條件，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

## 重新思考霸權概念

我們對于塞達卡階級關系的考察相當有力地表明，和意識形態統治相關的霸權概念值得從根本上進行重新思考。我希望說明的是，此類重新思考不僅是在這一分析中所涉及的70個家庭的情境所需要的，而且也是在普遍意義上分析從屬階級所需要的。

此處使用的霸權概念當然是來自杰出的意大利斗士、學者安東尼奧·葛蘭西的著作。[[476]](#_476_11)自從他的獄中札記變得廣為人知以后，大批有影響力的修正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學者（其中包括阿爾都塞、米里班、普蘭查斯、哈貝馬斯以及馬爾庫塞）都曾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使用過這一概念。這一分析傳統可溯源至馬克思、恩格斯所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著名篇章。其詳細內容如下：

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資料，因此，那些沒有精神生產資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統治階級支配的。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不過是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在觀念上的表現，不過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因而，這就是那些使一個階級成為統治階級的各種關系的表現，因而這也就是這個階級的統治的思想。此外，構成統治階級的各個個人也都具有意識，因而他們也思維；既然他們正是作為一個階級而進行統治，并且決定著某一歷史時代的整個面貌，不言而喻，他們在這個歷史時代的一切領域中也會這樣做，就是說，他們還作為思維著的人，作為思想的生產者而進行統治，他們調節著自己時代的思想的生產和分配；而這就意味著他們的思想是一個時代的占統治地位的思想。[[477]](#_477_11)

霸權只不過是葛蘭西賦予意識形態支配過程的一個名稱。其背后的核心概念是統治階級不僅要支配物質生產方式，也要支配象征生產方式的要求。從觀念層面上看，其對物質生產力的控制與其對社會的意識形態“部門”——文化、宗教、教育和媒體——的控制相同，使之可以傳播那些可以強化其位置的價值觀。簡而言之，葛蘭西所做的就是解釋虛假意識的制度基礎。

我要說明的是，取得從屬階級的認同和被動順從，是比制裁和強迫更為有效的階級統治方式，這才是霸權的關鍵意涵。當然，霸權可能被用于指涉社會統治的全部綜合。然而，此處是在其象征意義或者說理想意義上使用這一術語的，因為這恰恰是葛蘭西對于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主要貢獻之所在。事實上，通常情況下，正是意識形態霸權的普遍性、深入性確保了社會和平，并將政府的強制性機器推至后臺。唯有“當預期到危機將至、自發性認同失去效用時，國家才會公開訴諸暴力”[[478]](#_478_11)。

嚴格說來，即使詳細解讀葛蘭西的觀點，這種霸權的自發性和完整性究竟怎樣仍不完全明晰[[479]](#_479_11)。有時，他似乎暗示霸權包含了對統治集團的合法性和優越性的主動認可；有時，他又暗示這種認可是一種更為消極的行動，在這種行動中，社會秩序的主要特質僅僅由于已被給定而被接受。然而，葛蘭西的確敏銳地指出了思想和行動之間的區別。[[480]](#_480_11)例如，工人保衛其物質利益的具體行動可能代表一種激進的意識，但在思想層面——即霸權起作用的層面——由上層決定的、為社會認可的價值和觀念的土壤會破壞掉這種初始的激進意識。費米亞寫道，這一阻礙意味著“如果西方國家的大眾僅僅采用自己的策略，他們是無力克服自身的知識和道德從屬地位的……漫長而艱險的去神秘化歷程需要借助外在的力量”[[481]](#_481_11)。因此，革命性政黨的功能是給工人階級提供其自身無法生產的概念工具和“批判意識”。只有這樣的政黨才能夠打破資產階級霸權，并用自身的霸權取而代之；葛蘭西堅持認為，這一新霸權并非革命的后果，而是真正的革命的前提。[[482]](#_482_11)

當然，為了解釋為何《資本論》所述的資本主義物質矛盾并未在工業化的民主社會中引發社會主義革命，葛蘭西和其他20世紀的馬克思主義者在很大程度上推進了他們對意識形態統治的分析。正是資本主義顯而易見的持久生命力迫使他們將關注的焦點轉移至意識形態和“上層建筑”。這一關注點在很多方面都頗受歡迎并具有指導意義。首先，它避免了經濟決定論的極端形式的弊病，并且賦予廣義上的意識形態領域一定程度的自主性。文化、價值觀和意識形態不能直接被解讀為客觀的、物質性的條件，畢竟，霸權和虛假意識這兩個術語就是對這一觀點的明確認可。[[483]](#_483_11)但是，在為意識形態統治本身的分析開辟延誤已久的空間的過程中，在我看來，葛蘭西的許多繼承者用某種意識形態決定論取代了他們試圖規避的物質決定論。令人好奇的是，葛蘭西自己的著作則較少招致這種指責，而那些追隨這一傳統的人（例如，米里班和阿爾都塞）的更為純粹的、理論上的精雕細琢之作卻引發了更多此類的批評。[[484]](#_484_11)

下面，我希望對霸權的觀念和與之相關的虛假意識、神秘化以及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等概念加以說明，它們不僅無法幫助我們理解塞達卡的階級關系，而且恰恰可能嚴重誤導我們對大多數情境中階級沖突的理解。[[485]](#_485_11)接下來，我將相當簡要地概括我還會展開詳盡論述的內容的要點，這將有助于安排隨后的討論：

首先，霸權概念忽略了大多數從屬階級能夠在其日常物質經驗的基礎上對主流意識形態進行洞察和去神秘化的程度。

第二，霸權理論經常混淆何為不可避免的與何為正當的區別，這種錯誤從屬階級是很少會犯的。這種結論出自對負載權力情境中公開行動的表面觀察，既忽視了“隱藏的文本”，也沒有看到常規的必要性和對于“經濟關系壓力”和壓迫現實的實用性服從。

第三，根據定義，一種霸權的意識形態必然表現為一種理想狀態，因而不可避免地造成矛盾，它可以被用來對自身進行批判。群眾激進主義的意識形態來源在此意義上既可以在現行意識形態秩序的內部尋找，也可以在其外部尋找。

第四，對幾乎任何明顯的革命群眾運動的普遍參與者的歷史考察都表明，目標的確定通常是有限的，而且多帶有改革色彩，盡管為達到目標所采取的方式可能是革命性的。因而，“工團意識”并非如列寧所稱是革命的主要障礙，而是其唯一可能的基礎。

第五，歷史地看，一種支配性意識形態的規范與價值體系的崩潰，典型地是新的生產方式承載者——例如資產階級——的任務，而不是從屬階級如農民和工人的任務。因此，從屬階級經常被視為向后看的，因為他們要維護他們自己對早期主流意識形態的解釋以對抗由精英和/或國家所強加的新的和痛苦的安排。

洞悉[[486]](#_486_11)

假使在塞達卡存在一個支配性的霸權意識形態，那么，它會通過不同途徑讓人們知曉自己的存在。至少，它要求農業精英的信仰和價值體系能夠滲透并主宰窮人的世界觀，使之產生對本質上并不是服務于他們客觀利益的農業秩序的同意和贊許。這一主流意識形態的功能在于掩蓋或誤傳我們已經考察過的階級利益的真正沖突，從而對窮人加以有效地利用，使之成為犧牲自身利益的共謀者。

我們從塞達卡較貧窮農民那里聽到的描述，的確足以立即駁斥人們對他們的意識形態狀況特點的概括。如果這里存在任何需要說明的洞悉，那么，同精英信仰對窮人的洞悉相比，窮人有著更強的洞察能力，這就是他們對富裕農場主、地主以及外界官員所表現出的自私自利圖景的幾乎每一個細節的洞察。當然，窮人要求的權利及主張都是雙耕之前盛行的。或許，在此意義上，他們大多訴諸以前的/既有的意識形態秩序。我將在稍后討論這一話題，但在此我應該立刻指出的是，他們的這種訴求是基于自身的物質利益的，而富人用他們自己的方式贊同同樣的價值體系，盡管他們的經濟行為現在更多地因循了資本主義的路徑。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恰恰是塞達卡的富人不再認同這種意識形態，而這種意識形態將最有利于解釋他們如何行動并且為那些行動提供似乎很有道理的依據。

有充分的理由假定，塞達卡的窮人對于“官方”現實的有效洞察并非獨一無二或為數極少，而是極為常見。認為塞達卡的農民階級具有特殊的洞察能力，這顯然是高估了任何主流意識形態的力量、分量以及凝聚力。這里我完全同意保羅·威利斯對阿爾都塞極富洞見的批評：

結構主義的再生產理論認為主流意識形態（其中包含文化）是難以穿透的。一切都巧妙契合。意識形態總是先于任何真實的批評而存在并且優先于這種批評。彈子游戲的彈珠如果要平滑運行就不能有裂縫。所有具體的矛盾都被普遍的意識形態再生產功能抹平了……相反，我更為樂觀地認為……社會和文化再生產內部存在很深的官能障礙和強烈的張力。社會行動者并非意識形態的被動承載者，而是意識形態的主動使用者，他們只是通過斗爭、爭論和部分地洞察那些結構來再生產現存的結構。[[487]](#_487_11)

因為官方的陳詞濫調不可能具有人們通常設想的連貫性或統一性，并且由于處于不同社會地位的行動者對其又會作不同的解讀，因此，從屬階級對于任何官方陳詞濫調的洞悉都是值得期待的。反過來，這些多種多樣的理解根植于日常經驗。這類陳詞濫調并未作為空洞的象征信息而被接受，而是在為保衛物質利益而進行持續斗爭的情境中被賦予了意義。[[488]](#_488_11)

任何政治或宗教信仰體系的從上向下發送的過程都是重新解釋的過程，它調和了先在的信仰，被洞察又發生轉變，這是分層社會的共有特征。在此意義上，人們可以在一個農業社會中談論“民間”社會主義、“民間”民族主義和“民間”共產主義，如同談論民間宗教那樣。如果設想一下在奴隸當中所信仰和實踐的基督教形式同奴隸主所信仰和傳授的基督教形式分歧甚大，我們就不必驚訝佃農持有的對家長式統治的理解同地主對家長式統治的理解完全不同。[[489]](#_489_11)這些外在于農民階級而形成的信仰體系的原則被改變，這些原則是多種多樣的，但非常明確的是，在很大程度上，這些原則被接受它們的階級根據自身的物質和象征利益重新解釋了。當看到離經叛道的解釋——意識形態異端——源自于從屬階級時（根據定義，這些從屬階級在官方的現實描述中最無關緊要），也就不足為奇了。[[490]](#_490_11)

人們或許可以將此邏輯推進一步并且像某些人一樣提出主張：從屬階級的規范性合作并不是“社會秩序的必然要求”[[491]](#_491_9)。阿伯克龍比及其合作者在他們對“主流意識形態理論”的一般性批評中令人信服地證明，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都未能成功地將主流意識形態內化于從屬階級之中。他們將這一失敗解釋為社會化機制（反抗強度的另一名稱？）的弱點以及其他強制形式（包括導致我們早先稱之為“常規性順從”的壓迫）的效力。從這一角度來看，主流意識形態的功能可能主要在于確保統治階級的凝聚力。與此同時，從屬階級的順從則基本上源于他們這樣的認知：所有其他路線都是不切實際的、危險的或者兩者皆具。

如果此邏輯適用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那么它當然更適用于早期資本主義的工人階級和第三世界的農民階級。這是因為霸權的制度化基礎——如學校、媒體——在晚期資本主義有更加深厚的根基，并且可能因此而更為有效[[492]](#_492_9)。相反，依據多數資料記載，早期工人階級事實上在幾乎所有方面都是外在于資本主義制度框架的，只有在工作方面除外。正如恩格斯在其對19世紀英國工人階級的研究中所觀察到的：

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講話方式不同，擁有不同的思想和觀念、不同的習俗和道德準則以及不同的宗教信仰和政治理念。因此他們是兩個存在根本差異的族群，就像種族所造成的差別一樣。[[493]](#_493_9)

農民階級則更加遠離了象征性權力的制度圈子。他們居住在霸權機構駐扎的城市以外，主要依據口頭傳統行事，這使之與印刷傳媒也相對疏離。作為一個有著自身文化傳統和反抗模式的古老階級（與無產階級不同），作為擁有自身的影子制度（如非正式的宗教學校、儀式和節日）的階級，農民階級較少受到霸權行為的影響。貧窮農民的物質和象征利益很可能使其質疑主流的意識形態，而正是這些主流意識形態將對農民階級的物質剝奪和小農低下的地位合理化。當我們意識到這一事實后，我們就能夠理解為何他們會拒絕“象征性合作”了。

在塞達卡的個案中，窮人可以洞悉官方現實這一事實顯而易見，這有理由讓人提出疑問：在其他類似的情境下它為何沒能引起人們的注意呢？然而，如果人們只觀察到富人和窮人之間的公開遭遇（“部分的文本”）而完全忽視表層之下的含沙射影，忽視了對權力關系情景之外的問題的討論，忽視了每天都在發生的匿名的、不聲不響的常規性的實際反抗行動，那么這個問題就會隨之被忽略掉[[494]](#_494_9)。因為，在幾乎所有負載權力的情境下，支持官方現實正是為了維護大多數貧窮村民的直接利益。因此，如果僅僅采用部分的文本，則會造成神秘化的印象。但是，我們可能會犯這樣的錯誤，即沒有意識到神秘化和印象管理既是無權者的一種姿態也是富有者的意識形態統治方式。當葛蘭西宣稱從屬階級的激進主義更多地存在于其行動而非信仰時，我確信他是被誤導了。事實幾乎完全相反，行動領域——特別是在負載權力的情境下——正是被統治階級最受制約之地。而恰恰是在信仰和解釋層面——在這個層面他們可以安全地冒險——從屬階級才最少受到束縛。塞達卡的富人往往堅持公開行動的一致性并且做到了這一點；他們可以不堅持私人的意識形態一致，他們也不需要那樣做。[[495]](#_495_9)

必然性、順化與公正

還有一個更加深奧且影響深遠的有關神秘化和虛假意識的論點，該論點并不依賴于假定統治階級具有將其自身的信仰強加給從屬階級的能力。如果霸權思想暗示的是上層秩序對下層秩序的強加，那么，考慮到情境的影響，這第二個立場就暗示著神秘化至少有幾分是從屬階級自己選擇的行為。簡言之，我的論點是：一個社會統治的體系往往看起來是不可避免的。而一旦它被認為是不可避免的，按照這一邏輯，即使是那些因這一體系而處于劣勢的人也會傾向于承認這一體系的自然性，進而也會傾向于認為，凡是自然的就是正當的或合理的。人們可以在理查德·霍格特有關英國工人階級文化的細致分析中發現對上述立場最有限的陳述——一個省略了最后一步并且謹慎地避免將自然等同于合理的陳述：

當人們感到無力應付他們所處情境中的主要問題時，當人們感到已經沒有必要失望、絕望或怨恨時，當人們認為一切只是生活的現實時，他們就會采取在現實的陰影下得過且過的態度來面對他們所處的情境，即一種對更大的環境沒有持續感和緊迫感的生活。這種態度將情境中的主要因素歸結為既有的和現實的自然法則領域，這一領域是維持生計的幾乎無可替代的物質資料來源。就其最消極的層次來說，諸如此類的態度是一種宿命論或簡單地承受，它們通常都處于悲慘的境地；它們極其缺少可以征用的選擇。[[496]](#_496_9)

巴靈頓·摩爾更為一般地關注系統性從屬的歷史模式，他毫不遲疑地邁出了將必然性與正當性、合理性聯系在一起的最后一步：

所有這些人都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程度上感到了他們苦難的不可避免。對某些受害者來說，這樣的苦難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是必然的與合理的。人們顯然傾向于將合理性賦予那些本來是或者看上去是不可避免的事物，無論它讓人們感到多么痛苦。否則，這樣的苦難將是無法忍受的。[[497]](#_497_9)

皮文和科洛沃德在他們關于美國窮人運動的研究中回應了摩爾的判斷：

不管他們的命運何等艱難，人們通常會保持沉默，遵從其共同體日常生活的慣有模式，并且確信這些模式不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正當的。[[498]](#_498_9)

上述內容看上去類似于不可避免的“順化”——持續存在的“經濟關系的無聲壓力”的具體化。[[499]](#_499_9)因而，布迪厄將此信仰表述為“不可思議的”，稱社會“行動者”的傾向是“將不得不做的當成是主動做的”，也就是說，“拒絕那些無論如何不被接受的，喜歡那些不可避免的”[[500]](#_500_9)。

除了隨后我將再次談論的極其稀少和特殊的情況外，我確信所有這些同神秘化有密切關聯的論點都是誤導性的或錯誤的——或兩者兼具。首先，它們沒有為從不可避免轉為正當這一過程提供任何令人信服的邏輯。其次，它們忽視了必然性概念本身可能而且實際上也被從屬階級的歷史性實踐加以否定的多種方式。下面我將依次討論每一個論點。

有關這一虛假意識的特殊形式的論點，看似具有內在的合理性，這一合理性有賴于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大多數從屬階級生存于其中的分層體系的更大范圍必定是看似必然的因而也就是自然的。照此推論，19世紀印度的賤民、13世紀法國的農奴甚或是今日塞達卡的佃農，要嚴肅地思考提升自身的基礎地位的可能性，都是不太可能的，更不用提生活在一個沒有種姓制度、領主或地主的世界中的可能性了。即使他們能夠，他們也不可能投入太多時間或思想來考慮這些看起來完全被排除在現實目標之外的可能性。如我所理解的那樣，這種觀點要求我們相信，從屬階級應該像農民看待天氣那樣來看待宏大的統治架構。如果為了討論問題，我們可以接受這一類比。但是僅僅基于這一點，完全無法解釋為什么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命中注定的天氣就應該被認為是正當的或是合理的。因此，假定正當或合理概念同既有的不可避免的東西——比如天氣——完全不相干則看上去更為可信。我們沒有任何邏輯上的依據把正當與不可避免性視為同一事物；由于缺乏進一步的證明，我們只能將所有的不可避免都作為不過是必然的而已。事實上，天氣的類比在另一層面上看頗具啟發性。天氣的不可避免性并未阻止任何一個傳統的耕作者群體將天氣這種自然力量擬人化，或者發展出儀式來影響其進程，或者，當他們的努力失敗時則咒罵自己的命運不濟。因此，在歷史上，農民階級非但沒有將天氣視為必然范疇，甚至認為天氣應該服從于人類的操縱。如果說傳統社會中存在對自然規律的“神秘化”，那也是朝著將其置于人類控制之下的方向發展，而不是相反。[[501]](#_501_9)

稍后我還將回到對必然性的批判上來，但首先值得考慮的是，為什么必然性與正當性如此經常地發生混淆。當然，表象幾乎總是證實不可避免事物的正當性。即使從屬階級的成員已經意識到他們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謀取生計的日常壓力和公開挑戰的風險通常都足以系統地使這類民族志記錄偏離其原有方向——有關即使不是接受，也是不可避免的順從的記錄。然而，此處對看似不可避免的東西的順從，仍然不等于賦予其合理性，盡管合理性可能恰好有效地幫助制造了日常生活中的順從。當人們面對短期內無法從根本上改變的情境時，某種特定姿態的順從是完全有可能的。當塞達卡的窮人談到聯合收割機并且說，“你抗議不抗議都沒用，不會有什么結果”時，他們只是在表達一種有關他們正在體驗的情境的現實的、務實的觀點。他們曾試圖阻止聯合收割機的使用，但失敗了。他們的確必須接受這樣的結果，但這并不代表他們贊同這一結果。在這方面，他們的處境同大多數情況下的大多數從屬階級并無區別。除了當一種政治開放或一個革命情境創造了新的可能性或復興了舊的渴望時，大多數情況下務實的順從態度都會占上風。[[502]](#_502_9)

當然，順從可能出于不情愿的依從，也可能出于積極的意識形態支持。然而，我們應該了解，即使看似最明顯的忠實的順從也不等同于對意識形態的支持。為了驗證意識形態支持即霸權是否存在，我們需要提供獨立的證據加以證明：從屬階級的價值觀的確在很大程度上同統治精英的價值觀是相符的。為了可靠，這樣的證據必須出自于從屬階級成員最少受到權力關系制約的社會情境中。

那些即使在著眼于權力制約最小化前提下收集到的民族志記錄，也可能被曲解為人們的表面順從，這個問題還有另一個原因，那就是這些記錄總是指向日常生活并且很少包含對看起來力所不及的選擇的討論。[[503]](#_503_9)例如，塞達卡的小土地所有者并不談論土地改革。然而，當我和他們提及這個話題時，他們幾乎一致地充滿熱情，如同人們期盼的那樣，這通常表明10里郎稻田足以讓富人過上舒適的生活。但土地改革并不是一個自發產生的話題，它只是一個純粹的學術問題；它從未被任何熟悉它的政黨提出，也未被農業官員提出。相反，他們的注意力更為現實地集中在保持現有土地所有制下合理的租佃權的可能性上。[[504]](#_504_9)無論土地改革如何值得向往，在現有的環境下那都是一個不切實際的目標。

從更為適當的角度來考察有關霸權的各個方面，我們或許可以這樣說：一個統治體系的主要功能在于界定什么是現實的什么不是現實的，并且將某些目標和渴望歸入決無可能、白日做夢、癡心妄想的范圍。由于這一統治體系意識到權力對于界定何為現實的至關重要的影響，因而關于這一霸權的有限建構肯定有許多內容可說。然而，如果我們采納這個看上去更為合理的霸權概念，那么至少需要兩個限定條件。首先，我們不再提及正當性與合理性，而只會談到對既有情境中什么是可行的或多或少的理性理解。第二，更加重要的是，這一觀點毫無疑問是靜態的觀點，因為它從我們的分析中系統地排除了新環境下可能的領域如何擴展。[[505]](#_505_9)塞達卡的窮人目前并不把土地改革看成是現實的選擇，這一點確定無疑。同樣真實的是他們對當下不公平的看法、他們對大土地所有者的怨恨以及他們不被關注的苦痛都強有力地表明，如果土地改革真的成為歷史性的選擇，他們很可能成為土地改革的熱心支持者。今天看起來不過是無價值的思索，明天很可能會變成一個現實的目標，并且我們應該根據農民階級對于他們身處其中的社會秩序的全面評價來推測他們可能的反應，而不是從他們現在認為是可能的東西中推測他們的反應。[[506]](#_506_9)例如，人們不會想到可以從1788年法國農民的談話當中發現他們將在1789年上演洗劫城堡的行動，人們同樣不會想到俄國農民會在1916年討論他們將在下一年實施奪取土地的行動。然而，人們多半會發現的是，農民對于貴族統治和土地權利的態度與他們隨后的行動是完全一致的。

我們已經說明，務實性的服從和來自階級話語的不可信目標的相對缺乏可能模擬了霸權的效果，仍需考慮的一個最終的問題是，如何將必然性和霸權連接起來。這正是巴靈頓·摩爾在納粹集中營的記錄和較小范圍內印度種姓制度記錄的基礎上所研究的問題。他認為，存在這樣一種情境，在此情境下壓迫被如此總體性地和普遍地實行，以至于對無權者來說作出姿態通常是必要的——諂媚、恭順等等——這表現出從屬群體的全部現實和完整文本。“人們很難在尚未習得與角色相符的特征的情況下持續地戴一個面具或扮演一個角色”，他在指出這一點的同時提出了疑問：如果實際上人們必須時刻戴著面具那又會怎樣。[[507]](#_507_9)他指出，當人們在必須的領域中耗盡所有的行動時，合理性和公正性的問題就幾乎不在他們的考慮之列了。此種極端情形，很可能如同摩爾所表明的那樣，某些受害者確實認同了其壓迫者并且復制他們的行為和他們的價值觀。[[508]](#_508_9)但是我的目的在于說明，恰恰是為實現該目標所要求的極端性使它成為證明這一統治的例外。像大多數極權制度一樣，納粹集中營系統地著手破壞獨立的社會生活的每一絲殘余。受害者在被屠殺之前被剝奪了全部財產和家庭，他們工作至精疲力竭，他們營養不良乃至餓死，他們遭受了系統的和反復無常的殘酷虐待，與此同時，他們清醒時的每一刻都受到衛兵控制。納粹分子不遺余力地破壞所有的非正式團結網絡和使囚犯徹底地原子化。事實上自殺是留給囚犯的唯一自主的選擇。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極端性并沒有生產出某種“對壓迫者的認同”，而是僅有“一些集中營的居住者接受了其壓迫者的道德權威”。[[509]](#_509_9)

在此背景下，人們可能會對不同的壓迫形式進行比較，其依據就是它們允許受害者對其自主的社會存在進行偽裝的程度。據此標準，集中營是一個極端的例子，緊隨其后的或許是精神病院以及民事的和軍事的監獄。在此，人們可能會以為原子化和近乎總體性的控制可以造成一個邪惡的道德權威。[[510]](#_510_9)然而，事實是所有“常規性”的和歷史上普通的社會從屬與剝削模式——奴隸制、農奴制、佃農制甚或是雇用勞動——和集中營相比都不相同，在這些模式中，其“受害者”都保持了相當的自主性來建構一種不被統治階級完全控制的生活和文化。[[511]](#_511_9)換句話說，對所有這些群體而言，在一些情境下，他們可能摘掉自己巴結奉承、恭順及象征性服從的面具。這種相對“安全”的話語的領域雖然十分狹窄，卻是發展出象征性反抗的必要條件。在象征性反抗這一社會空間中，由統治強加的定義和表演不再是主流。[[512]](#_512_9)此外，這一社會空間不僅是由縱向權力關系的缺失來確定的，也是由那些處境相同的其他人所施加的約束和影響的存在來確定的。[[513]](#_513_9)因此，當帕克·亞赫按他的步驟將另外一些屬于伊斯蘭教黨的勞動者和小土地所有者集中起來時，人們聽到的話語不僅會不同于巴塞爾或哈吉·卡迪爾在場時人們可能聽到的話語，而且由于集中起來的人都是窮人并且都反對巫統，因而他們話語的內容也受到這一社會事實的影響。由于這些人還要在大量的小恩小惠和交易中彼此依賴這一事實，上述影響就愈發強烈；盡管他們之間的關系更接近于互惠與平衡，權力關系在此依然存在。如果說統治行使的創新和維持有賴于一定的社會背景，那么，反抗的行使也是如此。[[514]](#_514_9)

當然，甚至在“沒有面具的”情境中發現的話語在大多數或全部特性上符合統治意識形態在理論上是可能的。但每當我們涉及任何更大范圍的社會從屬結構時——該結構不僅總是暗示著勞動的占有，還暗示著將低劣的（即便不是不體面的）地位指派給從屬者——這就是不可能的。因而，有證據表明，印度的賤民等級在可以安全行動的情境中，會拒絕種姓制度賦予他們的大部分污名化的身份[[515]](#_515_9)。基諾維斯和其他一些人的著述表明，在南北戰爭前的南方蓄奴區，人們會遇到一套完全不同于官方主流價值標準的價值觀[[516]](#_516_9)。在《舊約》的文本中可以發現一種對解放與平等的宗教強調，這既是奴隸主的世俗看法，也是奴隸的世俗看法，它為行竊、偷盜、逃跑以及開小差等形式的反抗提供了正當性的辯護。正如基諾維斯所述，并非所有的這些態度都與奴隸制的延續水火不容，但它們是有別于主流意識形態的。一般說來，奴隸區創造的亞文化都是隱藏于奴隸主視線之外的。然而，當烈酒一時沖破奴隸慣有的謹慎小心時，這種亞文化偶爾也闖入公共舞臺。馬林在他關于19世紀弗吉尼亞奴隸制的研究中說道：

醉酒趨向于讓大多數人或是保持沉默、退縮，或是情緒失控、大叫大嚷，但被文化同化了的奴隸在喝醉后與主人交談時——毫無例外地——總是“大膽的”、“固執的”、“魯莽的”、“放肆的”或“狂躁的”。[[517]](#_517_9)

只有在極少數情況下，掩蓋亞文化的幕布才會暫時揭開。其他時候，如果我們想看到相對來說無保留的從屬階級亞文化，我們就必須在亞文化誕生的幕后場所中——即脫離統治階級密切監視那些社會情境中——尋找它。由于從屬階級的亞文化在非正式話語中被遮蔽但仍可覺察的存在狀況，這種亞文化系統地駁斥主流意識形態的可能性就很小。不會有人期望《資本論》誕生于工人階級的酒館，盡管他可能相當了解勞動價值論！只有在出現公開叛亂、追求政治自由或是爆發革命的情況下（這種革命允許亞文化以公共的、制度化的面貌呈現），掩蓋亞文化的幕布才會被揭開。除此之外，從屬群體的亞文化仍將保持為一種不易被覺察的和偽裝的狀態。然而可以確定的是，盡管統治或許是不可避免的社會事實，但它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在無權者可以自由言論的小社會范圍內也不可能具有支配性。

在這一點上，我的論述重點在于：將必然性的可能事實等同于正當與合理的規范是十分危險的，盡管民族志的記錄可能鼓勵這種做法。我還強調了在除了總體性制度以外的任何情境下自主領域的重要性，在這一領域中，盡管精英的價值觀從其實踐上來說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依然會受到挑戰。為了完成這一批判，我需要再次考察必然性這一概念，一個迄今為止我認同的概念。問題并不在于一個既定的統治結構在事實層面是否為不可避免的，因為在那種意義上沒有任何事件的歷史偶然性是不可避免的。問題在于，一個統治制度在何種程度上能夠使那些居于其中并在其統治之下的人們認為這一制度是不可避免的。

首要的問題是詳細確切地說明什么是“不可避免的”。假如不可避免就其全部歷史細節來說意味著一種統治制度，那么非常清楚的是，在此意義上沒有一種制度對其臣民來說是必然的。那些已經建立許久的制度，比如封建制或奴隸制，即使在其全盛時期被看成是不可避免的，以至于那些生活于其中的人們并未一再嘗試并繼而改變其邊界，假如我們如此設想，那就是將沒有根據的“客觀現實”歸于任何社會的秩序。

然而，如果我們將“不可避免”理解為某種統治模式的核心特質，而不僅僅是其細節，那么對于可感知的必然性的論證，就變得可信多了。從某種角度看，這些論證事實上既是不證自明的又是強制性的。對一個13世紀的法國農奴或18世紀的印度賤民來說，我們不能假定他們對除了身處其中的社會以外的任何社會秩序有過體驗，那么除了他們知曉的封建制度和種姓制度，他們怎么可能想象得出任何其他的制度呢？聲稱這些認知局限在原則上消除了任何可能的革命意識，這只不過是一個簡短的邏輯步驟。如果魚兒從不談論水，我們又怎能期待它們去談論空氣呢？讓-保羅·薩特的觀點背后似乎也包含著同樣的邏輯推理：

我們有必要顛覆一般性的觀點并且承認，并非是現有情境的嚴酷性或其所強加的苦難致使人們去構想另一種所有人的境況都會好于現在的情境。只有當有一天我們能夠構想另一種情境時，才會有一束新的光芒投射到我們的困境和苦難之上，于是我們便會認定這些困境和苦難是讓人無法忍受的。[[518]](#_518_9)

我確信，這一立場是完全錯誤的。基于我對種種證據的解讀，事實上以下的觀點更加可信：就意識形態領域而言，沒有任何社會秩序——即使在更寬泛的意義上講——對于其所有臣民而言，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農奴、奴隸或賤民沒有任何有關其他社會秩序的直接的知識或經驗，我確信這一事實并不會成為他們創造所謂的“革命性”思想的障礙。我們沿著這些思路來討論問題，與其說是為了反駁薩特，不如說是為了說明從屬群體顛覆和/或否定主流意識形態的想象力是如此廣泛——即使不是普遍的——以至于它可以被看做從屬群體的標準文化和宗教素養的重要部分。這里我們再一次站在葛蘭西的立場上，從屬階級——特別是農民階級——很可能在意識形態層面比在其行動層面更為激進，這是因為他們在行動層面受到權力的日常行使的更有力的束縛。

反駁必然性的爭論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由于我在別處已經充分闡述過這一點，此處我將僅限于概要性的說明。[[519]](#_519_9)首先要指出的是，即使人們承認農奴、奴隸和賤民很難想象除了封建制、奴隸制或種姓制以外的其他社會安排，但他們能毫無困難地在想象中顛覆他們所處的社會秩序中的地位與酬勞的配置。在許多社會里，這種樸素的想象能力并非只是抽象的：歷史地看，它是嵌于現存的儀式習俗中的。這里只提及少量例證，印度許多地區的克利須那神節、西方和拉美羅馬天主教社會的狂歡節、羅馬社會中的農神節、信奉佛教的東南亞地區形式各異的潑水節、古代社會的酒神崇拜——都包含了相當程度的對地位的顛覆、對順從的常規禮法的破壞以及對現存社會秩序的褻瀆。在某種意義上，這些顛覆性的儀式可以被看做是一種被認可的、可容忍的儀式性努力，其目的就在于暫時緩解由嚴格的等級制帶來的不可避免的緊張。然而，如果只說到此則會忽略這些儀式經常脫離控制的程度和統治精英為了消除或限制它們而做的努力。羅馬天主教會進行了長達數個世紀的運動以清除狂歡節的異教表現，如大眾滑稽表演、享樂主義，并用基督受難劇和更正統的儀式取代它們，便是一個有代表性的例證。

假如顛覆現存的社會秩序并不需要想象力的飛躍，那么它很容易被否認也就不足為奇了。這正是幾乎所有千禧年宗教意識形態所包含的內容，這些意識形態構成了歷史上大部分的大規模農民起義的規范性基礎。此類運動經常同我們以前討論過的顛覆緊密相連，但考慮到它們對于政治控制的實際影響，它們并不像空洞的儀式那樣容易被忽視。我們最好將千禧年和烏托邦意識形態中所包含的激進幻想理解為人們對現存剝削模式和他們正在經歷的地位下降的抗拒。冒著過度概括（overgeneralizing）的危險，人們可以認為，這種自反式象征主義經常暗示著一種充滿手足情誼的社會：那里沒有貧富差別，也沒有等級區分（除了在信徒和非信徒之間）。在那樣的社會中，財產通常是——雖然并非總是——公有的和共享的。有關稅收、租金以及貢賦的不公正要求都將是無效的。想象中的烏托邦可能還包括一個能自行生產的豐饒的大自然，人類特性會發生根本性轉變——貪婪、嫉妒以及仇恨將不復存在。盡管現世的烏托邦是對未來的預期，它往往會回溯到神話中人類開始墮落的伊甸園。我們可以從這些歷史上普通的意識形態中看到宗教象征主義在服務于階級利益過程中的革命性運用，這一點并不夸張。

只有當千禧年和烏托邦思想采取了教派形式或社會運動形式，而且這些形式對國家構成威脅時，它們才會出現在官方檔案中。在這方面，書面記錄既疏忽了普通形式的象征性反抗，又疏忽了日常形式的物質反抗。成為此類教派基礎的先知性傳統可能在很長時期內都保持隱匿狀態和邊緣地位。但正如馬克·布洛赫所觀察到的，這一傳統持續存在并深深地植根于大眾文化之中。布洛赫引用了泰納所稱的“自發性無政府狀態”的法國農民起義案例，這些起義始于821年而持續到“1789年的炎炎夏日”。布洛赫寫道：

但是，這種“無政府狀態”沒有任何新奇之處。那些被誤導的哲學家眼中的新產生的憤怒，實際上僅是長期地方性的傳統現象的再現。就連叛亂所采取的形式（叛亂的形式幾乎總是相同的）也同樣是傳統的：神秘的幻象，福音書的原始平等主義的強大吸引力，它在宗教改革之前就已經控制了卑微的心智。[[520]](#_520_9)

用現代的眼光來看，這些信念必須借助一定的情境才得以發動大眾行動，而這些情境具備革命性危機的全部特質。因而，在歐洲和其他一些地方，當饑荒、瘟疫、戰爭和侵略爆發時，當人們面臨新的沉重稅賦和生存危機時，或是當“傳統的社會紐帶被削弱或破壞、窮人和富人之間的隔閡日益變成鴻溝”[[521]](#_521_9)時，這些都可能成為將人們對千禧年的期待轉化為動員奇跡的背景。當日常生活的常規被打破時，據以理解社會現實的規范性范疇則不再適用。可以說，在為千禧年行動提供社會土壤方面，日常生活的去常規化和物質剝奪看起來幾乎發揮了同樣重要的作用。

人們偶爾會假定千禧年主義是猶太教——基督教世界的先知和預言傳統的特殊產物。但我們在東南亞的佛教地區、伊斯蘭地區和絕大多數信奉基督教的菲律賓人那里發現了類似的宗教傳統。例如，在緬甸，人們堅信一個公正的國王的歸來，他將正確地安排一切事物，與之并存的信仰是人們堅信一個佛教引渡者將會把人們帶入一個佛教的千禧年。在信奉伊斯蘭教的印度尼西亞地區，我們既發現了認為救世主將重現的傳統信仰，也發現了相信一個伊斯蘭征服者將肅清異教徒并重建正義的傳統信仰。對于公正國王重現的信仰，與俄國對于沙皇引渡者重現的信仰一樣，都是代表以往關于神圣王權的保守神話如何能夠在農民階級手中，經由某種象征性的柔道（symbolic jujitsu）而轉化成革命性神話的典型案例。然而，王權本身只是象征性地保留下來，真實的國王和他所代表的社會秩序都已經被否認了。這些東南亞宗教傳統還為不計其數的叛亂奠定了意識形態基礎，這一點不言而喻。[[522]](#_522_9)

千禧年信仰的自相矛盾當然在于，它們總是期待權力、地位和財富的分配——且不說人的本性——發生最為激進的變革，但與此同時又期望這些變遷是以領導者為中心的。事實上，所有此類運動的核心都是一個領袖、一位先知、一個公正的國王、一個救世主，他們將公正處事。與為了具體利益和微小收益而避免直接的象征性沖突的日常反抗形式相比，千禧年信仰是沒有折衷的極端行為[[523]](#_523_9)，它一旦被激發，就打算徹底改變這個世界。同樣地，它反對正統的符號和神話，它在本質上是超地域性的，并且依賴于共同的集體性歷史。

在塞達卡，人們很難談論一個真實的千禧年傳統。然而，有證據表明，宗教預言絕非是完全隱匿的。有四五個村民向我提起過宗教人士所做的預言，這些宗教人士在該地區各種非正式的宗教學校中教學。此類預言通常非常隱晦，并且預報了許多流血事件、對邪惡的懲罰、自然災害（地震、洪水），并常常指出所有這些災難將發生的伊斯蘭年份。偶爾，預言也會以匿名創作的“飛翔信”的形式流傳——這些信據稱寫于中東的伊斯蘭圣地，出于幻覺或夢境的靈感（我接到過一封此類信件，其譯文見附錄D）。1969年，當種族暴亂在幾個馬來西亞城市爆發以后，一種預示著恐怖的氣氛席卷了吉打州的大部分地區。當地的宗教人士、政治家以及那些精通傳統的馬來自衛術的人加入了一個名為紅色綬帶會的組織，這是一個同該國首都的巫統政治家有秘密聯系的團體。其目標在于保護種族和宗教，為此，來自塞達卡和雙溪通港村的至少40人在哈吉·沙利姆（他現在已成為該地區著名的巫統官員）家舉行了一個“宣誓”儀式。一個自稱是從吉隆坡派來的人通過唱圣歌、涂油（酸橙汁和水）禮的方式舉行了入會儀式，他還向成員示范了如何利用身上佩帶的紅綬帶使自己免受彎刀的傷害。最終動亂的局面并沒有蔓延至吉打州，這個團體也從未有過行動。

對塞達卡的預言和宗教動員的簡要說明，并非要宣稱此類特殊事件可以吸引村民，他們并未被吸引。這些記錄只是為了說明，無論預言和宗教動員在相對平常的日子里多么隱而不顯，它們都是馬來農民階級文化特質的一部分。1979年，一個據說在吉打州擁有三萬成員的隱蔽組織（Nasrul Haq）被取締了。政府宣稱這個組織有政治訴求、教授自衛術，并且其倡導的“非伊斯蘭”性質的圣歌、陰魂附體、婦女參與和非正統裝束都對公共秩序構成了威脅。幾乎在同時，一種出現在吉打州貧困地區且不為人知的名為Auratis mailiyyah的神秘崇拜儀式也被伊斯蘭法庭宣布為非法。[[524]](#_524_9)從馬來西亞的整體上看，斯托克維爾已經證明，實際上在每個爆發歷史危機的時段，都會有千禧年和令人沉迷的伊斯蘭崇拜再現。[[525]](#_525_9)如果我更仔細地關注這一點，我肯定會發現更多的飛翔信以及地方性預言[[526]](#_526_9)。在一些特殊的情境下，此類邊緣現象完全有可能迅速地移至政治舞臺的中心。[[527]](#_527_9)

在此，我的關注點完全指向了一個主題，即一個沒有任何關于其他社會制度的體驗或知識的從屬階級，是否能把他們居于其中的統治秩序看成并非是完全不可避免的。歷史事實是，他們能夠并且也這么做了。這一節所考察的三種主張都被證明是站不住腳的。認為從屬階級把不可避免等同于正當，這是毫無根據的，盡管務實性順從的需要可能往往使人們以為從屬階級會將二者等同。設想任何統治的一般歷史模式都能全面地控制從屬階級的社會生活，以至于消解了部分自主的、反抗性亞文化的創造力，這同樣是毫無根據的。最后，我們沒有理由臆測下層秩序被現有的統治體系嚴密包裹，以至于他們無法想象進行革命性的否定或者基于這種否定的行動。

霸權內部的沖突

出于討論的需要，我一直把我認為的霸權和虛假意識的核心假設看成是理所當然的。坦率地說，這個假設就是，如果說統治階級能夠說服從屬階級接受其對現存社會關系的自利性觀點，那么，結果將會造成意識形態的同一與和諧，這又將轉而阻礙對利益沖突和階級沖突的感知。畢竟，霸權基本上是對“客觀”利益的曲解。一旦承認這個假設，我們就會考查從屬階級是否能夠以及使用何種方式來洞察、抵制與否定這個霸權。但這個初始前提是否可信呢？出于至少三種原因，我認為它并不可信，其中之一是理論的或者說是概念性的，另外兩個是經驗性的。理論問題需要我們優先關注，因為它源自于對所謂的主流意識形態本質的誤解，至少在我看來是如此。

回顧塞達卡意識形態斗爭的基本特性能夠最好地幫助我們領會這種誤解：事實在于這類斗爭幾乎完全發生在舊有的農業制度的規范性框架內部。換句話說，斗爭發生于絕大多數觀察者稱之為現存霸權的內部。[[528]](#_528_9)小土地所有者、小佃農及無地勞動者不斷地利用早先社會秩序的價值觀和道理來堅持自己的權利主張并且貶低對方的權利主張。他們充分利用了幫助或援助這一價值標準，而這也正是富裕村民一直用以形容其自身行為的標準。小土地所有者、小佃農和無地勞動者將吝嗇和冷酷無情的污名給予富人，借此他們使慷慨和大方這些價值標準變得不利于那些富人，因為那些富人正是用這些詞匯來證明他們財產和特權的正當性的。窮人的努力盡管徒勞，他們仍然堅持自己工作和租佃的權利，這些權利曾一度是大土地所有者以救助的名義給予他們的。從各個方面看，地方統治精英仍在對窮人做出空頭承諾，這一事實是窮人權利主張的來源，而且由此衍生出他們的規范性力量和策略性價值。實際上，并不存在任何針對財產權或國家及其地方官員的激進質疑，盡管其政策設計都旨在推進資本主義農業。窮人所說的一切幾乎都很容易地符合地方精英在霸權范圍內公開宣稱的價值標準。如果說村里的窮人所尋求的目的是適度的，那么，他們用以達致目標的手段也是如此。然而，手段的非極端性更多是由其他原因決定的，包括當時的經濟選擇的可能性、“無聲的壓迫”的事實以及對可能的鎮壓的認知——而不是小小野心的驅動。

除了所謂的引起千禧年期待的非常規化危機以外，或許可以在大多數階級沖突的核心中發現上述溫和的權利主張。當條件允許時，這些小的訴求與更為暴力的、甚至革命性的行動并非互不相容。換言之，目的的溫和不必然等同于手段的溫和。任何霸權都必然做出承諾，社會秩序必然不能實現部分或全部承諾，可以說承諾和失信之間的鴻溝正是那些權利主張產生的原因。假如理解恰當，任何霸權意識形態本身在其內部都包含了矛盾和沖突的素材。

為了理解其中的原因，我們只需求助于前面詳細引述的《德意志意識形態》相關章節的內容即可。“統治思想（也就是霸權意識形態）不過是支配性經濟關系的理想化表達。”葛蘭西準確地意識到在支配性經濟關系理想化的過程中包含了哪些要素，他對這一點的理解遠遠超過他的繼承者：

毫無疑問，事實上霸權預先設定應該考慮到的群體的利益和取向，而霸權將行使于這些群體，霸權也應該形成某種妥協性的平衡——換言之，領導集團應該做出一種經濟合作性的犧牲。但同樣毫無疑問的是，這樣的犧牲與妥協不能是實質性的；因為盡管霸權是道義——政治的，它同時也必須是經濟的。[[529]](#_529_9)

因而，霸權意識形態需要把實際上是特殊的利益重構并表達為普遍的利益。如果它要成為制造認同的有效工具，就必須滿足兩個標準。首先，它必須宣稱它所維護的特權、地位及財產等制度不僅是為精英謀取利益，也是為從屬群體謀取利益的，以此獲得從屬群體的順從或支持。有效地做到這一點必須做出使從屬群體受益的確定承諾，這些承諾將成為他們在主流社會秩序中同樣重要的基礎[[530]](#_530_9)。其次，正如葛蘭西意識到的那樣，如果統治階級對獲得順從抱有一線希望，那么，他們必須至少部分地實現其承諾。也就是說，霸權并不僅僅是投給從屬階級的一塊象征性的骨頭；它也需要統治集團做出一些實際的犧牲或克制。

我們或許恰好可利用這些術語來理解在吉打地區雙耕之前發展起來的、在很在程度上依然作為主導的規范性框架的主流意識形態。大農場主通過強調他們給村里其他人帶來的好處——租佃權、薪資勞動、慈善、借貸、筵席、扎卡特——將其社會地位、財產和特權合理化。這一合理化過程被嵌于具體的經濟實踐中，并且為了其持續的統治，采取了適度的將其利益社會化的過程。就這一點來看，這種合理化以及與之相關的實踐是否是斗爭的產物并不重要，它們是否侵害了農業精英的基本利益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試圖通過將社會秩序理想化而賦予其合理性的過程，總是給其臣民提供了批判的手段、象征工具和思想，并且這種批判完全在霸權內部運作。因而，從屬階級在統治理想內部就可以獲得一種批判性的力量，用于實現他們大部分的目標。階級斗爭最常見的形式源自于主流意識形態無法真正實現他們必須做出的含蓄的承諾。主流意識形態有可能轉變成為對抗其優先獲益的工具，這不僅由于從屬群體對那些曖昧不明的話語可以做出自己的詮釋、理解和解讀，而且由于統治階級必須首先進行宣傳的那些承諾。[[531]](#_531_9)

在這一背景下，我們在塞達卡發現的是一個正在消蝕的主流意識形態，它從未真正履行過諾言并且現在也不再為那些大耕作者帶來利益。因而，這個正在消失、甚至衰退的傳統變成了意識形態的武器，在它的作用下，富人的合理性可能進一步喪失。當然，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窮人現在發覺如此有用的意識形態武器卻是早先流行過的，而且正是由那些富裕的耕種者和地主交到他們手中的。“共同的”意識形態決不是同意或和諧的保證。[[532]](#_532_9)

塞達卡意識形態沖突的結構并非不同尋常。例如，基諾維斯在他關于美國奴隸制的透徹分析中，展示了奴隸是如何利用合理性規范及其父權制意識形態——兩者在實踐中都被免于責罰地違背了——來表達他們對于生存、人道待遇和家庭維系等權利訴求的。正如在塞達卡，大部分對統治集團實踐的批評都能夠從統治集團意識形態的文本中直接讀出。[[533]](#_533_9)從團結工會運動所表達的對波蘭“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的批判中，也可以確定地進行許多同類的分析。[[534]](#_534_9)除了在意識形態上強調代表了無產階級利益的所謂社會主義制度的背景之外，如何去理解是什么導致了波蘭針對政府的大部分市民社會的反抗呢？[[535]](#_535_9)波蘭工人每天都要面對的現實是，從官方意識形態（在此意義上很難說是霸權）面前略過的現實——積習難改的特權與腐敗、工人日益下降的生活水準、黨派官員的特供商店、對工人抗議的鎮壓，等等。這并不是說，奴隸或波蘭工人都想象不出一個沿著不同路線運行的社會秩序。它只是表明，統治階級為了證明其統治合理性而定義的意識形態，為最具毀滅性的批判提供了大部分的象征性素材，從而使其得以產生和維系。

相同的邏輯或許也適用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不滿的常規形式。盡管此類國家的工人更容易接觸到激進的意識形態，但寬泛地說，大部分的對社會秩序的批評似乎都基于這樣一個前提：即批評也是源自統治意識形態本身。[[536]](#_536_9)在不偏離主流意識形態的情況下，工人們可以將精英領導層的社會道義同現實中的拉“關系”、偏袒以及不公平的高等教育機會等進行對比；他們可以將“一人一票”的民主意識形態與法團（corporate）影響媒體和選舉的現實進行對比；他們也可以將資本主義的慷慨承諾與周期性的蕭條和失業進行對比。由激進的政黨和知識分子提出的解決方案有可能會超出主流意識形態的邊界，并且通常情況下都是如此。但就我的目的而言，非常明確的一點是，對現有制度安排的激進批評實際上可能產生于任何一個從屬階級，這些從屬階級對統治意識形態了然于胸，而同時對日常生活中種種背離或忽視該意識形態許諾的現實又洞察無余。進而，當我們更仔細地觀察時就會發現：奴隸制、共產主義，自由民主主義，甚至塞達卡的“農業父權制”等意識形態都可能成為一種刺激和激勵，而并非霸權意識形態所假定的全身麻醉。[[537]](#_537_9)

嵌于任何所謂的霸權意識形態中的暗含的許諾，就其眾多臣民而言，或許只不過是一種犬儒式的“保護”騙局。如果封建領主不是在保護農奴使之免受其他領主的傷害（那些領主和他一樣具有掠奪性），那么，他們又是在保護農奴免受誰的傷害呢？當事實上是奴隸在養活他們自己和奴隸主時，又怎么能說是奴隸主為奴隸提供了生存“供給”呢？然而，這樣的偽善是“罪惡支付給美德的禮物”，并且它們有著實際的結果。[[538]](#_538_9)在塞達卡，窮人按照舊有的農業規范處事，這在策略上是明智的。它們不僅是村民藉以進行實際思考的道德范疇，而且還是農民可以利用的并能使之轉化為對自己有利的富人的意識形態資源。最后，通過謹慎地保持在可以接受的和熟悉的道德話語范疇之內，窮人將更加激烈的正面沖突的危險減至最小。

工團意識與革命

常識并不是同一而整體的概念，它隨時空的不同而不同……其最基本的特征在于，即使在單一個體的頭腦中，它也是一個支離破碎的、不連貫的而且非邏輯的概念，它符合那些群眾的社會和文化位置，它就是他們的哲學。

常識是多數人自發的哲學而且必須在意識形態上具有連貫性，這仍然是必定的起點。[[539]](#_539_9)

對葛蘭西等學者而言，激進變革的首要障礙存在于思想層面。葛蘭西認為，由于“智識方面的從屬性”[[540]](#_540_9)，工人階級的思想大多是從統治群體那里獲得的二手思想，因而無法超越一種關于他們自身處境的“不連貫的”、“支離破碎的”的概念。其結果形成的最多是某種集中于有限的具體利益的“工團意識”，而不是使激進變革成為可能的“革命意識”。當然，正是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這一缺點定義了先進黨派的智識角色。

這一立場背后有著諸多假設，但它們中的每一個都需要檢驗。首先，統治階級事實上的確有一個定義明確而且一致的共同意識形態。此處我不再詳細考察這種說法，但有必要指出，這種意識形態的一致性可能相當稀少——或許即使在那些思想形成體系知識分子中間也是如此。換句話說，以什么作為標準來比較工人階級的意識是否一致，這一點也不完全清楚。其次，一個更為明確的假設是，革命的行動只能從十分激進的意識中產生出來，這種意識不僅直接對抗統治意識形態，而且預期一種全新的社會秩序即將出現。如果我們僅僅根據行動者的意識來定義革命行動，這個假設當然是正確的，但是同義反復的。然而，如果我們不采用這一招數，一個并非革命性的意識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對統治階級的遷就——即改良主義和/或“工團政治”，這樣的假定是否正確呢？

在此我希望簡要說明的是，典型的“改良主義”意識中存在的微小和有限的要求與達成這些要求所采取行動的種類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的關系。可能有人會進一步和比較確定地認為，在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革命情境中，普通的行動者事實上是在為一些世俗的（至關重要的）目標而戰，這些目標原則上是與主流社會秩序相容的，但在實踐中通常并非如此。換句話說，典型的革命性危機是由一些微不足道但卻根本性的要求引發的，這些要求為許多人同時經歷，并且由于它們受到阻斷，因而只能經由革命行動才能達成。革命性危機的產生肯定有賴于許多因素，這些因素可能在我的直接關注之外，但是產生革命性危機不一定需要的一個因素就是普通人當中的革命野心。在此意義上，目標和手段并不相符。在一個層面上，這不過是常識；從屬階級的要求源自其日常經歷及其所面對的物質生活。但這一平凡事物值得重申的唯一理由在于，許多理論討論顯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并且將想象的意識形態要求強加于工人階級意識。據我所知，那些要求從未被任何真正的工人階級滿足過。

讓我們暫時返回到兩種革命性情境，并考察每種背景下的工人階級意識問題。巴靈頓·摩爾對一戰后德國魯爾地區工人的分析以及他對布爾什維克革命前夜的俄國無產階級的分析已經為此打下了基礎，他自己就曾參與被他稱為“發生于現代工業國家的最接近于自發性的無產階級革命”。[[541]](#_541_9)

至于德國，摩爾在1912年前后對無產階級的價值觀進行了開放式調查，他從這些調查中發現了一些非同尋常的證據，這使得他能夠展開對這一問題的探討。盡管對社會民主黨的支持非常普遍，但工人的期待和渴望卻在很大程度上是個人化的，而非公共性的或政治化的。這些最普通的愿望包括提高工資、食可果腹、適當的人道對待以及更高的要求——屬于自己的房子和一些土地。這些都是工人階級謹慎適當的期望，但在他們的行動層面卻已經相當激進并且將更加激進。畢竟，成為社會主義者的人是少數，而且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顯然對社會主義理論并不熟知。即便是煤礦工人——他們在1914年之前就是工人階級當中最富戰斗性的部分——也“沒有一絲一毫線索表明他們是革命情感的承載者”。[[542]](#_542_9)

種種證據一再表明，工人群眾并不是革命性的。他們并不想推翻現存的社會秩序并用別的什么取而代之，尤其不想用那些由普通工人統治的社會取而代之。盡管如此，他們卻非常憤怒，他們被逼入絕境并進行自衛性斗爭……

但即使人們承認所有這些論點，從政治后果的立場來看它們并非真的至關重要。一般說來，革命性的目標都是由領導者強加給憤怒的群眾的，這些群眾在其他條件具備的情況下會幫助摧毀舊有的社會秩序。我冒險地猜測，在任何成功了的偉大革命中，作為追隨者的群眾都不是自覺地有意識地要顛覆社會秩序的……

就憤怒的程度而言，人們很少因此而要求某些新生事物，人們只不過希望從舊有的制度中剔除那些令人厭惡和壓制性的特性。[[543]](#_543_9)

如果我們將德國近似革命的背后的問題稱做“生計”問題，并認為那只是適當處理的小問題，那么，正如摩爾所說，就是忽視了它們的重要性。[[544]](#_544_9)它們不僅對于走投無路的工人階級來說具有本質上的重要性，而且還由于產生于人們所感受到的正當性的憤怒而得到強化。事實上，公正地說，對那些小目標的不懈追求，部分地是因為它們看起來仍處于現存秩序的規范框架之內。這一時期的德國工人階級的權利要求并不比塞達卡窮人的權利要求更具雄心或走得更遠。革命的情境存在于前一個案例，卻并未存在于后一個案例，其原因可以歸結為許多其他因素；然而，這與有無革命的階級意識本身并無關聯。

就在十月革命之前和二月革命之后的俄國，工人階級要求的證據來自于位于歐洲的整個俄國的工廠委員會的自治要求。[[545]](#_545_9)它們再一次明確地反映出列寧所說的改良主義、工團意識。最普遍的要求是爭取八小時工作制。其他的要求還包括廢除計件工作制、最低額的加薪和解雇時支付解雇金。在工作場所，勞動者堅持主張管理人員對他們應該以禮相待、停止以從工資中扣除的方式隨意罰款、提供飲食和衛生設施以及由工廠而非工人提供工具。他們最激進的要求顯然是廢除童工和停止性別歧視，但是，他們完全支持基于技術和經驗的差別酬勞。這些要求本身很難說是那種預示著一場革命的要求。[[546]](#_546_9)正如摩爾所概括的：“這些要求的全部動力……在于改善工作條件，而不是改變它們……我們又一次看到，工人關于美好社會的理念……是緩和或消除了最不如人意的那些特征的現存秩序”[[547]](#_547_9)。

在此，我們還需要進一步補充一些實例——例如墨西哥革命期間莫雷洛斯地區農民的要求和法國革命期間的《抱怨備忘錄》（cahiers de doleances）——以增加證據的分量。[[548]](#_548_9)我們之所以從工人階級中援引證據，是因為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只有在此階級而非其他階級中才有可能產生革命意識。然而，在這里，我們發現不僅革命意識在很大程度上是缺失的，而且微小的改良主義要求與革命性行動之間是相當兼容的。一個革命的先鋒黨派對于革命的發生來說或許是必不可少的，但其必要性并非來自意識形態教導和提升從屬階級意識水平的需要。[[549]](#_549_9)對于普通人來說，革命性沖突通常是在現存霸權的邊界之內生成的。通常情況下，只有它所采用的手段是非同尋常的。這一觀察至少對農民運動和無產階級運動同樣適用。

正如霍布斯鮑姆非常正確地觀察到的，“實際上，革命可以由那些并不否認現存的權力結構、法律、國家甚或是地主的合法性的農民造成”[[550]](#_550_9)。作為一個例證，莫雷洛斯的農民階級僅僅是要重新獲得甘蔗種植園從他們那里奪走的公共土地，而不是要摧毀種植園制度，更不是要改變墨西哥政體。然而，他們對收回自己土地的頑強堅持卻有助于帶來這樣兩個更大的后果。正是這些微小的、未經協調的瑣碎反抗行動聚集到一個點上，就可能達到危及國家結構的地步。同樣，細微的、改良主義的、“意識形態的”目標聚集到一起也可能達到成就革命的地步。

當然，仍有可能斷言，某種形式的外部領導——例如政黨、知識分子——對于將大量的叛亂轉變為奪取權力并改變整個國家的革命，是非常必要的。在此我不就這個特殊的問題加以闡述，我要說明的是：如果這一論點被接受，那么，究竟是從屬階級如果沒有激進的知識分子就完全無能，還是激進知識分子如果沒有造反的群眾便衰弱無力？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個人理解的問題。然而，可以明確斷言的是，作為通常理解的兩個術語，“革命的意識”和精心制作的意識形態，對于造成那些其領導者確信可以從中獲益的革命性危機來說，并不是必不可少的。

誰打破了霸權？

總而言之，從目前來看，前工廠工人、工廠工人以及現代的革命性農民當中自發產生的觀念主要是向后看的。他們力圖恢復已經被破壞的社會契約，因為那些契約經常是修補其特定職業中的特殊的和具體的不平的力量。[[551]](#_551_9)

有無可能討論塞達卡正在被破壞的社會契約呢？倘若社會契約被理解為一套實踐以及與之相關聯的規范，倘若我們意識到不同階級對這一契約的解釋會有顯著差異，倘若我們認識到在很大程度上只有當這些契約被破壞時，窮人才創造出并意識到他們自己的契約版本，那么，我相信討論就是可能的。對契約的違背幾乎完全是經由大農場主而實現的，他們試圖以此來增加回報，盡管創造新的生產關系的機會是由國家建立的灌溉工程提供的。這些萌芽狀態的資本家解雇佃農、增加地租、改變租佃契約和引進機器。正是他們逐漸取消了扎卡特、施舍、借貸以及盛宴等習俗。正是他們因此幾乎取消了曾經對他們有利的稻谷收益的適度“公有化”。也正是他們日益壟斷了國家補助和投入的供給以及村莊生活的政治安排。

塞達卡的富人因而發覺自身處于一種雖然有權但是反常的境地。先前使他們的財富、地位、領導權合理化的習俗已經被系統地瓦解，而這正是他們獲得新財富的前提條件。他們的經濟統治的實現是以他們的社會地位和對貧窮鄰居的社會控制的喪失為代價的——他們打破了自身的霸權暗示著這些代價。與此相對照，窮人則發現他們的過去在意識形態上是大可利用的；它們對于維護先前農業秩序的規范和習俗來說都至關重要。在此情境中，區別兩種傳統是有益的：一種傳統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布迪厄將其稱之為信念（doxa），并且由此人們并不把它視為一種傳統而是看做就是如此；另一種傳統，是為了服務于當下的利益而對過去進行的想象性重構。[[552]](#_552_9)窮人創造和保衛的正是后一種形式的傳統。當然，它并不是憑空建構出來的——如果是憑空建構，它就很難具有任何意識形態價值——相反，它是對早先價值觀和習俗的摹寫，這種摹寫是可辨識的但帶有黨派性，其目的在于使基本的階級利益合理化。

如果塞達卡的意識形態情境從根本上具有早期資本主義的特征，那么，我認為，有關統治意識形態的論證將不得不從根本上重新建構。葛蘭西和其他許多人都認為，對任何從屬階級而言，其關鍵任務就是去創造一個最終能夠改變社會的對立性霸權（counterhegemony）。[[553]](#_553_9)這種觀點或許對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具有一定價值，在那些社會中精心制作的意識形態可能已經就位。但它忽視了一個重要事實，那就是，正是資本主義歷史性地改變了社會，并打破了現存的生產關系。即使隨意地掃視一下歷史記錄也會發現，資本主義的發展需要不斷地打破先前的“社會契約”，而在大多數情況下，正是資本主義在早期幫助建立和維系了那些契約。因而，一種現存霸權的去神秘化至少經由兩個同樣重要的因素而實現，一是必不可少的對資本主義固有習俗的漠視，一是從屬群體本身的“洞察能力”。事實上，資本主義的歷史恰恰可以按照這一思路來書寫。圈地、農業機械的引進、工廠制度的發明、蒸氣動力的使用、流水線的發展以及今日的計算機革命和機器人的發明都具有重大的經濟和社會影響，它們破壞了先前的有關工作、公平、安全、義務和權利的理解。

只有依靠資本主義的改造力量的這一背景——其激進地瓦解過去和現在的趨勢——才能理解發生在塞達卡的沖突。雷蒙·威廉斯生動地記錄了這一過程：

自從它相繼控制了一個又一個地區，它已經變得難以控制地騷動和不安，它只有立即離開某個地方才能使那個地方達到穩定，它留下了各種社會的和技術的碎片，破壞了人類的連慣性和安定，并且帶著一貫追求新事業的傲慢自信繼續前行。[[554]](#_554_9)

這也正是布萊希特宣稱資本主義具有革命性時，他心里所思所想的。

許多從屬階級的意識形態和抗議行動的向后看的特征，在此背景下可以得到完整的理解。正是資本主義的革命性質賦予了他們一個自衛的角色。如果他們為一個舊有的霸權辯護，那是因為原有的制度安排同當下的圖景相比看起來要好一些，還因為它在早先的習俗中具有特定的合理性根基。保衛和經營業已被資本主義發展消解的社會契約，或許是農民和早期資本主義工人最持久不變的意識形態主題[[555]](#_555_9)——從英國革命中的平等主義者和掘地派到瀕臨滅絕的手藝人和紡織工，再到抵制使用脫粒機的“斯溫上尉”（Captain Swing）叛亂。從以科貝特、佩因和卡萊爾等作為意識形態異端所代表的大眾知識分子抨擊資本主義的核心內容中[[556]](#_556_9)，同樣可以發現保衛傳統權力使其免受圍攻的情況。

塞達卡和19世紀的英格蘭一樣，人們的抨擊較少地直接指向資本主義本身，更多的是針對資本家的。對來之不易的先前制度安排的違背，在其受害者看來，是具體個人的無情的、故意的選擇，而并非出自某種更大的制度邏輯的非人性化運作。正如埃利爾所描述的安達盧西亞勞工的案例那樣，當僅僅涉及到經濟理性時，受害者就會看到惡意：

我的看法是，從過去到現在一直存在失業現象，而無論在過去還是現在，勞動者都把失業歸因于土地所有者不愿意為他們提供工作。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這種觀點確實有些實質性意涵。盡管如此，我們與其將失業看成是土地所有者一方的惡意，不如把它看成從企業個體的角度出發的經濟理性的決定。[[557]](#_557_9)

然而，從另一層面看，將不幸的成因人格化完全不是一種誤解。塞達卡或安達盧西亞的大農場主做出的決定——盡管可能受到經濟邏輯的限制——顯然也是有意識地個人選擇的結果。考慮到事物可能的其他方面，那些將這一問題人格化的人同樣會意識到一個更大的事實：即使是資本主義邏輯也是一種社會創造，而不是一種實物。此外，可以確定的是，無論是在狄更斯的小說還是塞達卡窮人的言說中，如果人們認為吝嗇、貪婪以及冷酷無情顯然是由人格化因素導致的，這將更容易引發憤怒和可能的行動；而如果人們將上述特性歸結為非個人因素和不可避免的，則引發憤怒和行動的可能性就小得多。如果人格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個神話，那么它就是一個強有力的、極具政治能量的神話。

這一必然性意義上的征服對于產生有政治影響的道德憤怒至關重要。為了達到這一點，人們必須將他們的境遇理解并界定為人類不公正的后果：一種他們不必、不能、也不應該承受的境遇。當然，僅憑這種理解本身……并不能保證政治和社會變遷的來臨。但是如果沒有某些相當可觀的道德憤怒的洪流，這樣的變遷也不可能發生。[[558]](#_558_9)

我在塞達卡所觀察到的人格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那里所經歷的資本主義轉變的自然結果。對于那些被我們稱為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或綠色革命的更為抽象的概念的受害者和獲益者來說，體驗本身是以非常個人化的、具體的、局部的、間接的方式獲得的。

讓我們暫且假定，塞達卡的貧窮農民轉而強調導致其困境的更大的原因。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他們并非沒有意識到這些更大的問題。但是，如果他們像馬來西亞發展過程中的知識分子批評家（或支持者）那樣，強調諸如財富積累、資本密集型農業的發展和國家政策（這些政策是偏袒富有農場主利益的，以保證對城市工業區廉價工資產品的供給）等問題，那又會是怎樣一番情景呢？人們能否想象打著“結束農業資本主義”或“打倒金錢關系”旗號的鄉村抗議運動呢？當然不行。這些無可置疑的事實太過抽象和遙遠了；它們根本抓不住地方經驗的本質。如果它們實際上成為人們關注的中心，那么可以想象，當鄉村的小土地所有者和無地勞動者意識到塑造他們未來的顯然是不可抗力的時候，他們很可能會袖手旁觀、無所作為。相反，把不幸歸結為由個人化的、邪惡的因素造成，是可識別的個人在他們自己的社區中沒有做到行為適當的后果，也是一種不全面的看法，但不是一個錯誤的觀點。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它完全有可能是唯一的能夠并且已經成為日常反抗基礎的觀點。

我猜想，塞達卡反抗的起點如同歷史上所有從屬階級反抗的起點一樣：接近土地，牢牢地植根于日常經歷的樸素然而有意義的現實。其敵人不是非人格化的歷史力量，而是真實的人。也就是說，他們被視為應當為自己的行動負責的行動者，而非抽象概念的承載者。反抗者所護衛的價值觀念不但近在咫尺而且熟悉常見。他們的出發點是一些習慣和規范，這些習慣和規范在過去被證明是有效的，而且顯然有望減少或挽回他們所遭受的損失。反抗所要達到的目標與其價值觀念一樣地溫和。窮人為獲得工作、土地和收入而奮斗；他們的目標并未指向諸如社會主義等大的歷史的抽象概念，更不必說馬克思——列寧主義了。除非爆發了可能激起更大夢想的罕見的危機，通常他們用于達到上述目標的典型手段既謹慎又現實。倘若可以逃跑到邊境或城市，他們也會那樣做。當直接對抗地主或國家看起來是徒勞之舉時，他們就會避免這種對抗。包括我們考察過的象征的反抗和物質的反抗，我們可以在兩種極端策略之間的廣大區域中發現日常反抗的所有形式。

此類反抗在人們頭腦中從未想過要取得革命性的結果，也從未那樣做過。但是，它們可能有助于革命性結果的出現，并且偶爾也的確引發了革命性結果。此類情形之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導致革命在農民或工人階級看來可能根本就不是一個結果，而毋寧是達到他們溫和目標的必要手段。即使當從屬階級打出了諸如“社會主義”之類的口號，它們對于普通民眾和激進知識分子的意義可能全然不同。奧威爾關于1930年代英格蘭工人階級的論述對于一般的下層階級來說幾乎完全適用：

我們必須記住，一個工人……在完全的邏輯一致的意義上，極少或從來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對于普通工人（你會在周六晚上任何一個酒吧里遇見的那種工人）來說，社會主義并不比更高的工資、更少的勞動時間以及沒人對你指手劃腳更有意義。對于那些更具革命性的絕食游行者和被雇主列入黑名單的人來說，社會主義這個詞是一種對抗鎮壓力量的戰斗口號，是一種對未來暴力的含糊的威懾……但我仍然必須接觸那些礦工、鋼鐵工人、紡織工人、碼頭工人、筑路工人或者任何有“意識形態”意義的人。[[559]](#_559_9)

這種觀察當然只不過是智力的勞動分工，人們可以在任何以階級為基礎的運動中預期這一分工，這些運動可以是工人或農民源于物質生活現實的斗爭，也可以是其視野投向更遙遠的地平線的知識分子運動。在此意義上的勞動分工與其他分工一樣，不僅是一種恭維贊美，其中還包含著沖突的可能性。

正如盧卡奇所認為的，事實上農民作為一個階級不可能想象出一個關于總體性社會組織的新計劃：

其他階級的見解（小資產階級或農民）是曖昧不清或缺乏創意的，這是因為他們的存在不僅是基于他們在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中的位置，還同封建社會的殘余息息相關。因而，他們的目標并不是推進或超越資本主義，而是扭轉資本主義的行動方向或至少阻止其充分發展。他們的階級利益集中于發展的征兆，而不是發展本身。[[560]](#_560_9)

然而，他本來可以加上這樣一點：工人階級本身，也許出于不同的原因而處于同一條船上。如果摩爾、湯普森、奧威爾和盧森堡都是正確的，工人階級也要應對發展的“征兆”，如同他們在日常生活中表現出來的那樣。我們沒有理由指望無產階級或農民階級會出于某種原因而不再堅持世俗的目標，那些目標將有利于達到尚可忍受的物質生活和起碼的尊嚴。相反，真正重要的在于，準確地了解這些目標和它們或多或少帶著對一個更人道的社會秩序的期望的頑強追求——這是以象征的和行動的方式對所有建立于農民和工人之上的、聲稱服務于他們利益的全部社會秩序進行批判的核心內容。

讀者將正確地察覺到一種關于革命性變遷前景的悲觀主義，這些觀點將系統地和確實地關注農民或工人階級所主張的雖然是微不足道的尊嚴，卻是他們階級意識的核心內容。小小的愉悅和些許仁慈往往會鼓勵革命主體的奮斗，如果革命連給予人們這種微小的愉悅和仁慈都做不到的話，那么，無論它取得了何種成就都沒有什么值得夸耀的。這種悲觀主義，唉，我以為，與其說是對多數革命國家中工人和農民命運的偏見，不如說是一種現實的評價——當命運寄托于革命的許諾時就讓人讀出了悲哀。[[561]](#_561_9)如果在這樣的國家創建之前就很少發生革命，那么，現在革命更是銷聲匿跡了。因而，更加有理由說，即使我們不去贊美弱者的武器，也應該尊重它們。我們更加應該看到的是自我保存的韌性——用嘲笑、粗野、諷刺、不服從的小動作，用偷懶、裝糊涂、反抗者的相互性、不相信精英的說教，用堅定強韌的努力對抗無法抗拒的不平等——從這一切當中看到一種防止最壞的和期待較好的結果的精神和實踐。

# 附錄

## 附錄A 村莊人口記錄，1967—1979

盡管塞達卡的人口在增長，我們首先應該看到的一點是它的增長速度遠遠低于自然的增長速度。如果家庭形成速度與自然增長速度保持同步，那么到1979年，就應該有大概83戶人家了，這一數字接近于實際增長率的兩倍。這一發現并不新鮮也不足為奇。[[562]](#_562_9)因為人口一度從吉打州水稻平原地區流失了。[[563]](#_563_9)這一方面是因為全國和都市大范圍的經濟繁榮，另一方面是因為即使引進了雙耕，佃農和自耕農子女的前景依然不容樂觀。他們的離去減緩了地方經濟的衰退，但很難逆轉這一進程。

除去只是減小已有家庭規模的年輕人的離去外，14戶在1967年還存在的家庭如今已經不復存在了。6戶家庭完全消亡[[564]](#_564_9)8戶離開了村莊。其中有4戶在別處購買了稻田，并在此過程中出租或出售了他們在原籍擁有的土地。4戶中有3戶在實勿朗霹靂（Seberang Perak）購進了土地，實勿朗霹靂地區是最后的“稻作區域”之一，在那里人們能夠以合理的價格購買到合適土地并清理干凈以便用作耕種。這種形式的遷移需要資本；在塞達卡，有一戶這樣的家庭擁有10里郎土地，另一戶擁有6里郎土地，還有一戶租了至少15里郎土地，剩下一戶只有2里郎土地的家庭，其生活僅能果腹。其余的4戶人家有幸被接納為政府種植園計劃的移民。受高收入保證的吸引，他們離開了家鄉，其中有3例是他們帶領其一個或多個兄弟一并離開。同樣的，這些人家在村里無論如何算不上窮戶。其中1戶擁有一家店鋪和小磨坊，另外2戶各擁有將近5里郎土地，剩下的那戶雖然只有1里郎土地，但據村民說他家相當富有。事實上，在成功申請到移民計劃的11個人當中約有2/3來自村里收入分配層級的上半部分。[[565]](#_565_9)

自相矛盾的是，此類移民計劃本是用于造福鄉村的窮人的，然而，像很多的政府計劃一樣，其效果卻適得其反。其原因顯而易見。該計劃的收入高到甚至足以打動最富有村民的兒子。申請至少需要兩步，通常要特地去彭亨州，并且許多書面材料需要特別賄賂才能獲得。這其中包含的成本相當大。然而，即使貧窮的申請者已經盡力，基于兩個原因，他們成功的幾率依然較小。[[566]](#_566_9)首先，他們很少有可能滿足必需的教育水平，因為他們的父母可能在他們很小的時候就讓他們從小學退學了。其次，他們擁有政治關系的可能性更小，而這些關系往往決定著成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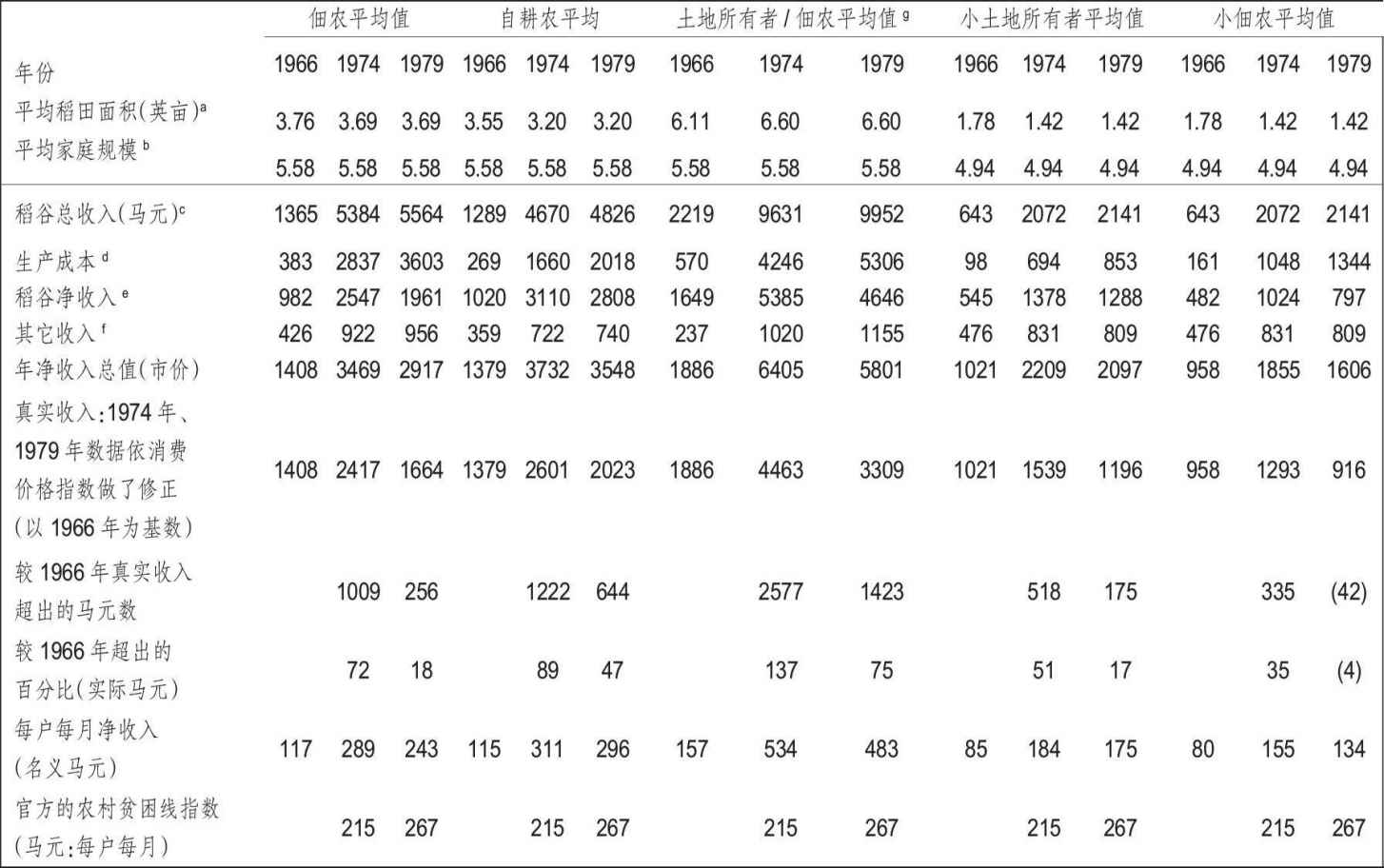
窮人和富人都離開了村莊，但他們離開的方式卻截然不同。窮人傾向于單個離開——他們常常是在村里前景相當黯淡的家庭的兒子或者女兒，但女兒的情形非常少見。只有少數擁有初中文憑的人離開，他們去城里找工作，比如體力勞動、建筑工，如果是年輕女性就去做家政服務或工廠工作。而當富人離開時，經常是全家搬遷到他們購買的土地上或者移民計劃指定的地點。換句話說，窮人離開是加入無產階級的行列，而富人則作為有產者離開，再差也是資產階級。

在過去12年中，共有28戶新家庭在塞達卡定居。有13戶的情況反映了新家庭形成的自然過程：其中6戶是村民的兒子婚后分家；7戶是村民的女兒婚后其夫入贅并且建立了新家。另有10戶遷入塞達卡村是由于公公或者岳父（這較為少見）在村里擁有土地（盡管他/她的父親不住在塞達卡村），因而，這些夫妻就可以在塞達卡村租種那些土地了。所以說，在23個個案中，親屬關系和可資利用的土地（不管是租種的還是繼承的）的結合為塞達卡新家庭的出現提供了解釋。在此情境下，親屬關系只是因為它提供了使用耕地的權力才具有決定性。馬來社會并不存在決定新家庭應居于夫家附近還是妻家附近的不可違逆的規則。并且這23個案例幾乎都是依據哪一邊可以提供更多的稻田來做選擇的，這一點幾乎毋庸置疑。在剩余的5戶中，2戶純粹是薪資勞工，在村里只有一間房子，還有3戶是特殊情況。[[567]](#_567_9)

這些新人家的經濟地位多多少少為我們回顧過去的10年提供了一個窗口。盡管幾乎所有在塞達卡定居的人都是因為認為那樣做在經濟上有利才在塞達卡定居，但他們的收入狀況使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都位列村里最貧窮的那一半。然而，更重要的一點是這一群體的平均耕種規模[[568]](#_568_9)。除了一些特例，他們現在從父母那里租種的土地面積很可能代表著他們將來最終繼承的最大土地面積；而在許多情況下，他們可能繼承的更少。[[569]](#_569_9)因此，這一群體中活躍的稻米種植者現有的農田規模也清楚地表明了他們未來的農田規模。1979年，這一群體擁有的農田的平均規模是3.5里郎，幾乎比村莊平均水平低1里郎。然而，假使我們在28戶中除去現在耕種超過6里郎的5戶享有特權的家庭，其余23戶的平均農場規模是可憐的2.6里郎，遠遠低于生存所需的4里郎的最低限度。

這23戶家庭的境遇證明了村莊農業長期的人口難題。用更為人類學化的術語來表達，有論者將此問題稱為“成家立業基金”問題，也就是“建立一個家庭的成本——這個家庭應該具有一定的謀生手段，使其能夠過比得上上一代的生活”[[570]](#_570_9)。對一個農業社會而言，這種路徑首先意味著土地的使用權。考慮到稻作區域的逐漸消失以及高出生率，每一個新生代都發現自身已經被局限在一個基本固定的資源基礎之上了。誠然，雙耕和趨于上升的城市經濟為人們提供了一個受歡迎的喘息空間。然而，它們所提供的空間卻在很大程度上被現在超過半數的耕地人口早已缺乏足夠的土地這一事實，以及薪資工作機會和可供出租的土地同時減少這些結構變遷的影響抵消了。村莊經濟一完全沒有給下代中的絕大多數提供生存的空間，這才是嚴酷的現實。

## 附錄B 不同土地使用類型/農場規模的農場收入比較（穆達地區，1966、1974和1979年）



a 1966年平均稻田面積源自Farm Economy Survey of the Muda River Projec t，1966（Ministry of Agriculture，1967），tableⅡ.1974年的數據源自the 1975 USM-MADA Land Tenure Study，153;由于沒有新數據，故假定1979年稻田面積與1975年相同。因此，從1966年到1975年，有一個變化就是：不同種類農場的稻田面積就代表了其實際耕作面積。1英畝等于1.4里郎。

b 為了反映USM-MADA Land Tenure Survey報告的數據，對1966年到1974年小農場的家庭規模進行了修正。

c 我們假設所有收獲的稻谷都賣掉了，目的是獲得與總產量等值的現金。

d 農場中家庭成員的無酬勞動并未被算做是生產成本的一部分。盡管我們計算的生產成本并非精確的生產成本，伊斯蘭扎卡特稅卻依然包括在內，但是已繳納的總產出百分比是從符合近來田野調查結果的通用數字中推算出的。至于佃戶，地租也被歸入生產成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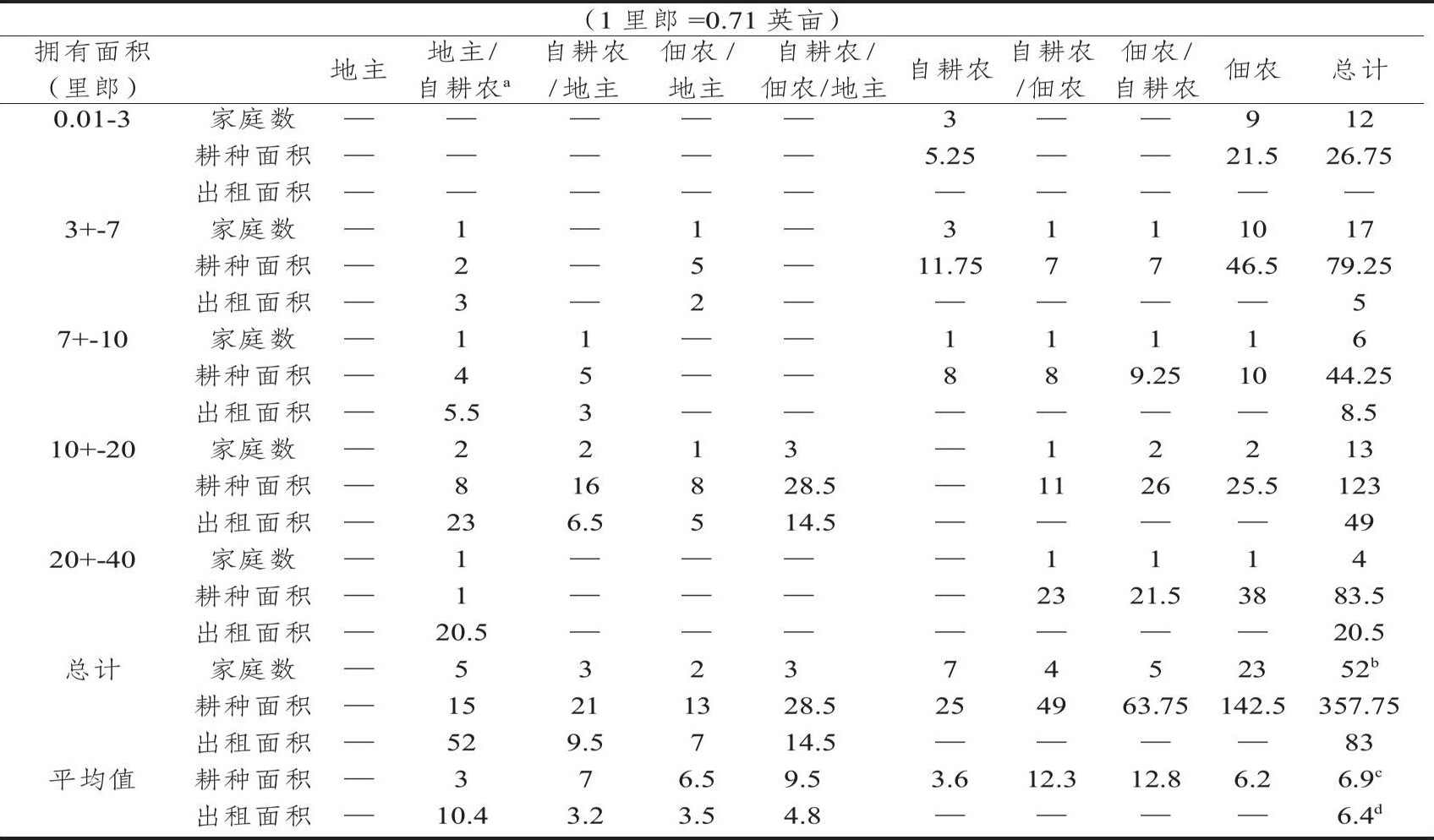
e 有充分理由相信，該數據估價過高。產出計算是基于收割調查基礎上的，該調查系統地高估了約10%的產出。此外，稻谷出售的收據并未核定由水分含量等造成的縮減量，該縮減量1977年的兩個季平均為14.5%，1979年平均為17.5%。更為真實的稻谷總收入數字將因此不得不減少超過20%。凈稻谷收入將減少更大比例——隨著稻谷總收入生產成本所占比例的擴張，該減少比例也將隨之增長。

f 其中包括：為消費和出售而進行的家庭生產，在其他稻作農場上的雇傭勞動工資以及其他工資、薪水、匯款、禮物等形式的收入。有理由相信，“其他收入”，尤其是小農場的“其他收入”被夸大了。因為通常該類別中只有很少人會從公共或私人部門的工作中定期獲得工資，但是計算時采用的是這一類別的均值。實際上，此類收入的中位數會低很多，并且或許該收入整體會減少20%到30%。

g 假定半數稻田面積是自己所有的，半數是租賃的。

## 附錄C 關于土地使用情況變更、凈利潤及政治事務的數據

表C1 1967年塞達卡土地使用情況



數據來源：Kenzo Horii，"The Land Tenure System of Malay Padi Farmers:A Case Study…in the State of Kedah，”Developing Economics 10，no.1 （1972）:55.匯總數據中少數明顯錯誤已更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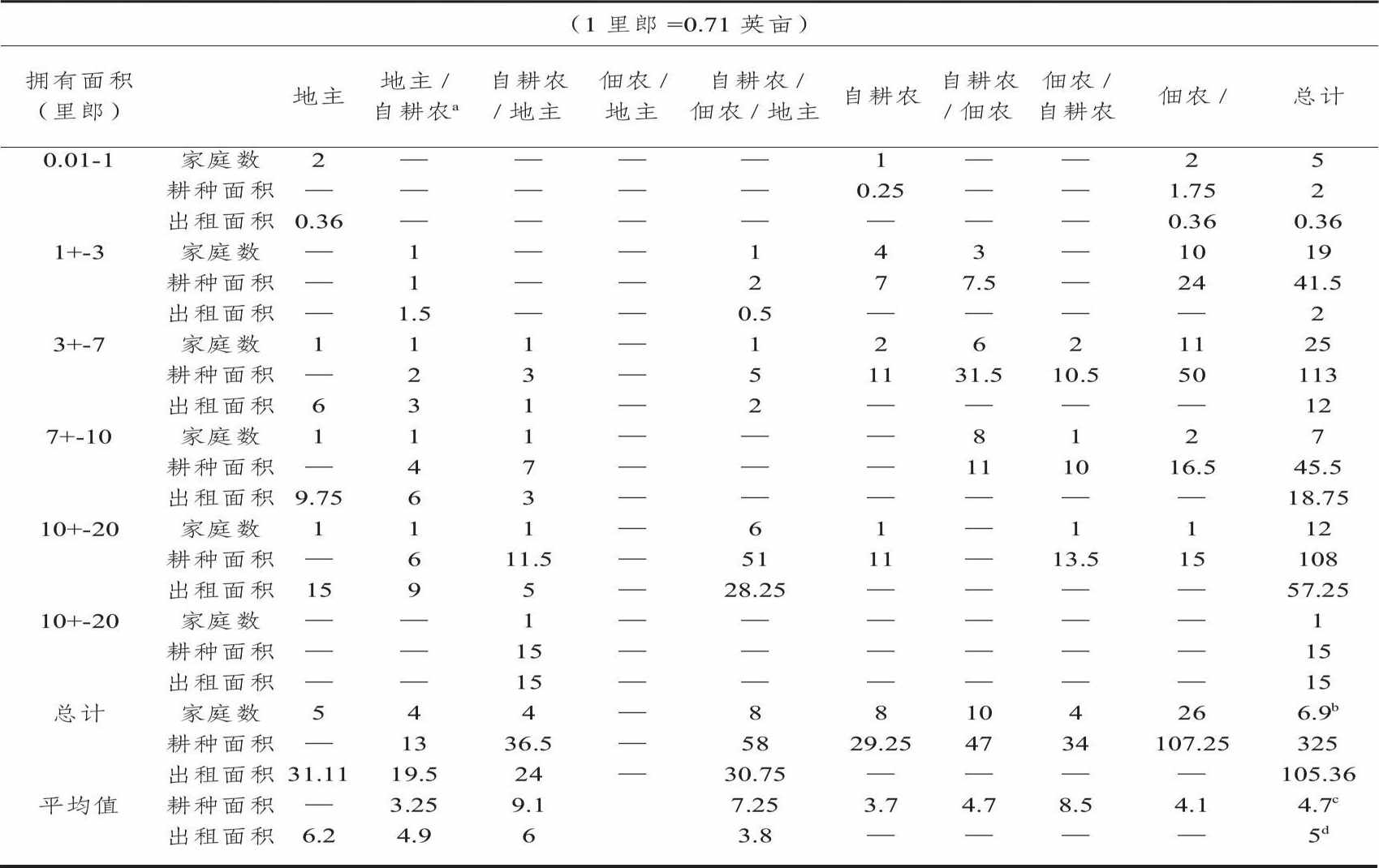
a 每種混合類別中，分類基礎是他們大部分的土地歸誰耕種。因此地主/自耕農是將他們大部分的土地出租，而自耕農/地主是將他們大部分的土地自留并自己耕種。

b 總家庭數中排除了4戶不從事耕種的家庭，因此總數為52而非56。

c 總耕種里郎數（357.75）除以家庭數（52）。

d 掘井健三公布的此項觀察數據為3.6。但我從表中未發現任何此觀察數據的依據。于是我用總出租英畝數（83）除以出租土地的家庭總數（13）得到6.4這一數據。

表C2 1979年塞達卡土地使用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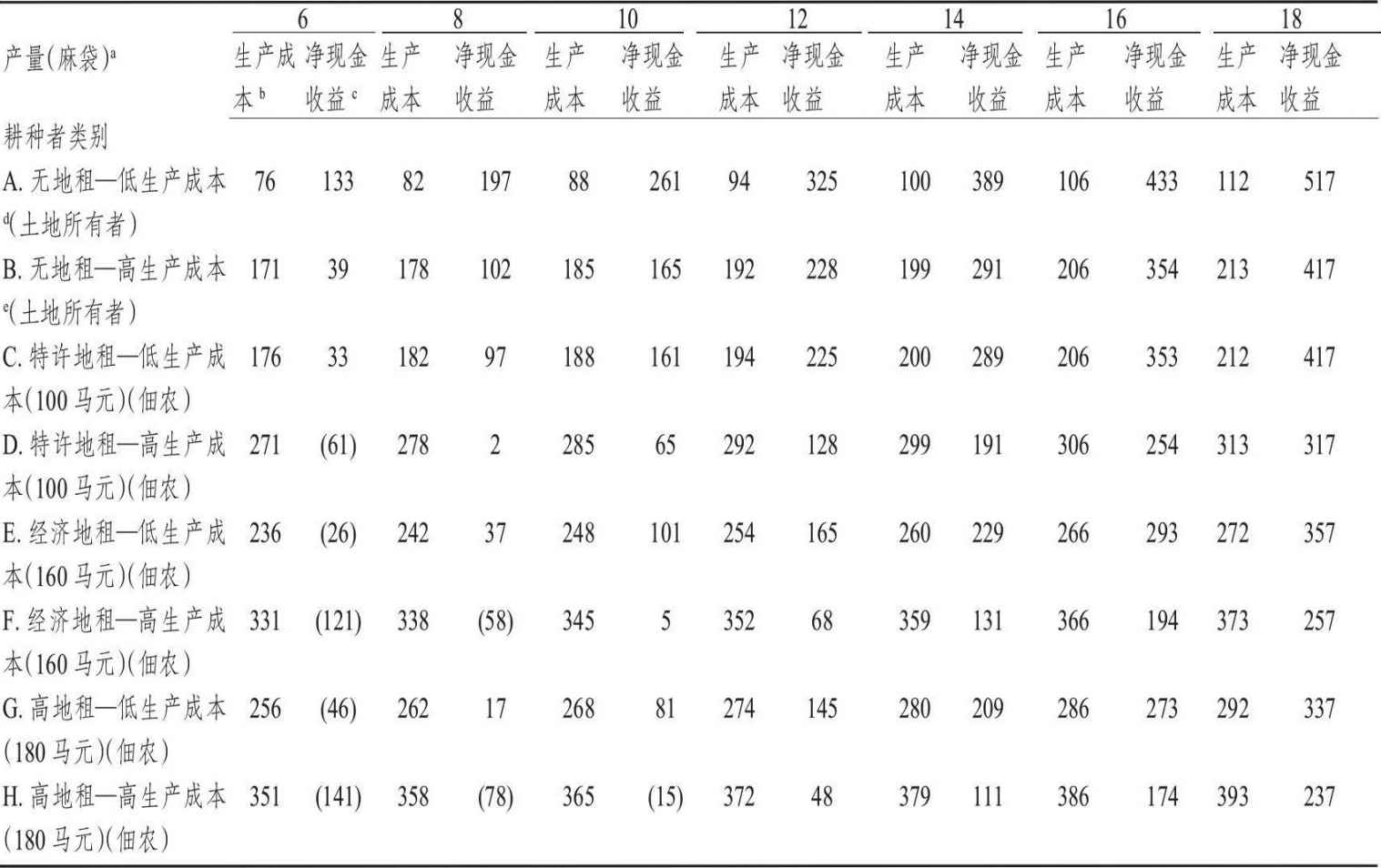
a 參見表C1的注解a。

b 總家庭數減去4戶不耕種的家庭（薪資勞動者）和1戶領養老撫恤金的，因此是69戶而非74戶。

c 總耕種里郎數（325）除以家庭數（69）。如果我們從該計算中去除5戶純地主，結果將變為5.1。

d 總出租里郎數（105.36）除以出租土地的家庭總數（21）。

表C3 1979年取決于產出規模的塞達卡不同階級每里郎凈收益



a 麻袋被用做產量的單位，這是因為它是農場主陳述自己產量的方式。

b 生產成本包括所有投入加上租金（如果有租金的話）。它僅指雇傭勞動力的成本；不包括家庭成員的無酬勞動。

c 基于1979年的標準麻袋重量的農業準入稻谷價格，假定全部收獲都上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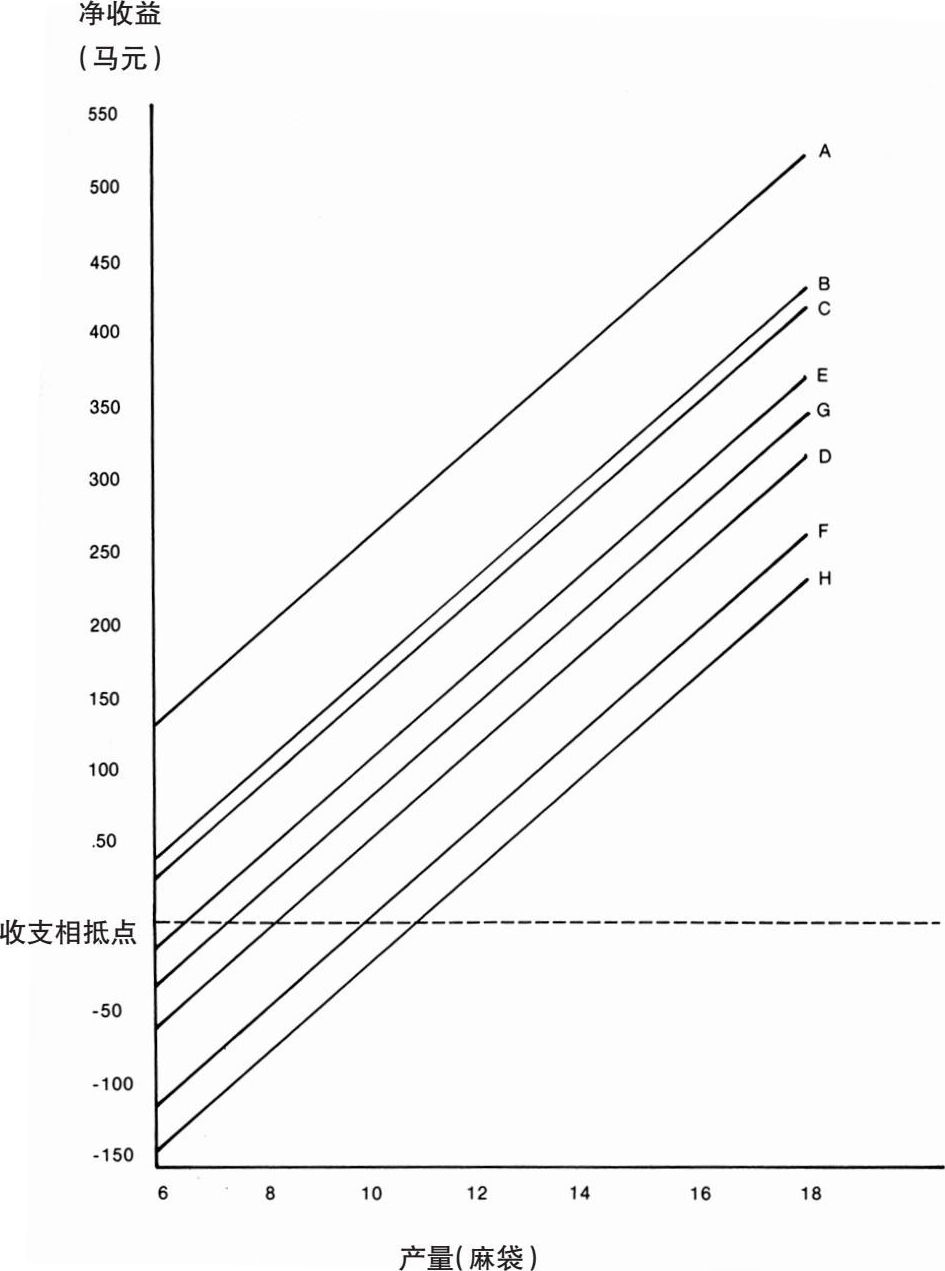
d 低生產成本假定耕作家庭使用家庭勞力及/或交換勞力而非雇傭勞力來插秧和收割。他們還假定田地只由拖拉機犁耕一次，使用相對較少的肥料，并且運輸成本很低。

e 高生產成本假定用雇傭勞力來插秧和收割，田地耕作兩遍，使用相對較多的肥料，并且運輸成本更高。

類別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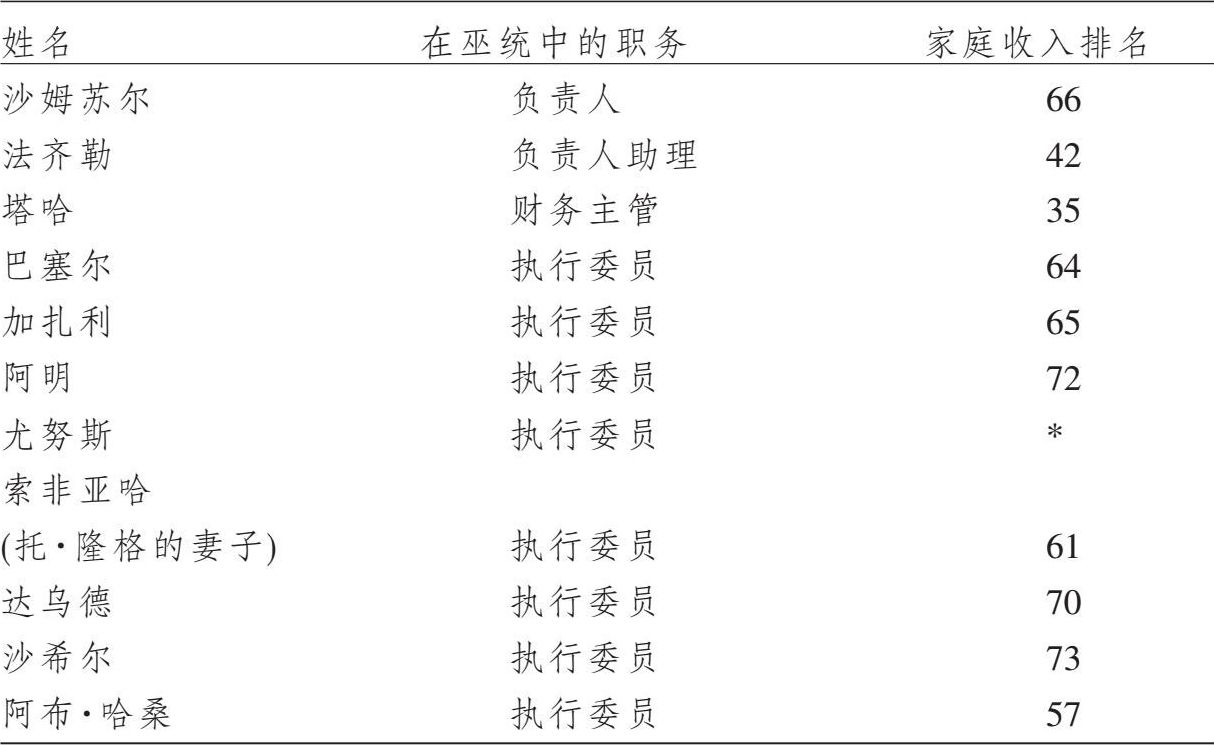
A.只對那些擁有充足的家庭勞動力供給、擁有土地數少于3里郎的小土地所有者才發生。B.在許多大規模的土地所有者以及/或者那些只有少量可資利用的家庭勞動力的情形下發生。C.如同在A中一樣，除了農場主是一個以特許地租（往往是從父母或岳父母那里）租地的佃戶。D.如同在B中一樣，除了農場主是一個以特許地租租地的佃戶。E.如同在A中一樣，除了農場主是一個以非親屬標準獲得新的租賃期限的佃戶。F.如同在B中一樣，除了農場主是一個以非親屬標準獲得新的租賃期限的佃戶。G.如同在A中一樣，除了農場主是一個以當地最高地租租地的佃戶。H.如同在B中一樣，除了農場主是一個以當地最高地租租地的佃戶。

圖C3a 1979年取決于產出規模的塞達卡各階級耕種者每里郎凈收益



注：參見表C3的實際數據以及那些收益已被記錄的耕種者階級的數據。

表C4 1979年塞達卡巫統村莊發展委員會（JKK）官員及成員（附家庭收入排名）



\*極其富有的土地所有者（擁有45里郎土地、兩輛卡車、小型稻米磨坊）的兒子，住在村邊。他父親被選為包括塞達卡在內的聯邦議會選區（Jerai）的巫統委員會的頭領。

## 附錄D 飛翔信的譯文

注：1979年3月，飛翔信的這份復本在塞達卡地區流傳。其形式類似于其他諸如此類的信件。它們以類似于西方的連鎖信的方式散布。

以最仁厚和慈悲的，

安拉的名義。

（這封信一字一句

毫無更改地

來自一封匿名信）

此信，以來自麥加圣地遺囑之形式，由賽義德·艾哈邁德發給全體穆斯林。它由哈吉·馬利克傳至印度尼西亞。賽義德·艾哈邁德在先知穆罕默德的靈寢前安睡（愿安拉保佑，安寧降臨于他），睡夢中先知降諭給他。

“我將不再賜予穆斯林神恩，不再保護他們免受真主的懲處，因為許多人早已犯下嚴重的罪孽，諸如通奸、酗酒；他們不再為支付扎卡特而費心；他們總是把自己的自私自利當成崇拜的對象。賽義德·艾哈邁德，我命汝提醒那些自稱為穆斯林者。要一心信仰至真至全的安拉，耐心應對所有困境，莫讓信徒背叛安拉。”

末日審判的征兆

1.1971年，許多家庭主婦在未通知其丈夫的情況下離家，此類事例為數甚多。

2.1972年，兩星視若牝雞。

3.1980年，塵世將陷入黑暗三天三夜；

太陽將西升北落，

從那一刻起，

安拉將不再接受懺悔。

賽義德·艾哈邁德誓言

我謹向安拉立誓，倘使我的夢是編造，我將被逐出穆斯林之列，誰不相信我夢境，將會變為異教徒，并且，當末日審判即刻到來的那一日，將被逐入地獄。

注意：1.寫給所有自稱穆斯林者；此信應該傳給其他地區的穆斯林。仔細閱讀這封信，因為此信是賽義德·艾哈邁德以安拉遺囑及誓言之名給所有穆斯林信眾的。

沙特阿拉伯

2.在先知穆罕默德靈寢前讀《古蘭經》的時候，賽義德·艾哈邁德安然入睡并做了這個夢。80000穆斯林已去世，但是就其總體而言，甚至無一人真正虔誠。家庭主婦不聽從她們的丈夫的訓誡。富人不憐憫窮人。許多人不支付扎卡特，不事善功。這就是賽義德·艾哈邁德向信眾散發此圣約的緣由，其目的在于讓信眾走上正途，因為末日審判將突然降臨。星辰將升上天穹，懺悔之門將會關閉。所有圣述都將衰落，太陽將逼近（地球）。

讀到此種信件的窮人將變得富有。如果印制此信30份并傳播出去，所有愿望都將實現。兩周后，聽從此訓諭的人都將被酬以良好的生活。在孟買，有一個人謄抄了此意愿，因而給其生意帶來利潤。另一方面，誰認為此圣約為偽，他的男性子嗣將會死去。誰讀過此信并且理解其意，卻不告知他人，他就將面臨生活中諸種窘境。但誰謄抄并傳播此信，誰就將獲諸多好處。

唯有安拉全知

唯有安拉吾信

唯有安拉可護佑，引領吾輩。

# 參考文獻

Abercrombie, Nicholas.1980.Class Structure andKnowledge.Oxford:Blackwell.

Abercrombie.Nicholas, Stephen Hill, and Bryan S.Turner.1980.The Dominant Ideology Thesis.London:Alien & Unwin.

Adas, Michael.1981."From Avoidance to Confrontation:Peasant Protest in Precolonial and Colonial Southeast Asia."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History 23（2）：217-47.

Afifuddin Haji Omar.1977.Irrigation Structure and Local Peasant Organization, MADA Monograph No.32.Ator Setar:MADA.

——.1978.Peasants, Institutions, and Development in Malaysia:The Political Economy ofDevelopment in the Muda Region.MADA Monograph No.36.Alor Setar:MADA.

——.1980."The Pivotal Role of an Integrated Institutional Reform in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Rice Peasantry in Malaysia."Paper presented at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The Peasantr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ASEAN Region,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Bangi.

Ahmad Mahdzan bin Ayob.1980."Choice of Technology in Rice Harvesting in the Muda Irrigation Scheme, Malaysia."Ph.D.diss.University of Florida.

Alavi, Hamza.1972."The State in Post-colonial Societies:Pakistan and Bangladesh."New LeftReview 74:59-81.

Alier, Juan Martinez 1971.Labourers and Landowners in Southern Spain.St.Anthony's College.Oxford, Publications, No.4，London:Allen & Unwin.

Anand, S.Forthcoming.The Size Distribution ofIncome in Malaysia Washington, D.C.:World Bank.

Ayoob, M.1981.The politics ofIslamic Reassertion.London:Croom Helm.

Badan Dakwah Islamiah, Pejabat Zakat Negeri Kedah.N.d.，probably about 1970，Panduan Zakat.Alor Setar:Majlis Ugama Negeri Kedah.

Bahro, Rudolf.1981.The Alternative in Eastern Europe.Trans.David Fernbach.London:Verso.

Bailey, Connor.1976."Broker, Mediator, Patron and Kinsman."Athens, Ohio:Ohio Universit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Bailey, F.G.1971.Gifts and Poison:The Politics of Reputation.New York:Schocken.

Balzac, Honoré de.1949.Les Paysans.Paris:Pleiades.

Banks, David.1972."Changing Kinship in North Malaya."American Anthropologist 74 （2）:1254-75.

Barnard, Rosemary.1973."The Role of Capital and Credit in a Malay Rice-Producing Village."Pacific Viewpoint 14 （2）:113-36.

——.1978."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in a Kedah Village，1967-1978."Paper presented at Second 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its, Sydney, May 15-19.

Bell, Clive.1979."Some Effects in the Barter Terms of Trade on a Small Regional Economy."Washington, D.C.: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World Bank.Mimeo.

Bell, Clive, Peter Hazell and Roger Slade.Forthcoming.The Evaluation ofProjects in Regional Perspective:A Case Study of the Muda Irrigation Project.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Press.

Berwick, E.J.H.1956.Census of Padi Planters in Kedah，1955.Alor Setar: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Government of Malaysia.

Bloch, Marc.1970.French Rural History:An Essay on Its Basic Characteristics.Trans.Janet Sondheimer.Berkeley:Univ.of California Press.

Bonney, R.1971.Kedah，1771-I821:The Searchfor Serurty and Independence.Kuala Lumpur:Oxford Univ.Press.

Bourdieu, Pierre.1977.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Trans.Richard Nice.Cambridge Univ.Press.

Brow, James.1981."Some Problems in the Analysis of Agrarian Classes in South Asia."Peasant Studies 9 （1）:15-33.

Caldwell, M.，and M.Amin.1977.Malaya:The Making ofa Neo-Colony.London:Spokesman.

Carr, E.H.1966.The Bolshevik Revolution:1917-1923.Vol.1.Harmondsworth:Penguin.

Cheah Boon Kheng.1981."Social Banditry and Rural Crime in North Kedah，1909-22."Journal ofthe Malaysian Branch of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54 （2）:98-130.

——.1980."Social Banditry and Rural Crime in Kedah，1910—1929:Historical and Folk Perceptions."Paper presented to Con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istorians of Asia, Kuala Lumpur.

Cobb, R.C.1970.The Police and the People:French Popular Protest，1789-1820.Oxford:Clarendon.

Cohn, Norman，1957.The Pursuit of the Millennium.London:Seecker and Warburg.

Corner, Lorraine.1979."The Impact of Rural Out-Migration Labour:Supply and Cultivation, Techniques in a Double-Cropped Padi Area."Typescript.

——.1980."Mobility in the Context of Traditional Family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Linkages, Reciprocity and Flow of Remittances."Typescript.

——.1982."The Impact of Rural Outmigration on Labour Utilization of Padi Households in Muda."Paper presented at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Canadian Council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ingapore, June.

Couillard, Marie-Andr伢.1982."A Brief Exploration into the Nature of Men/Women Relations among Pre-Colonial Malayan People."Paper presented at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Canadian Council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ingapore, June.

Daane, John R.V.1978."Farmers and Farmers'Organizations:A Study of Changing Resource Use Patterns in the Muda Area."Preliminary Report No.2.Mimeo.

Daane, John R.V.，and Gert Kalshoven.1979."Rural Organizations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West Malaysia."Mimeo.

De Koninck, Rodolphe.1979."The Integration of the Peasantry:Examples from Malaysia and Indonesia."Pacific Affairs 52:265-93.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Government of Malaysia.1973.Household Expenditure Survey.Kuala Lumpur.

Dickens, Charles.1971.Our MutualFriend.Harmondsworth:Penguin.

Disraeli, Benjamin.1950.Sybil:Or the Two Nations.Oxford:Oxford Univ.Press.

Djamour, J.1959.Malay Kinship and Marriage in Singapore.London:Athlone Press, Univ.of London.

Dobby.E.H.G.1951."The North Kedah Plain:A Study in the Environment of Pioneering for Rice Cultivation."Economic Geography 27:287-315.

Doering, Otto Charles，Ⅲ.1973."Malaysian Rice Policy and the Muda Irrigation Project."Ph.D.diss.，Cornell Univ.

Donohue, J.J.，and J.L Esposito.1982.Islam in Transition:Muslim Perspectives.New York:Oxford Univ.Press.

Dumont, Louis.1970.HomoHierarchicus.London:Weidenfeld & Nicholson.

Dunn, John.1979."Practising 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 on 'Realist'Assumptions."In Action andInterpretation: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the Social Sciences, edited by C.Hookway and P.Pettit.Cambridge:Cambridge Univ.Press.

Durkheim, Emile.1964.The Division ofLabour in Society.NewYork:Free Press.

Economic Consultants Ltd.1977.Kedah-Perlis Development Study:Interim Report, Alor Setar.

Edelman, Murray.1974."The Political Language of the Helping Professions."Politics andSociety 4（3）：295-310.

Elwert-Krerschmar, K.1983."Zur sozialen und ökonomischen Organization von Haushalten im ländlichen Westmalaysia."Diplom Thesis, Universität Bielefeld.

Engels, Friedrich.1973.The Condition of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

Far Eatern Economic Review.1981.Asia 1980 Yearbook.Hong Kong: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Fatimah, H.1980."Differentiation of the Peasantry:A Study of the Rural Communities in West Malaysia."Journal ofContemporaryAsia 10 （4）:40022.

Farimah, M.A.1978."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Government Policy Measures Relating to Padi and Rice Industry."Ph.D.diss.，University of Newcastle-upon-Tyne.

Fegan, Brian.1979."Folk-Capitalism:Economizing Strategies of Wet Rice Farmers in a Philippine Village."Ph.D.diss.，Yale University.

——.1978."The Establishment Fund of Peasants and Population Increase in Central Luzon:Changing Class Structures."Paper presented at Second Conference of the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Sydney, May 15-19.

Femia, Joseph.1975."Hegemony and Consciousness in the Thought of Antonio Gramsci."PoliticalStudies 23（1）.

Ferro, Marc.1971."The Russian Soldier in 1917:Undisciplined, Patriotic, and Revolutionary."Slavic Review 30（3）：483-512.

Firth, R.1981."Spiritual Aroma:Religion and Politics."American Anthropologist 83:582-301.

Firth, R.，and B.D.Yamey, eds.1964.Capital, Saving and Credit in Peasant Societies.London:Allen & Unwin.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World Bank Cooperative Program.1975.The Muda Study.2 vols.Rome:FAO.

Fredericks, L.J.，G.Kalshoven, and J.R.V.Daane.1980."The Role of Farmers'Organizations in Two Paddy Farming Areas in West Malaysia."Bulletin Nr.40.Wageningen:Afdelingen voor Sociale Wetenschappen aan de Landbou-whogeschool.

Fujimoto, Akimi.1980."Land Tenure, Rice Production, and Income Sharing among Malay Peasants:Study of Four Village."Ph.D.diss.Flinders University, Australia.

Fukui, H.，and Y.Takaya.1978."Some Ecological Observations on Rice-Growing in Malaysia."SoutheastAsian Studies 16（2）：189-97.

Funston, J.N.1980.Malay Politics in Malaysia:A Study ofPAS and UMNO.Kuala Lumpur:Heinemann.

Gaventa, John.1980.Power and Powerlessness:Quiescence and Rebellion in an Appalachian Valley.Urbana:Univ.of Illinois Press.

Geertz, Clifford.1973."Thick Description:Toward an interpretive Theory of Culture."Chap.1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Culture.New York:Basic.

——.1980."Blurred Genres:The Refiguration of Social Thought."American Scholar 49 （2）:165-79.

Genovese, Eugene D.1974.Roll, Jordan, Roll:The World the Slaves Made.New York:Pantheon.

Gibbons, D.S.1983."Paddy Poverty and Public Policy."Mimeo.

Gibbons, D.S.，Rodolpbe de Koninck, and Ibrahim Hassan.1980.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Poverty and Inequality:The Distributional Impact of the Green Revolution in Regions of Malaysia and Indonesia.Farnsborough:Saxon House.

Gibbons, D.S.，Lim Teck Ghee, G.B.Elliston, and Shukur Kassim.1981.Hak Milik Tanah di Kawasan Perairan Mnda:Lapuran Akbir（Land tenure in the Muda irrigation area:Final report）.Part 2，Findings.Pulau Pinang:Pusat Penyelidekan Dasar and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Giddens, Anthony.1979.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Analysis.Berkeley:Univ.of California Press.

Gilmore, David.1978."Patronage and Class Conflict in Southern Spain"Man（n.s.） 12:446-58.

Goffman, Erving.1956."The Nature of Deference and Demeanor."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8 （June）.

——.1967.Interaction Ritual:Essays on Face-to-Face Behavior.Garden City:Anchor Books, Doubleday.

Goldman, R.，and L.Squire.1977."Technical Change, Labour Use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the Muda irrigation Project."Development Discussion Paper No.35.Cambridge:Harvard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Gramsci, Antonio.1971.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Ed.and trans.Quinte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London:Lawrence & Wishart.

Griffin, Keith.1974.The Political Economy ofAgrarian Change:An Essay on the Green Revolution.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Press.

Guillaumin, Emile.1983.The Lift ofa Simple Man.Ed.Eugene Weber, rev.trans.Margaret Crosland.Hanover, New Hampshire: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Habermas, Jurgen.1971.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Trans.Jeremy J.Shapiro.Boston:Beacon.

——.1970."Towards a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Inquiry 13:36075.

Haraszti, Mikl仵s.1978.A worker in a worker's State.Trans.Michael Wright.New York:Universe Books.

Harrison, Brian.1966."Philanthropy and the Victorians."Victorian Studies 9（4）：353-74.

Haviland, John Beard.1977.Gossip, Reputation and Knowledge in Zinacantan.Chicago:Univ.of Chicago Press.

Hay, Douglas.1975."Poaching and the Game Laws on Cannock Chase"In Albion's Fatal Tree:Crime and Society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by Douglas Hay, Peter Linebaugh, John G..Rule, E.P.Thompson, and Cal Winslow.New York:Pantheon.

Hegel, G.W.F.1977.Phenomenology of the Spirit.Trans.A.V.Miller, with analysis and foreword by J.N.Findlay.Oxford:Clarendon.

Herring, Ronald.1983."Landlordism as a Social System:Quiescence and Protest in Kerala."Paper presented to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San Francisco, March 23-27.

Hill, Christopher.1972.The World Tunred Upside Down.New York:Viking.

Hill, R.D.1977.Rice in Malaysia:A study in Historical Geography.Kuala Lumpur:Oxford Univ.Press.

Hirschman, Albert O.1970.Exit, Voice, and Loyalty: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States.Cambridge:Harvard Univ.Press.

Hobsbawm, Eric.1965.Primitive Rebels:Studies in Archaic Forms of Social Movement in the 19th and20th Centuries.New York:Norton.

——.1973."Peasants and Politics."Journal ofPeasant Studies.1（1）:3-22.

Hobsbawm E.J.，and George Rude.1968.Captain Swing.New York:Pantheon.

Hoggart, Richard.1954.The Uses ofLiteracy.London:Chatto & Windus.

Ho Nai Kin.1978.Implementation and Supervision Problem ofInstitutional Padi Production Credit in MADA's Farmars'Association.MADA Monograph No.35 Alor Setar:MADA.

Horii, Kenzo.1972，"Thc Land Tenure System of Malay Padi Farmers:A Case Study…in the State of Kedah."Developing Economies 10 （1） 45-73.

Huizer, Gerrit.1972.Peasant Mobilization and Land Reform in Indonesia.The Hague: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

Husin, Syed Ali.1975.Malay Peasant Society and Leadership.Kuala Lumpur:Oxford Univ.Press,

——.1978.Kemiskinan dan Kelaporan Tanah di Kelantan（Poverty and land hunger in Kelantan）.Petaling Jaya:Karangkraf Sdn.Berhad.

Hyden, Goran.Beyond Ujama in Tanzania.London:Heinemann.

Ikmal Said.1980."Capitalist Encroachment in Padi Production in West Malaysia."Paper presented at Conference on Develoment:The Peasantr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ASEAN Region, Uninersiti Kebanasaan Malaysia, Bangi.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1975.Malaysia Loan 434-MA:Muda Irrigation Scheme Completion Report, No.795-MA.Washington, D.C.

——.1980.Malaysia:SelectedIssues in Rural Poverty.Vol.2.World Bank Report No，2685-MA Washington, D.C.

Isbak Shari and Jomo K.Sundaram.1980."Malaysia's 'Green Revolution'in Rice Farming: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Peasant Society."Paper presented at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The Peasantr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ASEAN Region,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Bangi.

Janeway, Elizabeth.1981.The Powers of the Weak.New York:Morrow Quill Paperbacks.

Jegatheesan, S.1976.Land Tenure in the Muda Irrigation Scheme.MADA Monograph No.29.Alor Setar:MADA.

——.1977.The Green Revolution and the Muda Irrigation Scheme.MADA Monograph No.30.Alor Setar:MADA.

——.1980."Progress and Problems of Rice Mechanization in Peninsular Malaysia."Working Paper No.17，Persidangan Padi Kebangsaan Malaysia （Malaysian national conference on paddy），Kuala Lumpur, February 26-28.

Kartodirdjo, Sartono.1973.ProtestMovements in RuralJava:A Study ofAgrarian Unrest in the 19th andEarly 20th Centuries, 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Kessler, Clive S.1972."Islam, Society and Political Behaviour:Some Implications of the Malay Case."British Journal ofSociology 23:33-50.

——.1974."The Politics of Islamic Egalitarianism."Humanniora Islamica 2:23752.

——.1978.Islam and Politics in a Malay State:Kelantan 1838-1969.Ithaca:Cornell Univ.Press.

Kim, K.K.1972.The Western Malay States，1880-1873:The Effects of Commercial Development on Malay Politics.Kuala Lumpur:Oxford Univ.Press.

Kuchiba, Masuo.1980."Kin Groupings in a Kedah Malay Village."Paper presented at Third 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Brisbane.

Kuchiba, Masuo, and L.Bauzon.eds.1979.A Comparative Study of Paddy-Growing Communities in SoutheastAsia and Japan.Kyoto:Ryukoko University.

Kuchiba, Masuo, Yoshihlro Tsubouchi, and Narifumi Maeda, eds.1979.Three Malay Villages:A Sociology ofPaddy Growers in West Malaysia.Trans.Peter and Stephanie Hawkes.Honolulu:Univ.of Hawaii Press.

Lai, K.C.1978."Income Distribution among Farm Households in the Muda Irrigation Scheme:A Development Perspective."Kajian.Ekonomi Malaysia 15 （1）:38-57.

Levine, Lawrence W.1977.Black Culture and Black Consciousness.New York:Oxford Univ.Press.

Lewis, I.M.1971，Eastatic Religions:An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Spirit Possession andShamanism.Harmondsworth:Penguin.

Lewis, Oscar.1964.Pedro Martinez:A Mexican Peasant and His Family.New York:Vintage.

Lim, Joo-Jock.1954."Tradition and Peasant Agriculture in Malaya."Malayan Journal ofTropical Geography 3:44-57.

Lim, Mah Hui.1980."Ethnic and Class Relations in Malaysia."Journal of ContemporaryAsia 10:130-54.

Lim, Teck Ghee.1977.Peasants and Their Agricultural Economy in Colonial Malaya，1874-1941.Kuala Lumpur:Oxford Univ.Press.

Lim Teck Ghee, D.S.Gibbons, and Shukur Kassim.1980."Accumulation of Padi Land in the Muda Region:Some Findings and Thoughts on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Peasantry and Development."Paper presented at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The Peasantr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ASEAN Region,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Bangi.

Lukacs, Georg.1971.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Trans.Rodney Livingstone.Cambridge:MIT Press.

Lyons, M.L.1979."The Dakwah Movement in Malaysia."Review ofIndonesian Malaysian Affairs 13:34-45.

MacAndrews, Colin.1978.Land Settlements Policies in Malaysia and Indonesia:A PreliminaryAnalysis.Occasional Papers Series, No.52.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Maeda, N.1975."Family Circle, Community and Nation in Malaysia."Current Anthropology 16:163-66.

Malaysia, Government of.1954.Report ofthe Rice Production Committee，1953.Vol.1.Kuala Lumpur.

Mansor Haji Othman.1978."Hak Milik Tanah Padi dan Politik di Kedah."Master's thesis, School of Comparative Social Science,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Marriott, McKim.1955."Little Communities in an indigenous Civilization."In Village India, edited by McKim Marriott.Chicago:Univ.of Chicago Press.

Marx, Karl.1970.Capital.Vol.1.Harmondsworth:Penguin.

Massard, J.L.1983."Kinship and Exchange Practices in a Malay Village."Paper presented at Seminar on Cognitive Forms of Social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 Asia, Amsterdam.

Meerman, Jacob.1979.Public Expenditure in Malaysia:Who Benefits and Why.A World Bank Research Publication.London:Oxford Univ.Press.

Mencher, Joan P.1980."On Being an Untouchable in India:A Materialist Perspective."In Beyond the Myths of Culture:Essays in Cultural Materialism, edited by Eric B.Ross.New York:Academic.

Milgram, Stanley 1974.Obedience to Authority:An Experimental View.New York:Harper & Row.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Fisheries, Government of Malaysia.1973.Implementation ofPadi Cultivators Act，1967.Kuala Lumpur.

Mochtar, Tamin.1980."Rural Credit:Past Record, Present and Future."Paper presented at Seminar on Economies,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umer, Consumers'Association of Penang.Penang.

Mohamed Abu Bakar.1981."Islamic Revivalism and the Political Process in Malaysia."Asian Survey 21:1040-59.

Mohd.Noh Samik."Delinquent Loanees."MADA, Bahagian Pertanian.

Mohd.Shadli Abdullah.1978."The Relationship of the Kinship System to Land Tenure:A Case Study of Kampung Gelung Rambai."Master's thesis,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Penang.

Mokhtar Mohamed.1974.Sistem Pondok dan pendidikan Islam zaman pembangunan:satu tinjauan ke atas Pondok di Pendang, Kedah（Pondok system and Islamic educ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area:An examination of the Pondok at Pendang, Kedah）.Thesis,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Bangi.

Mokhzani bin Abdul Rahim.1973."Credit in a Malay Peasant Society."Ph.D.diss.，University of London.

Moore, Barrington, Jr.1966.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Boston:Beacon.

——.1978.Injustice:The SocialBases ofObedience andRevolt.White Plains:M.E.Sharpe.

Mullin, Gerald W.1972.Flight and Rebellion:Slave Resistance in Eighteenth-Century Virginia.New York:Oxford Univ.Press.

Muzaffar, Chandra.1979.Protector?An Analysis ofthe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Loyalty in Leader-Led Relationships within Malay Society.Pulau Pinang:Aliran.

Nagata, Judith.1974."What is a Malay? Situational Selection of Ethnic Identity in a Plural Society."American Ethnologist 1（2）:331-50.

——.1975.Pluralism in Malaysia:Myth andReality.Leiden:Brill.

——.1976."Kinship and Social Mobility among the Malays."Man（n.s.） 11:40009.

——.1979.MalaysianMosaic:Perspectivesfrom aPoly-ethnic Society.Vancouver:Univ.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80."The New Fundamentalism:Islam in Contemporary Malaysia."Asian Thought andSociety 5:128-41.

——.1980."Religious Ideology and Social Change:The Islamic Revival in Malaysia."Pacific Affairs 53:405-39.

——.1982."Islamic Revial and the Problem of Legitimacy among Rural Religions Elites in Malaysia."Man（n, s.） 17:42-57.

Newby, Howard.1972."Agricultural Workers in the Class Structure."Sociological Review 20 （3）:413-39.

——.1975."The Deferential Dialectic."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History 17 （2）:139-64.

Nonini, Donald M.，Paul Diener, Eugene E.Robkin.1979."Ecology and Evolution:Population, Primitive Accumulation, and the Malay Peasantry."Typescript.

Ouchi, T.，et al.1977.Farmer and Village in West Malaysia.Tokyo:Univ.of Tokyo Press.

Orwell, George.1937.The Road to Wigan Pier.London:Left Book Club.

Paige, Jeffrey M.1975.Agrarian Revolution:Social Movements and Expert Agriculture in the Underdeveloped World.New York:Free Press.

Parkin, Frank.1971.Class Inequality andPolitical Order.New York:Praeger.

Patnaik, Utsa.1979."Neo-Populism and Marxism:The Chayanovian View of the Agrarian Question and Its Fundamental Fallacy."Journal ofPeasant Studies 6 （4）:375-420.

Piven, Frances Fox, and Richard A.Cloward.1977.Poor People's Movements:Why They Succeed, How They Fail.New York:Vintage.

Popkin, Samuel L.1979.The RationalPeasant.Berkeley:Univ.of California Press.

Purcall, J.T.1971.Rice Economy:A Case Study of Village in West Malaysia.Kuala Lumpur:Univ.of Malaya Press.

Radin, Soenarno.1960."Malay Nationalism，1900-1945."Journal ofSouth East Asian History 1:1-28.

Rainwater, Lee.1966."Crucible of Identity:The Negro Lower Class Family."Daedalus 95:172-216.

Roff, W.R.1967.The Origins ofMalay Nationalism.New Haven:Yale Univ.Press.

——.ed.1974.Kelantan:Religion,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a Malay State, Kuala Lumpur:Oxford Univ.Press.

Rude, George.1964.The Crowd in History，1730-1848.New York:Wiley.

Sabel, Charles.1982.Work and Politics: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Indust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Press.

Said, Eduard.1981.Covering Islam:How the Media and the Experts Determine How We See the Rest ofthe World.New York:Pantheon.

Salzman, Philip Carl.1981."Culture as Enhabilments."In The Structure ofFolk Models.edited by Ladislav Holy and Milan Stuchlik ASA Monograph No.20.New York:Academic.

Sarkisyanz, E.1965.Buddhist Background ofthe Burmese Revolution.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

Scott, James C.1976.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Subsistence and Rebellion in SoutheastAsia.New Haven:Yale Univ.Press.

——.1977."Hegemony and the Peasantry."Politics andSociety 7 （3）:267-96.

——.1977."Protest and Profanation:Agrarian Revolt and the Little Tradition."Theory andSociety 4 （1）:1-38，and 4 （2）:211-46.

——.1979."Revolution in the Revolution:Peasants and Commisars."Theory and Society 7 （1）:97-134.

Selvadurai, S.1972.Padi Farming in West Malaysia.Bulletin No.27.Kuala Lumpor: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Fisheries.

Shamsul, Amri Baharuddin.1979."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of the Malaysian Peasantry."Journal ofContemporaryAsia 9:434-54.

——.1981."Malay Village Politics:Some Past Observations and Recent Findings."Paper presented at Fourth 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Melbourne.

——.1981."Politics of Poverty Eradication:Local Level Implementation of Development Programmes in Malaysia."Paper presented at Fifty-second ANZAAS Congress, Section 25，Anthropology.Macquarie University, North Ryde,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

Sharil Talib.1979."Malay Socie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Programme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Universiti Malaya.Mimeo.

Sharom Ahmat.1970."The Structure of the Economy of Kedah，1879-1905."Journal ofthe Malaysian Branch ofthe RoyalAsiatic Society 43 （2）:1-24.

——.1970."The Political Structure of the State of Kedah，1879-1905."Journal ofSoutheastAsian Studies 1 （2）:115-28.

Shukur Kassim et al.1983."Study of Strategy, Impact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Integrated Rural Development Projects."2 vols.Report prepared for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by the Centre for Policy Research,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Penang.

Singh, Ajit.1978."Laporan Kesihatan Kawasan Kedah-Perlis，1970-1977."Alor Setar:Jabatan Pengarah Perkhidmatan Perubatan dan Kesihatan.

Skocpol, Theda.1979.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Press.

Snodgrass, D.1981.Inequa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alaysia.Kuala Lumpur:Oxford Univ.Press.

Solzhenitsyn, A.1968.The First Circle.Trans.Thomas P.Whitney.New York:Bantam.

Stenson, M.R.1976."Class and Race in Malaysia."Bulletin ofConcernedAsian Scholars 8:45-54.

Stoler, Ann.1979."The Limits of Class Consciousness in North Sumatra."Mimeo.

Sundaram, Jomo Kwame.1977."Class Formation in Malaysia."Ph.D.diss.，Harvard University.

Swift, M.G.1964."Capital, Saving and Credit in a Malay Peasant Economy."In Capital, Saving, and Credit in Peasant Societies, edited by R.Firth and B.D.Yamey，133-56.London:Allen & Unwin.

——.1965.Malay Peasant Society in Jelebu.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Monograph on Social Anthropology, No.29.New York:Humanities Press.

Thillainathan, R.1977."PubIic Policies and Programmes for Redressing Poverty in Malaysia:A Critical Review."In Some Case Studies on Poverty in Malaysia:Essays Presented to Ungku Aziz, edited by B.A.R.Mokhzani and Khoo Siew Mun.Kuala Lumpur:Persatuan Ekonomi:Malaysia Press.

Thompson, E.P.1966.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New York:Vintage.

——.1975."The Crime of Anonymity."In Albion's Fatal Tree by Douglas Hay et al.New York:Pantheon.

——.1978."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Society:Class Struggle without Class."SocialHistory 3（2）.

——.1978.The Poverty ofTheory and Other Essays.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

Thomson, A.M.1954.Report to the Government ofthe Federation ofMalaya on the Marketing ofRice.Rome: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Turner, Roy, ed.1974.Ethnomethodology:Selected Readings.Harmondsworth:Penguin.

Unfederated Malay States.1907-1956.AnnualReports ofthe Advisor to the Kedah Government.Alor Setar:Government Printer.

Uphoff, Norman, and Milton Esman.1974.Local Organization for Rural Development:Analysis of Asian Experience.Ithaca:Rural Development Committee, Cornell University.

Wan Zawawi, Ibrahim.1978."A Malay Proletariat:The Emergence of Class Relations on a Malay Plantation."Ph.D.diss.，Monash University.

Wharton, C.R.1962."Marketing, Merchandising and Moneylending:A Note on Middleman Monopsony in Malaya."Malayan Economic Review 7（2）:24-44.

Wildman, Allan.1970."The February Revolution in the Russian Army."Soviet Studies 22 （l）:3-23.

Williams, Raymond.1973.The Country and the City.New York:Oxford Univ.Press.

Willis, Paul.1977.Learning to Labour.Westmead:Saxon House.

Wilson, T.B.1955."The Inheritance and Fragmentation of Malay Padi Lands in Krian, Perak."Malayan AgriculturalJournal 38 （2）:78-109.

Windstedt, R.O.1936."Notes on the History of Kedah."Journal ofthe Malay Branch ofthe RoyalAsiatic Society 14:155-89.

Wolf, Eric R.1969.Peasant Wars of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Harper & Row.

——.1975.Agrarian Revolution:SocialMovements andExportAgriculture in the Underdeveloped World.New York:Free Press.

Wong Hin Soon.1980."Field Problems in Post-Production Handling of Padi."Working Paper No 19.Persidangan Padi Kebangsaan Malaysia （Malaysian naional conference on paddy），Kuala Lumpur, February 26-28.

Yamashita, Masanabu, Wong Hin Soon, and S.Jegatheesan.1980."MADA-TARC Cooperative Study, Pilot Project ACRBD 4，Muda Irrigation Scheme, Farm Management Studies."Mimeo.

Young, Kevin.William C.F.Bussink, and Parvez Hassan.1980.Malaysia's Growthand Equity in a Multiracial Society.A World Bank Country Economic Report.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Press.

Zakariah Ismail.1980."Economic and Social Aspects of Padi Production:Some Recent Trends."Paper presented at Seminar on Economics,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umer, Consumers'Association of Penang, Penang.

Zola, Emile.1980.The Earth.Trans.Douglas Parmee.Harmondsworth:Penguin.

# 索引

（條目后的數字為原書頁碼，見本書邊碼）

Abdul Majid（阿布杜爾·馬吉德）：5，159，218，221，226，233

Abdul Rahim（阿布杜爾·拉希姆）：93，198，261n

Abdul Rahman（阿布杜爾·拉赫曼）：22，93，122，141n，161n，164，171，173，175，207，234，244，260，281

Abercrombie, Nicholas（尼古拉斯·阿伯克龍比）：247n，319n，320

Abu Hassan（阿布·哈桑）：21，94，127，135n，144，155，195，227，267，360

Abu Saman（阿布·薩曼）：206—208

Accumulation（積聚）：181—82，234—35；資本積聚：181，184；土地積聚：14—17，96—97，149

Accusation:language of（指責的語言），186—189；logic of（指責的邏輯），160—162，168—169，181—183

Afifuddin Haji Omar（阿費夫丁·哈吉·奧馬爾）：72n，74n

Agricultural labor（農業勞動）：51n，113 and n，306；基于性別的農業分工：117n，119。

Agriculture（農業）：51；資本主義農業：27，42，44，71，80，110，167，181—183，184，234—235，241，349；農業的商業化：71，74，85，106，107，123—124，181—182，189；種植業：32，51，55，124，313

Ahmad, Tok（托·艾哈邁德）：93，165，194—195，208—209，210

Akil（阿基勒）：217—218

Ali Abdul Rahman（阿里·阿布杜爾·拉赫曼）：23，132n

Alier, Juan Martinez（朱安·馬丁內斯·阿里爾）：262n，322n，325n，347

Ali Husin（阿里·胡辛）：190

Alor Setar（亞羅士打）：52，62，80，170n，275

Althusser, Louis（路易斯·阿爾都塞）：42，43，247n，315，317，319

Amin（阿明）：4，5，7，94，97，114，153—154，162，228，254，263，267；村莊政治中的阿明：127，128，216—217，221，226，232，360

Andalusia（安達盧西亞）：239，422n，325n，326n，347

Anderson, Perry（佩里·安德森）：278n，315n

Ani, Haji（哈吉·安尼）：13，16，20，165

Ariffin（阿里芬）：5，89，93，132n，250

Arrests, political（政治抗議/示威）：246，274，276

Arrogance（傲慢）：187，199；對窮人的傲慢：197—198，301；對富人的傲慢：195—97，239

Arson（縱火）：29，248，249

Asian Development Bank（亞洲開發銀行）：50

Ayub, Haji（哈吉·阿尤布）：13—19，21，22026，188，200n，311

Azaudin, Haji（哈吉·阿扎丁）：212

Bakar"halus"（“瘦骨嶙峋的”巴卡爾）：200

Bakri bin Haji Wahab（巴克利）：92，123，132n，161n，171，222，229，230n，255，281

Barnard, Rosemary（羅斯瑪麗·巴納德）：72n，74n，253

Basir（巴塞爾）：2，4，7，11—12，19，89，90，94，128，131，136，159，161n，226，234，274，277 and n，278—279；村莊政治中的巴塞爾：127，128，131，136，169，214—218，221，222—223，227—233，276—277，360

Behavior（行為）：38，46；前臺與后臺：284—289。

Bell, Clive（克萊夫·貝爾）：79n

Bernstein, Richard（理查德·伯恩斯坦）：45n

Blacks, American（美國黑人）：33—34，279n，329，338

Blame（責備）：160—162，168—169，182

Bloch, Marc（馬克·布洛赫）：332

Blum, Jerome（杰羅姆·布盧姆）：294n

Bourdieu, Pirre（皮埃爾·布迪厄）：283，307，310，323n，345

Boycotts（抵制）：290，291；農業勞動：250—255

Brecht, Berrolt（貝爾托·布萊希特）：346

Broadcasting（播種）：121—122，123 and n，259，260 and n，242，250n

Brown, John（約翰·布朗）

Buddhism（佛教）：331，333

Bukit Raya district（布基拉雅地區）：253，276

Burma（緬甸）：44，333

Capitalism（資本主義）：50，51，234—235，307，311，316，318；農業資本主義：27，42，44，71，80，110，167 and n，181—183，184，241，349;早期的與成熟的資本主義：182n，320—321，346；勞動的意識形態影響：339；反抗資本主義：235，302，247—248；資本主義的革命性：346—347

Carlyle, Thomas（托馬斯·卡萊爾）：347

Census（人口普查）：275，130，131，143

Charity（施舍/慈善）：9—11，135，169—178；185，189—191；施舍的減少和偷竊的增加：269—271 and n，291；作為社會杠桿的施舍：11，171—172，175，185，194—195，197；作為階級紐帶的施舍：136—137，144，156，306，208—209；施舍的類型：169—174

Chettiar moneylenders（切蒂亞爾放債者）：21，44

Christianity（基督教）：287n，331

Civil War（內戰）：30—31

Class consciousness（階級意識）：38，43，288，297，340—345

Classexperience（階級體驗）：41—47，319n Class relations（階級關系）：43，140—141，180—183，290；階級關系分析：42—47；富人和窮人的權力平衡：22—27，193—194，212，286，287—289，305；指責的轉嫁：160—162，168—169，181—183；社會權威的瓦解：311—312and n；名義平等：192—195，196，218，220；金錢從窮人向富人的流動：162，194—195；相互依賴的切斷：76—77，124，136—137，150—151，180，184，243，284，305，311，312；地主和佃農的階級關系：104—105，136—137，153—154，189，193—194，205—212，306；道義情景下的階級關系：184—185，199；政治和階級關系：134—135，180，220—233，278—281，314；富人和窮人的關系：190—198，305—314；富人和窮人的階級關系：24，124，129，134—137，141—182，199—212，241，244，282，284，288—289，305，336，338，245—248；貧富差距的擴大：57，80，84，124，182；階級關系和儀式紐帶：169，172，180，237—240，308；施舍在階級關系中的作用：136—137，144，156，169—178，189—191，194—195，306—308；共享的價值與規范：184—198，204，207—212，282—284，305—310，313，337—338；階級關系的象征：44—45，309；顛倒的階級關系：162，167—168，178—183，194—195

Class structure（階級結構）：91，95—100，199—204；階級結構的復雜性：244

Class struggle（階級斗爭）：42，147—148，243，290，296—297；階級斗爭的共同原因：338；客觀的與個人的/社會的階級斗爭：181—182

Cloward, Richard（理查德·科洛沃德）：43，323

Cobb, R.C（科布）：30，37n

Cobbett, William（威廉·科貝特）：347

Coles, Robert（羅伯特·科爾斯）：279n

Collective resistance（集體反抗）：248—265，292，295，297—299；障礙：242—248，273

Combine-harvesters（聯合收割機）：44，72，110；經紀人：161—162；在塞達卡的效果：8—9，111—112，114—121，123，125，150，154—164，167—168；對純農業勞動的影響；116—118；用戶的辯護：157—158，161；農民反抗：116，160—164，242—243，246，248—255；辛迪加：109，110n，160，167，182，249；富人和窮人的觀點：154—164；雇用勞動的分布：9，67，74—76，111—125，150，155—164

Commercialization（商業化）：57，71，74，85，106，107，123—124，181—182，189

Commodity fetishism（商品拜物教）：39n，307n

Compliance and conformity（順從與服從）：24—26，273，277，289，302，304；虛假的：25，29，34，37，279—280，284—286，288—289；虛假意識：39—40，287，316；順從與服從的解釋：38—40，284—289，320；霸權合法性的缺少：324—335；窮人順從與服從的壓力：276—280，312；抗議：26，289；routine（常規的）：278—284，320

Concentration camps（集中營）：286，287，327—328

Conformity（服從）：參見“順從與服從”；“遵從”

Corruption and profiteering（腐敗與暴利）：128—129，143—144，222—223，225—229

Co rvée la bo r（徭役）：62，63，298，307

Counterappropriation（反占有）：34，296，301，302—303

Credit（信貸）：48，64，68，84n，136；行為不良與拖欠：84，128—129；欺騙：128；政府與準政府：56，82—84，126—129；利息率：15n，44，128；抵押制度：16—17，19，21，68，73，149，311，15

Cullam, Shelby（謝爾比·卡拉姆）：296

Cultural standing（文化立場）：237—240

Cutting of paddy（割稻）：75n，115，117，119

Danne, Jon R.V.（喬恩·戴恩）：74n

Datuk Asri（拿督·阿斯里）：224n

Daud bin Haji Jafaar（達烏德）：4，89，97，127，128，131，161n，201，216—217，221，360

Death benefit societies（喪葬互助會）：3，132，134，136，238

Deference（遵從）：24—25，191，197—198，273；恐懼死亡導致的遵從：286，327—328；“虛假的”：25，279—280，285—286，288—289，327n

Defiant behavior（挑釁行為）：26，32，33，243

De Koninck, Rodolphe（魯道爾夫·德·科寧克）：221n

Demonstrations and riot（示威與暴亂）：52，53—54，254，334；在塞達卡的缺失：273；在亞羅士打：80，275—276

Dependencies:rich-poor（窮人和富人之間的相互依賴）：76，180，284，86，305—306，312；依賴的斷絕：76—77，124，137，150—151，180，184，243，284，311，312；富人對國家的依賴：312—313

Desertion（丟棄/開小差）：30—31，32，291，293—294，301

Determinism（決定論）：317

Dignity（尊嚴）：尊嚴的喪失，窮人的尊嚴：236—240

Din, Haji（哈吉·丁）：165，194—195，208—209，210

Dissimulation（掩飾）：25，29，200—204，281，284—285，287，288

Double-cropping（雙季稻/雙耕）：55，186；效果：49，66—68，69，75—78，147；在塞達卡的效果：8，42，95—125，137，140，148—151，179—181，238—305；在吉打：65，66—68，148；窮人和富人的觀點：148—151

Drought relief programs（抗旱方案）：126，129—130，135

Dulang（village）（杜蘭村）：216，217

Dullah（杜拉）：11，90，92，143，149，171，174，175，186，198，228，230n，270—271

"Dull compulsion of economic relations"（經濟關系的無聲的壓力）：252，277—278，304，317，336

Dunn, John（約翰·鄧恩）：47

Durkheim, Emile（埃米爾·涂爾干）：247

Dzulkifli bin Haji Wahab（朱基夫里）：93，161n，222，230n，281

Economic system:and class relations（經濟體制和階級關系）：42，246，252，306—309，336；“無聲的壓力”：252，277—278，304，317，336

Economy, Malaysian（馬來西亞經濟）：50—51，57，246n

Education（教育）：50，52n，54，57n，65，238

Elections（選舉）：1969年的選舉：53；1978年的選舉；57，58n，132；選舉體制：49，52—53，314

Elite（精英）：38—40；階級價值的接受：40—41，194—185，287，304—305，311—312，313—314，315—317，335，336，341；政治精英：53；政治派系中的精英：132，135，135n;鎮壓的運用：246；村莊精英：25—27，129，132，137，220，283，288—289

Employment（就業）：56，67，135；village（階級之間的紐帶）：136—137

Engels, Friedrich（弗里德里希·恩格斯）：265，315，321

Equality（平等）：192—195，196，218，220

Esman, Milton（米爾頓·埃斯曼）：83

Euphemization（委婉化）：205；社會經濟權力的委婉化：306—309，314

Evasion（逃避）：31，35，36，301，302，329

Exchange labor（交換勞動）：113，115，300

Exploitation（剝削）：39，35，180，302，302，307；形式：328；最大化：76—77，243；理性化：204—212；狀況：240；詞匯與例子：186—198

Exports（出口）：50—51，54，314

Factionalism（宗派主義）：43，140，214—218，224

Fadzil（法齊勒）：11，19，93，97，109，141，159，166，214—219，223，267—268，271；村莊政治中的法齊勒：127，128，132，221，231—232，360

False-consciousness（虛假意識）：39—40，43，49，139，247，279，287；制度基礎：315—317，322；自我折磨：322—324

Farmers'Association（農會）：82—83，125—126，275；階級特征：126—128，129；貪污與牟利：128—130；賽達卡地區的農會：12，86，87，126—130，131，136，159，217

Farm size（農場面積）：穆達的農場面積63，64，69，70：；賽達卡的農場面積：91，95，98—99，100—102；大經營者的結構性條件：71—85，99—100，167

Feasts（筵席）：馬來西亞的筵席：87，149，162，169，172—178，237—239；社會地位的顛倒：287，331

Femia, Joseph（約瑟夫·費米亞）：316

Feminism（女性主義）：33

Fertilizer（化肥）：48，55—56，64，66，72，82，126，128

Feudalism（封建主義）：287，328，330—331，340

Field preparation（備耕）：74，113—114

Firth, Raymond（雷蒙·弗斯）：190

Flying letters（飛翔信）：334，362

Food（食物）：66，148—149；肉：174；窮人與富人：6

Foot dragging（拖后腿）29，34，35，251，255，302

French Revolution（法國大革命）：344

Frontier society（邊疆社會）：59，62，64，266

Fujimoto, Akimo（明實藤本）：72，74，192，213

Funerals（火葬）：3，7，225，238

Gaafar（加法爾）：217—218，219

Gaventa, John（約翰·加文塔）：277，325

Geertz, Clifford（克利福德·格爾茨）：45，139

Gelam Dua（village）（基蘭杜村）：253

Genovese, Eugene（尤金·基諾維斯）：292，293，329，338

Ghandi, Indira（英迪拉·甘地）：283

Ghani Lebai Mat（加尼·勒拜·瑪）：7，94，127，128，164，166，209，267

Ghazali（加扎利）：5，18，94，126，144，156，207，223，228—229，360

Gibbons, D.（吉本斯）：221

Giddens, Anthony（安東尼·吉登斯）：318，319，321，338

Gilmore, David（戴維·吉爾摩）：239

Goffman, Erving（艾爾溫·戈夫曼）：11

Gossip（流言）：282，284，290

Government policy（政府政策）：54—57，182，275，77

Government services and subsidies（政府服務與補貼）：4，12，50，52，220—221，314

Gramsci, Antonio（安東尼奧·葛蘭西）：39，315—317，322，331，336—337，340—341，346

Greed（貪婪）：17，22，197—188

Green revolution（綠色革命）：41—42，56，186

Griffin, Keith（基斯·格里芬）：80，84

Gross national product（國民生產總值）：50

Guar Cempedak（town）（古阿·貞布達鎮）：131，276

Gullick, John M.（約翰·古利克）：62

Habermas, Jurgen（尤根·哈貝馬斯）：274n，286，315

Haji, title and status（哈吉，稱呼和地位）：18—22，44—45，107，181

Hamid（哈米德）：93，141n，160

Hamzah（哈姆扎）：1—3，7，24，89，92，113，145—46，150，155，160，176—177，178，198，222，252，263，277n；哈吉·卡迪爾：21，271—272，279—281，309；扎卡特冠軍：11，171

Harun bin Haji Faafar（哈倫）：127

Harun Din（哈倫·丁）：93，132n

Harvesting（收割）：75，117—118，121，144—156，253—254；收割的機械化：114—116，118—119，155—157

Hasnah（哈斯納）：92，97

Hassan, Haji（哈吉·哈桑）：167

Health services（醫療服務）：50，52n，54，57n，65，87

Hearn, Francis（弗朗西絲·赫恩）：178n，299n—300n

Hegel, G.W.F.（黑格爾）：12n，139n，179，289

Hegemony（霸權）：意識形態霸權：247n，287，304—305，311—312，313—314，326；霸權沖突：335—340；葛蘭西的霸權分析：315—317；霸權爭議的不可避免性：322—324，327—328，330—331，334，347；受質疑霸權的合法性：322—324，330，334；窮人對霸權的洞悉：318—322，346；霸權概念的質疑：317—318，335

Herring, Ronald（羅納德·赫林）：312n

Hinduism（印度教）：40，287n，327，331

Hobsawm, E.J.（霍布斯鮑姆）：36n，273，301，344

Hoggart, Richard（理查德·霍格特）：322，323n

Horii, Kenzo（健三掘井）：90n—91n，98，101，103，104n，108，113，189

Housing（住房）：66，89；政府的住房津貼：89，132，143，221—223，226—233

Humiliation of poor（窮人的恥辱）：117n，176，194，237—240；避免：193，197，283

Hyden, Goran（戈蘭·海登）：302

Ideological conflict（意識形態沖突）：233—240，297，304—314，335—346；違背諾言引起的意識形態沖突：338—340，342—347；塞達卡的意識形態沖突：192—194，234—239，308—309，336，338，340，345—348；村莊大門問題：212—220；村莊改進計劃：220—223

Ideology（意識形態）：階級關系：188—198，199，204，304—314；去神秘化：40—41，316，317，346；精英控制與接受：39—41，184—85，287，304—305，311—312，313—317，335—336，341；千年的和烏托邦的：332—333，334—336；窮人的洞悉與異常解釋：318—322，346；共享價值：184—198，204，207—212，282—284，305—310，313，337—338；從屬階級：38—41，316—317，340—347

Idris（伊德里斯）：87，94，127，267

Ignorance:feigned（偽裝的傲慢）：29，33—34，37

Income（收入）：平均收入增長：55—56，77—79；平均收入的減少：78—79；穆達的農場收入：63，65，77—81，355；塞達卡的農場雇用勞動：112—113，116—124；馬來人與中國人：53；不良分配：51，53，56，57，77—80，91，95，96，124；貧困程度：9，51，52，81，82，91；瞞報策略：199—203

India（印度）：147，283；等級體系：33，39—40，289n，324，327，329，330—331

Indonesia（印度尼西亞）：147，332

Inheritance（繼承）：211；土地小片化：68n，71，99—100

Insubordination（不順從）：31，36，294

Interest rates（利率）：15n，44；補貼利率：128

Internal Security Act（國內安全法案）：53，274

Intimidation（恫嚇）：246，274—275，286

Invasion ofland（土地侵占）：32，302—303

Irrigation（灌溉）：50，66，67，111；國家安排的灌溉：48，56，82

Ishak（伊沙克）：25，93，227，229，255

Islam（伊斯蘭教）：40n，59，134—135，171—172，191，193n，333，334；扎卡特：10，18，21，31，87，144，156，169—172，173—178

Ishmail Arshad（伊斯梅爾·艾爾沙德）：159

Jaafar, Haji（哈吉·加法爾）：6，89，94，97，155，157，173，175，178，200n，234，267；村莊政治：127，132，136，277

Jamil（雅米勒）：93，127，227，263

Java:resistance in（爪哇的反抗）：41，283n，162n

Jegatheesan, S.（葉加西桑）：79，115n

Jenun（village）（浙倫村）：226

Jitra（town）（吉特拉鎮）：248

Justice, poverty and（正義與貧困）：27，237；不可避免性：322—324，330，334

Kadir, Haji（哈吉·卡迪爾）：2，7，23，25—26，89—90，94，96，114，119n，128n，144—147，251，267，269—270，271—272，279—281；守財奴：14，20—21，171，176，178，195，209；伊斯蘭教黨成員資格：133

Kamil（卡米勒）：2—3，5，94，99，126n，127，145，149，152，161n，173—174，212，222，251，267

KampungJawa（village）（爪哇村）：276

Kangkong（village）（康港村）：254

Karim（卡里姆）：92，116—117，132，150—51，156，161，223，263，281

Kasim, Tok（托·卡西姆）：92，116—117，132，150—151，156，157，161—162，174，188，195，224，229n，251，252

Kedah（state）（吉打州）：53—54，55，58，59，62—68，124，132，221，298n，313—314；土地所有制：14，16，18，62，64n，68—70，82，311—312；土地占有與使用：70—74；農民反抗：62—64，245，248—255，266，275—276；人口增加：63，71，245；貧困：63，64，71，81—82；移民：18，62；社會關系：147—148，180，243，334，337

Kelantan（state）（吉蘭丹州）：53，55，62n，135n，190，236，314；移民勞動：67，111，115，117n，158

Kemubu Irrigation Project（凱姆布灌溉工程）：55，56n

Kenduri（feast）（筵席）：149，169，172—178；238—239

Kepala Batas（town）（凱帕拉·巴塔斯鎮）：1，86—87，126，128，167，170，265，276

Kessler, Clive S.（克里夫·凱斯勒）：58，62n，135n，236n

Khalid bin Haji Jaafar（卡立德）：216

Kinship ties（親屬紐帶）：43，140，185，244，257n，310；政治聯系：133—134，136；租賃：72n，102，105—107，151，185，210—211

Koran（古蘭經）：16n，171

Kuala Lumpur（吉隆坡）：124；1969年暴亂：53

KubangJerai（古班·哲萊）：253

Kupang system（古榜制/固定的現金工資制）：119—120；121n，260

Labor（勞動）：180，313—314；作為商品的勞動：307n；控制形式：152，172，173，185，193—194，307；交換：113n，115，300；參股小組：119—120，250—255，258—260；團結：254—255，261—262，265

Labor market（勞動力市場）：259

Ladurie, Emmanuel Le Roy（伊曼紐爾·拉迪里）：18n

Landlords（地主）；22—45；同村佃戶：72n，102，105n，106—107，151，164，210—211；外村佃戶：100，102，106—107，165，196—197，206—209，235；塞達卡的佃戶關系：104—105，136—137，154—153，164—169，189，193—194，205—212；巫統支持的地主：54

Landowners（土地所有者）：大土地所有者：15—19，71，96，107，110，123—124，154，164—166；塞達卡的土地所有者：95—96，102，107，110，164，189；小土地所有者：68，71，96，102，110，149

Landownership（地權/土地所有制）：140，311—312；不平等：82，91，95—98，311；吉打的土地所有制：14，16，18，62，64n，68—70，82，311；通過債務掠奪土地：14—17，64，96—97，149，311；塞達卡的土地所有制：91，95—98，110，189 Land policy（土地政策）：52，54，55 Land prices（土地價格）：69，82，96—97，149

Land rents地租：43，164，166，185，205，264；現金地租與谷物地租：72—73，103—104，151—154，242；最高限度：54，105；地租增加：205—210，242；活租與死租：104，151—154；穆達的地租：72—73，105；契約租賃：73，108—110，151—154，166—167；窮人和富人對地租的看法：151—154

Land tenure（土地占有與使用）：類型：70—71；穆達的土地占有與使用：70—74；單極化：71，102；土地占有與使用模式：98—99，100—102，189，356—357

Lazim（拉齊姆）：93，109，127，157，168，209，251

Leasehold tenancy（契約租賃/長期租賃）：73—74，76，100，102，107—110，164，166—169，210，242

Lebai Hussein（勒拜·侯賽因）：13，93，127，128，132，197，206，221，223，252，264

Lebai Pendek（勒拜·彭德克）：94，109，114，144，161，174，178，200，213，219，225，234，253，267；村莊政治中的勒拜·彭德克：89，127，130，216—217，218n，226

Lebai Sabrani（勒拜·薩卜拉尼）：2，7，170，195，227—228，231，232

Lefebvre, Georges（喬治·列斐伏爾）：270

Lenin, Vladimir Ilich（列寧）：318，343，344

Leninism（列寧主義）：297，348

Lewis, I.M.（I.M.劉易斯）：289n

Lewis, Oscar（奧斯卡·劉易斯）：138

Liberality of the rich（富人的慷慨）：184—185，189，212，306，308—309；幫助：192—195，213，283

Loans（貸款）：142—143，146—147 Local government（地方政府）：53；塞達卡的地方政府：130—132，134，217—218，227—228，231

Long, Tok（托·隆格）：94，127，267，272，360

Ludke, Alf（阿爾夫·呂德克）：296n lukacs, Georg（蓋奧爾格·盧卡奇）：349 Luxemburg, Rosa（羅莎·盧森堡）：344n，350

Maeda, Narifumi（成文前田）：191

Mah, Tok（托·瑪赫）：94，126，206，251，264

Mahathir, Mohamed（穆罕默德·馬哈蒂爾）：220—221

Mahmud, Tok（托·穆罕默德）：89，94，141，161，164，177，229，249，252，275

Malnutrition（營養不良）：66n，67，180

Mansur（曼蘇爾）：11，89，92，132n，146，151，171，173，198，223，225，226，229，244，253，254，280

Marcuse, Herbert馬爾庫斯·赫伯特：315

Marginalization ofthe poor（窮人的邊緣化）：76—77，169，180—182，233，241，243，284，312—314；窮人在文化上的邊緣化：237—240

Martinez, Pedro（佩佐·馬丁內斯）：294

Marx, Karl（卡爾·馬克思）：246，247，261，265，308，215

Marxism（馬克思主義）：38—39，297，307，315—316，340—341，348

Mass movements（群眾運動）：38，297，298，317—318

Mat Buyong（瑪·布揚）：93，108，126，127，128，166

Mathiesen, Thomas（托馬斯·馬蒂森）：340

Mat"hatlus"（“瘦骨嶙峋的”瑪）：11，16—17，90，92，146，156，160，198，244，257，257，263；對富人的批評：142，175，177，196，230；拾穗工作：118—119，257；收入：17Mat Isa（瑪·伊莎）：94，157，173，196，229，230，250，252，257

Mat Khir（瑪·吉爾）：93，145

Mat Nasir（瑪·納西爾）：93，166，169，198，229

Mat Sarif（瑪·薩里夫）：92，132，210，269—270

Mat Tamin（瑪·塔明）：130

Maxwell, W.George（喬治·麥克斯威爾）：64

Mechanization（機械化）：在塞達卡的沖擊：95，109—110，111—125，181，305；穆達地區的機械化：64—65，74—65，74—76，82

Melaka（state）（馬六甲州）：191

Mengkuang（village）（明關村）：110，164，165，167，216，254，276

Merbuk（village）（默布克村）：226，251

Mexican Revolution（墨西哥革命）：343—344

Midon（米頓）：92，175，270

Migration（移民）：124—125，160，245；季節性移民：64，67，110，125，246

Miliband, Ralph（拉爾夫·米里班）：247，315，317

Millenarianism（太平盛世）：320，332—333，334，335，336

Miriam（米麗婭姆）：250

Mohd, Shadli Abdullah（沙茲利·阿布杜拉·穆赫德）：72，74

Mokhzani bin Abdul Rahim（穆赫扎尼）：21，188，196

Moore, Barrington（巴靈頓·摩爾）：27，237，239，245，264，322—323，342—343，350

Mosques（清真寺）：55，65，87，89，170

Motorcycles（摩托車）：66，124，148，159，214，219，267

Muda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uthority（MADA）（穆達農業發展局）：82，84，160，248，253；政治與階級特征：126，128—130

Muda Irrigation Project（穆達灌溉工程）：55—56，64—65；后果64—85；二期MUDA:123

Muda region（穆達地區）：59，63，180，313；階級沖突：147—148，243，248—255；小佃農的減少：70—72；農場機械化：64—65，74—76，82，157—158，181收入：63，64，69，70，71—72，76，82；人口增長：63，71

Mudin, Tok（托·穆丁）：227

Mullin, Gerald（杰拉爾德·馬林）：291，293，329

Musa bin Lebai Pendek（穆薩）：89，214—215，216—217

Mustapha（穆斯塔法）：93，118，168，222，277

Mystification（神秘化）：39—40，287，317，321，322—324

National Front（國民陣線）：53，57

Nayan, Haji（哈吉·納揚）：167，176，188，209

Negotiations（協商）：207，250，258—259，260

Negri Sembilan（state）（森美蘭州）

Neighborhood ties（鄰里紐帶）：43，106—107，140

New Economic Policy（新經濟政策）：54

Nizam bin Haji Lah（尼扎姆）：93，166，186，188，210，216，274

Nor（諾爾）：4，15—18，94，97，142，229

Omar, Tok（托·奧馬爾）：93，108，132，198

Oppression（壓迫）：186，327—328

Orwell, George（喬治·奧威爾）：349，350

Osman Haji Ismail（奧斯曼）：229

Paddy Marketing Authority（水稻專賣局）：86

Paddy（水稻）：110，162，165；價格：48，51，56，68，72，79—80，110，111，206，275偷竊：267—271

Pahang（state）（彭亨州）：245，335

Paine, Thomas（托馬斯·佩因）：347

Partai Islam（PAS）（伊斯蘭教黨）：53，58，183，274，276；地方政府的聯盟：224；鎮壓：274—277塞達卡的伊斯蘭教黨：26—28，131—136，215—216，218，223—224，244，274—277；村莊改進計劃中被忽視的塞達卡成員：130，131—132，135，143—144，220，221—223，226—233，279，281

Parties, political（政黨）：52—59；183；塞達卡的政黨：126—128，131—137，223—224，244—245

Paternalism（家長作風）：338，340

Patnaik, Utsa（尤沙·帕特耐克）：296

Patronage（資助/庇護）：184—185，191，199；政治資助：58，191，221；塞達卡的政治資助：12，126，128—132，135—136，142—144，220—223，225—233

Peasant resistance（農民反抗）：295—296

Peasant revolution（農民革命）：28—29，37，343—344

Penang（檳城）：48，124

Pendang（village）（彭當村）：276

Penghulu村長

Perak（state）（霹靂州）：245

Perlis（state）（玻璃市州）：53，59，188，245

Permatang Bluh（village）（帕瑪當·布魯赫村）：254

Philippines（菲律賓）：41，333

Pilfering（偷竊）：29，32，266—270，290—291，296，301，329

Piven, Frances Fox（弗朗西絲·福克斯·皮文）：43，323

Poor, the（窮人）：1—13，22—27，112—118，123—125，140—148，219—220，246，310，347—348；指責分布：61—62，168—169，181—183；偽裝策略：25，200—224，209，281，284—285，287；窮人在機構中的缺失：83—84，128，137，142，297；剝削窮人：39，76—77，135，180，204—212，243；“越來越窮”：83—84，128，137，142，297；“好窮人”：198，278—281，312；政府救助模式：130，131，142—144，221—223，226—228，231—233；拾穗機會的喪失：118—119，154；雇用關系的喪失：100，102，108—110，123—124，164—169，210—211，242；雇用勞動的喪失：9，76，112—115，123，150，155—164；邊緣化與冗余：76—77，137，169，180—182，233，136—140，243，284，312—314；對過去的重構：164，178—180，346；對意識形態霸權的洞悉：318—322，336，346；順從壓力：276—280；富人，參見“階級關系”；富人對窮人的看法：144—147，150，154，158—160，181，187，197—198，201，236，278；鄉村馬來西亞：51；塞達卡窮人的收入：91，95，124；塞達卡的土地所有制：95—98，102；塞達卡的土地使用：101，108；地位和尊嚴的喪失：236—240：塞達卡的黨派聯系：133，220；社會控制：34，152，169—178，185，192—198，307，312—313，345；對現金地租的看法：151，152—154；對聯合收割機的看法：116，155—158，160—164，167—168，242—243，248—255；對雙耕的看法：148—149，150—151；對契約租賃的看法：166—167，168—169

Popkin, Samuel L.薩繆爾·波普金

Poulantzas, Nicos（尼克斯·普蘭查斯）：247，315

Poverty（貧困/貧窮）：10n，52，236—240；文化和儀式意義：237—240；貧困的分布：53；政府的反貧困方案：51，52，54—55，221—222；正義：27，237；吉打/穆達的貧困：63，64，71，81—82最近的減緩：55

Power relations（權力關系）：22—27，193—194，286，287—289；委婉化：306—308

Primary school（小學）：131，136

Production relations（生產關系）：76，212，255，305—309，346；變遷：76—77，110—124，162，167—168，180—183，235，243，265；對窮人的越來越無關：76—77，169，233，241，284，312—314；主要問題：305，308，345，346

Profit motive（獲利動機）：18485，225，234—236；忽視的個案：192，234

Proletarianization（無產階級化）：124，241；鄉村的無產階級化：68，182

Property relations（財產關系）：140；委婉化：306—309；主要問題：308，311—312

Property rights（財產權）：49，234，237；財產權的社會用途：265

Puteh, Cik（吉·普泰赫）：6，93

Rabinow, Paul（保羅·拉賓諾）

Race, issues of（種族問題）：134，218，334

Radzi, Tok（托·拉德茲）：92，223

Rasid, Haji（哈吉·拉茲）：13，16

Razak（拉扎克）：1—13，17，18，22—26，89，92，132，145—146，151，168，175，177，193，198，211，271

Reddy, William M.（威廉·雷迪）：299

Red Sash Society（紅色綬帶社）：334

Reformism（改良主義）：318，341—344

Religion（宗教）：43，320，334；太平盛世：320，332—333；政治：58—59，134

Religious Affairs Office（宗教事務辦公室）：169，171，274

Repression（鎮壓）：40，246，274，317；一致：286—284，327—328；極端的鎮壓：246，274—277，304，336；鎮壓的性質：229；“日常的”鎮壓：274—278

Reputation（信譽）：17，24—26，185，198，228—230，234—236，240，262—263，282，284，288，290

Resettlement schemes（移民計劃）：55，124—125，131，245

Resistance（反抗）：28—37，204，239—240，284—285，304，329；匿名的反抗：36—37，242，248，250，266—272，273，277—278，282—289，297；集體：248—265，273，292，295，297—299；后果：291—292，293—295，301；定義：289—303；日常形式：29—30，31—34，35—37，240，265—273，290—292，302—303；觀念反抗：233—234，239，241；意識形態反抗：234—240，297，304—305，347；個體反抗：265—272，273，292，293—297，299—303；反抗意圖：290—292，295，301；勞動控制：34；機構與鎮壓水平：299；公開反抗的障礙：242—248，273；消極反抗：31—34；反抗的個人化：347—348；政治反抗與前政治反抗：290—292；象征反抗與附帶反抗：292；國家對反抗的反應：36，274—276；日常的反抗：255—273，281—282，321；對聯合收割機的反抗：116，154—164，242—243，246，248—255；塞達卡問題：308，309，345，348；塞達卡和吉打的反抗：62—64，242—273，275—277，348；塞達卡對貨車運輸業的反抗：212—219，248；自利的和有原則的反抗：290—291，292，293—297；象征反抗：235—236，240，282—83，290，328

Revolution（革命）：293—294，316，317—318，340—345，350；農民革命：28—29，37，343—344

Rice cultivation（水稻耕作）：51，55—56，74；雙耕前的水稻耕作：306—307；吉打的水稻耕作：63，64—65；莊稼的倒伏：18，164，258，260；單作文化：64，90；塞達卡的水稻耕作：110—125

Rice policy（稻米政策）：52，55—56

Rich, the（富人）：13—27，137，140—141，144—148，310；機構進入：126—130，132，135—137；對國家的依賴：312—313；掩飾策略：199—204，206—212；吝嗇的借口：174—175；“越來越富”：80，155，182；政府援助的濫用：130，131—132，144，222—223，226—228，231—233；意識形態立場：310—314；行為辯護：184，199，204—212，231—233，236，312，313；土地所有制：15—19，107，181塞達卡的佃農：108，109—110，123，165—169；守財奴：14—15，20，151，173—174，176—178，187—189，195，308；對施舍的夸大：203，參見“階級關系”；窮鄰居的看法：141—144，146—147，151，153—154，156—158，160—162，165—169，173—169，173—174，176—178，181，187—189，195—198，200—201，308；塞達卡的收入：91，95，124；塞達卡的土地所有制：95—98；社會權威：235，283，311—312；對現金地租的看法：152，154；對聯合收割機的看法：155—160；對雙耕的看法：148—150；對契約租賃的看法：167

Rokiah（羅吉婭）：2—3，4，89—90，108，158，160，161，167，168，173，176，188，198，222—223，225，263—264，271，281，;89，250，254

Rubber（橡膠）：31—32，50，51，52，54，55，245，298

Rude, George（喬治·魯德）：36，37

Rural development（鄉村發展）：54—55，65，131，314

Russian Revolution（俄國革命）：293—294，342

Ryle, Gilbert（吉爾伯特·萊爾）：45

Sabotage（怠工/破壞）：29，31，34，248，249，282

Sah Bidan（沙赫·比丹）：1，7，90，93，230

Sahil bin Lebai Pendek（沙希爾）：216，360

Salim, Haji（哈吉·沙利姆）：130，135，152，158—159，174—175，201，251，253，261，224；村莊政治中的哈吉·沙利姆：136，221，227—228，229，231—232，233，334

Salmah（沙勒瑪）：92，97

Samad（薩馬德）：92，114，132，166，252，254，263

Samat（薩馬特）：89，93，161，210，216，228，229，230，263—264，267—269

Sartre, Jean-Paul（讓——保羅·薩特）：330—331

Selangkuk（village）（塞古蘭村）：249

Setiti Batu（village）（塞迪蒂·班杜村）：227，252

Settlement pattern（移民模式）：87

Shahnon（沙赫儂）：4，94，198，230，267，274，280

Shamsul（沙姆蘇爾）：2，89，94，127，135，144，165，194，208—209，210，223，226，244，280，360

Siak, Tok（托·西亞卡）：7，170

Simmel, Georg（蓋奧爾格·齊美爾）：10，14，182

Singkir（town）（新基亞鎮）：251

Slander（誹謗）：228，234，235，262，282，284，290

Slavery（奴隸制）：285—286，287，291—292，328，330—331，340；美國的奴隸制：33—34，329，338

Social authority of rich（富人的社會權威）：235，283，311—312

Social banditry（社會搶劫）：266，273，300

Social consciousness（社會意識）：37—41，287—288，297，340—345

Social contract（社會契約）：345；契約違反：338—340，342—345，346—347；塞達卡的契約違反：345，347

Social control（社會控制）：34，169—178，192—198，307，312—313，345；對勞動的社會控制：152，172，175，185，193—194，307

Socialism（社會主義）：32，339，342，346，348—349

Socialist party（社會主義黨）：245

Socialization ofwealth（財富的社會化）：308，311—312，337

Social mobility（社會流動）：100。69—70，97，149

Sombong（arrogance）（傲慢）：196—198

Status exploitation（身份運用）：240；塞達卡的身份運用：236—240

Stinginess（吝嗇）：14—15，20，173—174，176—178，187—189，195，196，308

Stockwell, A.J.（斯托克維爾）：334

Strickon, Arnold（阿諾德·斯特里肯）：327

"Strike"behavior（“罷工”行為）：248，258—261

Structuralism（結構主義）：42，319

Subordinate groups（從屬群體）：284—287，292，296，328—329；自治領域和亞文化41，328—330，324；階級意識：38，43，284—289；名義平等：192—195，196，218，220；精英價值：40—41，317—321，322—324，335—340；意識形態意識：38—41，316，317，340—345，346—347；團結需要：254—255，261—265，329；激進的思想與行動：316，322，331—333，339；地位的儀式變換：287，331。也見Compliance and conform-ity;Deference;Defiance behavior;Resistance

Sukur（蘇庫爾）：22，92，168，176，177，198，209，218，229，249，252，263，269，276，281

Sukur Kasim（蘇庫爾·卡西姆）：81，86

Sungai Bujur（village）（雙溪布浙村）：163，226，228

Sungai Kering（village）（雙溪凱林村）：163，226，228

Sungai Tongkang（village）（雙溪通港村）：2，87，130，166，334

Surat laying（flying letters）（飛翔信）：334，362

Surau（prayer houses）（禱告室）：334，362

Swift, M.G.（斯威夫特）：190

Syed Ahmad（賽義德·艾哈邁德）

Symbolic authority（象征權威）：235，283，308—309

Symbolic resistance（象征性反抗）：235—236，240，282—283，290，328

Symbols, class（階級象征）：44—45；塞達卡的窮人和富人：22—27

Taha bin Lebai Hussein（塔哈）：135n，206n，216—217，221—222，226，228，264n，360

Taib（塔伊布）：11，89，92，135，168，175，177，188，198，201，211，230，270，276，280

Tajuddin（塔杰丁）：93，161n，250

Tanzania（坦桑尼亞）：31，302

Taxation（征稅）：29，62—63，169—170，227，313，314

Tax evasion（逃稅）：31，170n，291，295，298

Tenancy（租賃/租佃）：64，306；租賃的變化：70—74，76；租賃在塞達卡的變化：103—110，151—154，205—210；窮人租賃的缺失：100，102，108—110，123—124，164—169，210—211，242；商業企業：107，110，123—124，167；口頭契約與書面契約：105，210；純佃農的消失：70—74，76，82，102，211；支付形式：參見“地租”；親屬租賃：72n，102，105n，106—107，151，185，210—211；塞達卡的地主關系：104—105，136—137，153—154，164—169，189，193—194，205—212；契約租賃：73—74，76，100，102，107—110，164，166—169，210，242；改革嘗試：54；針對佃農競爭的禁令：261，262—264

Thai migrant labor（泰國的移民勞工）：67，111，115，158，159n，253

Theft（偷竊）：34，235n，255，265—272，289，290—291，296，301，329；施舍的減少：269，271；塞達卡的稻谷偷竊：267—271。

Thompson, E.P.（湯普森）：42，235，285，296，309，350

Thought and action, relationship of（思想與行動的關系）：38，316，322，331

Threshing of paddy（脫粒）：74，75，117，119，144n，256，257；脫粒的工資：117—118

Tokai（village）托凱村

Tractors（拖拉機）：48，110，113，16n；經紀人：161n；對雇用勞動的影響：74—75，113—114；出租：107，109；村莊大門費用：212—213

Trade, foreign（對外貿易）：50—51

Trade union consciousnes（工聯意識）：318—340

Trade unionism（工聯主義）：255，256—261；合作小組：119—120，250—255，258—260；一致行為：161—162，265

Transcript, onstage vs.backstage（公開的文本和隱藏的文本）：284—289，321

Transplanting of paddy（插秧）：74，75，117—120，250—253；聯合收割對插秧的影響：121—123，160，242，250n，260；插秧的工資：120，260

Trucks and lorries（卡車）：66，107，124n；對卡車的抵抗：212—219，248

Tun, Cik（吉·敦）：93—220

UMNO（馬來民族統一機構/巫統）：52—58，159，183，191，221，275，314；主要反對者：43—54，58；主要支持者：54，57—58；塞達卡的巫統：89，126—127，129，130—137，214—218，223，278—281，311，334；塞達卡的庇護：126，135—136，143—144，221—223，225—233

Uphoff, Norman（諾曼·厄普豪夫）：83n

Urban migration（城市移民）：100，124，245—246

Ustaz Pawzi（烏斯塔茲·帕夫茲）：274

Usury（高利貸）：16

Utopian ideology（烏托邦意識形態）：332

Vietnam（越南）：44，303；越南戰爭：28，205，294

Village Development Committee（JKK）村莊發展委員會：131—133，135，212，214—215，218，274—275；援助的不公正分配：221—223，225—229；它們的辯護：231—233

Village gate（村莊大門）：212—220，239

Village Improvement Scheme（RPK）（村莊改進計劃）：4，131—132，135，142，220—233，239；濫用：143，222—223，259—229，308；平均津貼：222；虛假的家庭調查：131，143，221，226—227；被選擇的村莊：221

Violence（暴力）：作為反抗形式的暴力：235，254，255；塞達卡暴力的缺失：273

Wage labor（雇用勞動）：74，157—160，306；長期取消：9，74—76，82，111—125，150，154—156；近期增加：65，67，110—111，114，150；保護：21—19；機械化對純雇用勞動的影響：112，116—118；塞達卡的雇用勞動：98，110—123，150，154—156；塞達卡對雇用勞動的抵抗：249—261；婦女收割小組：250—255

Wages, farm labor（農業勞動的工資）：75—76，117—118，158；工資增加：120，151，176，177；固定的現金工資：119—120，260；工資損失：115—117，119—120，159；計件工資：34，117—118，119，215n，219，256，260；工資的確定：257—261，265

Wahid（華喜德）：92，123，132，153，165，209，252

Wan Zawawi Ibrahim（旺·扎維·伊布拉欣）：239

Water supply（水供給）：50，54，82，266

Weber, Max（馬克斯·韋伯）：247

Williams, Raymond（雷蒙·威廉斯）：311n，346

Willis, Paul（保羅·威利斯）：318n，319，338n—339n

Women（婦女）：237；婦女在家庭中的經濟作用：202n；農業勞動：117n；農場收割小組：89，115，119—120，250—255，258—260；戶主：90，117，250n；名譽丈夫：89—90，250n；婦女與扎卡特：171n

Wong, Diana（黛安娜·翁）：74

Work-reliefprogram（以工代賑計劃）：12，129—130

World Bank（世界銀行）：50，65

Yaakub（雅各布）：4，8，94，188，226，262

Yah, Cik（吉·亞赫）：200

Yah, Pak（帕克·亞赫）：11，15—17，90，92，141—42，146，198，206，264，278—279；對富人的批評：142—144，147，151，177，230n；在村莊改進計劃中的被忽視：142，226，227，229；收入：117

Yan（town and district）（燕鎮）：86，221，251，266，274

Yunus bin Haji Salim（尤努斯）：135n，360

Zaharuddin（扎哈魯丁）：94，127，261

Zahir, Haji（哈吉·查希爾）：166，186，210

Zainah, Tok（托·扎伊納）：92，132

Zakat（Islamic tithe）（扎卡特，伊斯蘭什一稅）：169—172；私人施舍：10，21，144，156，169—170，171—178，191，193—195，203，269，271；官方救濟：31，87，169—170，1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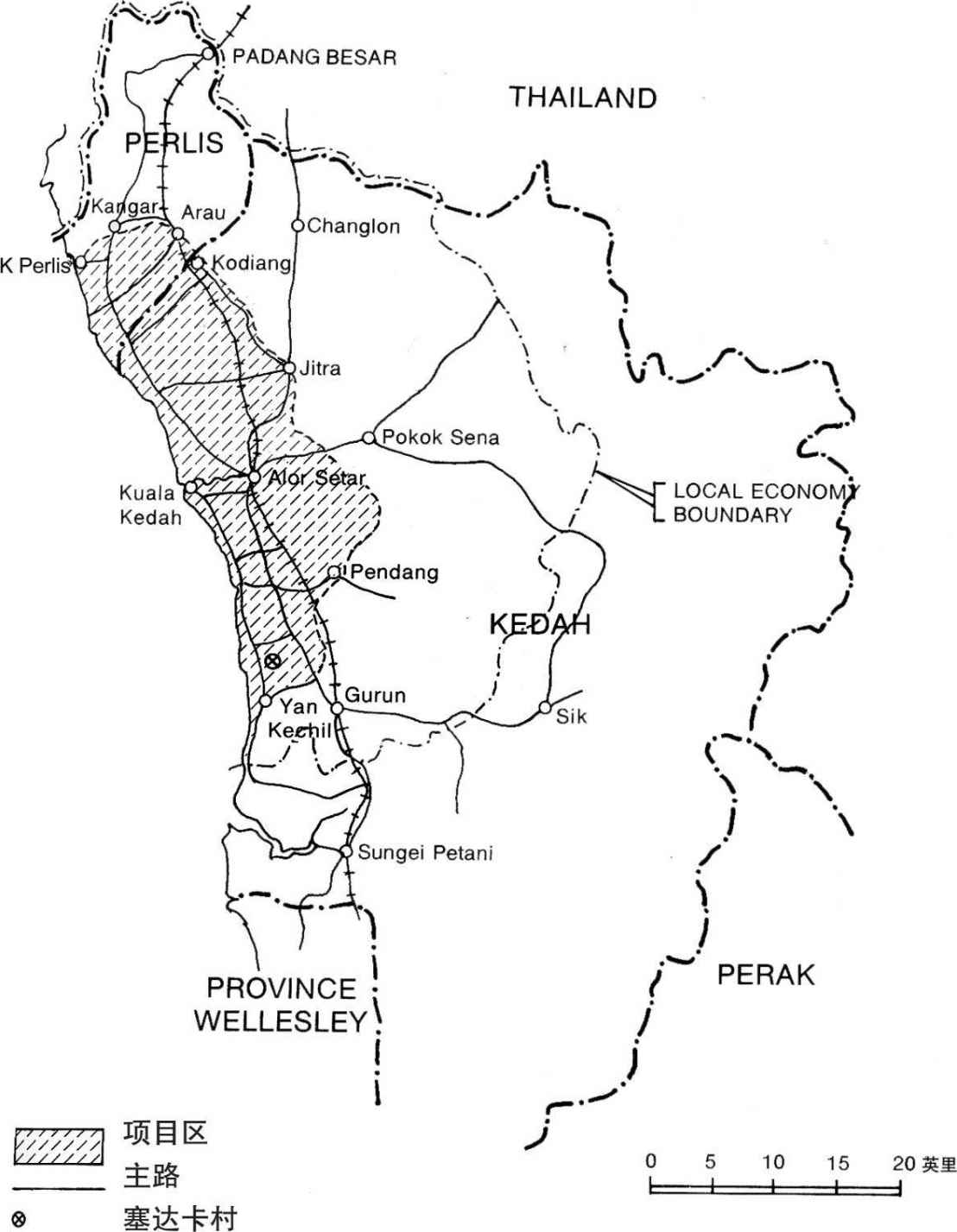
Zapata, Emiliano（埃米利亞諾·薩帕塔）：294

Zola, Emile埃米爾·左拉）：37，143，265，285，3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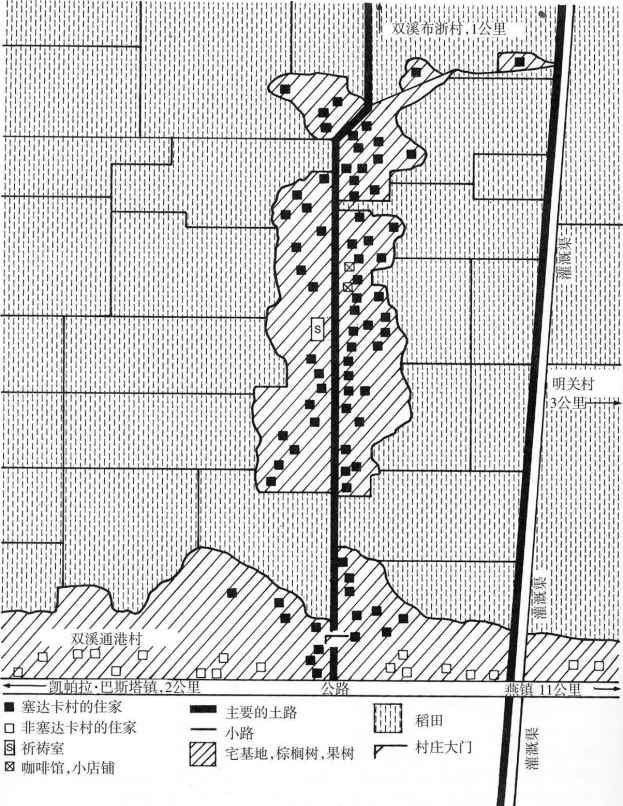
# 地圖



地圖1 馬來半島穆達水利灌溉項目區



地圖2 吉打和穆達項目區



地圖3 塞達卡村

# 譯后記

## “弱者的武器”：研究農民政治的底層視角

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與人類學教授詹姆斯·斯科特筆下的東南亞農民，是處于低下社會地位的小農（peasant）。他們雖然作為農業社會的人口主體，在各種宏大的歷史敘事中卻從來是無聲者和無名者，是少有文字記述其歷史的群體；他們即使偶爾出現在歷史記錄中，也不是作為歷史的參與者，而是作為征召、稅收、勞動、土地產出和谷物收獲的貢獻者，因而只是在統計學意義上以數字形式出現的無名者。但農民在歷史中的消隱并不意味著他們不受注意，歷朝歷代的統治者也不可謂不關注農民，但關注的原因在于，農民在很長的時間里一直是索取的對象，是任何社會都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源——農副產品、稅、費和廉價勞動力——的提供者；而且農民的生存境況和由此導致的集體行動常常關乎整個社會的安定或動蕩，甚至導致王朝的更名易主，這便是各個社會的統治者都諳熟的“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道理。

對農民的關注，對解決農業、農村問題的呼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出于這樣一種危機意識：農民的生存狀況過于惡劣會影響整個社會的安定，或者不如說出于一種自上而下的對危險警示的反應。人們會以歷史上大規模的農民暴動或流民之患為例，提請決策者和世人要有足夠的危機意識。顯而易見，出于“危機”反應的對農民的關注，尚未離開統治的立場、精英的立場或城市既得利益階層的立場。農民在這樣的關注眼光中是作為治理對象、防范對象和憐憫對象而存在的。

以農民的眼光來注視，以農民的立場來思考，已有的農民社會經典研究無疑不能忽視。詹姆斯·斯科特繼《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之后，又以《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和《統治與抵抗的藝術：隱藏的文本》兩部著作為我們提供了理解農民反抗與農民政治的灼見。介紹其富于洞察力的研究，對于關注農村社會與農民問題乃至整個社會結構的問題都是有重要意義的。

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斯科特首先反思并批評了許多關于農民革命的研究只對那些在國家層面造成大規模結構性變遷的運動感興趣。這類研究主要集中于有組織的、正式的、公開的抗議運動，因為它們顯然對國家造成威脅，即使只有短暫的片刻。但就發生而言，所謂農民的真正的反抗是相當稀少的，它們大多被輕而易舉地擊敗；即便是非常罕見地成功了，其達到的結果也很少是農民真正想要的。斯科特在此區分了所謂“真正的”反抗與象征的、偶然的甚至附帶性的反抗行動，并且不同意將非正式反抗視為無足輕重和毫無結果的。不難理解，在歷史中正式的、組織化的政治運動，即使是秘密的和革命性的，也通常為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所擁有；若在這一領域尋找農民政治大半會徒勞無功。農民也因而被認為是政治上無效的階級，除非他們被外來者加以組織和領導。

斯科特以自己在馬來西亞農村的田野工作材料為證據，指出上述視角所遺漏的是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公開的、有組織的政治行動對于多數從屬階級來說是過于奢侈了，因為那即使不是自取滅亡，也是過于危險的。有鑒于此，他認為更為重要的是去理解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即農民與從他們那里索取超量的勞動、食物、稅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間平常的卻是持續不斷的爭斗。這些日常形式的反抗通常包括：偷懶、裝糊涂、開小差、假裝順從、偷盜、裝傻賣呆、誹謗、縱火、怠工等等。這些被稱為“弱者的武器”的階級斗爭形式具有共同特點：它們幾乎不需要事先的協調或計劃，它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網絡，通常表現為一種個體的自助形式，而且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對抗權威。

了解這些平凡的反抗形式更有利于理解農民長期以來為保護自己的利益和對抗統治秩序所做的一切。在第三世界，農民很少在稅收、作物分配、發展政策或煩瑣的新法律等問題上去冒險直接對抗權威；他們更可能通過不合作、偷懶和欺騙去蠶食這些治理策略。

這類反抗的技術長期以來是最有意義和最有效的。因為它們適合于農民的社會結構和社會特點：一個散布在廣大鄉村的階級，缺少正式的組織和紀律，為了廣泛的游擊式的防御性斗爭而裝備起來。日常的反抗形式是一種沒有正式組織、沒有正式領導者、不需證明、沒有期限、沒有名目和旗號的社會運動。然而農民這些卑微的反抗行動不可小覷，大量的微不足道的小行動的聚集，就像成百上千萬的珊瑚蟲日積月累地造就的珊瑚礁，最終可能導致國家航船的擱淺或傾覆。僅此而言，理解這些無聲的匿名的農民行為的顛覆性就是十分重要的。斯科特認為，無論國家會以什么方式做出反應，我們不能忽視這樣一個事實，即農民的行動改變或縮小了國家對政策選擇的范圍。正是以這樣一種非叛亂的方式，在法律的政治壓力以外，農民經典性地表現出其政治參與感。因而，任何一種農民政治學的歷史或理論若想證明農民作為歷史行動者的正當性，必須掌握農民所使用的“弱者的武器”。

繼農民的日常反抗形式“弱者的武器”之后，斯科特又推出了“隱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這一概括農民行為選擇和意識形態的分析性概念。通過這一概念斯科特進一步闡述底層群體的意識形態特征，并以此解釋和理解底層群體的難以捉摸的政治行為。這種在統治者背后說出的對于權力的批評是千百萬人日常的民間智慧的重要部分，它們與“公開的文本”的比較為理解支配與反抗提供了根本性的新方法。

作為底層政治（infrapolitics）意識形態的隱藏的文本，不僅是一種話語、姿態和象征性表達，也是實踐的依據。斯科特在東南亞一個小村莊的田野研究工作證明了農民的反抗實踐與反抗話語的相互依存與相互維系。而且，支配與占有的緊密聯系意味著不可能將從屬的觀念和象征從物質剝削過程中分離出來。同樣，也不可能將對統治觀念的隱藏的象征性反抗從反對或減輕剝削的實際斗爭中分離出來。農民的反抗，一如統治者的支配，是在兩條戰線上作戰。隱藏的文本不僅是幕后的惱怒和怨言，它也是為減少占有而在實際上被實施的計謀（偷竊、裝傻、偷懶、逃跑、放火等）。關鍵在于，隱藏的文本不僅闡明或解釋行為，它還有助于建構行為。

農民反抗與底層政治的特殊邏輯“弱者的武器”與“隱藏的文本”使得底層政治的偽裝邏輯擴展至它的組織和實質性方面。因為公開的政治活動代價過高，幾乎是被排除的，因而反抗主要依托于非正式的親屬網絡、鄰里、朋友和社區而非正式的組織。非正式的市場、鄰居、家庭和社區的集合既為反抗提供了結構，也為其提供了掩護。由于反抗是在小群體和個體層面進行的，即使規模稍大也會使用民間文化的匿名性或種種實際的偽裝，因而適合于對付監視和鎮壓。在這種非正式反抗中，沒有可供逮捕的領導人，沒有可被調查的成員名單，沒有可以指控的宣言，也沒有吸引注意的公開活動。可以說它們是政治生活的元素化形式。這些元素化的形式也有助于解釋底層政治經常不被注意的原因。底層政治的邏輯是在其經過之處幾乎不留痕跡，通過掩蓋痕跡不僅可使參與者的危險減至最小，而且消除了許多可能讓社會科學家和歷史學家相信現實政治正在發生的證據。

底層政治本身的性質及其對立面出于自身利益的默不作聲共同造成一種“合謀的沉默”，幾乎將這些日常反抗形式從歷史記載中完全抹去。歷史與社會科學由于是知識分子用文字書寫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為有文化的官員所創造的，因而不可能揭示那些沉默的、匿名的代表農民的階級斗爭形式，這就是被斯科特比喻為紅外線的底層政治。與那些公開的民主政治、目標明確聲音宏亮的抗議示威不同，這些由從屬群體日常使用的謹慎的反抗形式超出了政治活動光譜的可視范圍。

就此而言，書寫未被書寫的反抗史并賦予其政治地位，理解和分析農民的“弱者的武器”，就成為非常有意義的工作。斯科特將來自村莊研究的本土見解與更大的關于階級的社會經驗以及典型的階級斗爭語境聯系起來。通過深入地分析象征性反抗的日常形式和經濟反抗的日常行動的方法，達到對于階級意識和意識形態霸權的理解。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斯科特對于日常形式的反抗與統治意識形態之間微妙關系的探究，他并不否認馬克思關于“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就是統治的意識形態”的經典論斷，但他更為強調的是，認清在何種程度上統治階級能夠將自己的公正社會秩序的想象，不僅強加給被統治階級的行為，而且強加給他們的意識。他的底層視角使他能夠重新思考霸權（hegemony）概念及與之相關的“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神秘化”（mystification）等經典概念：葛蘭西的霸權概念雖然闡明了統治階級不僅要支配物質生產方式，也要支配象征生產方式的要求，但是不能正確地解釋現實中的階級關系和大多數情境中的階級沖突。原因在于，霸權概念忽略了大多從屬階級能夠在其日常物質經驗的基礎上對主流意識形態進行洞察和去神秘化的程度。霸權理論還經常混淆何為不可避免與何為正當的區別，而這種錯誤從屬階級是很少會犯的。在強大的經濟占有、政治統治和意識形態支配情境中，農民運用屬于自己的“弱者的武器”和“隱藏的文本”，以堅定而強韌的努力對抗無法抗拒的不平等。我們從這一切當中看到的是避免最壞的和指望較好的結果的一種精神與實踐，而這恰恰構成了支配與反抗的歷史和持久存在的張力。

從《農民的道義經濟學》到《弱者的武器》和《統治與抵抗的藝術》，我們不難看到，斯科特對東南亞農民的行為選擇和精神世界的探索在實踐層次上是不斷推進的。如果僅僅關注正式的反抗行動，或如果僅以“生存倫理”（subsistence ethic）來解釋東南亞農民的行為，我們就無從理解為何當他們進入生存絕境時仍未有公開的反抗；而處于如此情境尚不反抗，真不知還有什么能夠讓他們奮起反抗了。對于農民的政治行動，僅用生存倫理的邏輯無法解釋，還必須加上對壓制制度、暴力強度和意識形態治理的考量。面對強大而嚴密的統治，對立的雙方因力量強弱過于懸殊，無從形成真正可以稱為對抗性的對立面，無從形成對壘的雙方，因而弱勢一方反抗的邏輯就會發生扭曲和畸變。這種反抗可能形成霍布斯所描述的“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卻不可能有助于改善他們的生存境遇，或使社會的制度安排變得比較合理。除此之外，反抗的偽裝性，即以表面的順從代替實際的反抗，有可能反而強化了統治權力，“弱者的武器”在上述扭曲的反抗邏輯中也有可能反而變成強者的工具。

介紹斯科特關于農民反抗和底層政治的研究，我們可以獲知的不僅是非正式反抗與底層意識形態長久以來不被注意的實際存在，更有支配與反抗之間復雜和微妙的互動關系。而這些，如果沒有對于農民社會與農民權利的真正關心和理解，沒有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的底層視角，是不可能達到的。

本書的翻譯歷經一年半而成。前言、第一章到第五章前半部分由鄭廣懷翻譯，第五章后半部分、第六章到第八章、附錄由張敏翻譯，何江穗校對復譯了第四、五章；郭于華、郇建立分別校對第六至八章和第一至五章，后又分別通校全書；索引由郇建立翻譯。本書在清華大學社會學系“農村社會學”課程中列為必讀書目，兩位主要譯者由研究興趣所致也都曾反復閱讀，但由于譯者是第一次翻譯學術著作，經驗和翻譯水平都尚欠缺；整個譯、校過程其實也是艱難的學習過程，雖不敢言嘔心瀝血，卻也是殫精竭慮，盡管如此，錯誤疏漏仍在所難免。加之斯科特教授這部著作堪稱博大、精彩而深刻，以人類學細致入微的田野實證材料與關于支配與反抗的宏大理論緊密結合，論述方式鋪陳細密，縱橫捭闔，我們的閱讀和理解也自然有不逮之處。所有缺撼不足，還望讀者多予指正為盼。

在翻譯過程中，南開大學政治學系研究生李利平、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史云桐幫助譯校了部分內容。特別需提及的是本譯叢主編劉東先生從選定書目、聯系作者到譯、校的各種細節問題都給予了不厭其煩的幫助指導，在此深表謝忱。

郭于華2006年5月于北京

# 注釋

#### 前言

[[1]](#_1_95) Eric Hobsbawm，"Peasants and Politics，”Journal ofPeasant Studies, no.1 （1973）：3—22.

[[2]](#_2_92) Marc Bloch, French Rural History, trans.Janet Sondheimer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0），170.

[[3]](#_3_87) "double-cropping"在本文中通常被譯為“雙耕”，也可翻譯為“雙作”、“二熟制”。在本書中，“雙耕”是指“雙季稻的耕種”。——校注

[[4]](#_4_87) Jean Duvignaud, Change at Shebika:Report From a North African Village（New York:Pantheon，1970），217.

#### 拉扎克

[[5]](#_5_79) 托（Tok）在馬來語中是“長老”、“族長”的意思。——校注

[[6]](#_6_75) 本研究所涉及人名列表、塞達卡村及其周邊的地圖，參見第四章。

[[7]](#_7_73) 哈吉（haji）是對那些去麥加朝圣過的男性伊斯蘭教徒的稱呼。——校注

[[8]](#_8_73) 馬來西亞的貨幣單位為“林吉特”（Ringgit），簡稱“馬元”（M$）。——校注

[[9]](#_9_69) “敦”（Tun）是馬來西亞最高級別的封號，只有國家元首才有權授予“敦”這種榮譽稱號。——校注

[[10]](#_10_67) 這座大約15年前在政府幫助下建成的兩層樓一般被稱做伊斯蘭學校，因為它的第一層被定期用做宗教班上課和村莊會議的場所。第二層則是專用的禱告室，特別是在齋月期間。

[[11]](#_11_63) 稱為村莊改進計劃（RPK），這一計劃在全國范圍內選擇村民進行資助。在塞達卡，資助嚴格按照黨派來分配，有關細節參見第六章。

[[12]](#_12_61) 扎卡特（Zakat）為伊斯蘭教“五功”之一，中國穆斯林稱為“課功”，即伊斯蘭教法定的施舍，或稱“奉主而定”的宗教賦稅，又稱“濟貧稅”。——校注

[[13]](#_13_59) 馬來西亞的土地面積單位是"relong"，這里音譯為“里郎”。1里郎約等于0.71英畝。——校注

[[14]](#_14_59) 拉扎克說自己體弱多病，不能種地，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事實。無論如何，他確實沒錢支付農機、化肥或種子的費用。

[[15]](#_15_59) 拉扎克和他妻子偶爾也用魚線和魚鉤釣水田里的魚。然而，由于雙耕的引入和更多地使用殺蟲劑，魚的數量越來越少，并且實際上可能會給那些繼續食用這些魚的窮人的健康帶來嚴重的長期損害。

[[16]](#_16_59) 這種葬禮之后的祈禱稱為Doa Talkin，祈禱者得到的禮物取決于死者的地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反對這種傳統的習俗，他們試圖通過禁止前伊斯蘭的宗教習俗來凈化馬來人的宗教習俗。在鄰近的玻璃市州，Doa Talkin是被官方禁止的。

[[17]](#_17_53) 家里有人去世后，葬禮筵席通常在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七天、第十四天、第四十天和第一百天舉行。它也可以在其他時間舉行（通常是收割季后），有時也和感恩節的筵席一起舉行。這類筵席很像印度尼西亞的Selametan，它顯然是伊斯蘭教早期的風俗，并且同伊斯蘭教徹底地整合在一起。

[[18]](#_18_51) 我需要說明的是我捐的這些錢主要是良心錢，因為我對瑪茲娜的死感到愧疚，如果那天我在村里，我就可以開車送孩子去醫院。另一個考慮在于，我覺得如果我公開地把這么一大筆錢捐出去，就會使其他捐得少的人感到難堪，因為對其他人來說，這筆捐款大得多，而且還會使拉扎克公開地向我欠下永久的人情債。

[[19]](#_19_52) 進一步討論見第五章。

[[20]](#_20_50) 由于聯合收割機引起的工資下降的數字參見第三、四章。畢竟，拉扎克身體虛弱（許多人會說這也是懶惰），當他打谷以獲取計件工資時，速度只有他弟弟哈姆扎的一半。

[[21]](#_21_51) 拾稻穗對那些地少或無地（租種的或自己擁有的）的村民來說是一種傳統的方式。他們會對第一次脫粒以后仍殘留在稻稈上的稻穗進行再次脫粒。采用機器收割后，稻稈散落在田野各處，從前手工收割時常常堆放在打谷桶旁邊的稻稈全都不見了。

[[22]](#_22_51) 貧困線定義為“可以滿足一個家庭衣食住行及家務管理等方面最低需要的收入”。引自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Malaysia:SelectedIssues in Rural Poverty, World Bank Report 2685-MA, vol.2 （Washington, D.C.:World Bank，1980），4.

[[23]](#_23_51) 有人會想，如果拉扎克不那么主動地討要，他能獲得多少施舍？我懷疑會更少，但實際究竟會怎樣我也無從知曉。

[[24]](#_24_49) 當朝圣者前往麥加時，通常會獲得1/4加侖的稻米捐贈。

[[25]](#_25_47) 對拉扎克行為的社會定義是重要的。正如齊美爾所指出的：“直到個人獲得救助時，他在社會意義上才是貧窮的……這具有一般意義上的正確性：從社會學意義上講，并不是先有貧窮后有救助……而是獲得救助的人才被稱為窮人。”Georg Simmel on Individuality andSocialForms, ed.Donald N.Levine （Chicago:Univ.of Chicago Press，1971），175.同樣，在塞達卡，在別人認為一個人是在請求施舍之前，沒有人是乞討者。

[[26]](#_26_47) 艾爾溫·戈夫曼注意到人在失去羞恥心時會產生的一種不同尋常的力量。“太少的感知力，太少的應變力，太少的自尊心和體諒，在這種條件下，人將失去感知自身及示意他人避免尷尬的能力……這種人將成為對社會的真正威脅；我們對他無能為力，他經常按自己的方式行事。”Ritual Interaction:Essays in Face-to-Face Behavior（Garden City:Anchor Books, Doubleday，1967），40.

[[27]](#_27_47) 拉扎克用來表述“低賤”、“粗俗”的詞是lekeb，這和人們描述瑪茲娜的棺木和拉扎克的行為時用的是同一個詞。此處用來表述“誹謗”的詞是mengumpat。

[[28]](#_28_47) 我無法確定拉扎克在此使用kita一詞是僅指他本人還是希望將其他像他一樣的窮人也包括進來。拉扎克的話中隱含著富人對窮人深深的羞辱，富人對他們不屑一顧，對他們的招呼置之不理，這是黑格爾自我意識辯證法的核心。正是像打招呼一樣的平凡的行為澄清了這一點：個體的自尊依賴于他者的認可。即使是這種招呼，正如黑格爾所舉的關于決斗的著名例子那樣，也必須以生命為代價才能換取。例如，Hans Georg Gadamer, Hegel's Dialetic:Five Hermeneutical Studies, trans.Christopher Smith （New Haven:Yale Univ.Press，1972），chap.3。

[[29]](#_29_47) From Juan Martinez Alier, Labourers and Landowner in Southern Spain, St.Anthony's College, Oxford, Publications, No.4 （London:Allen & Unwin 1971），206.

#### 哈吉·“布魯姆”

[[30]](#_30_47) 說到哈吉·阿尤布，經常最先提到的是他房子的狀況。與哈吉·阿尤布相反的是，隨著1971年雙耕的首次引入，即使是最節儉的農民也將修理房屋或建設附屬建筑作為第一筆開銷。

[[31]](#_31_43) 在塞達卡，只有真正貧困的農民，才不舍得花一角錢到市場上去買一捆聶柏櫚樹葉來卷煙抽。

[[32]](#_32_43) 守財奴是純粹積累的象征，他會把獲取金錢和財產本身當做最終目的，而不是將其視為獲得愉悅的手段。在這方面，哈吉·阿尤布的三個老婆——比《古蘭經》允許的最大數目少一個——也許僅代表了另一種形式的積累。關于這個主題，參見Simmel的文章"Miser and Spendthrift"，in Gerog Simmel，179—186。

[[33]](#_33_43) 出于行文的方便，我們把"Broom"音譯為“布魯姆”。——校注

[[34]](#_34_41) 例如，可參見Unfederated Malay States, AnnuelReport oftheAdvisor to the Kedah Government, December 11，1912，to November 30，1913，W.George Maxwell （Alor Setor:Government Printer，1914） 23; AnnualReportoftheAdvisorto theKedahGovernment，1914，L.E .D.Wolferston （Alor Setor:Government Printer，1915） ，14; and Government of Malaysia, Report of theRiceProduction Committee，1953 （Kuala Lumpur:1954），vol.1，p.82。水稻生產委員會對該借貸體系進行了如下描述：“在種植季，如果某農民借了50馬元，那么他就要承諾在收獲時償還1 kunca（160加侖）稻谷。這些數量的稻谷按照當時政府規定的最低保護價是102馬元，而通常的市場價是140馬元。”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放高利貸者的所得與借貸者的貧困并沒有必然的對應關系。東南亞鄉村的高利率通常反映了貨幣的實際價值和借債者無力償還的高風險。因此，這些利益協議對于小農來說可能是巨大的負擔，但不意味著它對放貸者來說就是巨大的收益。

[[35]](#_35_39) 在《古蘭經》眾多相關的章節中，有一節這樣說道：“吃利息的人，會像中了魔的人一樣，瘋瘋癲癲地站起來。這是因為他們說：‘買賣恰像高利貸’。真主準許買賣，卻禁止高利貸。奉到主的教訓后，就遵守禁令的，既往不咎，他的事歸真主判決。那些再犯的人，是火獄的居民，他們將永居其中。”Surah, II:275，The Koran, trans.J.M.Rodwell （London:Everyman's Library，1977） ，369。

[[36]](#_36_39) 在東南亞的殖民地，各處都可以發現類似的做法，如菲律賓、越南和緬甸。

[[37]](#_37_39) 關于正式財產轉移的實際時間選擇和“抵押”土地的使用權存在一定差異。但是基本的安排仍然一致。

[[38]](#_38_36) 盡管在理論上借款者可以將償還款項存入第三方的賬戶并通知法庭，從而贖回土地，但是很少有農民知道這一點，更不用說去做了。

[[39]](#_39_34) 正如摩洛哥農民的簡便說法：“那些毫不知恥的人為所欲為。”Paul Rabinow, Reflections on Fieldwork in Morocco（Berkeley:Univ.of California Press，1977），158.這種民間智慧拐彎抹角地進入到社會科學中就成了如下表述：“排斥一個人就是使其脫離社會控制……他不會因遵從而失去什么，甚至有可能因不遵從而有所得。”George C.Homans，"Status, Conformity, and Innovation，”in The Logic of Social Hierarchies, ed.Edward O.Lauman et al.（Chicago:Markham，1970），599.

[[40]](#_40_34) 這里可與伊曼紐爾·拉迪里對13世紀法國南部阿比爾村莊的描繪作個對比：“財富本身不是攻擊的真正對象，蒙塔尤人所憎恨的是不良的富人、牧師和僧侶不合理的謀利方式。他們從村莊抽取資源，卻不提供任何宗教上的幫助作為回報，甚至也不提供任何一貫是由富有的牧師和有錢的當地貴族提供的救濟性、保護性的服務。”Montaillou:PromisedLand ofError, trans.Barbara Bray （New York:Braziller，1978），341.

[[41]](#_41_34) 參見Afifuddin Haji Omar, Peasants, Institutions, and Development in Malaysia:The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Muda Region, MADA Monograph No.36 （Alor Setor:MADA, 1978），50—56。

[[42]](#_42_34) Unfederated Malay States, Annual Report of the Acting Advisor to the Kedah Government，1916，G.A.Hall （Alor Setar:Government Printer，1917），2.

[[43]](#_43_34) 反之則不一定成立。換言之，很多哈吉都收入不多，他們為去麥加朝圣做出了相當大的犧牲，包括出售土地等。一些人從此在經濟上一蹶不振。

[[44]](#_44_32) Merduk意指“毫無價值的財富或事物”，karut意指“虛假或不真實的”。

[[45]](#_45_32) 1979年旱季球隊的戰績如下：勝兩場輸五場平一場——這一成績僅僅部分可以歸功于我的守門。

[[46]](#_46_32) "pak"在馬來西亞語是“伯伯”或“父親”的意思。——校注

[[47]](#_47_32) 看起來這個詞（Ceti）至少在馬來西亞東北部是廣為流傳的。在穆赫扎尼列出的玻璃市州（北與吉打州接壤，是同一水稻平原的組成部分）馬來裔放高利貸者的名單中，有一半都被冠以Ceti的綽號。Mokhzani bin Abdul Rahim, Credit in a Malay Peasant Society（Ph.D.diss.，University of London，1973），393—394。

#### 權力的象征性平衡

[[48]](#_48_32) 在文學作品中，奇異的和邪惡的事物總是比普通的和圣潔的事物更為引人入勝，在交談中也是如此。不然如何解釋大眾報紙的內容？丑惡總是比善良更吸引人，惡魔總是比天使更吸引人。

[[49]](#_49_32) 對“名聲政治”的分析和經驗研究，參見F.G.Bailey, Gifts and Poison:The Politics ofReputation（New York:Schocken，1971）。

[[50]](#_50_32) “自由不過是一無所有的代名詞”，這句話在這個例子中非常恰當。亦參見A.Solzhenitsyn, The First Circle, trans.Thomas P.Whitney （New York:Bantam，1968），96。

[[51]](#_51_32) 此處關于“遵從”的簡短討論得益于霍華德·紐拜的分析。Howard Newby，"The Deferential Dialectic"，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7，no.2 （April 1975）：139—164，and Erving Goffman，"The Nature of Deference and Demeanor，”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8 （June 1956）：473—503。

[[52]](#_52_32) 相反的情況也時有發生，行人甚至會公然拒絕裝做著急的樣子（或實際上他們是放慢了速度）。這就是對司機通行權的直接挑釁，對象征秩序的公開違背。行人們實際上是在宣告他們擁有道路的優先通行權。這種公開挑戰會引發一場膽量的較量的游戲，但一般而言，唉，都是司機更有優勢獲勝。

[[53]](#_53_32) 正如人們所想，奴隸制下此種形式的“遵從中的抗議”得到了大量的關注。有兩個例子，參見Eugene Genovese, Roll, Jordan, Roll:The World the Slaves Made（New York:Pantheon，1974），和Lawrence W.Levine, Black Culture andBlack Consciousness（New York:Oxford Univ.Press，1977）。

[[54]](#_54_32) Barrington Moore, Jr.，Social Origins of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Boston:Beacon，1966），505.

#### 未被書寫的反抗史

[[55]](#_55_32) 關于例子，參見Barrington Moore, Jr.，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Boston:Beacon，1966）; Jeffrey M.Paige, Agrarian Revolution（New York:Free Press，1975）; Eric R.Wolf, Peasant Wars of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Harper & Row，1969）; James C.Scott, The Moral Economy ofthe Peasant（New Haven:Yale Univ.Press，1976）;Samuel L.Popkin, The Rational Peasant（Berkeley:Univ.of California Press，1979）。

[[56]](#_56_32) 關于此類臨時性的反抗成果，參見霍布斯鮑姆和魯德出色的研究。E.J.Hobsbawn and George Rude, Captain Swing（New York:Pantheon，1968），281—299。

[[57]](#_57_32) 關于這些議題的一些討論參見James C.Scott，"Revolution in the Revolution:Peasants and Commissars"，Theory andSociety 7，nos.1—2（1979）：97—134。

[[58]](#_58_32) 參見麥克爾·亞德斯出色的的解釋和分析。Michael Adas，"From Avoidance to Confrontation:Peasant Protest in Precolonial and Colonial Southeast Asia"，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History 23，no.2（April 1981）：217—247.

[[59]](#_59_32) R.C.Cobb, The police and the People:French Popular Protest，1789—1820 （Oxford:Clarendon，1970），96—97.埃米爾·左拉對通過自我傷害來躲避兵役的行為進行了引人入勝的分析，參見Emile Zola, The Earth, trans.Douglas Parmee （Harmonds Worth:Penguin，1980。

[[60]](#_60_32) 參見奧姆斯德·羅賓遜的出色研究。Armstead L.Robinson，"Bitter Fruits of Bondage:Slavery's Demise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Confederacy，1861—1865"（New Haven:Yale Univ.Press, Forthcoming），chaps.5，6.

[[61]](#_61_32) 這主要集中在對“二十黑人法案”（Twenty-Nigger Law）的不滿上。該法案規定，達到征兵年齡的白人，如果擁有二十名或以上的奴隸需要看管，就可以免服兵役。加之當時富裕家庭常雇用他人代服兵役，因而“富人的戰爭是窮人在為之戰斗”的說法廣為流傳。

[[62]](#_62_32) Goran Hyden, Beyond Ujamaa Tanzania，（London:Heinemann，1980），231.

[[63]](#_63_32) 林泰歌對此做了最出色最完整的分析。參見Lim Teck Ghee, Peasants and Their Agricultural Economy in ColonialMalaya，1874—1941 （Kuala Lumpur:Oxford Univ.Press，1977）。也可參見唐納德·諾尼尼等充滿說服力的討論。Donald M.Nonini, Paul Diener, and Eugene E.Robin，"Ecology and Evolution:Population, Primitive Accumulation, and the Malay Peasantry"（Typescript，1979）.

[[64]](#_64_32) 簡·奧伊對1978年農村改革前農民必須出售給國家的“剩余”糧食的定義如何受到生產隊和生產大隊的影響進行了細致而引人入勝的分析。Jean C.Oi, State and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Politics ofGrain Procurement，（Ph.D.diss.，Univ.of Michigan，1983）.幾乎所有這些反抗都被那些反抗者稱為“軟反抗”，反抗者的行動也表明，只有保持“公開表現”的遵從，反抗才能成功。

[[65]](#_65_32) 在一些對農民社會的女性主義研究中有一個有趣的類似情況。在許多農民社會中（但不是所有），男人通常掌握著正式的、公開的權力。偶爾有人指出，女人也可以掌握相當的權力，前提是她們不對正式的男權神話進行公開挑戰。換言之，只要大的象征秩序不受質疑，女人就可能取得“實際”的成果。同理，我們可以看到，農民階級經常會發現，當他們希望追求那些可能永遠不會符合正式認知的政治目標時，不觸動正式秩序不僅是一種適宜的戰術，而且十分必要。有關女性主義在這些問題上的討論，參見Susan Carol Rogers，"Female Forms of Power and the Myth of Male Dominance"，American Ethnologist 2，no.4 （November，1975）:727—756。

[[66]](#_66_32) Edward B.Harper，"Social Consequences of an Unsuccessful Low Caste Movement"，Social Mobility in the Caste System in India:An Interdisciplinary Symposium, ed.James Silverberg, Supplement No.3，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The Hague:Mouton，1968）:48—49.著重標記為本書作者所加。

[[67]](#_67_32) Ann Laura Stoler, Capitalism and Confrontation in Sumatra's Plantation Belt，1870—1879 （New Haven:Yale Univ.Press，1985），184.

[[68]](#_68_32) 參見New York Times, Aug.18，1983，p.A6，"Polish Underground Backs Call for Slowdown"，該文提到“降低工作速度的策略在波蘭被稱為意大利式罷工，由于它能減少遭到報復的風險，工人過去曾使用過這種策略”。

[[69]](#_69_32) 參見Peter Linebaugh，"Karl Marx, the Theft of Wood, and Working-class Composition:A Contribution to the Current Debate"，Crime andSocial Justice（Fall-Winter，1976）：10。亦可參見匈牙利工人詩人米克羅斯·哈那茨對計件工資的出色分析。Miklós Haraszti, A Worker in a Worker's State, trans.Michael Wright （New York:Universe，1978）.

[[70]](#_70_32) 在1984年，巴登每4個居民中就有1個因此獲罪。在英格蘭，3個世紀以來，偷竊可能是農村犯罪最常見的形式，同時也是法律約束的主要對象。The selections by Douglas Hay and E.P.Thompson in Albion's Fatal Tree:Crime and Society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by Douglas Hay ，Peter Linebaugh, John G.Rule, E.P.Thompson, and Cal Winslow （New York:Pantheon，1975）.

[[71]](#_71_32) 顯然，這一時期德國的木材失竊案很少發生在公社林場。不言而喻，在此種情景下，如果窮人只是通過偷竊他人的財物來維持生存，我們就不能再稱其為反抗。對任何從屬階級而言，一個核心問題在于它能在何種程度上通過內部制約，阻止只對剝削階級有利的自相殘殺式的內部競爭。

[[72]](#_72_32) 正如霍布斯鮑姆和魯德所指出的，不僅保守的精英忽視了這種形式的反抗，連城市中的左派也是如此：“社會運動史家的反應看起來與其他城市中的左派（社會運動史家中大多數傳統上屬于這一群體）的反應極其相似，直到反抗以十分引人注目的方式出現或反抗規模大到足以引起城市媒體的關注時，他們才會注意到這些反抗。”

[[73]](#_73_32) 當區級官員試圖向他們在首都的上級解釋一些事情時——比方說解釋稅收額或征兵數不夠的原因，并不是所有地區層面的記錄都是有利的。我們還可以想象，非正式的、口頭的記錄是很多的，例如在非正式的內閣或部長級會議上要求對因農村反抗導致的政策失敗進行處理。

[[74]](#_74_32) 一些例外來自于人類學的研究——原因在于它堅持對田野、奴隸史和蘇聯集體化的密切觀察。

[[75]](#_75_32) Zola, The Earth，91.

[[76]](#_76_32) 我決不是說源于報復心、憎惡和憤怒的暴力反抗毫無作用——只是正如左拉和其他人所指出的，它未能講述故事的全部。當然，正如科布（Police and the People，89—90）所指出的，喬治·魯德［George Rude, The Crowd in History，1730—1848（New York:Wiley，1964）］過于將暴亂者視為冷靜而文明的中產階級政治行動者了。

#### 作為思想和象征的反抗

[[77]](#_77_32) 認為意識先于行動，在某種意義上產生了行動，這似乎絕對且片面，為了防止這種絕對和片面，我們可以退一步來研究這種意識的構建。這樣的研究必然要從行動者在社會中的位置這一社會設定開始。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

[[78]](#_78_32) 相關討論參見Richard Hoggart, The Uses ofLiteracy（London:Chatto & Windus，1954）:77—78。

[[79]](#_79_32) 在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中，人們可能會特別引用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ed.and trans.Quinte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London:Lawrence & Wishart，1971），123—209，and Georg Lucka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trans.Rodney Livingston （Cambridge, Mass.:MIT Press，1971）。在我看來，馬克思從未使用“虛假意識”這一術語，雖然“商品的拜物教”可以被這樣解讀。但商品拜物教主要是使資產階級神秘化，而不僅僅是使從屬階級神秘化。關于“霸權”概念是否適用于農民階級的批評性觀點，可參見James C.Soctt，"Hegemony and the Peasantry，”Politics and Society 7，no.3 （1977）：267—296和本書第七章。

[[80]](#_80_30) 對同一現象的其他解釋，可參見Frank Parkin，"Class Inequality and Meaning Systems"in his Class Inequality andPolitical Order（New York:Praeger，1971）:79—102，以及Louis Dumont, Homo Hierarchicus（London:Weidenfeld & Nicholson，1970）。

[[81]](#_81_30) 但須注意到低等種姓提升他們的儀式地位的努力，及最近神子族（圣雄甘地稱賤民為"harijans"，即“神的孩子”，這里意譯為“神子族”）集體放棄印度教而改信伊斯蘭教的趨勢（這樣一來信眾之間就沒有種姓區別了）。

[[82]](#_82_30) 例如，可參見Gerrit Huizer, Peasant Mobilization andLandReform in Indonesia（The Hague:Institute ofSocial Studies，1972）。

[[83]](#_83_30) 菲律賓呂宋島中部的租佃是很突出的例子。Communcation from Benedick Kerkvliet, University of Hawaii.

#### 人類行動者的經驗與意識

[[84]](#_84_30)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8），98，106—107.

[[85]](#_85_30) 對于我們稱為制度的人類行動的規范模式來說，這也是正確的。例如——結構主義者注意到的——國家。

[[86]](#_86_30) 參見詹姆士·布饒在此方面的頗具說服力的討論。James Brow，"Some Problems in the Analysis of Agrarian Class in South Asia"，Peasant Studies 9，no.1 （Fall 1981）：15—33.

[[87]](#_87_29) Frances Fox and Richard A.Cloward, Poor People's Movements:Why They Succeed, How They Fail（New York:Vintage，1977），20.著重標記為本書作者所加。

[[88]](#_88_31) “人并不僅靠面包活著”，但“面包”可能比食物意味著更多的東西；它可能意指生活或交易的必要資金，例如，“兄弟，你能借我些面包嗎？”在馬來社會，諺語“不要砸他人的飯碗”意指“不要危及他人的生活來源”。

[[89]](#_89_30)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Culture（New York:Basic，1973），6—9.對于這種知識分子立場的出色總結參見Richard J.Bernstein, The Restructuring of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Philadelphia:Univ.of Pennsylvania Press，1978），173—236。如伯恩斯坦所說，“這些有意的描述、意義和解釋不只是與外在行為相關的心智的主觀狀態；它們是我們社會和政治生活的行動和實踐的根本”（第229—230頁）。

[[90]](#_90_30) Clifford Geertz，"Blurred Genres:The Refiguration of Social Thought，”American Scholar 49，no.2 （Spring 1980）:175.

[[91]](#_91_30) 例如，可參見Roy Turner, ed.，Ethnomethodology:Selected Readings（Harmondsworth:Penguin，1974）。

[[92]](#_92_30) John Dunn，"Practising 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 on 'Realist'Assumptions，”in Action andInterpretation: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the Social Sciences, ed.C.Hookway and P.Pettit （Cambridge:Cambridge Univ.Press，1979），160.

#### 第三章 反抗的景觀

[[93]](#_93_30) 更多關于19世紀末吉打州的狀況，參見Sharom Ahmat，"The Political Structure of the State of Kedah，1897—1905，"Journal ofSoutheast Studies 1，no.2 （September 1970）:115—128; and Zaharah Haji Mahmud，"Change in a Malay Sultanate: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Kedah before 1939"（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Malaya，1965）。

[[94]](#_94_30) 在這種意義上，也只有在這種意義上，人們或許才會提到“虛假意識”。即使在這一領域，農民完全有能力構筑一套不同的財產制度或不進行選舉的政治制度，完全有能力就諸如此類的問題表達意見。然而，猜測往往同日常社會行動的背景沒有實際的關系。

#### 背景：馬來西亞和水稻主產區

[[95]](#_95_29) 支持這一論點的其他材料參見Jacob Meerman, Public Expenditure in Malaysia:Who Benefits and Why, A World Bank Research Publication （London:Oxford Univ.Press，1979）。

[[96]](#_96_29) Kevin Yong, Willem C.F.Bussink, and Parvez Hassan, Malaysia's Growth and Equity in a Multiracial Society, A World Band Country Economic Report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Press，1981），24.

[[97]](#_97_29)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sia 1980 Yearbook（Hongkong: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981），10.

[[98]](#_98_29) Young et al.，Malaysia's Growth，31.這里的“傳統農業部門”不包括種植園，在1970年，它僅僅吸納了18%的農村勞動力。相反，3/4的農村勞動力集中在小片的橡膠和水稻地里。

[[99]](#_99_29) 這些數據來自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Malaysia:Selected Issues in Rural Poverty, vol.2，World Bank Report No.2685-MA （Washington:World Bank，1980），3，13—14。本段的其他數據也都來源于此報告。

[[100]](#_100_29) 如果我們把注意力從收入轉向公共基礎設施，比如醫療服務和教育等，那么情況會更好一些。因為，在這些領域，政府的政策確實起到了關鍵的促進作用。當然，我們也必須承認，如果沒有政府的貧困治理方案，收入的統計數據甚至會更令人失望。

[[101]](#_101_29) 關于大米政策的杰出分析，參見Otto Charles Doering，Ⅲ，"Malaysian Rice Policy and the Muda Irrigation Project"（Ph.D.diss.，Cornell University，1973）。

[[102]](#_102_29) Young et al.，Malaysia's Growth，104—105; and Meerman, Public Expenditure，89.米爾曼文中的數據部分來源于Sudhir Anand, Inequality and Poverty in Malaysia:Measurement andDecomposition（New York:Oxford Univ.Press, forthcoming）。

[[103]](#_103_29) 同上，第90—91頁。在此，貧困的界定并不是指官方的貧困線收入，而是指最低的40%的收入分配。

[[104]](#_104_29) 當然，巫統最終贏得了更多的議會席位，因為它贏得了非馬來人的選票。K.J.Ratnam and R.S.Milne，"The 1969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in West Malaysia"，Pacific Affairs 43，no.2 （Summer 1970）:219—220.

[[105]](#_105_29) 騷亂確立了重要的政治分水嶺，并且，顯然主要集中在半島西海岸的一些城市。恰恰在這些區域，中國人和馬來人不僅在數量上十分接近，而且他們都感覺到了經濟競爭。農村地區至少以以下三種方式被牽連了進來：首先，來自停滯的農村經濟的大規模馬來移民，是城市政治風云變化的源泉；其次，稻米業、橡膠業和漁業的貧困似乎不知不覺地增加了農村社區暴力的風險；最后，農村貧困似乎注定要增加馬來反對黨的魅力，于是馬來西亞伊斯蘭黨（PMIP）應運而生。

[[106]](#_106_29) Colin MacAndrews, Land Settlement Policies in Malaysia and Indonesia:A PreliminaryAnalysis,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No.52 （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78 ），7.

[[107]](#_107_29) Colin MacAndrews, Land Settlement Policies in Malaysia and Indonesia:A PreliminaryAnalysis, Occasional Paper Series，第45、47頁。

[[108]](#_108_29) R.Thillainathan，"Public Policies and Programmes for Redressing Poverty in Malaysia:A Critical Review，”in Some Case Studies on Poverty in Malaysia:Essays Presented to Ungku Aziz, ed.B.A.R.Mokhzani and Khoo Siew Mun （Kuala Lumpur:Persatuan Ekonomi Malaysia Press，1977），245—260.

[[109]](#_109_29) 這些數據來自MacAndrews, LandSettlement，46（table 3） and 47（table 5）。

[[110]](#_110_29) 這個估計主要是針對最大的穆達灌溉工程，因為凱姆布的收入數字目前仍有很大的爭議。

[[111]](#_111_29) 從理論上講，1979年實施的化肥津貼每戶限制在6英畝（或8.5 里郎）以內。但是，大農場主利用同農會的特殊關系，很快就找到了突破這些限制的途徑。如同先前的《水稻種植法》，限制依舊是形同虛設。甚至是在1955年，大米委員會明確規定，由其提供的貸款項目只用于幫助貧困的農戶贖回已經做了抵押的農田，但實際上，這些貸款資金更多流向了從事商業經營的農場主，而沒有真正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窮人。參見Doering，"Malaysian Rice Policy"，65—66。

[[112]](#_112_29) 然而，也許有人會提出疑問說，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公共福利設施，比如診所和小學，事實上具有再分配的性質，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說，窮人先前被剝奪了享受這些服務的機會，而現在他們成了主要的受益者。

[[113]](#_113_29) 關于Kerjasama Rakyat銀行丑聞和馬來人從股權銷售中獲益的報道，參見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sia 1980 Yearbook，228，237。

[[114]](#_114_29) 比如，至少在吉打州的四個議會選區中——Jerlun-Langkawl, Kuala Kedah, Ulu Muda 和Jerai（塞達卡村就屬于這一選區），巫統只獲得了極少數的贊成票，這也意味著伊斯蘭教黨贏得了這幾個選區中大多數馬來人的選票。這次選舉最終以伊斯蘭教黨的失敗而告終，因為華人投贊成票給巫統。盡管在這次選舉中伊斯蘭教黨失敗了，但它仍獲得了38.5%的支持票，只比1969年大選時少1個百分點，而在1969年大選中，伊斯蘭教黨離執政只差一步之遙。參見Ismail Kasim, The Politics ofAccommodation:An Analysis ofthe 1978 Malaysian General Election, Research Notes and Discussion Paper, No.10 （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st Asian Studies，1978），73—74。

[[115]](#_115_29) Clive S.Kessler, Islam and Politics in a Malay State:Kelantan 1838—1969（Ithaca:Cornell Univ.Press，1978）.

#### 中層背景：吉打州和穆達地區的灌溉系統

[[116]](#_116_29) R.D.Hill, Rice in Malaysia:A Study in Historical Geography（Kuala Lumpur:Oxford Univ.Press，1977），54.

[[117]](#_117_29) R.D.Hill, Rice in Malaysia:A Study in Historical Geography（Kuala Lumpur:Oxford Univ.Press，1977），第53頁。

[[118]](#_118_29) 比如，我們可以把這種形式同凱斯勒（Kessler）對吉蘭丹州東部地區進行的杰出的政治分析進行對比。凱斯勒的研究表明，公眾對執政黨強烈的不滿不僅僅是源于階級問題，還摻雜著州府的公眾對權貴家族強烈的怨恨，這些家族根據自身的利益來支配殖民官僚機構。有人發現，吉打州也存在著類似的情況，但是不那么明顯。參見Kessler, Islam and Politics。

[[119]](#_119_29) John M.Gullick, Indigenous Political Systems ofWestern Malays,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Monographs on Social Anthropology, no.17 （London:Athlone，1958），43.馬來西亞前殖民政府有限的榨取能力不是因為缺乏雄心，而是缺乏推行其意志的手段。

[[120]](#_120_27) Sharom Ahmat，"The Structure of the Economy of Kedah:1879—1905"，Journal ofthe Malaysian Branch ofthe RoyalAsiatic Society 43，no.2（1970）:13.

[[121]](#_121_27) 要想了解這一地區的馬來村莊和和水稻生產的歷史，讀者可以參閱Hill, Rice in Malaysia; K.K.Kim, The Western Malay States，1850—1873:The Effects of Commercial Development on Malay Politics（Kuala Lumpur:Oxford Univ.Press，1972）; Sharom Ahmat，"The Politics Structure of the State of Kedah，1879—1905，"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no.2 （1970）; R.Bonney, Kedah，1771—1821:The Search for Security and Independence（Kuala Lumpur:Oxford Univ.Press，1971）; Zaharah Haji Mahmud，"Change in a Malay Sultanate"。

[[122]](#_122_27) 這篇文章引用的數據來自穆達地區在雙耕推廣之前有關農業經濟的官方消息。S.Selvadurai, Padi Farming in West Malaysia, Bulletin No.27 （Kuala Lumpur: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Fisheries，1972）.

[[123]](#_123_27) 灌溉項目試圖消除的土地占有不平等以及穆達地區大部分人口的貧困狀態，都是由最初的土地占有造成的歷史遺留問題（而且，正是這種連續不斷的債務導致了土地喪失的結果）。早在1913年，吉打州的英國顧問喬治·麥克斯威爾（W.George Maxwell）就已經指出，“目前大多數的水稻種植者是受華裔的水稻商人控制的”。參見Unfederated Malay States, Annual Report of the Advisor to the Kedah Government, December 11，1912，to November 30，1913 （Altor Setar:Government Printer，1914），23。也可參見Federated Malay States, Report of the Rice Cultivation Committee，1931，H.A.Tempany, Chairman （Kuala Lumpur:1932），40。

[[124]](#_124_27) International Bank of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Malaysia Loan 434-MA:Muda Irrigation Scheme Completion Report, no.795-MA （Washington, D.C.:June 1975），ⅱ，quoted in S.Jegatheesan, The Green Revolution and the Muda Irrigation Scheme, MADA Monograph No.30 （Alor Setar:Muda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uthority, March 1977），3—4.

[[125]](#_125_27) 除了葉加西桑（S.Jegatheesan）的《綠色革命》之外，也可參見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World Bank Cooperative Program, The Muda Study，2 vols.（Rome:FAO, 1975），and Clive Bell, Peter Hazell, and Roger Slade, The Evaluation of Projects in Regoinal Perspective:A Case Study ofthe Muda Irrigation Project（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Press, forthcoming）。

[[126]](#_126_27) 關于這一項目對地區經濟的具體影響，參見Bell et al.，Evaluation ofProject, chap.7。

[[127]](#_127_27) 1966年，吉打州和玻璃市登記注冊的摩托車數量是14292輛，到1976年上升到95728輛，增長了6倍；在同一時期，私家車的數量增長了4倍多；公共汽車的數量約增長了4倍；商務用車的數量增長了3倍。參見Economic Consultants Ltd.，Kedah-Perlis Development Study:Interim Report（Alor Setar:December 15，1977），90。

[[128]](#_128_27) 請參見糧農組織和世界銀行合作項目中關于家具設備和雙耕年份的統計數據。Muda Study，1:26，and 2:tables 19，20.

[[129]](#_129_27) 請參見糧農組織和世界銀行合作項目中關于家具設備和雙耕年份的統計數據，第2期，表21。

[[130]](#_130_27) 然而，這些益處實際上是要付出相當代價的，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人們日常生活的營養多元化漸漸消失。雙耕推廣之后，大大減少了兩季之間種植各種蔬菜的機會。鴨、鵝和雞這樣的家禽變得越來越少，因為農閑季節可以放牧的草地大大減少了，而且農藥的使用也威脅著水鳥。用稻米釣魚曾經是窮人主要的生計來源，現在變得越來越困難，因為農藥污染了水源。對于那些還有能力從市場上購買蔬菜、魚和肉的人來說，這些影響可以說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對于窮人來說，這些影響卻很大，他們吃的食物要么很單一，要么營養不足，甚至有毒。

[[131]](#_131_27) Ajit Singh，"Laporan Kesihatan Kawasan Kedah-Perlis，1970—1977"（Alor Setor:Jabatan Pengarah Perkhidmatan Perubatan dan Kesihatan, October 1978，mimeo）.這些數據不是結論性的，因為它只是考察了3個區，其中之一就是哥打士打（Kota Setar）區，這個區是整個地區中最主要的城鎮區域。在哥打士打區，同營養有關的死亡率的下降遠比古邦巴素（Kubang Pasu）和燕鎮（塞達卡位于該區）更為明顯。

[[132]](#_132_27) Economic Consultants Ltd.，Kedah-Perlis Development Study，17.

[[133]](#_133_27) 我們不能提供精確的數據，但是，正如我們將要提到的，從1966年到1976年間稻田所有權分配的數據意味著小塊土地數目的激增。這是因為，土地繼承方式使大塊土地逐漸被細分成多個小塊土地。

[[134]](#_134_27) 這部分和下一部分引用的數據大多來源于D.S.Gibbons, Lim Teck Ghee, G.B.Elliston and Shukur Kassim，"Land tenure in the Muda irrigation area:Final Report"，Pt.2，Findings（Pulau Pinang:Pusat Penyelidekan Dasar and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1981）。這些數據也被后來的研究引用，如USM-MADA Land Tenure Study。這項研究以1975—1976年穆達地區所有農場的調查為基礎，通過同先前在該地區進行的抽樣調查進行對比，考察了土地所有權的變化情況。我個人認為，這項研究存在兩個缺陷：它沒有提供1976年以后的信息，而且調查的范圍僅限于土地所有權、農地面積和使用權等問題上。因此，就1976年以后的數據以及這項研究沒有涉及的問題而言，我不得不依賴于綜合性不強的其他研究。但這項研究報告的數據都經過仔細的整理、核實和解釋，引得大家爭相效仿。

[[135]](#_135_27) USM-MADA Land Tenure Study，145.這與表3.1中土地面積的數據略有區別，原因在于，原始數據是使用當地的土地測量單位計算的（1個里郎相當于0.71英畝）。因此，0.01—2.83英畝土地相當于0.01—3.9里郎土地；2.84—7.09英畝土地相當于4.0—9.9里郎土地；7.1英畝土地相當于10或10以上里郎土地。

[[136]](#_136_27) 目前已有的研究缺少關于穆達地區整體狀況的數據，但是我們這里提供的數據來自一項精密的抽樣調查，因此，數據很可信。參見Masanabu Yamashita, Wong Hin Soon, and S.Jegatheesen，"MADA-TARC Cooperative Study, Pilot Project ACRBD 4，Muda Irrigation Scheme, Farm Management Studies"（May 1980，mimeo），5. 下文稱為"MADA-TARC Farm Management Studies，1980"。

[[137]](#_137_27) USM-MADA Land Tenure Study，167.

[[138]](#_138_27) USM-MADA Land Tenure Study，164.

[[139]](#_139_27) USM-MADA Land Tenure Study，167.該書也提供了1955年和1972—1973年的比較數據。土地使用模式的變化究竟給先前的農民帶來了什么樣的影響，尚不清楚。毫無疑問，部分農民變成了無地的勞動者；而另一些農民，尤其是年輕人，暫時或長久地到城市打工以維持生活；小部分農民或許已經變成了佃農，他們中的一些因為年老已經不能再干農活了，而另外的一些還能干些農活。

[[140]](#_140_27) 參見Keith Griff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Agrarian Change:An Essay on the Green Revolution（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Press，1974），chap.3。這里有一個例外：盡管綠色革命偶爾導致了小自耕農的迅速減少，但這一階層在穆達地區仍然存在。不過，從經濟的角度來看，它越來越被邊緣化了。

[[141]](#_141_27) 在穆達地區，大多數的佃農與出租土地的地主有親屬關系，土地的租金也遠低于市場價格。參見穆赫德·沙得利·阿布杜拉所做的杰出的案例研究。Mohd.Shadli Abdullah，"The Relationship of the Kinship System to Land Tenure:A Case Study of Kampung Gelung Rambai, Kedah"（Master's thesis,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1978 ）.也可以參見明實藤本對同一現象的精彩分析。Akimi Fujimoto，"Land Tenure, Rice Production, and Income Sharing among Malay Peasants:Study of Four Villages"（Ph.D.diss.，Flinders University, Australia，1980）.同提高親戚必須支付的租金相比，收回出租土地自己耕種要更容易一些，因為村民認為，同遠房的親戚相比，土地的主人及其子孫有權優先使用土地。這樣就可以解釋，為什么地主不是簡單地把土地租給那些無地的親戚耕種，然后通過收取高額的租金來提高回報。

[[142]](#_142_27) 近期，巴納德對亞羅士打地區附近的村莊進行了研究。研究結果表明，聯合收割機的使用對地主出租土地有很重要的影響：在聯合收割機使用之后，地主出租的土地變少了。參見Rosemary Barnard，"Recent Developments in Agricultural Employment in a Kedah Rice-Growing Village"（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cond Colloquium of the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James Cook University, August 29—31，1979），30.穆達地區農業發展主管部門的阿費夫丁·哈吉·奧馬爾也指出了佃農被快速取代的趨勢，即聯合收割機使用之后，佃農大量減少。參見Afifuddin Haji Omar, in "The Pivotal Role of an Integrated Institutional Reform in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Rice Peasantry in Malaysia"（Paper presented at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The Peasantr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ASEAN Region, University Kebangsaan Malaysia, Bangi, May 26—29，1980），12。

[[143]](#_143_27) 關于1955—1976年間谷物地租和現金地租的數據，參見USM-MADA Land Tenure Study，66。一般的研究認為，谷物地租似乎就是繳納一定數量的水稻作為地租。然而，根據我個人的經驗，谷物地租的真實含義是：預先確定要繳納的水稻數量，具體的租金要根據當年水稻的市場價格來確定，通常佃農交納的是現金。另外需要特別注意的是：谷物地租是上繳固定數量的水稻，而不是上繳當年收成的百分比，因為水稻產量要受當年實際收成情況的影響。

[[144]](#_144_27) 我只有塞達卡的統計數據，在那里，1/7的佃農因交不起租金而租不到土地。而如果整個穆達地區都是這樣，那將是十分危險的。

[[145]](#_145_27) USM-MADA Land Tenure Study的作者研究發現：令人吃驚的是，農忙季的長期租金已經高到122.74馬元，而每季的現金地租是112.49馬元。他們提供的一個解釋是，“這種契約是那些對市場變化很敏感的地主和富裕的佃農（可能也包括那些更難得到土地的非馬來人，他們渴望通過長期地租的方式得到土地使用的保障權）之間簽訂的高度商業化的業務”。第72頁。

[[146]](#_146_27) 比如，穆赫德·沙得利·阿布杜拉（Mohd.Shadli Abdullah）研究發現，在哲倫·拉姆巴爾（Gelung Rambal）村，大約1/3以上的土地租賃合同都使用長期地租的形式。參見"Relationship of the Kinship System"，110。在黛安娜·王（Diana Wong）對該村作的后續研究中，作者指出：“在這個村子，更讓人沮喪的是，長期租賃土地的方式仍在快速擴展。”參見"A Padi Village in North Malaya"（1980，mimeo），18。約·達內（Jon R.V.Daane）在他對農民組織的分析中也指出，“甚至一些比較窮的地主也更愿意采用這種長期租地的合約方式，因為這樣不僅能增加土地租金收入，而且也可以回絕那些想便宜租地的親屬的要求”。參見Farmers and Farmers Organizations:A Study ofChanging Resource Use Patterns in the Muda Area, Preliminary Report No.2 （August 1978，mimeo）。阿費夫丁·哈吉·奧馬爾也發出了警告，指出了辛迪加的趨勢。他們有聯合收割機，并且以較高的租金租用了大片土地。參見"Pivotal Role"，12。韋爾斯利省是吉打州南部水稻種植業已經高度商業化的地區。在那里，明實藤本（Fujimoto）也發現，在所有的土地出租合同中，24%的合約是長期租賃的方式，參見"Land Tenure"，80。唯一不同的研究是巴納德（Rosemary Barnard）關于甘榜·亞森·讓（Kampung Asam Riang）地區的再研究，在此，近十年來，長期租賃的方式似乎已經消失了，參見"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in a Kadah Village，1967—1968"(Paper presented at Second 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Sydney, May 15—19, 1978, mimeo), 19—20。

[[147]](#_147_27) 然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拖拉機的應用推動了收入分配方式的改變。在使用拖拉機之前，大農場主通常會雇用適量的當地農民用水牛來犁田和耙地。這略微具有再分配的性質。伴隨著拖拉機的應用，這部分錢流向了外地商人和富有農場主的口袋，因為只有他們才有錢去購買拖拉機。

[[148]](#_148_27) 唉，這似乎并沒有發生，以至于聯合收割機1975年在該地出現后，沒有人去搜集相應的口述史資料。

[[149]](#_149_27) 在穆達地區，雇工收入的90%以上都來源于插秧、收割、脫粒和田間運輸等勞作。其中，收割和脫粒一般是由機器來完成的，占收入的55%。聯合收割機的應用也大大減少了田間運輸的機會，因為利用聯合收割機可以直接把稻谷送到田埂或者路邊。然而，這種損失基本上通過將水稻裝入袋中而得以彌補。在1980年，穆達地區80%以上的水稻是用聯合收割機收割的。假定這個數據接近正常的水平，那么，我得出的結論是：雇傭勞動收入的凈損失是44%（55%中的80%）。1974年，當時聯合收割機還沒有應用于農業，農民收入的數據表明，小農戶（土地面積少于2.84英畝）的雇傭勞動收入約為350馬元，如果損失了44%的收入，他們的實際收入將降到196馬元。對一個佃農來說，他的收入損失了15%；對一個自耕農來說，他的損失約為11%，而對于那些無地或者是完全靠出賣勞動力生活的農民來說，損失更大一些。因為所有這些階層的人數占到了穆達地區收入低于官方貧困線以下人口總數的一半以上，所以，這種收入分配的后果是非常嚴重的。關于聯合收割機的應用對農民們收入影響的詳細分析，參見"MADA-TARC Farm Management Studies，1980，"47—54。

[[150]](#_150_27) 例如，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水稻的總收入實際上被夸大了20%左右，因為預先的研究和實際產量之間存在一定的誤差，再有，稻米中因含水分較高而導致市場價格降低。對于大多數的農場主來說，所謂的“其他收入”幾乎理所當然地也被夸大了，這是因為，只有一小部分農場主在農閑時間擁有穩定的收入來源，平均數由此而變大。我們這里描述的境況也許要比實際情況樂觀很多。

[[151]](#_151_27) 實際上，所有關于穆達地區的主要研究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非常一致。糧農組織與世行合作項目的報告《穆達研究》的作者就指出，“該地區收入分配本來就很不公平，然而現在這種分配不公的趨勢正逐步惡化”，Muda Study，1:2.也可以參見Afifuddin Haji Omar，"Peasants, Institutions, and Development: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in the Muda Region"（Ph.D.diss.，Cornell University，1977），339—340; and Clive Bell，"Some Effects in the Barter Terms of Trade on a Small Regional Economy"（Washington, D.C.: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World Bank, July 1979，mimeo），32。

[[152]](#_152_27) 關于這一時期生產和價格的相對影響，葉加西桑（Jegatheesan）做了細致而又精彩的分析，參見Jegatheesan, Green Revolution，31—50。

[[153]](#_153_27) 正如葉加西桑指出的那樣，“這類估計（即水稻產量、農場規模、土地使用、生產成本和水稻價格的估計）在衡量實際的純收入時要認真對待，但它足以證明，自1975年到現在，由于水稻產量沒有大幅度提高、水稻價格相對穩定以及生產成本不斷上漲，穆達地區農民的平均收入（指純收入）一直在下降。”參見Jegatheesan，"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in the Muda Irrigation Scheme, Malaysia"（n.d.，circa 1979，mimeo），39。貝爾在相關的問題上指出，資本可能會伴隨著生產利潤而流出穆達地區，同時，據此，他也對該地區經濟持續發展的可能性表現出了懷疑。“項目的效果完全是一次性的，這種結論對我們而言似乎是不可避免的”，Bell et al.，Evaluation of Project, chap.9，p.35。

[[154]](#_154_27) 在1981年，我的研究結束之后，政府把水稻價格上調了大約1/3。這一舉動本身應該能使平均收入水平恢復到1974年的水平或者更高一些。然而，收入分配不公更加嚴重。政府之所以支持提高價格，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農民1980年1月在亞羅士打舉行了要求提高水稻價格的示威游行。

[[155]](#_155_27) Griffin, PoliticalEconomy，73.

[[156]](#_156_27) 關于如何劃定貧困線的問題尚有很大的爭議。一些人認為，農村地區的貧困線要劃低一些，因為農村的生活成本要低一些。在此，我不想對這個問題進行評價，但是，我相信，政府把貧困線定得相對較高顯然有強烈的政治考慮，這種做法是為了吸引馬來人的選票。我們姑且不論什么樣的貧困線才是合理的，但應該補充的是，考慮到官方的貧困線，即使我們估計大約30%的人口處于貧困線以下，那么，它還是相當的保守的。這是近期一項關于穆達地區貧困人口最全面的研究得出的結論。研究者對1972—1973年曾經訪問過的農戶在10年以后進行了跟蹤調查，研究結果表明，在穆達地區，一半甚至是一半以上人口的生活水平仍處于官方公布的貧困線以下，而且雙耕帶來的工作機會大都“流向”了富裕的農戶，而不是那些最需要工作的人。參見蘇庫爾·卡西姆（Sukur Kasim）所作的杰出的前期研究報告。"Evolution of Sources of Income in the Muda Irrigation Project （1972/73—1981/82）”（Paper presented at Conference on Off-Farm Employ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Asia, Chengmai, Thailand, August 1983，mimeo.）.

[[157]](#_157_25) 這個數據是比較保守的說法，它僅僅是在非農的雇傭工人數目之中加上了小農戶的數目。當然，一小部分小農戶的收入在貧困線以上。然而，出于同樣的原因，相當多耕種3英畝土地以上的佃農和自耕農的平均收入也低于貧困線。

[[158]](#_158_25) 正如諾爾曼·阿霍夫（Norman Uphoff）和彌爾頓·艾斯曼（Milton Esman）指出的那樣，“如果這類組織變成了制度化的組織，那么，它們將成為大、中農場主維護權益的工具，而小農場主卻不得不依賴傳統的方式保護自己的利益，或者他們被迫完全依賴他們擁有的微薄的資源維持生活”。參見LocalOrganizationforRuralDevelopment:Analysis ofAsianExperience（Ithaca:Rural Development Committee, Cornell University，1974），66.

[[159]](#_159_25) 最初，會員身份和每年繳納的會費（3馬元）都只是象征性的，但是，新會員需要購買同永久會員擁有的價值相當的股份。目前，會員繳納的會費不少于30馬元，而且通常會高達100馬元。對于那些生產貸款少于100馬元的小農場主來說，這種規定有效地限制了他們的加入。即使他們加入了組織，每年至少要從他們的貸款中強制扣掉15馬元的股份購買費，以至于加入農會的吸引力比不上傳統的從店主處獲取貸款的吸引力。這方面的資料源于USM-MADALand Tenure Study，68，以及Zakaria Ismail，"Institutional Short-term Production Credit Programme in Muda Scheme，”MADA Monograph No.38（Alor Setar:MADA, n.d.，probably 1977），24.

[[160]](#_160_25) 何乃今（Ho Nai Kin）的研究已經表明，到1977年，逾期債款在快速增長。"Implementation and Supervision Problem of Institutional Padi Production Credit in MADA's Farmers' Association，”MADA Monograph No，35 （Altor Setar:MADA ，1978），app.2.另有證據表明，逾期還款的通常是大農場主，而非小農場主，參見Mohd.Noh Samik，"Delinquent Loanees"（Altor Setar:MADA, Bahagian Pertanian, n.d.）。

[[161]](#_161_25) 關于第三世界國家的農業政策及其對收入分配、權力和發展的影響的出色分析，參見Robert H.Bates, Markets and States in Tropical Afric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

[[162]](#_162_25) Griffin, Political Economy，128.

#### 村莊

[[163]](#_163_25) 1982年采集的樣本數據顯示，雙耕以前在穆達地區就相對較窮的燕鎮行政區，同其他行政區相比，在過去的十年中受益較少。1982年，燕鎮貧困家庭的比例是最高的，燕鎮75%以上家庭的收入都在官方的貧困線之下。而其他四個被研究地區中只有一個在減少貧困率方面的進展不理想。到目前為止，盡管燕鎮行政區大多數家庭的實際收入有可能增加了一些，但是，多數家庭仍然認為他們經濟上很困難。燕鎮嚴重依賴單一作物（水稻）種植的情形使得這一地區人地比率相當高，也使得這一地區在城市就業中相當不積極。這些都可以用來解釋這一地區相對不發達的局面。有關細節參見Sukur Kasim“, Evolution of Sources of Income in the Muda Irrigation Project（1972/73—1981/82）”（Paper presented at Conference on Off-farm Equip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Asia, Chengmai, Thailand, August 1983, mimeo.）。從這個方面來講，燕鎮和塞達卡可能比穆達灌溉工程中其他更具代表性的地區要貧困一些。

[[164]](#_164_25) Afiduddin in Haji Omar，"Irrigation Structures and Local Peasant Organisations，”MADA Monograph No.32 （Alor Setar:MADA, 1977）.

[[165]](#_165_25) 我不是定居在塞達卡村的第一個外國人。一位日本研究者掘井健三博士曾在1966年底和1967年中期在塞達卡居住過兩個月。他搜集了關于土地所有、土地控制、社會組織的基本經濟數據。雖然他逗留的時間比我要短，研究興趣也必然地相對有限，但他的研究為我提供了珍貴的基本數據，我可以用這些數據來推斷雙耕的各種影響。本書后面的許多歷史性比較都是建立在掘井健三博士慷慨提供的信息的基礎上的。掘井健三博士用英語發表的兩篇最重要的報告是：Kanzo Horii，"The Land Tenure System of Malay Padi Farmers:A Case Study…in the State of Kedah，”Developing Economies 10，no.1（1972）：45—73，和Rice Economy and Land Tenure in West Malaysia:A Comparative Study ofEight Villages.I.D.E.Occasional Papers Series No.18 （Tokyo: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cs，1981）。

#### 富與窮

[[166]](#_166_24) 這個發現使塞達卡村純粹的佃農和純粹靠打短工工資收入的雇工的比例接近穆達水稻種植區37%的總體比例，見第三章。

[[167]](#_167_24) 更為普遍的是，這些因為移民規劃而離開的村民依舊保留他們在當地的土地，并把這些土地出租。

[[168]](#_168_24) 特殊情形是指，這兩姐妹有一位兄弟在吉打州某地的政府橡膠園工作。這位兄弟繼承了相鄰的土地，他把姐妹倆的這兩小塊土地也據為己有并在上面耕種。兩姐妹的懇求也無濟于事。但是，因為這位兄弟慣用暴力的名聲，姐妹倆不敢去警察局或法院告發。因為她們已經連續5個種植季不能耕種自己的土地，最后姐妹倆決定把她們的土地賣給另一位兄弟。那位1981年買了地的兄弟依然無法耕種這些土地，他為了申明自己的所有權，花費了不少的錢用于打官司。這個事件表明，在他人暴力的阻撓下，國家和它的地方代理人難以保證財產所有權的效力。不過，在村民看來，這個案例是相當例外的。

[[169]](#_169_24) 我把沒有土地的10戶人家也包括在內。而對于一般的耕種面積分配的統計來說，只有那些擁有土地的家庭才包括在內。這種方法得出的結果會低估土地緊張的程度。這10戶人家中的7戶都想方設法要租種別人的土地，只有3戶年邁的種地人是選擇不種地的。

[[170]](#_170_24) 和其他事情也一樣，雙耕并不意味著收入的翻倍。雙耕的必要投入，包括化肥、拖拉機的配備以及勞動費用的增加，都減少了一部分新收益。在吉打州，按最初的估計，稻田的純收入因灌溉可以增加60%。因此，在雙耕制中1.6里郎土地的收益相當于單耕制中2.66里郎土地的收益。在塞達卡村，小農戶的平均耕種面積減少了一半，這意味著，從種地的收入來看小農戶的處境更加惡劣，雖然他們每年都有兩次收成。

#### 村莊構成

[[171]](#_171_24) 村中的家庭從46戶擴展到74戶，增長了32%，我把在村莊“邊界”上的4戶人家也包括在我的統計中，而掘井健三并沒有把這些家庭歸入塞達卡。

#### 土地占有與使用

[[172]](#_172_24) 1979年雙耕方式下的每個農戶平均耕種的4.7里郎相當于單耕方式下的7.5里郎（和其他事情也一樣，雙耕并不意味著收入的翻倍。雙耕的必要投入，包括化肥、拖拉機的配備以及勞動費用的增加，都減少了一部分新收益。在吉打州，按最初的估計，稻田的純收入因灌溉可以增加60%。因此， 在雙耕制中1.6里郎土地的收益相當于單耕制中2.66里郎土地的收益。在塞達卡村，小農戶的平均耕種面積減少了一半，這意味著，從種地的收入來看小農戶的處境更加惡劣，雖然他們每年都有兩次收成。）。然而，1967年時每個農戶平均耕種6.9里郎的土地，不過是7.5里郎的92%。

#### 租佃的變化

[[173]](#_173_24) 參見Horii，"Land Tenure System"，第57、58頁。他在該文中寫道，“要理解這種固定的谷物地租，我們必須注意到，這種地租實際上是將租佃雙方已經商定的一定數量的稻米賣掉，獲得的現金用來支付地租。佃農在收獲后，立刻將租佃協議中約定數量的稻米賣給商人，把這樣獲得的現金付還給地主”。

[[174]](#_174_24) 參見Horii，"Land Tenure System"，第57頁。

[[175]](#_175_24) 當然，這個問題并不簡單是一個人的記憶力好壞的問題，而是一個如何解釋的問題。一個富裕的村民會聲稱，更換佃戶是因為在其他事情上的個人分歧，或者因為先前的佃戶不想再耕種這塊土地。一個特別窮的村民會說佃戶失去土地的原因恰恰是因為要提前交租。關于“社會事實”是如何成為各階級解釋的對象的詳細討論參見第五章。

[[176]](#_176_24) 關于各種不同假設下塞達卡種地人的收益，參考附錄C, 表C3和圖C3a。

[[177]](#_177_24) 我已經把1967年谷物地租的現金值和當時以現金為度量的地租進行了平均計算。

[[178]](#_178_24) 無需交租的租佃關系一般大多發生在父母和子女之間。這種情況并不簡單。許多通常有正式訪問安排的關于土地租佃的快速調查似乎表明，很多土地都是以免租的形式租入的。不過，父母普遍聲稱自己沒有向子女要求地租，而子女也說自己無需交納租金。這種說法符合村莊廣泛接受的關于父母子女關系的價值觀。不過，更進一步的調查表明，實際上，這種租佃中只有極少數是真的不用交地租的。一個例子就是，土地豐裕的父母通常會把自己的一塊地租給自己剛結婚的子女；作為送給新婚夫妻的禮物，第一年的租金是不需要支付的。除此之外，子女每一個種植季都要為從父母那兒租到的土地付給父母一些什么，或者是現金，或者是實物（如果父母和子女住在一起的話）。這種支付在雙方看來都是一種禮物而不是地租，因為禮物的多少是由子女決定的。如果根本沒有為租地付出任何東西的話，子女通常就會在家里或地里為父母出一些勞力，或者在某些特殊情形下送給父母一些禮物，這些都部分地同父母提供的土地聯系在一起。在吉打州的其他地區也有類似實踐，參見Mohd.Shadli Abdullah，"The Relationship of the Kinship System to Land Tenure:A Case Study of Kampung Gelung Rambai"（Master's thesis,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Penang），108，134—135，和Diana Wong，"A Padi Village in North Malaysia"（1980，mimeo.）。

[[179]](#_179_22) 塞達卡土地租佃中的地租水平與親屬及居住關系的交互表



[[180]](#_180_22) 即便是例外情況，也是有啟發的。24個近親租佃的個案中，只有4個個案是在播種以前支付地租的，而其中的3戶是因為租出土地的父母生活窘迫，為了幫助父母，子女就提前交了地租。提供特殊待遇的精神在這些個案中還是有效的。不過，這些個案所體現的是作為佃戶的子女給他們的父母提供了特殊待遇。而在沒有親屬關系的租佃中，21個個案中只有6個被允許在收獲以后再支付地租，而這些個案背后同樣也有特殊的情況。在其中的5個個案中，同一塊地已經被租給同一個家庭超過20年，所以，佃戶和地主之間建立了大多數非親屬關系的租佃中很難得的親密和信任關系。而另外一個反常的個案是因為這塊土地易遭水患， 所以如果地租不可以在收獲后商量的話， 沒有人愿意冒險去租種這塊土地。

[[181]](#_181_22) 3個個案中的2個都涉及了華裔地主，他們同他們的佃戶按照《水稻耕作者條例》簽定了租地合同。在這里，信任的同時也伴隨著地主可能的擔心：如果改變交租的時序，那么，佃農就會質疑他們為這些土地支付的不合法的高額租金。

[[182]](#_182_22) Horii，"Land Tenure System"，62.

[[183]](#_183_22) 雖然沒有相關的證據，但是總體而言，長期租佃的高地租（按種植季計算）中有一部分是由于長期租佃的土地通常是更高產的土地。

[[184]](#_184_22) 當然，佃戶會堅持簽訂書面合同，以保護他們耕種一定數目種植季的權利。塞達卡流傳著這樣幾個故事：過去一些租地的佃戶沒有堅持要求簽定書面合同，他們在一個晴朗的早晨發現，他們的地主在租約到期之前就賣出了土地。

[[185]](#_185_20) 當地或者整個穆達地區都沒有可靠的數據來告訴我們，華裔商人階層在租佃市場上是如何重要。事實上，我們很難知道，當地人的印象是否準確，如果這種印象準確的話，又是否具有代表性。

[[186]](#_186_20) 這種經營權的壟斷也可以有其他的形式：比如，把地里的“青”苗出售給擁有聯合收割機的辛迪加聯合企業。在這樣的實踐中，那些還在地里的稻谷，在插秧以后收獲之前，被打折出售。這種方式不僅被那些有資金困難的村民所采用，收獲之前需要現金周轉的大農戶也采用這種方式。據說，在南部的明關村，這一現象比較普遍；我在塞達卡的期間塞達卡至少有6例這樣的個案。在長期出租（paja）中，賣青苗的可能是窮人，也有可能是富人；而買方幾乎毫無例外地都是富人。與此相關，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并沒有證據表明，缺乏資本的小農戶和小佃戶的收成比大農戶差，雖說小農戶和小佃戶只出售他們收成的一小部分。

#### 水稻生產的變化和工資的變化

[[187]](#_187_20) 當然，這些并不是全部的因素。從1973到1974年，谷物價格的大幅增長、對泰國收割工人的限制，再加上吉蘭丹州勞動移民的減少，都刺激了聯合收割機的出現。聯邦政府降低或取消了收割機的進口稅，這也降低了要購買聯合收割機的財團的資本消耗。

[[188]](#_188_20) 首先，當收成不好的時候，更多的村民會在村里村外尋找打短工的機會，盡管如此，表4.8的數據仍然反映了獲得好收成后打短工的重要性。此外，到1977—1978年，已經出現了一些聯合收割機，這已經使一些農戶打短工的收入有所減少。在插秧和收割過程中，小農戶之間的換工是非常普遍的現象，但由于沒有現金交易，此處未將這種勞動交換計算在內。如果我們把這種勞動交換計算在內，我們可以假定這種勞動是通過降低生產成本獲得了“報酬”，那么，對打短工收入的依賴將更加明顯。我沒有將孩子們打短工的收入計算在內，這些收入通常是作為他們的零花錢，是不交給家里的。這些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家庭在養育孩子方面的開支，這一點在貧困家庭中尤其明顯。這些收入是可以納入表4.8的數據中的，這將進一步提高打短工的收入的重要性。最后，表中的數據是在聯合收割機給打短工帶來沖擊后收集的，1973—1974年間的數據會顯示出對打短工的收入更強的依賴。

[[189]](#_189_20) Clive Bell, Peter Hazell and Roger Slade, The Evaluation ofProjects in Regional Perspective:A Case Study ofthe Muda Irrigation Project（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Press, forthcoming），chap.2，p.40.1970到1973年土地備耕中的勞力投入減少了一半。

[[190]](#_190_20) 現在，水牛不再是一種資本，而更像一種經濟上的負累。在過去的12年里，它們的數量已經從42頭下降到了22頭，這不僅反映了水牛價值的下降，同時也反映了喂養水牛投入的增加。以前，犁地的花費大部分是在村莊內部循環，而現在，這部分收益流向了擁有新的生產要素的富裕的外來者。在包括塞達卡等村的雙溪達汶分區，水牛的數量已經從1970年的1670頭下降到1977年的1014頭，下降了40%。現在，水牛的擁有者仍然用水牛來犁自家的地，偶爾也犁一些別人的地。此外，水牛也用來在水地里拉橇運送秧苗或者成熟的稻谷。喂養水牛的工作時間也有了一定的增加。在雙耕以前，水牛可以在河堤或者水渠邊上的茬地放牧，而現在，因為有雙季稻的關系，農民不是割草喂它們，就是小心地用韁繩把它們拴住，以免破壞他人的莊稼。在過去的7年里，至少有一頭水牛被（不知名的）村民打死，因為他發現這頭牲口糟踏了他田里的稻谷。現在，因為開放式的放養受到較多限制，所以，水牛的喂食成了難題。

[[191]](#_191_20) 收割（包括脫粒）1里郎土地的花費已經從1971年的28馬元左右上升到1976年的60馬元，翻了一倍多；與此相比，糧食的零售價只上漲了44%。參見S.Jegatheesan，"Progress and Problems of Rice Mechanization in Peninsular Malaysia，”Working Paper No.17 （Malaysian National Conference on Paddy, Kuala Lumpur, February 26—28，1980），11。

[[192]](#_192_20) 葉加西桑（"Progress and Problems"，2）指出，在1975年，就整個穆達地區而言，那些耕種面積在2里郎以下的農戶，只有39%的勞動需要雇工；而對于耕種面積在15里郎以上的農戶來說，90%的勞動都是由雇工完成的。

[[193]](#_193_20) 比如，一個農民可能會說他在1977年的時候，靠收割時打短工可以賺得200—250馬元左右的收入，而在這一季，他大概只有100馬元的收入。他的回答事實上是一個數量級，這反映了他在1978年以前預期的收入。盡管這些估計是大概值，但是，考慮到農民有能力回憶起很長時間內的價格和工資，這些數據應該是比較可靠的。

[[194]](#_194_18) 在此，他對于我的“犧牲”有些嘲諷，因為我剛剛幫人用大的碾槌碾碎了一些未全熟的稻谷，來做一次豐收前的佳肴（emping），這種食物在村里廣泛食用。而且，村里人都知道我當時流了不少汗。他的話也是因為自己無事可做而感到羞恥，這種感受在我們稍后會提到的其他被機器剝奪了勞動機會的收割工人那里，也有一定的體現。

[[195]](#_195_18) 一般來說，插秧都是婦女的工作。但是，對于貧困戶來說，這種勞動分工的性別傾向就會被打破：男性會從事插秧和（或者）收割的工作，而婦女偶爾也從事脫粒的工作。在過去，對于從吉蘭丹州搬遷來的貧困夫妻來說，他們從事收割、脫粒工作，通常并不考慮勞動的性別分工。

[[196]](#_196_18) 據估計，這種工作的回報率是相當高的。拾穗4個早晨平均能得到相當于35馬元的一麻袋稻谷，也就是說一個早上的收入是9馬元，這是現在打一早上短工的所獲報酬的3倍。

[[197]](#_197_18) “瘦骨嶙峋的”瑪把這些遺留物叫做“機器上掉下來的東西”。

[[198]](#_198_18) 比如哈吉·卡迪爾，在1978—1979年的主種植季他以這種雇傭方式種植了3里郎的土地，同流行的雇工作隊的方法相比，他每里郎大概節省了7馬元的費用。至于為什么固定的現金工資制在插秧的時候不像收割的時候那樣流行，主要有三個原因。第一，在插秧時，質量控制更加重要。第二，因為插秧仍然大部分由人力承擔，勞動力剩余在這個階段不是那么明顯，所以，地主在插秧時還沒有處在頤指氣使的位置。如果說有例外，那是因為有些農戶插秧插得比其他人早或者晚，因此這些雇主有足夠的勞動力供給可以挑選。最后，同時可能也是最關鍵的，插秧的有效工資率（每小時的回報）低于收割的有效工資率，所以，向固定的現金工資制轉變，地主也只能節省很少的花費，甚至沒有節省下什么。插秧現在包括拔秧苗、捆扎秧苗，其花費大約是每里郎35馬元。換成古榜固定現金工資制，那么，拔秧苗、捆扎秧苗仍然是計件制，一扎秧苗是6分錢，1里郎地一般需要240扎秧苗，一共需要14.40馬元。再加上10個婦女工作一上午的工資，每人3馬元，10個人的工作則是30馬元。每里郎的花費一共是44.40馬元。只有當自己家里的勞力來承擔拔秧苗、捆扎秧苗的工作時，就像哈吉·卡迪爾一家的情況一樣，古榜固定現金工資制在插秧時似乎才是有優勢的。

[[199]](#_199_18) 主種植季的谷物收割情況尤其如此。少數幾個播種比較早因而谷物成熟也比別人早的農戶，可以利用在人力用工高峰季節之前收割的優勢，以固定的現金工資的方式來雇一些無事可做的婦女。這樣，這些農戶在收割上的花費就要少于合同雇工制。一般來說，農民都避免太早（或太晚）種植，因為最早（或最晚）成熟的稻田因為老鼠和鳥類造成的損害會更大。另外，除非他的田地挨著馬路，否則，早收割的農戶就不能使用聯合收割機，因為機器進入稻田時會損壞鄰近一家或數家田地里還沒有成熟的莊稼。

[[200]](#_200_18) 播種也有它自身的缺點，這些缺點和播種可能的優點一起是塞達卡村中人們廣泛爭論的一個主題。爭論的焦點在于采取播種的方式時可以預期的產量。有人說，播種方式的產量和插秧方式持平，甚至更高一些；而另一些人則認為，播種方式的產量會少一些。我曾經看到過，采取播種的方式，產量低的時候每里郎只能收6—8袋；而產量高的時候，每里郎可能有18—20袋的收成。當然，我們應該記住，播種方式所節約的生產花費意味著，如果播種的產量只是略低于插秧的產量，那么農民的純收入并不會下降。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跟插秧相比，干種的長勢很不穩定，因此，這種方式有很大的風險。一些窮的農戶曾經嘗試過干種的方式，結果他們的收成大量減少了，所以他們對再次嘗試干種都很謹慎。拋開播種的優缺點，并不是所有農民都可以在插秧和干種之間進行選擇。干種需要相當平整的土地，以及對水的良好控制。除非這一家的土地跟水渠毗鄰，否則就需要得到其他農戶的允許和合作，在灌溉季水必須通過這些農戶的的田才能引過來。而這樣的合作并不是容易得到的。技術的結構和社會的結構為播種的可能發展設置了一些限制。

[[201]](#_201_18) 這種技術并不是什么新技術，在這之前，所有人都知道這項技術，但是很少有人使用它。1978年的灌溉季種植由于天氣干旱而不得不取消，因土壤干旱，接下來的主種植季又開始得晚了，有可能要和接下來的灌溉季重疊，再加上聯合收割已經出現，所有這些無疑鼓勵了對播種的嘗試。

[[202]](#_202_18) 比如說，在1979到1980年的主要種植季，17戶嘗試播種的人家中有8戶都來自按人均收入來說塞達卡村最富有的25戶人家，只有3戶人家來自村中最貧困的那25戶人家。

[[203]](#_203_18) 采取播種還有其他的一些原因。諾爾是一個富裕的村民，他耕種了6塊相對分散的土地。分別建立6個育秧圃或者是在一個大的育秧圃里育好秧苗然后運送到分開的地塊，這兩種選擇都既費時又費錢。所以，諾爾決定直接播種大部分土地。還有一兩戶采取播種的是耕種高地的農戶。通常，高地的莊稼要種得晚些，高地莊稼也就會比大多數土地里的莊稼成熟得晚，因此高地收成受到的鼠害也就更嚴重。這些農戶發現，播種可以使他們早點收割莊稼，從而使他們與周圍的田地步調一致。

[[204]](#_204_18) 例如，“穆達二期項目”的操作手冊有一個部分題為“推廣與農業支持服務”，上面寫道，“他（指稻米種植專家）對農業管理實踐的持續發展負有全面的責任，農業管理實踐包括更好地安排土地耕作，發展更好的耕作技術，比如直接播種的可能性”。雖然說是見微知著，但是在1983年，穆達農業發展局事實上并沒有以“官方”身份推廣直接播種。

[[205]](#_205_18) 在這個解釋中，我忽略了其他形式的“機械化”。盡管這些機械化同聯合收割機沒有聯系，但這些機械化實際上也降低了貧困家庭的收入。現在，摩托車替代了自行車把裝滿稻米的麻袋從碼頭或谷倉運送到主路上再用卡車載走，或直接把它們運送到磨坊去。這項被村民稱為“塔里克”（tarik）的工作以前一般都是由自行車承擔的。而自行車是比較大眾化的，窮人和富人普遍都擁有自行車。這一工作對窮戶意味著每一個種植季100馬元到200馬元的收入。現在，這項工作幾乎都是由摩托車來完成的。而摩托車的分布是極不平衡的。塞達卡1979年有28輛摩托車，其中多于3/4的摩托車屬于村中比較富裕的那一半家庭，只有1輛屬于村中比較貧困的那25個家庭。因此，從這些有利可圖的工作中獲得的收益盡管依舊保留在村莊內部，但是，這些收益現在實際上是村中富戶獨占的領域。

[[206]](#_206_18) 從理論上來說，移民的年齡應該在45歲以下，盡管在實際情況下人們有可能通過行賄把身份證上的出生日期往后改。

[[207]](#_207_18) 唯一可能的例外是在1954年吉打州的干旱和歉收之后，此時許多有勞動能力的村民離開了村莊，到橡膠種植園和城市中尋找工作機會。

#### 地方機構和經濟權力

[[208]](#_208_18) 自從1979年以來，“穆達農業發展局”已經開始向所有的農民——不管他們是不是農會成員——提供化肥，這進一步減少了農會成員的潛在利益。

[[209]](#_209_18) 瑪·布揚和卡米勒是唯一例外的兩個成員。瑪·布揚是反對黨伊斯蘭教黨的成員，沒有償還“穆達農業發展局”最初提供給他的貸款。瑪·布揚之前為了逃債曾加入巫統。卡米勒是真正意義上的中立者，不過，他正在考慮加入巫統。

[[210]](#_210_18) 我們很容易解釋其中的兩個例外。一戶是托·瑪赫家，她是一名寡婦，不會參加一個幾乎全部都是男性成員的組織；另一個是加扎利，雖然他是一個比較謹慎的巫統成員，但他也是村里最富有的伊斯蘭教黨地主的女婿，他希望盡量避免公共地把自己同當地的巫統精英聯系在一起。

[[211]](#_211_18) 實際上，這7戶人家中的4戶是一個擴展家庭：哈吉·卡迪爾、他的父親、他的妹妹和妹夫、他的女兒和女婿。

[[212]](#_212_18) 其中一個例外是瑪·布揚，他的特殊情況已經在前注中作了介紹；而另一個人是勒拜·侯賽因，他是村長哈吉·加法爾的大舅子，而他的兒子則是巫統地方支部的出納。這兩個例外的收入在村中基本上還是屬于中等水平（分別排在第34和35位）。

[[213]](#_213_18) 從1979—1980年的主種植季開始，所有的農民都可以獲得免費的化肥，這取消了會員享受的優惠；同時，這也使得向“穆達農業發展局”償還貸款更加缺乏吸引力。

[[214]](#_214_18) 要了解在非洲發生的類似的情況，參見Robert H.Bates, Markets and State in TropicalAfrica（Berkeley:Univ.of California Press，1981），chap.7。

[[215]](#_215_18) 應該指出的是，這種做法毫無疑問會侵蝕農會的會員基礎，從而進一步削弱農會那早已空洞的聲明：在穆達地區代表所有農戶的利益。

[[216]](#_216_18) 在最窮的20戶人家中，8戶巫統的成員平均獲得了2次工作機會；而另外12戶伊斯蘭教黨的成員平均得到了0.9次工作機會。

[[217]](#_217_18) 參見表4.10。

[[218]](#_218_16) 這10戶是華喜德（#2）、曼蘇爾（#9）、瑪·薩里夫（#12）、薩馬德（#17）、托·扎伊納（#21）、阿里芬（#27）、哈倫·丁（#31）、勒拜·侯賽因（#35）、阿里·阿布杜爾·拉赫曼（#36）和托·奧馬爾（#37）。其余6戶之中的2戶——拉扎克（#1）和巴克利（#7）——是最近才從伊斯蘭教黨轉到巫統的。這2戶毫不隱諱，他們希望這樣做可以獲得學校貸款、短期的公共建設工程方面的工作等等方面的好處。

[[219]](#_219_16) 用"kami"而非"kita"來表示主格賓格所有格的“我們”，使得這句話在馬來語中達到了一語雙關的功效。用"kami"表示說話者在強調談話的對方不包括在“我們”這個群體里面。

[[220]](#_220_16) 當伊斯蘭教黨在某一段時間加入統治聯盟的時候，伊斯蘭教黨的地方成員就會普遍感覺幻想破滅。雖然伊斯蘭教黨幾乎沒有什么實際的背叛，但它的成員還是痛苦地評論道：“拿督·阿斯里（伊斯蘭教黨的領導）正在拿（從字面上說是‘吃’）政府的薪水。”

[[221]](#_221_16) Clive S.Kessler, Islam and Politics in a Malay State:Kelantan 1838—1969 （Ithaca:Cornell Univ.Press，1978）.

[[222]](#_222_16) 凱斯勒在吉蘭丹州的研究中所得到的許多結論也適用于吉打地區。就像他所指出的（同上，第125頁），很多伊斯蘭教黨的領導人都來自各種級別的神學教師、宗教領袖、傳統的頭人，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感受到了來自公務員以及拿執照的商人的威脅，覺得這些人似乎要取代他們。于是，一些被替代了的精英加入了伊斯蘭教黨的領導隊伍。另外，就像凱斯勒提到的，伊斯蘭教黨也代表了“馬來西亞民族主義各個激進的伊斯蘭派別的復興與結合”（第126頁）。

[[223]](#_223_16) 這個平均數是被過分夸大了的，因為哈吉·沙利姆的兒子也是村莊發展委員會的成員之一。哈吉·沙利姆是一個非常富有的經營者，他占有45里郎的土地，而且嚴格來說居住在村外。

[[224]](#_224_16) 巫統現任主席沙姆蘇爾是政府開辦的磨坊的雇員。會計塔哈曾經在地區政府辦公室做過兼職。執行委員會的成員阿布·哈桑曾經是農會的卡車司機。尤努斯從政府那里得到了一個執照，在市場上經營一個攤位。其他的5個人，包括副主席，都從農會獲得了為數不少的貸款。

[[225]](#_225_16) 塞達卡在這方面可能比較特殊。一項對穆達地區大地主的調查發現，他們相對平均地分屬馬來西亞的兩個政黨——巫統和伊斯蘭教黨。參見以下精彩的研究，Mansor Haji Othman，"Hak Millik Tanah Padi dan Politik di Kedah"（Master's thesis,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1978），chaps.1—3。

#### 分類

[[226]](#_226_16) 該小標題的原文是"CLASS-IFYING"。作者在這里做了一個個小小的文字游戲，他將英文詞"classifying"進行了變形。首先我們來看"classifying"的意思。"Classifying"是"classify"（意為“分類”）的進行時態。一方面，作者用這個詞表明在塞達卡，綠色革命的歷史不是一個，而是不同的、是分類的。明確地說，按照本章標題的說法，就是勝利者和失敗者的歷史是不同的。另一方面，作者用進行時態來表明對過去的不同表述和看法又參與——或者說正在——建構出勝利者和失敗者的分類。接下來，我們可以來討論一下作者的文字游戲。作者有意將"classifying"拆為"class-ifying"是為了突出這種分類中的"class"階級意涵，也就是說勝利者和失敗者對歷史的不同說法和看法是與階級有關的。總的說來，作者在這里用"class-ifying"是表明在塞達卡不同階級對共同的過去是有各自不同的描述和解釋的，同時，這種不同的歷史又建構出了不同的階級。——譯注

[[227]](#_227_16) 當有人做出這種聲明時，健康的懷疑主義顯然是應該提倡的。當假定一體的主題（unifying theme）脫離了其歷史根源并在某種文化的上空盤旋時，比如黑格爾的絕對精神，情況尤其如此。這種“唯心主義”的烙印使得作為行動者的人僅僅成為觀念的媒介或爪牙，盡管這些觀念是人類的創造物。只有當這些觀念跟促成其出現和發揮影響以及預示著其削弱或消失的那些歷史條件緊緊地結合在一起時，這些觀念才值得仔細考慮。

[[228]](#_228_16) Clifford Geertz，"Thick Description:Toward an Interpretive Theory of Culture，”chap.1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Culture（ New York:Basic，1973），9.

[[229]](#_229_16) 從1940年到1950年的這十年對這里的提法似乎構成了挑戰。在此期間，日本人的入侵導致了政權的中斷。

[[230]](#_230_16) 然而，事實上，實際資料是不成比例地來自窮人階層里的較窮者和富人階層中的較富者。我認為，情況之所以這樣，一方面，是因為階級圖譜中對立兩端的階級利益不那么模糊，另一方面，這也是因為我花了更多的時間去傾聽那些最窮者和最富者的想法。

[[231]](#_231_16) 比如，從收入分配來說，哈米德（#38）屬于中間層，但幾乎村里所有的人都認為他是富裕的，因為他擁有10里郎的土地和一臺拖拉機；村里人說，是因為賭博，哈米德才被迫把地租出去，他只是暫時顯得比較潦倒。法齊勒（#42）和阿布杜爾·拉赫曼（#41）情況比較相似，他們都是富有的地主，但是，法齊勒最近買進了一些稻田，為了支付這筆花費，法齊勒被迫租出了他的一些土地，而阿布杜爾·拉赫曼則是因為一連串的農作物歉收而不得不將土地出租。法齊勒和阿布杜爾·拉赫曼都被認為是富裕的人。另一個異常的例子是托·穆罕默德（#56），他過去相當窮，現在他成了鰥夫，家中只有一個獨身的女兒。托·穆罕默德家的人均收入相當高，但是，從他的一生來看，村民們認為他是窮人。

#### 夜行船

[[232]](#_232_16) 該小標題的原文是"SHIPS PASSING—AND SIGNALING—IN THE NIGHT"，其意為“夜晚航行并發送信號的幾只船”，這里譯為“夜行船”。作者在這里用了一個比喻。這一節討論的是對當時塞達卡村莊生活的兩種不同說法。當時塞達卡的村莊生活對作者和讀者來說就像無法看清的黑夜，而對于村莊生活的不同的說法就像黑暗中的船只。就像在黑暗中穿行并發出信號的船只一樣，這些說法是當時村莊生活的一部分，并且提供了一些“信號”用以解讀村莊生活。——譯注

[[233]](#_233_16) 馬來地區的綽號通常是由名字的最后一個音節構成，所以，Osman被叫成了"man"；Zakariah被叫成了"Ya"；而Ahmad變成了"Mat"。添加在這些綽號之后的詞往往反映了這個人或者其父親、其祖父的個人性格。所以，瑪·丁（Mat Din）在背后被人稱為“甲蟲瑪”（Mat Kabur）。Kabur是一種椰樹葉子上的甲蟲，而瑪·丁長得與這種甲蟲相似。瑪·薩里夫被稱為"Mat Rabit"，rabit的意思是“破的”，這是對他的兔唇的速寫。雅米勒（Jamil）被稱為“中間的雅米勒·帕克”（Jamil Pak Ngah），“中間的帕克”（Pak Ngah）是沿襲自他的父親帕克（Pak），雅米勒的父親帕克是家里排在中間的兒子，被稱為Ngah，這是Tengah的縮寫，是“中間的”意思。

[[234]](#_234_16) 村民們確實可以根據一個人充足的收成推測這個人是富有的，但是，他們通常很難了解到這個人需要償還的債務。所以，從這方面來說，現金的廣泛使用標志著村莊的一個變化：隱藏財富更加容易了。此外，在鄉村中，了解一個家庭是多么富有，并不是無所事事的消遣；這種至關重要的信息構成了鄰居之間權利義務的基礎。左拉寫道，“他們總是不厭其煩地評估每一寸土地，因為他們知道洛格尼斯（Rognes）村每一個人的的財產，甚至具體到他們亞麻床單的價值”。左拉寫下這句話時，似乎是在描述所有的農村。The Earth, trans.Douglas Parmee （Harmondsworth:Penguin，1980），194.在過去，一個種田人家的經濟狀況可以從他們谷倉里儲藏的稻谷的數量推算出來。如馬來諺語所言：“如果谷倉是空的，那么，胃就會是空的。”

[[235]](#_235_16) 手工脫粒的節奏通常需要兩個男人一起在一個脫粒桶工作；一個人取來一捆稻谷，而另一個人則要用連枷把稻粒打到木桶里。只要我發現脫粒者的數量是奇數，一旦受到邀請，我就會加入那個“剩下的人”（odd man out）。盡管我打谷時比大多數人都要慢很多，但按照記件工資的方式（每麻袋2馬元），我的合作者收到的是我們一起脫粒的全部報酬，我的合作者因此得了點好處。

[[236]](#_236_16) 我的出現對于他們的小型“演說”來說是個刺激，這當然是千真萬確的。他們會對我說這種話，但他們不會直接對帕克·亞赫說類似的話。在此意義上，他們的話是編造的。這種話是為了積極說服外來者，并讓外來者相信，誰可能是有權力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表達他們的觀點的時候，他們必須求助于嵌入村莊生活的價值和標準，還要使某個相當無知的人更清楚，一個手勢和一個常用語在他們之間究竟表達了什么意思。

[[237]](#_237_16) 這一過程，地方上稱之為"ambil kuasa"（獲得法律憑證），其費用包括50馬元的固定收費加上按照土地市值估價的1%收取的穆斯林遺產稅。

#### 綠色革命的階級史

[[238]](#_238_16) 本節的小標題是"TWO SUBJECTIVE CLASS HISTORIES OF THE GREEN REVOLUTION"，字面含義是“兩個主觀的關于綠色革命的階級歷史”。在這里，作者試圖從階級的角度簡要考察塞達卡綠色革命的經過，試圖探詢富人和窮人——勝利者和失敗者——如何體驗和解釋生產關系的每一個主要變化。作者認為在富人和窮人——勝利者和失敗者——那里，綠色革命的歷史是不同的，所以這里有“兩個關于綠色革命的歷史”。而造成這種不同的原因是因為窮人和富人——勝利者和失敗者——是沿著階級界線劃分，所以這里的歷史是“階級歷史”。另外，作者也力圖表明這里的歷史并不是關于“客觀事實”的歷史，而是對“事實”的表述。相對于“客觀事實”，這些表述是主觀的，所以作者說這是“主觀的歷史”。這里簡要地譯為“綠色革命的階級史”。——譯注

[[239]](#_239_16) 莫雷洛斯（Morelos）是墨西哥的一個州。20世紀初，莫雷洛斯州的階級對立尖銳，是墨西哥當時農業不安狀態最嚴重的州。1910年，墨西哥著名的農民革命領袖薩帕塔（Emiliano Zapata，1879—1919）發動莫雷洛斯州的農民奪取地主的土地，由此揭開了墨西哥1910—1917年資產階級革命的序幕。——譯注

#### 雙耕與雙重看法

[[240]](#_240_16) 他們最經常提到的宴席是kenduri berendul，字面意思是“搖籃宴”（cradle feast），這種宴席是為了慶祝新生嬰兒，包括儀式性的剪發以及為女孩舉辦的割禮（circumcision）。我在當地逗留期間，這種儀式只舉行過兩次。他們提到的游戲包括抽陀螺比賽和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的自衛表演，這兩個游戲今天都已經很少看到了。來自《古蘭經》的伊斯蘭吟誦包括berdikir 和berzanji，這些表演今天偶爾會出現在村里的宴會上，但表演者通常是一些收費的團體。所有這些活動都被描述為“娛樂活動”。

[[241]](#_241_16) 當然，這對于塞達卡純粹的雇工尤其如此。但這同樣適用于數量更為巨大的處于村莊生活邊緣的小土地所有者和佃戶，傳統上這些人的大部分收入都來自田間打短工的工作報酬。

#### 從活租到死租

[[242]](#_242_16) 這里提到的實際上是收益分成租佃，這很早就從“谷物地租”的通常意義中消失了。

[[243]](#_243_16) 馬來語中，這句話的字面意思是說，“這些人都在耍花招”。

[[244]](#_244_16) 華喜德就是一個例子：他租種了6里郎土地，正常情況下，盡管他還有一個大家庭，他的收入在村里應該算中等水平。然而，在過去兩個種植季，他的收成非常糟糕，每里郎稻田的產量只有9麻袋或者10麻袋，但是，高額的租金是固定的。結果，他的收益微乎其微，他正在公開地討論是否放棄他租種的三塊土地中的兩塊，然后在一年的大部分時間到檳城去工作。

[[245]](#_245_16) 許多土地租佃都是如此，即便地主和佃戶是近親。

[[246]](#_246_16) 按照村里的說法，阿明是富人，但是他租種了7.5里郎的土地，因此，他在這個問題上站在佃戶這一邊。

[[247]](#_247_16) 船只再次在夜晚行駛，這兩種說法之間距離大多與階級相關。如同往常一樣，這里再次經歷了歷史的重構。即使在現金地租制度下，的確也有些地主在歉收后不允許減少地租。卡里姆記得有個地主在一次歉收之后一點租也不肯減。那個地主發現當年的地租少了一點點以后，他跑來找卡里姆要求補齊。那個地主說地租的多少是“早就商量好了的”。問題在于，對于佃戶而言，一旦他們面對“預付現金地租”，那么舊有的制度就會呈現出樂觀的色調。

#### 聯合收割機

[[248]](#_248_16) 還必須加上少許（5個）小農場主，他們使用機器是因為這可以使他們有時間到別處工作，并且/或者由于他們家庭的勞力不足或者根本沒有家庭勞力來親自收割莊稼或者跟其他家庭換工。

[[249]](#_249_16) 在此，阿布·哈桑用petani稱呼農民，這在某種程度上是為了表現他接受的學校教育。這個術語通常出現在官方的講話和報紙上，而村民很少使用它，他們愿意稱自己是“村民”。

[[250]](#_250_16) 如果土地比較潮濕，麻袋就需要由水牛拉著木撬運出去。否則，就要由人力背到一個狹窄的小路上，再由自行車運到大路上，然后由摩托車或卡車運走。如果每麻袋支付1.50馬元，那么每里郎平均產量（24麻袋）的總耗費就將大致占生產成本的15%，而且，對需要繳納租金的佃戶而言，這種耗費要占他們純收益的12%至13%。

[[251]](#_251_16) 因此，同只需進行一次交易的機器收割相比，人工收割往往被大種植者描述為“麻煩的”、“復雜的”。

[[252]](#_252_16) Clive Bell, Peter Hazell, and Roger Slade, The Evaluation ofProjects in Regional Perspective:A Case Study ofthe Muda Irrigation Project（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Press, forthcoming），chap.2.

[[253]](#_253_16) 一些農場主完全有可能偶爾因收割灌溉季莊稼時的延誤而遭受損失。然而，沒有任何證據表明農業生產的權威認為1972年至1977年間這是個嚴重的問題。另一方面，這樣一種說法看起來確實有道理，現在來自泰國的移民急劇縮減，不使用聯合收割機的話，就會造成嚴重的作物損失。

[[254]](#_254_16) 這里理應加上一句，哈吉·沙利姆有特別的理由為自己辯護。在1979年的主要種植季，他去穆達地區規劃管理處（Muda Scheme）的中心辦公室請求準許輸入泰國插秧工。哈吉·沙利姆聲稱他無法在當地找到人來插秧。那次來了超過一打的泰國插秧工，哈吉·沙利姆因此受到村里窮人的嚴厲指責。村里的窮人認為，哈吉·沙利姆不過是想找到比他在附近能找到的雇工更便宜的勞動力，不過是為了讓他的地在相同時間種完，這樣他就能夠在日后一起用聯合收割機一次收割完畢。

[[255]](#_255_16) 播種工作的社會建構大體上遵循了關于聯合收割機話語的階級模式。跟手工插秧的土地相比，用機器播種的土地的產量是高還是低，這是一個持續不斷地討論和爭議的主題。大種植者支持機器播種，而絕大多數農業雇工和小農場主則往往反對機器播種。對于村里的許多窮人來說，這是影響其生存的致命一擊；正如羅吉婭所說，“如果用機器撒種，那會殺了我們”。

[[256]](#_256_16) 這些人當中有塔杰丁、巴克利、他的兄弟朱基夫里、托·穆罕默德、薩馬特、勒拜·彭德克、阿布杜爾·拉赫曼、巴塞爾以及卡米勒。或許是巴塞爾的政治角色迫使他雇用了比他的實際需要更多的勞力。除了巴塞爾以外，能把這些種植者同其鄰居區分開來的或許只有公德心（public-spiritedness）。即使這個名單也是富有爭議的，因為有些人認為，張三或者李四之所以雇用村里人是因為他們的土地太泥濘，沒辦法使用機器。

[[257]](#_257_16) 同拖拉機的情況一樣，聯合收割機的中介人通常都是住在村里的馬來人，他們個人要確保使用機器的相關費用都付清了，任何不足的部分都要由這些中介人自己補上。機器的所有者用這種方式利用了同村馬來人之間的相互義務。拖欠機器所有者相關使用費用是誘人的，但欺騙自己的鄰居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哈吉·加法爾的兒子達烏德也是一個收割機和拖拉機的中介人。

[[258]](#_258_16) 在其他人認為這種工作對社會有害時，“我們不得不活命”便成了證明其工作正當性的標準借口。

[[259]](#_259_16) 部分村民聲稱還有另一種形式的“尷尬”，這尤其反映在出賣青苗這種相當常見的行為之中。土地的主人在收割前就將莊稼轉讓給了有收割機的人。借此，土地的主人就可以逃脫人們的責難。如果真是這樣，爪哇的市場體制中有許多與這種形式類似的例子。在爪哇，人們的目標不在于避免使用機器的責難，而是避免因為雇用使用鐮刀進行收割的外地人而受到責難。當然，至于一個種地人為什么希望出售他尚未收割的莊稼，還有許多其他的原因。

[[260]](#_260_16) 一個可能的例外是另一次不幸的場景。當一輛卡車正轉彎準備給一家店鋪送貨時，駐扎在凱帕拉·巴塔斯鎮的當地警官開著他的新沃爾沃車撞了上去。這輛車是通過一項特殊的公務員汽車貸款計劃而購得的。那人是個新警官，他由于向附近的摩托車主人索取賄賂而臭名昭著。絕大多數摩托車主人都有計劃地違反法律，他們拒絕向政府支付必需的道路稅和保險費。因此，這些摩托車主是易于被警察捕獲的獵物。

[[261]](#_261_16) 那臺機器最后被解救出來的時候我不在場，但人們普遍認為，聯合收割機的主人在絕望狀態下雇了一個馬來巫師，正是馬來巫師的咒語才使得機器從黏土中得以解脫。

#### 失去的地盤：土地的獲得

[[262]](#_262_16) 然而，在其他村子里，比如在與塞達卡南部毗鄰的明關村，大量地主住在村里，這些地主或者是自己耕種大量土地，或者是按長期租佃制將大量土地租種出去。在這些村莊里，我們不久就要講到的一些沖突將會被內化到這些村莊的生活中。

[[263]](#_263_16) 華喜德等人宣稱，日益普遍的出售青苗的做法，正是這種做法的修改版本。在這樣的例子中，地主備耕，種莊稼，然后將未收割的莊稼出售給一些土地經營者——通常是擁有收割機的華裔。種植者這樣就立刻回收了他在土地上的投入，并且避免了同收割相關的種種冒險。出賣青苗這種做法在明關村相當普遍，出賣青苗是介于完全自己耕種土地和將土地租出之間的一種選擇。然而，在任何情況下，小佃戶都不可能購買別人出賣的青苗。

[[264]](#_264_16) 妥協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跟其他絕大多數租佃不同——沙姆蘇爾和托·艾哈邁德的租約是長期租佃，他們的租約還按照1955年稻谷法案進行了登記。1955年的稻谷法案規定了地租以及解雇佃戶等事宜，通常情況下，即使是登記在冊的租佃，絕大多數租佃的地租還是遠高于法案所規定的最高額。法律也允許地主重新收回土地，但是如果有人投訴的話，地方的土地官員（通常是地區長官的助理）就有可能要尋求一個折衷的方案或者推遲收回土地。這種推遲解釋了上面提到的貴族家族為什么僅僅收回了他們在明關村擁有的100里郎土地中的50里郎。

[[265]](#_265_16) 值得注意的是，這里動詞“吃”（makan）既有消耗糧食的意思又有剝削的意義。

[[266]](#_266_16) 因為他嘴里總是叼著雪茄，所以他得了這么一個綽號。

[[267]](#_267_16) 如果以每里郎220馬元的租金承租土地，就是不考慮如果這筆錢是借來的所需要的利息，假定平均產量是14麻袋，那么，每里郎土地的純現金收益將只有71馬元。只有那些擁有資本并要將風險分散到大量土地上（比如說100里郎）的人才會接受如此之小的邊際收益。另一方面，如果有人能夠以最小的成本（保養、燃料及折舊）使用拖拉機和聯合收割機，那么，每里郎的收益就會相當多。盡管許多富裕的馬來人也擁有拖拉機，但在吉打地區，只有少數馬來人是收割機的辛迪加聯合企業的成員。機械化具有雙重影響，它既可以確保大佃戶收支平衡，又可以使農場擴大到最為適宜的規模。

[[268]](#_268_16) 作為長期租佃佃戶的貧農和中農經常激烈地抱怨地主憑一時之興添加額外年份的做法。在一項租約還有三至四個種植季才到期時，地主就會突然出現并且宣布他想立刻把土地再租出若干種植季。因為擔心現有的合同失效，佃戶緊接著就會焦急地攢夠所需的現金。當這種突然的要求受到譴責時，這種指責總是說富有的地主沒有理由向比自己更窮的佃戶提出這樣的要求。羅吉婭從她的弟弟（外村人）那里租種了土地，她的弟弟經常到村里來要求延長合同。羅吉婭指出她的弟弟擁有橡膠地、一輛汽車，還有三個妻子，因此羅吉婭公然指責他的弟弟“非常小氣”。

[[269]](#_269_16) 國家或許應該受到責難的原因之一在于，1967年的稻谷法案實際上禁止了契約租佃，因為它將租佃有效期限制在一年之內。

#### 慈善的儀式與社會控制

[[270]](#_270_16) 作為農民反抗政府的一個例證，逃避法定扎卡特的行為本身是值得研究的。這里我只能提到一些細節。在塞達卡，有17個小規模種植者，他們的收獲量少于50麻袋但已經足以成為官方的征稅對象。這17個人當中只有3個人向地方收稅人“阿彌爾”交了些東西。而在中農和富農當中，沒有人（包括身為地方收稅人“阿彌爾”的巴塞爾）向政府支付了足額的“法定”扎卡特捐贈。就全村而論，真正繳納的“法定”扎卡特捐贈大概只有應繳納量的15%。村民抱怨說，只有稻農普遍地繳納了這種稅款，而其他更富的人（橡膠和棕櫚油計劃中的移民、商人、不耕田的地主）則很少繳納。村民們注意到沒有任何“法定”扎卡特返還到村里，所以他們懷疑“法定”扎卡特中的大多數都流向了亞羅士打城。

[[271]](#_271_16) 這些人群往往相互重疊。因此，一個耕種者可能將私人扎卡特饋贈給了他的兄弟或者侄子，而后者往往是這個耕種者的雇工，可能還是這個耕種者的鄰居。

[[272]](#_272_16) 并非所有的私人扎卡特饋贈都在村莊內部分配，這是因為，私人扎卡特饋贈經常被給予住在塞達卡村外的親戚和雇工。同樣，塞達卡的窮人也會從住在外村的親戚和雇主那里接受一定量的私人扎卡特饋贈。這里引用的數據必然是個近似值。因為個人給出的和接受的扎卡特的多少常常會引起爭論，富人往往夸大他們的慷慨，而窮人則縮小他們的接受量。

[[273]](#_273_16) Badan Dakwah Islamiah, Pejabat Zakat Negeri Kedah, Panduan Zakat（Alor Setar:Majlis Ugama Negeri Kedah, n.d.，probably about 1970）.

[[274]](#_274_15) Badan Dakwah Islamiah, Pejabat Zakat Negeri Kedah, Panduan Zakat，第5頁。

[[275]](#_275_15) 扎卡特饋贈基本上是男人之間的谷物轉移。因此，除了極少的例外，身為雇工的貧窮寡婦或離婚婦女收不到任何扎卡特饋贈。

[[276]](#_276_15) 外村較老的穆斯林偶爾也會挨家挨戶地征收捐款，他們希望以此募捐資金去麥加朝圣。這些捐助同樣被稱做德爾馬，因為它們類似于給予宗教學校的扎卡特捐贈。可見，德爾馬似乎有更明確的宗教意涵。

[[277]](#_277_15) 更特別的是，在理發儀式（至少在塞達卡，這被視為宗教筵席，三個或七個家庭會為祈禱祖先的靈魂而宰殺一頭較大的動物并辦一次筵席）、割禮儀式或求雨儀式中，幾個家庭將共同舉辦一個筵席。現在，許多官方機構堅持認為求雨儀式已經消失了，而且穆斯林官方也反對求雨儀式。我在塞達卡期間，塞達卡舉行過兩次求雨儀式，每次都是因為沒有及時下雨。

[[278]](#_278_15) 我聽說，在某些村莊，如果有許多來自城鎮的客人，舉辦筵席，尤其是婚禮筵席，會賺些錢，因為從城鎮里來的客人會為筵席的花費貢獻10馬元甚至更多。在對筵席的禮物（這些禮物通常會被記錄下來以便日后那些客人承辦筵席時報答對方）和花費進行粗略檢查之后，我們將會發現，在塞達卡舉辦筵席不太可能賺錢。大型筵席還要提供各種各樣的由東道主付費的娛樂活動。

[[279]](#_279_15) 簡要地確定筵席級別的方法是看被宰殺動物的種類和數量，這基本上反映了人們的富裕程度。例如，說一個筵席花了20只雞，就是說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筵席。如果根據價值聲望從高往低排序，肉類的次序是：水牛、母牛、羊、雞和作為日常食物很少出現的魚。在村莊的傳說中，最神奇的筵席是吉打州的蘇丹為女兒舉辦的婚宴；據說，那場婚宴吃掉了二百多頭水牛，吉打州的蘇丹為舉辦婚宴出售了檳城和韋爾斯利省。

[[280]](#_280_15) 另一個可能的例外是慶祝齋月結束的筵席日，在那一天彌漫著廣泛的慷慨精神，這或許可以和基督教國家的圣誕精神相媲美。

[[281]](#_281_15) 托·穆罕默德擁有4里郎土地，他自己耕種著其中的3里郎。因為現在他家里只有兩個人，這些地已經足夠了。而在10年前，由于龐大家庭的拖累，托·穆罕默德極度貧困。

[[282]](#_282_15) 這句話中“投資”（pusing）在馬來語中的原意是“轉”，用在這里是指使資金“周轉”，而不是閑置，這樣資金才會不斷增值。

#### 記憶中的村莊

[[283]](#_283_15) 為了避免把這僅僅當做某種形式的農民意識，這里值得指出的是，弗朗西絲·赫恩（Francis Hearn）將這種對過去的虛假占有視為英國工人階級早期團結的關鍵要素。Domination, Legitimation, and Resistance:The Incorporation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nglish Working Class（Westport, Conn.:Greenwood，1978），Chap.1.

[[284]](#_284_15) 在此情境中，有必要回顧齊美爾對早期資本主義和“成熟資本主義”時期階級沖突之間的差別的研究。齊美爾認為，在“成熟資本主義”時期當中，勞動條件被視做“客觀條件”或者“生產形式”的產物。“在普遍戰役和地方戰役中，個人的痛苦都顯著減少。經營者不再是寄生蟲和該死的利己主義者。”就其盛行的程度而言，這個更大的、更為“客觀的”看法有可能減少沖突。然而，不管它是不是更加“客觀的”觀點，這個觀點都值得懷疑；“個人化的”觀點——不管多么狹隘——都有助于認識到，諸如市場及技術革新這樣的進程都是社會產物。Georg Simmel 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s, ed. Donald N. Levine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1971), 88.

[[285]](#_285_15) 當然，制度性的因素在這里是決定性的。如果有一次運動或一個政黨支持對土地控制的保障、支持土地改革或者支持鄉村地區的充分就業，那么，看似有理的行動的領域或許可以得到略微拓展。然而，無論巫統還是伊斯蘭教黨都是被相當富裕的農場主和地主所主導，它們都沒有致力于解決穆達平原的階級問題。

#### 特定情境中的意識形態運作

[[286]](#_286_15) 參見F.G.Bailey, Gifts and Poison:The Politics ofReputation（New York:Schocken，1971）。

#### 剝削的詞匯表

[[287]](#_287_15) 這一術語在馬來語中同時用于左翼學者和反對派的政治領導人的發言中。政府對言語當中具有的馬克思主義口吻相當警惕，小心翼翼地使用它，并且通常僅僅是為了譴責華裔中間人，聲稱后者剝削馬來農民、漁夫和橡膠鞣革者。

[[288]](#_288_15) 吮吸血汗的概念同樣普遍使用，并且一個暴虐的地主或放債人可能被稱做“刮地皮”或者被譴責為吮吸血汗。“地”在“刮地皮”一詞中將與水或濕地有關的實際事物同干燥地區的人類等價物區別開來。

[[289]](#_289_15) 在歷史上，具有同一內涵的動詞出現在東南亞的其他地方。例如，一個前殖民時期的緬甸的地區官員被稱做myo-sa，即一個地區的“食客”。泰語中類似的詞是kin muang。被蘇丹任命來治理一個地區的馬來官員被稱做Akan Pemakannya。在大多數用法中，動詞“吃”也意味著，該種行為是不誠實的。

[[290]](#_290_15) 參見Mokhzani bin Abdul Rahim，"Credit in a Malay Peasant Society"（Ph.D.diss.，University of London，1973），255，著重標記為本書作者所加。還可參見凱斯勒（Kessler）對“庸俗唯物主義”的流行譴責的討論。術語kira的使用載于Islam andPolitics in a Malay State:Kelantan 1838—1969 （Ithaca:Cornell Univ.Press，1978），221。

[[291]](#_291_15) Kenzo Horii，"The Land Tenure System of Malay Padi Farmers:A Case Study…in the State of Kedah，”Developing Economies 10，no.1 （1972）:68.

[[292]](#_292_15) Kedekut, bakhil, miskin 以及segan的定義引自Awang Sudja, Hairul and Yusoff Khan, Kamus Lengkap（Petaling Jaya:Pustaka Zaman，1977），449，55，701，and 974。timbang rasa 的定義引自Tenku Iskandar, Kamus Dewan（Kuala Lumpur:Dewan Bahasa dan Pustaka，1970），1255。

[[293]](#_293_15) 作為論據，這一民風與許多鄉村情境有關，參見James C.Scott, The Moral Economy ofthe Peasant:Subsistence and Rebellion in Southeast Asia（New Haven:Yale Univ.Press，1976），chaps.1 and 6。

[[294]](#_294_15)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1.reprint （first published 1946），295，著重標記為本書作者所加。

[[295]](#_295_15) Malay Peasant Society in Jelebu,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Monographs on Social Asnthropology, No.29 （New York:Humanities Press，1965），153，著重標記為本書作者所加。

[[296]](#_296_15) Malay Peasant Society andLeadership（Kuala Lumpur:Oxford Univ.Press，1975），76.這一情境還可參見同一作者的Poverty and Land Hugger in Kelantan（Petaling Jaya:Karangkraf Sdn.Berhad，1978）。

[[297]](#_297_15) Masuo Kuchiba, Yoshihiro Tsubouchi, and Narifumi Maeda, eds.，Three Malay Village:A Sociology ofPaddy Growers in West Malaysia, trans.Peter and Stephanie Hawkes （Honolulu:Univ.of Hawaii Press，1979），278—279.

[[298]](#_298_15) Fujimoto，"Land Tenure, Rice Production, and Income Sharing among Malay Peasants:Study of Four Villages"（Ph.D.diss.，Flinders University, Australia，1980）.

[[299]](#_299_15) 由于此種原因，人們經常使用具有雙重涵義的術語tolong-menolong，從而強調了互惠關系。

[[300]](#_300_15) 然而，即使在這里，民間伊斯蘭認為救濟的受益人事實上通過為施主提供表現宗教憐憫行為并因此從上帝那里獲取報償的機會又幫助了他們。

[[301]](#_301_15) 此過程最好的討論之一參見Georg Simmel，"The Poor，”pp.150—178 in Georg Simmel on Individuality andSocial Forms, ed.Donald N.Levine （Chicago:Univ.of Chicago Press，1971）。另一具有洞見的分析集中于獄警和囚犯間的類似關系。參見Thomas Mathiesen, The Defenses ofthe Weak:A Sociological Study of a Norwegian Correctional Institution（London:Tavistock，1965），155—164.

[[302]](#_302_15) 當然，事實上，哈吉·丁在尋求被稱為茶錢的繼續租用土地的優先權的額外費用，他選擇要求以實物索取并且合法化為扎卡特。考慮到其在道德上那么令人不快，假使做出這樣的要求，那它將被期望拐彎抹角地實現。

[[303]](#_303_15) 舉例來說，兩個住在村里并且參加附近阿拉伯學校活動的十幾歲的姑娘突然心血來潮，她們在放學之后穿上學校平日要求的袍子和頭飾。她們顯然要通過自覺地穿著伊斯蘭服飾來顯示她們的虔誠。然而，這卻被村民理解為試圖在宗教上展示自己的地位。兩人勇敢地面對著隨之而來的白眼和冷漠，直到一周之后，她們才屈服，并重新穿上了在家時沒有頭飾的標準的紗籠。

[[304]](#_304_15) 當然，對傲慢自大的指責同樣經常指向村民必須對付的外來者，其中包括地區官員、地區辦公室的辦事人員、農會的工作人員、政府大米磨坊的店員（LPN）、醫院和診所的護士與醫生。對于這些外來者，不同之處在于傲慢是被預料到的，而不傲慢是受歡迎的例外。相反，村里的自大傲慢是不受歡迎的例外。

[[305]](#_305_15) Mokhazani，"Credit，”71.

[[306]](#_306_15) 我從白里安·費甘的杰出的學位論文中挪用了這一說法。Brian Fegan，"Folk-Capitalism:Economizing Strategies of Wet Rice Farmers in a Philippine Village"（Ph.D.diss.，Yale University，1979），317—325.

#### 歪曲事實：分層與收入

[[307]](#_307_15) 一項有關一個法國村莊的有趣分析表明，村莊里資助人和受益人的社會意識形態在持續不斷的斗爭中被當做符號性的武器，參見Alain Morel，"Power and Ideology in the Village Community of Picardy:Past and Present，”pp.107—125 in Robert Forster and OrestRanum, eds., Rural Society in France: Selections from the Annal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 Press，1977). 正如莫熱（Morel）所言，“既然斗爭雙方都依賴于某種可預期的反應，兩種意識形態，即關于‘有價值的工人’的意識形態和作為‘村莊之父’的資助人——雇主的意識形態，部分程度上達成了共識，達成了一種允許斗爭雙方發展其策略的框架”。

[[308]](#_308_15) 有關財富和收入的問題理所當然在本質上是可比較的，并且在某種程度上塞達卡的富人擁有一套區別于窮人的比較標準。例如，同哈吉·布魯姆那樣的真正的外來的大土地所有者、擁有穩定工資的政府工作人員或者華裔店主和生意人相比，他們確實并不那么舒適。盡管包括某種程度的謙虛，但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那樣，謙虛并非其自我描述的唯一的、甚至是主要的原因。人們可能還會認為，考慮到相當大的猜疑，這種模式大部分僅僅是為了試圖迷惑待在本地的局外人。但這一模式在富裕村民知道我已經熟悉了他們真正的經濟狀況之后很久還在繼續，并且尤其是在其他村民在場的情況下繼續。  
 少數富裕村民，尤其是哈吉·加法爾和哈吉·卡迪爾，當私下和我聊天時會撕下偽裝，偶爾還會吹噓他們的財產。我將之解釋為他試圖同一個看上去有一大筆收入的陌生人相比或者試圖把他遠遠甩在身后。然而，在公開場合，防衛性的經濟謙虛就會繼續。只有當涉及稻谷產量時，這種縮小收入和財產的模式才會偶爾出現例外。這里，一個耕作能手的聲譽和藏富的欲望會發生沖突，并且前者偶爾還會勝出。

[[309]](#_309_15) 婦女們通常掌握著馬來家庭的現金收入。有關馬來世界基于性別的經濟角色的歷史模式的精彩分析，參見Marie-André Couillard，"A Brief Exploration into the Nature of Men/Women Relations among Pre-Colonial Malayan People"（Paper presented at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Canadian Council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ingapore, June 1982）。

[[310]](#_310_15) 讀者可能合情合理地想知道，在這么困難的環境中怎么可能確定真相。這不是一個單一的事件，而爭論通常都同收入的差額相關；根據人們接受誰的意見，就任何一方的平均值而言，差異很少超過10%。許多實際情況事實上可以通過直接觀察，通過詢問那些最不可能冒險掩蓋真相的人，或者通過真實記錄（在自己擁有土地或有關長期租賃的正式租金協議的情況下）等來檢驗，以建立起能讓人具有一定程度信心的評估。有關實際耕作——花費、產量、耕種的土地——的數據最容易通過兩年多時間的觀察獲得，與此同時，盡管我為了反復核對頗多的數字而非常重視調查村外的雇主和合作者，村外賺得的收入卻最難精確算出。

[[311]](#_311_15) 此外，盡管差別很小，但確定事實的真相卻并不那么簡單。在我待在村里的四個耕作季節期間，許多信息都可以直接或間接探知。因此，通過觀察真實的禮物贈送，我可以非常自然地推算出上一季度的確定產量和稻谷價格最可能的水平。事實上，富人宣稱的施舍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被夸大了，盡管當他們意識到我在逐步熟悉村里的模式之后夸大的程度有所降低。

[[312]](#_312_15) 在總結這些意見的過程中，我回顧了我的田野筆記，以確證這些觀點的確為許多富人和窮人所分別持有。最窮的37戶家庭中有11戶無法被納入到窮人的一致意見當中；這11戶當中有7戶的戶主事實上不是不同意而是在許多此類問題上有所保留或者說保持了沉默。最富有的15個家庭中只有4戶與一般意見相當不同。

[[313]](#_313_15) 也許可以被稱做“中間的”農民——大約剛好低于20戶最富有家庭的20戶人家——很難歸入上述描述。他們有關村莊分層的觀點曖昧不清或者相互混雜；如果存在任何趨勢的話，他們以較富裕的村民看待他們的方式來看待事物。

#### 合理化的剝削

[[314]](#_314_15) 有關強勢集團之委婉言辭的社會功能的杰出研究，參見Murray Edelman，"The Political Language of the Helping Professions，”Politics andSociety4，no.3 （Fall 1974）。

[[315]](#_315_15) Government of Malaya, Report of the Rice Production Committee，1953 （Kuala Lumpur:1953），vol.1，pp.45—46.

[[316]](#_316_15) 勒拜·侯賽因和他的兒子塔哈聲稱托·瑪赫在給他們接受更高租金的機會之前將他們一直在耕種的3里郎土地租給了帕克·亞赫。在其辯護詞中，托·瑪赫說她告訴了他們想提高租金的意圖，并把他們的抱怨當成了拒絕。事情的真相也許永遠也不會為人所知，但在我看來，有啟發意義的是，托·瑪赫通過如下聲稱而認可了這一習俗：她給了他們優先拒絕的權利，并且他們拒絕了。

[[317]](#_317_15) 1973年稻谷價格的劇烈上漲之后，倘若增長適度，地租的增長通常會被合情合理地接受。原因在于新利潤可以在土地擁有者和佃戶之間公平分配。

[[318]](#_318_15) 轉告的策略被用來提出微妙的問題，比如說事情發生在關系密切并且經常碰面的雙方之間。因此，當哈吉·卡迪爾決定讓女婿加扎利在季度前而不是收割之后給付地租時，他讓妻子告訴兒媳，后者隨后再轉述給加扎利的妻子。下一季，地租無需雙方當事人之間多言就預先交了。假使地租沒有預先交納，哈吉·卡迪爾就會在放棄此事和直接提議之間做出選擇。

[[319]](#_319_15) 我最初待在那里時，對我經常性的社交失誤（social misstep）的批評總是以這種方式傳達的。因此，當我偶爾未加思考地在屋里吹口哨時，和我同住的地主哈吉·卡迪爾選擇通過他妹夫沙赫儂告訴我，在屋里吹口哨很危險，因為人們確信這會招蛇進屋。

[[320]](#_320_15) 1955年以來，這一獨特的租佃被一次至少延續兩個季度的書面合同掩蓋起來，這一事實或許排除了非正式的手段，因為一項新的協議無論如何都將出現。

[[321]](#_321_15) 即使有其他正當理由解雇一個佃戶時，這一點依然如此。拉扎克的另一個兄弟（不是哈姆扎）住在村外，曾經把地租給拉扎克。村民聲稱，拉扎克事實上幾乎不繳納雙方商定的地租，看來果真如此。盡管兄弟認為收回土地是正當的，但按照當地的道德標準，他不能只憑這個理由，他還要告訴拉扎克，他不得不為他兒子收回土地。要給兒子或女婿提供土地的義務如此之強，以至于如果做父母的無法做到這一點就會遭到批評，并且不少沒法按期交租的兒子知道即使父母很窮，撤回他們的租賃權也很困難。對父母來說，很少在他們去世很久前就合法地轉讓土地，因為遺產問題是他們擁有的少數物質約束之一，他們相信，他們只有通過遺產才能做到老有所養。

[[322]](#_322_15) Charles Dickens, Our Mutual Friend（Harmondsworth:Penguin，1971），97.

#### 意識形態沖突：村莊大門

[[323]](#_323_15) 似乎沒有人記得建門的確切時間，但大部分人同意，正是由于靠近村莊的公路逐漸改善以及隨之而來的卡車運輸的增長才有了大門的建造。因此，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之前，村民似乎并沒有用村莊大門來保護雇傭工作的計劃；更準確地說，直到那時為止都不存在對自行車運輸的真正威脅。村民還一致認為，他們最初關心的是，耕地在村莊附近但不住在村里的農場主可能使用拖拉機運輸稻谷。

[[324]](#_324_15) 有證據表明，吉打州外部也可以觀察到類似的風俗。例如，藤本明實介紹說韋爾斯里省的賽義德村（Guar Tok Said），“村民中間有一個協議，稻谷商的貨車在稻谷交易期間應該停在村外，這樣麻袋裝的稻子必須被運到車上，從而可以給村里的年輕人提供工作機會……狹窄的道路使得貨車很難開進村里，但其實完全是可能的。”"Land Tenure，”196.

[[325]](#_325_15) 此處推理的重要之處在于，它表明了一個理念，即價格應該與生活費用——需求——相連，并且如同農戶價格（farm-gate price）反映出的一樣，種田人利潤的增長總應該與搬運工共享。

[[326]](#_326_15) 巴希爾后來告訴我，這個報告那天早晨由他、達烏德·賓·哈吉·加法爾和阿基勒共同草擬。

[[327]](#_327_15) 這次會議還討論了有關大門的一些調整措施。勒拜·彭德克繼續保管鑰匙并將得到允許卡車通過所收費用的20%。沙姆蘇爾和托·艾哈邁德的地正好在大門里面，將免于服從規則。

[[328]](#_328_15) 這一時期派系情感也達到了高潮，不僅因為大門問題，還因為村莊改進計劃所帶來利益的派系分配，這一點剛剛總結過。下文將講述并分析村莊改進計劃的故事。

[[329]](#_329_15) 唯有一個富有家庭同時包含了勝利者和失敗者。因為勒拜·彭德克是一個大農場主，同時還有兩個兒子用摩托車搬運稻谷賺錢。當人們意識到法齊勒是個沒有子女搬運稻谷的大農場主時，他的態度就更容易理解了。中層農民家庭很少從減少運輸成本中獲利，這無非是由于他們出售較少稻谷，但他們仍然反對大門，尤其是如果他們家里沒有人搬運稻谷。

[[330]](#_330_15) 嚴格說來，窮人繼續運送稻谷，尤其是在田地潮濕時的農閑季之后，從田里運到適合摩托車行駛的路上。然而，這種運送無論大門是否存在都是必需的。

#### 意識形態沖突：村莊改進計劃

[[331]](#_331_14) 吉本斯（Gibbons）和德·克尼迪克（De Koninck）都在經驗基礎上表明，穆達的忠誠村民和忠誠農場主，即那些忠于巫統的人，作為政府援助的受益人都有計劃地受到了照顧。D.S.Gibbons, Rodolphe de Koninck, and Ibrahim Hassan,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Poverty, and Inequality:The Distributional Impact ofthe Green Revolution in Regions of Malaysia andIndonesia（Farnborough:Saxon House，1980），chap.7.

[[332]](#_332_14) 除了塞達卡村，還包括雙溪凱林村、Bedong、Setiti Batu、Dulang Besar、Peropuk、Sinkir Genting、Raga、Kampung Kubang Pasu以及Selankuh等其他村子。

[[333]](#_333_14) 第三個中立戶穆斯塔法是卡米勒的女婿；由于他和妻子住在岳父的房子期間準備把妻子和幼子搬回他父母所在的村子，他被認為兩邊都沒有資格。此外，他還以強烈同情伊斯蘭教黨聞名。

[[334]](#_334_14) 對當地許多伊斯蘭教黨成員來說，達督·阿斯里和其他伊斯蘭教黨領導人參與領導聯盟的決定是一種背叛行為。被出賣的感覺如此強烈，以至于當他隨后回到反對派時，他們都心存懷疑。這并未改變他們伊斯蘭教黨的成員身份，這種身份已牢牢地植根于當地現實中，但的確動搖了他們的信心。正像許多人所說，“他拿了政府的錢”。

[[335]](#_335_14) 人們可能會想到，村民所能設想的最糟糕的派系斗爭的例子，就是分屬不同派系的親戚拒絕參與彼此的葬禮。圍繞葬禮儀式的團結似乎是村莊和宗教價值觀最后的棲身之地；一旦這也被破壞，某種不可能失而復得的東西也就一去不復返了。有關類似的哀嘆，參見Kelantan in Kessler, Islam andPolitics，154。

[[336]](#_336_14) 由于絕大多數伊斯蘭教黨成員恥于接受這種二手資助，此類事務的談判非常微妙。

[[337]](#_337_14) 在我所能收集到可靠信息的五六個村當中，款項的分配似乎同樣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派系界限。盡管如此，曼蘇爾的意見依然是正確的，因為雙溪凱林村以約有90%村民屬于巫統陣營而為人們所熟知。

[[338]](#_338_14) 她還附帶補充說，他們最近一直躲著她，可能是因為他們很難向她證明其行為的正當性。

[[339]](#_339_13) 根據別人轉述給我的話，其中的一人說，“咱們一大群人一起到地區辦公室。”

[[340]](#_340_14) 我并未真正看到這封信，因為沒有保留任何副本，但是四個簽署人都告訴了我信的內容。他們尤其為自己有勇氣簽上名字和身份證號碼而驕傲。

[[341]](#_341_14) 他們當中有蘇庫爾、洛斯妮、伊沙克、薩馬特、托·卡西姆、奧斯曼以及諾爾家。

[[342]](#_342_14) 那些故意缺席的人包括帕克·亞赫、杜拉、“瘦骨嶙峋的”瑪、巴克利、朱基夫利、沙赫儂以及瑪·伊莎。但是薩馬特和塔伊布出席了。

[[343]](#_343_14) 在這種場合人們能召集到的人數，是主人聲望和朋友網絡的重要反映。然而在這個例子中，到場者的不足更多是對村莊發展委員會而非吉·敦的指責。

[[344]](#_344_14) 即使伊斯蘭教黨成員得到了幫助，他們也不會回報這種仁慈或者是說聲“感謝”，這種觀點也出現過一兩次。在此，互惠原則被引用并與忘恩負義或不聽話的孩子的隱喻結合了起來。

#### 作為反抗的爭論

[[345]](#_345_14) 在巴希爾的事例中，這種表揚因如下意識而被沖淡了：村民意識到，他作為店鋪老板和政治領導的雙重身份需要他比別人付出更大的努力——這種努力在很大程度上被認為是利己主義的。

[[346]](#_346_14) 當然，這種社會壓力并不純然是符號性的，因為對于水稻種植的某些階段來說，村民的勞動依然是必需的。除此之外，如同我們即將看到的那樣，這種社會壓力由于暴力威脅以及偷竊行為而被強化了。

[[347]](#_347_14) 我確信，阻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努力通常被用于論證無產階級突出的歷史作用。參見Georg Luka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trans.Rodney Livingstone （Cambridge:MIT Press，1971），59.對這一立場的批評，參見我的"Hegemony and the Peasantry"，Politics and Society 7，no.3 （1977）:267—296，和下文第八章。

[[348]](#_348_14)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Society:Class Struggle without Class，”Social History 3，no.2 （May 1978）:158—159.

[[349]](#_349_14) 凱斯勒在他關于吉蘭丹州伊斯蘭教黨反對派的社會基礎的研究中，通過強調象征和物質行動的融合，令人信服地表達了這一點：“［本研究］還省卻了在工具性與象征性政治行動、物質和理想因素之間同樣勉強的區分。地方問題僅僅是特定偽裝下的國家問題，它們具體且易于直接理解，并且，在具有地方特色的特定情境中，對之回應的闡述絕不是虛幻的……象征和象征性行動，只有在它們涉及真實的問題和普遍經驗時，才是可行的……它們不僅擁有真實的基礎，還有真實的后果。”Islam andPolitics，244。

[[350]](#_350_14) Injustice:The Social Bases of Obedience and Revolt（White Plains:M.E.Sharpe，1978）.

[[351]](#_351_14) 或許，一個類似的羞辱是，貧窮的美國基督徒無力給孩子們準備真正意義上的圣誕禮物。他們為了獲取哪怕最低限度的尊嚴要做出的犧牲，包括抵押未來，而這種犧牲無異于馬來窮人為提供一份拿得出手的開齋節食物要做出的犧牲。同樣，據說，在美國中部和南部，許多窮人都皈依新教，他們無力負擔天主教徒整套儀式所需的費用。通過這樣做，他們可以堂而皇之地不參與先前不得不參與的各種儀式。

[[352]](#_352_14) 他們中間相當多的人沒有任何土地——不管是租種的還是自己所有的——因此，他們無法參與勞動交易，也無法參與諸如求雨或避免農業災難這樣的筵席。

[[353]](#_353_14) David Gilmore，"Patronage and Class Conflict in Southern Spain，”Man（N.S.） 12 （1978）:449.在他有關1848年至1920年間德國工人階級運動的詳盡的歷史記錄中，巴靈頓·摩爾強調了他稱之為“應有的人類待遇”的需求如何頻繁地出現在工人的報告中。他在關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工人委員會的文章中總結道：  
 工人們憤怒的來源基本上是兩類事物的結合：特定的物質剝奪以及他們自己所稱的缺少應有的人類待遇。應有的人類待遇的缺少傷害了他們的公正感。在他們看來，這顯然意味著在每天的日常接觸中不把工人當人，比如態度過于生硬、不禮貌，等等。

[[354]](#_354_14) Wan Zawawi Ibrahim, A Malay Proletariat:The Emergence ofClass Relations on a Malay Plantation（Ph.D.diss.，Monash University，1978），398 et seq.

#### 公開的集體反抗的障礙

[[355]](#_355_14) 如同近來被解雇的一個工人曾可憐巴巴地告訴我的那樣：“比被剝削更糟糕的唯一的事情是不被剝削。”

[[356]](#_356_14) 確實，一旦離開村落，村里窮人間聯合行動的微弱可能就幾乎消失殆盡，這一點自不待言。甚至窮人用以證明其對工作、田地以及慈善權利要求的正當性的價值標準，在很大程度上也僅在村內適用。盡管親屬關系將絕大多數窮人與別處的親戚聯結了起來，但這些都是家庭聯系而非階級聯系。假使存在全國性的甚或是地區性的政治媒介，可以有效表達窮人在諸如土地改革、機械化以及雇傭等方面的階級利益，那它毫無疑問將得到大批擁護者。但是由大地主主宰的伊斯蘭教黨并非這樣的表達媒介。并且由于鎮壓和地方自治主義，社會主義政黨從未在吉打州建立起真正的根據地。

[[357]](#_357_14) Barrington Moore, Jr.，Injustice:The Social Bases of Obedience and Revolt（White Plains:M.E.Sharpe，1978），125.

[[358]](#_358_14) 就通常在地區層面對此模式的具有啟發性的探討而言，參見Michael Adas，"From Avoidance to Confrontation:Peasant Protest in Precolonial and Colonial Southeast Asia，”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History 23，no.2 （April 1981）:217—247。

[[359]](#_359_14) “退出”和“表達”的術語源自Albert O.Hirschman, Exit, Voice, and Loyalty: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Press，1970）。

[[360]](#_360_14) 馬來西亞人強硬的對外交易立場及其種類繁多的出口商品，使其較之許多其他第三世界經濟不容易受到沖擊，但容易受到嚴重、長期暴跌的影響。個人投資和出口收入的不足致使馬來西亞需要在過去兩年（1981—1982）中削減公共開支，從而使得這種脆弱性日益明顯。

[[361]](#_361_14) Karl Marx, Capital, vol.1 （Harmondsworth:Penguin，1970）:737.

[[362]](#_362_14) Nicholas Abercrombie, Stephen Hill, and Bryan S.Turner, The Dominant Ideology Thesis（London:Allen & Unwin，1980），46.在這三位作者有關封建主義、早期資本主義以及晚期資本主義的分析中，他們提供了一個頗具說服力的例子來證明，當代著名學者阿爾都塞、普蘭查斯、米利班以及哈貝馬斯詳細闡述過的“支配性意識形態”/“霸權”的概念，無論在邏輯上還是在經驗上都不能讓人信服。我將在下一章討論“霸權”和“虛假意識”的問題。

[[363]](#_363_14) Emile Durkheim, The Division ofLabour in Society（New York:Free Press，1964），356.quoted in Abercrombie et al.，Dominant Ideology Thesis，43.

[[364]](#_364_14) 有兩項研究在不同情境下都強調了壓迫以及“經濟關系的壓力”，參見Juan Martinez Alier, Labourers andLandowners in Southern Spain, St.Anthony's College, Oxford, Publications, No.4 （London:Allen & Unwin，1971） and John Gaventa, Power and Powerlessness:Quiescence and Rebellion in an Appalachian Valley（Urbana:Univ.of Illinois Press，1980）。

#### 抵制聯合收割機的努力

[[365]](#_365_14) 如同我們將要看到的那樣，暗中破壞這一說法十分準確。村民像19世紀的法國工人那樣，在工作中把鞋扔進機器，進而達到毀壞機器的目的。

[[366]](#_366_14) 有關這次運動當今的經典研究，參見E.J.Hobsbawn and George Rude, Captain Swing（New York:Pantheon，1968）。在未作不可避免的過度比較的情況下，我發現當談到動員起來反對脫粒機時，19世紀早期鄉下的勒德分子比吉打州的農民擁有幾個有利條件。他們被相當充分地無產階級化，并且依賴于雇傭勞動；他們能夠期望一套傳統的合法保護來強化他們對生存工資的權利要求；并且他們面對的是在鄉下設置較少的鎮壓機制。當然，他們也被征服了，但只是被在當時看來規模空前的軍隊所鎮壓。吉打州的抵抗要零散得多，規模更小，盡管從事破壞活動的人們和他們的英國同行都有在黑暗所提供的掩護下匿名行動的偏好。到1979年，官方公開的警告以及對機器更為嚴格的守衛將此種形式的抵抗減少到了可以忽略不計的程度。

[[367]](#_367_14) 播種機在1979年或1980年才開始對人工插秧構成嚴重威脅。

[[368]](#_368_14) 我們早已提到，洛斯妮是個寡婦。由于羅吉婭的丈夫被認為相當無能，這樣她就常常被看做一家之主，做出種種重大決策。這樣的婦女——尤其是如果她們已過了生孩子的年齡——事實上被視為“名譽”男性，并能免于服從馬來社會通常對婦女節制和恭順的要求。

[[369]](#_369_14) 在那個季，并非所有塞達卡農場主都能夠整齊劃一地被分為收割機使用者和共享小組的雇用者，因為至少有4個農場主在一塊地上使用聯合收割機而在其余地上使用人工勞動。在兩例中，如何選擇取決于每塊地稻谷的成熟程度，一方面要看有沒有空閑的聯合收割機，一方面要看特定地塊能否使用機器收割（由于有些地塊可能土質松軟、被水浸透或者可能被別的地塊或未熟的稻谷包圍）。在剩余的兩例中，農場主所作的決定幾乎肯定是為了避免欠債并避開可能來臨的聯合抵制。

[[370]](#_370_14) 他們正在耕種的稻田屬于共享小組中一個婦女的兄弟，這一事實使事情進一步復雜化。

[[371]](#_371_14) 這有益地指出了一些地方或村莊研究的局限——那些研究只考查階級的地方碎片，而實際上這些階級遍布范圍更廣、成員個人間彼此并不熟悉。關于階級的更為精確的看法事實上不僅包括空間維度，而且還包括時間維度，因為佃戶階級作為一個概念必須包括那些過去曾是佃戶的人以及現在仍是佃戶的人。在此情境中，階級的空間維度就其本身來說似乎贊成精英和知識分子協調并且統一其碎片化的行動。我們隨后將會看到，這一結論未必合理。

[[372]](#_372_14) Rosemary Barnard，"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in a Kedah Village，1967—1978"（Paper presented at Second 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Sydney, May 15—19，1978，33.

[[373]](#_373_14) 位于凱帕拉·巴塔斯的穆達農業發展局分支機構辦公室領薪的負責人在向我解釋為何未遂的聯合抵抗“沒用”時，明確強調了這一點，并且補充說，路面改進后，大農場主可以從更遠的地方運來勞動力。

#### “常規的”反抗

[[374]](#_374_14) 如果是在忙季，并且在結束這項工作時還有其他打谷的活兒等在一邊時就更是如此。通常，打谷工作實際上是上午的活兒而不需要干一整天，因為這項工作尤其需要體力以致工作要從黎明開始，并且剛到晌午就得結束。如果月光明亮，偶爾也會利用夜間涼爽的天氣進行打谷作業。

[[375]](#_375_14) 自然，還存在打谷工之間的競爭因素，每一對打谷工都在給定稻田中競相打下盡可能多的稻谷。

[[376]](#_376_14) 如果是農場主的近親在打谷，就會在一定程度上對此類行為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如果他的親戚是窮人，就會充分利用這種回旋余地。許多農場主告訴我，他們因此更喜歡雇用沒有親屬關系的人（或者，為此原因，雇用非親屬佃戶），因為這樣的話就更容易要求他們認真工作。他們補充說，雇用親戚打谷更容易使其他打谷工模仿他們的行為。農場主很難拒絕親屬在他們的地里拾穗的權利，這也是只要可能就盡量避免雇用親戚打谷的另一個原因。

[[377]](#_377_13) 這究竟是因為他們擁有更巨大、更多樣化的財富，還是因為作為外來者，只要他們需要就能絕對保證勞力供給（后者可能性更大）？這一點并不確定。但是他們被看成是確定工資額度的人。

[[378]](#_378_13) 婦女們的態度或許可由一句英國諺語最好地表達出來：“愚我一次，你之羞恥；愚我兩次，我之羞恥。”

[[379]](#_379_13) 當莊稼被冰雹打倒因而需要更長時間來收割時，俄國收割工人對標準計件工資率做出了更為激烈的反應，可將其與此進行對比。此例中的勞動力團體更加暴力，這似乎尤其應歸因于他們是外鄉人、陌生人這一事實。Timothy Mixter，"Of Grandfather Beaters and Fat-Heeled Pacifists:Perceptions of Agricultural Labor and Hiring-Market Disturbances in Saratov，1872—1905，"Russian History/Histoire Russe 7，Pts.Ⅰ&Ⅱ（1980）:139—168.

[[380]](#_380_13) 在此情境下，值得注意的是村里只有一個人——也就是哈吉·沙利姆“收養”的兒子——阿布杜爾·拉希姆，可以被看做“受約束的”勞動力，他只給一個富人干活。他的立場為其他窮苦村民所鄙棄，他們稱他為“奴隸”，部分是因為他必須接受雇主所強加的任何條款。

[[381]](#_381_13) 有跡象表明，打谷工在對待相對較窮并享有好名聲的農場主時不太苛刻，而在對待富有、吝嗇的農場主時則更為嚴苛。

[[382]](#_382_13) Karl Marx, Pre-Capitalist Economic Formations, trans.Jack Cohen,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E.J.Hobsbawm （London:London & Wishart，1964），133.

[[383]](#_383_13) 因此，舉例來說，共享小組不會同意取代其“罷工”的同事，而是會在下一個季接受大農場主的工作，而這個農場主希望雇用一個新組以取代前一個季給他帶來麻煩的那批人。

[[384]](#_384_13) 盛行于塞達卡的是埃里爾在西班牙南部稱之為“同盟”的變量。他描述道，“勞動者在試圖解釋規范存在的原因時使用同盟一詞。這些規范造就了義不容辭的——或者至少是值得稱頌的——旨在維持或增加工資或降低失業率的行為方式。這些行為方式在許多場合同單個工人的利益相對立，甚至可能會使他們遭受一定的風險或犧牲。”盡管此類規范偶爾會被違背，但看起來它們在小村莊里運行最為良好。因此一個勞工告訴埃里爾，“這個村里很少有人會做低于普遍工資的工作，因為村子很小并且人們相互都認識。他們不那么做；他們會被瞧不起的”。Alier, Labourers andLandowners in Southern Spain，122，136.

[[385]](#_385_13) 小店最終還是破產了，并在我離開一年之后關門，因為那時薩馬特欠債太多，沒辦法再貸款進貨。

[[386]](#_386_13) 正在討論的規則是被統治階級為了限制階級剝削而發展出來的屬于更大范疇的規則之一。正如巴靈頓·摩爾曾說過的，“對原有道德權威的挑戰、對習慣性行為方式（從屬群體創造出這些行為規范來保護自身利益、對抗上層利益并整合他們自己的社會群體）的挑戰，通常會引發道德義憤。（當挑戰來自從屬群體自身的成員時事情也是如此，正如速度極快的、以致超出非正式產量限定的工人會引發憤怒一樣）”；Injustice，30—31。在這個例子中，薩馬特等同于耕作中的高速度者，他破壞了一個窮人為保護自身而設立的微小然而至關重要的規則。

[[387]](#_387_13) 上一章托·瑪赫將3里郎土地的租佃權從勒拜·侯賽因和他兒子塔哈那里轉給帕克·亞赫，這就是一個不明確的事件。看起來帕克·亞赫只是在托·瑪赫說勒拜·侯賽因不再想按她提議的新租金租地之后，才為了土地接近她。勒拜·侯賽因和塔哈聲明，是他們的女地主而不是他們錯誤地支持了帕克·亞赫，因為她選擇將他們最初對新地租的抱怨理解為徹底拒絕。這一規范同佃農不應試圖彼此削弱的規范一樣強而有力。在這個事例中，是前者而非后者被明顯違背了。

[[388]](#_388_13) Emile Zola, The Earth, trans.Douglas Permee （Harmondsworth:Penguin，1980），317.從法國鄉村獲得的其他文字證據參見Honoré de Balzac, Les Paysans（Paris:Pleiades，1949）。就英國材料而言，參見Douglas Hay，"Poaching and the Game Laws on Cannock Chase，”in Albion's Fatal Tree:Crime and Society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by Douglas Hay, Peter Linebaugh, John G.Rule, E.P.Thompson, and Cal Winslow （New York:Pantheon，1975），189—253。

[[389]](#_389_13) 據說馬克思曾告訴恩格斯，正是對與木料偷竊行為相關法律的研究以及對摩澤爾（Mosell）農民階級境遇的研究，才使他從單純的政治觀點轉向經濟研究，進而轉向社會主義。Peter Linebaugh，"Karl Marx, The Theft of Wood, and Working Class Composition:A Contribution to the Current Debate，”Crime andSocialJustice 6（Fall—Winter，1976）:5—16.

[[390]](#_390_13) 這只是個粗略估計。通過撬開谷倉的門板或者開一個小洞來收集稻谷，倉里的稻谷就被偷走了。雖然許多農場主定期在谷倉內標記稻谷的數量，依然很難精確知道到底有多少稻谷被偷走了。通常，只有富裕農場主才有這樣的谷倉；窮人將他們的稻谷存放在屋角。這種蓄意偷竊只有一次被阻止，當時是伊沙克被屋子下面的吵鬧聲驚醒，他沖過去時卻只發現兩雙被丟棄的拖鞋和兩個裝滿稻谷的麻布口袋。

[[391]](#_391_13) 在六到七個傳到我耳朵里的此類描述中，大部分偷竊事件中的賊都來自于住在村外的華裔地主或佃戶。在此類偷竊中，藏匿或者秘密打谷的問題都不是那么嚴重。

[[392]](#_392_13) 依據所有報告，1978—1979年主季的偷竊行為造成的損失，遠大于此處所考查季的偷竊行為造成的損失。他們懷疑，其原因在于，前一個灌溉季由于干旱而被取消，因此村里的貧窮家庭比雙耕實施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加匱乏。

[[393]](#_393_13) 他是村里唯一擁有槍支的人。最晚是自從20世紀50年代的“非常事件”以來，槍支在馬來西亞的使用就受到了嚴格控制。比如說，當購買新彈藥時，主人必須出示所有用過的彈藥筒，以證明他們沒有把彈藥給第三者。

[[394]](#_394_13) 別處亦有此類報告，但就我所知的三個例子來看，每例中失竊的稻子都有3麻袋或者更多。

[[395]](#_395_13) 請將此同喬治·列斐伏爾關于認可惡意的描述進行比較。較窮的農民借此禁令堅持村莊集體財產觀的延續。他們顯然“為了擊退那些贊成加租的佃戶，由警告開始（在前院掘墓、在臺階上放子彈、在茅草屋頂上放上未點燃的火把，而后如果必要的話采取更為激烈的表達‘敵意’的手段（殘害動物、毀壞莊稼、在谷倉縱火）。”這些行為將會使那些熟悉愛爾蘭農業史的人感到吃驚。David Hunt，"Charting the Peasant Route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November 1982，mimeo.）.亨特正在討論列斐伏爾的Les Paysans du nord pendant la révolution francaise（Paris:F.Rieder，1972），93ff。

[[396]](#_396_13) 在經典的馬來民間傳說Pak Belalang中，巫醫將此交易變為一項有利可圖的生意。他的兒子偷了村民的水牛并將它們拴在森林里，然后焦急的失主就會付錢給他，因為他有能力察覺哪里可以找到牛。

[[397]](#_397_13) 在這樣的情境下——讓我們回想一下——窮人偶爾會將偷來的稻谷視做“自己動手拿的”禮物，而富裕的村民法齊勒則意識到了慈善救濟的減少和偷竊行為之間可能的關聯。

[[398]](#_398_13) 也有的小雞是被偷走的，但那與此處的例子不同。如果它們被偷走就一定會被賣掉，因為在窮人住宅區煮雞的味道將是一個致命的疏漏。

[[399]](#_399_13) 以非正確放血方式屠宰的動物，即使在它們死后立刻就被發現，也不能被穆斯林吃掉。

[[400]](#_400_13) 一項頗引人注意的有關范圍更大但依然缺乏組織的鄉間犯罪和秩序混亂的分析，參見Neil B.Weissman，"Rural Crime in Tsarist Russia:The Question of Hooliganism，1905—1914，"Slavic Review 37，no.2 （1978）:228—240.

[[401]](#_401_13) 富裕農場主將政府政策和規劃——貸款規劃、國家肥料津貼、發展津貼、入學許可、移民項目申請、小型商業津貼、大米磨坊以及出租車許可、政府雇傭——轉變為對他們有利的條件的方式，將構成所有此類分析的核心。

[[402]](#_402_13) 一些有趣的類似行為，參見Thompson，"The Crime of Anonymity，”in Albion's Fatal Tree, by Hay et al.，255—344。

[[403]](#_403_13) 參見E.J.Hobsbawm, Primitive Rebels:Studies in Archaic Forms of Social Movement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New York:Norton，1965）。我確信，霍布斯鮑姆的論述中充斥了太多關于下層階級歷史的單線論（否則它也是一個富有啟發性的論述），這一理論預言，每一種原始的抵抗形式都會在適當的時候被更高級的形式所取代，直到發展成為成熟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 “常規的”鎮壓

[[404]](#_404_13) 例如，參見Ann Stoler，"The Limits of Class Consciousness in North Sumatra"（Mimeo.1979）。

[[405]](#_405_13) 當時，塞達卡所產稻谷只有11%直接賣到了州稻谷行銷處（LPN）。剩余的絕大多數被賣給了個體商販，并且其中許多不是現金交易，而是用于還清在稻谷商販商店的積壓債務。

[[406]](#_406_13) 這個總結性的陳述基于以下三部分內容：塞達卡村民的言論——其中有4人參加過示威、亞羅士打附近的穆達農業發展局官員的報告以及那段時間Utusan Malaysia, Berita Harian, The Star及the Straits Times等報紙的報道。

[[407]](#_407_13) "Curfew Sekitar Alor Setar，”Berita Harian, Jan.24，1980，p.1.

[[408]](#_408_13) "Tunjuk perasaan issue padi bukan politik，”Utusan Malaysia, Feb.7，1980，bahagian kedua, p.4.

[[409]](#_409_13) "MB:PAS out to create fear, terror，”Straits Times, Mar.20，1981，p.1.

[[410]](#_410_13) 穆斯塔法、巴克利以及哈吉·卡迪爾的兒子邁哈特跑掉了，巫統分子加扎利也跑掉了。

[[411]](#_411_11) 選擇鐮刀是深思熟慮的，因為它也代表伊斯蘭教黨的象征“新月”。

[[412]](#_412_11) John Gaventa, Power and Powerlessness，145.加文塔就鎮壓和控制的影響如何能夠“自我維持”提供了一個有趣的分析。但我認為他從未充分地論述過“虛假意識”問題。一個馬來西亞觀點認為，馬來農民中的默許植根于文化而非“情境”。參見Chandra Muzaffar, Protector? An Analysis ofthe Concept and Practice ofLoyalty in Leader-Led Relationships within Malay Society（Pulau Pinang:Aliran，1979）。

[[413]](#_413_11) 比如，哈姆扎的母親去世時，他沒有用于購買葬禮必需品的存款。巴塞爾同意為他向不同店鋪做擔保，以便他能夠買到壽衣材料、棺材底部的帆布以及送葬者的食物。許多（但并非全部）債務由隨后的捐獻支付。

[[414]](#_414_11) 佩里·安德森在討論不滿和強制之間的關系時采用了一個類比，這一類比也適用于此。他寫道，紙幣由黃金支持并且由于其支持而流通，但在平時黃金是看不見的。只有在危機時，紙幣崩潰并且讓位于黃金搶購。同意就像紙幣一樣，在通常情況下盛行，但它盛行是因為它是“由一個沉默的、不在場的力量組成，這種力量使國家擁有了對合法暴力的壟斷……少了它，文化控制的體系將即刻變得脆弱，因為針對它的、對可能行動的限制將會消失不見”。"The Antinomies of Antonio Gramsci，”New Left Review 100 （1976）:43.

#### 常規的順從與不留痕跡的反抗

[[415]](#_415_11) 羅伯特·科爾斯關于美國黑人的看法與此相似，他寫道，“現在，黑人自然而然地采取非暴力行動，因為他們唯一的選擇就是將苦難歸諸于自身，將之轉化為沉悶的沮喪。黑人并不是現在變得生氣，而是一直很生氣，在內心的某一層面這種氣憤已經超出白人的視線，而且通常也超出了他們自己的視線。”Children of Crisis:A Study of Courage and Fear（Boston:Little Brown，1967），322.著重標記為原作者所加。

[[416]](#_416_11) Thompson，"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Society，”163.關于當代的證據，參見Howard Newby，"Agricultural Workers in the Class Structure，”Sociological Review 20，no.3 （1971）:413—439.類似的有關美國奴隸制度的更為詳盡的討論參見Eugene D.Genovese, Roll, Jordan, Roll:The World the Slaves Made（New York:Pantheon，1974），特別是第一卷。

[[417]](#_417_11) 我對他的成功完全是始料未及，因為哈吉·卡迪爾已經清楚地暗示塔伊布應該為他失竊的大米負責。我想到了塔伊布在此使用了他自己的保護策略，但沒辦法證實這種可能性。

[[418]](#_418_11) 我在這里非常感謝約翰·比得·哈維蘭德有關流言蜚語的討論。John Beard Haviland, Gossip, Reputation, and Knowledge in Zinacantan（Chicago:Univ.of Chicago Press，1977）.

[[419]](#_419_11) 我在這里非常感謝約翰·比得·哈維蘭德有關流言蜚語的討論。John Beard Haviland, Gossip, Reputation, and Knowledge in Zinacantan，第160頁。

[[420]](#_420_11) 在許多情景中，表面的決定性斷裂等同于宣戰。其他場景下的三個簡要的例子很有啟發性。在英迪拉·甘地去世前的最后一次普選中，她的反對者所使用的最有效、最具煽動性的策略之一就是，當她在人群中開始演說時，聽眾中成千上萬的反對者默默地轉過身去。在爪哇1965年對共產黨人大屠殺期間，據說當載有士兵及其平民支持者的卡車經過時，農村婦女偶爾會排列于路邊，并以完全蔑視的姿態掀起她們的紗籠來露出背部，為此而付出生命代價的在她們中并非絕無僅有。在波蘭羅茲（Lodz）市，緊隨戒嚴令的宣布和團結工會被宣布為非法，成千上萬憤怒的市民在官方新聞準時開播的晚上7:30將電視機屏幕朝外放在窗臺上，借此表達他們對于政府電視新聞聯播的蔑視。

[[421]](#_421_11) Pierre Bourdieu, Outline ofPractice, trans.Richard Nic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Press，1977）.

[[422]](#_422_11) 例如，參見Erving Goffman, Interaction Ritual:Essays on Face-to-Face Behavior（Garden City:Anchor Books, Doubleday，1967），30，106—107。

#### 服從以及部分的文本

[[423]](#_423_11) Emile Guillaumin, The Life of a Simple Man, ed.Eugene Weber, rev.trans.Margaret Crosland （Hanover, New Hampshire: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1983）.

[[424]](#_424_11) Emile Guillaumin, The Life of a Simple Man, ed.Eugene Weber, rev.trans.Margaret Crosland，第83頁。還可參見第38，62，64，102，140，153頁的其他例子。

[[425]](#_425_11) Emile Guillaumin The life of a simple Man, ed.Engene Weber, rev.trans.Margaret Crostand （Hanover, New Hempshire: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1983），48.著重標記為本書作者所加。

[[426]](#_426_10) Thompson，"The Crime of Anonymity，”307.

[[427]](#_427_10) 例如，參見Lawrence W.Levine, Black Culture and Black Consciousness（New York:Oxford Univ.Press，1977）; Genovese, Roll, Jordan, Roll;and Gerald W.Mullin, Flight and Rebellion:Slave Resistance in Eighteenth-Century Virginia（New York:Oxford Univ.Press，1972）。

[[428]](#_428_10) Howard Newby，"The Deferential Dialectic，”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7，no.2 （April 1975）:146.

[[429]](#_429_10) 此處應作一些限制。在權力平衡但各個派系能對其他派系造成相當破壞的情境下，大量完整文本同樣會被隱藏。其中每一個超級強權都能破壞其他的權力而在暗中玩牌。因此，不受限制的交流最有可能發生在兩個不僅在權力上平等，并且不能利用其權力給對方造成絲毫影響的行動者之間。在權力實踐已嚴格制度化并與法律有關的情境下，這一原則也不那么適用。在此類事例中，較弱的一方可能不會那么局限于隱藏那部分顯然處于固定的權力領域之外的文本。最后，人們可能還會期望將一般來說仁慈的權力（比如說父母——子女關系）排除在這種規則情境之外。孩子們確信父母的行動是為了子女的利益，這種認識使他們展現出他或她的完全文本而不用擔心因此受害。然而，在不求回報的愛的情形當中，較弱的一方會隱藏他或她的文本當中那些不可能贏得他們所珍視的人的愛的那些部分。

[[430]](#_430_10) 參見Jurgen Habermas,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trans.Jeremy J.Shapiro （Boston:Beacon，1971）和"Towards a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Inquiry 13（1970）：360—375。

[[431]](#_431_10) 完全文本有多少被隱藏無法簡單地從權力關系的標簽中推論出來。比如，奴隸制和農奴制的不同形式在此方面可能差別相當大。進而，在給定的從屬形式內，特定的個體，比如說掌握稀缺、有價值技術的鑄鐵奴隸，可能擁有相對較大的自主權。此外，大部分從屬形式都會允許在一些領域內發生大量的不加限制的交流，即在那些被界定為權力關系中立的領域。羅馬農神節、宮廷滑稽戲、基督教傳統的狂歡節、印度的胡里節都是允許從屬者暫時扭轉局面的宗教節日。沿此線索，參見James C.Scott，"Protest and Profanation:Agrarian Revolt and the Little Tradition，”Theory and Society 4，no.1 （1977）:1—38，and 4 no.2 （1977）:211—246。

[[432]](#_432_10) 當然，就后臺文本證實并強化了前臺行為來說，意識形態霸權被加強了。然而，真正的趣味在于對兩種文本之間關系的詳盡分析之中，這兩種文本可能既不全然相同又不全然矛盾。在這個分析中，我并沒有試圖暗示作為外來者的人類學家私下參與了各種村民的全部隱藏文本。盡管外來者的地位具有某種優勢，但它肯定也阻滯了了解其他信息的途徑。比如說，我總是會記住，絕大多數村民非常不愿意談及治療術和魔法實踐，他們猜測我可能會認為那是迷信。

[[433]](#_433_10) 例如，參見George Kelly, Hegel's Retreatfrom Eleusis（Princeton:Princeton Univ.Press，1979）; Hans-Gerog Gadamer, Hegel's Dialectic（New Haven:Yale Univ.Press），54—74; and G.W.F.Hegel, Phenomenology ofthe Spirit, trans.A.V.Miller, with analysis and foreword by J.N.Findlay （Oxford:Clarendon，1977），111—119，520—523。

[[434]](#_434_10) 意識到窮人一定怨恨自己在村莊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邊緣化地位時，有一種罪惡感在發生作用，這一點看上去似乎很有道理。這種解釋非常符合I.M.劉易斯對各種文化形態中的婦女和地位低下的男性擁有的精神財富的分析。在印度納亞（Nayar）低等種姓的禮拜式的情境中，他總結道：“因此像在其他地方的通常狀況一樣，從客觀的觀點來看，可以認為這些精神起到了某種‘富人的良心’的作用……他們惡毒的權力反映了嫉妒和怨恨的感情。高等種姓的人假定，不幸的低等種姓對上層種姓一定懷有這些感情。”Ecstatic Religions:An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Spirit Possession and Shamanism（Harmondsworth:Penguin，1971），115.

[[435]](#_435_10) 關于這一過程是如何被應用于階級關系和性別關系的有趣記述，還可參見Elizabeth Janeway, The Powers ofthe Weak（New York:Morrow Quill Paperbacks，1981），chaps.9—10。

#### 何謂反抗？

[[436]](#_436_10) Mullin, Flight andRebellion，35，著重標記為本書作者所加。

[[437]](#_437_10) Genovese, Roll, Jordan, Roll，598.

[[438]](#_438_10) 參見Allan Wildman，"The February Revolution in the Russian Army，”Soviet Studies 22，no.1 （July 1970）：3—23; Marc Ferro，"The Russian Soldier in 1917:Undisciplined, Patriotic, and Revolutionary，”Slavic Review 30，no.3 （September 1971）:483—512; Barrington Moore, Jr.，Injustice，364，and Theda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Press，1979），135—138。布爾什維克在前線的宣傳并未有助于引發這些開小差行為，這一點是一個共識。

[[439]](#_439_10) 有人可能希望將奪取土地和洗劫貴族的財產稱為革命行動，并且從它在1917年導致的后果來看它也的確是革命性的。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脫離任何政黨控制的自發行為，而且那些奪取土地的人極不可能自覺地將自己視做能帶來一個革命性政府的人，更不用說是建立一個布爾什維克政府了。參見Skocpol, States，135，138。

[[440]](#_440_10) E.H.Car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1917—1923，vol.1 （Harmondsworth:Penguin，1966），103.倘若我們期望將俄國農民的“自我遣散”帶回歷史，我們或許會看似正確地把18世紀規模宏大和持久的農奴在前線的斗爭算進去。努力保留農奴及其勞動或許是這一時期國內治理術的關鍵。杰羅姆·布盧姆提醒我們說：“有關逃跑及返回的法律遠遠多過其他方面的法律——這一事實本身就證明了農民逃跑的比例。”Lord andPeasant in Russia:From the 9th to the 19th Centu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Press，1961），553.

[[441]](#_441_10) 波蘭團結工會最初的成功也可以類似地大致歸功于這一事實，即不受歡迎的政體無法依靠它的軍隊積極鎮壓反叛的民眾，并且不得不轉而依靠可恨的輔助軍隊——警察組織Zomos。

[[442]](#_442_10) 薩帕塔（Emiliano Zapata，1879—1919）為墨西哥農民革命領袖，發動莫雷洛斯州農民起義（1910年），反對P.Diaz獨裁政權，提出“土地與自由”的口號，后在莫雷洛斯遭伏擊被殺害。——校注

[[443]](#_443_10) Oscar Lewis, Pedro Martinez:A Mexican Peasant and His Family（New York:Vintage，1964），102.

[[444]](#_444_10) 更為牽強但依然可能的是相反的情形，即我們無論如何都想象不到，一個我們不希望稱之為反抗行動的行動（例如，無意中在貴族的稻田里放火或者在一次打獵事故中一個農民誤殺了州的官員），可能會引發一系列削弱鄉村精英階級統治的事件。因此，任何關于反抗的定義多少都要考慮一下行動者的意圖。

[[445]](#_445_10) 另外，此類反抗不是下層階級專有的。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逃稅以及所謂的黑色經濟（black economy）同樣也是進行反抗的方式，但僅是中層和上層階級熱衷于此并取得極大成功。

[[446]](#_446_10) Utsa Patnaik，"Neo-Populism and Marxism:The Chayanovian View of the Agrarian Question and Its Fundamental Fallacy，”Journal ofPeasant Studies 6，no.4 （July 1979）:398—399.

[[447]](#_447_10) 在一個工廠或“國有農場”中，“階級斗爭的自利內核”包含對時間的再分配，人們以看似非常瑣碎的形式盡量將時間花在自己身上。因此，阿爾夫·呂德克和謝爾比·卡拉姆主張，德國工廠的“鬧騰”以及其他一些“表達和說明個人需要”的事例理應被視為“政治行為”。他們還補充說，對紀律和等級制度的反抗不僅在工廠中有所體現，而且在反抗社會主義政黨本身的行動中也有所體現。Alf Ludke, Shelby Cullam，"Cash, Coffee-Breaks, Horse-Play:Eigensinn and Politics among Factory Workers in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y，”Davis Center Seminar, Princeton University, April 2，1982，mimeo.

[[448]](#_448_10)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Society，”149.

[[449]](#_449_10) 逃稅的證據顯然來自吉打州一貫的土地稅欠款的報告以及系統性的謊報產量的跡象。因此，非聯邦制的馬來州在Annual Report of the Advisor to the Kedah Governmen t，1921（Alor Setar:Government Printer，1922）的第38頁記錄道：“水稻種植者懷疑收集統計數據是為了使進一步征稅成為可能，并使他們的收成減到最小。”1930年5月到1931年5月的報告指出，瞞報量應在15%至18%之間（第8頁），部分地區幾乎達到50%（第55頁）。有關1913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逃避限制橡膠計劃的情況，參見Lim Teck Ghee, Peasants and Their Agricultural Economy in Colonial Malaya，1874—1941 （Kuala Lumpur:Oxford Univ.Press，1977），and Donald M.Nonini, Paul Diener, and Eugene E.Robkin，"Ecology and Evolution:Population, Primitive Accumulation, and the Malay Peasantry"（Typescript，1979）。

[[450]](#_450_10) “無論錯誤源于何種智識，將運動和運動的組織等同起來（因而錯誤地認為抗議行動要有一個領導、一個章程、一個立法程序或者至少在他們被認出之前要有一面旗幟）的后果就在于將注意力從許多政治動蕩形式中移走，并將其指向更為隱蔽的社會問題和越軌行為的領域。結果，諸如大規模的逃學，或日益增加的工人缺勤，或日益攀升的公眾福利需求，或四處蔓延的拒交地租等事件，很少吸引政治分析家的注意。當法令明確裁定沒有任何政治事件發生時，什么都不需要被解釋，至少政治抗議是不需要被解釋的。”Frances Fox Piven and Richard A.Cloward, Poor People's Movement:Why They Succeed, How They Fail（New York:Vintage，1977），5.

[[451]](#_451_10) 參見此情境下威廉·雷迪所撰寫的精彩篇章。William M.Reddy，"The Textile Trade and the Language of the Crowd of Rouen 1752—1871，"Past andPresent 74 （February 1977）:62—89.雷迪認為恰是缺乏組織的群體行為才是可行的，并且認為人們開始重視和利用自發性，因為他們認識到它是最有效和成本最低的抗議方式。他說，文化默契發展得如此之好，以至于任何不平都能夠聚合人群而無需計劃或組織，更不用說正式的領導了。

[[452]](#_452_10) 弗朗西絲·赫恩在他有關19世紀工人階級歷史的闡述中發現，只有在這種非正式的儀式和共同體結構中，才有工人階級全心全意的直接行動。他確信，它們的腐蝕是工人階級在中世紀被“馴化”的關鍵。“在所有社會中，嚴重威脅現存安排穩定性的正式組織，如果不是直接被禁止，就是屈從于限制其行動范圍的法律約束……因此，維持生存的共同體的非正式的、往往是晦暗不明的結構和制度對維系集體行動來說是絕對必要的。”Francis Hearn, Domination, Legitimation, and Resistance: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19th Century English Working Class, Contributions in Labor History, No.3 （Westport:Greenwood，1978）.

[[453]](#_453_10) 沿此路徑的進一步分析，參見Scott，"Protest and Profanation，”and "Hegemony and the Peasantry，”Politics andSociety 7，no.3 （1977）:267—296。

[[454]](#_454_10) Til Eulenspiegel是德國民間傳說中的搗蛋鬼形象，善于惹事生非；Brer Rabbit 是美國民間傳說中的形象，其特性是能在不利形勢下進行斗爭并且往往取得勝利。——譯注

[[455]](#_455_10) Levine, Black Culture and Black Consciousness，81.

[[456]](#_456_10) 有關如何動員民間信仰和儀式來服務于政治目標和社會階級目標的具有啟發性的詳盡分析，參見莫里斯·阿古龍的出色討論。Maurice Agulhon, La République au village: Les populations du Var de la Révolution a la Seconde République（Paris:Plon，1970）.

[[457]](#_457_10) Eric Hobsbawm，"Peasants and Politics，”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1，no.1 （1973）:7.

[[458]](#_458_10) Goran Hyden, Beyond Ujamaa in Tanzania（London:Heinemann，1980）.還可見Issa Shivji, Class Struggles in Tanzania（London:Heinemann，1976）.有關阿爾及利亞國立農業組織以及試圖逃避這一組織的類似論述，參見Peter Knauss，"Algeria's Agrarian Revolution:Peasant Control or Control of Peasants，”Africans Studies Review 20，no.3 （1977）:65—78.正如一個國有企業成員所說，“以前我們是大土地所有者的（佃戶）……現在我們是國家的佃戶……所有工人都知道這一點。”

[[459]](#_459_10) 例如，參見Christine White和Adam Fforde即將發表于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的文章。

#### 塞達卡的物質基礎和規范性上層建筑

[[460]](#_460_10) 參見，例如Nicholas Abercrombie, Class Structure and Knowledge（Oxford:Blackwell，1980），68。

[[461]](#_461_10) 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這個階級還能夠意識到并且強烈地怨恨富裕的土地所有者利用此類貸款的方式：富裕的土地所有者通過窮人的土地抵押而接管了更多地權，從而強化了經濟依附的基礎。

[[462]](#_462_10) 這是皮埃爾·布迪厄的術語（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trans.Richard Nice [Ambridge:Cambridge Univ.Press，1997]，191）。本段和下一段的分析多有賴于布迪厄對于前資本主義統治形式細致入微的分析。

[[463]](#_463_10) Outline of Theory of Practice, trans.Richard Nic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Press，1977），179，著重標記為原作者所加。布迪厄還詳細闡述道：“和緩、隱蔽的剝削是當人們在不能公開、野蠻地剝削時采取的一種剝削形式。將這一本質上的二元經濟等同于官方現實（慷慨、相互救助等）是錯誤的，將其化約為客觀現實（將相互救助看成是強制勞役，將委托人、保證人看成是奴隸等等）也同樣是錯誤的。禮物、慷慨、炫耀性分配——其極端例子是美洲印第安人的冬宴——都是社會煉金術（social alchemy）的運作方式，每當公開的物質或經濟暴力的直接應用受到否定性限制時，它們就會出現，并且傾向于使經濟資本向象征資本轉變。”Outline of Theory of Practice, trans.Richard Nice ，第192頁。

[[464]](#_464_10) 在這方面，有人認為封建統治是直接的、赤裸裸的攫取，而資本主義統治經由商品拜物教（工人看似將自己的勞動力當做商品出賣）這一神秘化形式而起作用。變相攫取的“禮物”可以被看做資本主義制度下商品拜物教的實用等價物。然而，這并不是虛假意識的論據——這一點隨后將會明晰起來。

[[465]](#_465_10) 我想，人們可能看似正確地認為這些服務的全部——就其成本而言——并不比自由市場工資和租佃市場為達到同一目標所需的成本更多。然而，關鍵并不在于這些傳統的攫取形式更為方便簡易，而在于它們在此種情境下是必須的。

[[466]](#_466_10) E.P.Thompson，"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Society:Class Struggle without Class，”Social History 3，no.2 （May 1978）：150.

[[467]](#_467_10) 實際上，他可能會謹慎地對他所提出的要求進行試探。他通過暗示工作會被完成或者通過表明自己的財政困境來預先試探這個要求是否會被滿足。如果看上去有可能被拒絕，他就會就此打住，因為直率地說“不”將危及到將來再次請求的可能性。

[[468]](#_468_10) Bourdieu, Outline，37—38.

[[469]](#_469_10) Bourdieu, outline，40—41.

[[470]](#_470_10) Raymond Williams,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New York:Oxford Univ.Press，1973），182.他們的境遇和雷蒙·威廉斯所描繪的19世紀早期的英格蘭土地所有者的境遇并非沒有相似之處：  
 然而，英格蘭農業資本主義內部始終存在一個矛盾：其經濟是市場秩序的經濟，其政治是自稱的貴族和地主階級政治，需要完全不同的和“傳統的”紀律和控制。  
 雖然塞達卡幾乎沒有貴族階層，但非常清楚的是機械化、契約租佃以及二者對從屬、依附關系造成的后果同“傳統的紀律與控制”是矛盾的。

[[471]](#_471_10) 貧窮村民肯定會對這種合理化行為抱有懷疑。然而關鍵在于，在任何有組織的不平等結構當中，特權唯一可能的正當性必然存在于其社會功能中。就像在塞達卡一樣，當富人行之有效的自利行動（這些行動強化了這種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被拋棄，唯有花言巧語留存下來時，有產階級的社會權威必會受損。

[[472]](#_472_10) 參見，例如Howard Newby，"The Deferential Dialectic"，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7，no.2 （April 1975）：161—164和Brian Harrison，"Philanthropy and the Victorians，”Victorian Studies 9，no.4 （June 1966）：353—374。在另一項有關土地所有者農業“庇護”的敏銳的分析中，羅納德·赫寧（Ronald Herring）指出，對此類行動的投資應該被稱為“合法投資（legitimacy fund）”。"Landlordism as a Social System:Quiescence and Protest in Kerala"（Paper presented to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San Francisco, March 23—27，1983）.

[[473]](#_473_10) 參見，例如Unfederated Malay States, Annual Report of the Advisor to the Kedah Government for each year。這一模式至少可以追溯到很久之前泰國人的控制時期。

[[474]](#_474_10) 源自Economic Consultants Ltd, Kedah Perlis Development Study:Interim Report（Alor Setar:1977）。雖然咨詢專家預測同過去類似的人口外遷模式仍然不會減弱。甚至在城市工人和種植園勞力的供給主要源于中國和印度移民而非馬來人的殖民時期，情況亦然。

[[475]](#_475_10) 如果這一政治統治在選舉中受到嚴重威脅，那么已成為障礙的選舉制度就會被迅速廢除（1969年暴亂后的情況就是如此），這一點我毫不懷疑。

#### 重新思考霸權概念

[[476]](#_476_10) Antoni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ed.and trans.Quinte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London:Lawrence & Wishart，1971）.安德森認為，“霸權”的概念首先由布爾什維克提出，用來指無產階級為了戰勝革命的敵人而必須建立的對農民階級的統治。就此而論，它意味著政治控制，而未必是認同。這很有諷刺性。Perry Anderson，"The Antinomies of Antonio Gramsci，”New Left Review 100（1976）：6.

[[477]](#_477_10)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les, The German Ideology（London:Lawrence & Wishart，1965），61.中文譯文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德意志意識形態》第一卷第一章，第52頁。——譯注

[[478]](#_478_10) Gramsci, Selections，12.

[[479]](#_479_10) 參見約瑟夫·費米亞（Joseph Femia）的杰出討論，"Hegemony and Consciousness in the Thought of Antonio Gramsci，”Political Studies 23，no.1 （March 1975）。

[[480]](#_480_10) Gramsci, Selections，326—327，419.

[[481]](#_481_10) Femia，"Hegemony，”35.

[[482]](#_482_10) Gramsci, Selections，57，207.這表明，在處理其他事情時，革命性政黨將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創造其獨立的制度，這些制度將防止革命前的統治階級的聯合。但葛蘭西認為，它將如何發生這一點卻從來都不清楚。

[[483]](#_483_10) 參見，例如，Philip Carl Salzman，"Culture as Enhabilments，”in The Structure of Folk Models, ed.Ladislav Holy and Milan Stuchlik, ASA Monograph No.20 （New York:Academic，1981），233—256。

[[484]](#_484_10) 知識分子進一步離開政治斗爭和工人階級自身，糾纏于將幾乎強制性的影響歸諸他們自己階級的產品——也就是意識形態——的分析，或許這一點也不令人吃驚。

[[485]](#_485_10) 我非常感謝接下來尼古拉斯·阿伯克龍比、斯蒂芬·希爾以及布萊恩·特納所作的分析，他們對諸種偽裝下掩飾的霸權做出了精彩的一般性批判。Nicholas Abercrombie, Stephen Hill, and Bryan S.Turner, The Dominant Ideology Thesis（London:Allen & Unwin，1980），以及更具論辯性的——并且更有趣的——對阿爾都塞的猛烈攻擊，in E .P.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8），1—210。

[[486]](#_486_10) 此處使用的洞悉一詞借用了兩處來源：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Berkeley:Univ.of California Press，1979），and Paul Willis, Learning to Labour（Westmead:Saxon House，1977）。我特別感謝保羅·威利斯對于工人階級學校文化的研究，它是可靠地基于階級體驗的細致的民族志研究和微妙的意識形態分析的出色結合。

[[487]](#_487_10) Willis, Learning to Labour，175.吉登斯認為他的“主要法則”之一是“每個社會行動者都知道很多他/她身為其中一員的社會再生產的條件。”Central Problems，5 and see also 72.

[[488]](#_488_10) 無根據的結論的原因往往在于人們無法將意識形態和實際的階級經驗聯系起來。正如阿伯克龍比等人在分析其他人的研究時（Dominant Ideology Thesis，141）指出的那樣，“在使用標準化問卷的訪問調查中，工人們通常會認同統治要素，當這些要素被表達為抽象原則或指涉為一般情境時尤其如此。但當工人們身處其中或者當這些要素通過與日常現實相符的具體詞匯表述出來時，他們就會接受與前述截然不同的價值”。他們進一步認為工人階級意識形態的這種“混亂”并不會比統治群體更多。第144頁。

[[489]](#_489_10) 有關奴隸社會的論述，參見Eugene D.Genovese, Roll, Jordan Roll:The World the Slaves Made（New York:Pantheon，1974）。有關一般進程，參見我的"Hegemony and the Peasantry，”Politics andSociety 7，no.3（1977），and "Protest and Profanation:Agrarian Revolt and the Little Tradition，”Theory andSociety 4，nos.1and 2 （1977）。其他與此主題直接相關的著述，參見R.C.Cobb, The Police and the People:French Popular Protest，1789—1820（Oxford:Clarendon，1970）; McKim Marriott，"Little Communities in an Indigenous Civilization，”in Village India, ed.Mckim Marriott （Chicago:Univ.of Chicago Press，1955）; and Christopher Hill, 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New York:Viking，1972）。

[[490]](#_490_10) “一般情況下，社會提供給特定群體的回報越少，這一群體對待該社會的規范的態度就越發自主。”Lee Rainwater，"Crucible of Identity:The Negro Lower Class Family，”Daedalus 95 （1966）:212，cited in Lawrence W.Levine, Black Culture and Black Consciousness（New York:Oxford Univ.Press，1977），283.

[[491]](#_491_8) Abercrombie et al.，Dominant Ideology Thesis，50.

[[492]](#_492_8) 或許宗教是個例外，但我們這里只觀察早期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創造自己的教派和外在于官方正統學說的宗教的方式，其中包括革命性的千年信仰。例如，有關“邊緣精神”及刻畫各種社會中底層男女的占有形式的有趣討論，參見I.M.Lewis, Ecstatic Religion:An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Spirit Possession and Shamanism（Harmondsworth:Penguin，1971）。

[[493]](#_493_8) Friedrich Engels,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73）.162—163.恩格斯贊許地引用了保守派所說的文化隔閡，參見Disraeli, Sybil:or the Two Nations。

[[494]](#_494_8) 吉登斯在關于工人階級的著述中寫道，“誤解實際的、諷刺的（例如怠工）、滑稽的、在制造規范化認同的異化勞動程序中的疏遠的參與，這正是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社會學正統的幾大錯誤之一。”Central Problems，148.

[[495]](#_495_8) 這一點上，朱安·馬丁內斯·埃里爾對于澳大利亞農業工人的分析相當細致，頗具說服力。Juan Martinez Alier, Labourers and Landowners in Southern Spain, St.Anthony's College, Oxford, Publications, No.4 （London:Allen & Unwin，1971），chap.1.

[[496]](#_496_8) The Use of Literacy（London:Chatto & Windus，1954），77—78.著重標記為本書作者所加。

[[497]](#_497_8) The Social Bases of Obedience and Revolt（White Plains:M.E.Sharpe，1978）.458—459.巴靈頓·摩爾在別處還寫道，“不可避免的必然在某種程度上似乎是正當的。”同上，第64頁。同往常一樣，巴靈頓·摩爾在駁斥某些證據時非常謹慎，以至于他的大膽主張只有在他的個案研究中才是有效的。引文第二句所補充的“某些”和“一定程度上”相對于最后一句則更為精確地反映了他的立場。這里值得指出的是，他給出從不可避免向“正當”轉變的唯一原因和霍格特給出的相同，即受害者渴望稍稍逃離持續的心理苦痛，這些苦痛源自于他們必須承受他們處在讓人無法容忍的環境中這一事實。

[[498]](#_498_8) Frances Fox Piven and Richard A.Cloward, Poor People's Movement:Why They Succeed, How They Fail（New York:Vintage，1977），6.

[[499]](#_499_8) 人們可能會認為學者們的這些結論帶有保守傾向，而沒有考慮問題本身需要對被視為剝削的情境有一個居先的認同這一事實。尤其是因為這些學者都被說成是致力于社會主義問題的左翼學者，所以我引用了他們的觀點。這種一般化進程正是布迪厄在寫作“每個已經建立的秩序都傾向于生產……其專斷的順化”時所思所想的——這部分產生于“邊界感”（a sense of limits），部分產生于“現實感”（a sense of reality）。Bourdieu, Outline，164.

[[500]](#_500_8) 人們可能會認為學者們的這些結論帶有保守傾向，而沒有考慮問題本身需要對被視為剝削的情境有一個居先的認同這一事實。尤其是因為這些學者都被說成是致力于社會主義問題的左翼學者，所以我引用了他們的觀點。這種一般化進程正是布迪厄在寫作“每個已經建立的秩序都傾向于生產……其專斷的順化”時所思所想的——這部分產生于“邊界感”（a sense of limits），部分產生于“現實感”（a sense of reality）。第77頁。

[[501]](#_501_8) 參見，例如Maurice Godelier，"Fetishism, Religion and Marx's General Theories Concerning Ideology，”in his Perspectives in Marxist Anthropology, trans.Robert Brain, Cambridge Studies in Social Anthropology, No.18 （Cambridge:Cambridge Univ.Press，1977），169—185。

[[502]](#_502_8) 故此，阿伯克龍比、希爾以及特納在他們有關1850年后的幾十年間英國工人階級的“沉默”的研究中，沒有發現任何關于有效的教化或規范化的贊同的證據，他們發現的是對“資本主義經濟秩序及其階級基礎上的社會組織”的“實際的”接受。Dominant Ideology Thesis，122.約翰·加文塔在其關于阿巴拉契亞山脈煤礦工人的研究中同樣發現了順從甚至士氣消沉的態度。但這種態度遠非意識形態霸權或認同的證據，“它并非不具有理性……它經由歷史上一再重復的失敗體驗而逐漸被灌輸。”Power and Powerless:Quiescence and Rebellion in an Appalalchian Valley（Urban:Univ.of Illinois Press，1980），254.最后，埃里爾關于安達盧西亞農場工人的翔實分析認真區分了順從與合法性。“安達盧西亞勞工的行動選擇，既與大莊園的維持相協調，又與基于其上的社會結構相協調；但他們同樣持有對將會引發阻礙大莊園維持行為的價值判斷。如果他們不采取這些形式的行動，那也是由于控制的緣故，這種控制并非源于農業市鎮價值體系的社會約束，而是源于地方資本和馬德里行使的政治控制以及他們對1936年以后的恐怖時期的記憶。”Labourers and Landowners in Southern Spain，314—315.

[[503]](#_503_8) 對日常的關注恰好引發了這一觀念：傳統社會結構被當做一種宿命而被接受。毫無疑問，作為一種社會事實，對在短時期內不可更改的環境的適應，是強加于自身的。但我們沒有正當理由認為這就是事實的終點，這一點我們隨后就會看到。

[[504]](#_504_8) 我意識到，沒有一個社會情境能夠完全免受權力關系的羈絆。無權人士所表達的意見往往要受限于他們同伴的意見。在完全不受限制的文本這個意義上，根本不存在“真實的”文本。這里我要比較的是相對的限制。

[[505]](#_505_8) 安達盧西亞工人同樣不會經常談及土地分配的問題，盡管它在很久之前曾是真正的選擇，并且依然被認為是有關不公平的唯一解決措施。

[[506]](#_506_8) 這里我暫時不考慮這一事實——往往是從屬階級的行動在創造新的可能性方面極富影響力，并且常常包括那些連行動者自己都沒有預見到的新的可能性。

[[507]](#_507_8) 另一種表達這個主題的方式是聚焦于從屬階級意識不可避免的二重性——或者說多樣性。正如我們在哈姆扎和其他地區的案例中看到的那樣，許多為了謀生的日常斗爭，必然包含對于統治階級規范化制度的屈從——諂媚、恭順、溜須拍馬的說話方式等等。幾乎總是存在著與這些表面偽裝相矛盾的其他后臺的價值標準。并且，我們還不能完全把前者單單看成是虛假的偽裝而把后者看成事情的真相。在權力行使相當普遍且深入的情境中，后臺話語可能被限制在社會生活的隱匿之處，因此使得實踐中精英的霸權強加于行動規則。阿諾德·斯特里肯在他關于阿根廷農業鄉鎮的著作中認為，牧人有兩套分層話語：一個是完全基于保護人——被保護人關系的，另一個則是基于階級的分層。然而，前者在地方情境的日常生活中占據主導地位；它對底層階級行動來說既是一種解釋又是一種策略。后者則更適于及其少見的地方和全國選舉場合。觀察者可能看似正確地總結出傳統的、庇護主義的意識占據了主導地位，但這樣的結論僅僅等同于這樣一種發現：與那種行動方式相應的情境是占主導地位的情境。如果同階級話語相應的情境變得更為常見，那么同階級話語相應的階級術語和階級行動也會更為常見。那么，隨后人們可能觀察到的與其說是意識本身的變化，倒不如說是出現某一情境的相對出現頻率的變化，這一情境同一種行動方式有關而同另一種行動方式相反。"Folk Models of Stratification, Political Ideology, and Socio-cultural Systems，”Sociological Review Monographs, No.11 （1967），93—117.

[[508]](#_508_8) Moore, Injustice，464.

[[509]](#_509_8) 巴靈頓·摩爾在他的分析（Injustice，64）中借鑒了大量布魯諾·貝特爾海姆的觀點。Bruno Bettelheim, The Informed Heart:Autonomy in a Mass Age（Glencoe，Ⅱ.:Free Press，1960）.至于種種道德抵抗和有組織的抵抗何以在稍不嚴酷的條件下產生出來，可參見Emmanuel Rigelblum, Notes From the Warsaw Ghetto, trans.Jacob Sloan （New York:Schocken，1974）。

[[510]](#_510_8) 或許，在精神病院和平民監獄中，至少會存在一種宣稱其開設是為病人/囚犯的根本利益著想的意識形態。然而即使在這里控制也并不是總體性的，反抗也顯而易見。參見Erving Goffman, Asylums（New York:Anchor Books, Doubleday，1961），and Jack Henry Abbot, In the Belly ofthe Beast（New York:Vintage，1982）。

[[511]](#_511_8) 人們通常指出，這樣的自主性的存在不應簡單地歸結為控制的失敗，那正是制度運行所必需的。

[[512]](#_512_8) 統治階級或許會派間諜力圖滲透進這個社會空間。這些間諜的作用或許主要并不在于帶回信息，而更多地在于對有間諜存在這一事實本身的恐懼會壓制自主話語空間存在的可能性。

[[513]](#_513_8) 處在單一的外部地主的控制之下單一階級的村莊，即使村民的經濟條件不盡相同，它在階級動員方面仍有顯著優勢。他們還擁有同村莊本身相連的自主話語空間。

[[514]](#_514_8) 我們從精密的心理學實驗中足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一旦稍有獲得同類群體社會支持的可能，對統治的抵抗就會顯著增加。參見Stanley Milgram, Obedience to Authority:An Experimental View（New York:Harper & Row，1974），116—121。

[[515]](#_515_8) Joan P.Mencher，"On Being an Untouchable in India:A Materialist Perspective，”in Beyond the Myths ofCulture:Essays in CulturalMaterialism, ed.Eirc B.Ross （New York:Academic，1980），261—294.

[[516]](#_516_8) Genovese, Roll, Jordan, Roll.

[[517]](#_517_8) Gerald W.Mullin, Flight and Rebellion:Slave Resistance in Eighteenth-Century Virginia（New York:Oxford Univ.Press，1972），100.

[[518]](#_518_8) Jean-Paul Sartre, Being and Nothingness（London:Methuen，1957），434—435.quoted Bourdieu, Outline，74.

[[519]](#_519_8) "Protest and Profanation，”224—242.

[[520]](#_520_8) Marc Bloch, French Rural History:An Essay on Its Basic Characteristics, trans.Janet Sondheimer （Berkeley:Univ.of California Press，1970），169.

[[521]](#_521_8) Norman Cohn, The Pursuit of the Millennium（London:Seecker & Warburg，1957），32.

[[522]](#_522_8) 至于來自緬甸和印度尼西亞的事例，參見E.Sarkisyanz, Buddhist Backgrounds of the Burmese Revolution（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1965）和Saetono Kartodirdjo, Protest Movements in Rural Java:A Study of Agrarian Unrest in th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73）。

[[523]](#_523_8) 相當多的千禧年教派在歷史上以或多或少的持續性融入了社會結構，區域共同體的目標要么是脫離社會相對孤立地過自己的生活，要么是僅憑其虔敬等典范來變革社會。和平成果的取得既有賴于政府對這一教派的態度，又和該教派的初始信仰相關。

[[524]](#_524_8) Judith Nagata, The Reflowering of Islam:Modern Religious Radicals and Their Roots（Vancouver:Univ.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forthcoming），chaps.3，6.

[[525]](#_525_8) A.J.Stockwell, British Policy and Malay Politics during the Malayan Union Experiment，1945—1948，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Monograph No.8 （Kuala Lumpur:Art Printing Works，1979），151—161.

[[526]](#_526_8) 幾乎每個月報紙上都有關于指控宗教教師傳播虛假教義的報道。1979年，一個身為緬甸穆斯林的教師，帶領他的信徒攻擊了位于彭亨州的警察局。

[[527]](#_527_8) 借助于巫術和神圣戒律而產生的有關刀槍不入的信念，是絕大多數千禧年實踐的標準特質。它還說明了否認必然性的終極、關鍵要素。千禧年意識形態的作用并不僅僅是否定了社會秩序本身，而且否定了用于穩固社會秩序的權力。當然，唉，對宗教意識形態必然性的征服，不同于其在實踐中對宗教本身的征服，參與此類叛亂的大多數人的命運就悲劇性地證明了這一點。

[[528]](#_528_8) 由于霸權術語經常暗示著霸權意識形態是精英單獨創造的，然而事實上它往往是一再被試驗、修正的先前斗爭和妥協的產物，因此霸權術語本身就存在問題。相關內容可參見有關“對應”的富有啟發性的討論。W.F.Wertheim, Evolution or Revolution （London:Pelican Books，1973）.

[[529]](#_529_8) Gramsci, Selections，161.

[[530]](#_530_8) 葛蘭西隨后在同一篇文章有關政府的部分就主流意識形態做了類似的觀察：  
 ［獲勝的政黨帶來的］經濟目標和政治目標的調和、知識和道德的一致，將使沖突的所有問題偽裝成“普遍性”而非團體性的問題。并由此生產出重要的社會群體對一系列從屬群體的霸權……換言之，統治群體努力使自己與從屬群體的一般利益相協調，并且政府的存在被看成是一種持續的形成過程和取代不穩定均衡的過程……此均衡是在重要群體和從屬群體利益間、在某種程度上為統治群體利益主宰的均衡。但這種均衡終止于一點，即缺乏緊密的共同經濟利益的那一點。  
 Selections，181—182. 因此，主流意識形態的關鍵功能就是約束精英，這樣，他們的短期利益就不會危及整體社會秩序的穩定。

[[531]](#_531_8) 在此情境中，可參考吉登斯有關工人階級為了使最初是資產階級的“局部”利益一般化而進行的斗爭的討論。Central Problems，193ff.

[[532]](#_532_8) 在我看來，這里又一次對霸權概念反思不足，因為“順從”和“共同犧牲”既是由抵抗和斗爭贏得的，也是由精英給予或強加的。換句話說，從屬階級的斗爭有助于決定何種類型的從屬將使同意成為可能。

[[533]](#_533_8) 例如，參見Frank Parkin, Class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Order（New York:Praeger，1971），72—102。保羅·威利斯（在Learning to Labour，110中）討論得更為深入，并且宣稱，如果事實上統治階級成功地反復灌輸了主流意識形態，那么它將發現自己面對了更多工人階級的憤怒和憎恨。特別是，他認為，如果英國工人階級的子女相信學校教授給他們的東西——也就是說，他們在學校表現良好并遵守學校規范將有助于他們工作場所中的社會流動——他們在未來歲月中將更加感到被殘酷地欺騙了。因此，他含蓄地表明，只有學校無法將意識形態強加給工人階級的子女，才會帶來社會穩定和順從。事實上，那些最令學校頭痛的工人階級子女以玩世不恭的態度投入工作，他們不抱任何可以被辜負的期望。我認為，在任何情況下，Learning to Labour都是有關霸權的最好的研究。

[[534]](#_534_8) “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這個術語取自Rudolf Bahro, The Alternative in Eastern Europe, trans.David Fernbach （London:Verso，1981）。

[[535]](#_535_8) 參見羅馬·拉巴（Roman Laba）即將出版的有關團結工會的著作。有關匈牙利工人生活的社會主義批判，可參見米克羅斯·哈拉茨的杰出報道。Mikl仵s Haraszt i, AWorker in a Worker's State, trans.Michael Wright （New York:Universe Books，1978）.

[[536]](#_536_8) 就這一點來說，參見Abercrombie et al.，Dominant Ideology Thesis，17; Richard Hoggart, Uses of Literacy, and Charles Sabel, Work and Politics: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Indust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Press，1982）。

[[537]](#_537_8) 托馬斯·馬蒂森在其有關挪威囚犯的精彩研究中強調，盡管事實上幾乎不存在囚徒之間的團結，“吹毛求疵”的態度依然普遍存在。他想通過這一點說明，囚徒常常時刻準備著抓住獄警自己宣揚的標準，借此指控獄警違背了他們自己的標準。在這個事例當中，獄警進步的（家長作風的？）意識形態為服務于囚徒的利益提供了有效的素材。囚犯堅持不懈地奮力爭取“機械的”平等、自主權利、資歷規則，并根據工會的路線表達最低的需求。與此同時，同管理者一樣，獄警們在努力地維持全權控制。Thomas Mathiesen, The Defenses of the Weak:A Sociological Study of a Norwegian Correctional Institution（London:Tavistock，1965）.

[[538]](#_538_8) Moore, Injustice，508 and 84.還可參見James C.Scott,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Subsistence and Rebellion in Southeast Asia（New Haven:Yale Univ.Press，1976），chap.6。非常有趣的是，在此情境中，當俄國的東正教牧師通過儀式保護的莊稼歉收時，他們偶爾會被攻擊。

[[539]](#_539_8) Gramsci, Selections，419，421.著重標記為本書作者所加。

[[540]](#_540_8) Gramsci, Selections，第327頁。

[[541]](#_541_8) Moore, Injustice，351.近來波蘭發生的事件在此意義上提供了另一個令人信服的事例。

[[542]](#_542_8) Moore, Injustice，第340頁。

[[543]](#_543_8) Moore, Injustice，351—352.

[[544]](#_544_8) Moore, Injustice，第273頁。亦可參見E.P.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New York:Vintage，1966），168。

[[545]](#_545_8) Moore, Injustice，369.

[[546]](#_546_8) 至于俄國農民階級，他們的行動當然非常激進，他們沒收土地并且焚燒貴族和官員們的家。然而，他們的目的非常適度并且視野狹小。一項評估指出：  
 在各路精英在首都爭論立憲和政策問題的同時，農民正在鄉下形成他們自己的政治秩序……他們拒絕接受國家標準，并且他們的替代措施截然不同于現代中央集權政府樸素的新說法……彼得格勒或許會設立為國家的政治中心，但是農民聯合抵抗這樣的把戲，并且正在著手書寫他們自己的產品的劇本。  
 John H. Kress,“ The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of the Russian Peasantry,” Soviet Studies 31, no.4 (October 1979): 576.

[[547]](#_547_8) Moore, Injustice，370.

[[548]](#_548_8) 恰好在革命前匯編好的陳情書（cabiers），實質上是每個部門抱怨和要求的清單。因為陳情書是由地方上的精英撰寫的，雖然人們由此可能會斷定陳情書更接近資產階級革命的最終計劃，但它們并不完全是大眾的意見。事實上，所有的陳情書都聚焦于地方上的不滿；多半認為應該維持封建主義但要求對其進行修正（例如，限制領主狩獵權、統一度量衡、要求對林地的權利、對牧師工資的限制）。巴黎之外的陳情書甚至沒有提及普遍的主權，并且絕大多數人是依據習俗提出自己的要求。就像一個歷史學家總結的那樣，“由此可以斷定，內心的革命狀態在人權宣言中得到表達，1789年到1791年的政令是1787年開始的危機的產物而非原因。”George V.Taylor，"Revolutionary and Non-Revolutionary Content in the Cahires of 1789:An Interim Report，”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7，no.4 （Fall 1972）:501.

[[549]](#_549_8) 我確信，此處與盧森堡和列寧的論辯有關，但是他們都沒有意識到工人階級或農民階級適度的要求可能帶來的激進后果。參見Kathy E.Ferguson，"Class-Consciousness and the Marxist Dialectic:The Elusive Synthesis，”Review of Politics 42，no.4 （October 1980）:504—532。

[[550]](#_550_8) Eric Hobsbawm，"Peasants and Politics，”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1，no.1 （October 1973）:12.

[[551]](#_551_8) Moore, Injustice，476.

[[552]](#_552_8) 同樣參見Bourdieu, Outline，164—171.

[[553]](#_553_8) Gramsci, Selections，178，334.

[[554]](#_554_8) Problems in Materialism and Culture:Selected Essays（London:New Left Books，1980），259.

[[555]](#_555_8) 現代政府的創建對于地方上的制度安排具有許多同樣的破壞性影響，我們可以以同一方式加以考察。

[[556]](#_556_8) 參見湯普森在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一書中有關古伯特（Cobbett）的分析，第761頁。

[[557]](#_557_8) Alier, Labourers and Landowners in Southern Spain，93—94.

[[558]](#_558_8) Moore, Injustice，459.

[[559]](#_559_8) George Orwell, The Road to Wigan Pier（London:Left Book Club，1937），173，176—177.

[[560]](#_560_8) George Luka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trans.Rodney Livingstone （Cambridge:MIT Press，1971），59.著重標記為原作者所加。

[[561]](#_561_8) 請允許我最后一次引用奧威爾的話：“對一個當權的左翼政黨來說，它最危險的敵人總是它過去的宣傳。”Sonia Orwell and Ian Angus eds.，The Collected Essays, Journalism, and Letters of George Orwell, vol.1 （New York:Harcourt, Brace，1968），515.

#### 附錄A 村莊人口記錄，1967—1979

[[562]](#_562_8) 當然，這是假設家庭平均規模沒有增加。由于所有的證據都表明即使在鄉村地區，家庭規模也一直在減小，故這是一個有把握的假設。

[[563]](#_563_8) S.Jegatheesan, Land Tenure in the Muda Irrigation Scheme, MADA Monograph No.29 （Alor Setar:MADA, 1976），26，其中記錄了1957年至1970年間，穆達地區鄉村人口僅以1.54%的年增長率增長，而同期全國人口增長率為3.1%。

[[564]](#_564_8) 這些例子當中有2例是還活著的寡婦或鰥夫，已經移居到附近燕鎮的龐多克（pondok）去了。在許多情形中，龐多克既是宗教教育的中心，又是某種伊斯蘭退休養老場所，在那里，老人們可以為自己的死亡做精神上的準備。

[[565]](#_565_8) 在一子或與其共同居住于同一家庭的弟弟因被接納至移民計劃而離開的情形中，1967年和1979年兩次人口普查顯示，這些人家都還是留了下來。因為這個原因，被納入政府移民計劃的單個人數要多于1979年人口普查中離開的家庭數。同樣，在2例中，被接納的個人選擇了放棄這個機會。

[[566]](#_566_8) 在我所逗留的18個月中，政府的移民計劃吸引了至少12個村民提交申請。半數申請者來自較貧窮的人家，并且為了申請冒了相當大的風險，花了很多錢（通常是200馬元）。

[[567]](#_567_8) 在這些特例當中，有一人靠領取全國鐵路退休金生活，他出生于塞達卡并且選擇在那兒退休；另一個是在主路邊開店的店主；而第三個人是寡婦，她從老房子搬到小房子里，和還在上學的外甥女一起居住。

[[568]](#_568_8) 該集團擁有的土地顯而易見地低于村莊的平均水平，但這也在意料之中，因為很少有人處于可以期望繼承土地的年齡。通常的慣例是父親去世前土地不會真正讓與他人；當一個農場主退出實際的耕種時，他有可能因此將土地租給他的孩子們。

[[569]](#_569_8) 擁有大量土地的農場主或許偶爾會讓一個兒子租種多于他將最終繼承的數目的土地。這在以下兩種情況下都可能發生：一是農場主其他的兒子還未達到耕種年齡，二是農場主其他的兒子已經從事了其他工作因而無法耕種土地。當土地最終被繼承時，這些年紀尚幼和不事耕作的兒子們通常會接受一份全額財產。在新出現家庭中，只有四個農場主能預期繼承超過其現有耕種數目的土地，而且全部多余的土地不超過6里郎。

[[570]](#_570_8) Brian Fegan，"The Establishment Fund of Peasants and Population Increase in Central Luzon:Changing Class Structures"（Paper presented at Second Conference of the Asia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ialia,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Sydney, May 15—19，1978）.